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文化大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文化大革命

1921–2011

中国共产党
九十年历程

90 Years' History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文化在革命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程
第八卷　文化大革命

主　编：李　晨　李　健
副主编：张　华　韩泰华
编　者：罗欣欣　张国华　黄忠红　王彦东　谢春林
王宁宁　赵云连　陈　夕　张　翔　郑雅茹
高远戎　黄如军　韩　松　程　晓　杨　峰
李明军　韩　光　李正华　李建斌　陈立旭
蒋仲辉　刘建国　崔晓敏　金　砺　丁瑞生
贾　迪　李剑斌　魏雨晨　马明宇　李梦溪
蔡　泽　隋　勇　陈建志　谢金涛　梁桂华
梁鸿儒　董　云　董振军　韩　荣　韩　璐
彭　涛　傅　珍　雷经纬　蔡博识　谭仲谋
周万里　朱金智　孙　柏　潘英俊　闫　磊
孙立辉　武常海　孙长虹　于本成　李　俊
刘　花　郭海贺　王　波　张昌伟　王立丰
吴宝满　韩国生　苏志江　焦健民　乔　华
陈蕴涛　龙　锋　刘文锐　王　振　周敬青
张　曙　董乐山
统　稿：周敬青　余汝信

目　录

第三章 上海夺权与二月抗争

第四章 武斗风行 全面夺权

第五章 九大召开 文革继续



第六章　林彪集团覆灭和周恩来批极“左”

第七章　科技和外交成就

第八章　邓小平开展整顿工作

第九章 粉碎四人帮 文化大革命结束



批判《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围绕《海瑞罢官》掀起了批判浪潮，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58 年冬，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困难，毛泽东领导全党进行纠“左”口号这个过程中，感到党内党外都存在着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东西。正是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要敢于直谏。

历史剧《海瑞罢官》恰恰是吴晗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倡直谏，提倡实事求是，提倡海瑞精神而创作的一部京剧剧本。海瑞的直言敢谏精神在 50 年代末期在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中被毛泽东视之为重要的思想动力，号召全党都实事求是地将自己观察到的实际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指出来，帮助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

1959 年 4 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号召全党同志要讲真话，并特意提出要大家学习明朝宰相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后来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和钱俊瑞把毛泽东这个意思告诉了著名明史专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鼓励他写海瑞。吴晗不久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等文章。同年下半年开始，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的邀请将海瑞的故事改编成历史剧《海瑞罢官》，经过修改于 1960 年 8 月成稿。北京京剧团于 1961 年初公演。有关海瑞的文章和京剧一面世，就受到了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所谓反党问题，是江青的发明。1962 年 7 月 6 日，江青看了这个剧本和京剧以后，就发现了问题，她认为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她找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谈话，点名要批京剧《海瑞罢官》，但遭到拒绝。

此后在她开始过问文艺工作后，多次向毛泽东反映：《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评。毛泽东开始不同意。1964 年，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些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同年下半年，江青找《人民日报》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被婉言拒绝。

1963 年 12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各种艺术都是死人统治着。戏剧部门的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 年 6 月 27 日，他又作了一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4 年 7 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织领导开展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学术批判，即在文化领域开展文化革命。彭真刚就任五人小组组长，江青便找上门来，要彭真组织批判《海瑞罢官》，还向彭真提供了一些包括吴晗在内的所谓"坏人"的名单，要一块批。"我看《海瑞罢官》没什么问题，吴晗这个人我了解，政治上很可靠。"彭真一口回绝。

1964 年 9 月，彭真来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学术界的情况，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了江青，他说："江青搞京剧改革是有成效的，但她对文化界、学术界和历史界的看法太偏激，吴晗在政治上和我们党靠得很紧，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江青有点左，而且喜欢强加于人。"

毛泽东也说："我也不赞成她信口开河，她是她，我是我，她代表不了我。"毛泽东还就学术批判的事对彭真说："这是你分内的事，由你决定。"

据此，彭真回到北京，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遏止学术批判随意政治化、随意点名批判的措施，一度紧张的空气缓和下来了。

江青见在北京施展不开拳脚，便采取迂回战术，南下上海。1965 年 2 月，江青找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其间，江青频繁活动于北京上海之间，秘密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目的是打北京市委，给彭真来个措手不及。

《评〈海罢〉》共分四部分。在前三部分中，文章歪曲早已明载典籍的



史实，攻击吴晗为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不惜改写历史。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文章罗列的这些罪名都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文章实际上涉及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江青要搞的批判文章是想让读者明白，吴晗1959年写有关海瑞的文章时，就“未卜先知”，要为发生在1961年的“单干风”和1962年的“翻案风”喊冤叫屈。对于这一点，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他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①]毛泽东看了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接着，在《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②]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到上海后，他得知北京各报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可见毛泽东是支持姚文的。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写作，是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保密状态下进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毛泽东之外无人知道。张春桥找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编委姚文元执笔，竭力逢迎江青意图。姚文元每改一稿都由张春桥假修改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之名，把稿件夹在《智》剧的录音带内由飞机送往北京审阅。到1965年9月文章初步定稿后，才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批准发表的已是第十一稿。定稿之前数稿虽然都在上海市委印刷厂付印，但中共上海市委领导成员除张春桥之外一概不知。定稿后，市委得知该文将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立即提出应在文章发表前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通气，但被张春桥以江青的“指示”为名竭力阻挠，并对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负责人封锁消息。

文章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震动，先是华东六省一市，尔后是全国其他省市的党报纷纷转载。思想文化界陷入空前混乱之中。

地方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彭真事先不知道，连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被蒙在鼓里。彭真厉声责问张春桥“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连续几天，彭真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意见。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文不得人心。他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毛泽东对此也有过评论：“文章（指姚文元——引者注）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③]可以看出，毛泽东已把批判的矛头进一步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中央书记处在大体上了解姚文元发表的背景后，指示北京报纸予以转载。

1965 年 11 月 29 日、30 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27 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

江青发射的“重磅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纷纷跟进，毛泽东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申一步。但是，由于彭真了解《海》剧的来龙去脉，根本与“单干风”、“翻案风”不相干，不赞成上纲上线，于是还只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

由于各地报纸在转载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时都在“编者按”里强调是“学术讨论”的性质，所以这颗“重磅炸弹”并没有达到江青等人预先想要达到的效果。特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恼怒的有两件事：一、姚文发表之后，当时彭真同志主持下的北京市委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北京市委专门成立调查组，对吴晗同志的政治历史作了调查，申明吴晗同志历史清白，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又无私人联系；北京市委对上海市不打招呼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一个副市长提出抗议。二、吴晗



发表的那篇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文中除了违心地承认错误之外，还大量引用史料同姚文元据理力争，并用肯定的语言申述自己“20 多年来一直在党的教育、培养、关怀下，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社会各界对吴晗同志的不幸遭遇也深表同情，社会舆论明显地向吴晗同志一边倾斜。周总理也曾经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由于形势险恶，周总理的保护措施没能得到实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竭力把对吴晗的批判升级。江青密令关锋、戚本禹等悄悄赴沪，与张、姚多次密谈，商量对策；回京后又同康生详细密谋。1965 年 12 月 8 日，戚本禹首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打着批判胡适的幌子，把矛头指向吴晗、翦伯赞，与姚文实行“南北夹击”。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田家英等人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④

这些话，更进一步加重了批《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 1966 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对《海瑞罢官》（后来扩及一切对海瑞的宣传和评论）怎样表态，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与此同时，江青于 1966 年 1 月 21 日从上海赶到苏州，与林彪面晤，进行新的交易，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去“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江青要借助林彪的支持，攻北京那些“不听话”的人了。

姚文元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毛泽东一年多后曾对外国朋友讲过：

“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

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⑤

毛泽东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而且给予极大的重视，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把发表这篇文章看作是“甩石头”，用以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这便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注释：

①《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1965年11月15日。

②《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7期，1965年11月20日。

③⑤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④毛泽东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



《二月提纲》意在正确引导学术思想界批评讨论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上纲上线，立足政治批判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出现大量不同意见。

对此，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不赞成这样的政治批判。11月28日，当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说到“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时，彭真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12月14日，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2月22日，当毛泽东再次提出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时，他又当面对毛泽东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①]

彭真主张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方求”也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同时，吴晗也作了自我批评，《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

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但这样的自我批评与毛泽东的判断相去甚远。

在《海瑞罢官》的实质是罢官的论断出来后，1966 年初，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升为了政治批判，并很快发展到对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全面的"揭盖子"，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政治性批判急遽升温，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批判运动推向高潮。形成了紧张的学术政治气候，许多文章上纲上线，造成知识界人士心情紧张，惶惶不安。

1966 年 1 月 13 日到 17 日，戚本禹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关锋、林杰写成《〈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 1959 年 6 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 1961 年 1 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与此同时，江青、张春桥收集证据，他们则把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大量反对意见都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知识分子进行打击。

在批判《海瑞罢官》开始以后，围绕着如何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中宣部在北京报刊界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并收集了各方面的情况材料。

1966 年 1 月 2 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由胡绳传达毛泽东 12 月 21 日的谈话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



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

彭真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过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可见，彭真即使在毛泽东谈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之后，仍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主张把根本和彭德怀毫无关系的吴晗硬和庐山会议扯在一起。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定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

1 月底前许立群将《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会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同志在 1962 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 1962 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等七篇材料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其中有一份是有关 1 月 7 日召开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杂志、《前线》杂志、《新建设》杂志等报刊负责人座谈会的简报，是由林涧青、龚育之整理而成的，主要内容是许立群的总结讲话。简报主要内容包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执行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指示。前提是执行是“跟”，但关于批判吴晗政治性的文章，上纲的程度，发表的数量及发表的时间都不好掌握。第二个问题是批判的有关步骤和范围问题。如有的报纸就主张《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一个一个来是否合适。而在范围上，批吴晗的历史观必然涉及翦伯赞，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也会牵涉到冯友兰和朱光潜，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还有其他报纸，如《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体育报》是否参加和怎样参加讨论。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面向群众。读者反映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第四个问题是文章的数量和质量问题。参加讨论的各报都反映现在的文章有质量的不多，版面接不上。这四个问题，从后两个问题看，都说明群众和干部对这场争论并没有兴趣，写文章的人不多，

真正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基本上不写，干部大多也不关心，认真看文章的人不多。

上述请示包括其他六份请示材料，上面都没有答复。正在这时，发生了郭沫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的事件。这件事和这场大批判紧密相关。事件本身恰恰说明，无限上纲，没有章法的批判运动，必然要导致混乱，导致一批专家学者人人自危。这将会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作为主管文化工作的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诸位，当然有责任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几条规定，来匡正这个批判运动。这就是《二月提纲》产生的历史条件。

在呈送上述七份材料时，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谈了几个问题：一、肯定对吴晗的批判已取得成效，认识到不只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但在报刊上的批判，揭露政治上的错误，如何掌握？有的文章上纲很高，说吴晗和彭德怀是一伙，并把吴晗比成蒋介石，这种文章发表好不好？二、反映有许多人提出要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批判，中宣部已通知不刊登批评郭老、范老的文章。另如关锋等都写文章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而他们在1962年也在报上发表过影射中央的文章。这些问题，如果只批评别人，不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内清理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一旦被人指出就很被动。而对谭元寿、马连良等京剧演员则不赞成公开登报检讨。因为，这方面的人很多，而且不好要求他们负太多责任。三、说批判文章已发了不少，今后应当注意讲求质量，如果做不到，即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精神办。许立群信写好后，即念给林涧青、龚育之听，随后呈送彭真。

《二月提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分析这些情况的基础上形成的。

2月1日，彭真把许立群的这封信及七份材料送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吴冷西每人一份，并说明拟于3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5日看过材料的毛泽东将材料批给江青：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1966年2月3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圈阅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



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再次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他同志的一致赞同。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

《提纲》的主要内容为六个部分。

一、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提纲》认为，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学术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方针。《提纲》主张采取“放”的方针，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军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

三、队伍。《提纲》提出，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

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

四、《提纲》认为左派要互相帮助。《提纲》提出，要形成大批的左派学术工作者的“互助组”、“合作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军阀的道路；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五、争论的问题。现在就要着手准备，到一定时期，在报刊上再发表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

六、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组成。许立群为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这个《提纲》虽然有些“左”的错误，但主要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批判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对于这个过程，吴冷西回忆道：“以彭真同志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立于1964年，成员还有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2月初开会研究当时学术讨论的情况，认为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提纲。当时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开会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中提出的意见，同意在学术讨论的文章中不涉及庐山会议，并且要五人小组去武昌向毛主席汇报，最后由毛主席作决定。”②

2月8日，由彭真、康生、陆定一、许立群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当时，毛泽东听到政治局常委已经讨论并认可这个提纲，没有立刻表示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只是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对彭真说到学术批判是否可以两个月后作政治结论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提法不赞成，说两个月以后也作不了结论，强调要放



开。二、关于对“左派”整风问题，他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三、认为吴晗问题的实质是罢官。对于吴晗，他还问彭真，吴晗能不能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呀。彭真说，他一直站在党的一边。毛泽东反驳说，那他总是站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边，这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接着他又说，为了不形成紧张局势，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同时还特别叮嘱不要批判郭老、范老，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自己主动作些自我批评就好。

在毛泽东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提纲的情况下，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 月 12 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 1966 年 1 月 13 日到 17 日写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

很明显，《二月提纲》是想将这场大批判尽量加以限制，以避免发生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混乱。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原本《二月提纲》的基本观点、方法与毛泽东的判断、观点有很大差距。显然同毛泽东准备以批评《海瑞罢官》为切入点，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揭露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想法完全南辕北辙。

由于有了如此大的分歧，不久，《汇报提纲》即被毛泽东否定。

事实是，毛泽东本质上并没有同意《二月提纲》。在“二月提纲”拟定时，1966 年 2 月，江青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支持下，到上海主持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十多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他一面加紧对江青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的《纪要》进行修改，一面则针对《二月提纲》，把批

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3 月 17 日至 20 日他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要用五年到十年的工夫，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不要指望那些老教授，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中央农村工作部 1962 年被解散）。

3 月 28 日至 30 日，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针对 3 月 11 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根据彭真的意见在电话中向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责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向中宣部打招呼这件事，毛泽东生气地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并且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3]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4]

还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同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说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毛泽东的讲话之后，戚本禹、关锋、林杰被限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分别发表。

4 月 18 日，《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

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学术观点》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同志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同时也要从学术上清算吴晗同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是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对吴晗的批判调子骤然升高，完全把吴晗当成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来批判。

毛泽东谈话后不久，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江青等人炮制的江青召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国，代替了《二月提纲》。

至此，《二月提纲》把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说成是学术争论的说法，被彻底否定。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批评了彭真，决定起草一个撤销、批判“二月提纲”的党内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将彭真、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打了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该通知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纲领性文件。

《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13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

注释：

①《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五一六通知”附件），1966年5月16日。

②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50页。

③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

④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台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座谈会”），以及会后产生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是“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一个重大事件。特别是“纪要”曾被认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①]。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

党内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左”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

第三，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江青早有政治野心，要“露峥嵘”，只是没机会。她曾抱怨“刘少奇他们专了我十多年的政，不让我参加党的活动”。1962年后，党内在思想文化方面，“左”的错误的发展，使她有了可乘之机。1965年底，在江青、张春桥策划下，姚文元写成《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出笼后，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方面的抵制和批驳。全国报纸，除上海外，没有一家及时转载。发小册子也不顺利。后来全国报纸虽然都奉命转载了文章，但共鸣者寥寥；反对姚文元的文章，为吴晗辩护者倒不少。当时《文汇报》社收到的来信来稿中，反对姚文元的文章的就有3 000多件。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江青对此十分“气愤”，她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

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找林彪。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去



苏州找林彪，以“文艺革命”为题，请林彪支持。出于各自的政治目的，二人一拍即合。

座谈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不正常的方式进行的，1966 年 1 月下旬，林彪让叶群打电话给当时总政治部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叶群还说：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总政决定由当时的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宣传部长李曼村参加。刘志坚带队。

1966 年 1 月底，江青秘书电话通知 2 月 2 日在上海开会。2 月 1 日，叶群电话传达林彪给江青的话。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2 月 2 日下午 5 点钟，座谈会在锦江饭店小会议室召开，江青、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还有张春桥参加了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接着，她就谈了一通文艺方面的问题，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这个讲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

座谈会分两段：2 日下午至 10 日为一段；16 日至 20 日为一段。其中 10 日至 15 日江青没有召集开会。整个“座谈会”实际是江青一人谈，实际上是江青系统抛售“左”的一套文艺观点的讲坛。

“座谈会”开到 2 月 19 日结束了，为了向总政党委汇报，刘志坚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 3 000 字。第一部分写召

开座谈会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一共有3 000字，《纪要》写好后，送给了江青一份。

江青看了之后说，这个材料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还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来参加修改。

这次修改由江青、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参加，主要由江青、陈伯达炮制，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第二、三部分的“双八条”，增加为“双九条”。全文由3 000字增加到5 500字左右。

稿子修改结束时，江青说稿子经张春桥、陈亚丁修改后，她就“不管了”，可以“传达了”。但事后，她又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共11处，其中重要的有：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在“要破除对所谓30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30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①]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3月10日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陈亚丁、刘志坚再次对稿子进行充实和修改，14日修改完毕。这次修改补充的内容比较多。把二、三部分的“双九条”增加为“双十条”。全文由5 500字增加到10 000字左右。重要的修改、补充内容有：在第二部分第一条中删去了马恩列斯的论述，增加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三篇著作，并增加了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两个所谓文艺黑线的代表论点。把“文化革命也要依靠解放军”的提法，改为“文化革



命解放军要带头”。加了一段评价斯大林的话，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现代派文艺的批评是尖锐的，但是他对俄国和欧洲的所谓经典著作却无批判地继承，后果很坏。”“我们应当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把第九条（现第十条）中“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文艺队伍”，改为“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并接着写了一大段理由，即“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全国解放前，我们无产阶级在敌人统治下培养自己的文艺工作者要困难一些……不论是创作思想方面，组织路线方面，工作作风方面，都要坚持党性原则，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同资产阶级必须划清界限，决不能和平共处。”

这次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主席审阅”。并于 3 月 14 日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作了修改”。根据陈亚丁当时的传达，毛泽东第二次修改的主要内容有：在第五条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解决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问题”，改为“有些左翼文艺工作者，特别是鲁迅，也提出了要为工农兵服务和工农自己创作文艺的口号，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解决文艺同工农兵相结合这个根本问题”。又在第一次修改的“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后面，加了“拒绝研究是错误的”。在第十条“党性原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显著标志”后面，加了“须知其他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有他们的党性原则的，并且很顽强”一句。在稿子的最后加了一句：“以上整个座谈记录所说的内容，仅供领导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在作了上述修改后，于 17 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

3 月 18 日，江青召集上述参与人定稿，未作修改。江青在给林彪纪要的同时还写了一封信。收到江青的信和“纪要”后，林彪让刘志坚、陈亚丁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经林彪修改，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 3 月 19 日的信和她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

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

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6 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敬礼

林彪 1966 年 3 月 22 日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对“纪要”作了第三次修改。据陈亚丁当时传达，主要有四个地方改动：一是把第二部分第二条中的“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二是把第五条中“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三是在第七条中“在文艺批评”一句之前，加上“使专门批评家和群众批评家结合起来”。四是把第三部分中的“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经过毛泽东这次修改，“纪要”就最后定稿了。

4 月 10 日，这个座谈会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批转全党。

不久后，《纪要》替代了《二月提纲》，成为了“文化大革命”指导性的文件。

“座谈会”的召开和“纪要”的炮制经过，揭示了江青与林彪互相勾结、利用的罪恶阴谋。“纪要”的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纪要”的贯彻和推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纪要”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江青、张春桥一伙的推动下，很快蔓

延为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黑线专政”。由此而来的是，建国17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被全盘否定了。一大批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人物”，一大批文化战线的领导干部被打成“黑帮”，被“全面专政”。进而掀起了文化战线的夺权狂潮和所谓的“斗、批、改”，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注释：

①毛泽东修改:《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稿时加写的话，手稿，1966年3月。

批判“三家村”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批判“三家村”，是打击北京市委，深挖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批判“三家村”，发生在1966年5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发生在会议刚刚进行完传达毛泽东最新指示，揭批彭真罪行的过程中，起到了与会上相呼应的作用。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北京晚报》和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半月刊创办的副刊专栏。

1961年初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在市委常委会上对宣传工作谈了这样的意见：现在暂时困难时期，“正是学习的好时候，报纸要提倡读书，才能使精神振奋起来，多读书才能眼界开阔，就不会斤斤计较”，“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怎么发愤图强、发奋读书的故事。”《北京晚报》编辑部认为这个意见非常好，于是决定开辟《燕山夜话》专栏，请邓拓主笔，写些杂文，“激励先进、策励后进”。

《燕山夜话》开辟半年以后，北京市委机关理论刊物《前线》杂志为了配合当时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前线》杂志在宣传工作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决定也开辟一个群众喜闻乐见的杂文专栏。为此，1961年9月《前线》杂志主编邓拓，邀请吴晗、廖沫沙共商此事，三人议定以《三家村札记》为专栏名称，以“吴南星”为笔名，轮流撰稿。吴（即吴晗）南（马南屯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

《三家村札记》把批评各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歌颂祖国的伟大成就和支持新生的力量看成是神圣的职责。

邓拓、吴晗、廖沫沙讴歌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抨击给人民事业造成损害的弊端和积习，赞美民族的优良传统，呼唤和创造滋润万物生长的和风细雨，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却遭到江青等别有用心之人的诋毁和



攻击。

1966年4月，在“上面”点名批判邓拓等人之后，北京市委不得不组建了一个批判小组，由市委宣传部李琪主持，集中批判了他们三人所谓利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借传播知识为名，贩卖封、资、修货色。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前线》杂志率先违心地公开批判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编者按表示，过去发过的这些文章又没有及时地批判，这是错误的，从而决心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评。

批“三家村”，是从批判吴晗开始，株连同吴晗一起写《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然后又株连到刊登《三家村札记》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和《北京日报》和北京市委的一个关键步骤。

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策划和组织下，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发表了其写作班子署名“高炬”、“何明”（关锋化名）的两篇矛头直指北京市委的署名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解放军报》、《光明日报》联合摘编《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所谓材料，并逐篇加按语予以定论。次日全国各报奉命予以转载。这些批判文章，利用摘取只言片语，索隐发微的构陷方法，深挖“三家村札记”的“微言大义”，说这些文章“以古讽今”，为的是“恶毒地污蔑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右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和社会主义事业”。以此认定“三家村”是“反党集团”；邓拓被认为是“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吴晗是“急先锋”。

在一连串的动作之后，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文，与北京遥相呼应。

《解放日报》社长马达回忆了当时《解放日报》刊登此文的情况：一天，曹荻秋要我到他家里谈话，那时我方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一进门，曹荻秋交给我厚厚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②]

这篇大批判文章，目标很明确是在制造新的罪名要打倒北京市委。从《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集中火力炮轰北京市委，背后的目标则

是所谓的“暗藏在中央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章指责邓拓、吴晗、廖沫沙的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姚文元在文章中，给邓拓等人下了这样的断语：“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还给邓拓等三人罗列了一系列的罪名：“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等等。

姚文元还在文章中说，要彻底挖出“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流毒，宣称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涤“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要从各方面彻底揭露《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祸害”，并且强调：“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文章发表前，曾送在上海的毛泽东审阅。5 月 11 日，全国各报刊奉命转载姚文元的文章。由批判吴晗发展到批判“三家村”，由批判“三家村”又发展到批判全国各地的“黑店”、“黑帮”，挖大大小小“三家村”的错误斗争。

1966 年 5 月 11 日，《解放军报》以林彪的腔调发表社论，指出：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里，把问题上升为搞“复辟”，是在为“复辟”造舆论。

同日，《文汇报》发表了戚本禹《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把北京市委直接领导下的报刊，说成是长期以来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大肆宣传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工具，还对北京市委、彭真提出了肆无忌惮的指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这些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而导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溃、改组。

全国各地掀起了“上挂下连”，揪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四家店”的浪潮，斗争矛头转而指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界的



知识分子身上。“三家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代名词，并流行一时，成为无接触传染病毒，因此罹祸者甚众，形成恐怖气氛。连与文化无关的小单位，也要揪个“三家村”出来，否则就是“不抓阶级斗争”。《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 年 6 月 1 日）更是以最高权威从政治上定调，写道：“剥削阶级的枪杆子被缴械了，印把子被人民夺过来了，但是他们脑袋里的反动思想还存在着”，“他们是不死心的”，“解放十六年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个思想治罪的罗网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撒开：所有对现实稍有意见，或被领导、群众认为有不满情绪、不健康思想，常常撰文发表赚额外稿费引起嫉恨的人，那些喜欢合群、唱和的大大小小的文人，或普通爱好者，在当时都曾被冠以“三家村”的帽子了。③

在揪“三家村”的风潮中，邓拓、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从 5 月 8 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可见这场批判的深入广泛。5 月 16 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④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 年 8 月，经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撤销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邓、吴、廖三人所作的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为邓拓、吴晗举行追悼会。

注释：

①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人的谈话记录，见《王任重日记》。

②见《马达自述办报生涯 60 年》，文汇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③《红旗》杂志，1996 年第 7、8 期。

④《南方周末》，1999 年 6 月 25 日。

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为了把批判《海瑞罢官》而点燃的“文化大革命”之火燃烧起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及其制定者，将“文化大革命”之火由意识形态领域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和各级党政机关，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

为了准备这次会议，1966年4月底，在毛泽东主持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在上海组成了文件起草小组，为即将召开的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休假，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是按照毛泽东同年4月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有关部署进行。毛泽东的有关部署由康生负责传达。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70多人，其中包括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八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没有参加。按照惯例，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5月4日，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河北厅正式开始，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多数与会人员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要发这样一个《通知》，更不了解这个《通知》的产生过程，于是决定先开几天“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的一系列近期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

座谈会从5月5日至7日共开了五次，实际上并没有座谈，而是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这几次座谈会，刘少奇都没有参加。

在座谈会期间，康生一个人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讲了八



个小时，传达了毛泽东 1965 年 11 月～1966 年 5 月关于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开展“文化革命”以及批判彭真、陆定一等的多次谈话。从 5 日下午开讲，一直讲到 6 日上午，他介绍的毛主席的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求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以后还会出。康生传达完关于中共中央《通知》起草情况的介绍之后，又对彭真进行了“揭发”。康生讲话后，会议转入讨论和揭发彭真的问题。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人上下呼应，发言揭发、批判、论证，成了会议上最活跃的几个人物。

座谈会之后，会议转入分组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与会者已经听过介绍，了解了《通知》产生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这是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在 4 月 14 日至 30 日的 17 天中先后七次审阅修改之后才定稿的，并且已经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所以，与会各小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5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首先由陈伯达综合介绍各小组讨论的情况，接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对彭真支持的《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批判，认定它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路线的，是“违反”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五一六通知》还把《二月提纲》说成是对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 1965 年 9 月至 10 月间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指示的“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5 月 18 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三次会议。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林彪从上午 10 点讲到午后 13 点。提出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引证古今中外各种政变的历史，指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风”，“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 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六十

一次政变，搞成了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四十一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从我国历史上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接着林彪又列举了周、秦、汉、晋、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父子、兄弟皇族争位，互相残杀的情况。林彪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他接着联系实际说"最近有许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林彪还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他们要联合起来搞反革命政变"。

林彪在讲完了政变的危险性之后，话锋一转，开始鼓吹"个人崇拜"，竭力称颂毛泽东是"天才"。他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 岁，100 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在讲话中，还提出了"四个念念不忘"的口号，即"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由于林彪的讲话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疯狂的程度。林彪个人也乘机达到了树立自己威信的目的。会后，林彪的这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到了全党，在"文化大革命"中广泛传播，起了极坏的作用。

林彪讲完话之后，会议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定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从 5 月 19 日开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后来，会场改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议根据林彪讲话中定下的口径，以"反党集团"的罪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

5 月 23 日上午，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张春桥在这天的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张春桥在发言中系统介绍了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同时对人事进行一系列的调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



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调叶剑英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5月24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的问题。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正式发动的阶段。然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绝大多数人，包括中共中央的大多数人，对此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不少人是不赞成的，或是很不理解的。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左”的理论、方针、政策，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注释：

①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批示。

②《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三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49~452页。

《五七指示》设计了理想社会

1966年5月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看了林彪转送的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并于5月7日作了指示回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你在五月六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①]

毛泽东给林彪所去的这封信后来就被党内外称为《五七指示》。

中共中央于5月15日转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和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报告，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给林彪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毛泽东的这封信在发到全党之后，于1966年8月1日又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向全国作了公布，对《五七指示》作了进一步阐述及推广。

这个社论中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

《五七指示》实际上勾画了毛泽东此时所向往和憧憬的社会理想蓝图。

《五七指示》的核心内容是兼管他业。就行业来说，每个单位（行业）都要有工、有农、有学、有兵，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

《五七指示》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如何通过多种教育形式提高党政军工农兵学商的全面素质，促进全面发展的思考。其核心思想对于全面培育各方面的有用之才具有指导意义。然而，当极“左”思潮盛行的历史条件下，执行时自然会发生极大的偏差，与毛泽东同志所希望的也有天壤之别。

《五七指示》还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五七指示》中关于学校的一些说法，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学的方针，特别是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了的判断，开展了教育战线的所谓教育革命，使教育成为夺权斗争的重灾区，造成了教育制度和教学秩序的极大混乱。

《五七指示》下发后的几年内，城市的一些军队（包括野战军）、大企业、机关、学校纷纷开办“五七农场”、“五七干校”、“五七工厂”。当时许多干部及其家属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搬到农村去了。名为：“走五七”。干部“走五七”也是当年非常时髦的一个词语。同时，工厂也在试办工人大学，学校在试办工厂，涌现了许多有影响的典型。如柳河“五七干校”、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等等。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都与《五七指示》精神密切联系。

1968 年，黑龙江柳河干校命名为“五七干校”，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此命名的干校。

1968 年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柳河建立以毛泽东“五七指示”命名的“五七干校”，干校的经验是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此后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各地开办。“五七干校”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当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大批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 18 个省区创办了 105 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

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毛泽东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②]

粉碎“四人帮”后，1979 年 2 月 17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单位所建立的“五七干校”逐步撤销。参加“四个面向”和“战高温”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逐步重新安排了工作。

《五七指示》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产物，是他心目中的新世界宣言书。《五七指示》给中国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

一、一个学校式的社会。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



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学生依此类推，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敦促人们相互学习，改造人们的思想，共同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科目、学习目标、学习手段等。

二、一个逐步消灭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三、一个淡化甚至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在《指示》中，每个行业从商业行为上来看都自成一体，军队除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能办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里虽然提到产品的等价交换，但发生的对象是在军队和国家之间，而非社会个人的单独行为，其他行业则完全没有提到产品交换，因此，《指示》对产品交换行为是相当淡化甚至消灭的，各行各业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稀薄甚至灭绝状态。

四、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

五、一个批“资”的社会。在《指示》中有一个明显的行文特点，就是对每个行业都明确提出“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1958 年，毛泽东开展人民公社运动，运动失败让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他伟大理想社会实现的一个根本性阻碍，他要再次发动人民“斗私批修”，把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涤荡，有西方学者就把毛泽东随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称作向人性宣战。

六、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会。从《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这就使社会内部的交流变得单一化，缺少社会发展的某些必要动因，同时，与国外的交流也变得无法实现，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当然《指示》中也提到相互学习和帮助，但诱发各行业相互学习的动因则变得模糊而且牵强。群众工作也只是限于军民和思想改造之类。社会发展必然失去该有的合理组合，毛泽东过分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而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适宜性，从而适得其反。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一直坚持激进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随着经济建设的推进，这种超现实带有空想色彩的理想主义观念愈来愈强烈，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错误。[③]

注释：

①毛泽东：《对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 月版，第 53 ~ 54 页。

②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 年 9 月 30 日。

③《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著，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播出

正当全国范围的学术批判的政治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全国上下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观点争论得白热化之际，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拟定并经中央同意发往全国的指导学术批判的《二月提纲》受到了指责，江青组织的《座谈会纪要》则对我国建国以来的文艺发展提出了所谓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一反动的错误论断被视为是正确的，《座谈会纪要》实际上成为了指导“文化大革命”文件。

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二月提纲》，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并在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后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组。

就在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结束之际，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恶毒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珮云，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字报用歪曲事实、截头去尾、诬陷栽赃的卑劣手法，诬陷宋硕 5 月 14 日讲话中提出的“现在要急切加强领导，引导运动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大字报对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党委副书记彭巩云进行指责，诬陷“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是把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导到‘纯学术’批判上来”；号召“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中央规定的“内外有别”等纪律是“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等等。

大字报还气势汹汹地说：

“在革命群众轰轰烈烈起来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坚决反击反党

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时候，你们大喊：'加强领导，坚守岗位'。你们坚守的是什么'岗位'，为谁坚守'岗位'，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白日做梦！"
"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大字报一出来，就遭到抵制和批判，但大字报却得到了曹轶欧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推向全国。6月1日，大字报经毛泽东直接批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广播。毛泽东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这张大字报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造成中国长达十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利用"四大"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的极为恶劣的先例，被公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标志。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是共产党员，均来自哲学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均为该系教员。

大字报的出笼，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员内部、一部分党员与学校党委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最初并不十分严重的分歧和摩擦与政治运动相交织，逐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激化起来。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者"四清"）。运动经历了反复，牵动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夏季至同年底。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从政治上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断言北大党委的方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使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受到批判。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指责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师按照"左"的错误观点，响应社教工作组的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校党委节节败退。北京大学党委



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与社教工作队进行抗争，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抗拒以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从 1965 年 1 月～1966 年 1 月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委支持北大党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

1964 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1965 年 1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和彭真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 年 1 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队的结论。3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此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此后，张磐石受到批评，离开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方针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因其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所以被称作“国际饭店会议”。

1966 年 1 月，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宣布结束。这时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国际饭店会议”对北京大学前期社教运动错误的纠正，以及聂元梓等人受到的批评，使聂元梓等人耿耿于怀。

196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并且正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5 月 16 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干部和党员。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

长的宋硕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了华北局指示，强调各级领导要坚守岗位，加强对运动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积极投入斗争。聂元梓等人后来就是别有用心地抓住宋硕这个讲话，污蔑这个讲话是“捂盖子”，要揭发批判宋硕、陆平、彭珮云。

同一天的中午，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七个人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目的是为批判北京市委搜集资料，以及发动“左派”写批判文章。曹轶欧临行之前，康生面授机宜，明确要求调查组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并且点了宋硕的名。要揭开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把矛头直指中央。5 月 25 日，在曹轶欧的煽动下，聂元梓等 7 人在校内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发难。

大字报的开篇，即以十分醒目的笔调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一声“这里有鬼”的大声疾呼，在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即 1966 年 5 月 24 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中央、国务院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的五点指示，强调要内外有别。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出现后，立即引起全校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北大广大师生纷纷批评聂元梓。化学系分析教研室和法律系的许多同志首先贴出反驳的大字报，指出这张大字报违反中央“内外有别”的精神，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在大字报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全校自发地贴出了 1 500 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除“笔伐”外，还有“口诛”，1 000 余人围着聂元梓辩论。

聂元梓成了北大孤立的少数派。一张张反击的大字报贴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周围。

北大的混乱惊动了中央。5 月 25 日深夜 12 时许，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派人到北大了解情况，重申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八条规定，特别强调了关于在运动中张贴大字报“内外有别”（因北大有多国留学



生，文革初期，周恩来曾经特别强调了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传达了周恩来四点补充指示。

周恩来特别指出，作为党和国家的纪律，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聂元梓受到严肃批评，并被指责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原稿的内容抄寄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作了报告。

6月1日毛泽东批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

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黄金时间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字报责难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说“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

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王力、关锋、曹轶欧以评论员名义写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这篇文章把陆平、彭珮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文章诬陷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这篇评论员文章以造谣诬陷、无限上纲的手段煽动全国动乱。

文章说，凡是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的，不论打着什么旗号，不管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篇大字报和评论员文章越级发表，向人们宣示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在一天内突然向全国发表这样两篇东西，不但一般干部和群众感到惊讶，也出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料之外。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听到电台广播后，打电话询问周恩来，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他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

字报》中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②]谁是"应该坚决抵制"的"错误领导"，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一来，各级党委实际上就很难继续实行领导，他们的话也没有多少人听了。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正常组织机构、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开端的。

与此同时，陈伯达还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鼓吹中国正"处于触到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激流之中"，"这是触到人们灵魂的问题，也是触到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

社论告诫人们要抓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论号召人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不当动摇派，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受其影响，"狠触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一类的新鲜词，成了这一时期的口头禅。

6月3日，《人民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社论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猛烈冲击着意识形态各个领域里的反动堡垒，也猛烈冲击着史学界的反动堡垒。"

随后，陆平等人的一切职务被撤销。

陈伯达看完大字报回到报社后，立即"指示"工作组写了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发表在6月5日的《人



民日报》第一版上。

这篇反动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打成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将攻击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和邓小平。这就使全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愿起来造所谓“走资派”反的群众，顶着“保皇派”、“保皇党”的帽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造成了群众之间严重的对立和分裂。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运动轰然而起。千千万万封用以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似的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大。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在全国燃烧起来。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圣地”。首都各学校、各机关、工、矿企业单位成千上万群众涌向北大，声援聂元梓。北大校园人山人海。

继北大“踢开党委闹革命”之后，全国各地的高校也学习北大的“榜样”，“踢开党委闹革命”，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迅速泛滥，使学校陷入瘫痪。局势呈现无法控制的势头，天下终于大乱。

“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全国播出，使全国的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浙江大学等校园里一天就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一些师生还到省委机关张贴大字报，矛头直指省委负责人。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决定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命运和历史作用的人。北京大学对全国文化和政治具有传统的影响，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示范作用，是非同一般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盛赞大字报的真正动机，是把它当做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步骤。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是针对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的，至于大字报贴出以后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成为“天下大乱”的起点，从根本上说，是由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决定的。

基层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动、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决策，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的三部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群

众运动样板产生的模式。

注释：

①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总编室：《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6月1日。

②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写的批注，手稿，1966年8月5日。

设立“中央文革小组”

“中央文革小组”是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成立的特殊机构，是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机构。1966 年 5 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此后不久，一个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的领导全国的机构诞生了。“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初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准备，严重打乱了中央正常的领导秩序。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思想不断聚集，文化领域的左倾批判越来越泛滥的形势下，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 1964 年 7 月初成立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处理日常有关文化革命方面的事情。组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副组长陆定一（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兼文化部长），成员有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社社长）。按康生的说法，他和吴冷西是后来加进去的。当时毛泽东对中宣部、文化部工作不满，叫成立三人小组，后来毛泽东听取了康生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告密，才让康生和吴冷西加入这个小组，成立了五人小组。一年以后，这个小组由于不支持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不赞成在文化思想教育学术领域的大批判，被“中央文革小组”所取代。

“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过程中，在所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中，毛泽东为解决斗争中出现的与中央一线领导的矛盾分歧，采取的非常措施，是意识形态领域“左”倾错误严重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所采取的步骤。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中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后，在国际国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在苏共二十大出现否定斯大林，国内出现右派言论的背景下，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速

度等一系列问题上，中央一线领导与毛泽东存在不同看法，由此不断加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及与他们的分歧。

由此，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当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到八届十中全会，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也当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表现。因此，一些中央部门及其领导人不断受到批判。

1964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划委员会是“两个独立王国”。在起草《二十三条》的时候，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表面化。

到了 1966 年，毛泽东错误地认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认为，在当时的中央核心领导层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他常委中，周恩来、陈云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严重右倾，受到批评。陈云不再参与中央重大决策，朱德年事已高，唯有林彪不遗余力地鼓吹个人崇拜。所谓正确的思想在常委中已经无法推行。在中央书记处里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或反党集团的成员；国家计委成了“独立王国”，中宣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成为“阎王殿”。在这样的状况下，新的代替书记处、政治局的机构就应运而生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完成组织建设的需要。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解决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党内大部分人尤其是上层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很难通过开会讨论或沟通协调等正常程序加以解决。

就像他 1970 年会见斯诺时所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为了改变与中央一线领导意见分歧中的不利局面，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毛泽东决定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一个组织。

在毛泽东看来，为了夺取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



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于是，毛泽东采取激烈的非正常程序，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及在广大干部群众中的威信，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个“独立王国”。

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规定，各级文革小组应由群众选举产生。但设立“中央文革小组”这样事关党的领导体制变动的大事情，毛泽东事先没有征求其他领导人意见，没有经过政治局讨论。而成员的确认，不是他个人决定，就是作为组长的陈伯达从这些人与毛泽东的关系、思想认识是否一致等方面来考虑的，或是江青直接插手的结果。这既反映了当时党内生活的不正常状态，也表现出毛泽东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信任。

“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要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领域进行反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斗争的革命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他说：“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权机关、意识形态。”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起，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界的不满逐渐发展。1963 年～1965 年间，根据他的批示，在文艺领域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并逐渐扩大到学术界。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试图控制这种紧张的局面，但 1965 年 11 月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掀起更大范围的批判浪潮。对于该文，中央书记处采取审慎态度。

1966 年 2 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举行扩大会议，会后整理的“二月提纲”，试图把文化领域的争论限制在学术范围内。但是，“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和其中许多提法，与毛泽东的想法不符。根据提纲精神，中宣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这成为了撤销五人小组的根本原因。

3 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并指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是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他还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解决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问题。他原本希望通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加强对

意识形态的控制，然而五人小组不仅没有贯彻他的思想，却成为他进行文化革命的障碍。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本来想对学术批判加以引导，但由于与毛泽东的设想有所背离，反而加剧了毛泽东对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因此，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机构，牢牢掌握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1966 年 4 月在中央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成员包括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提出修改意见后，报送在杭州的毛泽东。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初稿。

4 月 16 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初步通过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同时，毛泽东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央文件起草小组"，名义是给常委扩大会准备文件，实际上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通知稿进行修改，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而在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央通知稿中再次强调"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思想。

1966 年 5 月 16 日，在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写道："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指定陈伯达为组长，其他人员由陈伯达提出，陈伯达同江青商议后，决定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后经江青提议，增加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这个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 年 5 月 28 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在四个副组长中，江青名列第一。

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是"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在 20 世纪五



六十年代反对党内所谓右倾倾向斗争中，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的论战，使已经产生的“左”倾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增加了反修防修的紧迫感。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当时党内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需要借助一种力量，证明这场“革命”的必要性。而这种力量必须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能够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再也不能搞成“独立王国”；其次，熟悉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能够舞文弄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开局面；再次，能够认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跟上毛泽东的思想变化；最后，要具有很大的能量，敢于同党内老干部“作斗争”，而其他中央领导要么支持，要么无力反对。在与苏共公开论战中，陈伯达、康生及其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中央政治研究室、《红旗》杂志凭借其对党内政策的阐释和撰写批判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其中一些年轻的“理论家”，如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崭露头角。而由于“左”倾批判文章受到压制，他们对中央一线领导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是“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加上他们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时间较长，善于察言观色。由于以上原因，在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时，这些人就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并被赋予“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出版界”“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向所谓“旧”文化部门开战。

“中央文革小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是以个人崇拜和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政治体制弊端长期积累的产物。它的存在及其恶劣行径违反了党章，损害党的威信，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破坏和恶劣影响。这是“文化大革命”最为沉痛的教训之一，也是我们应该深入总结和认真汲取的。

“中央文革小组”的演变

“中央文革小组”（简称中央文革）自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设立，到中共九大后逐步消亡，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指导全国文化革命运动，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权力。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成为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代表。

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除了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所谓“反党错误”，决定停止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职务外，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还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不久，除了毛泽东和林彪，其他人都无权过问它的工作。在运动初期，党中央的职能机关几乎全被替换，毛泽东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驾驭全局。它的设置，初步完成“文化大革命”的组织准备，严重打乱了中央正常的领导秩序。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又影响了文革小组的命运。与此发展进程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为中央文革小组初创阶段，它充当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参谋秘书机构。

说初创，是因为：第一，小组成立伊始，没有人特别重视。“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编制。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的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的地方。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一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组长，办公室主



任均为兼职。这一时期，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因此，它没有办公机构。第二，小组成立之初，对怎样开展运动没有提出措施。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一线领导指导运动发展，各中央机构还在发挥一定程度作用。但到6月下旬，江青从上海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支持“造反派”，直接去看大字报，不要让原来的机构控制运动。这样，陈伯达、康生等才比较重视小组的工作，小组的地位也开始提升。

作为参谋秘书机构，“中央文革小组”一方面向毛泽东反映文化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方面负责重要文件、报刊社论的起草，并支持造反派。在如何领导运动的问题上，它与中央一线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日趋尖锐。在它的挑动下，学生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断增多。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几天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工作组问题。康生、陈伯达都提出不派或撤出工作组，但被中央一线领导否决。陈伯达报告了在上海的江青，江青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由于对小组的现状不满意，就开始抓小组建设。她首先抓了机构建设，成立办公室。她还找人和总政商量，调100名团以上政工干部筹办《快报》。这就是文革记者站的前身。这些人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记者的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向毛泽东和常委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其次，江青还抓了制度建设，建立小组全体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这时刘少奇主持的怀仁堂会议只是讨论运动的一般性问题，实质性问题都逐渐由“中央文革小组”讨论。

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还只是“文化大革命”的执行机构，组织很不健全，地位也不稳定，它在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时常遭到中央一线领导乃至社会各界的抵制。而“文化大革命”的实际进展，又难以令毛泽东满意。问题的关键是中央一线领导还在发挥作用，毛泽东决心对“文化大革命”再作发动，并赋予“中央文革小组”更大的权力。

第二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党的各级组织（野战军中的除外）相继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

7月18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他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关

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后，指出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在他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领导运动的方法问题，而且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他提出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名义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并指定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参加起草。

1966 年 8 月 2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决定陶铸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同日，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 14 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 18 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展的转折点，这表现在：

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分别参加各组活动，还得到毛泽东、林彪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而他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指责中央一线领导。林彪接见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你们作战斗员，进行全国的大战斗，任务很大。”

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的、重点、依靠力量、方法，还规定各级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一线领导逐渐“靠边站”，而林彪、中央文革一些人则扶摇直上。刘少奇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而林彪列为第二名，并成为唯一的副主席。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一跃而为政治局常委。1966 年 8 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住院。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机构膨胀，权力膨胀。“代理组长”江青已成为“实权组长”，列入中央领导人的行列。这些措施不仅从组织上保证“文化大革命”决定的执行，而且大大加强了文革



小组的权力。全会闭幕后，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相继遭到诬陷和迫害，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被文革小组掌握，原来由刘、邓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集体不复存在。

这次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成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而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的。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小组”权力正在无限扩大之中，正在取代中共中央书记处。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几乎全被冲垮，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主要通过中央几个领导人以及文革小组成员的接见、讲话和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的精神来体现。11月，中央发出《工业十条》和《农村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部署，把运动扩展到工厂和农村，文革小组的权力随之延伸到基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更加倚重文革小组。1966年国庆节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文革小组主要成员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的。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饭，参加者都是文革小组的成员。毛泽东讲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想法，并和大家举杯同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凡此种种表明，“中央文革小组”成为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最重要力量。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夺权带来各级党组织停止活动的混乱局面，导致社会上出现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潮流。1966年12月份，在北京大中学校出现猛烈抨击中央文革的大字报、标语，提出“踢开中央文革”、“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等口号，结果触怒了中央文革一些人。他们下令逮捕写大字报、大标语的人，以此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容置疑的权威。

第三阶段，从1967年初到年底，“中央文革小组”相继代替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成为中央最高领导机构。

首先，1967年1月初，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身份前往上海策划夺权。陈丕显、曹荻秋被打倒，上海党政大权落入由张春桥等操纵的“造反派”手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发去贺电，肯定上海夺权。这是第一次把中央下属的一个机构同中

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文，使之一跃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机构之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经常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后患无穷。

其次，“中央文革小组”在夺权的浪潮下，打倒一大批党的老干部，夺了中央书记处的权。1月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捏造罪名，宣布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将他突然打倒，陶铸分管的文教口包括中宣部、文化部以及各大新闻单位由文革小组分管，中央书记处彻底停止了工作。毛泽东不久指出：“现在是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他原来有这个意思，这时等于肯定了既成事实。但文革小组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做法，毛泽东不是十分满意。他指出文革小组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请示报告制度。2月初，他批评打倒陶铸这件事“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要求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中央文革小组一度失势。

再次，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制造“二月逆流”，打倒其他大部分政治局成员，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由于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在怀仁堂会议上批评文革小组并对“文化大革命”置疑的态度严重不满，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严厉批评。在1967年二三月间，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等人进行批判。林彪、江青等借机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大规模地打击和迫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并诬蔑这场正义抗争是“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所代替。这个“碰头会”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

与“中央文革小组”地位变化相联系，它的组织机构也得到充实，其办公室改成办事组并有所健全，还相继成立了文艺组、理论组、宣传组、档案组等职能机构，充实了记者站。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并不满足。他们打着“文革小组代替了书记处”的旗号，公然向周恩来夺权。江青当面指责周恩来：“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他们散布“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等论调，把斗争矛头指向国务院。他们还变本加厉地煽动群众组织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妄图染指中央的军事权和外交权。1967年7月22日，江青发表讲话表示赞成



“文攻武卫”的口号。7月底，文革小组主持起草《红旗》杂志社论过程中，强调要以“揪军内一小撮”为主题。8月7日，王力在接见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代表时，鼓动造反派“动一动”外交部的领导班子，并支持提出“打倒陈毅”的口号。

中央文革小组不断煽动极“左”思潮，毫无收敛，令毛泽东实在难以容忍。他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尽快稳定局势的意见，决定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隔离审查，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这一时期，“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除了陶铸之外，“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王任重“离职养病”，刘志坚被江青扣上“叛徒”帽子，二人均被淘汰出局。组员中，穆欣被江青扣了顶“叛徒”的帽子，除名。接着，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尹达，也被扣上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站了。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第四阶段，1968年初到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通过筹备党的九大，进入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权力达到顶峰。同时，文革小组仅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他们的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其命运走到了尽头。

1968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这标志中央文革小组掌握了任免地方领导干部的大权。因为在此前成立的省级革委会，都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均以党、政、军和中央文革联名批准。进一步全面掌握中央权力，1968年3月下旬，林彪与中央文革小组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阴谋夺取空军大权”，宣布撤销三人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并取代杨成武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并通过进一步打击叶剑英等军委领导，控制了军队的权力。

在这个阶段，中央文革小组逐步成为九大的筹备机构。早在1967年秋，毛泽东便就九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要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做些调查。这年11月，文革小组以群众要求的名义整理出一份通报，发向全国。其主要内容为：要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写入九大党纲；要大力宣传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力量”选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要把“叛徒、特务、自

首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统清除出去，以根绝隐患”。这些内容实际成为准备九大的指导思想，也表达了文革小组企图通过合法形式安排人员、夺取更大权力的目的。

在扫除各种后患、羽翼渐丰后，中央文革小组开始花更大精力准备九大的工作。首先，政治报告的起草。1969 年初，毛泽东把起草报告的工作交给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由于相互间矛盾，陈伯达抛开其他二人，自己组织人员写了一个稿子。同时，毛泽东又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报告。报告稿出来后，毛泽东作了多次修改。

其次，党章的修改。毛泽东把起草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上海方面。1967 年 12 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参照上海的经验，组织党章修改小组和群众性的讨论，提出修改党章的方案。一场群众性的修改党章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同时，康生在北京组织一批人突击研究党纲党章问题，对九大党章内容提出具体设想。

第三，筹备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 1968 年 10 月举行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为九大定下政治基调；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政治上、组织上作了结论，为九大作了政治和组织准备；称赞中央文革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小组成员进入新一届中央制造舆论。

第四，控制九大代表的选举。八届十二中全会规定，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是“充分民主协商，高度集中”，这实际上抛弃了传统的民主选举原则。因此，许多九大代表不是通过正常选举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与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共同决定，或由上级部门指定。文革小组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成为九大代表，而许多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被剥夺了代表权。

1969 年 4 月 1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左侧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新文革”成员，毛泽东右侧是周恩来等“旧政府”成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十分积极，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分别到各组进行“辅导”和“帮助”。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暗中争夺，都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塞入中央委员会，为把持中央领导机构作准备。在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的帮派亲信大量充塞其中。



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据了政治局的半壁江山。会议没有再设立中央书记处。这样，通过筹备九大，“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合法化，还拼命把自己的成员安排进中央领导层。

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虽然全会后也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是次数极少。1969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的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还有拟保留中央文革的内容，毛泽东也批示“原则同意”。但是，文革小组终究没有保留下来。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它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想法有关。设立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措施之一，它也基本上贯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意图。“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年后，出现了新的情况。毛泽东在1967年7月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要在1968年春天结束，或者稍迟一点，接着开九大，不能再搞了。他还几次说过，要尽快把老同志解脱出来，以便他们被选为九大代表或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后他又讲过结束“文化大革命”、召开九大问题。到1968年9月，各地的夺权全部结束，地方革命委员会已经建立起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从1969年开始，特别是党的九大前后，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他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制定新的宪法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把局势逐步纳入正轨，而且他认为这样做是可能的。

中央文革小组是靠打倒老干部起家的，这些极端分子在制造天下大乱、浑水摸鱼方面能量很大，而收拾混乱局面，发展经济和实现“天下大治”就要靠周恩来等人。而且，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随着权力上升，内部矛盾越来越多。继续存在下去只能是无休止的斗争。1969年3月，在讨论九大文件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这是他第一次明确地说“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党的九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大会在“在

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圆满地实现了毛主席‘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号召”。与此相联系，“中央文革小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毛泽东希望恢复党的组织，依靠新组建的中央政治局等机构进行工作。1967年下半年，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供征求意见用）》等文件中就有恢复党组织的内容。在九大党章修改过程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党章草案中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常委领导下，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在审阅时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1969年3月，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大会准备工作时又说，报告上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文革小组在“文化大革命”夺权阶段逐渐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参与中央日常工作，完成了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任务。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许多“造反派”头头也进入最高领导机构。这样，毛泽东整党建党的思想，以及把各项工作纳入正轨的愿望有了新的组织保障。因此，九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九大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此基础上团结起来，进行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

第三，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毛泽东试图对江青等人的权力加以约束。九大前，毛泽东就在一封要求选江青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并应成为政治局常委兼中组部部长的来信上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几次提出“不准江青进入政治局”。江青等人不听劝阻，拼命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是，他们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中央的重大活动还是周恩来主持。江青不甘心自己的空头政治局委员头衔，九大一结束，她就要把个人突出在中央之上，还要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重新发表她在上海的座谈会纪要，要大家学习。而毛泽东看到文件后把“江青同志”四个字勾掉了，认为不妥。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令他们失去一个重要阵地。江青后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毛泽东指出：“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对于这伙人，毛泽东直到逝世也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由于对自身处境不如意，不甘寂寞的江青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议论他们的各种阴谋，继续兴风作浪，加上因造反起家、在九大上进入中央的王洪文，逐渐结成“四人帮”，发展自己的势力，攫取更多的权力。

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按照常规，“文化大革命”应该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但这时社会上出现了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等种种反常事态。

鉴于宣传舆论工作和北京大学急需加强领导这一具体情况，5 月 29 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通讯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时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大革命”。

这一决定由周恩来当即到隔壁房间打电话汇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信中说：鉴于《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迫切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复示。四小时后，毛泽东即批示：“同意这样做。”可见，派遣工作组最初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的，林彪、陈伯达也表示赞同。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了 300 多名干部参加向文化系统派出的工作组，就是经林彪同意的。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毛泽东批准派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后，陈伯达即与康生等商定名单，这个工作组成员共定八名，陈伯达、穆欣、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尚力科、朱悦鹏，《红旗》杂志杨丁和尚未选定的上海两人（其后张春桥由上海派来的是鲁瑛、邵以华）。



5月31日下午，《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局及首都各主要报纸负责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到会。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邓小平还当场宣布了工作组成员的名单。

自从报纸公布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后，北京市大多数学校的青年学生一面把本校领导当做“黑帮”来攻击以致批斗，一面成群结队地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校。

工作组开进学校，竭力组织学生有秩序地参加运动。但开进《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组织下，第二天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一篇社论将《五一六通知》的内容透漏了出去，对于“文化大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煽风点火的作用。本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是为了遏制该社有些失控的局面，没想到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后，不仅发表了这样一篇极具煽动性的社论，6月2日又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错误的大字报，而且还发表鼓动各地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的评论员文章。在陈伯达、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错误地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做“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

自此，学校的正常秩序已完全被打乱，学生不上课，教师不授课，党团组织生活已无形中停止了。混乱局面迅速向社会扩散。

6月3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会议在福禄居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人不是很多，除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就是各方面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工交口薄一波，财贸口李先念，农林口陶鲁笳，军队方面叶剑英，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办公厅汪东兴，北京市委李雪峰、郭影秋，还有刚从中南局第一书记岗位上调到北京主管宣传文教工作的陶铸，以及一些有关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首先由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汇报。李雪峰在谈了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情况之后，讲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游行不要上街；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不准打人、污蔑人；注意保密；积极领导，坚持

岗位。

李雪峰在会上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他的这一提议被认同。

经过一番讨论，会议同意北京市委的意见，即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贯彻这八条要求。大学工作组成员由中央组织部抽调，中学工作组成员由团中央抽调，然后由北京市委统一介绍到各学校。

会议决定，哪里出事，就派人到哪里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八条要求传达要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刘少奇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校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正轨。鉴于北京市委领导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

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附中工作组的谈话当中，针对一些学生批判老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这样说：

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了吗？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嘛。教师大多数是好的。说老师都坏，我不同意。[①]

邓小平在思想上和原则上都不认同“造反”的理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意图依然毫无领会。作为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自觉间在运动问题上“已经落伍”，已经跟不上甚至已经远远脱离了毛泽东的“步伐”。



许多大学、中学的领导班子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冲击面前已难以再行使领导职能。鉴于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为了使局面不致失控，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6月5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

到6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纷纷效仿北京市的做法，陆续向本地区、本系统的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

在局面混乱的情况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差不多一两天就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研究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刘少奇提出，这次“文化大革命”要善于领导，敢于领导。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要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避免被动领导而落后于群众。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清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要放在这上面，不要转移目标、视线，不要分散目标，要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中有“左”有“右”，因此要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6月10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大区的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到杭州的康生也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朱德、陈云没有被通知到会，林彪请假。

对于工作组的问题，会议没有专门讨论。毛泽东在议论中开始怀疑工作组派早了。他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但也没有要求把北京已基本进校的工作组都撤回来。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却被文革小组成员完全领会了，此后陈伯达就多次提出否定工作组。但这时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派出。

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到北京，开始贯彻杭州会议精神。因为周恩来按照已一再推迟的计划，要在6月15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

刘少奇、邓小平首先是把杭州会议上比较确定的几件事贯彻下去。一、大学、高中停课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这是会上定了的。二、关于“文化革命”的大体安排，这是各级组织都关心的问题。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曾说：“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

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的精神。在会议上，刘少奇紧跟毛泽东“越乱越好”的想法，但并没有要否定派工作组。他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刘少奇甚至说：“工作组派下去被人赶回，证明他不行么！乱就好么！”[②]

在刘少奇看来，比较好的工作组，就是能够有效地对运动实施领导的工作组，对这样的工作组，他是坚决支持的。他认为，像“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运动，没有党的领导是不可想像的。既然那些学校的领导瘫痪了，那么，就只有派工作组去接替，维持正常秩序。

此后，刘少奇、邓小平等又多次在福禄居会议室或怀仁堂后厅召集会议，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的一些讲话精神，既引导群众参加运动，又不使社会陷于混乱。

6月2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共中南局、西北局的关于“文革”报告时写道：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反击。

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1/3。后来，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6月30日，邓小平起草一封和刘少奇的联名信，请示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表示：“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



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听取了进驻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后又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只要改正错误，交代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对于老教师，“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他要求工作组同志“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

上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始恢复了学校的教学和工作秩序，相当程度地控制了无政府主义的蔓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工作组对引导运动有秩序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注释：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页。

②黄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卷，中央党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368页。

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

自从派出工作组，围绕着这一举措就开始产生分歧。在学校里，在《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引导下，在《人民日报》6月1日社论和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鼓舞与煽动下，一些学校、单位出现了支持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组织，反对工作组的造反组织在工作组进入不久便公开提出驱赶工作组，局面越来越混乱了。

派工作组最初也曾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6月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时，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1]

5月底开始陆续派出的工作组进校后，受到了大多数师生员工的欢迎。但是，他们在工作过程中，也与一部分响应《五一六通知》的号召起来向党委“造反”的群众和基层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并由此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发生了一些事件。

6月4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驱赶工作组事件。造反派因工作组保护院党委而赶走了进院才四天的工作组。新的工作组进院不到四天又被赶走。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13日到北邮讲话，说工作组是革命的，后受到大字报批判。北京邮电学院第一个赶跑了工作组，之后，各校几乎都出现了反工作组的大字报。

北京大学发生了“关门”事件。从6月1日以后，北大校园就熙熙攘攘，一片混乱。早在6月7日，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就规定，校外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北大校门。北大校门口也贴出公告，大意是：凡校外单位声援的代表或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停开放。造反者对此大为不满。

同时，清华大学也发生了“六七”事件。6月7日，清华造反派在这天



贴出大字报，反对时任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蒋南翔和校党委。绝大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约一万人气愤地与六七百名造反者辩论。北大造反者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到清华支持造反者“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这又引起清华学生与他们的辩论。清华大学派人把北大造反者护“送”出校，这一措施被说成“押送”出校。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决定蒋南翔停职反省。清华造反者欢呼雀跃。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大惑不解。

在中央的管理层，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以中央文革为代表，积极支持造反组织进行斗批，并指示媒体作公开的肯定报导，使来自上层的声音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

6月12日，南京大学造反派组织万人大会，批判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污蔑他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

根据康生的意见，《新华日报》在6月13日对这次大会作了肯定的报道。广大群众包围了《新华日报》社，并且加以斥责。南京大学校内开展了关于《新华日报》报道的大辩论。根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意见，江苏省委作出了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对此，工作组、广大党员和党外群众表示不满。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高度赞扬“罢了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官”，并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切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社论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①]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擅自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坚决制止，结果引起一些学生不满。第二天，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北师大一附中，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月1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去清华大学，耐心地帮助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造反派代表蒯大富。蒯大富与薄一波进行了辩论。

同一天，刘少奇派王光美作为校工作组顾问，去清华大学观察动态，及时反映学校运动的情况。

严峻局势在继续。6 月 20 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党委和一些干部、教师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指责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提出“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口号。党委站出来公开指责工作组，为造反者所欢迎。造反者举行了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不以为然。陶鲁笳、何长工（时任地质部部长兼党委书记）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

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也发生了“六二〇”事件。这天清晨，谭厚兰等 17 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组长孙友余。之后又有三人贴出大字报《郭影秋你是什么人?》，就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一事质问郭影秋：“此举是否是彭真的阴谋?”

孙友余作广播讲话，澄清了事实，批评了错误意见，认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也就是反对中共中央，提出了“反对干扰”的意见。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友余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于 6 月 20 日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及其批语转发全国各地，肯定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刘少奇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①

6 月 20 日下午，刘少奇还专门同北师大附中部分工作组成员谈话。他主张发动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要把讨论反工作组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刘少奇对工作组负责人说：“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②

刘少奇还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你们和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③

当天晚上，武振声、袁智平代表新市委接见北师大师生，作了二点指示，即要求“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此后，有少数反工作组的学生受到批评，有的甚至受到批判斗争。

6 月 21 日，何长工、胥光义（时任地质部副部长）、李人林（时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到地质学院讲话，批评少数人闹事和围攻工作组，指出工



作组是革命的。拥护党委和工作组的一派也示威游行。这被造反者叫作“六二一反扑”。

同一天，刘少奇、邓小平再一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在讨论后，刘少奇对几个问题作了指示。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6月3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的，都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以文化革命为纲，但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现，我们利用大字报，反革命也会利用大字报；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

邓小平也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会议精神逐级贯彻下去，学校中一些基本的教学和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较为有力的遏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但是，头脑狂热的蒯大富仍然在6月21日的一张大字报上写下批语说，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对此，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的王光美明确指出来“蒯大富要夺权”。薄一波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之后，清华造反者又在工作组召开的声讨会上批判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给以批驳。叶林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会场秩序一片混乱。

为了打击蒯大富的嚣张气焰，在王光美的建议下，6月26日，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在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游行，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

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后来，刘少奇在7月5日的会议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规划，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大学的由

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内起草出来，提交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还提议 8 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 1/3。

面对中央一线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运动的思路，“中央文革小组”极力反对。他们一面挑动学生同工作组对立，一面在一些场合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实际上是要取消工作组。

就在 6 月 20 日，“中央文革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让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工作组可以由上级指派。“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一建议间接地表达了他们取消工作组的意见。此后，陈伯达在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几次对工作组问题提出非议，但遭到大多数参加会议的领导人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被否决。

这样，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同“中央文革小组”围绕工作组等问题，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加深。不少学校内，在拥护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两派，尖锐对立，驱赶工作组的现象也愈来愈多了。

7 月 18 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在听取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一些材料后，毛泽东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表示不满。毛泽东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学生运动受到压制。但是，毛泽东最初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表态，也没有提出要撤出工作组。

7 月 19 日至 7 月 23 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汇报会”。7 月 19 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提出工作组问题。陈伯达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对陈伯达的无理责难，多数人仍表示不同意。刘少奇指出，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对他们要求不能高；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要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一个时候，取得经验再向“黑帮”进攻。

邓小平说，有的机关和学校，不派工作组可以；有的要夺权的，就要派工作组。工作组主要是起行政和党委的领导作用，因此是否统筹考虑，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中央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下来代理党委工作。



7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

会议对高等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作了指示。关于斗争方向问题，会议指示主攻方向是“当权派”；斗争方法有“文斗”和“武斗”，会议主张“文斗”，斗争之前要有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关于组织队伍问题，会议指示，队伍首先要统一思想。会议还指示，在运动过程中，不要“戴帽子”，不要限制人家的自由。

在会上，大家对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争论。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他们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驳斥了“文革”小组的发言，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讲了一番话，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邓小平忍无可忍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邓小平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组恐怕不行。他还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说，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教育帮助，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学校斗争的方向有三种：一种是斗“当权派”，一种是斗工作组，一种是斗群众、学生。

有鉴于此，刘少奇说，各个学校特点不同，不要采取和北大一样的办法，要区别对待。刘少奇还建议北京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班、系、校），北京市召开代表大会，中学召开师生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关于高等院校如何开展运动的四条指示。

但是，这种意见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终于使毛泽东得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结论。张春桥把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7月24日、25日两天，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

在第一天，当谈到工作组问题时，他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

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些?”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④]

对前一段的运动情况提出批评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6月20日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包括张承先的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他进一步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

在毛泽东提议下，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7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发出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7月29日，北京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在大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这次万人大会上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销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先后发表了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并且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不过，刘少奇、邓小平仍主张对工作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在这次大会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撤销了工作组。

由于各学校的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撤走，原先设想“文化革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也因为群众分裂成两派而成立不起来，或不能发挥多大作



用。这些使造反派更加肆无忌惮，学校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并迅速蔓延到社会。

工作组事件的发生，在毛泽东看来，运动是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走了弯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使“文化大革命”更加合法化，以便排除“阻力”，重新把运动“全面发动起来”。

注释：

①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42~643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024~1025页。

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日。

⑤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和大区书记谈话记录，1966年7月25日。

八届十一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扫清”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障碍”，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文化大革命”作出决定。

8 月 1 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141 人到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首都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包括聂元梓等）47 人列席了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没有过的事情。邓小平宣布会议的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当时宣布会议时间为五天。

会议首先由刘少奇作为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向全会作报告。在报告的前半部分，刘少奇简要叙述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在国内国际问题上所采取的重大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刘少奇着重谈了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工作，对派工作组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我在家里主持。主席回来，发现派工作组的方式不好，责任主要在我。”“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在他讲话时，毛在插话中指责工作组阻碍、镇压、群众运动。毛泽东说：“必然性是藏在偶然性中间的。谁知道聂元梓出那张大字报，一广播，乱子就出来了。就是一个迷信，迷信自己高明，不相信群众高明。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高明，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比我们高明。只有依靠他们，我们什



么都不知道。”他最后强调要由中央全会就“文化大革命”问题正式作出决定。他说：“要决定。要推翻这个决定，也要到下次全会。”[①]

同一天，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并附上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两份大字报。这两份大字报是7月28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请江青把两张大字报转给毛泽东的。

8月2日和3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大会发言。由于会内会外的气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全会对《决定》本身没有切实展开讨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大会小会的发言中总是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提出意见。虽然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人主动出来批评刘少奇和邓小平。

接着，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尖锐批评工作组问题，并对前一段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严厉批评，同时也含沙射影地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运动，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格处理。”

8月5日，毛泽东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写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说：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后来，他又讲：过去50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很明显，毛泽东的讲话和大字报直接针对以刘、邓为代表的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

刘少奇对此并不知情。这天，他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赞比亚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回到家里，周恩来打来电话：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

8月6日，毛泽东要秘书徐亚夫通知在大连养病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到会。在此之前的8月4日，林彪曾连夜从大连打电话给中共中央，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看法和方针。当晚，林彪乘专机回京，直接进入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7日，全会向与会人员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立即转了向，刘少奇、邓小平开始受到批判。

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使“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动合法化。

《十六条》内容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干部问题；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教学改革；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关于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的政策；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结合的部署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部队；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

《十六条》充分肯定了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确定了让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方针。《十六条》对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作了这样的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



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十六条》没有对“走资派”订出明确的判别标准。

《十六条》规定，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左”派。对什么是“左”派，《十六条》也没有定出明确的判别标准。《十六条》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十六条》强调，要“敢字当头”，“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十六条》并且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十六条》虽然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领导”等字句，但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没有具体的条文规定。尽管这个决定对于某些破坏活动也作了一些预防性的政策规定，例如，“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保护科技人员等，但这些规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发展并没有产生多少约束力。《十六条》还明确规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十六条》是按照“左”倾错误的指导方针来制定“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章程的。它的根本错误就是：将广大党员和国家干部当做革命的对象，混淆了敌我，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人为地制造了分裂；为乱打乱斗的违法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实际上取消了党的领导。事实上，《十六条》是《五一六通知》的继续和发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十六条》的通过，正式确认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指导方针。

为了把全会的“胜利成果”在组织上予以落实，会议结束前，毛泽东提出了原定的议程中没有的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这个名单此前经毛泽东提出，在小范围内初步进行了磋商。

12 日，全会进行表决。大会首先通过了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六名候补中央委员依次递补为中央委员，以取代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以后陆续病故的中央委员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罗荣桓、柯庆施、刘亚楼六人。

接着，大会通过了撤销“彭、罗、陆、杨”职务和补选陶铸和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为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事变动决定补办了法定手续。大会决定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

剑英六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最后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原为七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次增加为 11 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刘少奇从第二位降至第八位；而林彪则由第六位直线上升至第二位，显然是接班人位置。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其后就只称林彪为副主席，其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人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林彪就成为了毛泽东当然的接班人。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再次承担责任，“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并请求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的职务。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66 年 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 8 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的实际情况说明，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及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在这次全会上爬升到“第二位”的林彪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讲话。林彪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今天又把组织机构解决了，保证了我们今后的工作能够更加落实。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形势更加恶化，尤其是毛泽东多次接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造反派”的大规模活动愈演愈烈，全国性造反运动席卷全国，中国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混乱。

注释：

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记录，1966 年 8 月 1 日。

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 年 8 月 4 日。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红卫兵组织最初只是清华附中部分学生自发组成的一个类似“战斗队”式的组织。1966 年 5 月 29 日晚，在北京西郊圆明园遗址上，清华附中卜大华、张承志、王铭、骆小海、邝桃生、张晓宾、陶正、高洪旭等十几名学生开了一个小会。他们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清华附中校方进行斗争，决定成立自己的组织，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中国的文化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向日葵”，有人提议叫“火车头”，但大多数人赞同叫“红卫兵”。“红卫兵”三个字，既新颖又贴切，而且，最早的红卫兵是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夺取了沙皇政权的武装工人和士兵，列宁曾宣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就这样，1966 年 5 月 29 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诞生了。

红卫兵组织所以诞生有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社会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方针迅速蔓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不断升温，学校的教育革命不断推进，阶级斗争渗透到了学校的教学之中，这些中学生正是在这一特殊条件下，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讲话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并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

1964 年 11 月，高等教育部转发《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谈话纪要》中毛泽东谈到教育问题时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由此，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的意识也在学校的教学实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学生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根。

1965 年夏天，毛泽东与在北京外语学院进修的侄孙女王海容进行过一次谈话，谈了阶级斗争问题，学习问题，纪律问题。毛泽东提倡造反精神，提倡同阶级敌人、反革命进行思想辩论斗争。鼓励学生造学校的反。在谈到学校星期天会多时，毛泽东说：回去以后，你带头去造反，星期天不要回

去，开会你就是不去。王说：这是学校的制度、规定，星期天一律都要回校，否则，别人会说我破坏学校制度。毛泽东说：有什么好怕的，最多就是开除。学校应该允许学生造反。回去你就带头造反。王说：人家会说我是毛主席的亲戚还不听毛主席的话，带头破坏学校制度。人家会说我骄傲自满，无组织，无纪律。毛泽东说：你这个人哪！又怕人家批评你骄傲自满，又怕人家说你无组织，无纪律，你怕什么啦！你就说正因为我是主席的亲戚我才听他的话，正因为我听了他的话我才造反的。

这次谈话的内容后来逐渐被透露出来，在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里悄悄地流传着，使不少中学生感到备受鼓舞。毛泽东在谈话中所倡导的那种“造反”精神很快就被一些中学生所接受。

当时，《光明日报》正组织“怎样才能生动活泼地主动地进行学习”的讨论。清华预651班在这个讨论中经常进行激烈的辩论。许多人把自己的观点写成小字报，贴在本班教室后面的板报栏里。1965年10月28日，预651班学生骆小海在板报栏里贴出一张题为《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其中写道：“造反，造旧事物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

此后党内外开展的学术批判运动在学校中掀起了波澜。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从此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群众性批判运动不断升温，一大批学者、专家和他们的著作受到批判。同时，在“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下，大力提倡“突出政治”，大搞所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在这种形势下，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开始把与部分教师和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具体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预651班和预642班，还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这些学生成了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在校内与校方发生了很多争论和冲突。

1966年5月20日，预642班学生王铭、张晓宾起草了一份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较系统的汇报材料。这份材料列举了从1964年下半年起，本校高62级（62级是指1962年入学的，下同）、高63级、高64级的部分学生与附中党支部所进行的一系列“斗争”。这份材料的前言中写道：“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党支部是个不坚强的党支部。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骄傲自满、固步自封，长期拒绝接受学生的严肃批评，坚持错误的

资产阶级办学方向。

1966年5月29日夜晚的那次会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的，红卫兵组织的诞生，红卫兵运动的序幕由此揭开。不久，独立学生组织在北京的中学里蔓延，多数采用了“红卫兵”的名称。经媒体报道，红卫兵组织迅速扩散到全国各地，“红卫兵”成了专有名词。

《五一六通知》发布和5月25日北京大学大字报贴出后，清华附中的中学生们热情更高了。有的要求学校晚自习后不要熄灯，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规章制度。学校不同意取消熄灯制度，熄灯以后同学们就跑到外面去辩论，也有的学生开始到各个学校去串连。

5月30日，在清华附中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成立后，5月31日，红卫兵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反映清华附中存在的问题。信中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的学生。我校党支部共有党员24人，预备党员五人。其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出身，工农出身的占的比例很小。这个党支部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拒绝把毛主席的书当做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很少阶级斗争观点，基本上没有执行无产阶级的办学方针，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在这封洋洋万言的信中，红卫兵成员列举了学校党支部的20种“错误”：一、阻挠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二、说“清华附中没有阶级斗争”；三、大力宣传“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的谬论；四、大树“业务好、政治差”的标兵和榜样；五、不搞并且阻挠“突出政治大讨论”；六、不抓阶级教育；七、突出方法论，冲淡人的思想革命化；八、对政治思想有严重问题的学生不做工作；九、根本不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十、政治事故，百出不穷；十一、没有政治思想工作，一些学生腐化变质；十二、阻挠《海瑞罢官》的讨论；十三、阶级路线的右倾倾向；十四、团发展工作的错误方向；十五、教学改革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十六、业务学习压倒政治；十七、一支封资修的教师队

伍；十八、学校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和错误方法；十九、学校培养人的方向是错误；二十、大搞形式主义，大搞浪费。并列举了清华附中61件具体事例来进行说明。

在另一份清华附中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他们表示情况紧急，希望中央急速派工作组来。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鼓动各地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

北京市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出现了高潮，学生自动罢课，领导组织瘫痪。

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也大受鼓舞，6月2日下午，一张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这一大教室是学校专门设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大字报署名：红卫兵。

大字报全文如下：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中负隅顽抗！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我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持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同志们，革命战友们：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万岁！

当天就有100多人在大字报下部特意留出的大块空白上签字，表示同意大字报的观点。对于红卫兵的名称及提出的问题和观点，校园内的辩论十分激烈。

在这之后，清华附中红卫兵分别于 1966 年 6 月 24 日、1966 年 7 月 4 日、1966 年 7 月 27 日张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份影响极大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一口号喊得一次比一次响亮。

1966 年 6 月 3 日，在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北京新市委书记吴德和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参加，决定领导文化革命的八条政策，并把领导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任务交给团中央。会议决定派遣工作组进驻相关部门和学校。

7 月 28 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骆小海、邝桃生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海淀红卫兵代表宣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宣读完后，他们将这两篇大字报底稿和一封短信交给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江青，托她交给毛泽东。

这些“左”倾激进而幼稚的大字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写信给红卫兵。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求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泽东在信中连续使用了三个“热烈支持”。

当天，这封信就作为重要文件印发给刚刚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封信和 8 月 5 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很快就

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显然，毛主席认为青少年是一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力量，这从由他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中可以看出来。《决定》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的信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不但使正处于各级党组织压力下的红卫兵组织免遭解散，而且使红卫兵组织成为合法，为红卫兵走向社会奠定了政治基础。

8 月 3 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在北京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王铭和卜大华，将毛泽东写给红卫兵的信转达给了他们。“毛主席支持红卫兵”的这一特大喜讯立即被以各种形式传播开来。在当时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清华附中红卫兵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和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列为会议文件，发到了每一个与会者的手中。

此后，诞生于中国校园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中学得到迅速发展，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纷纷把他们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都改为“红卫兵”。各高校、机关也开始发展红卫兵组织。红卫兵的典型着装是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腰间束武装带、左臂佩红袖标，手握红宝书。

随着红卫兵组织的迅速发展，一些红卫兵组织任意揪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抄家、打人之风日甚一日。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错误地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做“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真正兴起。1966 年 8 月 18 日上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有首都和全国各地师生参加的百万人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出席了大会。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经毛泽东提议，1 500 名学生代表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检阅游行。“红司令”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接受并配戴了红卫兵敬献的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并且再次表示“我坚决支持你们!”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人们的口号声惊天动地。

此次大会实况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以后，全国各大报刊都进行了重点报道，刊登这次大会实况报道的报纸被大量印刷，免费赠发；纪录大会实况的纪录影片在全国城乡免费放映，由各单位组织全体人

员观看。在所有的这些报道上，都将“红卫兵”放在了突出的地位。登在各报刊头版上的巨幅照片上，以及在实况纪录片中出现的大量镜头中，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在天安门上向群众招手的形象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短短几天内，“红卫兵”三个字在全国城乡已经达到了几乎无人不晓的程度，并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坚决支持，对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起了关键的作用。当全国绝大多数人从报刊和银幕上看到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形象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几乎全国所有的大、中学校都行动了起来，纷纷成立了自己本校的红卫兵组织，一场声势浩大的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就此掀起。

此后，毛泽东又七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发展成为一股席卷中国数千万青年的狂潮。

破“四旧”运动

所谓“四旧”，指的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文革”中报纸上最早提出“破四旧”的是6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篇社论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此予以肯定，林彪在闭幕式上所作的总结讲话中说，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使之停顿下来，中断下来，倒退下来。在这种危险的时候，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打垮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使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除了物质的发展以外，精神上、思想上得到健康的发展。

但如何破“四旧”，具体的政策及措施中央没有说明。

1966年8月17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这一向旧世界的宣战书20日一贴出，全市各学校的红卫兵纷纷响应。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会上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讲话，号召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号召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八一八”大会给予红卫兵的“造反”活动以极大的鼓励。林彪的讲话可谓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红卫兵被号召行动起来，彻底破

除几千年的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他们把基于意识形态正确的思想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简单化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一系列物化形态的破坏行动。在“八一八”大会后的第三天，即1966年8月20日，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

随后，中央的权威媒体迅速作出了反应。

8月2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1966年第11期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权威媒体的鼓励推动下，红卫兵等革命群众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的“破四旧”活动。

紧接着，8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

红卫兵“破四旧”的洪水迅速向全国蔓延开来。

破“四旧”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

这种“破四旧”的行动首先以“改旧名”为突破口，校名、街名、店名、路名、人名各种被红卫兵们认为含有封建色彩或资本主义色彩的名称，或者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中性名称，都被红卫兵改为具有革命涵义的名称。

在北京，顷刻间公共汽车站的站牌都涂写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红卫兵每到一地，几个人一商量，大笔一挥，名字就改了过来。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被改为“红卫兵战校”；“北京崇文织布厂”被改为“北京东方红兴无织布厂”；“西交民巷”被改为“反修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被改为“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地处大栅栏的“瑞蚨祥绸布店”被更名为“立新绸布店”；“长安街”被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亨德利钟表店”改为“首都钟表店”；“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等等。

位于前门大街享有盛名的“全聚德”烤鸭店，也受到红卫兵的“革命”。8 月 19 日夜，北京市第二、六十三、二十五等中学的红卫兵三五成群，吆喝着来到“全聚德”烤鸭店，厉声斥责该店职工。在红卫兵的督促和煽动下，职工们忍痛用一块书有“北京烤鸭店”的长条油漆木牌换下了“全聚德”的招牌。

在上海，商店林立的南京路成了红卫兵关注的重点。红卫兵不停地高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各店铺的橱窗都被大字报封住，红卫兵开始了更名活动。

在天津，“破四旧”活动也在同一天开始了。1966 年 8 月 23 日这一天，天津的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原公司的职工贴出决心书，在店前设立了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过路人对更改店名的意见，最后决定改为“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中城市，如郑州、杭州、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济南、合肥、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南宁、贵阳等地无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冲击，街名、店名、商标名、茶名、房名，都被改为“革命化”的名字。

人名也纷纷改了，为了显示“革命”，有的改为“东彪”，有的改为“李东”、“李彪”、“卫东”、“卫彪”、“卫红”、“继红”等等。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把一条红卫兵袖章给毛泽东戴在了左胳膊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宋彬彬回答后，毛泽东说：“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她说：“是。”毛泽东说：“要武嘛。”从此，她改名为宋要武。此后，一些人纷纷效仿，把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和小资产阶级情调，例如“梅、兰、竹、菊、云”、 “春、夏、秋、冬、月”，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仁、义、理、智、信”等的名字，都改为“革命化”的名字，公安局户籍管理部门则以“报则速批”为原则，表示了对这种“革命行动”的支持。

改风俗习惯，从服装头型到饮食习惯，统统要进行改造。

红卫兵带着剪刀等工具，凡遇“牛仔裤”、“牛仔衫”、“港式衣裙”等“奇装异服”，“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轻则喝令马上回去改掉，重则当场剪掉或剪开，甚至不惜动用拳脚。有一服装店贴出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

灭资”。

红卫兵把服装“革命”引申到警察制服上。《人民日报》在8月28日以《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实行改革》为标题，发表了新华社8月27日电讯。其中说，中国人民警察的服装，经国务院批准改革，于9月1日在全国开始执行。新的民警服装式样，上衣为草绿色，裤子为藏蓝色，戴解放军帽、国旗帽徽、全红领章。自实行之日起，旧的民警服予以废除。

从此，中国人的穿着一律变成藏青、青灰、草绿、藏蓝等灰暗的颜色，再也看不见穿红、白、黄等色彩鲜艳的衣服。

红卫兵还在许多机关、学校门口和主要街道的路口，设置用桌椅摆成的“破旧立新”站，检查过路的行人有无“奇装异服”，并为行人剪剃“革命”发式。连人们的个人生活习惯、传统礼仪，都被当做“旧风俗、旧习惯”加以干涉和改变，甚至有的红卫兵还倡议修改宪法，废除国歌。

将表现传统文化的图书字画古旧文物以及金银器皿，统统当做“四旧”进行扫除，使大量的优秀图书、字画、文物遭到焚烧破坏。许多名胜古迹被毁、被砸。

据统计，北京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 843处文物古迹中，竟有4 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被毁于1966年八九月间。

红卫兵破“旧文化”的事实，说明人们所理解的“旧文化”，实际上是从形式上理解这个“旧”字，凡是解放前出版的均属“旧文化”之列，国外的东西也属“旧”的范围。总之，除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和江青排演的几个“样板戏”以外，其他几乎都属“旧”的范围。

1966年11月7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谭厚兰等200余人，在戚本禹的唆使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集会，誓师捣毁“孔家店”。

11月9日，200余人到达山东曲阜。他们以“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名义，冲破山东省委、曲阜县委和孔庙管理处的阻拦，串连当地一些学校的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并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1961年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发出了给国务院的“抗议信”。

从11月9日到12月7日，谭厚兰等人捣庙、砸碑、挖坟、烧像、毁书，共破坏文物6 618件。同时，谭厚兰多次围攻和揪斗省、地、县委领导干部，押他们陪孔子塑像游街，“为孔老二送丧”。

"破四旧"运动到了高潮时，为了彻底搜索图书字画古旧文物以及金银器皿，出现了抄抢打砸的问题，面对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并不相符。不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8 月 20 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②]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他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③]经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 21 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 22 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越出学校、走向社会。"破四旧"的烈火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越烧越旺。

媒体的大肆渲染也在"破四旧"运动迅速推向全国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6 年 8 月 24 日至 26 日，新华社连续报道全国各地红卫兵"破四旧"运动。24 日新华社报道："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25 日报道："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26 日以"横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为题报道了包括乌鲁木齐、拉萨市在内的各地情况。各种新闻宣传媒介也对"破四旧"作了大量的报道。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8月28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8月29日，《人民日报》便发表了题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

当时的理论权威刊物《红旗》杂志在评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时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检阅了红卫兵。“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直接鼓舞下”，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革命组织一起，掀起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

《红旗》杂志还说，千百万红卫兵由学校走上街头，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荡涤着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清扫着堆积了几千年来的“垃圾脏物”。红卫兵干了大量“好事”。红卫兵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新生事物”。号召人们要“擂鼓助威，鸣锣开道，高举双手，欢迎新生事物”。

第二天，全国各大报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告。《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刊登了《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两篇社论。

社论说，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社论还说，革命学生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泽东的教导，“违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

得到了鼓励的红卫兵，采取了更加激烈的行动，“破四旧”运动高潮迭起。

在当时关于文革的指导思想中，“破四旧”是被提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来认识的。“文化大革命”之

所以冠以“文化”二字，说明发动者的目的是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从广义来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破四旧”运动，文革中所倡导的文艺革命、教育革命、斗私批修等都可以视为旨在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具体行动。

“破四旧”这一提法的本身并无什么错误。在政治和经济制度革命的之前或之后，必然会存在新旧两种思想文化的激烈斗争，近代历史上，欧美各国在推翻封建制度革命的前后，都经历过这种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统治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封建的思想文化意识盘根错节，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来自西方国家的以个人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也对许多中国人产生着严重的影响。要说这些旧思想文化腐蚀人心、征服群众，也非危言耸听。所以，当时提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这些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一次大清扫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1966 年红八月发生的那场红卫兵“破四旧”运动，却是一场弊大于利、得不偿失的运动，原因就在于：

一、对于这样一场复杂的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却让一大批无论在知识水平还是在判断能力方面都很不成熟的青少年来打先锋，本身就是不妥的，而且在破四旧的过程中，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名义下，对这些青少年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以至造成严重的破坏性后果；

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来进行，而红卫兵“破四旧”则普遍采取了烧、砸等破坏方式，烧、砸只能破坏旧物品，却不能打倒旧思想文化；

三、“破四旧”的青少年并不懂得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新文化与旧文化既是对立的，但新文化又是从旧文化里孕育出来的，在人类文化史发展过程中，新文化对旧文化既是取代关系，又是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倒一切旧文化，就会使新文化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等于是打倒了所有的文化；

四、这场红卫兵“破四旧”运动所造成的最大的、最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对文物的极大破坏，其他事情做错了可以设法弥补，例如，路名、店名改错了可以改回来，一般书籍和物品被烧了、砸了可以重新印、重新生产，禁止穿港式服装、禁止理花式发型，一旦社会环境变化，可以开禁，等等，唯独文物被毁，却是完全无法恢复或再造的。正因为以上原因，使一场本来很严肃的“破四旧”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成为中国传统

文化遗产的一场浩动。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66 年 9 月 5 日。

②毛泽东对解放军报总编室《文化大革命情况简报》第 109 号的批语，手稿，1966 年 8 月 20 日。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 年 8 月 21 日。

全国范围的“大串连”

“大串连”是“文革”时期的特定历史现象，指1966年夏，为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而采取的一种特殊人员交流方式。

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而出现的全国性的“大串连”高潮，加快了全国动乱的节奏。

早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同年六七月份，各校青年学生的串连就开始出现了。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打鬼借用钟馗”，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判、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

“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这种串连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去北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8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连”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的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

8月28日，外地到京学生已达14万人。

在学生大串连如火如荼之时，各地群众也纷纷到北京，到各地城市串连。造反串连活动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开始混乱。

早在8月中旬，天津大学等院校的师生开始了徒步“长征”的先例。他们觉得在“文化大革命”过程当中受到了“压抑”，遂决定徒步到北京取“文化大革命”的“经”。他们一路上凭着朗读《毛主席语录》所获得的力

量，克服重重困难，一往无前。

8月25日，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兵”的红旗，开始了自己的步行旅程。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2 000余里，终于到达了北京。

8月26日，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总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时，建议各区应该成立联络分站。

8月28日，毛泽东在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中，针对北京及各地学生的串连说，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

在这之后，中南海开始安置红卫兵。

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次接见会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使大串连得到了有限度的支持。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外地高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高等学校）“革命学生”，除了有病的、已经到过的或有其他原因不能去的以外，都可以组织去北京参观；高等学校教职工可按每5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参加。

《通知》规定，外地中等学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农半读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按每十名学生选出“革命学生代表”一人；教职工按100名学生选出“革命教职工代表”一人。

《通知》还规定，从9月6日起，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到北京参观、学习、相互交流“革命经验”时，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从国家财政中开支。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越来越多。

由于《通知》规定参加“大串连”的学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他们的伙食和住宿由当地政府安排，费用由国家财政开支，“大串连”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

从9月5日起，全国大、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串连。

随着到北京的红卫兵人流越聚越浓，北京市许多机关、单位纷纷腾出地方接待红卫兵。北京市各街道也积极行动起来，纷纷设立接待站。广州市在公园里搭起了临时性大棚子，作为红卫兵的栖身之地。

串连的红卫兵每人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他们可以免费乘坐各类交通工具，免费进入公园等游乐园，在全国畅通无阻。

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需要，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满载100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竟然乘坐到两三百人。在茶几上、椅背上、行李架上、过道上、椅子底下、厕所里，到处都是人。

同时，由于上下车的人多，特别是在车站上等车的红卫兵，为了参加串连，破窗而入；由于交通工具的超负荷长时间运行，大大缩短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火车，车厢行李架普遍断裂，车箱内的设备也被毁坏。这种交通线上的混乱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

红卫兵串连行动规模浩大。周恩来在得知各地串连学生在京人数已达34万人、总趋势仍在增多、接待部门应接不暇时，于9月7日在致江青、“中央文革小组”并报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中说：“上次天安门大会（8月31日）后，从9月1日到5日止，经过铁路运输，离京学生（包括北京外出学生在内）共约四十二万人；来京学生（包括回京学生在内）共约39万多人，其中当天未得安置，留在车站等待安排的五天总数约8万8千人，以9月5日最多，达到4万多人。”②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信中建议由中央领导出面，动员在京学生早日回去。

9月中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准备前往各地

串连。周恩来向这些准备离京奔赴各地的首都红卫兵提出，红卫兵应是一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战斗”指的是进行文斗，而不是武斗；“学习”就是要作调查研究，要进行科学分析，要有冷静的头脑；“宣传”就是讲政策、讲实际、讲界限，不盲目行动，不强加于人。周恩来说：

“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的情况和党的政策是很不完全的。”“你们会遇到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因此要坚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对毛主席著作）单单学语录是不够的，还要看全文才能懂得毛主席如何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才能看到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伟大的前途，否则决不是真正学懂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机关，而工厂、农村、服务性的行业应由那里的干部群众自己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以去进行必要的革命串连，但不能像在学校里一样，冲进去，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的秩序、建设的秩序。”“边疆的省份，靠边境的城市、集镇和边防点你们不要去。这些地方的每一个行动都关系到很多政策，如对外的政策、民族的政策等。那里宗教信仰常常和民族问题结合在一起，人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即使改变也需要时间。”

国内的交通因为串连已拥挤不堪。为了减轻运输压力，9 月 17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关于保障铁路运输的电报。电报指出：“目前全国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各地革命师生暂不要到其他省市去串连”③

不久，中共中央碰头会决定电告华东局并各中央局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卫生部，中央同意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医院，要自动取消。

10 月 1 日，是国庆节，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到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代表。本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 10 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同时，中共中央要求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 150 万 ~ 170 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

由于频繁的串连活动，交通部门承受不了如此重负。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同“中央文革小组”商量后，向红卫兵号召，发扬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精神进行徒步串连。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

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被命名为“孺子牛长征队”、“延安长征队”、“井冈山长征队”、“女子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伍开始在各地出现。

这些“长征队伍”主要的行进目标是北京，也有相当多的“长征队伍”前往井冈山、延安等地。红卫兵“长征队伍”在行进过程中，经常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对扩大红卫兵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徒步串连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乘车串连造成的交通紧张状态仍然毫无缓和的趋势，引起了各方面的重重矛盾。特别是事故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各地的社会治安。有的学生几天几夜挤不上火车，就砸碎车窗跳进车厢，有的便用车站上的水龙头往车里滋水，更有甚者坐卧在铁轨上面不让列车启动。还有的扒车，露宿在车顶而翻滚到车下，人身事故多次出现。

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

然而，此时已有四万多人挤到大寨，又有十万多人挤到井冈山，还有上万人挤到韶山。时届严冬，天冷路塞粮缺。井冈山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大寨也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告急。国务院、中央军委动员了一部分部队连夜赶制大饼，并派直升飞机到大寨、井冈山空投大饼、衣服、毯子。

10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说：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客货列车晚点现象严重，在车站不断发生围车、拦车和阻止列车运行，以及乘车纠纷等事件，因而严重地影响了铁路运输秩序。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一、各省市自治区要有计划地组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串联，适当控制来京人数。二、为了不使北京接待工作过分困难，决定从11月1日到5日，各地来京进行串连的革命师生暂缓来京，各线铁路局停开来京学生专列五天。三、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严禁强迫铁路局延长列车运行区段，或改变列车运行方向。四、在车站和列车上任何人都不准用各种借口妨碍铁路职工执行职务。五、凡是革命师生专列都要派人民解放军随车值勤，协助维持乘车秩序，保证运输安全，并在列车上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十六条。六、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达到其目的，认为动员各处串连的红卫兵返校搞

运动是当务之急。为此，11 月 10 日，在北京体育馆，由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兵”和北京红卫兵联合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誓师大会”，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通知》说，预计到 11 月 20 日止，来过首都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 900 万人。通知说，为了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全国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的期限，需要持续到明年暑假。因此，决定在今年 11 月 21 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从明年 4 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通知还决定，从 11 月 21 日起，全国水陆交通，只负责免费输送到北京或外地进行革命串连的革命师生返回原地。通知还要求各地要作好徒步串连的试点，以取得经验，为明年徒步大串连做好准备。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补充通知》规定：11 月 26 日前到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 12 月 20 日以前，免费乘火车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 12 月 21 日起，在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在外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也须在 12 月 20 日以前返回原地，12 月 21 日后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凡返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开给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徒步长征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至此，乘坐火车等交通工具的串连受到了限制。

1967 年 2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的通知》。《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人员应当回到本地本校去。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全国长途步行大串连。

1967 年 2 月 27 日，陈伯达对红卫兵代表说，红卫兵运动初期搞串连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有“功绩”。但后来各地造反派起来了，红卫兵继续留在那里可能起不好的作用，外地联络站要一律撤回。由此可见，“中央文革小组”所鼓吹的串连所起的作用至此已经完成。

不久后的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此后，全国大串

连逐渐停止。但直到1968年，仍有少数红卫兵游荡在全国各地。

直至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以“从大乱达到大治”夺回红卫兵过度膨胀的权力为目的，红卫兵运动终于被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取代，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寿终正寝”。

大串连，不仅使国家花掉了数以亿计的金钱，而且造成了全国性的动乱。

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动乱，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的国家机器及一切传统终于被红卫兵运动所冲击破坏。

经过“破四旧”和大串连，红卫兵运动形成了高潮。在范围上，它从学校冲向了社会，从北京发展到全国；在内容上，它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展到破坏社会上一切文化的现象；从批斗“牛鬼蛇神”发展到揪斗工作组，揪斗“走资派”；在方式上，它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更加凶暴；在组织上，它从单一的队伍发展成为表现不同思想倾向的组织林立、山头对峙的局面。

总之，红卫兵大串连造成的狂风暴雨的声势，使广大干部群众都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

注释：

①②③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

红卫兵从它一成立就埋下了分裂种子。由于在工作组问题上，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上，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上等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的红卫兵组织的态度立场的不同，形成了对立的派别。加之上层不同影响的作用和推动，最终使红卫兵组织走向分裂。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阻力。在社会上，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遭到各级党政领导和工农群众的抵制，有的地方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学校中，多数派红卫兵和少数派红卫兵出现了斗争。

那些各校工作组帮助建立起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最早组织起来的红卫兵，多数是党团员，思想素质好。他们赞成斗“黑帮”，不赞成全盘否定工作组；赞成批斗个别干部，不赞成普遍冲击党委。总的政治倾向是不赞成笼统地提斗争矛头朝上。由于过去运动“跟队”的传统影响，多数群众都站在这一派，形成多数派。1966 年 8 月 27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首都第一司令部”，简称“首都一司”）和 1966 年 9 月 5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首都第二司令部”，简称“首都二司”）都属于这一派。

然而，要求彻底批判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朝上，揪党内“走资派”的，则需要一定的“勇气”，揪上派处于少数派的地位。1966 年 9 月 5 日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就属于这一派。它是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 16 所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联合组成的，以“三司”而闻名，由蒯大富等人领导，受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和操纵。

“首都三司”的成立，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因为这一派红卫兵组织大多数都是 1966 年 8 月 18 日以后陆续成立的。人们常称之为“新红卫兵”。而在此之前成立的

红卫兵组织，人们常称作“老红卫兵”。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老红卫兵”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具体来说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教育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奉行“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以教学班或学校为单位组建的；组织成员以中学生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者为高级干部子弟。

而“新红卫兵”组织的基本特点是：造反的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来说是党的内部领导人；造反的形式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是跨教学班，甚至是跨学校的；组织成员中大多是高等学校的学生。

“新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是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逐步形成的。这些红卫兵也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造反工具。

从1966年10月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被引向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数派与少数派斗争的优劣势态发生了变化。

9月17日至20日，“中央文革小组”连续四次召集北京大专院校少数派代表，座谈汇报“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暗示“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他们。清华、北师大、地质学院等高等学校的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了座谈。

在会上，蒯大富、王大宾等人攻击“文化大革命”中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污蔑周恩来“搞调和”、“把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保了一下”；还提出“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领导解决这个问题”，“怀疑现在是否还有一个暗中与党中央、毛主席对抗的司令部”。

张春桥把这类发言都印成材料。江青则把材料上送毛泽东。

红卫兵少数派受到鼓励后，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冲击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北京敢于冲击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少数派都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都成了闻名全国的“左”派。这对各地造反派来说“太具有魅力了”。

于是，“造反就是大方向”、“矛头向上就是大方向”成为一时全国造反派的口号。湖南的造反派并且喊出了“打倒一切当权派”的口号。

红卫兵的分裂倾向产生于对待茶组的态度上，围练工作组，中央和文革小组形成两种态度，红卫兵也出现，拥护和反对工作组两种态势，由此发生对立，由此，在对待中央文革小组的问题上，红卫兵态度不一。

早在红卫兵运动刚兴起时，社会上就逐渐出现了“唯成分论”的风潮。

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红卫兵，到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贴了一副名之为“鬼见愁”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说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影响了一些青年。他们把“唯成分论”看做“阶级路线”。因自己家庭出身好而抱有“自来红”的优越感。这副对联说明这些青年学生赞成造“牛鬼蛇神”（他们认为“牛鬼蛇神”就是“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编者注）的反，反对造革命老干部的反。这种折中的意见为许多青年接受。

8 月 20 日，北京工业大学一些与谭力夫观点不同的人，要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表态。

谭力夫作了发言，这就是《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老干青年学生既“无限崇敬毛主席”，又保党委和工作组。他们认为这是一致的。由于家庭出身、革命教养的缘故，这部分青年尊重革命前辈，信任党委和工作组。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知甚少，保党委和工作组没有别的武器，就搬出了“唯成分论”。

同时，这副对联导致了子女之间高低贵贱的区分，使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干部子弟把父母的旧绿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出身“高贵”，而一些农民子弟在某些地方酝酿成立“贫协”的风潮，以抗击一些干部子弟的“高贵”言行。

这样，围绕着这副对联，北京的学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8 月 12 日，在北京工业大学就读的谭力夫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

谭力夫在“必须坚持阶级路线”的前提下，提出了这副对联立论的偏颇，建议补充一副“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的对联。谭力夫认为，前一联说明了过去，是“唯成分论”。后一联指明了未来，不“唯成分论”，两联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工农、干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点缺点错误，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革命遇到大问题”，绝不能把他们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

同时，谭力夫表示，他不同意不加分析地冲击、批斗、侮辱党的积极干部，把攻击工作组和粗暴批斗党的干部说成“右派翻天”；他不能容忍一些人的幸灾乐祸。

谭力夫在辩论中不住地质问：“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公开申明拥护工大的工作组。

谭力夫还公开表明了他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谭力夫说，有人老习惯于

翻本本，找条条。什么事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世界上哪有完善无缺的东西?”世界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

谭力夫的发言，明显地流露出“自来红”的情绪。这位只有24岁的大学三年级的年轻共产党员，讲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

谭力夫的《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流传很广。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它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不必说，它也遭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和造反派的反对。不久，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歪曲谭力夫的观点，对谭力夫横加挞伐。王力在作报告时也说，《十六条》批判工作组执行的是“反动路线”，而谭力夫公开地宣传工作组好。

与此同时，周恩来、陈毅等竭力为工作组开脱，保工作组过关。

陈毅在8月16日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代表时说，看待工作组要一分为二。工作组是他派的。陈毅说，中央外办副主任张彦率领的工作组也是他派的，工作组的“错误”由他承担。

陈毅还在讲话中表示，他的后台是毛泽东。各人有各人的账，他有他的账。陈毅要求学生们不要用大帽子压人，压也是压不住的。

陈毅指出，外交部副部长刘新权不是“黑帮”，工作组也不是“黑帮”。工作组有错误，应检讨，但工作组没有“黑帮”，也不能说有。陈毅表示，他不损害少数派，不损害多数派，也不损害工作组。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群众大会上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北京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共中央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向学生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

尽管各高校内部多数派保护工作组，中共中央也有部分领导人保工作组过关。但是，各学校的工作组组长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仍然遭到各校少数造反派的揪斗。

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组织的“东方红公社”1 000多人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质学院工作组任过组长的邹家尤（时任地质部副部长）。批斗是戴高帽、挂牌子、搞“喷气式”的残酷斗争。地质部党委为保护干部的人身安全，没有交出邹家尤。于是，学生们在地质部静坐绝食。

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学生们的行动。邹家尤只好答应第二天到校听取批判。这就是所谓的“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不久，地质学院“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这时，邹家尤已经去了地质学院。而一些人仍留在地质部为所欲为，并强行翻阅、取走机密档案。

9月7日，“西域纠察队”要“东方红”撤回。“东方红”不同意，双方发生了武斗。“东方红”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月19日撤离。9月28日，关锋在地质学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指责邹家尤。

10月8日，“东方红”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当天深夜，造反派绑架了何长工。

10月27日，“东方红”四进地质部，“扩大战果”。

于是，地质学院“东方红”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它的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

在地质学院的造反派揪斗何长工、邹家尤的同时，北京航空学院造反组织“红旗战斗队”的学生于8月25日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时任国防科委的局长）。

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罗舜初报告林彪，说明赵如璋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将不堪设想。罗舜初又多次向林彪报告学生情况，请求指示，均得不到答复。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学生撤走。

北航“红旗”为揪斗工作组组长，用了28个昼夜，因而一举成名，成了北京响当当的“左”派。它的头头韩爱晶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解放军报社一位年轻的记者写诗颂之。其中有这样几句：“北航旗如血，风雨满京城。二十八昼夜，牛鬼吓断魂！”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内部在工作组问题上也出现了微妙的斗争。8月30日，陈毅在红卫兵大会上说，工作组检查一次两次就行了，通不过也不要再回去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9月7日在北京外贸学院群众大会上说，工作组是中央领导派的，可以说“错误”他应该首先负责任。李先念表示，他可以向学生们道歉，向学生们检讨。

然而，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的20名红卫兵时，表示支持少数造反派。谢富治说，好多学校至少有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对工作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但少数派方向是对的。不仅北京政法学院如此，其他学院也是一样。

谢富治表示，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他支持少数派。他要求学生们赞成少数派的大方向。

直到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问题的通知》，工作组问题才算舒了一口气。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考虑到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主要锋芒应当针对着这条“错误路线”的提出者，而不应当长期揪住工作组不放。各学校、各工厂、各机关、各单位，以后不要再揪工作组去斗争。

尽管揪斗工作组的风波从此结束了，但由此红卫兵埋下的分裂种子都开了花。

11月27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在北大附中举行会议，决定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的主要政治倾向是反对蒯大富的首都三司、反对中央文革小组。

12月5日，“联动”正式公开宣布成立，并在北京刷出一批标语，其中有“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等口号。“联动”被中央文革定为“反动组织”。

12月1日，北京林业学院李洪山在辩论会上批判“中央文革小组”。他提出三点意见：一、中央文革小组的产生不符合《十六条》。二、中央文革小组是钦差大臣满天飞，到处招摇撞骗。三、中央文革小组把谭立夫打成右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从11月下旬到12月，北京连续出现批判中央文革小组的事件，这在红卫兵中产生极大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阵线。

12月16日，“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会议宣布“西城区纠察队”等中学红卫兵组织是镇压革命的非法组织，予以解散。江青在讲话中说，西城纠察队等组织中“有一小撮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家伙”。她点了周荣鑫、雍文涛、王任重的名，说他们是支持这些组织的，对此要负责任。这一事件，使不被江青支持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打击，也使已经四分五裂的红卫兵组织彻底分裂了。

此后，进入1967年，红卫兵组织卷入了全面夺权运动中，随后，分裂的红卫兵组织发生了长时间的对立，并发生持久的武斗事件。由此，其作用逐渐被工人造反组织所代替，红卫兵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基本告一段落。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到1966年国庆节前后，离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已经一个多月，“文化大革命”的进展却不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顺利。由于红卫兵的冲击已不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来揭发、批评和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改正错误，也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清敌我和辨明是非，而是“无限上纲”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相当多的一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中，不仅原来那种“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况仍普遍存在，而且对这种冲击和混乱局势的怀疑和不满更加强烈。在党团员和基层干部群众中，信任并支持各级领导干部的仍占绝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的到处“造反”、“横扫”和“炮打”不能不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抵制。怎样把“文化大革命”继续有力地推进下去，便成为毛泽东这时思考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下了很大决心的，不惜付出代价，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并没有从来自各方面的抵制中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是否正确，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相反，更加坚决地认为必须以极大力量排除阻力。在他看来，这种来自各个方面，首先是高中级领导干部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同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打击”、“压制”群众运动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尽管刘、邓两人实际上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他们推行的那一条“路线”却依然存在，成为运动前进的主要障碍。

这便是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10月间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同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的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的社论，社论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任务，写道：“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果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地进行斗批改呢?”“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的这一社论。

这篇社论指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对于“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曾对毛泽东说，党内历次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否定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的提法也被认为是折衷主义，遭到批评。

社论发表后，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发言的中心内容是：说刘、邓的影响还很大，又攻击周恩来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他们把记录送给了毛泽东。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林彪的意见，规定：“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中央在转发的批示中，又把这项规定适用的范围扩大了，写道：“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的宣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

框统统取消"，那就对群众运动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了。

正当在全国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时，10 月 9 日到 28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出席。

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遭受红卫兵猛烈冲击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大多思想不通，忧心忡忡。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会议"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④

在会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讲话中说，"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问题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是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陈伯达的报告把要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解释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陈伯达的报告指责广大干部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字派"。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的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周恩来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

1966 年 10 月 25 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由毛泽东、林彪讲话。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时"高度评价"了"文化大革命"。林彪在讲话中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还挖出了很多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最主要的是在思想上，确实是触及到了人们的灵魂。

林彪在讲话中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林彪说，刘少奇、邓小

平“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泽东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由刘少奇、邓小平发起的。”

10月16日，陈伯达向会议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长篇讲话，成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他着重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陈伯达作了这样的归纳：“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刘、邓的错误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主要是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在党内，有一定市场，因为党内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相当一批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⑤他所说的“一小撮”，到各地和各部门便成了一大片。这个讲话，经毛泽东批准后印发。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在全体会议上作检讨，对派工作组等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他们的发言稿都先送给毛泽东看过，毛泽东表示欢迎。对刘少奇的发言稿，他写道：“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⑥对邓小平的发言稿，他写道：“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⑦

林彪在同一天的会上也讲了话。他说：“几个月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是两头的劲很大，中间就有一点劲头不足，中间甚至还有一点顶牛，局势一度有些紧张。毛主席看到这个形势以后，提议把大家找来谈谈。”他在这篇讲话中提出：“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⑧

这种“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全盘肯定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似乎一切都可以脱离党的领导而由群众说了算，为他不久前提出的“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正在社会上恶性泛滥的无政府主义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林彪这个讲话，经毛泽东的批准后下发。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被“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林彪

的讲话也大量印发。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本不向群众传达，由于陈伯达在讲话中已全文引用而等于公开发表。这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号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发《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如火上加油，使造反行动更为激烈。

事实上，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对各级党政机关的冲击，除原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旗号外，又打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冲击面更大了，冲击的势头更猛了，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对党政机关打砸抢的行为，负责干部遭受侮辱打骂和被随意绑架的事件，到处发生。造反派的队伍迅速扩大，形形色色对社会现状存在这样那样不满的人纷纷加入到造反行列中来，种种不合理的破坏性要求也纷纷提出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各地党政机关已无法正常工作，连毛泽东要求他们举行的四级干部会议也根本无法召开。

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澜向各个角落铺天盖地地涌起。凡是对“文化大革命”持怀疑或消极态度的干部，曾经挺身而出保卫过各级党组织的干部大都受到批判或揪斗。没有参加造反派的党团员也都受到鄙视，被造反派称为“修”字号的党团员。

红卫兵运动兴起的造反浪潮，被引向各级领导机关。他们顺藤摸瓜，沿着派工作组的线索冲击上级领导机关，对阻止他们过激行为的各级领导，都统统视为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与此同时，红卫兵还把追查“黑材料”、要求领导干部认错和检讨，作为冲击各级领导机关的主要内容。各省区的领导机关先后被冲击。各部委机关也被所属院校的红卫兵冲击。“火烧”、“炮打”、“罢官”之风遍及全国。各级领导部门先后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

注释：

①毛泽东同希尔谈话记录，1966年10月1日。

②《红旗》杂志1966年第13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

③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7日。

④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⑤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6日。
⑥毛泽东对刘少奇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
⑦毛泽东对邓小平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2日。
⑧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⑨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军队院校的"文革"运动要比地方院校稍晚些，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下发和8月的《十六条》公布以后，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随之开展起来。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以上的军事领导机关，另一条是部队院校。关于部队领导机关的文革运动开展情况，公布的文献资料很少，情况不明。

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成立了全军"文革小组"。

全军"文革小组"全称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1966年5月2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设立，隶属于总政治部党委领导，由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组成，谢镗忠任组长。8月，刘志坚任组长，谢镗忠改任副组长，隶属于总政治部。这一时期军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主要在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下进行。但中央文革小组认为军队的"文化大革命"在原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得不好。

部队院校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军委、总政根据《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规定。

1966年5月25日，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通知规定，全军各级党委对运动"加强领导"，"在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并且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由各大单位常委批准。

1966年6月14日，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

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把军内“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了宣传、文化等少数部门。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该报告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

1966 年 6 月 21 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指示要求对各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即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1966 年 7 月 8 日，叶剑英在《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以总政治部名义加上一个批语：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 23 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请示提出的主要办法是，“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革命”。

1966 年 8 月 16 日、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运动后期处理。不能不经过批准查阅军委和总部机关档案，要严格控制。

同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革部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早在 3 月 22 日，林彪提出：“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时间比例现在是三七开，可以考虑改为四六开、对半开，甚至倒三七开。” 8 月，他又提出：“九个军兵种军政教育的时间比例都要来个全面的大改变。”根据林彪意见作出的这一《决定》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 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练部队为 40%，半训练半生产部队为 20%，生产部队为 10%。并规定，其他工作如果与政治教育发生矛盾，都要给政治教育让路。

1966 年 9 月 3 日，经叶剑英批准，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规定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

1966 年 9 月 23 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

其他还包括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等等。

10月5日，根据林彪建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由中央文革小组参与改革的《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下发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冲破了原定的界限。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0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认为：

各军区、军种、兵种、院校、总参、总后党委、政治部：

有些领导机关和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了军队院校的特殊性，至今还有压制民主的现象，不许班、系、校串连，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左派，严重地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因此，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做出好的榜样。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关于指挥学校的学员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与连队相同的规定；关于只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内不在军种兵种院校范围外和地方学校串连的规定等，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今后各院校应按照十六条的规定由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了搞好军队院校的斗批改，应当允许进行革命串连和调查，但军队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这个指示，应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中央在转发批示中说：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地宣读，坚决贯彻执行。

同一天，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师生十万人大会，这一天，所有在北京的军队院校学员都集中到了工人体育场，由叶剑英、陈

毅、徐向前等四位老帅接见。叶剑英在会上宣读了《紧急指示》。

10 月 6 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大会，公布《紧急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明《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紧急指示》终于拉开了军队院校“文革”的序幕，它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大的作用。

1966 年 11 月 16 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也说明它适用于“各单位”。这份规定和军委《紧急指示》的性质和意义类似，其实是《紧急指示》的补充说明。

《紧急通知》一发出，大批的军队院校师生涌入北京。军事领导机关连续遭到冲击，军队领导干部不断地被揪斗。军队院校和某些机关中的一些造反派相互串连、勾结，全国到处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军事院校的学生纷纷到北京串连，多的时候将近 20 万人。有些人到北京就是为了造反，为了揪人，他们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在北京横冲直撞，到处串连，无法无天，不但冲击国防部，冲击总参、总政、总后，还冲击空军、海军、工程兵、铁道兵、炮兵、装甲兵、通讯兵和北京军区，几乎所有的军事机关都被他们冲遍了。他们每冲一个军事领导机关，都是先进住领导机关的办公大楼，然后再白天黑夜地揪斗这个机关的领导干部。另外，在这些军事机关里贴大字报、炮轰、火烧并且抢档案，肆无忌惮地随意折腾，几乎把所有的军事领导机关都搞瘫痪了。军队院校和地方学校出现要求平反、追查运动初期的“黑材料”的热潮，引起无数纠纷，进一步加剧了干部、群众与领导的对立和群众之间的分裂。

10 月下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到北京三座门，冲国防科委，揪斗曾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当过工作组组长的、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路扬。

11 月，张家口电讯工程学院的一些学生冲向国防部办公大楼。

这类冲击军事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11 月间在北京发生了多起。

由于军队受到了很大冲击，战备训练受到了影响。11 月 6 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根据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叶剑英的指示，主持起草了一个《关于各总部、国防科委、军种兵种机关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的通知》，用以制止学生冲击军事机关。这个《通知》要求军队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战备状态，随时准

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通知》指出，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种的主要领导，在完成战备任务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因而他们对部队实施经常指挥必须得到保证，不能中断。未经许可，他们不能离开指挥岗位。对于军事机关的办公室、通信设施、保密设备要妥为保护，以免影响部队的指挥和日常工作的进行。

林彪看后，把这个《通知》转送“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以“借战备压革命”的罪名将其扣压。

11 月 29 日，陈毅、叶剑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说：“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现在有些人不是斗真正的黑帮，不是斗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在那里扭着自己的同志斗！每个部都在斗他们的部长，每个单位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斗争的目标很不明确，不要把工作有错误、缺点的也当成黑帮，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去斗，要区别，不同对待；路线斗争怎么斗法？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搞路线斗争，不要简单化、扩大化。要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叶剑英在讲话中批评了一些人冲击中南海、国防部的做法。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军内造反派对陈毅、叶剑英的讲话进行了批判。

12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毛泽东、林彪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许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转业、复员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并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在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同志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现在起，到明年暑假，派出得力的干部和战士，分期分批地对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普遍进行一次短期军政训练。政治训练内容，主要是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和语录。军事训练内容，进行必要的队列训练，重点

是单个到连的队列动作。训练办法，由各大军区、省军区分片包干，派出干部和战士。每期训练时间半个月到20天。

军队院校的“文革”是整个席卷中国的文革的重要部分，它虽然比地方院校开始得晚，但却结束得早些。军队院校后来多被解散或改编了，无论是学员或教员，都下放或转业了。

维护生产秩序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开展，“文化大革命”开始有由城市走向乡村、机关学校走向工厂矿山的趋势。工矿企业面临着动荡的局面，为了稳定工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致信毛泽东。信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40%～45%，现在只能完成35%～36%。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上海正在进行“四清”的40万职工的企业，决定以文化革命运动为中心的方法进行，我们已答复同意，看看他们的经验如何，再行推广）。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

信中所说的“通知稿”，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地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通知还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

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此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同日，此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36号名义下发。

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社论和下发《工厂六条》《农村五条》。

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营业生产开始受到冲击。

为此，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了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人民日报》社论。

这篇社论发表在1966年9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要两不误。社论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这个社论的主要精神就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从9月10日起，派人民解放军不带武器，协助铁路维护联运列车、联运车厢和停车站的秩序。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亲自宣讲了这篇社论中的观点。周恩来提出，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要实验放在一边。周恩来说，“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于是，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厂六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编者注）。

《通知》要求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和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

《通知》指出，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

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通知》强调，三线建设的重要项目、国防工业项目和新工矿区，无论已建成的或正在建设的，都是国家的机密，本单位职工更应说服其他单位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通知》中说，中央各部直属企业以及各地区的工矿企业、事业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等单位，凡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抓业务”。

《通知》指出，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可以推迟进行，但必须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充分的正面教育，以利以后开展“文化大革命”。

《通知》规定，具体搞法，除派工作队已不适用外，仍按照中共中央7月2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和7月22日发出的《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中的有关措施进行安排。

《通知》强调指出，不论是中共中央直属的还是地方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该单位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通知》还强调，各级生产、建设的指挥机构，必须认真负责，在抓生产、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质量、节约、安全等项工作。特别是要抓紧原料、材料的生产、供应工作，注意做好防火、防爆、防寒和维修等工作，保证重要设备、交通枢纽和仓库等要害部位的安全。

中共中央要求将这个文件迅速传达到中央直属和各地的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研、设计单位，并督促他们安排落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中提出的五条包括：

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

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城市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应动员下乡，有组织地到农村参加劳动，帮助秋收。

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专门安排一段时间把它搞好。这件事，也应当依靠本县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的力量去进行，必要时可由省、地委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校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下乡帮助宣传和协助行动。

四、县以下各级干部，应在本地革命群众和本单位干部的帮助下，揭发错误，批评错误，改正错误。对问题特别严重、不能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由上级党委作出决定，调动或撤销其工作。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则依法处理。对由上级党委和政府任命的干部，均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已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其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必须加强对各级干部的教育，突出政治，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改善领导作风，对工作要勇于负责，坚决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

当周恩来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两个文件及附件报送毛泽东，建议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时，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这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学生、红卫兵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

9 月 14 日，这两个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这两个文件传达后，有利地支持了各地党委的工作，受到基层生产第一线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维持了社会生产和县乡厂矿等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

根据这两个文件的指示精神，9 月 15 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周恩来讲话时突出地讲了生产问题。周恩来说，搞好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

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还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周恩来在会上强调指出，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革命学生”要尊重工农群众，信赖工农群众，相信工农群众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把革命搞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是经过毛泽东审阅批注的。

同一天，《人民日报》为了配合宣传《农村五条》和《工厂六条》的精神，再发社论《向工农兵致敬向工农兵学习》，紧急呼吁：“生产是不能停下来的。工厂、农村的文化革命，应当按原来的‘四清’运动部署结合进行。农村在秋收大忙的时候，可以把运动暂时停一下。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不必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连，干预那里的部署。”

社论还强调指出：“工人，公社社员，机关企业干部不能像大、中学校的学生那样放假，也不要到外地去进行革命串连。”

以上经毛泽东批准同意的社论、文件、讲话，对于稳定社会的生产秩序具有积极意义。

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依然抽空听取有关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11月9日，他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9月7日，该报曾发表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严肃批驳了只强调“革命”，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观点，突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适用于一切单位和部门，是“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而“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一次会上说：工人闹革命的两次高潮，被两篇

“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压下去了。

11月13日，陈伯达将“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12条规定交国务院，要求尽快答复。这个规定提出了“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旨在突破“文革”发动范围的条款，与周恩来的意见大相径庭。当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时，遭到各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听取李富春、余秋里、谷牧汇报座谈情况后，明确指出：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搞，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内外串连。他还根据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并要他们立即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15条内容的修改稿，对陈伯达的12条规定作了几处实质性的修改。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遭到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反对。12月4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的汇报。会上，林彪及“中央文革”严厉批判这个汇报是“以生产压革命”。一连三个半天，谷牧遭到围攻。周恩来承担责任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12月6日，林彪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汇报提纲，并荒谬地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成绩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面得一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收获。他还说，“这次运动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就将运动的重点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的干部，大大增加了打击面。

最后，会议通过了陈伯达修改而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文件否定了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允许学生到厂矿串连和厂际间串连，允许工厂企业成立群众组织。工交被突破了，农村、财贸也随之突破。

与此同时，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提出把“四清运动纳人文化大革命中去”。这些文件否定了周恩来9月14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即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至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遍及全国城乡各行各业，终于酿成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

1967年初维持军队稳定局面的种种努力

“文化大革命”迅速发动起来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而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封、资、修”的旧事物而抛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无政府状态，使中国社会内部原来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不受任何约束地爆发出来，并恶性发展为对抗性行动。同时，也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在“革命造反”的大旗下兴风作浪，不择手段地胡作非为，制造出一幕幕乱打乱斗的惨剧。

此时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的叶剑英和中央委副主席陈毅、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致认为“天下不能乱，长城不能毁”。他们认为，只要军队不乱，就能保住天下。为此，他们采取并制定了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措施。

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了《关于军队贯彻执行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全军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对于连队和一般机关干部，要着重进行正面教育。《通知》还规定，要“点名批判”的人，应由各大单位党委批准。

6月1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明确规定，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进行思想上、组织上的整顿。

《请示报告》还规定，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请示报告》决定在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和

“文化革命办公室”。同一天，叶剑英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委会议问题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中央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请示报告》上批示说，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并于当天转发了这个《请示报告》。

6月21日，叶剑英批准下发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六条指示”，要求对各军事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也就是不搞“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还将军队“文化大革命”只限制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

为了稳定军队，中央军委还不断地召开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文化大革命”。会议强调指出，军队不能乱，不能随便揪斗、处分干部。“罢官”问题要等到运动后期处理。不允许军队任何人员不经过批准查阅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的档案。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对此要严格控制。

9月1日，在叶剑英主持、徐向前和聂荣臻等人参加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在汇报驻京部队各大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时，说部队中不准组织红卫兵，师以上部队及军以上机关的警卫、通信部队统统搞正面教育，不准地方到部队串连，也不准部队到地方串连，更不让地方群众和红卫兵到部队营房搜查。

肖华强调，如果发现有人企图煽动部队搞武斗，各级党委要采取措施，坚决制止，并立即上报。

肖华讲话的总的精神是要保持部队的稳定。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表示完全同意。

9月3日，经叶剑英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9月23日，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干部战士亲属被斗被抄情况及处理意见》。会议提出，各大军区的工作重点应转向抓好部队工作，保证部队正常秩序。

由于及时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队开展“四大”仍由各级党委领导。党委又领导设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具体掌管“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且，军队的“四大”被限定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少数部门和单位开展。因而，军队基本上保持了总体

局面的稳定。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派出联系小组出席海军、空军党委扩大会议，并交代联络员“只带耳朵，不带嘴巴”，进行大量调查。当联络员发现林彪暗中指使时任海军副司令的李作鹏等人搞派性，制造混乱，妄图夺取海军领导权时，叶剑英立即报告刘少奇、邓小平。

随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常务联席会议，对海军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叶剑英根据时任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

叶剑英在讲话中针对李作鹏等人诬蔑时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等人是“黑帮分子”的做法，明确指出，肖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要分清是非，搞好团结。

叶剑英并且在讲话中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叶剑英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空军司令部参谋长的何廷一，告诉他“不要卷进去”，要站稳立场。叶剑英等人及时采取了相应措施，从而有效地抵制了林彪等人夺取海军、空军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67 年“一月夺权”风暴袭来，形成了全面夺权、天下大乱的严峻局面，不仅掀起了“乱党”、“乱政”的狂潮，而且出现了“乱军”的恶浪。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革”后，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一些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被认为偏向支持“保守派”，引发地方造反派强烈不满；在军队内部也产生了派性，出现了分化，处在严重混乱中，各地在一些军事院校造反派领头下，也在冲击领导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影响了军队的稳定。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势，怎么办？这时国内唯一有领导、有组织、能够在一片混乱中成为一股稳定力量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考虑到，要使军队出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控制局势的作用。

在这种形势下，1967 年 1 月 11 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改组后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副组长为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组员为王宏坤、余立金、刘华清、唐平铸、胡痴、叶群、王蜂、和谷岩、张涛。新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总政治部。3

月 30 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谢富治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1 月 11 日，毛泽东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先后发言。他们对军队内部这种状况忧心忡忡，在发言中一致强调要绝对维护军队的稳定。徐向前说："军队不同于地方，不同于学校、工厂、农村，不能和一般单位那样搞大民主，否则就会搞乱，搞瘫痪，要定下来这么一个方针。""军队一定要保持稳定，否则像地方一样一哄而起，就没有办法控制。"叶剑英说："军队要稳定，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①]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对各地的要害部门，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各地银行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和公安部门负责保护。[②]中共中央还发出通知，规定凡是在内部发生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

1 月 12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规定："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地方的电台、监狱、仓库、港口、桥梁，由军队负责守卫，也是完全必要的。同样，不准挑动群众对这些地方进行包围、冲击、占据和破坏。"[③]这个《通知》在 14 日发出。

在这样情况下，几位老帅和一些老同志，为了维护军队的稳定，采取了抗争斗争。在 1967 年 1 月 19 日、20 日的中央军委碰头会上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争论。

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那样搞"文革"。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则叫嚣："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开展'四大'"。在会上，他们还搞突然袭击，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江青带头发难说："部队执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不彻底，是肖华打马虎眼。"陈伯达则阴阳怪气地说："肖华不像战士，像绅士。"叶群发言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陈伯达、江青也在一边帮腔。江青还指着肖华的鼻子质问："今晚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

会后，叶剑英立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周恩来，说江青等要批斗肖华。周恩来向毛泽东转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报告？赶快制止，总政治部主任是能乱批的吗？!"

随后，周恩来一面打电话给叶剑英，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并说："告诉

他们，没有我的命令，肖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一面打电话给江青、陈伯达，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批肖华的会不能开。

但是，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便抄了肖华的家。肖华闻风从后门走脱，到叶剑英家避难，这才免遭揪斗。

次日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叶剑英等老帅对江青、陈伯达等策划批斗肖华，并抓人、抄家，妄图搞乱军队的嚣张气焰，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怒斥他们反党乱军的罪恶行径。这就是史称的“大闹京西宾馆”。

毛泽东在得知“大闹京西宾馆”的情况后，想去听听不同的意见。1月2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由于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仍在继续，接见时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许多高级将领对造反派的行为十分愤慨，将领们，见到毛泽东心情十分激动，纷纷向他汇报部队在“文革”中遇到的问题和造成的危害，诉说自己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批斗的情况，情绪激昂。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汇报他和一些军队领导同志躲在京西宾馆的情况。他气愤地说：“他们点名要批判我，我抗议。戴高帽子，对地、富、反、坏可以戴，对我们几十年的老干部这样做，我们想不通。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毛泽东插话说：“那些做法是对付土豪劣绅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

北京军区的同志说，我们几个常委都被包围起来了，司令员杨勇被抓走了，还要抓副司令员郑维山。毛泽东插话说：“那还了得！到处抓人怎么行?!”

二炮政治委员李天焕报告说：“我们现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许我们工作，有错误我们检讨。”毛泽东随即说：“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

毛泽东在听完老部下在“文革”中的种种不幸遭遇后，对他们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他也批评了造反派：“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了

得?! 哪个不犯错误? 我也犯。""对群众我们不能泼冷水，但要说服。""张体学、江渭清（分别是湖北省省长、江苏省委第一书记）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

"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做经验来对待"。[④]

为了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月23日，在继续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讨论军以上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以与会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建议。同时，叶剑英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商量，要采取措施，抵制干扰，稳住军队。他提出："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在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老帅敦促下，林彪同意搞个条令。于是，中央军委拟定了一个命令初稿。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使军队能执行这个《决定》，前提仍是军队本身必须保持稳定。这个问题事实上远未解决。

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说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还有的自杀，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的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⑤]

25日，徐向前又写信给林彪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一面要大力支援地方的真左派，一面又要进行内部的阶级斗争，因之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⑥]

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规定中包括：军队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内的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等。毛泽东对这个规定十分重视，先后作了多次批示和修改，如提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

1月28日凌晨，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会上，文革小组成员不同意删除“要欢迎左派冲击（军事机关）”的内容。当天下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碰头会讨论情况。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同几位老帅一起研究审定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时，删去了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的内容。将第五条改写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追究。最后，毛泽东审批时加写了一句话：“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并批示：“很好，照发。”当天，中央军委颁布了“八条命令”。⑦

经毛泽东批准的“八条命令”的颁布，和1967年间一些领导人和军队人士为维持军队稳定作出的种种努力，对稳定军队，遏制军队内部的混乱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注释：

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67年1月11日。

②《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967年1月14日。

④毛泽东同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谈话记录，1967年1月22日。

⑤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67年1月25日。

⑥徐向前给林彪的信，手稿，1967年1月25日。

⑦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命令稿的批语和修改，手稿，1967年1月26日、28日。

“《解放日报》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是“中央文革”的江青等人阴谋夺取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权的一个步骤。为了夺取上海的党政大权，他们利用红卫兵首先从舆论大权入手，制造了这一闻名全国的事件。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此后连续推出社论、文章号召造反。在此前后，中共上海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由张春桥兼任。各委办、区县局和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继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全市大、中学校和党政机关、文化科研单位开始出现针对各级领导的大字报，揪斗“牛鬼蛇神”，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强调“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提出“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

毛泽东8月1日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热烈支持的信和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上海。

同月11日，复旦大学出现全市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学生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他们筹集路费派代表前往北京向中央文革汇报复旦运动。

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的百万群众，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从此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行开来。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一哄而起，最多时达5 340多个。初期以学校为单位，自由结合。9月以后，各区先后自发成立红卫兵军区或司令部。10月开始出现全市性的几大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上三司”），以及从中

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颇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红反会”）等。

九十月间，部分学生先后成立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和上海市中等学校红卫兵总部，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风潮刮起，两个红卫兵总部被视为“保守组织”，11 月以后相继被冲垮。

上海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是响应号召破“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 月 23 日，上海红卫兵仿效北京红卫兵的做法，从学校“杀”向社会，从改路名、店名、校名、厂名、影剧院名、公园名开始，继而一切被认为与“封、资、修”等“四旧”沾边的事物，都成为红卫兵冲击对象。

破“四旧”过程中，由北京红卫兵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盛行起来。在抄家过程中打人成风。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 1966 年 9 月 1 日至 25 日，市区 489 所中学有 361 所学校红卫兵有打人行为，被打达一万余人，其中打死 11 人，打伤 961 人。

8 月 24 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有关部门和区县负责人到会。最后，市委作出“不要抄家，不要破坏公物，不要搞外侨，不要在马路上脱鞋子、剪裤子，不要随便拦汽车，不烧档案，保护图书”等十条口头规定，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回去进行普遍教育、宣传和落实，但在当时情况下，这些指示难以起作用。

继破“四旧”后，红卫兵又盛行起全国大串连活动。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下，不仅大中学生，有的小学生，机关、工厂职工也汇入大串连队伍。9 月中旬以后，串连学生上火车人数由每日 5 000 多人上升到一万人以上。上不了车的，到市郊车站爬车、拦车，出现伤亡事故。中断铁路运输事件不断发生。上海铁路分局列车正点率下降到 18%。10 月底，外地来沪串连师生先后共 40 多万人，各级党委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解决红卫兵的吃饭、住宿等问题。以北京为主体的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设立了驻沪联络站，介入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从 8 月 31 日到 9 月 4 日，北京南下红卫兵连续发起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他们宣称“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一些上海工人、学生劝阻、反驳他们，从而发生冲突。为避免上海群众与北京学生的对立，曹荻秋

一再接见北京学生，欢迎大家揭发市委领导的问题。9 月 5 日，北京红卫兵进入市委机关大院。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9 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 200 多起，参加者 7 000 多人。

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副主席林彪先后讲话，会议主要批判各级党组织执行了一条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根据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军委、总政关于取消军队院校党委对院校“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对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的指示，同月 19 日，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宣布停止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党组织对本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此后“踢开党委闹革命”之风在上海盛行开来。

在这一背景下，1966 年 10 月下旬江青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马到上海去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夺上海的权。聂元梓立即行动，于 11 月初窜到了上海。到处煽阴风点鬼火，说什么“上海必须大乱”、“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

一个异地的普通党员，不经任何授权，不顾客观事实，可以明目张胆、信口雌黄地指责一个全国最大工业城市的市委是“反革命的”；可以肆无忌惮地煽动群众，要“大乱上海”，这还有王法，还有半点党的组织原则吗？针对聂元梓的言行，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对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同志说：“我看聂元梓不像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要组织上海各报刊针对聂的胡言乱语进行反击，要大量刊登上海‘五大科学成就’的消息，以此来驳斥聂元梓。”

陈丕显回忆，为了打倒上海市委，聂元梓与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徐景贤进行了密谈。聂元梓向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徐景贤立刻心领神会。他心里十分清楚聂元梓的身后站着什么人。[①]

1966 年 11 月 25 日，由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团长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代表蒯大富主持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上海和外地在沪的红卫兵一万多人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曹荻秋等市委领导被迫到会。

受江青指使，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来沪鼓动造反夺权的聂元梓（注：聂元梓原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是被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的主要作者），煽动群众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聂元梓和蒯

大富杀气腾腾地在会上轮流发言，说“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上海几次乱，没有真正乱起来，这次我们来上海，上海是乱起来了”，“乱得好，还要乱下去，上海必须大乱”。聂元梓在这次大会上公然称：“上海市委是反革命的”，并领头呼喊“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的口号。[2]

会后，“红革会”要求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报道大会消息，遭到拒绝。于是，红卫兵便在他们《红卫战报》上作了报道，并配发了一篇题为《〈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的文章。文章说：“《解放日报》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黑又长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解放日报》散毒到哪里，革命的《红卫战报》就消毒到哪里。”诬称《解放日报》“发表大量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是中共上海市委“执行资反路线的工具”，等等。

11月27日“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代表到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和《解放日报》，要求将28日即将印出的第9期《红卫战报》（该报系“红革会”与“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合办的小报）与当天的《解放日报》一起发行，以便“消毒”。这理所当然地遭到《解放日报》和报刊发行处的拒绝。

11月29日，“红革会”20多人闯进解放日报社，强行要求报社将《红卫战报》第9期夹进《解放日报》，分送给每个订户。解放日报社请示中共上海市委后，拒绝“红革会”的无理要求。

11月30日凌晨，“红革会”出动400多人涌进《解放日报》社汉口路274号大楼，首先占据了楼下发报间，强行阻止当天报纸发行。和报社负责人谈判，提出三项要求：

一、《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内一起发行，版面要与《解放日报》一样大小；

二、《解放日报》必须全文刊登《〈解放日报〉是中共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

三、把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对如此无理的要求，报社当然又拒绝了。

“红革会”一声令下，发出勒令：“勒令《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红革会”的勒令，立即得到“工总司”的支持。

于是，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

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王树人后来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1966年11月30日凌晨，持续九天九夜围攻解放日报社的事件开始了。红卫兵和报社领导展开“推磨”式的谈判，从夜里一直磨到天亮。王树人对红卫兵们说：“你们这种说法不通啊！是邮局不让你们发行，并不是报社不让你们发行。好比吵架，你们同姓王的吵架，怎么能封姓李的门呢?”

“红革会”的蛮横行为激起报社职工的愤慨，纷纷同他们进行辩论。而报社的造反组织“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却在当天发表声明：“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红革会”的行动得到解放日报社和文汇报社造反组织的响应。然而全市大多数市民非常反感。

第二天，“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为配合“红卫兵”强占报社的行动，在街头贴出题为“《红卫战报》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解放日报》的毒草必须彻底批判”等大字报。“红革会”占据《解放日报》社的消息就此传开，汉口路报社门前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许多群众要冲进去与他们评理，占据报社的“红卫兵”用木棍、铁管对付群众，在报社门口发生冲突，有些群众被拉进去批斗和殴打。

12月2日，“红革会”和上海新闻界造反派在文化广场联合召开“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市委资反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等造反组织也参加大会。会后“工总司”为支持“红革会”的行动，派出300多工人造反队员开进报社参加占领。“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红三司”、“红上司”等“红卫兵”组织也纷纷派人参加占领。占据报社的各“造反派”达1 000多人。与报社外广大群众及赤卫队员对峙，不时挑起冲突，致使《解放日报》被迫停刊九天。

报社被占据后，每天印好的《解放日报》不能发行，一天天被积压。“造反派”蛮横阻挠报纸发行的行为，激怒了广大读者，黄浦区机关干部、职工、学生和全市各界群众，不分昼夜地涌向《解放日报》社门前，向占据报社的“造反派”提出质问和抗议。一批批群众上街游行，举着横幅，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强烈要求撤离占据解放日报社”等口号。在此期间，每天聚集在报社周围的群众有数万人，最多时约有50万人。

其间，聂元梓频繁接触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头头，煽动他们说：《解放日报》是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市委才能倒；上海的权要夺，但难夺，宣传机器不在你手里，所以要夺报社的权。

12月5日“工总司”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再次诬蔑《解放日报》，并鼓吹“《解放日报》必须彻底改组”。“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还亲自去报社为“造反派”们鼓气。当天晚上，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解放日报》事件的指示，在巨大的压力下当即派市委书记王一平、常委宋季文去报社与“造反派”进行会谈，答应了“红革会”和“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

12月3日，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和副市长宋季文、李干城等进入报社对红卫兵做说服、劝说工作。他们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了人身迫害。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曹荻秋打电话请示陶铸同志。曹立即给陶铸同志打电话，谈了解放日报社发生的情况，请中央火速作指示。陶铸同志作了四点指示：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对红卫兵冲击，要说服，这是原则问题；三、可以分开发行；四、造反派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如果红卫兵硬冲，要说服，要顶住，这是个原则问题。造反派们见陶铸同志有电话来，也拥到报社总机室，要打电话给陶铸同志，要他撤回四点指示。

这时，聂元梓又在幕后活动了。她把一些心腹从报社叫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从《解放日报》轻易撤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并向他们交底说：“《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许多组织打电报给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表态。中央文革没有表态，就是支持我们！”

然而12月5日晚，中央文革小组电话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说《解放日报》附带发行《红卫战报》，无非是揭露市委的错误，应该欢迎；地方报刊停那么几天，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共上海市委不得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

《三项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一、《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

二、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允许“红革会”查阅报社内有关文章、底稿等；

三、解放日报社党委就执行资反路线作出检查和交代。

“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主要内容为：

一、支持“红革会”的要求；

二、市委要采取有效措施，使其他群众组织不要干涉革命造反派组织的

行动；

三、《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果由市委负责，并作公开检查；

四、保证工人革命造反队回厂后不受刁难，否则引起的后果由市委负责。

12 月 8 日就此发出市委文件，通知各级党组织执行。至此，“工总司”、“红革会”才相继撤离报社。

12 月 8 日《解放日报》恢复发行。9 日凌晨占据报社的各造反组织全部撤离。历时八天九夜的“解放日报事件”才告结束。

12 月 10 日，曹荻秋同志也被迫签字，为了不扩大事态，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12 月 14 日，又一个主角姚文元出场了。他兴奋地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表示支持“红革会”和“工总司”的“革命行动”，夸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

《解放日报》事件后上海社会动乱加剧，这一事件将市委的威信全部打掉，上海市委距离瓦解指日可待了。

在这期间，12 月 12 日晚，姚文元从北京打电话给徐景贤，下令写作班子立即举旗造反，并向徐景贤透露说，他和张春桥不久之后要回上海，要踢开上海市委，要写作班子做好做他们工作班子的准备。

徐景贤接到电话后，如获至宝。12 月 13 日下午，就立即召开写作班子全体会议。徐景贤向到会的人传达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指示，决定写作班子一致起来，全体造上海市委的反。他们把这叫做“后院起火”，“心脏开花”。

12 月 18 日下午两点，以市委写作班子为首联合了市直机关四个单位的造反派，在“红革会”、“工总司”的参与下，在市文化广场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场上有两三千名红卫兵维持秩序。大会由写作班子支部副书记郭人杰主持。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上海市委领导以及市委、市人委 20 多个部局级领导，都被揪到会场接受批判，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常溪萍、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被作为“反党分子”押上了主席台成为重点批斗对象。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

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毛泽东对《文汇报》、《解放日报》造反派的夺权很快就明确地加以肯定。他在1月8日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上海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他们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么回事。”他还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起来，就管住了。”“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他又说：“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③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在九日《人民日报》转载“工总司”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中加以公布。

注释：

①《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②《陈丕显回忆》，解放日报。

③毛泽东谈话记录，1967年1月8日。

“安亭事件”

“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造反夺权活动开始出现蔓延到工矿企业的趋势，为此，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起草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7月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同日，此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36号名义下发。

这个通知是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致信毛泽东时一并送上的，信中提出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

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的仗，不要全国所有厂矿企业一哄而起。否则，不但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成功，而且会使生产建设遭到损害。通知还指出，各级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的单位，要以主要力量抓革命，同时，也要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抓生产建设工作。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说，以文化大革命为纲，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全面地、迅速地向前发展，我们必须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

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

通知要求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各工矿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但是，随着各级干部被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不断升级，造反内容不断深化，《十六条》关于工矿、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限制也被突破。“中央文革小组”私下支持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造反。

到1966年11月上旬，从中央到地方，生产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卷入运动，部分企业领导班子瘫痪，厂矿停工、停产时有发生。在学生运动的带动下，一些城市和工厂出现了“战斗队”组织。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上海的一批造反派“纷纷起来批判市委和各级党政机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干部遭到冲击，很难开展工作。有些工厂的造反派亦在串连中开始纠集起来。同时，北京南下红卫兵和少数上海红卫兵到工厂串连，以“工人学生联合运动”的名义，动员工人起来造工厂党组织和上海市委的反。

11月6日，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玻璃机械厂工人潘国平、良工阀门厂工人陈阿大、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黄金海等17个单位的造反派头头30余人，在北京红卫兵召集的“上海工人串连交流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计划于9日召开批判控诉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宣布“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的成立，并要求中共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派负责人前去参加成立大会。王洪文被推举为“工总司”“司令”。

当夜，王洪文、陈阿大等十余人，冲砸协大祥绸布店和上海市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抢劫红布、府绸等100余米，作为“工总司”袖章之用。

11月8日，王洪文指使黄金海等40余人冲砸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砸毁办公室，殴打档案工作人员，抢劫档案，开创打砸抢先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群众组织不符合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精神，决定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经请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

组长陈伯达，得到同意。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文化广场自行召开成立大会。会议受到冲击。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上海市长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但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没有给予承认，并对群众进行教育。

10日凌晨2时，市委派市总工会主席张祺接见他们，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听劝告。后冲进上海北火车站，强行登上开往郑州的65次列车开行，声称去北京向中央控告上海市委“打击镇压”工人造反派。上午7时火车开出，上海铁路局根据国务院指示，8时17分将列车停靠在位于上海市西北郊的安亭站的岔道上。安亭镇是以轿车工业和轿车生产配套工业为主的现代化综合性工业城，也是上海西部的中心城镇。南濒沪宁高速公路，西接江苏省，北归嘉定区，为嘉定、昆山、青浦三地之交界。

中午12时零2分，王洪文等率众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全线中断31小时又34分钟。安亭站东面被迫停下的列车有12趟，上海站36趟北开列车不能发出，从安亭到蚌埠，开往上海的近百趟客货列车被迫停留在沿线各站，严重影响客货运输。

这就是举国震惊的“安亭事件”。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同时，周恩来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的行动不但影响了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了全国的交通。周恩来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有问题回去后解决。

周恩来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

张春桥驱车去安亭找王洪文等几个造反派头头开会，并达成协议。13日下午，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一、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二、承认11月9日的大会和工人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三、安亭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出公开检查；五、对上海“工总司”今后的活动提供各方面的方便。为此，上海市委负责人曾打电话向中央汇报，并开会对张春桥提出了批评。

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1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

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工总司”的成立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从此，江青等人更加放肆地煽动工人“造反”。“安亭事件”开始了在全国由产业工人组织“造反”和“串连”、工矿企业“停产闹革命”，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进一步升级的运动。全国局势进一步恶化。

注释：

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 年 11 月 13 日。

“文化大革命”引向工厂农村

进入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这个重要问题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是一个关系整个国民经济能否正常运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必需品能否得到基本保障、国家建设事业能否继续发展的全局性大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影响所及，不仅在学校和机关里，不少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已纷纷建立群众组织，相互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地区、本系统的党政领导。

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就文化大革命运动部署问题致信毛泽东。并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7月2日，毛泽东在此件上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同日，此通知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336号名义下发。

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地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通知规定：一、全国铁路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应当根据具体情况，结合四清运动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进行。二、必须指定必要的人员，组成专门的领导班子，切实负责管好各项运输生产工作。铁路分局和分局以下的单位，可暂缓开展文化革命运动。三、铁路工厂不论是开展文化革命运动的单位或推迟进行的单位，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证完成机车、车辆的制造和修理任务，并保证完成冬运防寒的准备工作。四、铁路系统暂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应当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关文化革命的文件和文章。五、进一步整顿车站和列车上的革命秩序。在车站和列车上，不要打人，不要搜查；不要拦截列车和阻止列车的正常运行，全力保证列车按规定时刻运行。六、通知下达到铁路各基层单位，并应向职工进行传达。以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运输生

产的双胜利。

中央工作会议前，周恩来在9月8日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在9月1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

通知说，“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领导班子已经瘫痪的，应由上级党委指派或商同该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委会，责成有关人员迅速成立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各工矿企业等单位的领导干部需要撤换的，应由上级党委主动加以调整，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②]

可是，就在这年11月10日，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由于参与事件的已不是学校的红卫兵，而是工厂的工人。这就提出一个大问题：“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要扩展到工业交通领域中去，产业工人能不能像红卫兵一样也搞“革命造反”，进行“革命串连”，以至“停产闹革命”？

在工人农民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是支持的。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观看烟火时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中说的“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

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

这种判断就有了后来的要把“文化大革命”推进到工厂企业推进到农村的决心。他要通过工人农民参加运动，提高觉悟来抵制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人。

“安亭事件”后，毛泽东决心将运动引到工业交通领域。

“安亭事件”后，张春桥支持造反派的做法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

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

他主张首先抓好“革命”，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认为抓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生产就会上去。正如他对“十六条”修改的那句话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③在“十六条”中，正是根据他的意见，加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他还在陈伯达的一个讲话稿上批道：“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④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后的工厂形势已经无法控制了。有了最高指示的撑腰，早就对周恩来、陶铸等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动作。11 月 13 日，陈伯达拿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这就等于规定工交企业也像学校一样闹“革命”，大

大小小的“安亭事件”将层出不穷。

11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22 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邀请了上海、北京、黑龙江、辽宁等省市和铁道、水电、化工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参加，写出了《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

周恩来指示：组织国务院业务组，管理经济工作，抓工交企业的生产。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充分考虑工交企业的特点，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应当强调：一、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二、工交战线开展文化大革命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三、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四、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不搞跨地区的串连。据此，国务院业务组组织有关部门起草了《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即《十五条》）。

第二天，谷牧把工交座谈会期间修改的关于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提纲》批印上报。谷牧回忆：“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 12 月 4 日林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激烈批判。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在 12 月 6 日的会议上，陈伯达气势汹汹地站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时，周总理马上严肃地对着陈伯达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12月3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讲话。他提出，工交系统也必须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交系统也有薄一波的东西，也有刘、邓的影响。他说："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在生产岗位的人不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单纯落实在生产上，文化大革命达到的目的是多方面的，应当达到巩固政权，巩固所有制，必须思想革命化，这是就国内来说；对国外来说，在马列主义的阵营中要树立抗修正主义的典范。完全从生产上看文化大革命是片面的，我们用别的方法也可以提高生产。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间内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点损失，其他方面得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的收获。但是我们要注意生产。文化大革命本来促生产，但在一定时间内某些部分可能挫伤生产。认为失败是不对的。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不仅将来可以促生产，一定时间内搞得好，还可以立竿见影。这次大革命是个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干部大批判，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是干部舍不得面子，不肯让群众批判，群众不服气，就对立。所以我说是批判干部的运动，我们是当权派，总是有错的，错误重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轻的也有资产阶级思想萌芽，也要批判。"他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搞学术界，现在进入工人、农民，进入全社会，要席卷全国。过去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现在迎接，不是堵而是要扩大，要渗透到每个领域，要改变社会面貌。要有意识地扩大，深入发展下去。当然不是放假停工闹革命，精神要永远坚持下去。文化大革命是不能停的大战役，思想革命不能停火，要经常打，长期地打下去。"

会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在听完工交座谈会的情况汇报后，对根据周恩来指示写的《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进行指责和批判，说这个《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

林彪在会上说，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且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

林彪并在会上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林彪表示，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的是要“改变社会面貌”。

会议最后一天，林彪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同意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林彪说，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就是“镇压革命”。陶铸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刘少奇也在发言中被迫作了检讨。

12 月 9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其主要内容是：

一、坚持实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

二、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按照十六条办事，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有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这个班子，对国家生产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担负责任。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包括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区中央局）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不许调动原来的生产位子，不许对工人家属进行威胁迫害。被打击而被迫离开工厂的革命工人，必须允许他们回厂参加生产，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工人被迫离厂时的工资应该照发。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

本单位或本地方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用摆事

实讲道理的方法，进行讨论，不要被坏人利用，不要造成对抗的形势。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一切工人组织，都应当保持工人阶级劳动朴素的本色，不要搞一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装备。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一切革命串连，都不要包办代替，强行干涉其他单位的文化革命。[7]这一来，所谓在“八小时工作以外”的“业余时间”闹革命，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个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这个《指示(草案)》。

《指示（草案)》中规定，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如不称职，可以随时改选或撤换。经过群众讨论，健全或改选领导生产的班子，负责生产分配、收购、供应工作。

《指示（草案)》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红卫兵可以参加民兵。在农村中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一般不要担任红卫兵的领导职务。在外地工作和学习的地富子女，不要回原籍进行串连。要像土改那样，采取回避政策。

《指示（草案)》还指出，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空闲时间，进行串连”。同时，这些单位之间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农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办代替。在斗争中，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同时，还要防止坏人挑起宗派斗争。

这个文件的下达，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扩及到广大农村。[8]

12月21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会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做起，再到工厂、农村中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有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以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胜负还未定哩！”[9]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

中共中央先后下发陈伯达等起草的在工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使“文化大革命”合法地进入 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停产闹革命”一时风行全国。

一场“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浪潮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以席卷之势掀起了。

注释：

①毛泽东对周恩来请示信的批语，手稿，1966年9月14日。

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③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稿的修改，手稿，1966年7月21日。

④毛泽东对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批语，手稿，1966年10月24日。

⑤⑥《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页、第27页、第46页。

⑦《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1966年12月9日。

⑧《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966年12月15日。

⑨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康平路武斗"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与"工总司"对立的另一个造反派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简称"赤卫队"）因反对"工总司"进驻解放日报社而被骂为"保皇派"，两派形成对立局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和"工总司"将"赤卫队"视为他们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障碍。

1966年12月23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批判市委"资反路线"大会，向市委提出了承认"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制止"工总司"的打砸抢活动、，反对张春桥签字同意"工总司"提出的"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作检查等八项要求，曹荻秋签字同意。25日，"工总司"又在文化广场召开批判大会，强迫曹荻秋承认"赤卫队"是"保皇组织"，"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这一来矛盾更为复杂。原来支持上海市委的"赤卫队"有被遗弃之感，索性也召开大会，要"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另一方面，"赤卫队"紧急商讨对策，决定给党中央、国务院打电报，要求中央派专人来解决上海问题；另外，调集人马包围了康平路上海市委所在地，要找陈丕显、曹荻秋算账。

无疑，"赤卫队"要"算账"，却找错了债主。

1966年12月28日之前，上海华东师大、交大、"红革会"等红卫兵组织已经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工人赤卫队也开始向市委大院集合，并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据"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王知常交代：28日下午，两万多名赤卫队员陆续来到康平路市委机关静坐，要求市委领导澄清是非，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

徐景贤立刻召集郭仁杰、王承龙、王知常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对付"赤卫队"。在会上，有人提出应该向"赤卫队"进行宣传。王承龙表示同意，并提出"向院子里的赤卫队进行广播"。

徐景贤对于这个意见表示称同，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决定立刻动用宣传车和高音喇叭，向“赤卫队”发动“政治攻势”，对“赤卫队”进行“瓦解”。

当天晚上，张春桥的秘书急急忙忙地给在北京的耿金章打电话，说是上海发生紧急情况，要他立即返回上海。

随时都注视着上海政治动向的张春桥，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于29日凌晨给他在上海的老婆（李）文静打电话，告诉她“要提高警惕，胜利果实不能被赤卫队夺去，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

（李）文静在得到张春桥的指示之后，立刻将此情况通知徐景贤。

张春桥连夜打电话到上海指示王洪文等抓住时机调动人马对付“赤卫队”。密令“工总司”与以徐景贤等人为头头的“上海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采取行动，瓦解“赤卫队”。同时张春桥叫当时在北京的“工总司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司令耿金章立即乘飞机回沪，补充实力。张春桥还授意其妻捏造了一个“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罪名，授以“工总司”围攻“赤卫队”的借口。李文静在《声明》中写道：“今天，有一批‘赤卫队’无视公安部的规定，公然冲击我的家。……我呼吁上海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上海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在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规定明文指出：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

据《陈丕显回忆录》记载，接着，张春桥等人捏造了“‘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大方向错了”的谣言，蒙骗社会和广大群众，决定于12月30日凌晨向“赤卫队”发动总攻。

“赤卫队”是抄了张春桥和柯庆施的家吗？张春桥老婆李文静后来自己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老婆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了一张名为《造谣派破产》的辟谣传单，上面写道：“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张维维的真话戳穿了王洪文等一伙人的谣言，因而被他们斥

为“铁杆保皇分子”，“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

谣言既出，“工总司”便理直气壮地大打出手了。这样，“赤卫队”自然成了反革命。

29日上午，曹荻秋同“赤卫队”谈判，承认“赤卫队”是合法的群众性组织。“赤卫队”准备下午撤离康平路。此时，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成立了联合指挥部，迅速调集十多万造反队员包围、控制了以康平路为中心的周围道路，不让“赤卫队”撤出。

30日凌晨2时，造反派手持长矛、木棍冲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大院，对手无寸铁的赤卫队员进行围攻和殴打。到清晨6时左右围攻结束，大批“赤卫队”队员受伤，伤势严重当场送医院治疗的有91人。“工总司”抓了300多名“赤卫队”骨干。当晚，“赤卫队”总部被解散，各区的大部分“赤卫队”基层组织也相继被砸。在全国开了大规模武斗的先例。

31日，约两万名“赤卫队”队员北上赴京控告，被阻于昆山，“工总司”派人乘汽车赶到追打，制造了又一起流血的“昆山事件”。“工总司”将“赤卫队”打垮后，又于12月31日抓了“赤卫队”的全部负责人。此后“赤卫队”各级负责人遭到迫害，主要负责人被捕判刑。据不完全统计，“赤卫队”大小头目被抓240人。这样，同情、保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瓦解了。

康平路事件后，大批赤卫队员被迫离开工作岗位，使生产、交通受到严重影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康平路武斗事件”。

这是上海也是全国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以后仅仅一个星期，1967年1月6日，“工总司”、“机联站”等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

张春桥对这次武斗的成果，给予了很高有评价。

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事件发生一个月以后，张春桥当上了上海人民公社的主任。而“赤卫队”的市、区负责人被抓240多人，作为一个组织从此土崩瓦解。“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还被当时的法院判刑。

197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赤卫队”一案进行复查，决定撤销“四人帮”控制的原市公检法军管会对原“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潘

月法、金瑞章、李诗音四人的判决，给予彻底平反。中共上海市委宣布推翻强加在“赤卫队”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这一事件才算有了结局。

法庭审判对于这次事件作为一起重大事件进行了庭审。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除当时武斗现场之外，也就是说同一时刻在上海的其他地方也同时发生了武斗。

就在耿金章率“二兵团”和“工总司”近两万人的队伍，对进驻市委大院的“赤卫队”进行围攻时，另一支队伍也在上海滩上秘密地开始了行动。

位于杭州路的上海“工总司”总部，负责值班的王腓利急急忙忙地走出大门，直朝上棉十七厂跑去，见到了正在那里的“司令”王洪文，将康平路发生的情况向他汇报。王洪文没有想到耿金章下手如此之快，便对前来的王腓利挥挥手，说了一声“走”，很快就冲出了厂门。

王洪文带领几个人跑到位于闸北的“工总司分部”，立刻对早已调集待令的人员进行安排，要他们迅速占领“赤卫队”闸北分部，同时将他们的物资缴获过来，全部搬到“工总司闸北分部”，归造反队享用。

王洪文为什么首先要带队去闸北呢？因为上海火车站在这个地方，交通方便，为了防止被打散的“赤卫队”人员外逃，更为了防止他们乘机到北京去告状，揭露张春桥、王洪文一伙人打击群众的残酷手段，因此首先必须得占领这个地方，以便封锁消息，用他们的说法就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在打垮了闸北“赤卫队”分部之后，王洪文立刻下令，由他带领一支队伍，去西藏路一带堵截，千方百计阻止“赤卫队”的人去火车站。

接着，王洪文又令另一部分队员，前往康平路协助攻打“赤卫队”。

据王洪文在特别法庭上交代：29 日晚，我（王洪文）和王腓利从上棉十七厂去闸北区分部，同曹德宏调人包围西藏路一带的“赤卫队”，收缴“赤卫队”的袖章，解散了他们的队伍。

曹德宏在法庭上的证言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证言中说：29 日晚，王洪文、王腓利、廖祖康到各区指挥点检查。王洪文说：“你们负责外围阻止任务，要是赤兄（指“赤卫队”）来增援部队，如果发现，要很好揍他们一下，决不能让他们冲进去。”“要阻止，要狠狠揍他们一下子。”

30 日早晨，部分“工总司”的头头接到通知，让他们到位于衡山宾馆二楼的现场指挥部去开会。

王洪文向大家下达了命令：你们回到各区后，尽量迅速地彻底摧毁“赤卫队”的区联络站。

从此，王洪文便以武力打击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群众组织，在上海制造了几件血案。

1966 年 12 月 31 日，在张春桥支持下，为了不让工人“赤卫队”“死灰复燃”，在经过秘密策划之后，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发出特急通令。

《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特急通令》称：……把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及各区、县分部的头头统统抓起来，押送公安局。各工矿企业工人“赤卫队”头头中，有反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罪行者，也一律抓送公安局。

康平路武斗过后，“赤卫队”部分队员去北京告状。“工总司”组织大批人员堵截，在昆山终于追上了告状的“赤卫队”员，双方再次发生冲突。有近百名“赤卫队”员被殴打，“工总司”也有部分成员受伤，造成沪宁铁路交通全线中断。这就是著名的“昆山事件”。

“昆山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央的关注。“中央文革”打电话给陈丕显，要他找各造反派组织解决交通中断问题。接着，“中央文革”又打电话给“机联站”头目徐景贤，告诉他这件事，安慰说：“给陈丕显一个机会，但不是支持陈丕显”，“陈丕显的账，你们要清算，以后算。”张春桥、姚文元还对王洪文、陈阿大说，你们不要参与解决交通中断问题，让陈丕显自己去表演，让他出出丑。

康平路武斗事件，“工总司”血洗“赤卫队”，成为上海大规模武斗的开始，也为张春桥等人的夺取行动扫荡了障碍。接着，他们便开始了上海的夺权。

1 月 16 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同时，《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高度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

2 月 5 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夺权由此开始。

上海"一月风暴" 全面夺权的开始

1967年，"文化大革命"局势发生急遽变化，进入一个社会更加动荡、冲突更加激烈、范围更加扩大的新阶段。

新年伊始，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社论发出非同寻常的信号：十月革命解决了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新的伟大的榜样。社论回顾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说，有一两个或几个在中央做工作的负责人，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抛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社论还说，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的主要特点就是，广大工人、农民起来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社论提出：我国现代史上的文化革命运动，都是以学生运动开始，发展为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这是客观的规律。1967年，文化大革命将按照这个客观规律进一步展开。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社论还具体提出了1967年的政治任务。①

这篇社论在人们心中引起极大震动，社会上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

这篇社论是在向人们说明，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产业工人将代替以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充当"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展开总攻击"的主力军。

元旦社论发表后，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具体含义很快就有了答案，

那就是向被所谓资产阶级篡夺了的各级政权进行“夺权”。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直到1966年底，各地造反派主要的斗争手段是大批判，对党政机关主要是围攻、“炮打”和揪斗领导干部，还没有和机关干部联合起来从下而上夺权。红卫兵、工人、机关干部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这种的活动，从上海开始，以一月夺权为标志，蔓延全国。

上海的夺权是从《文汇报》、《解放日报》开始的，但机关夺权的准备工作却在张春桥等人的怂恿下早就开始了。

上海的机关造反派在张春桥等人的指使下在1966年10月以后建立起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通过数次电话、面谈形式，催促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副书记郭仁杰以及朱永嘉等早日起来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以争取主动。

12月12日晚，姚文元在给徐景贤电话中，催问市委写作班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如果他和张春桥回上海，写作班能不能做他们的工作班子。

13日至14日，市委写作班连续两天召开全体会议，最后决心按张春桥、姚文元几次电话精神，全体一起造反。并串连市委机关内部一批造反的人，搞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徐景贤派人联络了《支部生活》造反队、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市委党校革命造反联合战斗队，与市委写作班共同发起批斗市委大会。还串连“工总司”、“红革会”等造反组织，取得他们的支持。

16日，大会筹备会发出通知，“勒令”全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负责干部到会听取大会的批判发言，各机关均须派代表参加。

18日下午，以市委写作班为首的机关造反派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向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红革会”动员了8 000多名红卫兵压阵助威。“工总司”也派了1 500余名成员声援。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书记、市委常委以及部、局级领导干部均被“勒令”到场接受“批斗”。会场挂出“火烧陈丕显！揪住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注：陈丕显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杨西光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常溪萍任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大幅标语，这些口号由徐景贤与聂元梓共同商定，得到张春桥的赞赏。市委写作班在大会上宣读了集体《造反声明》，徐景贤作了《造反才知主席亲》的长篇发言，说上海市委

“始终贯彻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从上到下贯彻了一条黑线”。会后出版发行了十万份会刊《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攻击污蔑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成立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注：王承龙当时为《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等为联络站负责人。该联络站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后院起火”事件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机关各部门一下子出现了上百个造反组织。这股造反之风很快又波及到各局、区、县，一时间，打着各种旗号的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搜查所谓“黑材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势日益高涨。党政机关工作陷于瘫痪。

进入1967年1月，上海的夺权，首先是夺了市委《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1967年1月3日晚，文汇报社造反组织“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了文汇报社领导权，接管了报社。次日，《文汇报》以套红标题刊登了他们的夺权声明——《告读者书》，这是全市第一家宣告夺权的单位。5日晚，解放日报社也由造反派宣告夺权，开创了全国党报夺权的先例。

夺权后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并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发生了较大影响。这两个文件的问世经过是这样的：

在不断升级的造反浪潮中，全市出现了一股要钱要物、抢占住房、化公为私、任意挥霍国家财产的经济主义风，其始作俑者是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加上康平路事件的发生，使得上海的经济秩序极为混乱。上海港每天积压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仅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3日短短五天内，全市被抢占新工房有2.2万多平方米，私房被抢占30多万平方米。为此周恩来于1967年元旦凌晨亲自打电话给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贯彻毛泽东“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并特别强调与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的困境。

接到周恩来电话指示，陈丕显连夜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周恩来指示，商定了一些解决办法，并决定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会后，由两个红卫兵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的传单，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

书》(《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经修改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等11个群众组织同意签名,由陈丕显签发,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1月5日,夺权后的《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了这份传单。

1月4日上午,《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表的同一天,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组员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回上海。他们肯定报社夺权“大方向是对的”。从7日至9日的三天里,张、姚五次接见《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鼓动说:“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3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觉!”同月17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造反派亦宣布夺了权,当晚23时30分,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员对电台实行了军事管制。《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发布后,交通运输情况经各方面的努力稍有好转,但经济主义风仍刮得很厉害,至1月6日,全市银行各区办事处现金被抢提一空。

1月8日,红卫兵又发起召开了一次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并推选“红革会”和“机关造反联络站”代表起草,提出了反对经济主义风的九条措施。陈丕显等出席了这次会议。稿成后32个群众组织签字,于1月9日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布。

1月8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0日,毛泽东又对《紧急通告》予以肯定,让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市32个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张春桥等策划下,举行了“打倒市委”大会。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姚文元一回到上海,就频繁召集徐景贤、王承龙、王洪文等造反派头头,加紧夺权步伐,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张春桥还强调:“通过打倒陈、

曹大会，可以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

“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出面具体筹备了打倒市委大会事项。张、姚亲自过问将大会口号升级，定为“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把大会名称定为“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张春桥还亲自修改大会的重点发言稿。

1月6日上午10时至下午3时，32个全市性的造反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十余万人参加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中心会场“揪斗”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注：魏文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注：梁国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杨西光等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并把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数百人拉到台上“陪斗”。

会后，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的实际权力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手中。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参与了大会的策划，但在5日向中央汇报的简报上他们却说：“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6日的简报上则进一步说：“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造成群众组织自发起来打倒中共上海市委的假象。这次大会后，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所有工作瘫痪，全市的实际领导权落入张、姚之手。

在张春桥“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的指示下，1月8日，以“工总司”和“工总司”交通六局（铁路、海港、海运、长航、交通、邮电）联合指挥部为主，市委机关联络站、大专院校红卫兵等组织参加，共40余人，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夺取了上海交通运输大权。张春桥说这个火线指挥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人委”。他们还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来代替上海市公安局，用“造反派组织联络站”作为全市最高机构来代替市委。

同日，《文汇报》发表社论：《革命造反有理万岁》。社论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杀出了一批革命造反派。他们高高举起革命造反的大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那些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物，发起了急风暴雨式的总攻击。其势锐不可当，迅猛异常，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社论说，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许多所谓“越

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社论还说，如何对待“造反有理”的口号，如何对待革命造反派，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红旗》杂志第2期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并加了编者按。

最初，毛泽东对“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没有表态。不过，毛泽东很快就对上海的夺权加以首肯。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3]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32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

“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

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④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郑重地向上海造反派团体发出贺电，这是非同小可的举动。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把中央文革小组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在一起发电，这是第一次，自然也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

1 月 13 日，张春桥在全市造反组织座谈会上公开支持造反组织冲砸公安局，夺取公安局的领导权。说："上海公安局不仅已经瘫痪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成了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支持造反派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文保会"），行使公、检、法机关的职能。"文保会"由"工总司"等 15 个造反组织组成，王洪文任主任。公开宣称是"参加接待、调解工厂、企业、学校两派纠纷，负责全市性的集会，维持全市治安"。实际上成为"工总司"等造反组织镇压反对派的工具。3 月 1 日，上海市政法指挥部成立，"文保会"保留组织名义，停止一切活动，政法指挥部完全取代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专政机构。

从 1 月 11 日起，上海夺权进入高潮。三天内，市、区、县、局级单位有 49 个被夺权。有的是造反派上下、内外结合夺权，有的是本机关造反派夺权，也有外单位造反派前去夺权的。甚至银行、电视台也相继被夺权。根据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进驻银行、电视台、交通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⑤

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

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⑥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号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自下而上地夺权”。

由于有了最高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在不长的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迅速蔓延。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迅速吹向全国。继上海之后，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造反派”也相继起来夺权，建立所谓军队、干部和造反派群众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使全国陷入更大的动荡混乱中。这是文革中所谓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14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30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2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2月1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2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伙人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这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肯定和鼓励，《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对上海夺权的肯定和支持，使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注释：

①《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

②上海“工总司”等召开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

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所发《第三号通令》，1967年1月6日。

③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10日。

④《人民日报》，1967年1月12日。

⑤《人民日报》，1967年1月16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年1月16日。

“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976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1967年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先夺了《文汇报》、《解放日报》的权。就《文汇报》夺权，1月8日晚，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0日，毛泽东又对《紧急通告》予以肯定，让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市32个造反组织的贺电。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接着，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工总司”和以徐景贤为头头的“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做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

1月10日，江青给毛泽东报送了两篇新华社电讯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发出（紧急通告)》。前一篇通讯稿中，提出上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有四个重要标志：第一，广大的工人、农民起来造反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自己解放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第二，市级党政机关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他们打破了“内外有别”等种种框框，同工人、革命学生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革命造反派不仅队伍越来越壮大，而且斗争艺术也越来越趋于成

熟。第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全线崩溃，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庇护下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已开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泽东当天就把这两个电讯稿批给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小组：“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批语最后补充说：“关于反经济主义的文件，不要发了，上海这个就很好。”[①]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1 月 12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工总司”等 32 个造反派团体的贺电。贺电最后说：“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②]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所说的：“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评论员文章还写道：“上海工人阶级，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这一革命行动，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标志着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③]

同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

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但他对“接管”的内容作了一个重要限制：“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我们只管监督。”[④]也就是说，造反派可以夺的只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而不是业务工作的领导权，那些“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但是，这一点后来在各地大多并没有做到。

由于有了最高领导人的明确支持，在不长的时间内，各地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迅速蔓延。上海刮起的“一月夺权”风暴，迅速吹向全国。

1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再次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红卫兵、工人、机关干部造反派联合起来进行“夺权”这种的活动，从上海开始，以1月夺权为标志，迅速向全国各地蔓延。

继上海之后，接着，山西（1月14日）、青岛（1月22日）、贵州（1月25日）、黑龙江（1月31日）等地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文领导权，这些夺权行动同样得到中央的认可。

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等25个团体组成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1月14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30日，又刊登了“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1月22日宣布夺权的《第一号通告》。2月1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贵州省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发表了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2日，在刊登黑龙江造反派夺权消息同时，又发表《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

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这些连篇累牍的夺权通告和社论，表明毛泽东对这些地区夺权活动的支持，对全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夺权之风刮遍全国，动乱局面愈演愈烈。

这样，在很短时间里，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他是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故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以后，要实现革命后的稳定局面，对于当时严重混乱状况毛泽东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不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

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

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上述社论、指示中提出的许多要求、规定，几乎很少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地方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些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立刻又被那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

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军队安全的动乱，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从1967年1月19日在军委扩大的碰头会到2月11日和16日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他们相继激愤地发言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乱党乱军。但在毛泽东的反对下，这一正义行动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打成“二月逆流”，受到严

厉的指责、围攻。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的动乱局势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以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退路的名义，否定建国17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把大多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中央领导人及其以下各级领导人都诬指为走资派，要把他们打倒，要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推翻。这种混淆是非和混淆敌我的“全面夺权”，怎么谈得上正确地对待干部、要“革命干部的代表”站出来呢？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涨。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诬指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局面。

从1967年4月起，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实际上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开端，又制造了一个从多方面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高潮，这种大批判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混淆是非，混淆敌我，传播和助长“左”倾思潮，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原想以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结果却促进了大动乱，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长时间不能成立。

5月，一些地方发生武斗事件，6月到8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号称“揪刘火线”），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

在7月下旬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之后，报纸上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许多地方边疆发生抢劫银行、仓库、国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发生大批人员伤亡的武斗流血事件，特别是7月20日武汉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军队官兵对中央文革小组“左”倾错误的强烈不满。

7月22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公安部部长谢富治8月7日发表讲话，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同日，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8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长春、

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遭到更大的冲击。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涉外事件。局势的发展，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

面对这种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月底，他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0月，中央发出毛泽东在这年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记录。这个谈话记录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重申“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的情况，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和各省、市分期分批举办轮训干部的学习班。有一批干部从受审查中解脱出来。报刊上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某些过左的做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种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67年冬到1968年春，社会动乱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在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的情况下，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有所增长，不时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言论，上海、北京出现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多数是驻外大使和司局长）也贴出为陈毅正名的大字报。

这些动向，使林彪、江青等人深感恐慌。从1968年3月下旬以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与此同时，林彪与江青合伙又制造一桩诬陷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戍成区司令员）的“杨、余、傅”事件，罗织罪名撤销了他们在军内的所有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党委会，这使林彪一伙在军内控制了更大的权力。

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地方又连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劫，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等恶性事件。一些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

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以外，他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毛泽东在这时找聂元梓、蒯大富等几个造反派头头谈话，批评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要求他们停止武斗。

经过两次的实践，毛泽东逐渐发现，这些曾经被依靠的对象，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和许多个中学，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要复课闹革命，但是始终不能实现。毛泽东决定对学校和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解决派性对立、武斗和大联合的问题。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经过近两年几次反复的社会大动乱，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

注释：

①毛泽东对《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等两篇电讯稿的批语，手稿，1967 年 1 月 10 日。②《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2 日。

③《人民日报》，1967 年 1 月 16 日。

④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 年 1 月 16 日。

“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在“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和人民群众陷入严重内乱的形势下开始的。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全国处于“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状态。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和半瘫痪之中，公、检、法等机关失去作用。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堵塞。制止武斗，稳定局势，是当时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人民解放军的“三支两军”正是在这种天下大动荡、大混乱、大混战的形势下开始工作的。“支左”在1月份最先开始，其他四项工作在3月底以后也陆续展开。

“支左”起于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转送来的一件紧急请示报告，说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组织22日和23日要在合肥召开15万~20万人的大会，批斗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李葆华，要省军区派300~500名部队来警卫会场秩序，声称“如不派就是不支持文化大革命”。安徽省军区向南京军区请示。南京军区党委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转呈了安徽省军区的请示报告。毛泽东当天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①]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军委碰头会人员，要求军队“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面，像唱戏一样，要亮相”，“能够公开支持（左派）的，就公开支持；时机不成熟的，就半公开支持”。

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发”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规定：“（1）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2）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的夺权斗争，凡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要求军队去援助他们，军队都应该派出部队积极支持他们；（3）坚决镇压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组织，如果他

们动武，军队应该坚决回击；（4）军队不得做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防空洞；（5）要在全军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教育。”这是一个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的决定。毛泽东不久后说：“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②随后，《解放军报》于25日发表题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社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向全军各部队提出，“支左”并入“三支两军”整体工作。此后，以1月23日发布“支左”决议为起点，解放军“三支两军”便逐步在全国各地展开。

同年9月，毛泽东到外地视察期间曾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由于毛泽东提出要实行革命大联合，消除派性，全军和全国上下，立即朝此努力，“支左”也就转变为促进团结与联合的工作了。从此的“支左”变为事实上的“和稀泥”：不管是什么组织、什么派，都合到一起，成立“大联委”或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所以，事实上的“支左”只存在了八个多月。

在严重的派性斗争中，谁是“左派”是一个极难判断的问题。这就使军队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

在这前后，为了发挥军队在稳定局势中的作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继续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

1月20日起，北京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派军队干部训练师生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通知，派出4 100多名干部到北大、清华、北航、地质学院、矿业学院，对两万多名师生进行20天的军政训练。重点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件，“检查批判了对自己看成绩多，看缺点少；强调自由多，考虑纪律少；喜欢‘大干’，忽视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只看局部，不看整体等错误思想”。③

2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19日，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等院校和两所中学实行短期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批示：“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

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

23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援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7 日，周恩来因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自动向造反派“让权”，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广东以及有类似混乱情况的云南实行军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因江苏各派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管。

3 月 13 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这次会议是为了要求军队帮助地方搞好春耕生产而召开的。周恩来在讲话中宣布：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码头、铁路局、海港）、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业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事管制。他在报告中说：“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天津市），已经实行军管或等于实行军管的加上已经批准准备实行军事管制的有十个：陕西、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

“已经实行‘三结合’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五个：黑龙江、山西、贵州、上海、山东。”

“不论是要通过军事管制或者推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三结合’夺权斗争，都需要有一个筹备阶段。我考虑，要成立夺权筹备小组。按主席思想，毫无疑问，也要以解放军为主。总要有一个推动力量，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革命干部没有出来亮相，站不出来。”

“一个地区的军事管制（省、地、县三级），应当由当地最高军事机关和其他军事机关派人组成军事管制委员会，成为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负责执行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最高指示。”

这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思想作出的具体部署。

仅在 1967 年前 5 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 7 752 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 2 145 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 219 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 42%）、547 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 24%）、111 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 53%）、10 个铁路局（全国共 18 个铁路局）。

3 月 16 日和 20 日，毛泽东又先后批准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对需要实行管

制的厂矿的布告和聂荣臻提出的对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所，以及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实行军事接管的意见。

毛泽东原来以为“文化大革命”到这年2、3、4月可以看出个眉目来，后来又加上一个5月份，而且采取了军事管制等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措施，想把运动尽快引入他所预期的轨道。可是，各地派性武斗日趋严重，局势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当毛泽东看到各地因派性纷争而致使工业生产持续下降的情况后，焦虑地批道：“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⑤

1967年4月3日，为了加强和保证对解放军“三支两军”的组织领导，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在中央军委设立三个办公室，即支左工作办公室、支工支农办公室、军管工作办公室（军训工作不设办公室，由总参总政分管）。

随后，解放军大批人员便投入到“三支两军”中去，并在全军师以上机关设立了“三支两军”指挥部，正式列入军队编制。

局势实际上在继续恶化。随着解放军越来越深地介入到“文化大革命”中，自身也就越来越深地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他们的任务是要“支左”，但各地几乎都存在两派或几派自命为“革命左派”而又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难以正确判明应该支持的是哪一派。一旦支持了这一派，总是立刻引起另一派或几派的猛烈攻击。军队内部的意见也往往并不一致，有的部队支持这一派，有的部队却支持另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却又担心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会受到很大压制，着重强调要对军队做思想教育工作。

4月6日，他在林彪送审的《中央军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⑥《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这个《命令》共有十条，通常称为“军委十条”。它的调子和重点，同一月间的“军委八条”有明显区别：“八条”的重点在不得冲击军事机关，保持军队的稳定；“十条”的重点在对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组织概不追究。

5 月 10 日，毛泽东在刘伯承转报的一封反映济南地区军队遭受严重冲击情况的来信上批道："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情况"其实不是那样严重"。[⑦]四天后，他又就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的报告写了批示："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他特别强调："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⑧]这段话，很能反映出他自己当时的心态，很能反映出他面对如此混乱局势时的基本想法。27 日，他又在转发 54 军在重庆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⑨]显然，由于过于自信，毛泽东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总以为"其实不是那样严重"。这已严重地脱离实际。

"十条"下达后，局势不是走向缓和，而是更趋恶化。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面对两派的激烈对抗，必然会有支持和反对的问题，结果是对抗更加激烈。

6 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⑫]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

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7 月 13 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肖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⑬]

正式的"支左"是从支派开始的，搞的是支一派、压一派，亲一派、疏一派。因为当时党中央就是以"两个司令部"划线的，党中央强调的是群众组织分两派，必有一"革"、一"保"。所以，下边也自然以"革"与"保"分派。

1967 年 6 月 27 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正确对待群众》的社论，

指出："识别左派，要看大节"，即看他们"是不是坚决地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对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还是'保'，这是大节。"此后，各地群众组织为证明自己最为"革命"，开始更大规模地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而且各派矛盾加剧、斗争不断升级。

从8月份开始，上海、南京、郑州、长春、沈阳、重庆和长沙等地相继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许多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银行、仓库、车船及档案机要文件被抢，铁路交通被严重破坏等严重的违法事件，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混战和内乱中。

群众组织争相论证自己是革命派，对方是"保守派"和"保皇派"。这使部队很为难，因为这就要事先识别出谁是"左派"、谁是"保守派"，以便决定支谁和压谁。识别的主要标准就是看谁"紧紧把握了斗争的大方向"——批斗"走资派"。所以解放军一进点．群众织织就争相表现自己大方向的正确，所谓"走资派"也就在群众组织的摆弄下，频频挨批受苦了。所以，八个月的"支左"制造了很多矛盾，挑起了派争和派仗，消极后果也十分明显。

"支左"实践活动的后一阶段，是从1967年9月开始的。"支左"由前一阶段的支派转变为各派都支持，力主中止派争，消除派性，搞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这一转化，等于是走向"支群"。所以，事实上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夕，"支左"的工作以及除"军管"以外的"三支两军"工作已基本结束。继续在地方发挥影响的只是"三结合"的军方代表，已是少数同志了。

"支农"、"支工"其主要使命是去地方贯彻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有关政策规定，其中尤其强调的是"促生产"。支工、支农宣传队开赴工厂和农村之后，要求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余时间闹革命，同外流、旷工、停产、擅离职守、敷衍了事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坚决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谁不坚持生产，就要受到破坏和违背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指示的强大舆论的压力，甚至会被说成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工农群众坚持了生产，工业生产的损失减少了，并获得了农业生产的连续增收。在支工、支农的实践中，广大指战员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为把生产搞上去，在人力、物力、车辆等方面尽了很大努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其中，解放军

在“支农”中投入的力量最多、贡献最大。

“支农”和“支工”中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在“支农”中，有些地区的部队同志不顾客观条件，片面地强调“农业学大寨”，推行了某些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经验和做法，如修大寨田、“坡改梯”、评“公”字分、学习小靳庄等，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农民的担心和反感，有的则劳民伤财，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在“支工”中，由于军队同志大多数不懂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难免发生生产管理上的失误。

在1967年3月~1972年8月的五年多时间中，先后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280多万名指战员，分赴中国各条战线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任务之巨，是解放军建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广大指战员，在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下，做了大量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三支两军”缓和了紧张局面，维护了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些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左”的指导思想支配下“三支两军”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它助长了军队中派性，破坏了军队内部的团结；伤害了不少干部和民众，损害了军队在民众中的形象，降低了军队的威信，也把社会上的派性、无政府主义和一些风气带到部队。“三支两军”工作是在局势极端混乱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实际上无法控制住整个动荡的局面；参加这项工作的指战员思想上又缺乏准备，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难以弄清究竟谁应该是“支左”的对象，甚至在军队内部也出现严重分歧；加上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插手、干扰、破坏，因而在“三支两军”工作中也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

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注释：

①毛泽东对南京军区党委请示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年1月21日。

②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③北京卫戍区《北京五所高等院校短期军政训练试点的总结报告》，

1967 年 2 月 18 日。

④周恩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7 年 3 月 13 日。

⑤毛泽东对沈阳军区一份报告的批语，手稿，1967 年 3 月 3 日。

⑥毛泽东对林彪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的批语，手稿，1967 年 4 月 6 日。

⑦毛泽东对反映济南地区问题的来信的批语，手稿，1967 年 5 月 10 日。

⑧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转发广东省军管会、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 年 5 月 14 日。

⑨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转发第五十四军对反对派进行工作情况报告起草的批语，手稿，1967 年 5 月 27 日。

⑩毛泽东对《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的批语，手稿，1967 年 5 月。

⑪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5 月。

⑫⑬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10 月版，第 39 页。

《工业十条》的出台

《工业十条》是“文化大革命”在文教系统全面展开并波及到了公交企业后出台的，它围绕着“抓革命、促生产”来进行讨论，其核心是探讨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评估公交企业的现状。

“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大多数工矿交通企业，甚至农村的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干扰，有的企业的生产陷于完全停顿状态。为了维护公交企业的正常秩序，1966年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7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此后开始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营业生产开始受到冲击。1966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同意，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提出革命和生产要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要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他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这个社论的主要精神就是，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他两大革命，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

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

产的通知》（即《工厂六条》）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即《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学生、红卫兵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

但不久，9月15日以后，毛泽东却肯定了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的造反。突破了《通知》要求。随后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10月1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扣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全文刊登了《红旗》杂志第13期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打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的旗号。首当其冲遭受灭顶之灾的，是各省市委、各部局党组的“第一”书记们。就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口上，中共中央又召开了“十月工作会议”。

在严重的形势下，周恩来焦虑万分，谷牧、余秋里、刘西尧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曾多次讲过：“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余秋里后来也回忆说，周恩来一向对他们讲，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经济建设一定要尽可能设法进行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反复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10月30日，就工人离厂外出串连问题，中共中央答复安徽省委并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各地按照《十六条》中第14条和中共中央9月14日“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的精神，对工人群众进行正面教育，“坚持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去串连”。

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通知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适当控制人数。”

《通知》还规定：“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但是，当时已经是令行不止的形势。

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社论重申：“城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当积极地、分期分批地进行”，“在城

乡生产单位搞文化革命，同学校搞文化革命，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却绝对不能停止生产。社论指出，加强领导是极为重要的，“一定要学会领导，加强领导。一刻也不能中断对生产的领导。凡是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都要按照中央的规定，在统一领导下，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领导文化革命，一个班子领导生产，既分工，又合作，不要各自为政。”

不过，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朝着保护工农业的生产秩序不利的方向发展。

谷牧回忆说，11 月 9 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蔑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

1966 年 11 月张春桥去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采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法，承认了“工总司”的组建及其卧轨拦车的恶性事件是“革命行动”。事后竟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张春桥这样做就相当于在事实上完全推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自 7 月以来连续发出的关于工交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规定，从而为合法地搞乱工交企业开了先例。

与此同时，哈尔滨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全市性跨行业的工人群众的造反组织。究竟在工交企业还要不要坚持原来的部署，执行分期分批和“业余闹革命”等规定，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在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和地方主管经济工作的一批领导人，以周恩来、陶铸、谷牧、余秋里为代表，与陈伯达、江青等人进行了一次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斗争。工业十条就是在这一形势下产生的。

11 月中旬，周恩来征得毛泽东的同意，让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力求把 1967 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让谷牧组织几个人研究在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尽可能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

11 月 15 日，余秋里正式写了一个报告给分管计划工作的李富春，提出拟在全国计划会议开始的时候，先用五天时间座谈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天，李富春批示：“拟予同意。送主

席、林总、总理、陶铸、任重同志。”李富春还指出，“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分别座谈，由谷牧、余秋里分别负责。

11月16日，工交企业座谈会开始，参加会议的有五部（冶金、化工、水电、铁道、机械）七市（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以及各大区有关负责人。

会议座谈讨论是围绕“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展开的。由于意见分歧，争论激烈，座谈会原定的五天会期被大大超过，实际开了近20天。

《十二条（草案）》是陈伯达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起草的。11月13日，陈伯达将《十二条（草案）》交给谷牧，并要求他在一周之内提出意见，将《十二条（草案）》退给他。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召开碰头会时，同意把“中央文革小组”的文稿拿到11月17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

但是，11月17日，在该稿尚未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之前，陈伯达、王力等人抢先召集了职工代表会，宣读了该稿，煽动群众闹事。王力在会上说，工人阶级“负有特大责任”。工矿企业的工人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好得很”，是“不可阻挡的”。

然而，在工交座谈会上，对陈伯达稿子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问题，都遭到了反对。与会者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大串连势必影响生产。“文化大革命”如果全面铺开，时间集中，问题集中，生产肯定要受到影响，影响的程度很难预料。目前生产已有停顿趋势，科研、尖端项目、协作项目已基本上停止，基本建设也开始受到影响。此时的企业生产主要在靠吃老本，库存材料已经很少，问题越来越多，马钢（即马鞍山钢铁厂）、武钢（即武汉钢铁厂）都有停产危险。经过讨论，会议认为，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只能分批分期地进行。

与会者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并一致认为建国十几年的工交系统的各级党委还是好的。东北地区的同志说，工厂里无论如何要由党委领导，下边再分两摊，非受影响不可。大家指出，《十二条》只提了统一领导，连党的领导都没有提，许多人对此不理解。

在讨论时，与会者认为，工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建立联合组织。各大区负责人表示，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们担心各种组织中会出

现两派对立的现象。东北地区的与会人员说，如果各种组织都建立起来，麻烦就更多了，不是打架就是停产。

他们要求，对于建立全市性工人联合造反组织问题不要松口。哈尔滨和上海的同志都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的工人组织。

在讨论时，与会者不同意把学校搞“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搬进工厂。他们担心学生进工厂串连会搞包办代替，搞乱工厂。

座谈会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充满着不满的情绪，有的部长非常义愤地说，问题是学生到工厂去，是向工人学习，还是“领导工人搞革命”。这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核心。他们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不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

关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是各大区和各部门领导人极为关注的问题。与会者讨论时气愤地说，如果允许生产受影响，哪怕是允许有个“马鞍形”，就可以放手去“闹革命”。

时任水电部副部长的刘澜波说，如果既要“抓革命”，又要“促生产”，那么，方针就得好好研究了。“现在弄得人心情不舒畅”，人家积极搞生产，说人家是“保皇”。

事后，周恩来在谈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时说，会议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十二条》基本上是全盘否定，也反映出不满的情绪。周恩来说，他们这种思想也不是孤立的，反映了客观上的思想动态。

随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主持座谈会谷牧等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增加了三条实质性的内容。

这三条内容包括：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

修改后的稿子，原来《十二条》变成了《十五条》，第 15 条就是一句话：“此件精神也适用于财贸系统。”这一条是按照主管财贸口工作的姚依林的意见加上的。姚依林一再对谷牧说：“你的列车上一定要多挂一个车皮，把财贸捎上。”

11 月 21 日上午，刚定下了修改稿的架子。下午 5 时，陈伯达打电话要谷牧和余秋里立即去他那儿。一见面，陈伯达就发火说自己是“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责怪谷牧和余秋里等改了他搞的《十二条》。谷牧说：

“情况没有这样严重，我们不过是结合工交系统实际，加了那么几条，使文件更完善一些。”

谷牧、余秋里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决定同陶铸再听一次会议汇报。”

11 月 22 日中午，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谷牧等汇报了几天来座谈会的情况和陈伯达的态度。周恩来、李富春在 11 月 22 日碰头会后，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对此，毛泽东指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 12 月份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我们提出的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的意见。

毛泽东的表态虽然对于陈伯达的《十二条》和谷牧的《十五条》各有取舍，但基本精神是坚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又要保证生产。

与会者认为既然允许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群众组织，允许工人业余时间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串连，包括允许学生在工人业余时间到工厂串连，那么其他诸如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业余闹革命”、保证产品质量、完成生产定额等就难以保证。

12 月 4 日至 6 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简称《工业十条》）。这个《规定》反映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相左观点。林彪、康生、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激烈批评 15 条稿的《汇报提纲》，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张春桥则指着我说：“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 20 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 50 天的问题，而是 10 年、20 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说工交座谈会是受了陶铸同志的影响。最后，会议一致通

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十条》。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指出："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抓革命，促生产"从此成了"文革"中的一个主要口号，后来还发展成"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等口号。

《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十条：

一、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带动生产发展。

二、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让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三、八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

四、坚持八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定额。

五、保证产品的质量，力求高质量。

六、由工人群众认真讨论，健全或者改造领导生产的班子。

七、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必要的时候，工人群众可派少数代表到上级机关反映，特别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派少数代表来京反映，不要大批离开厂矿。

八、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许厂矿领导因为群众提出批评，揭露事实，而实行打击报复，不准因此克扣工资，不许开除。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工人，必须平反。

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群众之间、工人组织之间，彼此有意见，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

十、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进行革命串连。学校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

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文化大革命"名副其实地在全国正式展开。

注释：

①选自《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第322～329页。

反对江青一伙的“二月抗争”

正当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一股正义的力量正在聚集酝酿一场正义的抗争。

1967 年一、二月间，老一代革命家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为制止动乱局面的蔓延，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坚决斗争。这场斗争开始于一月的军委碰头会，在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后，达到了高潮，由此便有了后来的政治局碰头会大闹怀仁堂。但随后因为毛泽东不能容忍老帅们彻底否定中央文革小组，否定“文化大革命”，使这场正义的“二月抗争”受阻。

1967 年 1 月，随着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党内一些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已从最初的很不理解发展到强烈不满。这种不满突出地表现在三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是不是统统都要打倒，军队还要不要保持稳定。

斗争从 1967 年 1 月 19 日在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开始，在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所谓大鸣大放等“四大”。为这个问题，他们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展开激烈的争论。

此后，军委为稳定军队采取了一些列措施。在军队的“八条命令”颁布后，叶剑英先后处理了新疆、广州、成都、青海、南京、内蒙、甘肃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与“造反派”的冲突问题。1967 年 1 月 26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生流血事件。从 1 月 17 日开始，石河子市先后有七个单位的造反派冲击了武装部门，有八个单位的造反团接管了武装部门管辖的通讯总机。25 日至 26 日，毛纺厂等八个单位的造反派与汽车二团、独立团发生武装冲突。

为此，1967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对石河子的指示：要求新疆自治区党委、人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

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如有群众夺取部队武器，首先应该劝阻；不听，也应向天放枪以示警告。对武装反革命分子和过境窜人的武装反革命分子，也要力求逮捕，只有敌人首先开枪时，才能自卫还击。

二、新疆军区和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值班部队，担负着保卫祖国边疆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繁重任务。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目前在石河子、乌鲁木齐等地区已经发生的乱抓人、打人的行为，应该立即停止和劝阻，已经抓了的群众，必须立即释放。

1967 年 2 月 6 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叶剑英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

针对造反派冲击广州军区，1967 年 2 月 8 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对各造反派发布了命令，指出：一、冲击广州军区领导机关和无命令自由抓人打人，是直接违犯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的，是一种错误行为。广州军区坚决维护军委命令，是完全正确的。希望你们分清是非，立即离开军区机关营区。地方各革命组织和革命师生同志们：昨晚所发生的事情，纯属于军队内部的事情，请你们不要介入。请你们自觉捍卫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项命令，立即离开军队营区。二、军队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同志们：今天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已经下了命令，要你们坚决执行毛主席批发的军委八条命令，你们没有执行，现再命令你们立即撤退。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向北京打电话或派代表来北京解决。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

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外出串连人员限时返回本单位的通知。中央军委 1 月 28 日命令发布后，军队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外出串连的同志，热烈响应军委号召，大部分已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去进行斗批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但是，仍有一些同志，目前还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为切实贯彻执行军委 1 月 28 日命令，军委决定：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机关、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同志一律于二月二十日前返回本地区、本单位，不得再在外地逗留。革命群众组织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也一律撤销。各单位的接

待站，从二月二十一日起一律停止接待。凡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差旅费。凡违反上述规定者，一律按一月二十八日命令给以纪律处分。

同日，中央军委还规定：一、海军，空军，飞行航校，各军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二、海军舰队，机关和各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暂不搞四大，什么时间，另行通知。望各单位遵照执行。

1967 年 2 月 11 日，叶剑英又和聂荣臻研究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叶剑英在军委碰头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又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条规定的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绝对不准任何人，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取消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对干部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军委扩大会的争论以及此后采取的稳定军队和社会冲突的措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些做法显然与中央文革的做法相矛盾，由此双方呈现矛盾的对立局面。

2 月毛泽东对文革小组进行了批评，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小组提出严厉批评。为老干部的进一步抗争创造了契机，促成了军队和老干部不满的爆发，引出了"二月抗争"。

毛泽东的批评涉及打倒陶铸、"独立王国"和打倒一切三个问题。对此，毛泽东连续两次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上，严厉批评江青、陈伯达。1967 年 2 月 6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常委外，叶剑英、江青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说："对干部要豁达一点。犯了错误就打倒，就要打到自己头上来了。你们就不犯错误？可是一下子就捅出去，不同我打招呼，也没有同林彪同志、总理打招呼，上脱离，下没有同干部、群众商量。"

2 月 9 日，叶剑英、陈毅、徐向前三人写信给毛泽东要求接见，接见中叶剑英说：处理党内的一些问题，总要经过一些合法的程序才行。如打倒陶铸这样的问题。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太大，他们一两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许多老同志对此有反映。

毛泽东说："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商量。他们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会

议上来决定。叶剑英又说，“军队应该稳定，我们之所以能坐下来安心搞内部问题，不全凭解放军镇守边关吗?”

毛泽东说：“这个观点我赞成。军队要稳住，一定不能乱。革命造反派夺权，一是要有领导干部，二是要有人民解放军参加。没有这两条，他们夺不了权，即使夺了，也巩固不住。”

随后，1967 年 2 月 10 日，毛泽东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毛泽东再次批评陈伯达、江青。

毛泽东说：“今天专门谈谈中央文革小组的事。前几天我说过，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书记处，你陈伯达就成了总书记了。你的官越做越大了，说话也是金口玉言，怎么能说是小小老百姓呢？难道还嫌你的官职小吗?”

“我看你陈伯达就有这种表现！如果说具体些，这两个多月来的行为就足够了。上个月群众大会上，你一个常委打倒了另一个常委，还说是小小老百姓，我看那都是唬人的。”

江青说：“事情要一分为二，许多事情比如打倒陶铸的事，并不能都推到陈伯达身上。”

毛泽东说：“是不能光怨伯达，还有你！你这个江青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里有谁？我看只有你自己！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俩干的。我看了一月四日你们接见中宣部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记录，别人都没说话，就是陈伯达讲话，还有你的插话。你们一点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党的领导呢？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重大事情从不向我报告。还是对我搞封锁。只有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你们几位就不是这样了。总想对我瞒着什么。这种风气要改变，改变不了就要出修正主义。这个问题我已讲过多次，就是没有做起来。我看中央文革小组要开会，好好批评一下陈伯达和江青。王力，你通知春桥、文元，让他们回北京专门开这个会。

李富春说：“主席今天讲得很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的话。”叶剑英说：“不是不便说，而是不敢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的屁股，谁也摸不得。稍微给他们提点意见就要砸烂狗头，就要千刀万剐，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盖来。像这样，谁还敢讲话?”

毛泽东说：“偏要讲，你们就来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嘛。怕什么，还能不给饭吃？共产党是不兴饿人的。只要给饭吃，照样要革命。毛

泽东最后要求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他说，我看，在我这里召开的会议范围要扩大，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要参加，中央文革的那几个秀才如关锋、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也要参加。”

毛泽东 2 月 10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使一些知情的老同志深受鼓舞，成为“三老四帅”、“二月抗争”的重要背景。

这件事，在党内引起了共鸣，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等感到了一股正义的气氛。他们早已经对文革中出现的打倒老干部、群众斗群众、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强烈不满。

1967 年 2 月 11 日下午，在中央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拍着桌子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徐向前、聂荣臻也相继发言。

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 能不要军队吗?”

当天晚上，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说的（关于上海公社的问题）对。”

为此，12 日，毛泽东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他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他严厉批评了无政府主义倾向，指出“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对于干部问题，他指出“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

对于上海夺权后使用人民公社，否定党的领导倾向给予制止。当时上海“一月夺权”后，在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下，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文汇报》发表了《伟大的历史性的革命创举——欢呼上海人民公社诞生》的社论。毛泽东批评道：“上海公社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

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①]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4 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称病没有参加。会上，集中批评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发言为江青开脱，说毛泽东的批评，陈伯达问题的性质同江青问题的性质不一样，陈伯达是路线问题；江青眼高手低，是作风问题。企图为江青开脱。中央文革小组的做法使老干部很不满意，一场更加激烈的碰撞在酝酿着。

2 月 1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这次会原来是准备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的。会议开始后，谭震林首先对周恩来说：“研究经济问题不能忽视管生产的干部。现在许多业务干部都打倒了，我们还怎么抓生产？”谭震林接着责问张春桥：“比如上海的陈丕显同志，他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我请春桥同志回去保一下丕显同志，把他解放出来。”张春桥说：“群众不答应呵！这些事都要和群众商量啊，我们都得尊重群众意见嘛，他来不来北京，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张春桥说：“依靠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谭震林说：“你所谓的群众，就是蒯大富之流，蒯大富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你们的打手吗！他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说着他气愤地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

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他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②]

陈毅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我看不仅这次是错误的，而且延安整风也是错误的。”张春桥说：“这是翻历史的案。陈毅同志，你要对这话负责。”

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

保障？还怎么做工作？”余秋里说：“许多干部都揪出来斗，这样残酷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怎么行？下次再揪，我就不去，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去吧！”谢富治不断插话说：“中央文革从来没有说过要整全体老干部，对在座的老同志他们都是要保的嘛。”李先念说：“你不要和稀泥好不好。现在可以说是全国范围内都在搞大逼供信了。不但老干部挨整，连他们的子女也挨整。把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打成反革命就是证明。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会是反革命吗？”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不能因为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说：“考虑问题不要从个人利益出发，要从全局出发。”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全体老干部哭，为我们这个党哭！”李先念说：“迫害老干部是什么全局？毛主席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我看有些人要打倒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陈毅说：“他们不把老干部斩尽杀绝是不死心的！”叶剑英、徐向前说：“连国民党没有达到的目的，他们达到了！”

李先念说：“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号召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全国就乱了。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倒了。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周恩来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你看了吗？”康生说：“我没看。”周恩来说：“起草这么重大的社论，为什么常委没有研究？为什么我也不清楚，你们谁起草的？”陈伯达说：“我不清楚。”周恩来说：“今后写这种文章要事先给我们看一看，征求一下意见。”叶剑英说：“我搞了这么多年的革命，从来没见过什么大串连。大串连把正常的革命和生产都搞乱了。这种干法本身就有毛病，我根本不赞成。”

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写一份《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记录》材料。江青说：“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是一场新的大的路线斗争”。当即安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向毛泽东汇报。

据王力回忆说：“我注意到汇报前面其他情况时，主席光笑，当讲到陈老总发言的时候，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的，听到这

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以后讲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说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没送他看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常委审查！'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③]

第二天，谭震林又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④]林彪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并附了一封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了"已阅"。

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会议，在会上发了大脾气，讲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毛泽东认为，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他说，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做了大量的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

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有看见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它？

他又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中央文革改组，让谭震林当组长，陈毅、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请美国、苏联一起来。你们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我提议这件事要认真地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由周恩来主持政治局

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得好。这样，缓和了一下空气。毛泽东的气也慢慢消下去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2月25日~3月18日，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

会议期间，康生说：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同志大闹怀仁堂，实际上代表着党内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社会上不甘心灭亡的牛鬼蛇神的利益。是一股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你们是疯狂反对文化大革命，矛头是指向毛主席。毛主席发怒了，这是对资产阶级之怒，是对资产阶级的义愤；你们反对文化大革命，进而又否定二十五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否定解放战争的胜利——现在要翻这个案，矛头指向谁，不十分清楚吗？你们污蔑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心目中还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要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反毛主席吗？那绝对做不到，我要和你们奉陪到底！他断言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个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江青说：说我是武则天，武则天怎的，她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学她。武则天使唐朝出现太平盛世的政治局面这有什么不好？你陈老总，仗着自己资格老，地位高，功劳大，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那是痴心妄想。文化大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谁想反对它，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猛击你一掌，你再不悬崖勒马，顽固不化，那只能是死路一条。你们实行打击一大片干部的路线，甚至不惜把这些嫁祸于中央文革，挑动军队和中央文革对立，制造混乱，瘫痪国家政府机关，你们安的什么心！你们借口保护老干部，实际是死保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你们借口保护高干子弟，实质上否定红卫兵，为联动翻案。你陈老总还想否定毛主席领导的延安整风！

谢富治说：怀仁堂的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在京西宾馆会议上，你们就跳出来，反对江青同志，阴谋夺军权。这次，你们又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行动。那次只是军队几个，这次你们阵容扩大了，又把几位副总理也联合上了。你们的用心很狠毒，是想搞垮中央文革，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夭折。讲过的话可以不认账，这说明了他们心中有鬼嘛。你谭震林口口声声说你没反文化大革命，但在农林口，你亲自扶植保守势力，搞假联合，制造了一·一七假夺权、真复辟的反革命事件。然后疯狂镇压造反

派，大搞反攻倒算。这不正说明你们心中有鬼吗？

陈伯达说：同志们，有一个重要问题，应该引起注意，就是他们反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因为社论提出了路线斗争，提出了要打倒走资派，他们心虚害怕了。不是有人说不晓得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现在我再一次告诉你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镇压群众，就是压制革命派起来向资产阶级造反。

谢富治说：这次怀仁堂事件，是军委和国务院的两股势力的总合流，这两股势力中，还有挂帅人物。

此后，江青等借毛泽东的批示，猛烈攻击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在全国掀起反击"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浪潮。正义的抗争被说成"二月逆流"。这以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实际上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过了一段时间，王力、关锋借政治局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的生活会，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以便进一步打倒更多的人。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⑥]

江青等人的动作，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4月底，毛泽东同意让受到批判的几位老帅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多次遭受批判的朱德、陈云等在"五一"节检阅游行队伍时登上天安门，使他们的处境有所好转。

注释：

①毛泽东同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记录，1967年2月12日。

②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1967年2月16日。

③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8月12日。

④谭震林给林彪的信，原件，1967年2月17日。

⑤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第1332号上的批语，手稿，1967年2月28日。

⑥江青传达毛泽东对《红旗》杂志社论稿《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意见的记录稿，1967年4月15日。

所谓“揪军内一小撮”

“揪军内一小撮”是林彪、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借以打倒军队内的反对力量、正义力量，培植亲信争夺军队领导权的重要行动。

“文革”开始时，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虽然对“文革”运动不理解、怀疑，但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怀着良好的愿望支持了这场运动。可是，到了1966年10月，随着运动的发展，颁布了《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由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辩论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允许进行串连。《紧急指示》发布后，军队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院校相继大乱，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一切规章、制度被视为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院校师生纷纷外出串连，参与造反夺权活动。总部、军区机关不断遭受冲击，军队负责干部被揪斗，军队战备训练受到影响，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

老帅们对此深为担忧，并为稳定军队和国家形势作了努力和抗争。为了避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所有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11月13日和29日，总政治部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十万人大会，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四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文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老帅们的讲话，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这是老帅们对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的首次努力。大会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反响，给狂热的军事院校青年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退出“造反”行列。江青等人对两次大会极为反感，认为违背了《十六条》、《五一六通知》和《紧急指示》，是在抵抗“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的反对派。

他们极力煽动批斗陈毅、叶剑英等，陈、叶遭到“炮轰”，并被迫“检讨”。此时，抵制林彪、江青一伙倒行逆施的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已经被视为是“军内一小撮”代表了。

跨入1967年，全国更加混乱，对军队的冲击更加厉害。1月初，在中央文革的阴谋活动下，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刘志坚被打倒。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这个报告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全军蔓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穿军装、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反军乱军浪潮。在此前后，一些军队的领导干部像廖汉生、王辉球、成钧和常乾坤也被打倒了。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提出以后，由于正义力量的抵制，发生了制止反军乱军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军委八条命令”和“二月逆流”。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两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在会议上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进行突然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肖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其目的是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此前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或被揪斗。对此，老帅们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叶帅、聂帅等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看到总政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被揪斗，机关陷于瘫痪状态，为军队的稳定十分担心。他多次叫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林也不肯见。在这种情况下，1月24日晚7时，徐帅直接驱车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军委一些老同志的要求，建议军委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革”的问题要搞几条规定。并且在第二天

又给林彪写了亲笔信，同时叶剑英等也找林彪反映意见。在老帅们的坚持下，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并形成了意见稿，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 28 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命令》规定：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所有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三、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地区，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不得索取和抢劫军队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七、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江青一伙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使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接连不断发生。

鉴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煽动和支持造反派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搞乱了军队，1967 年 2 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中央文革小组就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 2 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斥责张春桥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当面指出：“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

谭震林气愤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次会议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其他一些会议上，老革命家们也对“文革”的做法公开提出了批评。因为这场斗争集中在 2 月，因而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1967 年 2 月抗争被压下去后，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高涨，肩负着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被打倒、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至此，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造反派夺权行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活动也越加猖狂。

3 月以后，林彪多次提出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人”揪出来“烧掉”。3 月 21 日，周恩来根据3 月 19 日毛主席关于“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的批示精神，要谷牧立即研究拟出一个对铁、交、邮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在政治局碰头会上讨论时，中央文革小组一伙挑剔说“对军管后军管会如何执行毛主席路线、如何坚决支持左派闹革命”写得不够。林彪则提出，军管如搞得不好，“军队也会执行一条拿枪的刘邓路线”。

4 月 6 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布有关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十条”，否定了军委的“八条命令”、“七项规定”。并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权。林彪等人诬陷贺龙，企图搞“兵变”，将贺龙打倒。诽谤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企图把朱德搞臭。4 月中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罪行，逼迫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作“检讨”。然后，炮制“五一三事件”，5 月 13 日，军队文工团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在京举行文艺演出时，他们违背周恩来总理关于军队文工团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造成两派发生武斗，加深了军队的派性斗争。借此打倒肖华，砸烂“总政阎王殿”，撵走“阎王”，赶跑“小鬼”。

与此同时，重新挑起“青海事件”背后两派的矛盾，追查“罪魁祸首”赵永夫的“黑后台”叶剑英。随后在武汉制造“七二〇反革命事件”，7 月 19 日下午，武汉军区在军区礼堂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武汉军区领导为了尽快稳定局势，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请谢富治和王力出面做工作。谢富治、王力等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

王力还危言耸听地说，武汉的主要矛盾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7 月 20 日，武汉支左军队人员和支左军队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说理辩论，惊动了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把群众的这一行动说成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的兵变，是“反革命事件”。他们利用这次事件，再一次掀起反军乱军浪潮，揪斗陈再道，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带枪的刘、邓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等反动口号。全国到处发生“揪陈再道式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在林彪、江青、谢富治、王力等人的支持鼓动下，全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白热化了。全国到处都在“揪军内一小撮”，冲击部队领导机关，抢夺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

在这种形势下，红卫兵再度表现出盲动的趋向。北京著名的红卫兵组织在自己的小报上登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等文章，宣称“夺权”斗争进入到夺枪杆子的第三阶段。北京“红代会”头子蒯大富等人提出了“第三次大串连”、“武装夺取政权”、“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等口号。

针对全国范围的武斗局势和混乱状态，9 月 1 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以至抢夺援越物资的现象，周恩来作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并且指出，“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口号。9 月 5 日，毛泽东在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时，宣布解放军在执行命令时有权自卫反击。

在全国一片“揪军内一小撮”的错误口号下，林彪、江青集团开始了“砸烂总政阎王殿”的夺权行动。7 月 25 日，他们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打倒肖华，搞垮了总政，使总政机关 40 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总政机关及直属单位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林彪还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导演了一场军队“管制”军队最高政治机关的闹剧。

林彪、江青等人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机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夺取这些领导机关大权，凡是不符合其心愿的、不听从他们的指挥的，一律打倒夺权。

砸烂了总政打倒了肖华，张春桥取而代之。之后，林彪一伙矛头直指总参谋部等要害机关。他们采用捏造罪名，突然袭击的手段，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

1968 年 3 月 24 日，林彪在北京地区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并借此排斥打击一批老干部，篡夺军权。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组成由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参加的军委办事组，以取代中央军委常委。至此林彪集团控制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

在“文革”期间，他们通过“揪军内一小撮”罗织罪名制造了大批冤

案，残酷迫害军队干部。

由于军事机关受到造反派的严重冲击，大批军队领导干部被打倒或靠边站，致使许多军事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许多战备设施遭到破坏；正常的军事训练基本停止，部队战斗力水平下降；院校由125所减至43所，大部分军队院校被撤销；军事科研工作也处于停滞状态；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止，部队作风、纪律、官兵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机构臃肿，兵员膨胀，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办公室。军队建设遭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破坏。

武汉的“七二〇”事件

1967 年 7 月 20 日，武汉一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质问和揪斗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等支一派和压一派的做法，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游行活动，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东湖宾馆，揪斗王力的事件就发生在身边。

在“七二〇”事件中，武汉“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冲击东湖宾馆，被认为是冲击毛泽东住地、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安全。这一事件被江青、林彪说成是陈再道发动暴乱，后被中央文革称为“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七二〇”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借这一事件大肆煽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江青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国各地武斗急剧升级，大规模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武斗遍及全国城市乡村。

所谓的“七二〇”反革命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谓左派和保守派难分胜负，全国的形势日益混乱恶化，为了解决对立与纠纷，1967 年初毛泽东决定派出军队支左。

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无法判明各派的对错，加之支左的军队中存在不同意见，造反派的对立愈发严重。当时，各地的派性武斗由于有军队的介入更加升级，尤其是武汉等地最为严重。

早在 1966 年底开始，武汉的造反派内部围绕揪斗还是保护王任重等省委干部，出现了两派，一派是革当权派省委命的“革命职工联合会”等组织，后来发展为百万雄师；一派是保省委王任重的“工人总部”等造反组织。由于来自北京省委不同势力的作用，使原本就尖锐对立的两派从 1967 年 1 月开始激烈对立，开始出现了武力对抗。5 日，“工人总部”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 3 000 余人，“联合会”也预谋用暴力抗争。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1967 年 1 月 9 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1967 年

1 月 26 日晚，中共湖北省委被造反派宣布夺权。这次夺权虽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但湖北省委事实上已分崩离析。

1967 年 2 月 8 日，武汉《工人总部》、《九一三战斗兵团》、《二司》等 12 个革命造反派组织在长江日报上联合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目前形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1967 年 2 月 18 日，武汉军区发表《严正声明》宣布“《二八声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牛鬼蛇神炮制的反革命宣言书”。把“拥护或反对《二八声明》看做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把群众分为“香花派”（支持《二八声明》的人）和“毒草派”（反对《二八声明》的人），并公开发出指示：“香花派靠边站！”在工矿、企业、学校剥夺“香花派”群众的听报告、被选举等政治权利。对“香花派”群众大搞人人请罪，个个过关。在汉口井冈山大楼搞了所谓“工人总部罪行展览”，在武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搞了所谓“二司地下黑司令部展览”。

在这样的形势下，2 月 28 日，陆军第 29 师师部率 4 000 余人，奉命进驻武汉地区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师指挥机关由孝感花园移驻武昌军区大院东侧。

随着军队支左，军队支持百万雄师。但中央文革与军队支持的组织并不一致。

3 月 17 日，武汉军区及武汉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宣布解散武汉最早、最大的工人造反组织工人总部，把工人总部打成“反革命组织”。并勒令 48 万工人总部战斗队员“不得改头换面成立其他组织”。把武汉地区军内外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抄、抓的一批造反派组织头头和骨干分子抓了起来。十几天之内，逮捕造反组织《工人总部》头头朱鸿霞、夏邦银、胡厚民等人。工总区分部以上头头近 500 人被捕。

21 日，武汉军区又发表《通告》，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并且解放了一大批地方干部，成立省市的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这些措施，稳定了武汉地区的局势，使生产形势得到迅速扭转，但也引起各造反派的不满，引起林彪、江青等的注意。

武汉军区发表的《通告》，说工人总部有十大“罪状”。并逼二司头头交出《二八声明》的炮制者。工造总司和三新认为军区无权这样做，这干预了文革运动，违反了十六条，把支左变成了支派，要求军区放人，为工总平反。工造总司和三新因此与军区公开分裂。

4 月 2 日，造反派乘《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社论之机，东山再起，并重新整合后，将矛头直指曾经压制过他们的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钟汉华等。三新工造和几十个工人造反组织开始加强了冲击军区阵式，上万学生静坐。满城口号是，“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陈大麻子你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

4 月 2 日，军区派员到工造、三新做工作要求工造、三新到军区开会组建省、市革委会，遭到拒绝，三新工造提出：三结合必须有“工总”参加，军区必须为工总平反，释放工总没有问题的头头，换掉“修”了的头头，这是他们的权力。此时，二司拼命为工总翻案，工造、三新也参入其中，为工总问题，工造、三新和其他几十个中等造反的工人群众组织，学生组织和军区对立，冲击军区机关，游行，到市、区、公安局静坐，示威，工人组织全力支持学生，工总解散后，一部分人参加了工造，一部分人不参加任何组织，成散兵，同工造、三新一道活动，协助工造、三新游行示威，这些人当时称“钢八司”（即按时上下班、下班后八小时自由参加运动）。

4 月 6 日“军委十条”下达后，武汉地区的形势立刻出现大的反复。造反派组织公开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把陈再道称为“武老谭”（即武汉的谭震林），把矛头对准武汉军区。

江青 4 月 16 日在北京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这样，武汉局势更加混乱了。造反派贴出的标语、漫画、大字报上，提出“彻底粉碎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等火药味极浓的口号。

4 月 19 日，陈再道、钟汉华到钓鱼台汇报武汉情况。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成员参加。他们汇报了武汉的情况后，周恩来让中央文革小组尽快地接见一次武汉的造反派，帮助武汉军区对造反派做工作。江青表示同意，并让戚本禹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安排在 4 月 21 日接见。同日，军区支左办公室迅速传达了陈、钟打回的电话内容。传达的内容是：“最近，周总理和江青同志接见了我们。总理说，我们解散工人总部做得对，坏人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以后还得注意工人总部一些头头的活动。江青同志说，她受了新一中学生的骗了，绝食不是三万，而是三百人。江青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中央首长指出，武汉军区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江青得知后，认为陈再道是以中央文革来压制武汉地区造反派，并取消了 21 日对造反派的接见计划，中央文革小组不再帮助武汉军区做工作。自此以后，对于武汉

军区的请示报告，中央文革小组一律不予答复。

5月16日，同这些造反派组织持不同观点的群众在“工人联合会”的基础上成立“百万雄师”联络站，队伍迅速扩大。2月间，周恩来曾把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找去，要他们集中力量抓好三件事：“一是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抓好按行业、按系统的革命大联合；三是抓好大、中学生的复课闹革命。”①

6月4日，鉴于当时严峻的局势，武汉军区发表《公告》，在肯定支左工作的大方向正确、重申不得为工人总部翻案的同时，检讨了支左工作中某些缺点和错误，希望各群众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求大同，存小异，尽快实现大联合。但两派组织对这个《公告》都不满意：造反派认为，军区是“假检讨，真反扑”，闹得更加凶了；“百万雄师”认为，军区这个《公告》太软弱，扶不了正，压不了邪，也对军区不满。

6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的突出现象是：各地的派性武斗大幅度升级。毛泽东在这年年底也说过：“用热兵器搞武斗是从六月开始的。”②有些造反派组织抢武器库，夺走机枪、冲锋枪、子弹、手榴弹等。有些实际上是支持这一派的军队支左人员听任他们抢夺的。六七月间，江西赣州地区的武斗，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局势也十分紧张。

期间，武汉于6月17日、24日和7月15日连续发生三次大型武斗事件。为了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决定亲临武汉。

7月13日下午，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和肖华、杨成武开会。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发动阶段已经过去，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③他提出要到湖北、湖南去。

大多数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武汉，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毛泽东说，我不怕乱，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他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火车，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跟他谈河北省的问题。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安全仍不放心，当晚先飞往武汉，为他安排住处。

毛泽东是7月14日凌晨3时乘专列离开北京的。这是他自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后第一次离开北京。他在路上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时，谈得仍很轻松。他说：

"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形势大好，阵线也分明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④]

当晚9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武汉。他这次来武汉，没有对外宣布，社会上并不知道。他们静悄悄地下了车，首先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

先到武汉的周恩来对陈再道和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钟汉华说："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你们放心吧，不要有顾虑。"[⑤]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达武汉的。

毛泽东到武汉后，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先到的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原来在成都、这时被叫来汇报情况的谢富治和王力住在百花二号，陈再道和钟汉华也搬到东湖宾馆的乙所。毛泽东到武汉后，发现情况比他原来想的要复杂得多。连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也分成两派，互不合作，房子弄得不像样子，经过周恩来做工作才一起收拾房间，共同从事服务工作。

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郑维山。毛泽东对周围的一切仍不很在乎。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他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长——引者注）都不要打倒。"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他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



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日听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因为冲击得厉害，要维护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他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分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引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引者注）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他还对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引者注），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讲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⑦

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的谈话到晚上 10 时才结束，他很客气地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这时，刚好有几个招待所的服务人员站在走廊里。毛泽东把他们招呼过来，要他们同陈再道、钟汉华一一握手，笑着对他们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⑧

事情似乎正在向乐观的方向发展，一天多后却陡然发生逆转，这是谢富治、王力造成的。谢、王两人是 14 日到武汉的。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第二天，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面指责他们：你

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能平等对待。

18日夜间毛泽东同陈再道等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当晚回北京。周恩来一走，谢富治、王力立刻赶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他们戴上造反派袖标，视察他们的据点、工事，慰问武斗负伤人员。随后就召开大会，王力在会上讲话，把他们称为“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且说：你们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19日，造反派以高音喇叭在武汉三镇到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的讲话录音，还播放王力的“四点指示”：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为“工人总部”平反，造反派是革命左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这一来，大大激怒了在武汉地区拥有多数群众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一部分军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当天贴满了武汉街头。晚上，他们乘坐几十辆拉响警报器的消防车，上百辆大卡车涌进军区大院，质问军区：王力为什么把“百万雄师”打成保守组织，又凭什么把几个造反派组织封为“革命左派”？军区支左大方向明明没有错，陈再道、钟汉华为什么要当“投降派”，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7月20日拂晓，“百万雄师”的两百多个代表来到东湖宾馆百花二号，要求王力回答问题。陈再道、谢富治出来会见，答应下午接见，答复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些代表将要离去时，又有几百人冲进东湖宾馆，多数是部队战士。他们感情冲动地殴打了陈再道，又冲进房间把王力揪到军区大院去。

这些冲进来的人，目标只是要揪王力去回答问题。他们根本不知道毛泽东这时已到了武汉，更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东湖宾馆，也没有冲向毛泽东所住的梅岭一号。但是这样多的人、包括相当多的军人气势汹汹地冲人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打人揪人，在一片混乱中确实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发生了“兵变”。

在局势没有明朗的情况下，林彪、江青当天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危言耸听地说：武汉形势不好，毛泽东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9]这封信由军委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带着坐专机送到武汉。毛泽东一时也把情况估计得很严重，怀疑是不是由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策动的一场“暴乱”，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这天发生的事情，被称为“七二〇事件”。

21 日凌晨 2 时，毛泽东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宾馆去机场，上午 11 时乘飞机到达上海，住进虹桥宾馆。

杨成武叙述了毛泽东到上海后在 24 日晚同他的一段对话：

“晚饭以后，毛泽东又通知我去一趟。向我交代了第二次返京的任务，然后问我：‘你过去认识不认识陈再道？这个人怎样？’‘以前不认识，解放后才认识的。这个人不错，我们关系也很好。’我回答说。‘你对武汉的事情有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老百姓，都把你当成大救星，军队里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啊！’毛泽东经过两天冷静的思考，对武汉军区领导的看法，比较实事求是了。‘他们不会反对您。’我又补充了一句。‘对！对！对！’毛泽东高兴地连说了三个‘对’字。然后又说：‘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在什么地方？’‘不清楚。’我答。‘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10]

第二天，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他在电文中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11]尽管电文中说陈再道犯了严重错误，但在林彪、江青等把“七二〇事件”说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把陈再道说成这个事件的“罪魁祸首”，要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情况下，这个电报仍把陈再道称为“同志”，对他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两个字，林彪他们要整死我们，那是易如反掌的。”[12]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同杨成武等谈话时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13]

过了十来天，他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14]

林彪、江青等却抓住“七二〇事件”，变本加厉地进行煽动。7月22日，江青接见河南省造反派代表时说：“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不能天真烂漫，当他们不放下武器，拿着长矛，拿着大刀对着你们，你们就放下武器，这是不对的，这是要吃亏的，革命小将要吃亏的。现在武汉就有这个情况。”[15]

27日，林彪主持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杨成武回忆道：“在这关键时刻，林彪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即揪出所谓‘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6]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乘机在军内清除他心目中的众多异己力量。

8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纪念建军40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不久以前，武汉地区党内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勾结起来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镇压。”

“目前，全国正在掀起一个对党内、军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17]

在林彪、江青的煽动下，各地造反派组织更加无所顾忌地冲击军事机关，大肆抢夺武器弹药，全国范围内的流血武斗继续升级，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注释：

①⑤⑧⑫《陈再道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301页、第318页，第322页，第363页。

②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年12月18日。

③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39页。

④毛泽东同杨成武、汪东兴、郑维山谈话记录，1967年7月14日。

⑥毛泽东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7年7月17日。

⑦毛泽东同陈再道、钟汉华等谈话记录，1967年7月18日。

⑨⑩⑯《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84页，第289页、第290页，第294页。

⑪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手稿，1967年7

月25日。

⑬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年9月9日。

⑭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年9月20日。

⑮江青接见河南造反派代表时的讲话记录，1967年7月22日。

⑰《红旗》杂志，1967年第12期。

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很不正常。出席全会的133人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十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

八届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中共九大做准备。会议内容中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件是要对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统一认识，另一件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对刘少奇的审查报告。

从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两年多了。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事态的发展，对它持有怀疑以至反对的人日益增多。林彪江青一伙也借此制造了“二月逆流”与“杨余傅”事件。

毛泽东主持会议，他在开幕式上说：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多少？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还是第一次；但毛泽东的基本意图显然仍是要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同时他解释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

打。那种战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有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①

10 月 31 日，全会发表的《公报》断然地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

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经过两年来的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空前广泛、深入地发动了亿万人民群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经历了反复的阶级较量，终于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在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现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全会指出：两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剧烈斗争。斗争的中心，是政权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曾经用政治的、经济的各种手段，或者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即形“左”实右的方面，妄图混淆阶级阵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但是，他们种种阴谋，已经被掌握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人民群众一一揭穿了。全会认为，对于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的破坏活动，必须继续提高警惕。

全会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极其深远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

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思想在亿万人民中迅速地传播，深入人心，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斗争中自觉地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永不变色的根本保证。全党全军和各级革命委员会，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认真执行毛主席每一项最新指示，进一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步伐，统一行动，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使我们各项工作继续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知识分子，号召全国各族革命人民，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我们必须执行毛主席关于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指示，执行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把查明有据的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其他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入党，首先是吸收产业工人中的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选拔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优秀的共产党员参加党的领导工作。

我们必须完成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伟大历史任务。对知识分子，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关键问题。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要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②]

这个公报以中共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在肯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前提下，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

为了实现将这些副总理和老帅们完全打下去，林彪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不过，毛泽东在闭幕会上没有肯定林彪这种讲法，他说：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说，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毛泽东强调，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③

但公报中说道，全会严肃地批判了那个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1967 年的“二月逆流”。全会认为，击溃“二月逆流”和今春那股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十二中全会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诬陷刘少奇的审查报告。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虽然被剥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但仍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对待。毛泽东在 1966 年 10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④

1967 年 1 月 17 日，毛泽东对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变化的转折发生在 1967 年 3 月间，是由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引起的。

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⑤

专案组不择手段地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扣押重要材料等极端卑劣的手段，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无中生有地把刘少奇说成叛徒、内奸、工贼。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以后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起诉书中写道：为了诬陷刘少奇是叛徒，他们对 1927 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搞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 1929 年同刘少奇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1967 年 9 月 25 日，丁觉群在狱中就申明，他被逼写的材料是打破事实的框框写的。孟用潜从 1967 年 6 月 15 日至 1969 年 3 月 18 日，在狱中先后 20 次书面声明，他在逼供下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但丁觉群、孟用潜的更正、申辩材料，均被扣压，不许上报。⑥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会上当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时。当时的表决方式是举手，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举手。会上，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

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第二年 11 月 12 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 71 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却在民主和法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被非法隔离和批斗达三年之久，并完全剥夺申辩的权利，被诬陷为叛徒、内奸、

工贼，含冤逝世。这是令人极为痛心的沉重教训。

全会还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九大的召开做准备的会议，是一次贯彻“文革”方针、路线的会议。

注释：

①③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年10月13日。

②《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日。

④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⑤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年2月26日。

⑥《历史的审判》（上），第19～20页。

附：

刘少奇冤案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大肆批判。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加害刘少奇，给他罗列了“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出党。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受尽非人的折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惨死在河南开封。

刘少奇是怎样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呢？

文革前，在如何看待社会矛盾党内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上，在如何开展社

会主义革命，文革中在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问题上，如斗争的目标、采取的方法，实施的措施，具体的在对待各级党政机构和领导人、对待工作组问题上，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1966年7月，毛泽东先是严厉批评刘少奇派工作组，接着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8月5日，毛泽东突然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行动——发布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开火，矛头直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10月9日~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林彪在会上发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林彪的这一讲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而且在会后被大量印发到群众之中。会上，另外一些人也指名道姓地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了批判。在会上，毛泽东说，北京问题，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此时，毛泽东还是把刘少奇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要求采取党内矛盾的解决方式。

但在这个批判狂潮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恶意推动下，造反派开始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社会上的造反行动更为激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普遍受到冲击而逐渐陷于瘫痪。10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组织贴出“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口号。之后，社会上红卫兵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举动不断发展。10月29日，清华大学校园内出现了《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字报，直接向刘少奇“开炮”。

随后，地质学院迫使工作组组长返回地质学院接受批判，给清华大学学生反对工作组的行动注入了兴奋剂。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又出了一批矛头对准刘少奇、王光美的批判性的大字报。

中央机关也发起了“批判刘、邓司令部”的运动。11月2日，中央组织部贴出很多指责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天安门前也高悬着“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

11月25日，刘少奇陪同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12月11日，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名义给肯尼亚发出一份礼节性贺电，则是最后一次行使了他的国家元首的权力。此后，刘少奇实际上失去了人身自由，遭到无情的接二连三的批判斗争，同时对刘少奇的残酷的人身迫害也接踵而来。

12月18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审查王光美所谓“特



务嫌疑问题”。江青等人开始公开宣传“打倒刘少奇”，竭尽所能，企图把刘少奇先在社会上搞臭。

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接见了蒯大富。张春桥对蒯大富说，从全国来讲，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要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刘少奇、邓小平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当天晚上，蒯大富向“井冈山红卫兵”的头目传达了紧急命令，并对“打倒刘少奇”的行动作了具体部署。

12月25日上午，500多人在蒯大富的率领下从清华大门冲出，一路摇旗呐喊，一直来到天安门，然后又兵分五路，每路由广播车嘶喊着开道，分别到西单、王府井、北京站、菜市口等处演讲，张贴大字报、大标语，散发传单，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人身攻击。

一时间，北京城里响起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口号。这次行动一直闹了一整天。

12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北京部分大中学校师生座谈会。在会上，江青煽动说：“两条路线斗争的胜负还没有定，阶级斗争还相当激烈。刘少奇的检讨不像话，在干部中没法通过”。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作了《向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发言。

聂元梓说，刘少奇、邓小平从来也“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邓小平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最大的代表”，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

12月30日，江青到清华大学，单独召见了刘少奇的女儿刘涛，策动刘涛起来从家庭成员角度揭发批判刘少奇。江青对刘涛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不打倒他，是因为全国人民转不过弯来，要一步一步来。

1967年元旦，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这天早晨6时，刘少奇家的大门被叫开了。中南海里的两个造反派强行闯入院内，在院墙上涂了很多大标语，并在院里地上用排笔写下了“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和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两行大字。

1967年1月3日傍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中南海造反派强行在走廊门口接受批斗达40分钟之久。一个造反派跳出来命令刘少奇背诵《毛主席语录》某一页的某一条。刘少奇背不出，但不慌不忙地说，叫他背词句他背不出，但可以让他说出毛泽东的哪篇文章，写的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写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见。刘少奇说，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将一卷铅印的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单独交给蒯大富，并极为恶毒地说：“回去要组织批判。”

造反派们在江青的一手策划下，上演了一幕“智擒王光美”的丑剧。1月6日傍晚，王光美接到一个电话，说她女儿刘平平从学校回家时在路上被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正在人民医院急诊室，截肢需要家长签字。

当刘少奇、王光美匆忙赶到医院时，没有见到刘平平，却看到被当做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

1月12日，戚本禹根据江青的旨意，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戚本禹在会上煽动说，“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

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分别对他们进行围攻批斗。70多岁的刘少奇受到低头弯腰的批斗体罚。

从1月份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揭发、批判刘少奇的文章，用大量的捕风捉影的“材料”，制造了种种罪名，公开进行各种各样的辱骂和人身攻击。他们还用漫画形式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罗列其所谓“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蒯大富组织搞的“百丑图”。大批功勋卓著的老干部在图中，以小丑的形象与赫鲁晓夫等所谓“修正主义分子”排在一起。

2月1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出版的《井冈山报》，刊登了题为《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的大篇文章，列举了刘少奇的所谓“十大罪状”。

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三次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当谈到刘少奇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看过几遍，是‘反马列主义’的。但九大还要选刘少奇当中央委员。”同时，毛泽东还强调说：“现在不要挂牌子，戴高帽子。”这表明，毛泽东此时还是把刘少奇

的问题按党内矛盾的性质处理，要求以党内路线斗争的方式加以解决。

但到1967年3月间，毛泽东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变化。3月，康生利用一份诬蔑刘少奇是“叛徒”的虚假材料，给毛泽东写了报告，声称他掌握确凿材料，完全可以证明刘少奇在历史上有“重大叛变嫌疑”问题，建议中央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

康生搞的材料就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对于61人的出狱的事，中共中央领导人一直都很清楚。中共七大时，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这61人中被选为代表和候补代表的14人均作了“本人不能负责”的结论，认为他们都符合代表资格。

对登《反共启事》手续的最高具体负责人确实是刘少奇。然而，刘少奇是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后执行的。林彪、江青等人一心想把刘少奇置于死地，要尽可能多地罗织刘少奇的“罪名”。

在江青、康生等人的一手策划下，历史被歪曲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最终被定性了。

康生一伙借抓“叛徒”大作文章，是竭力想把刘少奇问题从党内问题搞成敌我问题。他们的诬告终于有了效果，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21日，毛泽东批准了康生的报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审查刘少奇1925年、1927年、1929年、1936年的所谓“叛徒嫌疑”问题。

中共中央决定审查刘少奇后，刘少奇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随之升级。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红卫兵小报中报道说，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并且说刘少奇自诩为“红色买办”。刘少奇对这种无中生有的报道极为气愤。

3月28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对影片《清宫秘史》的观点。可这封信如黄鹤西去，杳无音讯。

而后来，《红旗》杂志第五期突然发表了由戚本禹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矛头直指刘少奇。戚本禹以“权威”的架势，第一次在中央报刊上点名批判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言“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戚本禹在这篇文章中给刘少奇等人戴上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帝国主义买办”、“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

宣传的应声虫”的大帽子。在文章的结尾，戚本禹还对刘少奇荒谬地提出了“八个为什么”的问题。

刘少奇对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气愤异常。刘少奇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他从来没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也没有说过当“红色买办”。所以，文章所说的都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刘少奇还说，他不反革命，也不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是他在中共七大上提出来的，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刘少奇说，他曾在1966年8月的会议上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他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

在戚本禹的文章的煽动下，4月1日以后，全国“打倒刘少奇”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号召全国人民、各机关部门开展这样的大批判。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明5月8日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并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江青等人觉得批斗王光美还不解恨，便趁毛泽东出巡大江南北之际，组织了一批红卫兵，“围攻中南海，揪出刘少奇”。一时间，中南海的大墙外人声鼎沸，帐篷高挑，被围得水泄不通。

群众性的极“左”思潮的狂热被煽动起来后，江青等人“趁热打铁”，进一步大作文章。7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三人密谋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7月14日，戚本禹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趁机对刘少奇进行围斗。

同一天，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写信给汪东兴并转呈周恩来，提出要召开大会“批斗刘少奇”。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的戚本禹却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并且请他们作决定。

7月17日，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擅自决定对邓小平、刘少奇、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次日凌晨1点多钟，戚本禹召集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召开会议，进行动员和具体部署，准备再次批斗刘少奇，而且还要加大批斗力度。

在此期间，戚本禹还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开展全面的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任务"。戚本禹又说，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戚本禹并指使其爪牙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戚本禹还亲自指定了批斗方式、规模、日期。

当晚，中南海"造反派"300多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揪到中南海内的两个食堂进行批斗。在整个批斗会上，刘少奇遭到低头弯腰的人格污辱，而且被罚站两个多小时。批斗的同时，戚本禹还派人前往中南海抄了刘少奇的家，抄走刘少奇笔记本61本，王光美笔记本127本。

批斗结束后，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就被隔离开了。刘少奇被押在前院，王光美被押在后院。子女们在中院，也都失去行动自由，不准到前院，更不准随便离家。造反派头子迟群还以"中央"的口吻向警卫人员宣布，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卫刘少奇，而是看管刘少奇。从这一天起，刘少奇的文件被停发。他整天只能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基本上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与此同时，邓小平、陶铸夫妇也遭批斗，家也被抄了。

毛泽东这时正在南方视察。他从上海得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和"揪刘火线"的事情，当即要杨成武马上返京，要求"造反派"停止对刘少奇的批斗。就这样，"中央文革小组"被迫向"揪刘火线"的群众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动员群众撤回。8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解除围困的决定。

8月5日，虽然"揪刘火线"撤回，但"中央文革小组"又搞"收兵之战"，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百万人大会。同时，中南海内组织批斗"刘、邓、陶"大会，批斗情况作实况广播。戚本禹在安排批斗时，对中南海内的造反派说："不要文质彬彬，一定要有气氛，要是开不好，拍成电影，群众看了是不答应的"。

当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组织了一些群众，分成了三处地方，在各家院内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邓小平、卓琳、陶铸、曾志等。

这一天，天气异常酷热。几个彪形大汉架着刘少奇和王光美走进会场，粗暴地扭手按头，强迫他们"卑躬屈膝"，坐"喷气式"，又脚踢拳打，揪刘少奇稀疏的头发，强迫他抬头照相，刘少奇的几个孩子也被军人押着陪斗。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斗争会上，刘少奇不断遭到辱骂和殴打。他的答辩不是被阵阵呐喊声所打断，就是被造反派用语录本劈头盖脸打来，无法继续下去。

造反派还把刘少奇、王光美押到会场一角，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刘少奇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脚下只剩袜子，双腿还一跛一跛的。

刘少奇被押回办公室后，按铃唤来机要秘书。他拿出了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辞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秘书连夜就此写了汇报，给中共中央反映了刘少奇的抗议，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8 月 7 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并就这篇文章发表了社论，文章和社论说："刘少奇与北京的畅观楼事件有关。"

刘少奇看到这篇文章及社论后，感到十分气愤。刘少奇为了自己的清白，立即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说明自己从未参与过这些事件。

刘少奇在信中还表示，欢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进行大批判。虽然这一报道有些事实有出入，这也是难免的。但他看到的却是"反党"、"篡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等，对此他表示是肯定不能接受的。

刘少奇在信中严肃地表明，他所作的都是公开的。他没有在党内搞任何形式的组织派别，搞非组织活动，希望中共中央、毛泽东严加审查。刘少奇还表示，任何方面要他写出材料，他随时都可以写出。信中，刘少奇还申明，自己已失去自由，再次请求解除职务。但是，这封信也犹如石沉大海，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9 月 13 日晚上，王光美正式被捕入狱。接着，几个战士奉命搜查刘少奇的房间，要把他的皮带解下来。刘少奇大声抗议，但无济于事，他被按倒在地，皮带被强行抽走。刘少奇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半句话来，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这样，刘少奇成了连囚犯都不如的"囚犯"，连起码的人道主义保障都没有了。不久之后，迟群代表"中央"给刘少奇的警卫战士训话："你们中队负责警卫的人里黑帮出得最多，刘少奇就在这里。你们中毒最

深，要肃清流毒。你们的任务已经根本变了，不是警卫，而是看管刘少奇"，"要好好地看管，不能留情。不然，你们也是一样的下场"。

林彪、江青等人在煽动群众掀起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刘少奇"的浪潮的同时，也加紧了给刘少奇罗织"罪名"的活动。

1967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刘少奇实行审查以后，王光美专案组的人数就增加了，由原来的 3 个人增加到 40 多人。5 月 18 日，王光美专案组从中央组织部调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档案。

5 月 20 日，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写了一封信，决定于当天在江青处开会，以研究刘少奇的专案问题。专案组并于当天正式确定了审查刘少奇的文件的发放范围。这一范围只限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江青、肖华、汪东兴、杨成武、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叶群，还有专案组的有关人员。

6 月 3 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林彪、江青等人"周密"部署下正式成立。专案组的工作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康生、陈伯达是顾问。在组内，江青虽然没有什么职务，但大小事情她都要过问。专案组实际上处于江青的直接控制之下。

6 月 5 日，康生写信提出，刘少奇一案涉及有关的关押人员，有很大一部分审讯工作由于审讯人员的力量太弱因而难以开展。康生要求公安部尽快增调一些审讯人员。康生又于 8 月 6 日要求调 30 名日文翻译，查 600 余件日伪档案。

为了所谓的"审讯"工作，专案组还逮捕、关押、审讯了与刘少奇、王光美专案"有联系"的所谓"知情人"。这些"知情人"共有 64 人。在 1967 年 5 月至 10 月，由江青擅自决定逮捕关押的就有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 11 人。

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搜集陷害刘少奇的材料，以便给刘少奇罗织一系列"罪名"。江青一伙对专案组人员进行种种的威胁利诱，迫使专案组人员按着他们的意图编造材料。

1967 年 8 月 4 日，康生对专案人员说，要整倒的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干部里有"叛徒"，有"三反分子"，有"特

务”。长期以来，这些坏人没有被发现，他们是老干部中的“败类”，这次运动就是把这一小撮“揪出来，挖出来”，这是很大的收获。

康生还对专案人员说，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些人“不是老革命”。他们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和反对共产党的大叛徒、老反革命”。

同年10月，谢富治在对专案人员讲话时也说，凡列入专案进行审查的，都是“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专案组和这些“敌人”要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这样，专案组人员的思想就被框得死死的，从而使得他们不敢实事求是地弄清问题。

事实上，在康生、谢富治看来，“打倒刘少奇”是一件具有“伟大的意义”的事情。所以，康生、谢富治等人还命令专案组成员要按照江青的意图搞专案。康生在一次讲话中说，揪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叛徒、特务集团”，就是清除了“党内最大的隐患”，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召开九大都具有“伟大的意义”。

除此之外，谢富治还对专案人员说，刘少奇一案，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专案组一定要认真搞。这实际上已先给刘少奇定了性。

谢富治所说的“认真搞”，只不过是“认真”按江青的意图编造材料，罗织罪名。正如谢富治对专案组的一次指示中所说，专案人员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重大的情况要请示江青，工作要想到有利于“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彻底。

后来，谢富治则直接在对“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亲自抓的。以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先报江青”。

1967年8月，江青在对八个专案组讲话时说，她觉得专案组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右倾保守”。所以她要求专案组要“解放一下思想”。江青还特别强调说，刘少奇是一个“大内奸、大叛徒”，“红卫兵小将们整的材料比专案组整的还好”。江青还当场指着一个办公室的负责人说：“他就是保守”。

林彪、江青等人还教唆、怂恿专案人员搞逼供信。1967年2月，康生对专案人员说，搞大会批判，主要是“政治上打一下威风”，但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还要靠小范围的审讯。审讯方法应该“软硬兼施”。康生还说，审讯过程中有时搞点逼供信是难免的。

与此同时，江青也曾对专案人员说，她认为在审讯工作中难免要打人。

气极了打两下，也是可以理解的。江青还说，如果打人之后出什么问题，她一人担着。1967 年 10 月 23 日，谢富治对“王光美专案”组人员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了手，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总之，为了制造诬害刘少奇的伪证，他们采取了各种卑劣手段。

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指挥和一手策划下，专案组一方面采取弄虚作假、断章取义、无中生有、刑讯逼供等令人气愤的卑鄙手段，拼凑虚构、牵强附会材料，伪造证据，报送中央；另一方面，又扣压一大批了解真相的人的证词和被迫提供伪证的人后来多次的更正材料。

1968 年 9 月，刘少奇专案组提出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给刘少奇罗列出一系列莫须有的“罪状”。

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罗织“罪名”是多方面的。其中，有一个是专案组编造刘少奇曾经在长沙“被捕叛变”的材料。

江青、康生在《审查报告》中捏造说，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期间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之后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当时的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刘少奇为了活命，接受了赵恒惕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刘少奇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赐的《四书》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

这完全是江青、康生等人无视历史事实，主观捏造出来的“罪名”。关于“借口养病”、“私自潜逃”，是专案组把当时上海《申报》登载的一条当局要传讯中华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的消息与刘少奇回长沙的事联系起来，完全是凭想像得出来的。而同是当时的报纸，《上海总工会三月刊》、广东《工人之路》、长沙《大公报》、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均报道了刘少奇因病重回长沙养病的消息。然而，1968 年 9 月 17 日，康生给江青的信中，竟称这个虚构之事他完全可以证明。

至于“被捕叛变”，同样是专案组依照想像推断出来的。专案组认定的根据有两条。这两条根据就是，军阀赵恒惕曾经发布过“四斩”布告，随后又杀了当时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而刘少奇被赵恒惕逮捕后没被杀反被释，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投降叛变”了；而且，恶霸罪犯杨剑雄的笔供中提到赵恒惕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释放刘少奇之事。

其实，当时的具体情况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的“四斩”布告，是针对长沙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人，引起群情激愤，赵恒惕怕造成更大的动乱而发布的。而黄静源则是被江西军阀所害。这些事和后来刘少奇的被捕与释

放是完全不相干的。

其实，就是在罗织“罪名”的过程中，专案人员也感到证据相当地苍白无力。所以，1967年，专案人员的报告中只是认为刘少奇“有叛变自首嫌疑”。经后来的某些人修改，到1968年10月的结论报告中，“有叛变自首嫌疑”则被改成百口莫辩的“叛变”字样。

关于编造1927年大革命进行的紧要关头，充当“内奸”，“破坏”工人运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支持专案组罗列了刘少奇的四条“罪名”，即“四·三”惨案发生后，为日寇保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被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并“为敌人出谋划策，调走武汉工会骨干，解散工人纠察队”；为掩盖“内奸面貌”，演出假被捕的苦肉计；武汉“七·一五”事变前，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卖勾当。

以上这些所谓的“罪名”没有一件有说服力的物证，只有四个人证。四个人证中又只有一个是主要的，即当年曾和刘少奇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丁觉群。整个材料的提出有的是诬陷，还有的是虚构。

《审查报告》还提出，刘少奇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搞了一个“假逮捕”的“苦肉计”。事实完全可以证明，这也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大量证据证明，刘少奇在1927年没有被捕过。专案组认定刘少奇曾被捕过的所谓根据，是当年6月29日汉口法租界巡捕房给驻汉口总领事的报告信。这封报告信提到，头天晚上军队在总工会办事处逮捕了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项英等领导人。陈仲波、曾昭美、吴良福等都证明，当晚确实有军队到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闹事，但是没有发生捕人的事。吴良福还证实，他第二天还见过刘少奇。

《审查报告》提出的所谓刘少奇受汪精卫“指使”，“躲往庐山”，“继续进行叛变勾当”的问题，仍然是以丁觉群在逼供下编造的那份“书面材料”为根据。而且，对罗章龙、聂荣臻写材料证明，中央知道刘少奇在庐山养病的事情这些真实的证据，专案组都被扣压下去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刘少奇的“勾结汪精卫进行叛变勾当”的罪名成立了。

至于《审查报告》提到的1927年的其他罪名，也是专案组歪曲历史事实编造的。如调动武汉工会干部一事，这是中共中央鉴于汪精卫反共面目日益明显，决定疏散在武汉干部的应变措施。李维汉、郭述申等人均可证明。湖北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调整了干部队伍。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审查报告》却将上述事件歪曲为刘少奇“破坏

革命的内奸活动”。

至于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这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屈从于武汉国民党的压力，作了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决定。刘少奇只不过是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专案组无视历史，把它演绎成为刘少奇的“特务、内奸活动”。

关于捏造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罪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刘少奇1929年8月22日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叛变”的问题；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问题；按“敌人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的问题。确凿的事实证据表明，这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无中生有，血口喷人。

以上所述的三个问题中，刘少奇1929年在沈阳奉天纱厂被捕一事，是专案组确定突破的重点。他们在沈阳地区组织了400多人的专案班子，动员了大量的人力查找资料。然而，在查过十五六个档案馆，查找了历史档案245万卷之后，他们没有找到一件足以证明刘少奇叛变的事实证据。

专案组为了达到陷害刘少奇的目的，找不到物证就四处地找人证。他们找了当时有关的敌伪人员、原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和原奉天纱厂供职的人员等100多人，最后选定了八个人在逼供下写出供词。供词主要是孟用潜（时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编者注）和许多荃（时任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两人的交代。另外，还有六个“知情人”的材料。

除《审查报告》定的“罪名”外，江青、康生等人还蓄谋把刘少奇打成“大叛徒头子”、“特务”、“美国远东情报代表”。在这一有预谋的罪恶活动中，也涉及其他专案。许多干部、群众被迫害。

《审查报告》还认定，刘少奇在全国解放后犯有“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等罪行。

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呕心沥血，做出了卓越贡献。长期的历史证明，党内根本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8年2月，关于刘少奇专案的材料大体整理得差不多的时候，中央办公厅政治部要刘少奇就群众组织提出的问题写出自述材料。

2月12日，刘少奇按照中央办公厅的要求写好材料交上。刘少奇在材料中写明了自己在历史上被捕的情况，并一再重申并没有“叛变”过。值

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写的材料与专案组掌握的大量材料是一致的。2月16日，江青看了这个材料后“批示”说，刘少奇简直是在“胡扯八道，乱说一气”，江青要专案组继续罗织“罪名”。

刘少奇专案的罗织捏造最后完成后，专案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刘少奇的三本所谓“罪证”材料，并以江青等四人的名义将这些材料上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阅过了，没有按历史顺序排列。”

9月16日，江青在专案组上交的刘少奇“罪证”材料上“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

第二天，康生在给江青写的信中，称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特务、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康生并煞有介事地断定，他觉得刘少奇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

9月29日，林彪看了江青的“批语”，马上批写“完全同意”。同时，林彪还写上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字样。后来，张春桥在11月上旬的一次讲话中说，这本《审查报告》就要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13日~31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

首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中央委员除去世、被打倒、受审查者外，到这次全会时已不足半数。中共中央只得递补10名候补中央委员补足半数。其次，党内一批卓有声望的老同志，被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和“一贯右倾”的“老右”遭到围攻、批判并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再者，刘少奇专案组把歪曲、编造的材料提交全会，凡证明刘少奇没有问题的全都隐匿不报。对此，没有一个人对专案组的做法提出异议。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附件《罪证》，并作出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

在表决通过决议时，中央委员陈少敏不畏高压，没有举手。但个人的作用不能挽回大局，刘少奇被戴上了“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被当做“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彻底打倒。林彪、江青等人还鼓噪要“公审刘少

奇”，“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未能实现。全会公报号召“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公报中说：全会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全会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和革命群众把刘少奇的反革命面貌揭露出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伟大胜利。全会对于刘少奇的反革命罪行，表示了极大的革命义愤，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1968 年 11 月 24 日，是刘少奇 71 岁的生日。恰在这一天的清晨，刘少奇听到了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把他“永远开除党”的决议，这使他痛不欲生。刘少奇浑身颤抖，他的血压急剧升高，发高烧至摄氏 40 度。1969 年 10 月 17 日，正在重病中的刘少奇被遣散到开封，11 月 12 日 6 时 45 分，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遗体到达火葬场时，专案组人员在火化单上填写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死因：病因。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趁“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的机会，用无法无天的封建法西斯手段酿造了共和国的最大冤案，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冤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同志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制止武斗反对派性稳定局势

毛泽东反对武斗，是在武斗出现时的1966年，针对学校里出现的派性武斗，他发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号召。但在中央文革、江青的怂恿下武斗现象越来多。到1967年春夏之际形成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全国各地一片混乱。最早是北京、上海、武汉，接着是吉林、湖南、广西、青海、江苏等省市。

1967年七八月间，全国很多省份发生了派性群众抢夺解放军的枪、抢战备仓库、拦截军用物资等事件。而且，冲砸公检法机关、大规模的武斗流血事件急剧上升。许多地方的武斗还动用了机枪、火炮、坦克和装甲车。

为了制止各地日益严重的武斗，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令，即《六六通令》。针对各地刮起的大规模打、砸、抢、抄、抓歪风，《通令》提出了七点措施。这七点措施包括：

一、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必要的逮捕拘留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和变向的私设公堂。

二、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

三、社会主义的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绝对不可侵犯，革命群众都有保护的责任，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侵占，不准砸抢，不准用任何借口进行破坏。

四、严禁武斗，严禁行凶打人，严禁在本单位和到外单位打群架，严禁抢夺个人所有的财物。

五、除国家专政机关奉命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

六、由各地卫戍部队和驻军负责保证上述各条的执行。自即日起，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都应该严加处理。对于肇事者和背后挑动者，对于打死和

打伤人的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对于破坏、侵占和抢夺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个人财物的，都必须追回或按价赔偿。对于违犯上述各条的团体，分别情节轻重，在一定的范围内通报批判。

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成为执行本通令的模范，并协助卫戍部队和驻军进行政治思想工作。

1967 年 7 月至 9 月间，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多次发表谈话，要求制止武斗和派性对立。但他始终认为“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由于毛泽东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制止武斗收效不明显。

“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失控，在外地巡视的毛泽东意识到局面的严重性，果断地采取了治乱措施，批准发布一系列的命令、布告、通令，制止武斗。

针对全国范围的武斗局势和混乱状态，9 月 1 日，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提出“坚决反对武斗，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对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物资，以至抢夺援越物资的现象，周恩来作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并且指出，“第三次大串连”，“揪军内一小撮”是错误的口号。

9 月 4 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后，着重谈了如何控制局势的问题，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同时指出“要解放一大批干部，对!”“有的‘四大’（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搞得很惨，何必那么搞？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现在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①

据此，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命令》指出，为坚决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 6 月 6 日通令和 8 月 25 日《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特再次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和任何人，不管是属于哪一派，不许以任何借口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抢夺军火仓库、军用仓库和国防企业中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不许拦截火车、汽车、船舶上装载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物资，不许外部人员进驻人民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二、军队院校、文体单位以及所有开展四大的单位中，不管任何组织、任何人，更不准抢夺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

三、军队所有机关、部队、院校等单位，不经中央批准，绝不许将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发给任何组织、任何人。

四、已经抢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装备、车辆、器材、物资应一律封存，限期归还。

《命令》中说，这项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以后，如有违反命令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

同时，中共中央解放了一批干部，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部门实现军管。这些措施对于制止混乱局势的进一步恶化，遏制武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不能根本改变“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所必然带来的内乱局面。

江青一伙迫于形势，不得不出来讲话“反对动武”。然而，他们却同时强调了“文攻武卫”。

9 月 1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再次联合发出通知指出：

“坚决制止抢夺国家和集体财产的事件发生”；“对于已经发生的抢夺国家财物的事件，要严肃处理”；“人民解放军、公安机关、革命群众组织，要对保护国家仓库、金库、物资、财产的安全负责”；“对外出串连和从原地出走的群众，要动员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因武斗而造成停产的单位，从停产时起到生产恢复之日止，一律停发工资。经查明以后，未参加武斗的人员，他们的工资以后再行补发”；“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保护国家财产，监督和检举坏人。”

9 月 16 日和 17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时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9 月 9 日晚间，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他特别关心“大联合”问题，把它看做解决各省问题、改变当前严重混乱状况的关键。他说：“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搞得更好了，二、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主要是找各方面的人谈

话，多做思想政治工作。他计算了一下，说：现在有七个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是比较好的，还有几个省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形势就很好了。

毛泽东又谈到上下级关系问题，说："龙潜（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军管会主任）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就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另一方面，他又叮嘱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你们现在正是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江苏省一个群众组织）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江苏省另一个群众组织）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

毛泽东特别关心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当有人谈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反到底"组织提出要以它为核心时，毛泽东说："什么核心？核心是实践中群众承认的，不是自封的。"②

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身份，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指使并支持造反派采取极端行动，制造事端，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1967 年 8 月底到 1968 年 1 月毛泽东决定对他们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以稳定局面，这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等"左"派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对遏制局势进一步恶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事后他对此曾有过评论，10 月 3 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③

10 月 16 日，毛泽东坐火车离开上海，经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回北京。他在途中都找这些省的负责人谈话，讲得最多的仍是正确对待干

部和消除派性问题，希望尽快地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在浙江，他一开始就谈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说：“龙潜、阮贤榜（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引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嘛，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对打派仗的问题，他又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他归纳起来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我看（明年）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④

据杨成武回忆：“在视察途中，毛泽东还提到，明年春天‘文革’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还列举了邓小平、乌兰夫、彭真、贺龙等人。”⑤

9 月 19 日，他在武汉同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谈话，重点放在他正考虑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上。他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⑥

20 日，他找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领导干部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又说到：“大概（明年）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他也向曾思玉等提出九大什么时候开的问题，说：“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份开。”他又一次说：“现在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什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这里显然流露出他对林彪已有不满。他还谈到邓小平，说：“邓小平是不是要保？一个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⑦这是他一直在考虑的问题，但以前还没有这样明确地说出来。

21 日上午，毛泽东根据各地解决问题的情况，很有把握地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

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并且说：“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8]

当天，毛泽东离开武汉，经过河南，在23日回北京。这次南巡共两个月零10天。10月7日，中共中央整理转发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是中央在“一月夺权”以来第一次下达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论述。但由于他没有改变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些谈话收效甚微，各地的混乱状况仍在发展。

经过1967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1968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他仍设想这场“文化大革命”能够在三年左右告一段落。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这种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9]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1968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1967年要稍稍平稳一些。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像毛泽东所估计的那样乐观。已经陷入严重动荡以至失去控制的局面是很难收拾的。有些地区和有些部门情况仍极混乱，甚至继续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铁路运输方面。

1968年2月2日，津浦铁路上两列客车遭到武装抢劫，乘务员数人被绑架，枪支等被抢走。这条铁路的几处路段被毁，通讯调度中断，几座铁路桥、公路桥被炸。4日，周恩来将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并且写了一封信说：这种破坏铁路的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次为昆明、成都一线。他在信中提出：这些破坏铁路、炸毁桥梁的行动已超出派性，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毛泽东阅后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10]

保存下来的一份2月12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

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11]他希望由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由此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他希望借此制止武斗。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武斗仍在进行。

到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3月到6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

在各地的武斗中，广西的情况最为严重：一部分人破坏铁路交通，无法恢复通车；抢劫援越物资，拒不交还；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和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武斗还造成两派群众大量伤亡。6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后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12]13日，中央发出特急电报[13]，他们仍拒不执行。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布告》中以严厉的措词规定：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

依法惩办。”[14]

《布告》发布后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将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转发各地，并要求各地检查宣传情况，加强领导，“力求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在陕西出现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一系列极其严重的事件，包括：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武器装备，杀伤指战员。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布告》规定：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15]

以往，毛泽东要求制止武斗的一系列要求以内部谈话、电报和文件等方式表现出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社会上大多数人并不知道。现在采取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公开张贴布告的方式，警告那些武斗操纵者“不得违抗”，否则将“依法惩办”，力度就大得多，也显示毛泽东已不能容忍这种混乱状态再持续下去。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但在一些地区也发生把群众组织一些严重错误行动定为反革命事件，从而在这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得到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一直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连，设联络站，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不少地区的严重事件是在他们直接指挥下发生的；各地造反派组织也

纷纷设立“驻京联络站”，在1967年达到数千个。[16]这是武斗不止的重要根源。它们的头面人物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当时号称“五大领袖”。

那时候，北京高等学校多数师生已对这种无休无止、徒然造成严重破坏的派性武斗十分厌倦，做了“逍遥派”。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大多数人是你们要打你们就去打，我不来。他们当逍遥派。”[17]但聂元梓、蒯大富等自恃“造反有功”，又有中央文革做“后台”，把自己封成“一贯正确”，一意孤行，不仅插手各地武斗，而且继续在北京高等学校内指挥大规模武斗，不断酿成流血事件，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

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已不能再延续下去。7月27日，经他决定，向清华园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向校内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员达到两万八九千人。蒯大富等却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员，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这使毛泽东十分愤怒。

鉴于红卫兵已经失去控制，武斗不断，毛泽东对红卫兵大发了脾气。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地质学院的王大宾。

他一开始就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背后有“黑手”的说法，严厉地指出：“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接着，他说：“你们看怎么办？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嘛！你说搞了两年了，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他提出四种解决办法：第一，军管。第二，一分为二。“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呀？你们一派住一个城市，不要在一个城市。”第三，“统统不要，叫斗批走。不是学生讲了吗？斗批走，斗批散。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办。”“这也是一种办法，统统走光，扫地出门。”第四，工人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闹。也可以让你们闹，想打就打，要打嘛就大打，打他一万年。“也不逼着你们就在这里答复，回去你们也可以开点会，考虑考虑。”

他十分严厉地说：“第一条我是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些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于广西，不适用北京。那好啊，现在我们又发了一个陕西的。又会有人讲，只适用陕西。那么就发一个全国的通告。

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个别的捉起来。如果成股反呀，打解放军啦，破坏交通啦，我看消灭它！这是土匪、国民党！”“如果坚持不改，坚持要这么搞，那么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呀，拿重武器破坏交通呀，那要用兵去把它围剿！”

毛泽东最后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18]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实际上是下达了制止武斗的命令。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力地震慑了热衷于打派仗的骨干分子，缓和了学生中两大派的矛盾，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

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在当天整理印发了一份《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30 日，又重印了这份“传达要点”。重印时增添了一些话，其中最重要的是：“主席的指示精神，是要我们欢迎和支持首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少数有武斗的大学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七三布告’，劝说学生停止武斗，上交武器，拆除工事。要我们支持、尊重人民解放军。”[19]北京市由大专院校红代会出面召集 44 个大专院校的代表进行传达。有武斗的六所院校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聂元梓、蒯大富等在大会上作了检查。

1968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20]

8 月 4 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北京市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最新指示即毛泽东在 7 月 28 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讲话要点。

中央两个布告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7 月 3 日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 7 月 24 日的布告（即“七二四”布告）。

周恩来对北京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泽东“七二八”最新

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修改后的报告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中共中央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新的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抓好典型；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上的安排，并建议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参加领导小组。毛泽东还指示，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8 月 5 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个人对他们行动的支持。8 月 13 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并于两天后接见了驻清华工宣队代表。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由此武斗平息了下来。

注释：

①毛泽东听取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7 年 9 月 4 日。

②⑥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9 日。

③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 年 10 月 3 日。

④毛泽东同南萍、陈励耘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16 日。

⑤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10 月版，第 40 页。

⑦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0 日。

⑧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 年 10 月版，第 40 页。

⑨196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

⑩毛泽东对周恩来等1968年2月4日报送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年2月。

⑪《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

⑫毛泽东接见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班沈阳、南京班时对陪同接见的领导干部的谈话记录，1968年6月3日。

⑬即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柳州铁路地区恢复交通的五点指示》。

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3日。

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1968年7月24日。

⑯谢富治、郑维山、傅崇碧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报告，1967年3月5日。

⑰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年7月12日。

⑱毛泽东等同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谈话记录，1968年7月28日。

⑲《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重印本，1968年7月30日。

⑳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0月5日。

打倒“王、关、戚”

打倒“王、关、戚”是毛泽东制止混乱稳定局势的一项措施，对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积极作用，经历了南巡期间的所见所闻，毛泽东深深地感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面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认为需要打击一下了。

1967年8月，外事纠纷日益增多，在王力等煽动下，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严重事件，这是“王、关、戚”倒台的导火索。

此时，毛泽东从武汉转移到了上海，在这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武汉事件和剧烈动荡的社会现实，让他考虑必须进一步稳定。

期间，他对王力等人在武汉事件中的表现不满。后来，在9月9日晚间，在同杨成武等谈话时多次批评王力，并且也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他批评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①

针对工人中分裂为两大派的问题，他说：“工厂的问题，我就讲啦，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在武汉开会，我同王力就不一致。在谈话时，王力好凶啊，好凶啊！”

过了十来天，他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时又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就是不听我的，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又不找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前次我不走就好了，王力他们搞得太凶了。”②

为了遏制国内局势的进一步恶化，特别是看到全国内政外交有濒于全面失控的危险，毛泽东作出一项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决断：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到处煽风点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直接导因是8月7日王力对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所作的讲话（当时被称为“王八七讲话”）。那时候，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后的混乱局面，组成千人“揪陈大军”，矛头直指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8月7日晚，从武汉回到北京并受到盛大欢迎而得意忘形的王力，约见外交部“革命造反派联络站”代表，公然煽动他们夺外交部的大权。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把外交部大权夺过来？陈毅是‘二月逆流’的骨干分子。”“外交吓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的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多少过火的地方。”[③]林彪在8月9日也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在王力林彪讲话之后，外交部造反派在姚登山带领下封闭了外交部党委，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并以外交部的名义，向外发号施令。指使外交部的造反派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

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制造了一起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起因，是香港一家人造花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英港当局打伤工人和前往慰问的中国公民，英港警还抓捕报社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中国当时做出了强烈反映，向英国驻华代办处，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释放香港的19名爱国的新闻工作者和30多名三家报社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北京外国语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余所大学院校及工厂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万人声讨大会，要强行冲入英国驻华代办处。

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立即前往做说服工作，召见各造反派头头一齐开会。周总理告诫他们说：“你们千万不要乱来，不要随便进入外国使馆，这件事由政府出面和他们交协。”可是胜利冲昏了头脑的造反派固执得很，不听劝告，并扬言：“我们的同胞被外国人欺负，不能再像旧社会那样任人宰

割。我们做事，我们自己负责，王力同志讲话支持我们。”周总理说：“你们不能听王力的话，王力能代表政府吗！他只是文化革命小组的一个成员，说话能算数吗？你们再这样胡闹下去要犯错误的。”总理强行说服，一直坚持到半夜。最后总理和造反派头头达成协议，造反派头头许诺：“不进入英国驻华代办处。”总理才筋疲力尽地离开。

可是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数千名红卫兵中少数几百人，在英国代表处的正门、西门、北门不听指挥，强行突进，还有少数坏人取来汽油，放火焚烧英国代办处大楼、车库。

23 日凌晨，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同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谈了话，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严斥他们这种无政府主义行为，警告他们：“难道我们国家荣誉都不要了吗！中央多次指出外交部不能冲，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不汇报，我行我素，任意妄为，你们的头脑发热了，膨胀起来了，你们要犯错误了。你们放火，你们夺权，无所不为，前几天还冲击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三国驻华机构，这三冲一烧，使得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在世界上造成恶劣的影响。”

随行的还有陈伯达、谢富治。周恩来明确指出，“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④

三天以后，中国驻英国伦敦代办处，就遭到英国人疯狂的报复行动，使馆人员被抓被打，中国领导人被污辱，使馆人员还被抓做人质，也扬言要放火烧毁中国驻伦敦代办处。

几年以后，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周总理会见将军时还沉痛地说：“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到 8 月份，外交部也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了外交部夺了权，我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时已经晚了，来不及制止了，大火已经烧起来了。我立刻下令群众离开，那些坏人还不听我的话，我后悔轻信了他们的许诺。”

与此同时，外事口的造反派，就批判陈毅问题，又发起对周恩来新一轮的围攻，并无理揪缠，采用车轮战术围攻周总理，不让吃饭，不让休息、睡觉，企图强迫周总理交出陈毅，让他们批判。周总理一口拒绝，最后只好向



他们摊牌说："我奉命保护陈毅。"鬼迷心窍的造反派还是不让，不肯散去，扬言："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周恩来愤怒地说："你们这样做，是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单独约见刚从上海毛泽东处来到北京的杨成武，向他谈了对近来一系列事件的看法，特别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并把一份讲话记录交给杨成武，要他立刻送给毛泽东看；还谈了关锋主持起草的《红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他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⑤

杨成武在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上午立刻直飞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的意见。杨成武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叶剑英、陈伯达、康生、江青、吴德、纪登奎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说着拿起桌子上杨成武的记录稿，逐字逐句地宣读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读完，周总理就起草一个报告。

主席：

根据你的指示，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视其表现再作

处理。

周恩来

报告交杨成武速报毛主席，毛泽东很快批准了报告。

8 月 30 日，王力、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召开生活会，王力、关锋受到批判。1968 年 1 月，戚本禹也被宣布隔离检查，投入秦城监狱。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最先发迹，也是最早倒台的暴发户。他们得意的日子不长，却罪恶累累。例如，煤炭部长张霖之的死就同江青、戚本禹有关系。1966 年 12 月，戚本禹学江青的舌，在矿业学院的大会上说“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鼓动学生“要集中炮火狠狠地打击”。结果，张霖之被造反派残酷批斗和刑讯，不到一个月就被折磨死了。也是在江青的唆使下，戚本禹策动中南海里造反派贴朱老总的大字报，诬蔑朱老总是“黑司令”、“大军阀”。在 1966 年 11 月的一个夜里，在中南海、全国妇联、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打倒康克清”的大标语。戚本禹还到人民大学去煽动，透露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曾给朱老总当过秘书，要造反派通过搞孙泱的问题，“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一夜之间，在人民大学校园内外，贴出了许多“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在 1967 年 2 月初，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开始组成“揪朱联络站”。1967 年 3 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来头很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对刘少奇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刘少奇是什么“假反帝、真投降”，“日夜梦想着复辟资本主义”，“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而是“假革命”、“反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戚本禹因此声名大噪、红极一时。与此同时，戚本禹还唆使韩爱晶等人贴“打倒陈毅”的标语，在首都组成“批陈联络站”。1967 年 4 月，戚本禹在陪同陈伯达接见“批陈联络站”等组织时，鼓动说“外事口的盖子还是要揭开”。一时间在外事口、外交部等单位又掀起了揪斗陈毅的风。1967 年 7 月中旬，彭德怀同志被残酷批斗，也是在戚本禹的怂恿下，韩爱晶等人对彭老总大打出手。

这件事，直到 1972 年，毛主席在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还提起这伙人说：“那时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又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大权被他们夺了，外交部大权一个半月没在我们手中，在那些‘左派’

手中，这些‘左派’，其实都是反革命。现在这些人都在班房里了。”

审查王力关锋后，周恩来重申：“外交部大权属于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周恩来，外交大权还是由我来管。”并严肃地批评姚登山：“你最近到处乱讲话，还作报告，散布什么‘打倒刘、邓、陈（陈毅）的口号。你在外贸部的讲话，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你只是刚刚回国的代办，你这样做，是在和中央对抗。”姚登山辩解说：“我是根据王力同志的讲话精神说的。”他哪里知道王力已经被抓进秦城监狱。

时间不久，姚登山也被宣布隔离审查，。先后下放到湖北、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并继续审查。外交部也开始批左清理内部的工作，抢班夺权的坏头头，一个一个都被抓起来，受到应有的处罚。

12 月 12，周恩来和陈毅，在中南海西花厅，召见回国的数十位大使外交家。在会上，大家一致斥责姚登山的恶劣态度。姚登山在会后被公开逮捕，也投入秦城监狱

也就在毛泽东批示审查王力等人时，1967 年 9 月在江西，他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⑦

在湖南，他说：“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反抗。”但他又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⑧

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这句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如何处理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基本态度。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但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难以解决，急着去解决也解决不了，而现在似乎快到时候了，应该提出批评那些“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的“极左派思想”的时候了。

事后毛泽东对此曾有过评论，10 月 3 日，他会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时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⑨

注释：

①毛泽东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9 日。

②毛泽东同曾思玉、刘丰等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20 日。

③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讲话记录，1967 年 8 月 7 日。

④宗道一：《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文史精华》，1998 年第 11 期。

⑤《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 5 月版，第 483 页。

⑥毛泽东同程世清等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17 日。

⑦毛泽东同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谈话记录，1967 年 9 月 18 日。

⑧毛泽东同努马扎莱谈话记录，1967 年 10 月 3 日。

“文革”期间的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始于“复课闹革命”之后。包括了课改、教法、分配、招生，以及学校的组织领导等一系列内容。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了教育革命的命题和基本原则，信中说，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学生也应该“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此信简称“五七指示”。

此后在经过了学校的大动乱后，开始实施复课闹革命，教育改革提到了日程。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其中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上课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以必要时间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学生要分批进行军事训练，在农忙期间，师生下乡劳动。《意见》中已经提出了中学教育改革问题。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规定》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指出：下厂下乡和外出串连的师生，于3月20日前返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期间，毛泽东对《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作了批示。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

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号召中小学革命师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同日，毛泽东在《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材料中批示：军队应对学校师生进行军训，并参与关于学校的各项工作。要说服学生实行联合。此即“三七指示”。由此，一些高等学校提出了各种各样“教育革命方案”，进行了名目繁多的“教育革命试验”，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形成的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规章和制度。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时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泽东是从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逐步实现“共产主义教育方针”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这一指示，成为中央恢复高校招生工作并进行教改的主要依据。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又向大中小学校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要求学生们不要再外出串联，而要在本校参加斗、批、改，搞教育革命。《人民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发表了若干关于教育革命的文章，公布了有的大学提出的几种教改方案。《人民日报》还特地发起了“社会主义大学如何办”的讨论（1969——1974年）。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课”除外，各高等学校也许没有哪一所是真正复了课的。各校师生投入派性斗争，接受军训，下放劳动和参加本单位斗、批、改。

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三个教育革命的初步方案。12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毛主席论教育革命》一书，各级学校再次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

上已经失去了先锋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良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此后，全国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年先锋队达11年之久。

在教育革命中，最典型的做法是派驻“军宣队、工宣队、农宣队”进驻学校以及厂矿、社队管理学校。军宣队早在1967年就在支左中开始进驻学校，此后，为了配合学校的教育革命，1968年7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此后，按照《通知》各城市大、中、小学以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普遍派进了工人宣传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工作。城市小学进驻“工宣队”，农村小学进驻“贫宣队”，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工宣队、贫宣队人员任主任，实行一元化领导。学生按军队建制，年级为连、班为排，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教改的内容之一是学生的分配。1967年底进行过一次高校毕业生分配，把进校就读年限已满，本应毕业的学生统分到全国各单位。这批学生分赴各单位后，先到工厂、农村或基层接受锻炼（一年或一年半不等），然后回单位参加斗、批、改工作。此后，直到1972年，又陆续进行过几次毕业生分配（包括分配研究生），大体上分配完了高校学生。其中有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1965年）进校的学生，他们在高校业务学习的时间还不到一年。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1969年、1970年、1971年大专院校应届毕业生，从1970年7月份开始分配。通知要求各校要认真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使毕业生服从革命需要，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工矿去，到基层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三大革命的第一线作出新贡献。在大量学生陆续离开高校，高校几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为了不致中断人才的培养，中央考虑恢复高校的招生措施，并切实地进行招生等方面的教改。

与此相适应的市招生制度的改革。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提出了《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进行所谓“教育革命”。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制度，改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规定他们在校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学制缩短为两年至三年。课程设置为：“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文、理、工各科都要参

加生产劳动。”按照决定，一些有条件的省、市和文、理、工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0年春季即开始招收）后来陈伯达和林彪事件发生，在“批林批陈”的形势下，中央继续抓了高校招生工作，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学校增多。

这样的“教育改革”，完全违背教育科学的规律，教师一开始即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被打乱；学校成为所谓“革命”、“造反”的场所，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偏低，加以入学后主要不是学习业务课，教学质量也严重下降；由于不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而主要靠推荐，结果“走后门”上大学成为难以制止的不正之风。

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恢复招生的形势和贯彻“左”倾指导方针的需要，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同志和大专院校的代表共631人。

经过长达100多天的报告、学习和讨论，这次会议通过了由迟群主持起草，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这个《纪要》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全国教育工作强加“罪名”，全盘否定，宣称建国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种完全背离实际情况的“两个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枷锁。

《纪要》充分肯定和赞扬“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错误做法，宣称“工农兵学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并作了若干“左”的规定。《纪要》说，在“当前教育革命斗、批、改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必须进一步“贯彻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着重抓好十个方面的问题。这十个方面的问题包括：

“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要批判资产阶级”；“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工农兵学员是教育革命的生力军”；“教材要彻底改革”；“高等院校调整和管理体制问题”；“中小学教育革命中的若干问题”；“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是

我国普及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必须认真办好"；"军队院校的教育革命，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军队院校的具体情况贯彻执行。"

这个《纪要》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办大学和一切学校的指导文件，产生了严重的恶劣影响。

在教育战线的教育革命"斗、批、改"运动中，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将其作为试点单位总结经验，指导全国。"六厂二校"是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简称。"六厂二校"的经验就是进驻这些厂、校的原8341部队和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斗、批、改"运动中的经验。

"六厂二校"革委会或宣传队经验的根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经验是极"左"的。这些经验得出的最根本的前提是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六厂二校"大体上贯彻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关于"缩小打击面"的批示。与全国许多单位乱揪乱斗、乱打乱关的恶劣做法相比较，"六厂二校"又有"落实政策"的一面。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普遍存在的极端"左"倾的错误。

高校的教学改革（有时称为"教育革命"）是和招生同步进行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成为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毛泽东于1966年在"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各高等学校把这一指示的精神和要求，具体贯彻到了教改各项工作中。

1973年初，国务院科教组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4月3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文件，批示指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根据国务院的这一规定，全国高等学校全面恢复了招生工作。1973年各大专院校共招收十五万工农兵学员，包括把部分在乡知青招进大专院校。

在招收工农兵学员工作中，各地具体做法并不很一致。有些地方搞了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有些地方则主要由基层干部推荐。有的地方较认真地进

行了文化考查；有的地方则是对文化考查走过场。即使在较认真地执行推荐与考查的地方，在掌握推荐的标准与考查的方法上也是不很一致的。推荐的标准虽说主要是看表现，但往往是偏重于家庭出身；文化考查的方法虽然主要是出题考试，但往往可翻书答题（即“开卷考试”）。

在教育革命中，各地还涌现了许许多多的革命典型事件和人物。著名的有辽宁的“白卷先生”张铁生、朝阳农学院“开门办学”和“社来社去”的经验。

“白卷先生”张铁生，诞生在1973年。1973年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保证入学学生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根据这一要求，1973年辽宁省高等学校招生增加了入学文化考查。兴城县考生张铁生系该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队长，他的物理化学试卷答案得六分，他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认为这种考试只利于“不务正业，逍遥浪荡书呆子”，表示自己是“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的人，上大学是自己“自幼的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很明显，张铁生对考试制度强烈不满，他否定现行考试制度，要求有关方面在招生中录取自己。照他看来，只要表现好、认真劳动锻炼的工农兵青年，即使文化程度较低，都应该上大学。

省委书记毛远新得知这一情况后，亲自将原信作了删改，并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1973年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张铁生的信，并在编者按语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为了配合这一宣传，8月2日，毛远新等人在沈阳医学院以突然袭击的方法用本年的高考数学题考56名教授、讲师。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辽宁日报》的按语和张铁生的信，并再加按语，说张铁生的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江青对“白卷”推崇备至，借题发挥，封张铁生“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反潮流的英雄”，借此掀起了高校招生中的风浪，掀起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此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32种报纸先后转载，张铁生上了大学，“交白卷”问题轰动全国，大学的招生考试制度发生动摇。

《红旗》、《教育革命通讯》围绕着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发表署名文章、评论，说搞文化考查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由于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的影响，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对招生的文化考查进行了研究，都觉得不能取消文化考查，但同时也找不出比出题考试更合理的考查办法来。于是，只有继续采用出题考试的方法进行文化考查，只是考试更放得松些，使推荐对象更容易答题，甚至有意放一些推荐对象过关。结果，推荐对象“走后门”的现象迅速蔓延，以致不少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农兵青年进了大专院校，常常是在一个班级中，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甚至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文科推荐对象都不考数、理、化，便宜了少数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工农兵青年进入高等院校学文科。

如果说高校招生中存在着较大较多的问题，那么高校教改的情况则是既纷繁又奇特。其树立的典型是朝阳农学院的开门办学。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后，1965 年 3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农村并农半读教育会议，10 月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12 月召开全国并工（农）半读高等教育会议。由此，全国再次掀起试行两种教育制度，大办并工半读学校的热潮。此前，11 月 17 日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中央批示：半工（耕）半读学校我们今后教育发展的方向。7 月 3 日，毛泽东写信给陆定一，指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建议从学生活动总量中砍去 1/3，使学生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和自由支配的时间。此信简称“七三指示”。

1973 年，朝阳农学院招收工农兵学员后，实行“开门办学”，批判“三脱离”，废除全日制，删砍文化课，组织小分队，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法，并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办法。

1974 年 12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好——辽宁朝阳农学院实行“社来社去”的调查》，并加编者按语说，这是“教育战线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全国掀起宣传和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同年 12 月 21 日至 28 日，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全国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经验现场会。会上宣扬所谓“朝农经验”有：坚持在农村办学、分散办学；教学工作实行“三上三下”；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当农民挣工分等。迟群、毛远新在会上鼓吹朝农经验具有“战略意义”。现场会提出：“学朝农、找差距、迈大步，让朝农经验尽快地在本地区生

根、开花、结果，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975 年 3 月 15 日至 28 日，教育部在朝阳农学院举办第一期学习班，4 月又举办第二期学习班。参加两期学习的有 28 个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 24 个部委的教育部门领导共 162 人。1975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推广朝阳农学院经验和有关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教育部在《报告》中提出 1975 年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实行改革，农业院校一般实行“社来社去”，林、医院校部分实行“社来社去”，其他各类院校可进行“社来社去”试点。同年 8 月，辽宁省革委会决定 1975 年高等学校招生办法是，面向农村的各专业全部实行“社来社去”，面向工业的各专业全部实行“厂来厂去”，其余各专业实行“哪来哪去”。对辽宁的这一做法，教育部于 1976 年发出通知，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加以推广，认为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深入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

根据毛泽东的“学制要缩短”的要求，各高等学校都把原来要学五年、四年的本科，改为学三年。多数工农兵学员本来文化基础较差，进校之后，不少科系还得为他们补习一段时间中学课，所以他们实际学习大学专业的时间不到三年。由于学制的缩短，课程设置就相应从简。各专业砍掉了不少被认为是多余的课程。有的专业几乎把外语也砍掉了（保留的外语课不过是点缀品）。但各专业也适当增开了个别实用课和实习课。

“文化大革命”后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驾驭改革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相应作了调整和改变。为了使学员“学以致用”，课堂教学内容力求删繁就简，只扼要讲述专业基础知识，并且结合现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科学实验来讲解。由于社会上正在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所以各科教学必须尽量结合“批林批孔”；结合不上“批林批孔”的课程，则结合“批判资产阶级”，这是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做到的。然而有一点却很重要，即在教学中提倡用提示、启发的方式进行课堂讲授，并以讨论的方式加深学员对问题的理解，以答疑的方式解决学员的疑难问题，对学习特别困难的学员作专门辅导。有的学校提出对学员不仅要“牵着走”，而且要“抱起走”。不过这样一些用心良苦的教学方法，对基础普遍薄弱的学员来说，作用并不大。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学工、学农、学军”的指示，有关方面提出“开门办学”的口号。各学校、各科系每年要安排一定时间让教师带领学员到

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到军营“学军”（即接受军训和参加军垦农场劳动）。文科学员在“学军、学农、学工”过程中，要兼做一些社会调查工作，要写某些家史、厂史和社史，还要搞点文艺创作。各学校、各科系和各专业对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即“三学”）所确定的时间比例不全一致。

招收工农兵学员和教改的效果并不甚好。多数工农兵学员的业务水平很不理想。他们的基础知识较差，技术操作水平较低，综合分析能力缺乏，仅仅提高了一般文化水平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他们难于胜任经济、文化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工作。

教育改革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违背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基本国情，无论是工农兵掌管学校，还是缩短学制，在工农兵中招生，还是分配的四个面向，都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对此，“文化大革命”前后教育界曾进行过激烈的辩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央恢复了文革前的招生与教学制度，恢复了专家治校的理念，注重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我国的教育走上了符合基本国情的健康道路。

派出“工宣队”、“军宣队”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的倒台，引发红卫兵组织进一步分裂，以致出现了各校的武斗对立，发生了“清华百日大武斗”。在全国实现大联合的口号下，这种对立违背了运动的大方向。“清华百日大武斗”是直接引发派出工宣队的事件，它引起最高领导人的关注，决定派出工宣队。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毕竟是站在前台“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骨干。他们的倒台，使全国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地震，对红卫兵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的地方，对立的两派都指责他们是对方的后台。一些地方的派性分歧更深化了。

“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幻莫测，促使红卫兵中一些有理论素养的人开始寻求自己的答案。有些人开始独立地探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他们写出了一批反映各派独立意识的文章。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反映激进造反派极“左”观点的文章，诸如上海的《一切为了九大》，广西的《今日的〈哥达纲领〉——评“倒旗协议”》，湖南的《中国向何处去——极左派公社宣言》等等。

这些文章，反映了一些红卫兵想通过“文化大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新制度的思想，并且在造反派当中广为流传。这些文章把“三结合”当做“旧官僚复辟”，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路，因而出笼不久就遭到批判。

王力、关锋、戚本禹先后被揪出，红卫兵、造反派被批评犯了错误，使对“文化大革命”怀疑和不满的情绪在一些红卫兵组织中滋长起来。

1968 年 2 月，北京有的高校红卫兵组织就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及打倒陈毅、余秋里等人的问题公开提出异议，认为此事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其中作祟。还有一些红卫兵组织认定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是反革命两面派，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同党。

3 月间，七八个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贴出一批“批倒谢富治”的大字报，

掀起了一个“倒谢”的小高潮。江青把这些动向作为来自右的危险，进行了严厉的训斥。

政治风云的反反复复，越发使群众对不断出现的新动向感到迷惘。他们对运动已失去了往日的主动性。

然而，红卫兵的行动目标混乱，忽“左”忽“右”；而红卫兵头头的权势欲和野心却在扩大。同时，“夺权”斗争的严酷，使派别组织的向心力更强，“以我为核心”已超出了“唯我独革”的宗派团体意味，成为对实际利益的争夺。

经过几个回合的拉锯战，派仗越打越大，积怨越打越深。对立双方已难说有什么是非可言，而是“凡是你拥护的我就要反对，凡是你反对的我就拥护”的混战。联合变成了武力统一。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斗争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厌倦、淡漠，而游离于运动之外，成了逍遥派。

红卫兵忙于内战，“斗、批、改”的任务迟迟不能落实。甚至在工人已经联合起来、全国性“夺权”即将完成之际，一些学校还在激烈地武斗，对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禁止武斗的通告置若罔闻。

1968 年 3、4 月间，北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相继暴发了大规模武斗。以蒯大富为首的“团派”与对立派“四一四”进行了“百日大武斗”。

清华大学的“团派”俗称“老团”，“四一四”派俗称“老四”。

清华大学两派红卫兵，随着利用自办的小报进行唇枪舌剑温度的上升，武斗也开始蔓延。1968 年 4 月，在蒯大富的煽动下，“团派”和“四一四”派斗了起来。

事情起因是蒯大富怀疑“老四”收买了自己队伍中的叛徒，遂命人绑架了两个“老四”的人，并将其毒打一顿，谁知两人“舌头”坚强不屈。于是，蒯大富编造了一份“供词”，让“老团”用来对“老四”进行宣传攻势，以证明“老四”都是一些“支持蒋介石的反动派”。

“老四”毫不示弱，以牙还牙。他们出于同样的目的，也绑架了“老团”的一名“大将”。火终于被点起来了。

4 月 23 日，双方为争一辆救护车，用大弹弓互射达三小时之久。4 月 29 日，为抢夺两辆运送大米的汽车，双方又大打出手。5 月 2 日，一方试图断水，另一方拼命反击，战事又起。

就这样，双方打来打去，互有死伤，全然不顾后果，向对方发出最后通

牒。双方之间的小范围冲突随即被突击队行为所代替，小规模的游击战逐步升级成正规战斗。

5 月 29 日，蒯大富等人开会决定于次日凌晨 3 时攻打东区浴室楼的学生。

第二天凌晨 3 点整，蒯大富亲自跑到清华大学自备电厂，下令拉闸断电。随后，蒯大富又发出攻击信号，下令向东区浴室的十多名“四一四”派人员发起攻坚。武斗残酷地持续进行。

为了制止武斗，整顿学校的秩序，毛泽东指示北京工人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7 月 27 日，为了改变各大、中学校长期武斗、不搞联合的局面，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等数家厂矿的产业工人组成的一支 5 000 多人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的配合下，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工宣队的进驻，使武斗正酣的清华园中的两派暂停了厮杀，调转枪口一齐对准他们，对赤手空拳入校的工宣队进行武力对抗。

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骄横不可一世的蒯大富，根本没把工宣队放在眼里，仗着人多势众，不时瞅住战机对工宣队员进行扭打和撕扯。尤其是那些身体单薄的工宣队员，稍有不慎，便被“老团”揪出，乱打一通。

工宣队在红卫兵的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只得悻悻地打电话到钓鱼台国宾馆，向“中央文革小组”讨教对策。

只两个多小时的功夫，工宣队在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暂时撤回”的答复后，便鸣金收兵，在“红卫兵小将们”的一片喝彩声中低着头离开清华。

然而，五个小时后，重新集结的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战士分七路，再次向清华大学挺进。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手捧“红宝书”，齐声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向红卫兵封锁线进发。这一回，在强大的“攻击”面前，红卫兵真抵挡不住了。他们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很快，他们便溃散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个据点负隅顽抗。

工宣队和解放军战士进驻清华大学后，首先展开宣传攻势，令“老团”和“老四”立即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

在此之前，科学馆的屋顶已被蒯大富部署施放的燃烧弹炸塌。在工宣队的护卫下，“老四”的成员被带到安全地带。“老四”的“守军”，原先的

整整百名战将，已有两名“光荣牺牲”。他们的尸体，在炎热的7月，散发出令人窒息的腐臭。剩下的一个个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头发一尺多长，犹如街上的叫花子一般。

与此同时，蒯大富率领“老团”仍在两个据点拼命顽抗。更有胆子大者，躲在暗处向工宣队打冷枪，致使五名工宣人员不幸饮弹身亡。工宣队员和解放军战士继续向这两个据点冲击。他们头顶着被子或课桌，猫着腰，一批又一批地往里冲。乱石如雨，直砸得桌面砰砰响。

“老团”实在顶不住了。蒯大富三次令“长矛队”打头阵，企图冲开包围圈。

到傍晚时分，除了蒯大富等核心人物突围外，其他“老团”人员不得不打出白旗，与工宣队谈判。

仅7月27日这一天，工宣队基本上解决了“清华百日大武斗”。但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五位工宣队员被打死，伤约700人，失踪143人。

“清华百日大武斗”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鉴于红卫兵已经失去控制，武斗不断，毛泽东对红卫兵大发了脾气。7月28日凌晨3时至8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地质学院的王大宾。毛泽东严肃地批评道：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方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讨论讨论。

毛泽东的批评和警告，实际上是下达了制止武斗的命令。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力地震慑了热衷于打派仗的骨干分子，缓和了学生

中两大派的矛盾，保证了工宣队对学校的进驻和领导。

7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管，并成立了军事管制小组。

8 月 4 日，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给毛泽东呈送了一份北京市进一步宣传贯彻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最新指示即毛泽东在 7 月 28 日接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时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讲话要点。

中央两个布告是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7 月 3 日的布告（即“七三”布告）和 7 月 24 日的布告（即“七·二四”布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7 月 3 日发布的布告中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委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 7 月 24 日发布的布告中说，最近以来，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周恩来对北京革委会、北京卫戍区的报告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报告指出，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泽东“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的工作中，军队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对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修改后的报告指出，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参照广西等地的经验，中共中央对下一步的工作拟作新的安排。

这些安排包括：北京驻军、北京卫戍区已组织几万人至十万人的宣传队，深入到大学、工厂、街道、农村等处，发动群众，宣传、落实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中央两个布告；宣传工作要点面结合，重点抓好大学和几个问题多、影响大的工厂、机关、招待所；抓好典型；发动三军采取适当形式大力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共同组成领导小组，加强领导；这次群众运动要与准备国庆节的治安工作结合起来，持续保证首都安全和革命秩序。

毛泽东表示同意报告上的安排，并建议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郑维山参加领导小组。毛泽东还指示，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

8 月 5 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个人对他们行动的支持。8 月 13 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并于两天后接见了驻清华工宣队代表。

8 月 8 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①]

为什么这时又要派出工人宣传队呢？首都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时这样解释：“现在北京的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②]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一搞武斗就说对方是国民党，这个我也是罪魁祸首，说是国民党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但是说人家是国民党要查明有据。所谓国民党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8月22日，毛泽东批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原来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把它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在审改时加写道："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中说：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而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显著的成效，在全国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阻止失控的武斗事件，红卫兵被再度限令回校搞运动。但是，结合干部、军队"支左"、建立革命委员会、对各地和社会上的各派别的支持、各自的依靠力量的变化等问题和红卫兵头头的权力欲的膨胀，都使派性分歧无法调和。

在许多学校里，两派学生各自盘踞一方，武斗不断。这和全国逐渐平息的局势形成强烈对比，"红卫兵运动"走到了它的发动者所要求的反面。工宣队入校"领导一切"，宣告了红卫兵使命的完结。

到9月5日，全国最后两个省级革命委员会——新疆、西藏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欢呼声中，"文化大革命"开始从全局上转入"斗、批、改"阶段。

随着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学校逐步被管了起来。稍微正常一点的秩序的恢复，使红卫兵这类以造反为宗旨的组织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工宣队在驻进学校以后，拆除了武斗工事，收缴了各派武器，制止了武斗，使各校内战停止。因此，工宣队进校，虽然仍然执行"左"的一套政

策，但它客观上制止了武斗，结束了学校长期无人管理的局面。这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从此走向下坡路。

在工宣队的主持下，各校都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两派组织“斗私批修”，按系别班级实现“大联合”，成立或调整了校级革命委员会。工宣队实际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工作组未能起到的作用。

红卫兵由造反的“天之骄子”转而成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

中共九大前后，各校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了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教育革命等项工作。广大师生们“以《五·七指示》为纲”，搞开门办学，建立学农学工基地。一度在“文化大革命”中活跃非常的红卫兵头头受到了审査，许多“老造反”受到打击，只有少数人“结合”进了学校革委会。大部分学生已无心在校，只想“斗”、“批”、“走”，及早分配。

总之，毛泽东在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下作出了重要指示，各地采取了切实措施，终于使内乱夺权之风、打砸抢之风有了一定的遏止。

1967 年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驻沪陆、海、空三军奉命组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军宣队），介入上海地方“文化大革命”运动，进驻部分重要单位、市郊各县和大学，实行军管、军训。

1968 年 7 月，北京市经毛泽东同意，成立“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等单位，制止派仗，促进联合。张春桥利用这一时机，同王洪文等人密谋，提出上海抽调工交系统的“工人代表”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全市重要单位，选拔标准为“造反要早”、“敢于斗争”，“主要看现实表现”，共挑选了 128 人，称为“128 个工人代表”，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亲自接见，集中学习。7 月 28 日，市革会成立了“工宣队领导小组”，由王洪文、陈阿大负责，为工宣队全面进驻各单位作准备。

同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同日，姚文元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宣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

从 1968 年 8 月～1969 年 1 月，由九万多名工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全市 1 971 个独立单位。由张春桥、王洪文等人选定的“128 个工人代表”也以工宣队员身份于 9 月 1 日进驻市革会各部门和区、县、局重要部门参加领导

班子，实行所谓“掺砂子”。张春桥规定，这批人的职务非经他同意不得变更。10 月，张、王还借口“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将市革会“工宣队办公室”扩充为第一、二、三、五、六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宣、文教系统，第二办公室主管全市 10 个区，第三办公室主管科技系统，第五办公室主管市郊各县，第六办公室主管财贸系统，并从“工总司”委员中抽调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 26 名帮派骨干分子（占“工总司”委员总数 60%）担任这些办公室的负责人。还将市革会原有组、办同工宣队办公室对口合并办公，使王秀珍、戴立清、黄金海等人成为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工总司”系统先后进入市革会各组、办以及区、县、局等单位担任领导的达 168 人。

在工宣队大规模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军宣队也进驻全市基层单位。驻沪三军先后共派出 1.9 万余名官兵，进驻全市 1 800 多个单位，开展“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

1970 年起，进驻各基层单位的工宣队，随着各基层单位革委会的建立，除文教、科研系统之外，都逐步撤离。到 1974 年，全市尚有工宣队员一万多人，未从 18 所大学、1 516 所中小学、202 所医院、30 所市属科研单位撤离。

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根据这一指示，至 1975 年 3 月，进驻全市各单位的军宣队全部撤离。

粉碎“四人帮”后，根据 1977 年 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全市工宣队全部撤出进驻单位。

注释：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 年 8 月 8 日。

②温玉成向毛泽东汇报的记录，1968 年 8 月 17 日。

“上山下乡”与创办工人大学

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等学校、高等学校即“停课闹革命”。高等学校停止招生达四年之久。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大、中学校积压在校的老三届毕业生相当多，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对红卫兵影响最直接和关系最大的是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它使红卫兵不得不从革命狂热的云端回到分配去向的现实土地上来。

早在1966年，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全国一片混乱。1967年，“一月风暴”横扫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逐步实现。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停止串连、“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是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已经使红卫兵分不清是非界限。“革命到底”使他们滞留在社会上与各机关单位的造反派一起冲击各个部门，由于派性斗争，武斗连绵不断。

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大、中、小学复课。但各地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一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学校还积压六六届、六七届两届毕业生。

10月22日，教育部关于复课的材料中，把毕业生问题当做亟待解决的问题。材料反映说，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当年的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到1968年，中学滞留在学校里的有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共三届高初中学生，又称“老三届”，约1 250多万人，大学也有数十万之众。

老生出不去，新生进不来，几年积累的三届毕业生很快就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毕业生的分配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1968 年 3 月 19 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上，总结了从 1967 年 9 月开始进行的 1966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报告中说，这些经验主要是：

一、在大专毕业生分配方向问题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分配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使毕业生真正和群众相结合，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二、在毕业生思想教育问题上，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带着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活学活用“老五篇”及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系列最新指示，并通过阶级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在贯彻群众路线问题上，打破过去那种少数人冷冷清清坐在屋子里，大搞神秘化的分配办法，在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及毕业生分配、调配工作机密的原则下，将有关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群众，然后用各种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四、在毕业生分配权力机构问题上，在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同时，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保证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于 4 月 4 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学生的毕业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而且有大量中、小学都存在这个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当天转发了这个报告。

毛泽东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毕业生要“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学校对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大批学生离校，部分学生升级就读。

1968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分配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通知，对 1967 年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去向做出安排。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严重衰退，给这个社会带来深刻影响，也波及学生分配问题。

1967 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近 10%；1968 年在 1967 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 4.2%，只相当于 1966 年的 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无法容纳如此庞大的劳动大军。

一代“文革”的弄潮儿，“革命造反”的先锋军，此时竟然弄到无法解决自身出路的地步。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无论去军队农场，还是去工矿企

业，都有固定工资。而更广大的高初中学生，只能去边疆和农村了，“四个面向”只剩两个了，即面向农村和边疆。

从1968年的七八月间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全党都要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2月22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毛泽东的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上山下乡”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

此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所谓“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以“反修防修”为号召，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一场大规模运动。

在“反修防修”、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号召下，老三届的高初中学生相继离开城镇，上山下乡，奔赴农村、边疆，安家落户。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山下乡运动其实是20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运动的继续，只是由于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学校的学生没有正常流动，才使这一运动来的更宏大，汹涌澎湃。

早在20世纪5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已经出现过。1956年1月，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事实上，这里已经把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上山下乡”。以后，这一提法一直被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识青年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中国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早在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的社论。社论明确提出了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这篇社论说：

“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

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

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编者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

同时，毛泽东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人民日报》社论，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

由此可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与这时的中国人口众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大批更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等历史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中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农村正在组织合作社，400万个合作社的建立确实需要大批的会计人员、技术人员、教师等。这些年轻人下到农村，对于发展农村、解决农村文盲过多、人才空白的一系列问题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城镇就业的负担过重的问题。

从1955年起，共青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到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才7.9万多人。这表明，此时下乡的工作还是比较慎重的。

之后，在1958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了下来。其中，在这些下乡知识青年当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到了开

拓者的作用。

到了20世纪60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中国这时在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

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中国国情的影响，由于中共中央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的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

这一时期，在一些地区由于安置政策不够落实，一些下乡青年的生活发生了困难，思想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波动，甚至出现了下乡青年受迫害的情况。不过，从总体上来讲，这一时期的政策还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中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到20世纪60年代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几年积累的三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

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性质已超过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从而使得社会动荡更加严重，社会局面更加十分混乱，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而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

法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

毛泽东要想结束“文化大革命”，要变大乱为大治，解决这些青年学生的出路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赋予了此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20世纪5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互区别的一个重要特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虽然宣传上还是以发展农村为一个目标和作为下乡的理由之一。但是事实上，这时农村的公社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对于会计、出纳、小学教师的需求量已经基本上能自身解决，这些下乡知识青年真正到农村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已不超过20%。

知识青年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在田里干活。但是城里青年根本没有农业生产经验，因此这些知识青年不仅不能给农村增加劳动力方面的补充，相反却大大地增加了当地农民的劳动负担。

另外，多数知识青年在“文化大革命”时所下的乡都不是农村最贫困和最落后的地区，而是到农村较发达的地区。有的则到建设兵团和国营农场。这些都表明，“文化大革命”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不是把发展农村作为主要的目标，而重在所谓的“再教育”。

由于在此期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因而，在上山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有些地方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识青年场队，发展多种经营，却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有的地区把大批知识青年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识青年花费上千元。由于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表示非常担心中国的第三、第四代会“变修”。1965年11月，毛泽东在谈到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机关，没有受过锻炼时说道：“就是这批人出修正主义。”

1967年，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讲道："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同年2月3日，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希尼斯·卡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谈话。毛泽东讲道："现在红卫兵帮助我们，但也有不可靠的"，"大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我是怀疑的，特别是文科，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就要变修正主义分子了，搞修正主义了。"

毛泽东认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对学校里的教育不放心。他认为把知识青年放到农村去，接受群众的再教育，就可以洗掉身上的"灰尘"，成为新一代可靠的接班人。

同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又可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而消灭三大差别是共产主义实现的重要特征。于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变成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战略部署"。

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区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

从1968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下到农村和边疆的大中城市"老三届"毕业生有400多万人。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大批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许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地反映到中共中央。

后来，到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应当统筹解决。"

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中共中央于当年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研究制定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但是，"规划"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定

出“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

1976年2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识青年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这个问题也未能有效“解决”。

197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197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识青年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来能解决”，这就是对这种大轰大嗡、没有长远整体规划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本就十分困难的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历史性“人才深谷”。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致使在现代化建设中，中国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教育，并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破坏了许多教学和科研机构等做法；而另一方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地方的中学被停办，大部分学生得不到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

据统计，从1968年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共达1 623万人。

多年后，尽管知识青年中的一部分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但是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再加上“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广泛流行，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长时间来中国教育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使中国人才整体上在一个时期内，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成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易跨越的障碍。

这一切事实证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但没有像“文化大革命”

中所宣传的那样，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且拉大了中国与正处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其次，“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识青年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支出了100多亿元的经费。国家用于知识青年农场的投资达到46亿元，这些农场不仅未给国家经济增加收益，却亏损达32亿。有的农场乱砍滥伐，使生态失去平衡，造成严重的后果。

到了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十年浩劫后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还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

对于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各地农民是当做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形成了知识青年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多数插队知识青年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五元。这对于多子女下乡的家庭来说，负担尤其严重。许多知识青年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知识青年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识青年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提前步入社会生活。上山下乡的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了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他们对于农村和农民有所了解，并且逐步感受到和继承了中华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

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下乡的知识青年由于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使其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这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

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质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正确地实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思想上、精神上、个性上健康地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

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然而，这种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生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发生了“信仰危机”。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政治运动的特点，对于这种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做政治运动来搞的做法应该给予否定。但是，必须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

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他们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并建设着一些农场。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这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创办社队企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知识青年中还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苦涩的插曲，给中国社会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运动与其他运动一起，使中国已经混乱不堪的局势更加雪上加霜。

“全国山河一片红”

自上海的“一月夺权”以后，1967 年一二月间，由上到下夺权成立了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五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北京市于 4 月 20 日成立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其他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成立遥遥无期。这是因为“大联合”、“三结合”问题没有解决而成立不了。名曰自下而上地对省、市、自治区领导机构的“夺权”，实际上乃是自上而下的“夺权”。这种自上而下的“夺权”由于遭到造反组织的冲击，很快就夭折了。因而，中共中央不得不对一些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或指定以军队干部为主的若干人员组成“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实施领导。

3 月 15 日，广东省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为黄永胜。

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为了扭转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单位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经请示周恩来后，向中共中央写出《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

聂荣臻在报告中说，据了解，国防工业各部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许多单位领导瘫痪，研究工作陷于停顿，三线建设也存在许多问题。这种情况必须迅速予以改变。

聂荣臻还在报告中建议对这些单位实行军事接管，接管工作由国防科委组织进行。按照“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的精神，迅速恢复科学和生产工作。

同时，聂荣臻在报告中分析说，接管后，将遇到“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强烈提出的改变现行领导体制的问题，建议一面恢复生产，一面着手将国防工业部门及中国科学院的有关国防科研机构，结合“批改”，通盘考虑，进行一次全面的适当的调整和改组。聂荣臻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五条调整改组的原则。

3 月 18 日，周恩来为此向毛泽东等写报告说，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经与有关同志商量，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每一部门只派出三个人的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革命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分别处理，以便最后实现各部门的革命“三结合”。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报告中还提出，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并基本同意他所提的调整改组原则，待方案商定后再报批。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毛泽东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也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商定后将分别报批。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报告中所提建议表示同意。

3 月 18 日，鉴于中共中央调查部三局因两派争斗致使业务工作停顿一事，周恩来立即派杨德中从中央警卫团中选派三个负责人去调查部三局，宣布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周恩来还建议对调查部也实行军管，并请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三人至五人的军管代表小组。

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指出，军管代表小组的任务是保证该局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决定》指出：

一、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由沈阳军区派驻大庆地区的部队，组织大庆油田军事管制委员会，向油田所属各生产指挥部、各重点单位、各重要居民区派出军事代表，实行军管。二、油田军管会受沈阳军区和石油工业部双重领导，主要任务是接管油田的党政权力，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镇压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油田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三、油田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劳动纪律，勇挑革命和生产两副重担。现在尚在外地串连的职工，要迅速回到生产岗位。四、要迅速健全和改组各级生产业务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五、驻油田的外地师生和外单位职工，应立即回本校、本单位闹革命。六、大庆油田半工半读的学

生，都要回原生产单位和本校复课闹革命。要遵照毛主席“五·七”指示，以学为主。七、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正确对待干部。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教育、团结他们。八、职工家属应努力搞好春耕生产，争取今年农业丰收。

3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中说：“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2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中说：“安徽一月二十六日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立即成立以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编者注）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4月1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中说：“成立以滕海清、吴涛二同志为首的内蒙古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5月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中说：“由新任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

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了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的《五一二命令》。《命令》指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了彻底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的盖子，把坏人揪出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要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所属运动系（队），由所在地区、省军区接管；各航空俱乐部（包括飞机、器材）和滑翔机制造厂由各军区空军接管；各航海、潜水俱乐部（包括船只和航海器材）由海军各舰队接管；各无线电俱乐部（包括通讯设备、器材）由各军区通讯部门接管；各射击、摩托俱乐部由各大军区、省军区、军械部门分别接管。

同一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在《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中说：“中央决定对甘肃实行军事管制，以冼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编者注）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主

任”。

5月13日1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党委在给中央军委、全军“文革小组”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当中这样说：

兰州地区当前的文化革命形势仍然是大好的，一些左派组织已组成“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这是甘肃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联合。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继宗等领导干部已表态支持“红三司”，因此“红三司”决定结合他们。我们认为，应以“红三司”为核心，通过进一步对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促进“三结合”，建立甘肃省革委会。军区党委经过讨论，认为应该明确表态支持“红三司”，请速指示。

5月14日，毛泽东就甘肃问题又批示：“胡继宗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的冼恒汉、詹大南等20多位负责人和胡继宗等被召到北京，就甘肃问题进行座谈，并产生了《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

这个《纪要》指出，鉴于“红三司”成立和胡继宗等已站出来，兰州“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大家认为甘肃省可以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了这个《纪要》。

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7月25日，林彪提出：“要战斗！要突击！要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被“砸烂”后，被实行军事管制。

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中说：“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

正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没有发生较大的动乱，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时，人民解放军才可能有效地对全国公安、法院、铁路、航运、港口、邮电、广播电台、报社、银行、体育、机要、国际机场和重要仓库等系统实行军事管制，以稳定混乱局势。

号召“夺权”后，毛泽东说，要于1967年2月、3月和4月看出眉目，1968年看出结果，或更长一点时间。所谓2月、3月、4月“看出眉目”，

就是1967年2月、3月、4月建立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但是，到了1967年底，全国才成立了九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委会（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于8月12日成立，刘贤权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于11月1日成立，滕海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天津于12月6日成立革命委员会，解学恭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还有20个省市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

由于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省和各主要城市建立革委会经历的时间比预料的长得多。由于老干部们不情愿与曾数次冲击过他们的这些“小字辈”在一个委员会工作，“红卫兵小将们”也瞧不起老一辈的革命者。毛泽东倡导的“老、中、青三结合”、“大联合”的革命委员会，在组建过程中困难重重，颇费周折。理论上应由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组成的革委会，实际上主要由当地起领导作用的军队干部组成，而红卫兵和老干部在革委会中占的比例很小。

1967年12月26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汇报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关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江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应予批准。毛泽东阅后表示同意。

1968年1月5日，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次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两篇稿子发表在1月7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

1968年1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表明了他对局势的估计。社论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①]同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2月12日整理的《主席指示》中记录道：“总理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主席说：‘凡破坏铁路，就消灭。”’记录还谈到反对派性的问题，写道：“主席说过，清一色是没有的，世界上就没有清一色的事情。要清一色这种观点就是派性。陷到派性中去就麻烦了，要超脱派性。错了就检讨，没有关系。可以作深刻的检讨，可以承担责任。不管是党、政、军、民，都是军队负责。”[②]他希望由

军队出面作检讨，承担责任，消除隔阂，早日实现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个讲话记录，传达到军一级和军区机关有关部长。

从1月22日至28日，“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连续召开，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湖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1月24日，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冼恒汉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刘建勋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河南省负责人文敏生、赵文甫被点名“打倒”。

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雪峰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河北省负责人林铁被点名“打倒”。

2月5日，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思玉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湖北省负责人王任重被点名“打倒”。

湖北省革委会成立后，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在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关于目前我省各专、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中说，全省八个专区已有六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77个县、市已有49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报告》中还谈了军区实现“大联合”、搞好“三结合”的几点体会：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运用上筹下联、上带下促、上下结合、互相促进的方法；军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周恩来于2月8日在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转发的批语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研究这个报告中的几点体会，参照执行。

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黄永胜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广东省负责人陶铸被点名“打倒”。

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王淮湘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吉林省原负责人赵林被点名“打倒”。

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许世友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陈光被点名“打倒”。

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南萍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浙江省负责人江华被点名“打倒”。

3月30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一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干、群代表共八人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汇报了湖南省关于革

命委员会的筹备情况。会后，周恩来将会议讨论结果报告了毛泽东。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请示报告当中每讲到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时，都分别点了杨成武（原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在当年3月份“杨、余、傅”事件之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张平化（原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的名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同意这个请示报告的批语当中，也点了张平化的名字。

周恩来在送审时，将中央批语稿上加上一个注释说：“中央文革碰头会和湖南省革筹小组代表均主张点张平化的名，可否，请主席决定。”“第五页还有两处，请主席决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点的人名，并批示：“建议在这个文件上，杨成武、张平化均不点名，留有余地，将来要点也不迟。”

毛泽东很看重普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这件事，把它看做稳定局势、着手建立新体制和新秩序的关键。3月间，他提出：“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他还说：“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③]这些话，在稍后不久的“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以黑体字刊出，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4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湖南省负责人王延春被点名“打倒”。

从4月份起，周恩来投入不少精力，一个省一个省地帮助他们制止武斗，推进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使一些经历了长时间“内战”苦难的地方社会秩序能相对稳定一些，并使一部分老干部重新站出来参加领导工作。

4月16日，宁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康健民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宁夏负责人杨静仁、马玉槐被点名“打倒”。

4月18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德生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安徽省负责人李葆华、黄岩被点名“打倒”。

5月1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李瑞山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

陕西省负责人习仲勋、刘澜涛被点名"打倒"。

5月10日，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陈锡联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辽宁省负责人马明方、顾作新被点名"打倒"。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张国华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四川省负责人李井泉、廖志高被点名"打倒"。

对毛泽东来说，他这时关注的重点仍放在制止武斗、实现"三结合"的大联合上。但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毛泽东认为有阶级敌人在作怪，于是号召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以便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完成三结合。

到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3月到6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但还有云南、福建、广西、西藏、新疆五个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没有建立，原因是这些边远地区的情况更为错综复杂，各种矛盾交织，导致两派长期对立，武斗不断加剧。其他有些地区的武斗也仍在继续。

对此，毛泽东深深感到，必须用更大的决心，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这种造成严重灾难的派性武斗。7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称为"七三布告"。

但是，一些地区的武斗并没有因"七三布告"的发布而停止下来。7月24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再次发出《布告》，称为"七二四布告"。

"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相继发表，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使国内紧张局势得到明显缓解。

紧接着，毛泽东又采取一项大行动：直接找北京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的头面人物谈话，对他们发出十分严厉的警告。

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学生不信任他，本派的大部分不信任他，只有几百人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④

随后毛泽东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的单位，促进大联合，实现"三结

合”。8 月 19 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又谈到高等学校的问题。他说：“要依靠教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或者解放军少一点工人多点，或者一半一半，但一定要有工人。”

此后，形势发展得很快。8 月 10 日、14 日、20 日、29 日和 9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

8 月 13 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谭甫仁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云南省负责人阎红彦、赵健民被点名“打倒”。

8 月 19 日，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韩先楚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福建省负责人叶飞、范式人被点名“打倒”。

8 月 26 日，广西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韦国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广西省负责人贺希明、谢五岗被点名“打倒”。

9 月 5 日，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同时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曾雍雅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原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周仁山、王其梅被点名“打倒”；龙书金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原新疆负责人武光、吕剑人被点名“打倒”。

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实现了“全国一片红”。

9 月 7 日，北京举行了庆祝大会。同一天，为了庆贺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宣告了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阴谋的彻底破产”。“全国山河一片红”，“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我们一定要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主动地向阶级敌人发动猛攻，认真清理阶级队伍，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隐藏在阴暗角落里从事捣乱和破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显而易见，这篇社论既对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盛况”予以高度赞扬，同时也提醒了“革命造反者”，在那“红”色的山河里还暗藏着一些“黑”色的渣滓，需要人们去“清除”，因此斗争还没有结束。

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武斗一直延续到1969年底至1970年初。这时驰名全国的保定地区大规模武斗持续时间更长。

由林彪、江青等人挑起的武斗，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混乱，对立派别之间视如仇敌。在武斗中献出生命的人被各自的派别追认为“烈士”，并在自办的小报上大加宣扬，而对立派却又称之为顽固不化的“反革命”。两派对立的急剧加深，给了林彪、江青等人以可乘之机，也为林彪、江青等人提供了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逐渐实现其篡夺党和国家更大权力的可乘之机。

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各部门各地方和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

对此，党史学界认为：“‘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地方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些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是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立刻又被那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经过二十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注释：

①1968年1月1日《人民日报》。）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②《主席指示》，1968年2月12日整理。

③《人民日报》，1968年3月30日。

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兴办“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是为了实现干部与工农相结合而采取的组织形式。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只是没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劳动形式。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他认为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试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

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1965 年元月 29 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一封信和毛泽东的这个批语。陈正人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虽然都带有时代的烙印，比如“阶级斗争”、“当成资产阶级被打倒”。但领导干部不能搞特殊化，领导干部与群众生活距离要缩小，干部与群众关系要拉近，要到群众中去，与群众“三同”，拜工人为师，学一两门手艺，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当外行。这些主张闪耀着真理的光芒。而且主观愿望是为防止干部的蜕化变质也是好的。

此外，毛泽东在 1964 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就在这时，林彪寄来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他批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并认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

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文化大革命”中的最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建立革命委员会。它强调“文化”领导，强调机构精简，使机关干部的安置成了一个大问题。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同时宣布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毛泽东决定，在这些机构中也要成立革命委员会。

在建立中央各部委的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泽东也考虑到了精简问题。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时，加了一个按语，按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建立革命委员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实际上，那时地方都已经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毛泽东此时所说的“精兵简政”，主要是针对中央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来说的。机构精简了、干部编制压缩了，多余的干部怎么办？毛泽东于1969年1月指示，干部要下放劳动。在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机构精简的原则。在精简原则和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下，中央开始全面考虑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设立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确定：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的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的干部编制总数压掉82%，27个部委干部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实际上，原干部留用少于18%，因为军管的军队干部和后派来的军队干部占了一定的编制）。各部委均建立革命委员会。在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一些部委被保留；一些部委进行了合并，成立一个新的部级机构；有些部委被撤销。这样一来，在中央机关里，富裕出来的干部数量就更多了。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的精简，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机关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的精简。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大量精简。精简之后，多出来的干部数量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如何安置精简出来的干部，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打倒的干部的安置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批

斗干部的热潮过去之后，有大批干部被关进了“牛棚”。但是，当各造反派把注意力转向争夺本单位、本地区领导权时，大家谁也顾不上管“牛棚”了。何况谁管“牛棚”谁就要花费人力，还要承担被关押者自杀或者逃跑的风险。于是，各造反派开始相互推来推去，最后谁也不管了。被关在“牛棚”里的干部到底往哪儿安置？这是一个大问题。当时，许多地方的负责人，包括接管一些单位权力的军代表、工宣队负责人，都纷纷向上反映这一问题，请示如何处理关在“牛棚”里的干部。这个问题自然逐级地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一时也拿不出一个好办法来。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大批被精简的干部等待安排，一大批被关进“牛棚”的干部等待安置的问题。

这时黑龙江省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想办法，他们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1968年5月7日，在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了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这个材料最初在1968年9月29日《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上发表。

经验材料中说：办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干校共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第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目前，干校耕种土地3 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工厂、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姚文元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对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报上来的材料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加工修改，定题目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这个由姚文元写的按语说：毛主席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的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姚文元写好这一按语后，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兼有"改造"和"锻炼"轮训干部的两种功能。"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五七"干校也分为几类：有的以农为主，有的以林为主，有的以牧为主……各地的"五七"干校还办有加工厂，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还搞了不少副业生产。各地办的"五七"干校，大多建在当地条件较好的地方。这样，当年或第二年，即可以实现生产自给。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

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说得更明确：“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这些话所表达的含义是：包括通过造反当上革命委员会领导干部的人，也要下放到“五七”干校去劳动。在造反派眼里，他们到“五七”干校，不是去“改造”，而是去“锻炼”。他们认为自己只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要求——为了“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才去“五七”干校的。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并且在开始，一点回城的希望都没有。他们在干校里，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劳动。连年老体弱的人，每天也要去干那些很重的体力活。他们的子女到了一定年龄，也要参加劳动。这部分人中，有些仍然有亲属在城市，但他们一年也难得回城一次。其他一些干部，则是以向贫下中农学习，实行三同名义轮训来的，许多科技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在“五七”干校那种条件下，也只能干体力活，而不能从事专业研究和创作，他们的大好年华就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单调的生活中消逝了。一般来说，除了“牛棚”里的干部外，其他干部去“五七”干校，是定期轮换的。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半年一年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1971 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 年底至 1972 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

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原来住满了人的宿舍空了一大半；农业机械闲置在那里生满了铁锈；牲畜也没有人喂了，有的干校干脆把牲畜大批杀掉吃肉；还有的干校将所办的小工厂停产；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做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各种学习班的场所，但当各类学习班一结束，“五七”干校就又呈现出一派冷清景象，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着揭批“四人帮”的深入，许多人都说，办“五七”干校是“四人帮”迫害干部的手段。中央虽然没有对此下结论，但各地各级的“五七”干校却更加冷清了。不少“五七”干校把土地划归当地公社耕种，而他们办学习班时，则大多在城市里找机关会议室来开办。在“五七”干校工作的干部，也大多把家属安置在城里，他们本人则成了不经常去干校上班的“通勤干部”。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办好各级党校是我们党的一项重要事业。不但要把党校办成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坚强阵地，而且要把党校办成一个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

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各省、地（市）、县的党校也陆续恢复招生办学。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有的则是在原“五七”干校教职工的基础上，扩大人员后，复办党校。

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斗、批、改”运动

所谓“斗、批、改”，就是指：“斗”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为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为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斗、批、改”以“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为标志，以党的九大为分界，形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所谓经过斗争成立大联合的省、部级革命委员会。第二阶段是在各级各个领域全面进行阶段。

“斗、批、改”是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就号召红卫兵要搞好学校的“斗、批、改”，随着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斗、批、改”走向各个领域。1966年底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强调“斗、批、改”，他说：斗、批、改，改什么？光在文化部门、机关学校改，改些什么？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改些什么？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工矿农村还是老一套，那还改什么呢？那就没有目标了。1967年元旦社论明确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但由于在全国的打倒、夺权运动的出现的派性与武斗，“斗、批、改”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正常进行。毛泽东认为1966年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和工矿企业的“斗、批、改”由于派性斗争，都没有落到实处。在全面夺权，派性武斗激烈进行时，毛泽东提出了“斗、批、改”的目标是革命的大联合，并以“斗私，批修”的口号，推动革命的大联合。直到各地的革命委员会陆续宣告成立前，“斗、批、改”才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比较统一地按照既定目标开展起来并形成了运动。

对此，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以政权问题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为根本

问题。

1968 年以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开始落实毛泽东倡导的“斗、批、改”。辽宁省走在了前面，比较有代表意义。1968 年 8 月 23 日 ~9 月 6 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常委会议，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一切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坚决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的初步安排》。同年 10 月 14 日至 31 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了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第二次（工交战线）会议。交流了工交基建战线落实毛泽东主席指示，认真搞好“斗、批、改”，促进革命化的经验。10 月 10 日，省革委会下发《关于目前工矿企业斗、批、改的意见》的文件。11 月 2 日至 17 日，省革命委员会召开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第三次（农业战线）会议。总结了搞好以整顿社队班子为重点的农村“斗、批、改”运动的经验，讨论了全省农村今冬明春搞好“斗、批、改”的安排。12 月 19 日，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斗批改的几个问题》的文件。

为了制止派性斗争，推动“斗、批、改”，毛泽东还专门接见了搞派性斗争严重的红卫兵领袖，严肃批评了他们不搞“斗、批、改”，只热衷于武斗的问题。

1969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阶段的开始，也是“斗、批、改”运动更加深入全面展开的阶段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充分肯定“文化大革命”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的任务。这就使得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左”倾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继续向前推进。

九大前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台湾省外）均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对此，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说，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但是“革命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需要继续前进，认真搞好“斗、批、改”，“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8 月 25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了《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

九大的政治报告认为，“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精简机构”，在工厂

里还包括“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

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首先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九大政治报告说，要深入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按照毛泽东 1966 年的《五七指示》，把新中国真正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中共九大认为，这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一条根本原则。

为此，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重叠的脱离群众的行政机构，压制、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繁琐哲学，讲究排场、追求形式的地主资产阶级作风，都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其他组织，都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密切联系群众，首先是密切联系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等基本群众。新老干部都要经常扫除官僚主义的灰尘，不要染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要坚持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要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解剖一个到几个麻雀，不断总结经验。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斗私，批修”，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工人阶级和它的巩固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的斗、批、改的政治舞台。”“‘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总结领导上层建筑斗、批、改的经验，把这条战线的仗打好。”

中共九大确定“文化大革命”深入进入“斗、批、改”阶段，而“斗、批、改”的第一步被确定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指在同走资派斗争的基础上，建立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县以下的公社等基层单位，普遍建立有革命干部代表、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参加的革命委员会。

然而，由于此时各地严重的派性斗争，勉强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大

抵只是形式上的联合。实际上，各级革命委员会或是一派掌权，压制多数；或是两派、几派分权，互相拆台。一些地方的形势因此更趋于复杂化。

“斗、批、改”的第二个内容是“大批判”。在进行“斗、批、改”的各项工作中，各地都一再强调“大批判开路”。

关于“大批判”，《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于1969年8月25日发表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认为不搞“大批判”不符合思想战线上的“实际情况”，实质上“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表现”；不搞“大批判”，只能“帮助一小撮阶级敌人迷惑革命的人民，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率领广大革命群众去完成斗、批、改的任务”。

社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一直贯穿着“革命的大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均为批判的对象。

社论认为，“大批判”的内容还包括“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违反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右的或极‘左’的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大批判”促进了各个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进”。

社论说：现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继续，我们进入了在各个单位认真搞好斗、批、改的阶段，无产阶级世界观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在各个方面更深刻地展开了。当形势正需要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有力地批判各种阻碍斗、批、改的反动思想的时候，怎么能够说“大批判搞得差不多”了呢？事实上，尽管一小撮阶级敌人经常变换口号和形式，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决不应当停止。

社论指出，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不破不立，这是革命的真理。不用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不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无产阶级就不能真正占领思想文化领域的各个阵地；已经占领了，如果不继续开展革命的大批判，这些阵地就有被资产阶级重新夺过去的危险。毛泽东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为了真正

实现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必须抓紧大批判的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革命大批判”的锋芒应指向这样一些地方，即“要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要批判党内、革命队伍内部违反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各种错误倾向和错误思想，加强无产阶级党性，肃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继续促进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革命大团结”；“要批判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

事实上，“大批判”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无论干什么，总是先搞“革命大批判”，先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时期，报刊上着重批判了四个问题。即批判所谓的“黑六论”，历史上的“罪行”，“人性论”、“唯生产力论”。

中国赫鲁晓夫推行所谓“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即“吃小亏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义去腐蚀工人群众，腐蚀党。“六论”的中心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驯服工具论”。前者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妄想扼杀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蜕化变质。后者否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必须继续革命，妄想扼杀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党员蜕化变质。

在全国“大批判”运动中，还包括批判抽象的“人性论”。1970 年 12 月 29 日，姚文元在给毛泽东写的报告中，提出了在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还要批判“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意见”。1971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毛泽东、林彪批语的全文和姚文元的报告。此后，全国报刊掀起了以刘少奇为“靶子”的批判所谓“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浪潮。这是“革命大批判”中的又一项颠倒黑白、混淆敌我的运动。

对“人性论”的批判是以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左”倾观点。去批判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形成的“良知”、“博爱”、“民主”、“自由”、“平等”等等，对中外文化中优秀的文明成果作了全盘否定，为党内的互相斗争制造合理性的根据。

在“斗、批、改”运动中，中央和地方报刊上还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唯生产力论”的文章，混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红旗》杂志在 1969 年曾连续刊出《政治统帅经济，革命统帅生产》、《永远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正确处理抓革命、促生产中的几个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等文章，批判“唯生产力论”。



以上的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都是鼓吹“空头政治”，把“突出政治”放到与经济对立的地位，把按经济规律办企业一律批判为“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同时，把社会化生产所需要的知识人才和必要的管理制度诬蔑为“专家治厂”和“管、卡、压的规章制度”。

这样的“大批判”无疑造成了管理思想的更大混乱。其具体表现为：企业管理一片混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很难确立起来；企业不考虑经济效益，仅仅是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存在；在空洞的“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和空洞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下，经济工作误入歧途，而且越陷越深。

“斗、批、改”运动的另一项内容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主要是粗暴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所谓“修正主义路线”下的一切成就和各种政策法令、工作条例、规章制度。改革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按照“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精神，建国后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被“大破大立”。特别是中国在调整阶段制定的一系列工作条例，如《工业七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条》、《高等教育六十条》、《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统统被砸烂，完全被否定。江青等人甚至提出了“跟前十七年对着干”的荒谬口号。

对于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红旗》杂志1969年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一文说：

“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规章制度，是一场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斗、批、改”运动中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清队”）。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将“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迅速开展。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加之派性的干扰，以及大搞逼、供、信，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错整了一大批人。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共九大以后，停止活动两年多的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建立。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了党的委员会。新产生的各级党委领导进行了整党建党的工作。

整党建党的根源在于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误断。由此出发，毛泽东有时称“整党建党”为“重建党”，认为只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于是，每个党员都要经过申请、群众评议和重新登记，方能恢复组织生活。

早在196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毛泽东在批发这个文件时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后来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

11月5日，毛泽东提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12月2日，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下达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文件，提出了整党建党的任务，并且提出了这次整党建党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五十字建党方针”；规定在整党建党中要“虚心听取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意见”；犯错误的党员要“斗私心、批修”；并且“要吸收那些朝气蓬勃、富有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勇于在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入党”。

此时，在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未提。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在这种错误方针指导下的重建党的工作，必然带来严重后果。

1968年10月14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社论中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吐故纳新”的一段话。

于是，“吐故纳新”成为这时整党建党的一项原则。所谓“吐故”，就是把所谓“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以及“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清除出党；“纳新”，就是吸收所谓优秀的造反派入党，选拔所谓“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优秀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在这个错误的指导思想下，不但各地进一步打击迫害了很多合格的党员和党员干部；而且吸收了相当数量不够党员条件的人入了党，又使一批打着

"左派"、"新生力量"、"造反派"招牌的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得以乘机进入党内，造成了严重的组织不纯。

中共九大召开后，整党建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70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海国棉十七厂等单位关于整党建党的经验，各地区各单位先后开始了整党建党。这次整党建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锋、曹轶欧等分管各项具体工作。

整党建党工作过程中，各地逐步恢复了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和组织生活。但是，由于这次整党建党的指导思想和要求都是错误的，因而处分了一些不应当处分的党员，使一些不应当暂缓过组织生活的党员暂缓过组织生活，特别是吸收了许多"造反派"头头、打砸抢分子入党。

整党建党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一次大破坏。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都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它毕竟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对于稳定局势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斗、批、改"运动中提出的"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主要是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不切实际地实行自上而下的精简下放。其前提就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权力高度集中，政权职能并没有切实转变的情况下，这项要求的贯彻执行，实际上只是简单的、形式主义的减人简事。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按语发表了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人民日报的这个按语中说："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中说："今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提供了新的经验。"

从此，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的机关、团体、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等普

遍在偏远地区开办“五七”干校，把大批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教师都送到干校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进行所谓的“重新学习”。

这种做法不但难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反而在许多部门、单位成为迫害干部、惩罚知识分子、反对科学研究、不准钻研业务的手段，产生了带有破坏性的后果。尤其荒谬的是，一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生产任务不足，或者因为派别纠纷，也被派往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又人为地加剧了这方面的社会矛盾。

实践证明，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运动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目的，巩固“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果”，把各方面工作全面纳入“文化大革命”的轨道，在此基础上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以便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运动便很少再被提及。

清理阶级队伍与“一打三反”

“清理阶级队伍”，是指把所谓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

在1967年11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讲话，第一次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清队”）问题。此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接连发表社论，将“清理阶级队伍”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迅速开展。1968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又错误地提出，要彻底查清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此后，有些单位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

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

此后，“清理阶级队伍”活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加之派性的干扰，以及大搞逼、供、信，这场运动严重混淆了敌我界限，错整了一大批人。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内容是“清查五·一六”和“打击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经过1967年“全面夺权”和到处派性武斗的大动荡后，进入1968年，毛泽东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到反对派性、制止武斗、促进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上来。

许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不仅仍在继续，而且十分激烈，这是什么原因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部署必然导致的结果；相反，却从他习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

路出发，认为一定是有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指挥。他曾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武斗的幕后指挥。"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4 月 10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又用黑体字刊出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新判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②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新的提法，使问题进一步升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对象，主要是党政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下要清查解放前有着或被怀疑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的人，涉及的社会面更广。这样，"文化大革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是一步一步推开的。5 月 15 日，先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并发出《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这以后，便掀起了再度席卷全国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毛泽东在发动这场运动时，曾多次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要给出路，防止扩大打击面，严禁逼供信。他说："整顿队伍，把坏人抓出来，基本上是对的。自从我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战争的继续后，抓了一批国民党坏人。抓坏人还是要搞，但是要有条件，要有人掌握。搞到什么时候，就要煞车。""十六条规定，现行反革命就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国家财产。贴了几张反动标语，也不一定要抓嘛！总之，现在现行反革命的范围相当扩大。""只要不是真特务、真反革命，就不要那么去搞，不要使人毫无出路。""对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根本分别，是资产阶级专政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分别。"③

在另一次谈话中，他又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随便杀人没有手续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讲也得讲。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抓一个人来审，这时一般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他供出来的越多越好。""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这样去供。这样做也不好。"

"投降过国民党就永远忠实于国民党，投降过共产党就永远忠实于共产党，这个规律我就不信。有些人被敌人抓住了，放出来了，登报了，但不一定永远依靠敌人。他还参加了长征，参加了抗日嘛，没有做过大坏事。一抓历史，后一段就都否定了。但也不能讲投降是好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④

几天后，他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内部参考特刊所载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他还在这份材料的一些话下面画了粗线，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跟在群众后面，看着群众这样乱揪斗下去，当群众的尾巴呢？还是站在群众前头，引导群众，指导运动，把群众运动纳入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呢？""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从严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在材料中"这是一些'推一推就可以掉下去，拉一拉就可以站过来'的人"下面，还画了双线。⑤这份材料，由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

但是，在各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违背政策、逼供信、造成冤假错案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造成不少悲剧。这同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泛滥、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有关，也同毛泽东对敌情的过高估计和采取的错误方法直接有关。

1968 年 6 月 20 日，毛泽东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尼雷尔讲到帝国主义要颠覆某一个非洲国家时总要在它内部利用一些工具。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只好收罗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清理他们，加以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⑥

不久，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谈到陕西问题，又说："这些省所谓解放是怎么解放的？把胡宗南一扫就解放了。东北装了个口袋，一个也没有跑掉。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这些坏人搞不出来。至于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人，一下子也搞不清楚，一个工厂需要几个月。""这次文化大革命，才有社会主义革命之气，是群众自己搞的，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⑦

几天后，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又写来报告说："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一直在进行着变天活动。据统计，全省光是军、政、警、宪、特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和匪首、汉奸、反动会道门中小道首即达四十二万人，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这些人是翻案复辟的急先锋。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打进了我们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和各种文化界。"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各地大都如此，不独广东一处。"[8]

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一再强调要正确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禁逼供信、防止扩大打击面，实际上却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他对敌情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又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异常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和极为紧张的政治氛围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大张旗鼓地发动这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结果，各地到处出现对被怀疑有历史问题或视为有现行反革命行为的人任意扣押批斗侮辱、采取逼供信等现象，导致不少非正常死亡。它波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时间虽不长，造成的后果却很严重。

10 月，他正式会见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同他们谈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对敌情仍像以前那样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说："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

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他提出要同前面所说那种情况加以区别："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他对运动作了这样的估计："这一次党政军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9]

1970 年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

这个《指示》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放手发动群众"；"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别轻重"；"要大张旗鼓、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批准，报中央备案"；"要加强领导"。

《指示》要求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来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

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别动队”的斗争，实际上也是一项重要的战备工作。

《指示》说，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过程中，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由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2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

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中指出，有些单位大兴土木，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这种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作风，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为此，中央重申了七点措施：

一、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二、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不许随意拆迁房屋；三、一切新建、扩建企业和“五七”干校的非生产性建筑、生活设施必须从简；四、一切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等，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必要时由内部调剂解决；五、严禁用公款请客、送礼、看电影，不搞不必要的庆祝活动，更不许借此铺张浪费；六、违反上述规定，继续铺张浪费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十分严重的要给予刑事处分；七、要严格遵守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节约开支。

中共中央在《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要求：“开展一场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群众运动，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违法犯罪事件，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至枪毙一小批最严重的贪污盗窃犯和投机倒把犯；通过这场斗争，认真整顿财贸队伍。”

自此，根据中央连续发布的三个文件，“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由于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又被改判死刑。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案。

“清理阶级队伍”，上海市十分积极。1968年初，上海市革会召开扩大会议，将“清队”作为全市1968年的首要任务之一进行布置和动员。

1968年5月，上海市革委会成立领导全市“清队”工作的专案办公室，全市各单位也普遍成立“清队”专职机构，上海“清队”运动正式展开。运动对象主要是所谓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现行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等。

当时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处于瘫痪状态，公、检、法专政机构被

"砸烂"，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殆尽，刚掌握全市党政大权的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为借助"清队"运动进一步稳固其篡得的权力，鼓动掌了权的造反派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整个"清队"采用"怀疑一切"、"残酷斗争"和所谓"群众办案"的方法，使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刑罚，大搞逼、供、信，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全市各级党政干部和各阶层人士，凡历史上曾被俘、被捕过的，曾从事过地下工作的，家庭出身非劳动人民的，社会关系复杂的，曾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曾有过所谓"不恰当"言论的，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当作运动对象的等等，都被作为审查批斗的理由。实在查不出什么"罪证"的，则扣上"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也遭到审查批斗。

"清队"运动中，"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常委、上海市市长、副市长的 20 名领导干部，除张春桥、马天水、王少庸三人外，全部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等。

上海文化界因有许多是江青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活动历史的知情人，因此成为运动的重点。在江青"17 年（的账）要算，30 年代（的账）也要算"的口号下，接连制造了"演剧九队案"、"国民党沪中区特务集团案"等一系列专案，全市文艺界原有相当于文艺六级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冲击，80% 以上被立案审查。

注释：

①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2 月 18 日。

②《人民日报》，1968 年 4 月 10 日。

③毛泽东关于武斗、造反等问题的讲话记录，1968 年 5 月 11 日。

④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 年 5 月 8 日。

⑤毛泽东在新华社《文化革命动向》第 1220 期上的批语，手稿，1968 年 5 月 19 日。

⑥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记录，1968 年 6 月 21 日。

⑦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 年 7 月 12 日。

⑧毛泽东对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关于广州地区敌情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 年 7 月 21 日。

⑨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5 日。

“斗、批、改”运动中涌现的“新生事物”

在“斗批改”运动中，产生和宣传了许多所谓新生事物，最典型的是文艺领域的“样板戏”、工业领域的“七二一”工人大学、教育领域的同济“五七公社”、农业战线的“菜农不吃商品粮”、教育领域的工农兵上大学，以及朝农经验、白卷先生、反潮流小将等。

1963年12月和1964年4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文艺两个批示下达后，现代戏成为戏曲创作的重点。上海在“大写13年”的口号下，传统戏剧剧目的整理、上演基本停止。调集各方面人才，集中创作和排演了一批现代戏。这些戏的题材大都以革命斗争为素材，在戏曲结构、音乐唱腔、人物造型、舞美灯光和伴奏乐器等方面突破原来的戏曲样式，融入了其他艺术的表现手法，公演后颇受好评。此时，江青将上海作为其“京剧革命”的一个点，开始介入上海现代戏的创作活动。

1967年5月1日，上海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海港》，芭蕾舞剧《白毛女》和山东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会同北京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个剧目，在北京举行会演，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会演前后历时37天，演出218场，接待观众近33万人。5月10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称这八个剧目“不仅是京剧的优秀样板，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优秀样板，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个阵地上‘斗批改’的优秀样板。”“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纪元。”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会演结束，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样板戏”从最初的戏曲改革研讨和艺术实践变为一场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此后，以这八个经江青认可的戏为代表，“样板戏”几乎取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文艺作品。

与这次会演相配合，中央和上海等地的报刊接连发表文章，称江青是“文艺革命的旗手”，将这八个“文化大革命”前就基本完成创作、凝聚许多文艺工作者心血的现代戏，说成是江青“呕心沥血”创作的“样板戏”，江青是“第一编剧、第一导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不仅传统剧目全部被禁演，连上海“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非“样板戏”的现代戏，如爱华沪剧团的《红灯记》（京剧《红灯记》系根据此剧改编）、人民沪剧团的《芦荡火种》（京剧《沙家浜》系根据此剧改编）和上海淮剧团的《海港的早晨》（京剧《海港》由此剧改编），也被全部打入冷宫，不许再提及。许多原参与领导、创作和演出现代戏的人员遭到迫害，《海港》的编剧之一、诗人闻捷被迫害致死。

1968 年 5 月 23 日，于会泳（上海文化系统革筹会主任）在《文汇报》上发表《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章从“理论上”对“样板戏”进行了总结，首次提出和阐述了“三突出”的口号，“我们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精神，归纳为‘三突出’，作为塑造人物的重要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来。”这一提法经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首肯后，成为“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和其他文艺创作中必须遵守的公式。

1969 年 9 月 30 日，《红旗》杂志发表《学习革命样板戏，保卫革命样板戏》，提出“保卫革命样板戏”的口号，要求“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坚决打击破坏革命样板戏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在这一口号下，演出“样板戏”丝毫不许走样，必须以“两报一刊”陆续发表的“样板戏”正式演出本作为标准。一句台词、一个台步、一束灯光、一个道具，甚至一个人物身上的一块补丁，都不能作变动，否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破坏革命样板戏”。上海铜管厂青年工人谈元泉因在业余时间组织演出文艺节目时，用沪剧传统曲调演唱“样板戏”，被作为“破坏革命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于 1970 年 4 月 25 日被判处死刑。

继第一批“样板戏”中的《智取威虎山》、《海港》和《白毛女》之后，上海还陆续创作和排演了第二、第三批“样板戏”，主题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主要剧目有京剧《龙江颂》、《磐石湾》以及钢琴弦乐五重奏《海港》和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等。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

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上海机床厂是中国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企业，该厂从50年代初就开始在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1958年又开办业余大学，招收工人学员，到1965年，全厂共拥有技术人员580多人，其中既有在工人中培养的技术人员，也有从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的调查报告，把知识分子（学生出身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技术人员对立起来，否定老技术人员和大学毕业生，片面强调工人技术人员的作用，把工人技术人员短期培训的做法说成是"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这篇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7月21日，他在调查报告上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

调查报告和载有毛泽东批示的《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市革会立即在上海机床厂召开现场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会主任张春桥到会发表讲话，要求对照调查报告予以落实。

1968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以毛泽东指示日期命名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全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以上海机床厂为样板，办起了各类"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的学员来自工厂生产第一线，基本上都是有实践经验，但文化程度不高的工人，办学方式有全日制、半日制，亦有短期训练班补习班的形式。这类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内容，缺乏必要的师资和设备，无论从教学内容还是教学质量，都根本达不到高等教育的水平。许多中专、技校、职工业余中学等都办成"七二一大学"，打乱和破坏了国家的教育体制。

据统计，到1976年，全市共举办"七二一大学"1 609所，在校人数达8.3万人，全国"七二一大学"达1.5万多所，在校人数78万多人。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办好七二一大学的几点意见》，全国各地"七二一大学"进行了调整整顿，除部分具备办学条件的逐步改名职工大学外，其余都逐步停办，"七二一大学"也逐步自然消失。

上海同济大学是一所以培养建筑工程专业人才为主的高等院校，1967年7月，同济大学建筑系的部分学生，为探索"教育革命"道路，提出了

以学校、施工单位、设计单位“三位一体”办学的初步设想。10 月 9 日，由同济大学建筑、建工、建材三个系的部分师生和上海市建筑第二工程公司205 工程队以及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组成了“三结合”的“教育革命试点”，为表示按毛泽东“五七指示”去实践，遂定名为“五七公社”。同年 11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并加编者按给予肯定。此后，同济“五七公社”被姚文元作为进行所谓“教育革命”的试点。1969 年 11 月 19 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雏形”为题，发表同济“五七公社”调查报告，称赞同济“五七公社”在学校体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体现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对全市文教战线具有普遍的意义。1971 年 6 月，同济大学建筑系、建工系被取消，全部并入同济“五七公社”。

同济大学“五七公社”所提倡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教改方案，在课程设置上大量削减和取消基础理论课，实行所谓“两部、三线、一中心”，“一中心”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以三大革命运动（注：三大革命运动是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中心；“两部”是课程分为政治和业务课；“三线”是将原来设置的二十几门业务课合并为建筑、结构、施工三线。在教学上提出教学服务于生产计划，施工单位搞什么工程，“公社”学生就学什么工程，遇到劳动紧张时，则取消教学时间，“开门拆墙”，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这种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打乱和破坏了高等教育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但作为张春桥、姚文元树立的全面否定建国后 17 年教育成果的“教育革命”典型，“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教育革命的突破口”、“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革命方向”的同济“五七公社”，从 1967 年 10 月～1976 年，经《人民日报》、《文汇报》》等先后以各种名义发表文章 120 篇，其中由张春桥、姚文元等点题授意、直接组稿、修改的达 13 篇。硬性向其他学校和学科推广，全市其他高等院校的一些理工科专业甚至文科专业都相继效仿同济大学的做法，办起了各种名目的“五七公社”。

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 12 月，经国家教育部同意，同济大学“五七公社”建制撤销，恢复建筑系及有关学科教研室。

1969 年 11 月 19 日《文汇报》发表《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牌楼十一队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的长篇报道及社论《赞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由张春桥、徐景贤制造的“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在全国造成极大的混乱。

牌楼十一队地处上海市郊上海县梅陇公社，是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粮、棉、油夹种的生产队，全队24户、118人，耕地107.8亩，人均粮田2分4厘，“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一个先进生产队。1969年全队农业生产全面丰收，亩产蔬菜5 250公斤、皮棉107.5公斤、油菜籽134公斤，粮食亩产达1 079公斤，成为上海县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牌楼十一队的成绩，引起了张春桥、徐景贤的注意。徐景贤去那里“蹲点”。张春桥认为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牌楼十一队的农业成就，将菜农种粮得高产上升为“斗、批、改的方向”。徐景贤亲自审阅《文汇报》的报道稿件，并将原来拟配发的评论员文章改为社论，正式提出“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认为“这件事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可以说服很多人。”“菜农不吃商品粮是备战备荒的一个重要措施。”“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坚持的方向，应当提倡。”并提出：“宁愿多收一百斤粮，不要多赚一百元钱，”“牌楼大队十一生产队能够做到不吃商品粮，市郊不少条件和他们相仿的生产队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此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支部生活》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不断刊登和广播市郊各县社队学习和落实“菜农不吃商品粮”的体会文章和措施，为全郊区的推广升温加热。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的提出，在全市郊区尤其是以蔬菜种植为主的蔬菜区引起了极大的混乱。本来，为更好地落实“市郊农业生产为城市服务”的方针，本市有关部门曾对郊区农作物生产区域作了通盘安排，划出一定区域种植蔬菜，作为城市副食品生产供应的基地。蔬菜种植区菜农的粮食，则由国家统一供应商品粮。这一做法，不仅有利于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而且符合农业生产规律。而“菜农不吃商品粮”这一口号，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提倡和鼓励在蔬菜区盲目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以粮挤菜。

“菜农不吃商品粮”口号提出后，市郊各社、队纷纷前往参观、学习，“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也进一步发展为“宁要千斤粮，不要万斤菜”，“抓菜就是抓钱，就是资本主义倾向”。郊区各蔬菜区修改耕作计划，片面砍掉蔬菜种植面积，向蔬菜生产争地、争劳力、争肥料。据统计，1970年郊区粮食播种面积比1969年增加48.65万亩，而蔬菜种植面积却一减再减，全郊区曾有五万亩蔬菜地被借茬种粮，占全郊区蔬菜生产规划面积的1/4。城市蔬菜供应紧张，居民买菜需凭卡限量供应。

196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菜农不吃商品粮》称其是“经过激烈的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取得的”。把“菜农不吃商品粮”

的口号推向全国。并陆续出现了“棉农不吃商品粮”、“果农不吃商品粮”、“茶农不吃商品粮”、“林农不吃商品粮”等口号。针对“菜农不吃商品粮”造成的混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及时严肃批评和制止。1970年冬，徐景贤不得不宣布“菜农不吃商品粮以后不要再宣传了”。至此，曾在全市乃至全国引起极大混乱的“菜农不吃商品粮”草草收场。

事实上，牌楼十一队1969年尽管粮食取得丰收，实际并未做到“菜农不吃商品粮”。据查，该队1969年粮食总产量29 554公斤，实际用粮44 113.5公斤，其中社员口粮31 213公斤，饲料粮11 155.5公斤，种子粮1 745公斤。国家实际供应统销粮16 796公斤（其中包括社员口粮5 966公斤和饲料粮9 729.5公斤）。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从1966年起，上海市各高校停止正常招生工作达4年之久。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提出，高等学校招生应废除过去的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学习“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10月15日，国务院以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试点招生工作按北京、清华大学请示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

上海市革会根据上述精神，决定先在市内几所重点大学试点招生，其中复旦大学招收学员1 135人，同济大学招收786人，华东师范大学招收735人，共计2 656人。本市其他高校在年内也相应地举办“试点班”，招收工农兵学员，当年招生总计3 180人。1971年继续招收试点生。1972年开始，经过合并的上海高校按照上述原则正式全面招生。当年从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共4 600余人。由于取消文化考试，所招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很多缺乏文化基础知识。加上当时开展“教育革命”，提倡“结合战斗任务教学”，使高等教育正常的教学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1973年11月21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以《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为题，发表经徐景贤修改的上海师范大学（由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而成）某工农兵学员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认为学校在平时教育、毕业生分配等问题上重业务、轻政治，“是刘少



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的流毒尚未肃清”。质问“究竟要把学生引到什么方向上去”。徐景贤在编者按中称其“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在上海两报开展了以批判“智育第一”、“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大讨论，持续三个月，发表文章170余篇。在半个月内，全市一万余人前往上海师范大学观看大字报。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调查报告。1974年12月底，国务院科教组、农林部和中共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农经验”现场会。上海市出现了宣传、学习所谓“朝农经验”的浪潮。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再回到社队；不少院校把“学大庆”、“学大寨”作为基本课、必修课，教育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等。办学方式采取“几上几下”，即每年分几段组织学生在校学习和回生产队实践。上海市高校的基础理论教学被作为“右倾回潮”遭到批判，教学秩序被进一步搞乱。

1974年九十月间，市革会要求各高等院校深入开展“开门办学”，改变“三脱离”（脱离阶级斗争、脱离实践、脱离工农兵）的现象。此后，文科院校师生主要到工厂、农村、部队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宣讲“儒法斗争史”，并以此为中心确定教学内容，组织教学。理工类院校则搞厂校挂钩、厂校合一、厂办专业、半工半读、按生产过程组织教学等。这样，学校中阶级斗争成为主课，劳动成为中心，教学计划经常变动，文化学习没有严格要求，师生经常到社会大课堂去“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教学秩序混乱。

1976年，全市大专院校招收工农兵学员12 878人，为历年之最。在1977年8~9月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国务院作出决定改变高校招生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的一次错误实践。因此，要完全弄清“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错误的理论根源，彻底否定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弄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怎样由来和形成的。毛泽东的错误集中表现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正是由于这个错误发展日益严重，最终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且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需不需要继续革命？如何继续革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并成为执政党以后，是不是到此就止步了呢？假如不止步，革命的对象是什么呢？革命的方法手段是什么呢？走什么样的道路呢？这成为毛泽东始终思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民主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不能把革命停留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而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最终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坚持不懈地奋斗，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进行这样的革命，毛泽东认为让群众起来革资产阶级的命，用大民主的形式来监督自己的党和政府，铲除资产阶级滋生的气候和土壤，并让群众在革命的进程中用实践来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实现党政军的各级领导和每个人的思想观念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化，最终防止修正主义的出现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是毛泽东思考后的结论。

经过土地改革和工农商业的社会主义合作化改造，初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继续革命的范畴内容是什么？毛泽东在 1956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时指出：“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被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



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样的道路？是简单模拟苏联的"一长制"、"一条腿"走路，模拟赫鲁晓夫搞物质刺激、专家治国，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反对暴力革命搞和平过渡，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滑向资本主义泥坑，还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还是走出有别于苏联发展模式、走有所创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能够为广大的不发达国家（地区）人民提供经验性借鉴的模式。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心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了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拿起这把刀子杀向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练习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马克思写了那么多东西，列宁写了那么多东西嘛！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

经过了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和 1959 年的庐山会议的党内斗争之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毛泽东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开始萌生并逐步形成。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到底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即发展资本主义？其次，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我国还存在不存在矛盾、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不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究竟解决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另外，如何对

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如何对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得与失？这些问题引发了，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与斗争。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产生错误的开端。他提出“还要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和从“政治思想上划阶级”的概念，这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观点就成为他后来提出“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1958 年 11 月 21 日，他在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苏联是 1936 年宣布的。我们 16 年也许可能，今年 9 年，还有 7 年，但不要说死。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

1957 年 10 月 9 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作结论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①]改变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

1958 年 3 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观点。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指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所谓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两个剥削阶级”是根据政治思想状况来划分的。这个观点为八届四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所接受。

1957 年，毛泽东根据世界观的表现，认为我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占总数的 80% ~90%）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在 1956 年以后，最有影响的，敢于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一不是富农，二不是地主买办阶级，是谁呢？就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说，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



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约计600万人，5口之家，五六就是3 000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②]很明显，他把知识分子和资本家以及他们的家属一例看待。1964、1965年，他仍坚持这种看法。

1959年庐山会议发生了党内争论。他认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③]这样，就把党内的是非争论等同于阶级斗争了。

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从而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的时间延长到由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并且把抓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提出了一个新的论断：“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党内，斗争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人。

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同年9、10月间，他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通过一系列的思考论述，毛泽东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广泛宣传。并被写入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还写入了四届人大、五届人大修改通过的宪法之中，影

响十分巨大。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地出现在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概念，是 1967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当年第 15 期社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伟大革命》中首先提出来的。社论说，只有认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等等，“才能领会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接着，1967 年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进行了概括。该文是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过他们反复修改过的。他们在将此文报送给毛泽东的信上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列宁的话已充分引了。”“大家很希望主席能看一看，并加批改。”毛泽东当即审阅后在信封上批道：“内件已阅，修改得好，可用。”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且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即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极其重大的标志。

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

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必须“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和加强，使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发展。

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说，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

三结合。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判修正主义，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战胜资产阶级利己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文章还评价道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上述这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观念，天才地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这里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这一提法见于1967年5月18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一年前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将《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而写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修改中写了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④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核心是：在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最重要的方式。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贯穿文化大革命始终，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因此，在党的九大决议和党章中都对这一理论进行了阐述。

1975年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

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⑤

2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⑥

关于这一理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有过论述。认为这一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应该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来。

注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75页，第484页。

③毛泽东：《机关枪、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④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5月18日。

⑤《人民日报》，1975年2月9日。

⑥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1975年2月18日。

筹备九大

1968年7月毛泽东南巡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以后，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出发，毛泽东把召开九大和整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这年一二月间，甘肃、河南、河北、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国内局势比1967年要稍稍平稳一些。

到1968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从3月到6月，浙江、江苏、宁夏、湖南、安徽、陕西、辽宁、四川等省、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

对于武斗型严重的省区，毛泽东采取了制止武斗、清理阶级队伍、派出工宣队进驻、批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

他在这次讲话中作了一个重要判断：“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或十月要开个会”，“叫做工作会议或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姚文元问道：“要准备什么?”他回答说：“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我看是在九月至十月中旬差不多了。”①

他认为，在接连采取几项大动作后，局势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形势确实发展得很快。8月10日、14日、20日、28日和9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先后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当时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这在毛泽东心目中是一件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大事。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宣称：“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②

他在11月5日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了一次，说：“其实，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军，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

民、学都整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搞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他又说：“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他要求拟出几条征询意见性的办法，在11月内发下去，以便12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个指示。根据他的要求，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先后发出《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和《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在着手筹备九大和整党工作的时候，毛泽东认为需要对“文化大革命”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以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切实巩固下来。

8、9月间，毛泽东接连批示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并为有些调查报告写了“编者按”或作了修改。它们包括：《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等。

在关于“五七”干校的批语中，他写道：“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③

这以后不久，他又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在不长的时间内集中地发表那么多有着毛泽东所写编者按或批语的调查报告，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它同前一阶段毛泽东言论的调子形成明显反差，说明毛泽东这时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更多地转移到斗、批、改上来，转移到怎样建立符合他理想的新体制和新秩序上来，也就是更多地从“破”转到“立”上来。

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便突出地提到毛泽东的议事日程上来。他这样提出问题：“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

9月19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报告送交毛泽东。报告中说：“十二中全会要解决什么问题？

一、准备召开党的九大；

二、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若干经验；

三、解决不仅在实质上、而且也在组织上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顺带着也就解决了国家主席问题。"④

毛泽东在第二天作了批示，说这件事要在一次至二次会上讨论才能作出决定，并指出："我认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中央全会也不要扩大很多人，有一百多人就够了。"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的国庆很快就到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庆祝国庆的标语口号。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其中的第十一条（"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并且批示："去掉第十一条，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⑥

10月1日，毛泽东同各地工人代表和首都50万军民共度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当巴卢库讲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时，毛泽东说："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也已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巴卢库问："你们党快要开代表大会了吧？"毛泽东回答："是的。要总结工作，选举中央领导。""所有的工厂都要来一个改革。人民公社、学校、机关都要来一个改革。要发动群众改。"⑦

对于文革中被冲击打倒的干部，"关于一部分被认为犯了错误的干部，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的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⑧

反映出毛泽东注意的重点正在逐渐发生变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到了改的阶段。

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出席全会的133人中，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只有59人，不足到会者的一半。八届的中央委员原有97人，其中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有57人，只能从中央候补委员中确定10人递补已去世的中央委员的名额，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达到50人，稍稍超过法定最低人数。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其

他参加会议的 74 人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不正常的状况。

周恩来在全会开幕式上说：“这次全会的召开，就是要为召开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9]他宣布全会的议程有四项：一、九大代表如何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修改党章草案；三、讲一讲形势；四、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谈了形势问题，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在毛泽东看来是这次中央全会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发展，对“文化大革命”抱有怀疑以至反对态度的人日渐增多。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成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里包括红卫兵、“三支两军”等。此外，中央领导、各级领导中的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10]

这种状况，使毛泽东更认为需要在这次全会上再一次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统一大家的思想。他在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采取“提出问题”要大家“讨论”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其实他的意思很清楚。他说：

“国内问题嘛，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呢，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可以的，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呢，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当时通过那个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但是后头呢，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至于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譬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在党的中央全会上，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而且由自己承担主要责任，这是第一次。他又说：“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那种战

争，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三年半也差不多。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啦，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把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

“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这个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这也是一个问题。现在不是讲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就是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些。”⑪

10 月 31 日，毛泽东在全会的闭幕式上讲话。他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清理阶级队伍，请大家应该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要做到稳、准、狠，重点还是这个“准”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呀，你也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嘛。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不要打人，不要搞“喷气式”。第二，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冯友兰、翦伯赞，还有吴晗，也还有某种用处。你如果要问唯心主义，要问帝王将相，还得请教他。毛泽东还提到北京的华罗庚、赵纪彬、任继愈，上海的周谷城、刘大杰、谈家桢、苏步青，广州的杨荣国。第三，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的，我就不那么赞成。你有这么几位，有啥要紧啦？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嘛，将来是不是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讲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过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什么。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要那么纯，纯得那么很厉害呀。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太好。

全会后期，林彪、江青等联合发起对所谓“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还在全会上说：“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谈了这个问题。但他的讲法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他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几个人

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12]会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13]

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关心的焦点。他最后还是在全会上作了十分肯定的“结论”。全会《公报》发表了他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4]这就以党的中央全会的名义，把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全面肯定下来。

十二中全会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批准中央专案小组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这个审查历时近两年，主要是审查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

对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毛泽东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变化过程。他曾说过：“同刘少奇同志的这个斗争是从一九六四年夏天开始的。一九六五年制定的二十三条就是这场斗争的结果。”[15]那时，他认为刘少奇已不适合做他的“接班人”，不能继续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他们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又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两人的分歧公开化。刘少奇实际上被剥夺了在中央的领导工作地位。但这时毛泽东仍将刘少奇的问题作为党内的“路线错误”看待：基本肯定刘少奇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查，不赞成把关于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公共场所去，不赞成在报刊上公开引用《炮打司令部》一文。他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6]1967年“一月夺权”刚开始不久，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刘少奇。刘少奇表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临别时，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回到家，刘少奇对家人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17]四天后，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朋友谈话中讲到王明时说：“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18]

毛泽东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是在 1967 年 3 月份。这个月初，毛泽东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章士钊写信给他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都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十日，毛泽东复信章士钊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19]十分清楚，这里说的"个别人"是指刘少奇，所谓"情况复杂"是指历史情况"复杂"。21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涉及刘少奇 20 年代被捕的材料交"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控制下，这个专案组实际上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23 日，毛泽东对戚本禹所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作些修改后批示："看过，写得很好。"[20]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所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谁都看得明白是指刘少奇。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后，对刘少奇的"大批判"立刻大幅度升级。

从 1967 年 5 月到 1968 年 10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这项专案工作完全在江青直接控制下进行。担任专案组组长的谢富治曾明确批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21]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断章取义、弄虚作假等极端卑劣的手法，制造出大批伪证材料；而对否认刘少奇有"变节"行为的材料，或当事人推翻过去因逼供而被迫提供伪证的声明（如与刘少奇同时被捕的人在残酷逼供下被迫写过刘少奇自首变节的伪证，以后多次书面声明那份材料是不真实的），全部扣下不报。这些伪证材料对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1967 年 8 月，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 1936 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22]他对有些材料也存在怀疑。1968 年 5 月 8 日，他同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曾说："整出来的刘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比如说他一九四六年冬季和美国勾结，组织反共同盟军，要美国大规模出兵打共产党，并且要沈其震（中共地下党员、医务工作者）经过司徒雷登介绍去见杜鲁门、艾奇逊。有些材料是故弄玄虚，是骗我们的，是耍我们的。"周恩来接着对抗战前夕一件材料说："说



刘少奇当时去南京，见过孙科、宋子文，我看不一定。”但总的说来，毛泽东相信了这些伪证材料。他在这次讲话中又说：“还是一个不杀好，留下来的人总有用处嘛，一可以劳动，二可以当证人。例如刘少奇在东北的事情，就是找到了当时审讯他的人。如果都杀了，这些证人也就没有了。”[23]5 月 20 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24]7 月下旬左右，刘少奇这些被严重诬陷的“罪名”得到中共中央领导层认可。

10 月 31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0 月 18 日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刘少奇对《审查报告》的内容以及审案情况一无所知，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1969 年 11 月 12 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囚禁处含冤而死，终年 71 岁。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起最大的冤案。

全会上，有一些人提出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泽东在闭幕会上特地谈了这个问题。他说：“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嘛，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25]这样，把要开除邓小平的主张平息了下去。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6]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是为召开党的九大作准备的。会议公报宣布：“全会认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全会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7]

全会结束后，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三件事情上：一、整党建党工作；二、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三、九大的各项具体准备工作。

注释：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 年 8 月 19 日。

②《人民日报》，1968 年 9 月 7 日。

③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的批语，手稿，1968 年 9 月 30 日。

④周恩来等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手稿，1968 年 9 月 19 日。

⑤毛泽东对周恩来等报告的批语，手稿，1968 年 9 月 20 日。

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标语口号》草稿上的批注，手稿，1968 年 9 月 25 日。

⑦毛泽东同巴卢库谈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1 日。

⑧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5 日。

⑨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 t-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13 日。

⑩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12 日。

⑪⑫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13 日。

⑬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 年 11 月 18 日至 25 日。

⑭《人民日报》，1968 年 11 月 2 日。

⑮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 月 17 日。

⑯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 年 10 月 24 日。

⑰《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版，第 26 页。

⑱毛泽东同一个外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7 年 1 月 17 日。

⑲毛泽东给章士钊的信，1967 年 3 月 10 日。

⑳毛泽东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稿的批语，手稿，1967 年 3 月 23 日。

㉑谢富治对“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报告的批语，1968 年 2 月 26 日。

㉒毛泽东同万捷尔莫依修、缪非特穆希谈话记录，1967 年 8 月 16 日。

㉓㉔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记录，1968 年 5 月 8 日。

㉕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68 年 10 月 31 日。

㉖㉗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见 1968 年 11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整党和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毛泽东心目中“斗、批、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很早就在认真考虑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特别是各地相继“全面夺权”后，党组织普遍陷于瘫痪状态，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随着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的相继建立，这个问题便迫切地提到他的面前。1967 年 10 月 19 日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请示：“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审阅时，在“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下面画了横线，批示：“应当这样做。”2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复电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并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各省军区，答复在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问题。毛泽东对复电稿作了很大的修改，主要是加写了一段话：“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①]这段话显然是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指导思想的。11 月 5 日，他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又提出党要“吐故纳新”的问题。

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红旗》杂志发表题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的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党要“吐故纳新”那段话：“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②]毛泽东在审阅《红旗》目录时，把这篇社论从第四篇调到第一篇的位置上来，可见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但这时还只在个别单位进行整党试点，到九大召开后，整党工作才逐步普遍开展起来。

在当时严重混乱的局势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毛泽东那样强调“吐故纳新”，表明他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能按照他所设想的模式来改造和重新组织党的队伍，这不仅无法做到，而且产生了不少弊病，有些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就在这时被拉进到党内来，甚至担任了领导职务。

落实政策，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是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谈得更多的问题，被他看作是召开九大的一项重要准备。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到处出现“打倒一切”的浪潮，打击面之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力图对这种现象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11 月 10 日，他对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说：“过去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这仗好打。文化大革命的仗不好打，因为敌人不很清楚。”“现在是共产党内部自己分裂，都说是共产党，人们就不易搞清楚。不过时间也不需要很长，比如过去要花二十二年夺取政权的话，这次大约有三年左右就差不多了。”[③]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多。毛泽东觉得现在应当着重提出缩小打击面的问题了。12 月 1 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对报告中讲到要解放一位厂党委副书记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④]17 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两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⑤]

对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他也一再表示自己的态度。1969 年 1 月 3 日，他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⑥]2 月 19 日，他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请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一开始就说：“你们这几位老总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由

陈毅挂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又问李富春等：“今年的计划，五年计划还有两年，你们在搞吗?”他还说：“总之，许多方面要改革。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现在下去走一走，可以早去晚归，或者带包袱去住个把星期。”“国内问题要注意调查研究，搞点材料，提出意见。”[⑦]

毛泽东在苦苦思索的，归根到底还是这次讲话中说到的“怎样搞社会主义”。

离九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3 月 15 日，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就落实政策问题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

“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搞了很多人去搞调查，没有目的地到处乱跑。还有抓人太多，关人太多，解放的人太少。有些人站队站错了，还没有转过来，一个学校那么多教师、教员都不要，怎么办呢？你不改造他？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也要给出路。对走资派也要区别。有些走资派，开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很厉害；但所谓死不悔改，难道一万年也不改吗？不做工作又怎么改呀？这些人都不要怎么行？都把他们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我们讲钱伟长、梁思成（钱是著名力学家，梁是著名建筑学家），可以作为典型，要找标兵嘛！有人说，人家有历史问题。有历史问题不要紧，人都是有历史的嘛。人就是历史。有的人和美国、国民党有关系，就是有嘛，不要怕嘛！那都是摆在那里的嘛！拼命搞外调，又搞不清楚问题，盲目地乱跑，结果花了很多时间精力，问题还是搞不清。为什么不要他坦白、叫他自己交代呢？关的人太多，统统放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破坏，至于写几条反动标语，那有什么要紧？有的人放出来，只要不继续杀人就行了，可以继续进行教育。他再杀人，再抓嘛！这是第一。一个是关，一个是放。一个不关不行，我们说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现在那么多教授、干部，不解放是不妥当的。我们历来讲坏人是少数，可以教育争取的是大多数。一讲就是一窝黑，几十个，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开始有些老工人、解放军，一讲就是一窝黑，一个样，那样不是把人都推到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那里去了?”

“我主张报告不讲‘二月逆流’。六六年冬季和六七年春季，有些同志犯了错误，对红卫兵冲击不了解情况。有的打到自己身上来了，受了点侮辱，连听报告都不能到，只能在幕后听。所以始终有点不服，所以闹。大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共产党不隐蔽自己的观点。大家并没有隐蔽自己的观点，都讲出来了嘛！”[⑧]

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特地把正下放工厂“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去参加，对他们说：“好久不见了，你们搞得不错啊！你们应该换一换：南口、新华、二七厂都是大厂。”“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你们几位老同志，为国家做工作，不要只管一个部门。聂荣臻不能只管一个国防科委，叶剑英只搞一个军事科学院，钻进去就出不来。要管宽一些：军事、政治、国内、国外。你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多吃几年饭，经验多一些。小萝卜头看不起你们，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小萝卜头有用，但他们没有经验。”“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

他又对与会的人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只写我和刘少奇两个人的名字，只写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这次犯错误的同志，没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时一个也没有丢。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谭启龙、张平化、赵紫阳、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严重问题。如没有什么严重问题，只是这一次犯严重错误的话，过一个时间，群众的气消了，就可能解放他们。”[9]

到九大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31日，他在审改九大报告时又加了一句：“对于那些略有进步、开始有了一些觉悟的人们，就要从团结的观点出发，继续给以帮助。”[10]

这些谈话进一步表明，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不在继续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斗争，而把落实政策的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来。一部分被打倒或受到批斗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陆续得到“解放”。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和。但毛泽东这些话仍是在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个前提下来讲的。这个时期内，他仍然在说：“解放以后十几年，被资产阶级包围，被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坏人包围着。”[11]这时，林彪、江青等人和他们操纵的造反派组织仍有相当大的势力。被“解放”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必须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和接受“再教育”，并被要求做到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却不涉及他们被打倒或受到批斗过程中出现的大量偏差。相当一部分受到错误审查或处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仍没有得到“解放”。还有数以百万计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到干校“劳动锻炼”。这

样，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至于九大的具体准备工作，是从1969年2月份开始的。2月2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报送《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草案，内容包括：代表产生办法、党章修改、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国内外形势和政策、中央机构、九大宣传方针等。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发。"

在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最关心的是九大报告的起草。2月7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开会时说："搞出第一稿就有办法了，无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让他们几个人搞，伯达牵头，伯达、春桥、文元，林彪同志挂帅。文章写出后才好开会。现在讲几个里程碑（指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赞成。"[12]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指标。会上初步商定报告稿在2月20日交卷，九大在3月15日开幕。19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你报告写得差不多了吧！二十号交卷有希望吗？你们三个人要一齐找林彪同志谈一谈。"[13]3月3日，期限已过了十多天，仍然没有消息。毛泽东很生气，在找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说明道理。会议决定的，一个人（指陈伯达）推迟时间。"[14]7日，他在谈话时表现出更大的不满，说："开会，一个主要的是文件，一个是党章，一个是选举。做了决议又不办，不办又不报告。还是准备两手：一个是写出报告可用，一个是不能用。"他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回答：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15]12日，他就提出换人的问题，说："是不是请你们三位：康、张、姚三位。""两家各搞各。"并且点明报告的主题："总之，要提出矛盾来，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斗争，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碍群众运动，就是有这个东西，相当严重。"[16]这以后，九大报告就由张春桥、姚文元来起草。三天后，毛泽东说："报告没有写好，迟几天开会不要紧。给陈伯达是一个月，给你们半个月，索性四月一日开会。"[17]张、姚两人从16日起陆续将报告稿分批送审，毛泽东改了多遍，在3月31日完稿。

陈伯达起草的报告稿同林彪有很大关系。这个稿子被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据当年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吴法宪回忆："陈伯达写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两人商量的。"在由张春桥等起草后，"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

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18]

九大的准备工作，除起草报告外，还要产生代表。毛泽东对这件事过问得比较少。他只在1月间从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19]2月份，他在周恩来关于九大代表人选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陈奇涵同志似宜考虑。”[20]3月31日，又在周恩来送来的关于徐海东参加大会主席团的报告上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请考虑酌定。”[21]

这时，还有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在讨论一个文件的署名时，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22]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确地说“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并且提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和中央文革碰头会议这些组织形式不需要保留下去了。这些，自然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日到14日，听取并讨论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第二阶段，从15日到24日，酝酿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共开了三次全体大会，其他时间是小组讨论。

4月1日，九大在毛泽东主持下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大会，能够开得好，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他在回顾党成立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后又说：

“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23]

他如此强调团结和胜利，显然认为经过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取得决定性胜利，形成一个新的格局，今后就是要在由九大肯定下来的这个新格局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更大的胜利。

接着，林彪代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分八个部分：一、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三、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四、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关于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六、关于党的整顿和建设；七、关于我国和外国的关系；八、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经毛泽东多次审阅修改的报告，用很大篇幅来回顾“文化大革命”准备和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形成所谓九大的政治路线。

从4月2日起，开始分组讨论这个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在党章修改草案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还十分引人注目地规定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不仅严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而且很快被事实证明是十分荒唐的。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回忆道：“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提出：‘林彪同志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应该写在党章上。’‘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她进一步强调说：‘一定要写！’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主席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央讨论修改党章的会议上，江青说：‘林彪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张春桥第一个赞成。他说：‘是这样，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关于林彪的名字是否写进党章的问题，主席考虑了一个晚上，最后对‘写作班子’说：‘既然大多数同志都同意，那就把林彪写进去吧！’”[24]

4月11日，毛泽东召开了一次大会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的会议。他先说：“找同志们来商量一件事，这个会是小组会一直开下去，还是开一次大会？我们商量了几次：中间开一次大会通过报告和党章；然后搞选举，再开一次大会，结束。”“另外有一个问题和同志们商量一下。在北京市小组的简报上说，现在有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清理阶级队伍有一种倾向，就是扩大化。”“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清理阶级队伍是中央规定要搞的。下面一搞，有些地方就扩大化。在历史上有不少这种事。”他接着从两个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面继续对敌情作了不符合实际的过分严重的估计，一面又强调要谨慎，不要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

他的矛盾心情。他说：

“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没有经常讲，没有公开向大家讲，结果广大群众不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消灭的，但是有些人硬是在那里利用而不进行限制、改造，所以，这次又来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叫不叫大革命，让历史家去作结论，叫文化大革命也可以，因为是由文化革命开始的。不管叫什么名字，总之是触及了上层建筑，从中央一直搞到工厂、机关、学校。过去这些不都在我们手里，大都在国民党手里，都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而且他们还有后台。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还要一个时期，要认真抓一下。”

“军队要谨慎。南口有个工厂，八个人搞了一个专案，把党委书记搞成狗特务，后来交给群众去查，不是特务，是个好人。搞专案的人搞的材料不那么准确，不那么可靠。他们的观点是抓得越多越好，好像我们过去行军捉虱子，越多越好，少了不过瘾。搞专案的人搞错了要翻案很不容易：搞了这么久，翻案还得了？所以人家不敢讲话。还是超脱一些好。我不搞专案，超脱了一点，就好讲话。”“把人家既关起来了，不容易放。要放怎么办呢？你还要讲点理由：你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总要讲个理由。有些人关在牛棚里不少，有些人还关在地下室。有些犯错误的人推一推就下去，拉一拉就上来了。”“现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各级主要领导同志要注意，当成一件主要事情来处理。鉴于历史的经验，各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要使我们的同志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

毛泽东最后谈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他说：下一步搞选举，选举的名单由下面提，然后大组提。我提议几位老同志要选进去。我开幕讲话就有这个意思：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25]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毛泽东仍认为，这些都是次要的，不搞这场“文化革命”是不行的。4 月 13 日，他对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在群众有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怀疑一切的思潮，一方面不少人乘机杀人放火放毒，包括武斗在内，我看这些都无关大局。”[26]

四月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九大的第二次全体大会。会上，先后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九人发言。孙玉国是来自珍宝岛前线、同苏联入侵军队作战的基层指战员

代表。他上台时和发言结束后，毛泽东都站起来鼓掌，同他握手，并且说："坦克、装甲车、大炮、飞机，我们都要，但是主要要靠我们步兵的勇敢。"[27]这次全体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九大最后一个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会。从4月15日起，代表们开始酝酿和进行预选。它的程序是：根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先由各地各单位的45个小组提名，再经主席团秘书处整理后提出统一候选名单，经过协商和预选，再拟出名单，提请主席团通过后，作出正式候选名单提到大会进行选举。由于林彪和江青都力图多选一些自己方面的人，暗中争夺候选人的斗争异常激烈，使酝酿和预选时间拖长，原定21日选举和闭幕难以做到。23日，毛泽东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开会，把名单增加了5人，共279人，其中中央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作为正式候选人。毛泽东在会上说："要说清楚：没有列入名单的，好的很多。摆上名单的不一定都好。""总的看来，头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占多数，七次大会、八次大会没有这次大。八大的老人只五十三位，新排的二百多人，五个占一个，五分之一不到。再一个就是产业工人、农民都增加了，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脱离生产。比如这次参加大会的，他在本单位要做工作，又要到省、地、县做工作，如果脱离生产就和我们一样。"[28]可见，他十分看重要在中央委员会中增加不脱离生产的工人和农民，把它看作一项重要改革。第二天，九大举行第三次全体大会，经过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九大随即宣告闭幕。

4月28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选举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的办法同样是无记名的等额选举。选出的九届中央政治局成员25人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包括在内；而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30人（没有包括已去世的三人）中，只有12人继续当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政治局成员所投的277票中，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获全票，陈伯达275票，黄永胜274票，江青270票，吴法宪、叶群的得票比张春桥、姚文元高。[29]政治局常委当选的是毛、林、周、康、陈五人，此外，江青得150票，黄永胜得130票，其他被提名的都在35票以下。[30]从这里可以看出：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争夺已经很明显了。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篇不太长的讲话，说："我的话是些老话，就是大家知道的，没有什么新话，无非是讲团结，团结起来的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胜

利。”“我们讲胜利，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

“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开头不要全面铺开，可以铺开，但不要一铺开不管了。不要搞了半年或者更久，就是没有人去管它。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机关地去总结经验。”

鉴于不久前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发生的中苏边防部队武装冲突事件[31]所造成的紧张局势，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准备打仗”。他说：“我们是不打出去的。我说不要受挑拨，你请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来呢，那我就要对付了。”[32]

同日，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单：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林彪、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此外，还决定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名单，以黄永胜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实际上把持了军委的日常工作。

九大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共中央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应该告一段落了。但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在九大上分别加强了实力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矛盾和争夺却迅速加剧。在九大“团结”和“胜利”背后，正在酝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斗。

注释：

①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致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复电稿的修改，手稿，1967年10月27日。

②见《红旗》杂志1968年第4期。

③毛泽东同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0日。

④毛泽东对北京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执行“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的批语和批注，手稿，1968年12月1日。

⑤毛泽东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的修改，手稿，1968年12月。

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送的一个材料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3日。

⑦⑨⑬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等谈话记录，1969年2月19日，1969年3月22日，1969年2月19日。

⑧⑪⑫⑭⑮⑯⑰㉒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记录，1969年3月15日，1968年11月4日，1969年2月7日，1969年3月3日，1969年3月7日，1969年3月12日，1969年3月15日，1969年3月3日。

⑩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报告时加写的一句话，手稿，1969年3月31日。

⑱访问吴法宪谈话记录，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⑲毛泽东在国务院秘书厅信访室1969年1月11日编印的《人民来信摘报》上的批语，手稿，1969年1月。

⑳毛泽东对周恩来1969年2月5日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2月。

㉑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徐海东参加中共九大主席团问题报告的批语，手稿，1969年3月31日。

㉓㉗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日，1969年4月14日。

㉔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13～115页。

㉕毛泽东在中共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11日。

㉖㉘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谈话记录，1969年4月13日，1969年4月23日。

㉙《被提名为政治局委员的九十五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

㉚《被提名为政治局常委的十八人名单》，原件，1969年4月28日。

㉛1969年3月2日，苏联边防部队入侵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珍宝岛地区，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对入侵者进行还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3月15日、17日，遭到打击的苏军向驻守珍宝岛的中国军队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经过连续激战，入侵的苏军最终被中国军民击溃。

㉜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9年4月28日。

解放被打倒的干部

“文革”开始后，林彪一伙和江青、康生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借机疯狂迫害和打击老干部，制造冤假错案，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组织，大批党政干部收到错误批判被打倒甚至残酷迫害，使整个国家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察觉并揭露了林彪集团的宗派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他们的权势，打乱他们的阵脚，最终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此前后，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过去所认定的某些问题，尤其是对老干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逐渐改变以前对一些老干部的错误看法和态度。

对解放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也一再强调。到武汉前十来天，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专案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①

当听取军委办事组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时，他说：“搞专案，许多是靠不住的，是道听途说的。内查外调搞不出什么东西，搞了很长时间没有搞出什么东西。有的学生没有经验，有的还有派性，这一派整另一派。”他还说：“不要把责任推到下面，不要怪下面，谁叫我们不管呀!”②

“九一三”事件之后，在周恩来的大力协助下，毛泽东着重抓了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解放”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

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来京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当着叶剑英的面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所谓“二月逆流”，是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革”初期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正面抗争。现在毛泽东对它的正义性质作出肯定的评价，无疑是解除了几年来一直压在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次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在谈话中他肯定了陈毅是个好人，是个好同志。在“文革”中，仗义执言的陈毅屡遭批判，是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典型代表之一。毛泽东出席他的追悼会，本身就是一个

极不平常的事情，给了所有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一个清晰而明确的信号。从此以后，许多老干部及其家属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申诉自己受迫害的情况。他们有的要求解除监禁，出狱治病；有的要求落实政策，恢复工作；更多的则是要求弄清问题，作出结论。对于这些来信，毛泽东大多及时地作出了批示。

据粗略统计，仅在 1972 年一年间，他批阅的这类来信就不下 30 件。对一般高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他明确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及其负责人处理；而对担任过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干部，他则直接批交周恩来亲自处理。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上。

突出的如 1972 年底，他根据毛泽东对刘建章一案的批示精神，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对北京监狱的待遇问题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所说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都需列举出来，宣布废除，如有再犯者，当依法惩治。此后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仅中央交办、北京市负责审理的 100 多人中，就有一半以上获得“解放”。

1972 年，这时的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干部政策的落实。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直十分看重这件事。前面说过，他在 1972 年重病期间所作的批示，绝大部分是关于解放干部的。接着，周恩来就以很大力量来抓解放干部的工作，但不断受到江青等的无理阻挠，纠缠不休，僵持不下，很难取得进展。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道：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工作提了点分配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走资派’不都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流行的叶帅的牵骡诗，是他在会场上即席写给我的：‘一匹复一匹，过

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那是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叶帅把诗交给我后就请假退席了，我在会上给李先念看，李先念又给吴德看。证明事情之难，阻力很大，收效甚微。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总理很为难。”③

1973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提出整错了贺龙、罗瑞卿等人的问题，有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贺龙等的平反问题。可是，江青、康生等继续寻找借口，一拖再拖，压住不办。

毛泽东这一时期“解放”老干部的批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陈云、邓小平等同志的批语。陈云在“文革”中被解除了除中央委员之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参加老同志学习班，并在春秋季节到外地作些调研工作。毛泽东次日阅信后即批示“我看都可以同意”，“请中央商定”。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林彪的罪行，同时提出愿意做一点工作。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中央各同志，并写了一个较长的批语，亮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并强调指出：“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1973年12月，毛泽东又三次同中央政治局等方面的同志谈到邓小平复出的问题。至12月22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决定的通知，使邓小平又重新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邓小平的复出，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对整个干部队伍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也表明要结束长期以来不正常的混乱局面，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还必须依靠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排在第一位的副总理。四届人大重提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确认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意味着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已遭破产。不久，邓小平即受毛泽东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

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邓小平的复出和领导全面整顿工作，使广大党员、干部感到无比振奋，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自己获得平反、“解放”的希望，开始不断地向毛泽东、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信，形成了继林彪事件之后又一轮较为集中的申诉。

1974 年 7 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他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说：“主要是人事问题。”④

随后，毛泽东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常采取的“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抱病出院参加 7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刚被“解放”的军队干部的会议，并且告诉吕正操：你的事，毛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⑤又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⑥在这种时刻和场合，周恩来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第二天，国防部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叶剑英致祝酒词。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⑦

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他说：“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他还着重地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⑧

关于贺龙，毛泽东在 1973 年 2 月对张春桥讲过：“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指 1933 年 12 月蒋介石派去“策反”贺龙的政客熊贡卿），贺把他杀了。”并说，“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事后，张春桥既不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更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⑨

1974 年 9 月初，毛泽东又向陪外宾来武汉的邓小平提出：“贺龙要恢复名誉”。⑩邓小平回京后，立刻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在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的努力下，终于排除江青等的干扰，起草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平反的文件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 9 月 29 日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在列举林彪一伙蓄意捏造罪状诬陷贺龙的事实后，《通知》宣布：“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

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虽然《通知》在当时条件下还有一定局限性，但毕竟澄清了基本事实，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身上的“罪名”。198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宣布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同时撤销 1974 年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上海是“全面夺权”开始的地方。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时仍在“隔离审查”中。9 月 17 日，毛泽东在陈丕显的来信上批道：“洪文同志：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11]

毛泽东还通过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进一步推动对老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落实政策工作。

这一年，是建国二十五周年。庆祝活动比往年隆重，除组织游园活动外，还增加放焰火、举办大型国庆招待会等。9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将参加国庆招待会见报的名单报送毛泽东，其中包括近几年没有露过面、第一次见报的老干部四十多人，如胡乔木、孔原、伍修权、宋任穷、欧阳钦、林铁、孙起孟、屈武、马文瑞、张劲夫、李昌、李一氓、江一真、杨秀峰、孙大光、蒋南翔、萧向荣、刘少文、傅秋涛、王辉球、陈鹤桥、傅崇碧、薛明、范瑾等。当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念这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稿时，毛泽东又想起一些人，如肖华、侯宝林等，提出应把这些人加到名单里去，还询问商震国民党元老人士，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1949 年辞职留居日本，1974 年 9 月来大陆参观访问是否已列入名单。以后，他又想到需要加上刘志坚。[12]

29 日，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稿时，另加上“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以及齐燕铭、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等。[13]

9 月 30 日晚，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抱病主持盛大国宴，隆重庆祝建国 25 周年。几千名中外人士济济一堂，用热烈掌声欢迎周恩来祝酒词。参加这次宴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中，不少人是刚从“牛棚”或“五七”干校赶来的。

在四届人大前后参与平凡工作的吴德对此有过回忆，他说，1974 年底，毛主席指示周恩来，四届人大之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

护的干部的问题。此后，毛主席亲自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但“四人帮”借口问题查不清楚，千方百计干扰、阻挠干部解放工作。

1974年年底，毛主席在长沙，周总理去见过毛主席后，回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很快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还说，不要原来管专案的人员参与这件事，要过去未管过的人去办。专案工作曾经由三个办公室管理，“一办”由汪东兴负责，“二办”由黄永胜、吴法宪负责，“三办”由公安部谢富治负责。“九一三”事件后，“二办”撤销，其所管的专案分别划给了一、三办。周总理提议、政治局决定由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吴德负责办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成立专案小组，汪东兴任组长。

周总理说：毛主席曾经批评过“搞专案的人，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好像就没有成绩”，华、纪、吴这三位同志没有与三个专案办公室沾边，超脱一点，由汪东兴牵头，因汪东兴在毛主席身边，有事请示方便。

周总理还说，毛主席已经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我们应抓紧解决，不能每件都等毛主席批。

此后，毛主席几次催问工作进展。周总理抓得也紧，要求在三个月内办好。社会舆论当然也跟了上来，多少人正盼着这一天，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老干部。我们感到要在三个月内解决完这件事很困难。当时，我们一方面抓紧听取一、三办人员的汇报，了解情况，看他们写的简要材料；另一方面要翻阅大量档案，这些档案材料很多，一摞又一摞，堆积如山，有的档案材料，光看一个人的，要看完就要一个星期。

而最困难的问题是“四人帮”的干扰。

这已是有前例的。1974年下半年，周总理曾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一批要解放的老干部名单，政治局开会不下十次，都因“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而没有结果。“四人帮”借口这个问题不清楚，那个问题不清楚，提出需要再查。政治局会议有时讨论一整夜，争执不下。后来，叶剑英比喻行军牵骡子过桥，提出先易后难的办法，也没有行得通。在一次会上，叶剑英很生气，提前退席了，留下打油诗《过桥》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再举一个例子。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六十一个叛徒”的案件需要重新审查。1936年，我是地下党的

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了解当时的情况，因此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把当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江青听后变了脸，大声说：你们要给叛徒翻案啊！

江青这么一闹，邓小平没法谈下去了，我也不能说了。如何是好？华国锋、纪登奎和我都很着急。我们将情况汇报给周总理请示办法。周总理经过思索，与我们商量，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就是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其他的人都先放出来，结论由中央组织部和本人单位以后再做。这个处理原则经周总理报告毛主席同意了。

定下原则以后，处理有些具体问题还有难度。例如有中央文件决定的、毛主席批示的案件、人员，我们不好处理。我们又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又同我们一起定了两条：

一、毛主席批的、中央有决定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党正式发了文件的，办理时要慎重，暂不复查，但先把人放出来，然后再审议。

二、凡是只有口供而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和申诉的意见，不必再纠缠。

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大批干部的问题。

在这中间，“四人帮”又出来刁难，张春桥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我们搞出一个明确政策界限的文件。我们斟酌来斟酌去，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在政治局讨论时，仍因“四人帮”的百般挑剔而未获通过。

我们只得又找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请示如何办。周总理说，以毛主席批的29个案例为根据，把毛主席批示解放干部的内容归纳列成条文，作为政策界限文件送政治局讨论，这样，别人（指“四人帮”）就不好说什么了。

政治局开会时，“四人帮”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仍有挑剔之意。我们理直气壮地说明，这是归纳了毛主席批示的各种案例后写出来的。他们这才噎住，不吭气了，没有公开反对。这个文件经政治局通过后，报毛主席审批。

文件送出，我们即将情况向汪东兴通报，提出这个名单我们批不了，要请毛主席批。汪东兴向毛主席反映说：解放这批干部，纪、华、吴几位政治局同志批准不行。毛主席对汪东兴说，那你批吧！汪东兴说他批也不行，谁批都不行，只有毛主席能批。

毛主席考虑汪东兴的意见后，指示汪东兴打电话给纪登奎、华国锋和我，说毛主席看了报告，还要看各案的全部名单，要求我们很快地把所有人员的名单送去。

名单搞好后，周总理要我们先送一份给毛主席，然后再送政治局各同志。

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绕过了“四人帮”。毛主席读了所有名单和我们的意见后，于3月8日批示同意，批件退回中央办理。这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加上牵连专案的干部，获得解放的有六七百人之多。⑭

注释：

①毛泽东的一次谈话记录，1969年5月19日。

②毛泽东在听取军委办事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9年5月26日。

③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④⑩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记录，1974年9月4日。

⑤访问吕正操谈话记录，1984年9月15日。

⑥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10月版，第162页。

⑦《人民日报》，1974年8月1日。

⑧《传达毛主席指示要点》，1974年8月18日印。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写组：《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632页。

⑪毛泽东在陈丕显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4年9月17日。

⑫⑬周恩来：《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的意见》（1974年9月29日）。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457页。

⑭《当代中国史研究》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是在党的左倾错误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它是以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为基础，以反罗瑞卿为标志形成雏形，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尤其是在“杨、余、傅”事件之后，形成了稳定的集团，他们以军委办事组为主要依托，唯林彪是从。以林立果的加入，标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最终形成。

以林彪为首的集团萌芽于林彪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59 年 9 月，毛泽东提议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为林彪笼络亲信、壮大实力提供了必备的资本。此后的反罗荣桓，倒谭政，插手海军、空军的夺权，巩固了林彪在军中的地位。

林彪集团的第一位主力干将是林彪的夫人叶群，她性格奸诈、贪婪、迷恋权势、爱搞阴谋诡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她积极与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拉线，周旋于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之间，为林彪通风报信，探测动向，充当参谋长的角色。林彪的实权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叶群手里。下面的人向林彪请示汇报必须通过她。叶群身份特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权限也就无法估量。

林彪、叶群为了能实现政治野心，一直在寻找机会。林彪的篡权阴谋同中国历史上其他搞政变或篡夺政权的阴谋一样，需要有适合的土壤和条件。1966 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客观上为林彪实现篡党篡国的政治野心、纠集组织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条件。

林彪集团的聚合始于文革前夕的斗罗瑞卿。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曾经是非常密切的。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从 1930 年 2 月开始共事。1959 年庐山会议以后，罗当总长也是林彪建议的。但是，仅仅经过一年，他们的关系就出了裂痕。林彪对于罗瑞卿有时不经过他向毛泽东直接请示和决定问题不满，同时还对罗瑞卿有时支持别的元帅而

不支持他而不满。

1961 年春天，罗荣桓和林彪对如何学习毛著产生分歧，并在 4 月 30 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发生争论。林彪恨罗瑞卿没有支持他，并在一次接见罗瑞卿时冲他发了一通火。

1962 年秋，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生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他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这也引起林的不满。

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发出号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指示。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罗瑞卿提出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过程中要开展比武，后来在批判时又称之为大比武。比武的高潮是参加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成员在毛泽东带领下到十三陵观看军事表演。此时，林彪像局外人一样，正在昆明休息。在参观军事表演以后，毛在十三陵对参加会议的人员讲话，提出了“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的问题，提出了各大区的书记要抓军队，还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7 月间，杨成武按照周恩来、罗瑞卿的嘱托，在昆明向林彪汇报了十三陵军事表演的情况和毛泽东关于战略问题的指示。林表示：“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

在这个时候，林彪下决心要整罗瑞卿，突破口是“比武”。10 月间，为了检查 1960 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刘志坚副主任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要参加进来。刘志坚以生活条件差等理由进行劝阻无效。叶群率几个秘书到达部队后就集中精力挑比武的毛病。调查了三天，感到材料不够，就号召揭盖子，专找在训练中怕苦怕累的，挨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然后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斗干部。12 月 24 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先期到达广州的林彪汇报。28 日晚，林彪接见刘志坚和军报副总编唐平铸，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地位，第二步提高政

治工作。”随后，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1965 年 1 月初，军委连续召开三次办公会议，参加人员随后又扩大到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讨论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 279 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虽然是由刘志坚作的，但内容则是叶群带人搞的。随后展开讨论，中心内容就是如何评价 1964 年军训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与会的绝大多数将领不赞成否定 1964 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

1965 年夏秋之间，林彪、叶群开始诬陷罗瑞卿“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正在组织班子”，并据此指使他最为器重的帮手李作鹏，从海军的角度，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林彪看到仅凭这一条还整不倒罗瑞卿，往后退了一步，让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后来在批判罗瑞卿时，说罗瑞卿修改了 78 处。主要修改是三处。一、在“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了一句：“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二、在提出 1965 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气可鼓，不可泄”。三、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这些修改都成了罗的罪状。

林彪接着做的是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即选择一些人，让他们可以越过各单位党和行政组织的正常渠道，直接同林彪、叶群联系。林彪、叶群通过交底，动员他们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到下半年，李作鹏等四名高级干部和林彪的秘书等共写了九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些材料从 10 月起陆续到了林彪手中。林彪、叶群还曾动员肖向荣、梁必业揭发罗，遭到拒绝。

11 月 18 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同时给毛泽东送去兰州军区《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

同日，叶群带着这些材料乘飞机秘密到达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12 月 2 日，毛泽东对林 11 月 18 日的信和所附兰州军区的报告作了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毛泽东此时认可了林彪对罗的攻击。

1965 年 12 月 8 日～15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



召开。在会上，叶群三次发言。叶群的发言，主要就是造谣、诬陷。特别是江青编造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病重期间向她说过，罗瑞卿曾授意刘亚楼向她转告的四点意见。叶群还诬陷罗瑞卿对刘亚楼说，“办好了，总长不会亏待你的”。叶群用这个捏造的“罪名”，给罗瑞卿扣上“反党篡军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帽子。

叶编造的这些，刘少奇表示“难以置信”，邓小平说是“死无对证”。罗瑞卿则坚决否认。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林、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为了彻底“打倒罗瑞卿”，叶群又进一步施展阴谋手段，以她女儿林立衡的名义，编造了一个《我所知道的罗总长的几件事》的伪证材料。这个假证是叶群口述，秘书记录，最后让她女儿林立衡抄写上送给中共中央的。

12 月 25 日，叶群又叫吴法宪写了一个假证。叶群还指使吴法宪蒙骗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并要她按着叶群口述的内容，以刘亚楼病重时在场人的身份写了假证。叶群一手导演了在政治上陷害罗瑞卿的丑剧。

1966 年春，在北京召开的整罗瑞卿的会上，吴法宪、李作鹏一齐上阵，诬陷罗瑞卿是“篡党、篡军、篡国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危险人物”以及“伪君子”、“要在军队造一个罗家天下”等。

黄永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为了表“忠心”，便写信给叶群，诬陷罗瑞卿“手段十分毒辣，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十足的伪君子，大阴谋家，大野心家”。

这样，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任务都粉墨登场了，林彪宗派集团开始出现了。

在对罗瑞卿进行残酷迫害的罪恶活动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林彪、叶群直接指挥下，忠实执行了林彪的“整罗计划”。林彪认为，他们“反罗有功”，都是忠于自己的心腹。

林彪上台以后急于安插自己的亲信进入军队各个领域，其中，他首先瞄上了海军、空军。

1962 年，他调任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为海军常务副司令员，进行夺权。他说：“海军那里现在思想混乱，反对四个第一，纯军事第一的观点，是没有彭德怀的俱乐部。”李作鹏进入海军以后很快就秉承林彪的意思攻击肖劲光，通过李作鹏控制了海军的大权。此后，林彪通过扶持吴法宪掌

控空军，并借此打击贺龙。

1966年5月18日，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他同叶群蓄谋已久的一篇讲话。

在这个讲话中，林彪搜罗了大量古今中外搞政变的事例，诬陷许多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进了党内。

林彪在继续诬陷罗瑞卿的同时，还直接诬陷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联合起来搞颠覆”，而这种“颠覆”主要是来自国内、党内上层等。

在会上，林彪叫嚷对这些人“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林彪的这个讲话，为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内乱，准备了反革命舆论。

在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位置排列，刘少奇引人注目地由第二降到了第八，而林彪排到了第二，排在周恩来、陶铸、邓小平、朱德等之前。林彪成了全党全军的“副统帅”。会后，林彪又成了党的唯一副主席。他的政治野心在他的地位和权力增长的同时，也进一步膨胀。

此后林彪一伙又以各种理由控制军队大权，他们通过打倒贺龙、刘志坚、肖华，制造“杨余傅事件”，以及打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一步步将总政、总参、总后三总部，将军委办事组，将空军、海军等的领导权控制在手中。

1967年4月初，驻京各军事单位的文艺团体，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开始准备文艺演出。在筹备庆祝时，解放军总政治部明确指出，观点不同的各种群众组织，都要以文工团为单位，实行同台演出。总政治部的指示中还明确提出，这是消除两派群众对立情绪、促进革命群众团结的有效措施。

周恩来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进行联台演出的做法，非常赞同和支持。但是，叶群则反其道而行之。她对海军“红联总”头头说，单干不行，可以联合起来演出。有林彪、叶群撑腰，吴法宪、李作鹏完全不顾周恩来和总政治部的一再反对，指使海军、空军、二炮、北京军区等单位文工团中的一派群众组织于5月13日晚搞联合演出，把各单位文工团中的另一派组织排

除在外。正是这种制造分裂的活动，导致了“五一三”流血武斗事件的发生。

“五一三”事件开创了解放军打解放军的先例，打乱了军队原来相对稳定的局势，进一步分裂了军队，成了军队“画线站队”的标志之一。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从此则以“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面目出现，逐渐左右全军的“文化大革命”。

因此，“五一三”事件，是林彪和他的心腹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和影响，在全军和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林彪、叶群事前对这一事件进行阴谋策划，事后又对这一事件的结果加以精心利用。

5月14日、15日，叶群带着吴法宪、李作鹏、戚本禹等人，到海军医院、二炮医院，代表林彪看望受伤群众。但是，他们只看望支持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一派的武斗受伤群众，而对另一派的受伤群众却不理睬。与此同时，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林彪封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领袖。叶群还把反对搞一派联合演出的群众组织，称之为“冲派”。林彪、叶群的这个举动，一方面在政治上大大地提高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身价，另一方面则给了未得到他们支持的另一派的群众组织以很大的压力。

5月16日晚，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在海军大院再次组织联合演出，表示示威。出席“亮相”的有吴法宪、李作鹏以及二炮、北京军区的有关领导人，这是所谓的“三军”领导人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6月9日，林彪特地到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了“三军”文艺团体的演出。第二天，部分人便在叶群的授意下，上街游行。这不仅掀起了吹捧林彪的高潮，同时也提高了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林彪的干将的身价。

6月10日上午，根据叶群的授意，在李作鹏的直接安排下，由海军负责组织，空军、海军、二炮等单位的几千人，到总后勤部大院游行，支持被群众揪斗得四处躲藏的邱会作“站出来”。

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五一三”事件前，由于群众造他们的反致使他们的处境十分艰难。“五一三”事件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仅由被打倒对象变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摆脱了原来的处境，而且成了“合法”军委“看守小组”（此时是内部组织，没对外公布）的成员。这个小组是由叶群和江青密谋后于8月17日成立的。

吴法宪负责这个小组，小组成员有叶群、邱会作、张秀川（李作鹏因随毛泽东外出，海军才由张秀川）等人。这个小组接受“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负责处理驻京机关、部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从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更加不可一世，毫无顾忌了。这样一来，“五一三”事件就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使林彪的势力有了明显的变化和加强。

1968 年 3 月 24 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有个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在这个会上，林彪当场宣布：撤销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职务；逮捕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撤销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其真实目的是林彪为了进一步支配首都局势和控制在首都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禁卫军”，并通过“杨、余、傅事件”打击朱德、聂荣臻、陈毅、徐向前等老帅，第一次公布了“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详情。“三二四”大会名副其实地第一次把老帅们赶下了主席台。林彪反革命集团不仅仅要打倒“杨、余、傅”三人，更重要的是林彪借此排斥异己，安插了亲信。

3 月 25 日，在林彪主持下改组了军委办事处，另成立办事组，军委办事组由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邱会作、李作鹏为成员。3 月 27 日，林彪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在十万多狂热的人海中，林彪宣布由黄永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温玉成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停止活动，不再开会了。军委办事组就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原来领导中央军委工作的老帅们，也全部被赶下了台。老帅们对军委的领导权彻底被剥夺了。林

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合法”化了。

这样，林彪一伙就以“合法”形式，利用篡夺的权力，更加横行无忌、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老干部，进行一系列篡党篡国的反革命活动。例如诬陷并迫害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几位老帅的所谓《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的大事记》；诬陷叶剑英的所谓《叶剑英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材料》；对罗瑞卿、贺龙等人进行的人身迫害等罪行，都是在这个军委办事组指挥下进行的。

同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叶群为了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力量和基地，排除反对他们控制空军的阻力，指使吴法宪趁着混乱之机，把反对他们的人搞掉。吴法宪根据林彪、叶群的旨意，在空军制造了三次所谓“罢官夺权”事件，打击迫害了一大批空军领导干部。其间，吴法宪于1967年把一个不是党员的“新兵”、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安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接着，不到半年，吴法宪又亲自当介绍人，把林立果拉入党内。此后，吴法宪又两次向时任空军政委的王辉球说，林彪把林立果派到空军来，是对他们最大的“关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吴法宪并让周宇驰、王飞把这些内容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空军直属机关进行了传达。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纲。同时，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也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紧跟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些人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到1969年10月，吴法宪又把入伍两年多的林立果，一下子提升为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兼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与此同时，吴法宪向王飞、周宇驰和林立果宣布，关于空军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向林立果“报告”，空军的一切行动布置，都必须听从林立果的“指挥”。由此，林彪反革命集团最终形成。这深刻说明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同林彪、叶群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正常的同志之间的工作关系，而是在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和宗派主义基础上，出于共同的反革命目的而结成的反革命集团中的主与仆、头子与成员的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反革命结盟的关系。

这样一来，林彪反革命集团完全控制了中央军委办事组，达到了权势的顶点。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势力的增大，其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步伐。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争议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形成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各自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共九大以后，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林彪集团首先发起了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一场争议，由此，中国最高决策层再次引发了一场“庐山风波”。

1970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讨论筹备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提出，新宪法中应设国家主席一章，并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让汪东兴回京向中央政治局传达他关于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以及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央政治局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意思，决定在政治局成立宪法修改小组成。

毛泽东的意图是“文化大革命”已近尾声，各级党组织也已陆续恢复或建立，下一步应该是重新组建政府机构，使它正常运转，发挥各种职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3月17日至20日，中央工作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一职存在不同意见。

3月25日，周恩来将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书面报告给毛泽东、林彪。

4月4日，陈伯达致信周恩来、康生，提出毛泽东批评的缺点方面，主要应由他来负责，并建议在中央范围内先开一次会，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批示。对此，周恩来批示，将毛泽东的批件先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正在苏州休养的林彪无疑也很快就见到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但他对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却没有作出什么反应。

4月11日晚，林彪突然从苏州通过秘书以电话记录的形式向在长沙的毛泽东提出：关于国家主席一职，“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林彪还特别表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这个电话记录，同时也被传给了中央政治局。



4 月 12 日，已访朝回京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林彪的“建议”。会上，多数中央政治局成员对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表示赞同，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对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来说，设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个形式问题；因为无论毛泽东是否担任国家主席，他的最高权威地位都是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当然，这件事最后还要报毛泽东决定。

当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泽东请示报告时，毛泽东当天批道：“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4 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然而，林彪仍然主张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5 月中旬，林彪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7 月 17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召开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修改宪法问题。7 月 17 日，周恩来在会上宣布，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林彪任副主任，委员会成员共 57 人。

7 月 18 日，周恩来在东北、西南组小组会上发言，提出修改宪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中包括突出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党是我国的核心力量；毛泽东是全国武装部队的统帅，林副主席是副统帅，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等问题。同时会议根据讨论的情况，多次修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和通过四届人大代表问题的通知稿。在周恩来的通盘筹划下，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按计划进行。

8 月 13 日，在康生主持下，中共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讨论宪法草案稿的会议。在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再一次就宪法草案稿中的有些提法发生争论。张春桥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理由，提议删去原草案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则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在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宪法再次重复上述观点，并得到叶群的鼓励。

8 月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对宪法修改草案最后定稿。

8 月下旬，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这是建国后召开的第三次

“庐山会议”，到会的共有253人。

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其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等事。在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会上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都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仍然坚持其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这是毛泽东1970年春以后第四次表明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8月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周恩来在开幕式上宣布了全会议程。周恩来还谈了会议的时间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成分裂的失败的会”的意见。同时在会上林彪发表了讲话。林彪说，毛泽东在会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指示。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四届人大的问题，毛泽东一直都很关心。关于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他认为这很必要，很合时宜。这次他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革命的工作是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地位是否巩固。

林彪讲完话以后，康生发言。康生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康生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这个重要问题上，所有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彪当国家主席。如果是毛泽东、林彪都不当国家主席的话，那么国家主席就不要再设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这时，吴法宪提出，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林彪的讲话录音并分组讨论。江青、张春桥等没有表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这一提法打乱了毛泽东既定的会议议程，却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会议便作了这样的安排。

第二天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根据林彪的旨意，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



组、西北组会上发言。在华北组的陈伯达说，林彪在这次宪法中肯定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泽东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在西南组，吴法宪也很积极地跳出来说：“当前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吴法宪在小组会上甚至为此与张春桥唇枪舌剑，大吵了起来。

李作鹏也“忙”得不可开交。他在中南组说，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彪。“当前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却偏偏想往下吹。

邱会作来到西北组。他对这一组的代表说，争论的实质是反映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林彪曾经说过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思想要全面继承、捍卫等等。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仍然应该坚持这种观点。

与会者中有不少人出于个人崇拜，确实真心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对林彪等人的发言纷纷附和。8 月 24 日下午，有的同志就在华北组会上发言说，他完全拥护林彪 8 月 23 日的讲话。并且表示同意陈伯达的发言。还说，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很严重的”。“党内还有这样的野心家”，这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路线”，是“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

他还建议，根据中央办公厅机关和 8341 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但在小组会上，没有人提出让林彪当国家主席。

叶群等人气势汹汹地把“不设国家主席”的提议说成是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但正是毛泽东本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

叶群等人说，有人反对提毛泽东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但这正是毛泽东本人所提倡的。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对九大党章进行讨论时，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状语。而当一些同志提出意见说，这三个词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

的，新党章不写不好时，毛泽东则明确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所有人对毛泽东的意见也都表示了同意。因而，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个状语，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词。

叶群等人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斗争才写入宪法草案的，不写入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但是宪法修改小组已在8月12日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8月13日，这句话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8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这句话就被通过了。

小组会后，华北组就陈伯达的发言向大会秘书处交了一份简报。经李雪峰、吴德、解学恭等三人签发，大会秘书处于当天晚上印了这份简报。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8月25日上午，这份简报就发到了与会者手中。这份简报煽动性很大，在各小组引起强烈反响。有些组也仿效华北组的做法，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把“否认毛主席是天才”、“不赞成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人揪出来“斗倒斗臭”。从而造成一种紧张的局势。

这场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已演化为一场尖锐而复杂的斗争。它有紧密关联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叶群秘密指挥吴法宪、李作鹏、陈伯达等人在庐山四处煽风点火。叶群以为喧嚷一番“天才”论之后，众人就会推举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而既然毛泽东已一再表示不能重新担任，那么国家主席的职位则“非林彪莫属”。

同时，叶群在这一过程中采用“捧杀”策略，以为如此既可以蛊惑人心，又可以见风使舵。但是，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除了他自己不愿重新担任而外。它的特定含义显然首先就是不同意由林彪任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已逐渐察觉到叶群等人的地下活动。

事实上，就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前期，毛泽东对这一“捧杀”就已经有所察觉。对此，毛泽东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树他自己。”

另一方面，更具有实质性的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矛盾日益激烈。不设国家主席就是不由林彪任国家主席。这对江青



集团有利。因而，江青集团始终坚持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当然他们坚持这个意见并不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并且企图借此机会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

8月25日下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了断然措施。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指示，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

毛泽东还在扩大会上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同时还明确地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随后，毛泽东于8月31日找了一些人谈话后，就此写了一篇题为《我的一点意见》的700多字的短文。严厉批评陈伯达等“采取突然袭击、煽动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的指示，给了正在得意忘形的林彪一伙当头一棒。林彪立刻私下传话给吴法宪等人，要他们不要再坚持设国家主席了，也不要再提“天才”了。但是当周恩来提出要吴法宪等人作检讨的时候，林彪却在暗中向吴法宪打气说，吴法宪没有错，叫他不要作检讨。叶群更直截了当地叫吴法宪不要紧张，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

在小组会休会期间，周恩来连日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并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要吴法宪将手中那本《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转送给毛泽东。

8月29日，林彪被迫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陈伯达、吴法宪等人的检讨。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与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

周恩来在会上严肃地说：“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八月二十五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

周恩来强调：“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

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

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虽然先后作了检讨，但他们的检讨没有触及实质性的问题。

9月1日，《我的一点意见》印发全会后，各组开展对陈伯达的行为进行揭发批判。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陈伯达等人多次在一起研究如何检讨，掩护退却。林彪则有意保护吴法宪等人。在这几天里，周恩来先后参加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小组的讨论。

由于这些突发事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已经难以再按照原订计划进行讨论了。

9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各组组长会议，商量本次庐山会议的会期问题。周恩来提出会议在9月6日结束为宜。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全会基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在闭幕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的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陈伯达等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泽东说：“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同时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在庐山准备中央全会公报稿的改定；印译、播发等工作。这次全会的公报一反寻常地迟迟未予公布，直到9月10日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中写道：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970年8月23日开幕，于9月6日胜利闭幕。”“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根据会议的议程，进行了热烈讨论。”“全会认为，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全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议，进



行必要的筹备工作，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获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经过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必须继续加强这种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全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用新的胜利，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尽管《会议公报》引人注目地公布了要召开四届人大，而对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只字未提，但是在庐山会议上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因此，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被搁置起来了。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甚至战争的威胁。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悍然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新中国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进行侵略战争，对中国的威胁越来越严重。

这一系列严峻的周边态势，使得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政府一直注意开展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对外敌人侵的高度警惕，主观上仍强调要继续加强战备工作，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情况下，军队和地方的战备工作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有的甚至已经陷于瘫痪和停顿。

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同时，按照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设想，这意味着“文化大革命”已由“天下大乱”的阶段进入了“天下大治”的阶段。

与此同时，在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对亚非拉国家的干涉已越来越困难。而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凭借在全世界到处伸手推行霸权主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力量的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新态势。同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两国边境的摩擦不断。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中国战略防御的重点，逐渐由南向北转移，核心地段放在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地区。随着中苏边境冲突



事件迅速增加，特别是1968年7月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部队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紧迫性、严重性的估计急剧上升，迫切希望搞好各项战备工作，以应付可能发生的苏联突袭入侵事件。

这也是中共九大召开前后全国范围的战备工作高潮的外部原因。

从1969年3月至1970年底，是中国战备高潮的掀起与形成的阶段。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边境军事斗争一触即发。中国前所未有地更直接、更严重地感受到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全国性的战备工作也随之进入高潮。

在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发表社论，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苏修叛徒集团”。在1969年4月28日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要准备打仗的问题。

中共九大召开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的轨道，很快进入了突击性的高潮阶段。

1969年6月，为系统研究、制订对付苏联入侵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委召集的“三北”会议在北京举行。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办事组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的“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由于国家盲目扩大军工生产，国防建设过于突出，造成了工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了社会财富巨大的浪费，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1969年6月中旬，中央军委办事组公布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机关精简整编方案。同年6月中旬至7月初，总参谋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通信工作会议。会议着重就战备通信保障计划、加强通信保密的措施和全国地下电缆网的建设规划等问题作了研究。

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示，在地方各级革委会统一领导下，吸收驻军和地方有关部门人员参加，组成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小组下设办事机构，承办日常业务工作。同时，报告规定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的基本任务为，组织和领导对机关、部队和人民群众战备思想教育和防空常识教育等项工作，拟制对空防御作战计划并组织实施，拟制城市战时人口疏散计划并组

织实施；组织和训练群众性的消防、救护、抢修、治安队伍等。

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担任组长，黄永胜、谢富治、吴法宪、阎仲川担任副组长。办事机构设在总参作战部。

9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交通战备建设指示》，批准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修建战备国防公路，要求国防公路1970年开始，在三年内完成。军委办事组并在9月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9月23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口号》。《口号》共有29条，其中第十一条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第十二条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混乱局面给战备工作带来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中共九大以后，虽然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相继成立了，整个形势逐渐趋于平稳，但前一阶段"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留下的后遗症绝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更何况"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又在继续造成新的动乱，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战备工作的进行。不久，山西、河南、江苏、湖北等一些省、市、地区逐渐平稳的态势又出现反复，动乱再起，部分地方武斗严重。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中共中央于1969年7月23日发出布告，即著名的"七·二三"布告。布告中明确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大联合等等。

"七·二三"布告的发布，在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等省的形势迅速好转，其他省、市、自治区存在类似情况的地区也受到震动。布告本身没有谈到战备问题，但它所针对的问题和所产生的结果都与战备密切相关。它对战备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七·二三"布告仍不能解决此时大规模动乱和武斗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严重问题。

自布告发布之日起，一些边远省、自治区武斗动乱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一现象与这时已经十分严峻的战备是很不相符合的。

为此，中共中央于1969年8月28日发布命令。这个命令既是一个广泛、紧急的战争动员号令，又是一个措辞严厉、态度坚决的要求立即停止武



斗和大规模动乱以及安定形势的命令。

命令首先指出了美国和苏联加紧勾结、狼狈为奸、企图阴谋侵犯中国的严峻形势，再次要求边疆军民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同时命令中还明确要求，驻边疆部队指导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意敌人动向，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这一系列命令被统称为“八·二八”命令。

“八·二八”命令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了战备工作的紧迫性，把战备问题与稳定形势、平息武斗、消灭派性及加强纪律等问题联系起来。以此为标志，全国的战备工作立即进入高潮，并由在这之前的主要是思想动员阶段进入了全面的具体实施阶段，由主要是部队的工作变成了全国人民的紧急行动，由领导机关的一般工作上升为最重要的工作。

“八·-二八”命令下达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均在8月底和9月初召开各种会议，宣读中央的这一命令，部署、检查落实各项战备工作。

9月2日和3日，北京市革委会连续两次召开全市大会。大会号召全市800万军民立即动员起来，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坚决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号召，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团结起来，准备打仗。

同时在对“七·二三”布告，特别是“八·二八”命令广泛的、声势浩大的宣传和贯彻执行之后，一片浓厚的战备气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此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的因素都为了完成加强战备的首要任务而受到严厉的打击，革委会的权威也得到了维护，社会生活、工作秩序有所好转，工农业生产得到一定恢复。这些都是进行战备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1969年9月11日，应苏联方面的要求，周恩来在北京机场接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讨论了两国关系中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苏联方面表达了缓和边界形势的意愿。双方商定，同年10月在北京重新开始中苏边界谈判。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南苑机场。当晚，他立即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阎仲川等人开会，布置紧急战备疏散问题。林彪命令当晚立即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机空降；留在

机场的值班人员也全副武装。9 月 30 日晚，空军在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值班飞机外，全部转移。其他措施也马上落实。

10 月中上旬，为防止苏联军队大规模突然袭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撤至北京西郊临时办公，总参谋部组成了以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为首的战时指挥班子。前指进入京郊战备工事。

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林彪要秘书给在京的黄永胜发出“六条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当即，黄永胜布置阎仲川向全军传达“六条指示”。阎仲川立即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由前指下达全军。全军立即进入紧急备战状态，或进入前沿准备工事或紧急疏散。

10 月 19 日 ~20 日，许多大中城市也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

10 月中下旬，全国上上下下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随即进入了戒备状态。

中苏边界谈判重新开始以后，两国关系有所缓和，战争一触即发的迹象逐渐减少。这时，虽然有些部队还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但总的来说，全国全军的备战活动已开始缓慢地从那种大战在即、一触即发的状态向常备型状态恢复。即使转变已经缓慢地开始，但直到 1969 年底，战备气氛仍然没有烟消云散。其规模远远超过了 1969 年 9 月以前和 1970 年以后。此时在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日常工作中，战备工作被当成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纲”。

1969 年 10 月至年底，全国各地战备工作的重点已普遍从平息武斗、铲平山头、促进团结、批判无政府主义等转到战备教育、战备动员、战备训练、战备组织、物资储备、人口疏散等方面。

此时，中共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一种“内紧外松”的方针。紧张的国际形势，大规模紧迫的战备活动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几乎没有反映，尽管战备工作一度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但报纸和广播的基本内容都是“革命大批判”、“活学活用”、“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整党建党”以及工农业生产等工作，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从 1970 年初开始，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一些变化。全国的战备工作也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于 1969 年的显著的特点。

1970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



《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社论，号召全国人民进一步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用毛泽东关于“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推动“斗、批、改”运动深入进行，检查“斗、批、改”取得的成果，戒骄、戒躁，更好更快地完成中共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

在这里，虽然战备工作仍然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但在程度上，较之1969年10月至12月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已显得不太突出了。

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时，再一次谈到了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毛泽东表示，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一文里又明确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从此以后，毛泽东的多次谈话和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对中国战备的提法与以前有所差别。

在1970年9月6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中，有关战备问题的提法有一定变化。公报没有重复以前有关“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而提出的是“抓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这种提法实际上是恢复了1969年以前战备工作没那么突出时的提法。

197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国庆社论又重复了这一提法。这些提法的变化表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备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已得到了适时的调整。

在减少了对“备战”的强调之后，与1969年相比，由于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中国突出了对美国扩大印支战争和加剧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谴责。

1970年11月24日，中国外交部在发表谴责美帝国主义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新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越南和印度支那局势的发展。中国政府重申，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12月13日，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再次严正声明，强烈谴责美国扩大越南战争，轰炸越南北方。

如果把1970年中国对美帝国主义扩大印支战争的强烈反应，与1969年中国因苏联的战争挑衅而进行的全面战备动员相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因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际战略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虽然这种变

化不是根本性的，但它还是逐渐影响到 1970 年中国的战备活动及其他各项工作。

从 1970 年初开始，随着大规模的战备活动逐渐向常备型方向发展，战备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从 1970 年初起，虽然中共中央在内部讲话、文件和动员中还把战备作为整个工作的“纲”或“中心”。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 1970 年初全面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加之“斗、批、改”运动中的各项繁杂任务，以及 1970 年初掀起的工农业生产高潮，战备工作往往不再被放在中心的地位。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精力往往不得不放到不间断的、杂乱纷繁的政治运动和发展生产的运动上去。

然而，尽管如此，战备还是对 1970 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或者也可以说，虽然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战备工作没有被摆在中心位置，但此时的各项工作却又都是在强烈的战备气氛中展开的。

1970 年 2 月 15 日 ~3 月 21 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拟定的计划纲要中强调，四五计划期间要将内地建成一个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备后方；同时，内地的工业要大分散、小集中，不要过多集中于大城市，工厂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特别重要工厂的关键设备或车间，有的要“进洞”等。四五计划纲要草案所提出的一些超出实际的高要求和高指标以及这个时候以战备为中心带动其他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希望在 1970 年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的愿望是密切相关的。1970 年国民经济的盲目“跃进”也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不仅如此，除经济工作外，1970 年特别是其上半年的“斗、批、改”运动也受到了战备工作的巨大影响。

同年 11 月 24 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但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

随后，从 1970 年底至 1971 年初，野营拉练在全国全面铺开，迅速掀起了空前的大规模的野营拉练热潮。

战备工作中的交通建设在 1970 年出现了空前的多项目、大规模、高速

 

度的局面，新建了大量的铁路和国防公路，疏浚、整治了航道，各地区还新建了许多地方交通线路。同时，全国范围内大三线的铁路网也迅速形成了。

国防通信网的建设也有进一步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地下指挥所为中心的平战结合的通信网，有效地增强了通信的可靠性。

在这同时，地方的战备活动也在广泛进行，但其声势和紧张程度已不如1969年下半年。

1970年上半年，东北、华北等地区又分别召开了各地区的战备工作会议，然后有关省、市、自治区又分别召开了各自的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的精神层层传达，直接指导着基层各单位的战备工作。会议研究分析了国际形势，总结和交流了前一阶段各自战备的经验，研究和确定了以后战备工作的方向和内容。

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工作在1960年的基础上，又取得了较大进展。到1970年底，全国许多城市的防空工事已连片成网。此外，物资储备、军事生产、后方建设、支前准备、战地医疗网等各项战备工作，也都有了很大发展。

1969年～1970年间的全国性战备高潮，是中共中央在中苏发生武装冲突、中美继续对峙的国际环境中，在对于发生外敌入侵、对立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后产生的。从1970年上半年起，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地调整了战备构想之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又逐渐走向常备型的轨道。同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和紧张的战备空气，使得中央在1969年下半年毅然采取断然措施，迅速有力地解决了由“文化大革命”中持续已久的“全面夺权”、“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所遗留下来的武斗、派性和无政府主义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纪律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这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战备工作的进行创造了基本条件。

林彪天才论的出笼和破灭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明确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响应鼓吹"正确的崇拜"最用力的当属林彪。林彪独树一帜，在军队内部首先不遗余力地搞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竭力塑造自己毛泽东思想捍卫者的形象。

1958 年以后，在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为主"的方针指引下，全军开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著作，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是，林彪在这场学习过程当中，又别出心裁地提出和推行了一整套"左"的东西。林彪首先提出了走"捷径"和"顶峰论"。

1959 年 9 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捷径论"。林彪向大家提议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说这是捷径，这并不是吹捧毛泽东的，而是告诉大家一个学习的简便的窍门。

林彪还孤陋寡闻而又别有用心地说道，马克思本人就没有写过哲学著作，他准备写一个相当于报纸那么大的辩证法，但是他没有写。恩格斯也只是讲了几段，列宁也只不过写了几篇小文章。在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导师中间还是中国的毛泽东，毛泽东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林彪显然是在吹捧毛泽东的过程中把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列主义对立起来了。

进入 60 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



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2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毛泽东的许多“警句”要把它背下来，恩格斯的不要死背。但是，林彪又主张要背一点东西，肚子里就是要背得那么几条。“大家不要背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道理太多了也不需要，但是一点没有也不行。

随后，林彪又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1960年10月，林彪在视察部队时说，“带着问题学”毛泽东的著作，这种方法是“有的放矢”。部队学理论就是要有什么问题学什么，需要什么学什么。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接着，林彪又提出了“背警句”和“带着问题学”的一套实用主义和庸俗主义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张。

1961年1月，林彪提出了后来影响巨大、流传甚广的学毛著“21字方针”：“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

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 年 9 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 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林彪提出的“背警句”、“带着问题学”的一系列做法，实质上是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

为了表示自己的“紧跟”和宣扬自己的“高举”，林彪从提出“走捷径”、“顶峰论”、“背语录”到“二十一字方针”，形成了一套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简单化、庸俗化和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并把它作为自己“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表现到处宣扬。

1963 年 12 月 23 日～1964 年 1 月 13 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召开。林彪在会议上极力推行实用主义的“二十一字方针”，说它不仅适用于战士，也适用于干部；不仅适用于一般干部，也适用于高级、中级干部，适用于各行各业作各种不同工作的干部。

会后，林彪一手策划，又把此时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典型塑造成运用“二十一字方针”的典型。这就使林彪这一套“左”的东西逐步得到推广。



1964年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1965年12月，《毛主席批示同意林彪同志提出的五项原则》即“五项原则”是：第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第二，坚持四个第一，特别要大抓狠抓活思想。第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同时要切实搞好干部的领导作风。第四，大胆地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第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七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一段话，他说：“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十九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二十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

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后又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

1966年8月18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由刚刚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的林彪讲话。陈伯达在开幕词中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我们在伟大统帅的指挥下”，等等。不难看出，在这一天陈伯达先提出了“三个伟大”，即在“伟大的领袖”之外，又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的头衔，林彪则给毛泽东增加了“伟大的统帅”的头衔。“四个伟大”在18日确实都有了，但在第二天即19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中，还未将这“四个伟大”并列在一起，而综合林彪和陈伯达的提法只是并列了“三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种综合并列的提法，在19日的《人民日报》上，从通栏套红的口号，到画面解释，再到正文解释，至少有五次出现。由此可见，“四个伟大”并不是一下子就出现的。

只是到8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并列的“四个伟大”才第一次出现。这篇社论开头就说：“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



日，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穿着人民解放军军装，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其他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百万大军。”这个时间表表明“四个伟大”的提出和形成经过了8月18日至20日三天时间。在“四个伟大”中，为什么把“伟大的导师”排在最前面？据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这是康生的“功劳”。他说：“康生还把几本外语词典带到中央文革小组会议室来，翻查、考究、推敲的结果，认为‘伟大的导师’最重要，应放在前面。”8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眼”就写出了“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口号。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讲话开口就是：“我代表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向各地来的同学问好，向大家问好！”这样，“四个伟大”也就铺天盖地地流传开了。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1967年五一劳动节，林彪题词，即为：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幅题词的手迹发表在196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毛主席像的下面。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称：“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同志为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题词，最集中的表达出了亿万人民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感情，成为今天整个节日庆祝活动中最响亮的颂歌。”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调子就进一步升格了。“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四个伟大”的手书随处可见。

其实，林彪“造神”，并不是为了自己信神，而是为了把他自己变成神，迷惑人民群众，为其篡党篡国制造舆论。

1966年12月1日，周恩来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说明》。2日，毛泽东在审阅时，将文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删去。

1967年秋，杨成武随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期间，毛泽东曾同杨成武讲过林彪讲的“四个伟大”的问题。毛泽东在和杨成武的谈话中说，他看

了“四个伟大”的头衔很不舒服。1967 年 2 月 3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卡博 · 巴卢库时说：“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就不高兴。但是，有什么办法！他们到处这么搞。”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二天，毛泽东在具体谈到关于氢弹爆炸的新闻稿时说：昨天氢弹公报我就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1967 年 7 月 ~9 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时，又一次强烈批评“四个伟大”的提法。他对随行的杨成武说：“我现在很不喜欢‘四个伟大’，讨嫌！”

以上就是毛泽东对“四个伟大”的态度。

1970 年 8 月 23 日 ~9 月 6 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 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庐山政治风波

陈伯达投靠林彪，江青一伙对陈恨之入骨，对林彪集团也忌恨异常。这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后来发生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导火索。

1969 年，中央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名义，下发了《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从这时起，围绕着起草九大文件权的争夺就开始了。

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况是：林、江两个集团，不论哪个集团，谁拿到了九大文件的起草权，谁就在政治上占上风。显然，起草者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也是稳固的，起草九大文件，标志着他们是受毛泽东信任的，而且起草者的政治观点能充分体现在文件中无疑，这对于发展其集团势力极为有利。

江青、康生、张春桥他们借口上海是所谓“一月革命风暴”的发源地，向毛泽东建议，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先起草修改党章的意见，再在此基础上形成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上海是江青、张春桥的老窝，实际上，江青一伙已经把起草修改党章文件的权力抓到手了。林彪、陈伯达要争夺的，也只有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权了，他们当然要力争。

一开始，毛泽东决定，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已经投靠林彪，是林的人，而张、姚则是江的人，且此时陈伯达已与江青等人很少往来了，三个人根本不可能合作。于是，陈伯达决定单干，而且自己动手亲自写。江青假惺惺地让张春桥、姚文元请陈伯达去和他们一起写，陈不去。江青便指使张、姚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毛泽东，又把康生请来挂个名，算是牵头人，由张春桥、姚文元组织人单独起草九大政治报告。两个集团展开了起草竞赛。

两个报告稿都拿出来了。张、姚把他们起草的报告稿单独送毛泽东，陈伯达也把他起草的报告稿用大牛皮袋封起来，单独送毛泽东。不久，陈伯达收到了毛泽东退回的牛皮袋，上面写着毛泽东的几个字：退伯达同志，毛泽东。牛皮袋的封口根本没有打开。这不仅表明毛泽东决定不用陈起草的报告

稿，而且表明毛泽东更加不信任陈伯达了。

林、江在九大文件起草权上的较量，以江青得势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集团势力有所减弱，也不表明林、江两个集团的关系已经破裂。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发展，合作也在继续。江青等人还是极力主张在九大报告中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林彪也继续吹捧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两个集团下一轮的争夺，就是看谁更多地把自己的人塞进中央政治局了。

1969 年 4 月 1 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的大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左侧是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新文革”成员，毛泽东右侧是周恩来等“旧政府”成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十分积极，在讨论报告过程中分别到各组进行“辅导”和“帮助”。在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暗中争夺，都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塞人中央委员会，为把持中央领导机构作准备。在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除在外，而林彪、江青的帮派亲信大量充塞其中。

4 月 28 日，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叶群、吴法宪、黄永胜、谢富治等成为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占据了政治局的半壁江山。会议没有再设立中央书记处。这样，通过筹备九大，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合法化，还拼命把自己的成员安排进中央领导层。

然而在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原来由康生主持起草的修改草案中规定“设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文革这样的机构”，毛泽东在审阅时把它改为“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确定在九大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

九届一中全会后，中央文革小组逐渐停止活动。虽然全会后也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行文，但是次数极少。1969 年 7 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的中央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中，还有拟保留中央文革的内容，毛泽东也批示“原则同意”。但是，文革小组终究没有保留下来。

中央文革小组的取消，客观上削弱了江青一伙的权力，令他们失去一个重要阵地。江青后来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由于对自身处境不如意，不甘寂寞的江青在一段时间里回到上海，和张春桥、姚文元议论他们的各种阴谋，继续兴风作浪，加上因造反起家、在九大



上进入中央的王洪文，逐渐结成“四人帮”，发展自己的势力，攫取更多的权力。

而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他们已经拥有相当的政治资本：林彪不仅成了法定的“接班人”，而且通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等控制的军委办事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但他们仍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可能。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本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是密切合作的。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边是野心勃勃的林彪集团，另一边是不甘寂寞的江青一伙，互相倾轧，愈演愈烈。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越来越不能相容。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还是警惕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在他给江青的信中，已经表明了他对林彪的这种警惕。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看到林彪一伙势力急剧膨胀，就试图通过九届二中全会酝酿召开四届人大有关事宜和修改宪法的机会，抑制一下林彪集团。

早在1969年5月下旬，毛泽东在武汉期间，他就一再谈到要减少对他个人的过分颂扬。有一次，他针对林彪最先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更加盛行的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说法，向工作人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话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不能顶那么多。我的话怎么可能有那么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吗？这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辩证法。”6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指出：当前在国内宣传中出现了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1970年4月初，毛泽东审阅中央“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列宁诞辰一百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稿，写下一大段批语：“关于我的话，删掉了几段，都是些无用的，引起别人反感的东西。不要写这类话，我曾讲过一百次，可是没有人听，不知是何道理，请中央各同志研究一下。”

他在稿中删去的话有：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等等。这些被毛泽东认为是“无用的”和“引起别人反感”因而删去的，几乎全是人们所熟悉的林彪用来颂扬毛泽东的原话。

接到毛泽东的批件后，周恩来立刻将此件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传阅。见到传阅件的林彪却保持沉默。

根据毛泽东批准的计划，将在同年8月下旬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9月举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7月20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地认真动员群众，广泛讨论对宪法的修改，提出修改意见，讨论并通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为此，林彪、江青两股势力加紧了“较量”的步伐。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中央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是主任，林彪是副主任。8月13日下午，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十天，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会上，吴法宪同张春桥就草案稿再次发生激烈争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话：“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张春桥提出：“已经有了理论基础一句，后一句可以不写了。”又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吴法宪不知道后一句话是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外宾波德纳拉希时针对赫鲁晓夫说的，而以为这下可抓住了张春桥的把柄，找到了对他们发动猛烈攻击的突破口，立刻情绪激烈地反驳：“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肯定了的。这样说不是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吗?”又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议休息时，吴法宪打电话向黄永胜通报情况。会后，陈伯达又邀吴到他家里进一步磋商，最后由黄永胜向正在北戴河的叶群作了汇报。叶群在电话里告诉黄永胜：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夸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宪法修改草案。会前，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天才”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以便在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同张春桥等“斗争”。但出乎他们的



意料，很有心计的张春桥没有再作争辩，宪法草案稿顺利地通过。林彪又暗中叮嘱黄永胜、吴法宪等：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8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坐专列从杭州出发，赴江西庐山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21日，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林彪报告：“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计划和战备工作”，并且报告了这三项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大会编组是按六个大区来混合编的。担任华北组副组长的吴德回忆说：“初到庐山，气氛并不紧张，我乃没有料到会有一场巨大的风波。”8月22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量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日程等。

会上谈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到会的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泽东听了很不满意。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最后，他严厉地告诫道：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但是，到会的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知道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他决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宪法修改草案中已删去“国家主席”一章，而在全会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一边倒”现象：从中央党、政、军部门到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参加讨论的人员当中，大家的“热切愿望”都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就连毛泽东身边的中央办公厅机关和中央警卫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也是“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并且“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

这些，为林彪、陈伯达等在会上就这个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礼堂开幕，255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

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后，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主要是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他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

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条。”“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他又着重地强调：“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林彪讲完后，康生也讲了话。他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且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讲话，等于给林彪的讲话作了一个“注解”，向与会者进一步点明了林彪所要强调的主题，支持了林彪。

康生讲完后，毛泽东立即宣布：“今天开到这里为止嘛，大家去讨论，今天散会。”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回忆道：“林彪本来说不讲话，临时他说有几句要讲。下了会场，主席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再让他吃，他就发火。去开会，他本来很高兴，以为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第一天开会就不顺。”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分组讨论宪法草案和计划问题。吴法宪在会上提出，林副主席开幕式上的讲话很重要，各小组应该首先学习讨论，并要求重新播放林彪讲话录音。

这天夜里，根据林彪、叶群在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中午打印出来后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到8月29日才上庐山）。他们还准备了一段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些事情，全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私下进行的。

8月24日下午，在连续收听两遍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后，各组开始进行讨论。这天上午，叶群已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



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强烈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激烈。

陈伯达在当天下午的会上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他大讲了一番“天才论”，闪烁其词地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人要否定（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有的人竟然怀疑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要赶快觉醒起来，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25日上午，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上写有这样的话：大家“认为林副主席的讲话，对这次九届二中全会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还说：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一时间，全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尽管这些活动打的旗号是要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它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在背后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议程，狂热地煽动揪人。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

25日中午，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从华北组的简报上，毛泽东已敏锐地察觉到会议中出现的严重不正常现象。听了张、姚汇报后，他更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

下午，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

后，向到会的人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正在气头上的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由于毛泽东的支持，江青集团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林彪集团彻底败下阵来。



毛泽东追查庐山会议情况
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970年8月25日，毛泽东要汪东兴立刻通知召开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分别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进行单独谈话。随后，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补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

此后从8月26日到30日，全会各小组一直休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不分昼夜地找人谈话或开小会，进一步了解情况。毛泽东每天工作达十二三个小时，有时到凌晨三点钟才返回住所。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心里已大体明白了。

8月31日，他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写下一大段批示："这个材料（指《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在这个批语的抄清件上，他又加上了一个标题：《我的一点意见》。

在这篇仅有700字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地揭露了陈伯达等在庐山会议

上的所作所为，并把问题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高度，成为他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不多见的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毛泽东当然已看出庐山会议这场风波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文革”以来的“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刚规定的“接班人”，对林的问题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还有待进一步弄清。因此，他把批评集中地指向陈伯达一人，而对林彪仍不去触动，采取保护的态度。

9月1日，毛泽东在有各组召集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可以作自我批评、检查。会上，他点了陈伯达的名，要他作检查，还要林彪召集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听取他们的检查。

毛泽东提出由林彪出面，对有关当事人进行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林彪等找个下台阶的机会。但直到庐山会议结束，林彪以及吴法宪等并没有打算真正认识和揭露问题，更没有作出像样的检讨。他们只是在应付毛泽东。林彪主持闭幕会议。

9月6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要林彪主持闭幕会议。这时，主席台上已没有陈伯达。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主持会议的林彪最后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间出现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1970年9月15日，毛泽东来到武汉。16日，他批阅了汪东兴就庐山会议上跟着主张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所犯错误而写的第二次书面检讨，并约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指华北组以外的简报——引者注）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又说：“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他还嘱咐汪东兴回京后把他对汪东兴检讨的批示面交林彪、周恩来、康生等阅读，并转告他的这些意见，以“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几天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汪东兴已经作出书面检讨的情况



下，要求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后“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过了一个星期，吴法宪向毛泽东交上第一篇书面检讨。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但对这样做的原因，仅仅说是“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这不只是避重就轻，而且是在蓄意掩盖他们幕后策划的事实真相。

10月13日，毛泽东阅批了叶群13日送来的书面检讨。毛泽东把吴、叶两人的检讨以及他所写的批语给了林彪阅。但他所期待的林彪本人的“表态”，却始终不见动静。11月中旬，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同时，向党内的师级以上领导小组或核心小组印发《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使党的高、中级干部对庐山会议的情况有所了解。“批陈整风”运动由此展开。

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

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亲自传达。由此，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编者注）运动，毛泽东将调查陈伯达历史和政治面目的任务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叶剑英。

11月间，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参加调查组人员和中央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会议。在会上，叶剑英明确指出，这次调查陈伯达的任务，是毛泽东亲自交代的，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叶剑英还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更好地完成这项任务。”

12月10日，北京军区所属第三十八军党委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呈送中央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

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

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

为此，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第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这个批示。在会上，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八名常委于 12 月 18 日前到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

12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会上，周恩来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指示的内容。到会者都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以集中讨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陈伯达。

为了“打通思想”、“更好团结”，会议决定先以三天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会后，周恩来书面向毛泽东、林彪报告了会议情况。

毛泽东看完周恩来的书面报告后，在这份报告上批示说：“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毛泽东在对周恩来书面报告的批示当中，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批判陈伯达的会议，实际上是要借此机会敦促他们作出深刻的检讨。

华北会议从 1970 年 12 月 22 日开始。会议开始的几天里，因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涉及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和李雪峰，对此，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

1 月 4 日晚上，周恩来即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情况。周恩来在信中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符合毛泽东对华北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

针对江青在会上牵强附会、随意点名的情况，周恩来批评说，这样点

 

名，未经讨论，恐怕是不恰当的。周恩来经过毛泽东同意，阻止了会议印发和播放江青的讲话。

1 月 5 日，毛泽东就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问题讲话，并要求予以落实。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

1 月 6 日，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被先后传达给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区党、政、军负责人。周恩来就落实毛泽东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等做出安排。

1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时，一致认为，眼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议还讨论了华北会议的情况。

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要在近期专门召开一两次中央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

当天，中央军委召开了“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 143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而参加会议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作检讨。华北会议并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结果。

随后，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会议。在会上，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对华北会议的情况作了汇报。会议并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议的安排。

1 月 19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认为，华北会议可以准备结束，接下来的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大家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

会议并且认为，最后需要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会议提出，北京军区拟换李德生任司令员的职务。

1 月 20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了中央政治局的讨论情况。周恩来在信中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

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后，阅批“同意照办”。

1月20日~22日，周恩来审改了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文稿。1月22日，周恩来将此稿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子上批示说：“大体可用。”

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提纲》稿。

1月23日，毛泽东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等人谈话，讨论华北会议《提纲》。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等人将《提纲》稿再作修改之后，先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然后召集有华北会议以及中央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对该稿的意见。这个稿子获得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系统地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并且指出了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同时，周恩来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周恩来在讲话时还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随后，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华北各地传达贯彻华北会议中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同有关负责人共同讨论华北会议传达贯彻及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问题。

同一天，周恩来找出“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所发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都是关于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内容。周恩来并在其中陶铸签发的一份报告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

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地到北京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各军区党委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这次



会上宣读了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进一步推动了“批陈”运动。

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强调把批判和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结合起来。3月15日，毛泽东在两报一刊编辑部送审的一篇文章上这样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这样，“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周恩来对林彪等人仍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要求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几个人能够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自觉地检讨、反省自己的错误。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几次联系自己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以严于责己的态度来引导黄永胜等人认真作检讨。

然而，林彪从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却一直以生病为由，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他既不批判陈伯达，更不作自我检讨，反而一步步走上同党和人民敌对的绝路。

3月29日，周恩来偕黄永胜等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将毛泽东有关揭批陈伯达的一系列指示以及中央准备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等问题向林彪作了汇报。

3月30日和31日，周恩来等人在北戴河的林彪住处连续两天同林彪进行谈话。周恩来向林彪谈到了“批陈整风”的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判陈伯达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周恩来还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严重问题。

听了周恩来的汇报后，林彪在口头上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后的一系列指示，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表示“很高兴”，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他还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把批判陈伯达运动“引向深入”。

然而，在谈话中，林彪对自己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

示要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

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带着黄永胜等六人一起向毛泽东具体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对林彪的态度十分不满。

4 月 11 日，毛泽东把吴法宪、叶群两人重写的检讨批转给周恩来，告诉周恩来：“我已看过，可以了。”由于两个人的检讨这时仍然是只字不提林彪的问题，毛泽东实际上已不再对他们抱有什么希望。

4 月 15 日 ~29 日，中共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 99 人到会。“批陈整风”汇报会，主要是批评中央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批判陈伯达不积极彻底。会议也听了他们的检讨。

4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中央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之后，各小组分组揭发、讨论庐山会议及其前后的问题。从 4 月 22 日开始，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

4 月 29 日，“批陈整风”汇报会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发言。

周恩来在讲话中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周恩来说，大家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汇报会上，周恩来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这一《通知》。



毛泽东南巡　继续追查庐山问题

经过声势浩大的“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从大量揭发材料中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毅然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也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九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1971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巡视。他先到武汉，然后到长沙、南昌、杭州，在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讲述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批评并揭露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以及背后支持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活动。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从 8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的 20 多天里，毛泽东先后抵达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等地，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浙江和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谈话。他到处都谈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谈庐山会议的问题，许多话都讲得很坦率。

毛泽东的南巡谈话，除了他指定的传达范围以及要汪东兴专送在北京的周恩来以外，对其他人一概严格保密。林彪、叶群等便千方百计地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和谈话内容。

南巡途中，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出一些不正常的可疑迹象。

毛泽东到南昌时，听取江西省负责人的汇报，引起他注意的主要有三点：一、这年 7 月周宇驰曾两次秘密来江西活动；二、庐山会议期间叶群确有“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说法；三、林彪之女林立衡关于“同林彪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警告。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又陆续得知有关叶群、林立果等的一些可疑情况，使他更加警觉起来。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指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

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关于历史上党内出现的分裂状况，毛泽东十分关注。毛泽东说：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1927 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81 个人发表声，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1928 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 1930 年 6 月到 9 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1930 年到 1931 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只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毛泽东给各地负责人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是要地方负责同志站稳脚跟，不要站错队。这已经隐隐表示了眼前的斗争性质也是属于“路线斗争”的。虽然毛泽东还未直接点林彪的名，但不少人已经有所预感了。

接下来，在与刘丰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直接点出了1970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叶群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毛泽东还尖锐地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陈伯达等人搞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毛泽东说他不是“天才”。他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1918年才开始读马列主义。毛泽东在谈话时再次表示不同意那几个副词，即“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词。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他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陈伯达的“天才论”的。毛泽东还说：“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对于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表示，林彪没有同他商量，也没有给他看。毛泽东批评林彪一伙说：“他们有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联系了所谓彭德怀、刘少奇“路线错误”的问题。毛泽东说：“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泽东强调说，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因为要保护林彪，暂时没有作个人结论。毛泽东表示，对犯了错误的那些人，还是进行教育，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彪还是要“保”。毛泽东在同各级负责人谈话时说：

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对于林彪等人企图利用个人崇拜制造混乱气氛，毛泽东也表示了反对。

毛泽东说，林彪有些话说得不妥。比如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其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毛泽东对此反驳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够说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够说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呢？

毛泽东还说，“顶峰”，“一句顶一万句”，说过头了。毛泽东说：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在讲话中，毛泽东一再强调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他一定要抓住不放。他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他还谈了庐山会议以后，他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

具体来说，毛泽东认为批陈伯达搞的那个材料，批发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以及对有关中央军委批陈问题的文件作的批示，这些是“甩石头”；中央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墙”。

毛泽东在询问了被接见的一些负责人对庐山会议的看法后，明确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毛泽东还在谈话中强调军队问题时提出军队跟谁走的问题。毛泽东说，一定要谨慎。军队要谨慎，地方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要进行整顿。毛泽东表示，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因为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调动军队搞坏事，军队是不干的。

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党、政、军干部都要过问军事，要搞好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究团结。

毛泽东还就“三支两军”问题表了态。毛泽东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不应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

针对部队的现状，毛泽东批评说，之前部队在军事训练中还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时间；而此时则是只搞文不搞武，军队搞成文化军队了。

毛泽东指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在南巡途中，毛泽东还借《国际歌》说到了团结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针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某些做法，毛泽东也清楚地表示了不满。

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他希望高级干部以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是不行的。毛泽东还提出，读马、列的书，不好懂，办法是请先生帮。

毛泽东还说，他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

这时，在林彪那里，叶群当办公室主任。黄永胜等四个人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叶群。对此，毛泽东指出，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

在南巡途中，毛泽东还就“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的情况讲话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林彪集团在得知毛泽东在南方巡视的谈话内容后决定铤而走险，南下广州割据或北上苏联，最终导致了“九·一三事件”的发生。



“四三方案”出台

1963 年制定“三五”计划时，原本设想解决“吃穿用”问题。1964 年 8 月，美国轰炸北越，使毛泽东和中央不得不把计划的重点转到战备问题上来，提出搞三线建设。同时，三线建设也是做两手准备的，即战备和改变内地落后工业交通布局。

从 1965 年到 1980 年，我国在 13 个省、自治区开展的三线建设，历经三个五年计划，共投入 2 050 余亿元资金，几百万人力，安排几千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我国建设史上是空前的。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初步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三线建设还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内地以后的建设带来了发展机遇。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等过去是人烟稀少的荒山僻野，现在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铁路的开通，矿产资源的开发，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内迁，使长期不发达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涌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缩小了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各种差距，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增长。

三线建设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空前的壮举。

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来认识昨天。有材料证明，毛泽东作出三线建设决策时，正在研究苏联卫国战争的教训。即使在当今世界，邓小平 1990 年就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1992 年他更加明确地说：“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

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事实正是如此，90年代初期的海湾战争和末期的北约轰炸南联盟，说明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尖锐存在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长期的经济意义。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所以，江泽民1991年4月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

1971年至1975年，国防科技工业经历了两次整顿。1971年9月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毛泽东指定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协助他领导国防科技工业。他们围绕恢复科研、生产秩序，重点抓了加强组织领导、调整计划、整顿质量管理、建立武器定型、调整管理体制等五个方面的工作，撤消了林彪一伙控制权力时成立的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其下的各组，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领导二至七机部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国防科研和生产的形势有了好转。

5月和6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批发了关于导弹核武器研制规划和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促使国防科技工业的形势进一步好转。1975年下半年，连续发射成功了3颗人造卫星，被人们称之为“三星高照”。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是我国国防科技尖端技术取得多方面重大突破的一个里程碑阶段，先后制成和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第一颗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颗人造卫星和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卫星。这些成就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领导人和广大科研技术人员经过不懈的开创和连续科学技术攻关才取得的，也反映了他们在“文革”困难政治环境下的可贵努力，为以后改革开放时期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现代化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在“文革”前，随着三线建设的开展，地方“五小”工业（主要指地、县办的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工业）已经有了兴起的趋势。但由于动乱而未能发展。中共九大召开以后，为了实现毛泽东于1966年2月重新提出的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也为了适应战备需要，国家对地方“五小”工业进行了新的部署。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会议强调各地都要建立自己的“五小”工业，形成为农业服务的小而全工业体系。从1970年起的五年中，中央安排了80亿元扶植地方“五小”工业，并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中央财政预算之外的投资也迅速增加，由1970年的100万元增加到1973年的1.48亿元。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管理权下放运动，使地方获得了较多的自主权，提高了地方建设的积极性。下放到地方的机关干部、科研人员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科技文化知识和经济信息。于是，地方“五小”工业蓬勃发展起来。仅1970年全国就有近300个县、市兴建了小钢铁厂，90%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20多个省、市、区建起手扶拖拉机厂、动力机械厂和农机具制造厂。与上年相比，地方小钢铁工业的炼钢能力增长1.5倍，生铁产量增长1.8倍，小化肥厂生产的氮肥、合成氨增长60%～70%，小水泥厂、小化肥厂的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小煤窑为主的南方各省煤炭产量增长70%。

这些地方“五小”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

20世纪70年代初，国际关系日趋多极化和复杂化，不再是单纯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立。苏联军事争霸力量崛起、西欧日本经济起飞，使出现了经济“滞胀”的美国急于寻找海外市场，感到国际政治地位提高的中国“潜力极大，任何灵敏的外交政策都不能加以忽视或拒绝考虑。”尼克松政府开始推行“均势外交”，向中国伸出外交触角。而中国也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逐渐超过美国，成了最大国家安全问题，需要寻找一个新的外交战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1972年《中美联合公报》指出：“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此后，发展与西方经贸关系成为中国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四三方案”成为对外贸易的一个突破口。

1972年1月22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联名报送了国家计委《关

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建议引进中国现代化建设急需的约四亿美元的化纤化肥设备，得到毛泽东的批准。8 月 6 日，国家计委根据李先念的批示，又提出了《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扳机问题的报告》，估价约四亿美元，以便和先前进口的冷轧机设备配套，也获得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批准。11 月 7 日，国家计委再次提出《关于进口成套化工设备的请示报告》，建议进口六亿美元的 23 套化工设备。周恩来批准的同时要求计委采取一个一体化的更大规模的引进方案。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下，1973 年 1 月 5 日，国家计委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对前一阶段和今后的对外引进项目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建议利用西方处于经济危机的时机，在今后三到五年内引进 43 亿美元的成套设备，这被通称为“四三方案”。其中包括：大化肥设备 13 套，大化纤设备 4 套，石油化工设备 3 套，综合采煤机组 43 套，10 个烷基苯厂，3 个大电站，武钢一米七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工厂等大型项目。后来在此基础上又陆续追加了一批引进项目，进口的总额预计达到 51.4 亿美元。这是继 50 年代从苏联引进 156 项项目后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四三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不仅打破了“文革”时期外贸领域闭关自守局面，也通过“集中力量切切实实地解决国民经济中几个关键问题”即“吃穿用”的问题的第一原则，为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吃的方面，通过引进，共建成大化肥成套生产设备 13 套，年产尿素 636 万吨，按照农业部每公斤尿素增产 4 ~ 5 公斤稻谷的测算比例，可增产稻谷近 2 544 ~ 3 180 万吨。相当于全部大化肥设备投产的 1982 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7.2% ~ 9%，成效非常显著。中国在 80 年代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除了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推广袁隆平杂交籼型水稻外，化肥大大增加，是一个重要因素。当年负责引进具体工作的原国务委员陈锦华认为：“中国农业增产，以全世界不到 10% 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 22% 人口的吃饭问题，引进化肥项目的作用功不可没，‘四三方案’的引进技术设备功不可没。”在穿的方面，1972 年中国年产化纤只有 13.7 万吨，仅占全国纺织原料的 5.5%。而引进的四个大化纤厂 1982 年全部建成投产后，中国从 1984 年起就宣布取消了长达 30 年的布票，敞开供应纺织品。2003 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产量大国。在用的方面，中国过去制造肥皂用宝贵的天然油脂，十分紧张。引进设备建成南京烷苯基厂后，用石油生产肥皂、洗衣粉，能够满足全国市场的需要，取消了凭证供应。通

 

过这次对外引进高潮，中国才真正对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了解，经过学习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在研究利用外资、借鉴国外现代金融和先进管理手段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使中国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1973 年达到 109.76 亿美元，是 1970 年 45.8 亿的 2.4 倍；1974 年达到 145.7 亿，是 1970 年的 3.2 倍。

现在看来，如果说 1975 年整顿因为总体上还在“文革”环境的限制下，只能以整顿恢复生产为主要内容，还无暇顾及改革实验，那么在对外引进方面可以说，确实有改革的性质，后来的开放政策就是沿着整顿的思路发展起来的。

“四三方案”的批准实施，带动了对外引进工作的全面开展。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在国务院领导人的积极努力下又果断地进行了开拓整个对外经济工作新局面的部署。从 1972 年起，我国的外贸、金融及与之有关的其他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建国以来对外引进技术设备、开展经济交流的第二次高潮。

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方面，除“四三方案”的主要项目外，重要的引进项目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像管成套生产技术项目；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等。1972 年 9 月，国家计委成立了进口技术设备领导小组，负责审查进口设备和综合平衡及长期计划衔接工作，还组织有关部委派出多个考察小组，到国外考察检查进口设备。同时，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

从《“五七一工程”纪要》到“九一三事件”

就在毛泽东追查庐山会议相关人员错误的同时，一份由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等炮制完成的武装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出笼了。

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陈伯达被揭露出来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1970年10月中旬，毛泽东又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作了批示。11月中旬，毛泽东对黄永胜再一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全党全军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0日，华北会议开始。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系统揭露了陈伯达的罪行。

在庐山抢班夺权阴谋败露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十分惊慌。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就派遣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联合舰队”投入了第一线，更加紧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1971年2月8日下午，“联合舰队”召开了布置搜集情报以便发动武装政变的“舰队会议”。周宇驰在会上讲了收集情报的重要性。

2月12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一起到了苏州。2月21日，林彪指派林立果到达杭州，联络“战斗小分队”的部分人员，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于新野多次同时任7350部队政治委员的陈励耘密谈。

同时在林彪的授意下，林立果于1971年3月18日，带领“联合舰队”的两名主要成员于新野、许秀绪到上海，并开始纠集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进行密谋。他们经过一番讨论后，最后商定，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他们还研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实施要点以及具体措施。

3月22日至24日，根据“武装起义”的谐音，于新野执笔起草了



《“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分为“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个部分。

《纪要》把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污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B—52”是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诬蔑性称呼），“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联合舰队”的口号和纲领。并且提出了要在“军事上先发制人”，阴谋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或利用特种手段（如轰炸、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或者制造“割据局面”，建立“林家王朝”。还提出了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去打击毛泽东的力量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策和策略。按照这个反革命计划，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始行动。

同年4月，林立果又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了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教导队”，并对“教导队”成员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型武器、驾驶车辆等特种训练。

在这前后，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时任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的胡萍及王维国、米家农、时任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等，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多处秘密的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利用这些“根据地”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以及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

1971年7月初，林彪、叶群离京去北戴河。前往机场送行的吴法宪发现：“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很反常。”这段时间跟林彪有过接触的黄永胜等，也都有这种感觉。

这时，密切关注情况发展的毛泽东，通过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得知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以后的两个月里，黄永胜等在总参谋部一直严密封锁庐山会议的真相，扣压不下发他们几个人的检讨，以致连总参二级部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黄永胜等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毛泽东得出结论：“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对全国的工作，毛泽东仍按原定部署进行。8月中旬，他提议在“十一”后召开已因庐山会议风波而推迟了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以前举行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抓紧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8 月 15 日，年近八旬的毛泽东再次乘专列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市巡视。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

心怀鬼胎的林彪一伙，对毛泽东的这次出巡极为忌疑。他们紧张地研究形势，准备对策。毛泽东离开北京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千方百计地打探毛泽东南巡的行动路线，窃取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1971 年 8 月底和 9 月初，吴法宪连续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把毛泽东到武汉、长沙、南昌，先后派飞机接一些负责人去谈话的情况，密报给叶群。

9 月 5 日上午，叶群惊惶失措地跑进林彪的卧室，告诉林彪说，吴法宪打电话报告，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用飞机把附近几个省的负责人接去谈话。但谈话内容还不知道，好像很重要。

9 月 5 日晚上，周宇驰通过电话从广州空军司令部参谋长顾同舟那里了解到，广东部队负责人正在传达毛泽东接见时的谈话，便让顾同舟给他们传达传达。深夜 11 点半，于新野打电话给顾同舟，了解到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并作了记录。

9 月 6 日，周宇驰带着电话记录稿，自己驾驶直升机飞往北戴河，同林彪、叶群、林立果密谋。

同时，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李作鹏也在为打听毛泽东谈话的内容而活动着。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的李作鹏于 9 月 5 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一到武汉，李作鹏就急于找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的刘丰打听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

9 月 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舰队”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

9 月 8 日，林彪在北戴河下达了武装政变命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上面的落款是“林彪”、“九月八日”的林彪手迹。

晚上，林立果带着林彪亲笔书写的反革命手令，还带了叶群给黄永胜亲启的密封大信袋，同刘沛丰、陈伦和一起，乘飞机悄悄潜回北京。

9 月 8 日晚上 9 时 40 分，林立果所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

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 9 月 8 日深夜到 9 日凌晨，急急



忙忙地部署了一连串谋害毛泽东的反革命措施。林立果分配任务说，这次武装政变任务代号叫“571 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功了论功行赏，王飞就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他人也有不同封赏。生死成败在此一举。

9 月 9 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和“南线司令”江腾蛟、“北线司令”王飞再次聚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平房里，策划政变的具体部署。

9 月 9 日和 10 日两天里，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等人，又先后多次聚在一起密谋策划，继续具体策划谋害毛泽东的办法。除了 9 月 8 日夜间提到的一些办法外，他们又提出了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炮制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此间，林彪和叶群在北戴河也没有闲着。他们时刻注视着林立果等在北京的策划和部署，并与黄永胜等人进行着频繁的电话联系。

9 月 10 日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乘专机到北戴河运密件。中午，由王飞将林立果从北戴河带来的密封亲启件送给黄永胜。

林彪知道搞反革命政变光靠林立果是肯定行不通的，还需要靠这时的“军委办事组”。

从 1968 年 10 月，“军委办事组”正式成立，到 1969 年 3 月进行改组，军委办事组一直是由黄永胜担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任组员。“军委办事组”取代中央军委，事实上就是由林彪的死党掌握军队的领导权。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个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大舰队”。

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林彪对“大舰队”的使用至少出于两种考虑：一、由林立果带领“小舰队”（即“联合舰队”）进行地下活动，由“大舰队”进行公开活动相配合。“大舰队”不能搞地下的如谋害毛泽东的活动，原因就在于“大舰队”目标太大，且差不多已暴露。故诸如谋杀这种事由“小舰队”搞比较合适。

林彪也曾这样考虑：一旦政变成功，由“大舰队”出面来维持局面；如果政变失败，则由“大舰队”拉一部分人另立中央，这算是留了一条退路。到关键时刻，把“大舰队”作为“预备队”出击。林彪带兵打仗几十年，当然懂得“预备队”的重要性。

然而正当林立果在北京歇斯底里疯狂叫嚣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他们意料之外的变化。

原来，8 月 31 日，毛泽东的专列到了南昌。在谈话中，毛泽东了解到吴法宪、周宇驰等人十分反常的一些活动。这些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9 月 3 日，毛泽东乘坐列车到了杭州。当天，他在接见陈励耘、南萍、熊应堂的时候，板着脸严肃地问陈励耘过去是干什么的；在庐山，吴法宪是不是找陈励耘开过会。陈励耘张口结舌，不知怎么回答，一时间汗流如雨，如芒刺在背。

9 月 8 日深夜，毛泽东提出立即把他乘的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毛泽东说，不能把它摆在机场。这就表示他对空军不信任了。此时，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找当地负责警卫工作的陈励耘商量，找遍了办公室、医院、宿舍，都没有找到陈励耘。因为陈励耘正在与窜到杭州的于新野进行密谋。

毛泽东见找不到陈励耘，当即决定由中央警卫局负责带人到机场把专列转移到绍兴。

9 月 10 日下午 3 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开往上海，并且说，走的时候，不要陈励耘他们送行。毛泽东登车的时候，陈励耘他们也到了车站。但是他心中有鬼，又怕像上次一样被毛泽东严厉斥责，只是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敢上前去与毛泽东打招呼。

当天下午 6 时，毛泽东的专列到达上海。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王维国等人。在会谈中，毛泽东谈笑风生，轻松自如，使王维国错误地认为毛泽东会在上海呆很久。晚上 8 点，王维国等人邀请毛泽东下火车吃晚饭。毛泽东却说就在列车上休息，不吃饭了。

9 月 11 日上午 10 点，许世友乘飞机从南京赶到上海，直接到列车上见毛泽东。毛泽东与许世友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下午 1 点左右，许世友由王维国陪同到锦江饭店吃午饭。

这时，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突然急如星火地驶出上海，风驰电掣般地北上。许世友立即乘飞机返回南京。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南京车站停留了 15 分钟。在车站站台上，老将军许世友目视着列车驰向远方，挥手向毛泽东告别。

9 月 12 日傍晚，毛泽东乘坐的列车缓缓地平稳地驶进了北京站。

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9 月 11 日晚，王维国从上海打电话给林立果、周宇驰，告诉他们毛泽东离沪北上的消息。林立果闻讯后绝望地说：“全完

 

了！……没完成首长（指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用什么向首长交代！”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在安排去广州的几架飞机当中，有一架256号“三叉戟”飞机被秘密调往离北戴河不远的山海关机场，这是专为林彪一家准备的。这一切，进行得极其隐秘，对所有稍不放心的人都严加封锁，包括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在内。

当时，中共中央仍在按原定工作部署，积极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9月12日晚，周恩来照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22时许，他接到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林立衡感到情况异常，通过警卫部队向中央报告了在北戴河的林彪等的动向。周恩来立即下令追查已停在山海关机场的那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负责安排林彪飞机的胡萍（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谎称飞机出了“故障”。林彪一伙得知周恩来紧紧追查飞机情况的消息后，顿时惊恐万状，感到阴谋已经败露，南逃广州的计划也难以实现，决计向北逃往国外。当天夜里23时40分，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驱车从北戴河急驰山海关机场。到机场后，林彪等在混乱中匆忙登机，在副驾驶员、领航员和报务员都没有上机的情况下，下令飞机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向西北方向逃去。

中共中央事先并不知道林彪一伙的计划。接到“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的报告后，周恩来命令开动雷达监视天空，以掌握飞机的去向，并向林彪的飞机呼叫，要他们飞回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后来周恩来又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

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很快从赶来向他报告的周恩来那里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况。他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南侧的118室。这时，林彪的“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行了30多分钟，快接近中蒙边境。有人请示是否派飞机拦截。由于当时中央对林彪一伙策动政变的计划和他突然出逃的原因还没有掌握，毛泽东仍采取慎重的态度，并没有阻止林彪逃走。

9月13日凌晨1时50分，林彪飞机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林彪一伙的叛国面目终于彻底暴露。

凌晨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又接到报告说，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起飞，现正向北飞行，机上坐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毛、周

指示："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原来这是周宇驰等得知林彪一伙出逃后，用林彪手令劫持一架直升飞机，携带机密文件资料，企图跟随林彪北逃。因为驾驶员陈修文发觉了周宇驰等的图谋，在凌晨六时半将飞机强行降落在北京北部怀柔的空地上，陈修文被枪杀，周、于等开枪自杀，李伟信被抓获。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大量罪证，对后来弄清林彪一伙策划政变的事实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飞机越出国境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一事，并研究部署各种应变措施。当晚22时15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18时4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2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18时起进入一等戒备。周恩来立刻将这个情况报告毛泽东。

9月14日下午，已经连续工作两昼夜的周恩来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发来的特急报告中，确知正是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几天后，根据中国驻蒙古使馆人员前往坠机现场查看的报告和有关专家的分析论证，终于揭开了林彪飞机坠毁之"谜"：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9月24日，鉴于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十天来一直拒不交代问题、反而加紧烧毁罪证，毛泽东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在这前后，林立果"联合舰队"在各地的骨干分子也相继被捕归案。至此，林彪集团的政变阴谋彻底粉碎。

林彪叛逃事件和他们一伙策动政变计划的暴露，是令人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以后被称为"九一三事件"。这个事件给毛泽东的震动和打击极大。他借用唐代诗人杜牧的一首七言绝句，抒发心中的感慨：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中"折戟沉沙"四字，恰好成了林彪一伙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坠落蒙古沙漠、丧命异国的绝妙写照。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虽是毛泽东、周恩来预料之外的事。但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毛泽东是有所察觉的。在谈到"九·一三"事件在预料之中时，周恩来曾指出，对于林彪，毛泽东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对林彪是仁至义尽了，林彪最反感别人对他的批评，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的。



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

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的遗留问题，做好清查同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1971年9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9月18日，为了搞清楚林彪等在蒙古境内摔死的确切情况，中国外交部指示中国驻蒙古使馆尽快派专人送回256号飞机坠毁现场的照片、资料等，并详细汇报有关情况。

9月20日，中国驻蒙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国内汇报情况。在回国途中，全国到处也呈现出紧张气氛。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等待黄永胜等人悔过自新，向党作出认真交代，但黄永胜他们什么都不坦白，他们住在西山，烧毁文件，搞串联，统一谈问题的口径。

在周恩来召集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之前，即9月23日晚，周恩来就召集了汪东兴、杨德中、吴德等人，商谈处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的方法。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的通知。

9月3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九·一三”事件以后各项工作作了初步的总结，同时还研究了有关外事工作。

10月3日，根据林彪反革命集团长期乱党乱军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特别是根据林彪等人在军队中推行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和做法所造成的恶劣影响，经过毛泽东亲自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

军委日常工作。”

同一天，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专案组由周恩来等十人组成，下设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10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中指出：“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陈他们搞的。”“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头脑不要太简单了。”“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下达指示，要用军委名义。”

“九·一三”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沉着、果断地领导全党、全军，比较稳妥顺利地处理了林彪事件遗留下来的一些紧迫的重大问题，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稳定了形势。

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粉碎，“批林整风”运动即在全国开展起来。

“批林整风”运动，是 1971 年“九·一三”事件后至 1973 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活动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

这一历时近两年的运动过程，由于指导思想有所改变，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而这种矛盾正是“文化大革命”深刻内在矛盾的缩影。它不仅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全局上的错误及由此产生的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而且反映了此时党内外健康力量对“左”的错误和极“左”思想的顽强抵制和抗争，预示了“文化大革命”必然失败的应有下场。

为了彻底清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对中央军委工作的干扰和破坏，1971 年 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原来由林彪一伙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首的军委办公会议。

同时为彻底查清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10 月 3 日，中共中央又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紧接着，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于 10 月 6 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通知。

对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早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



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

同时，《通知》中说，中共中央决定在1971年国庆前后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泽东长时期的教育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

为了使全党、全国人民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通知》还强调，在10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兵种党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

中共中央认为，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

10月7日，叶剑英又在参谋部处以上党员干部大会上，对中央文件上所揭露的林彪问题进行了具体解释，再次揭露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这样，人们对林彪有了进一步了解，对他的反革命活动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1971年10月以后，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材料陆续发出并逐步传达到基层，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被称做“批林整风”的运动。

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和人们思维方式的巨大惯性，在“批林整风”运动之初，基本上还是按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来总结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和进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

10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传达的通知。11月2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林彪一伙的叛卖行径表示极大的义愤，对中共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拥护。更为重要的是，全国人民为“九·一三”事件而震惊，以“九·一三”事件为契机，全国人民开始觉醒。

1971 年 12 月 11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好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讨论。

这个材料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

按照这样的逻辑，“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后果反而成为“继续革命”理论“正确性的又一标志”，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伟大转折”。显然，这种理论既不能真正总结“九・一三”事件的教训，也不能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而只能引发更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更为混乱。

1972 年 1 月 13 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这一材料批判了《“571 工程”纪要》，揭发了林彪一伙按照《“517 工程”纪要》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然而由于“批林整风”既要批判林彪而又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既要群众广泛参与又不得不回避许多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这种内在的深刻的矛盾，很快就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一种普遍的路线斗争“不可知”的消极心理，认为“该批的都批了，没啥好批的了”。

根据毛泽东的意思，批判林彪与联系实际要和整风结合起来，也就是要结合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结合解决本地区、本部门的具体问题。但是，由于对“九・一三”事件的实质采取了回避态度或对这一问题含糊不清、语焉不详，加上这时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气氛，导致这种整风带来了扩大化的结果。

在联系实际进行批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无限上纲的乱抓“小林彪”的错误现象。在一些政策水平低的基层，“批林整风”更是五花八门，屡屡出现把矛头指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错误倾向。为了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部门一再强调要把批判林彪放在首位，要注意区分两类矛盾，规定不要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不要“打横炮”，不要层层揪“代理人”，不要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等。

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扩大化的倾向，但它同时又使批判林彪所要联系的实际更加空泛和令人感到捉摸不透。在给中共中央的汇报中，各地普遍反映，对“批林与整风如何结合”、“批林如何联系实际”难以把握。



在“批林整风”运动时期，在各种文件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在不能触及“文化大革命”根本错误的前提下的“批林”，其结果为，要么是新一轮的扩大化；要么就是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但是，与这种不良倾向同时存在着的还有另一种倾向，即把批林与清算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结合起来的倾向，也正在发展。尽管它此时还处于次要的位置。如果说在“批林整风”初期，已经有不少人不是根据文件所定下的调子，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开始批判极“左”思潮了，那么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引导下，这一思潮和倾向已成为很大一部分人的共识，并于1972年下半年逐渐发展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1971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其目的是为了总结交流半年多“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会议主要议程是学习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通报有关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和审查陈伯达历史问题的材料；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在会议所列文件中被当做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少数几个人知晓。在信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林彪1966年5月18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安。

1971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周恩来就会议印发的文件逐一作出说明、解释，回顾了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并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周恩来指出，这次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革命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这是“批林整风”的一个精神。

5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1971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他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

5月29日，陈云向会议写出了《对于叛党、叛国、阴谋家、卖国贼林彪的揭发》，再次据实揭发了林彪历史上的一些严重错误。

在6月10日~12日的三个晚上，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于5月29日至6月7日起草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重要报告。

“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于6月23日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

7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又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这一材料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从1971年2月到1972年7月间，中共中央总共下发了三批揭发材料。它们在总体上揭发和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还批发了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和陈伯达的历史罪证。

7月上旬至8月上旬，按照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精神，各省、市、自治区都召开了各自的“批林整风”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会议的精神，并要求在学习这些文件的同时，联系各地的实际，清理思想，总结经验，解剖自己。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这些会议研究、部署了下半年的工作安排，又把“批林整风”运动当作各级党委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

会议还强调，“批林整风”，重点是要搞好“批林”，在此基础上搞好整风，要借此机会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等。

总的来说，1971年9月下旬至1972年7月间的“批林整风”运动虽然比较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主要还是在“左”的错误框框里做着既难以被群众接受，又实在难于深入下去的批林文章。

而在此时，已经有许多地区和部门明确地提出要“认真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罪行”、“当前主要是克服极左思想的干扰”一类的任务。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这种真正反映人民群众要求和历史发展方向的倾向很快突破了“批林整风”汇报会所规定的范围，成为“批林整风”运动的主流。

在“批林整风”运动当中，各地各条战线在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下开展的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左”倾路线的错误，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同时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积极变化。但是，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



命”的前提下，这种变化还是有限的。随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特别是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要越来越多地触及“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本身时，它也就超出了毛泽东所能够接受的限度和范围。

1973年后，尽管毛泽东对“批林整风”运动中明显发展起来的纠“左”倾向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断定林彪的实质是极“左”，但他仍然支持对干部政策的调整工作。

毛泽东的最后裁决，虽然改变了“批林整风”的方向。但是，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由于它的正义性，它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所得到的越来越多的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使其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向前发展。周恩来等人也在可能的条件下，顽强地继续领导着这场艰难的斗争。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报送中共中央。

《报告》中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早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中央专案组在《报告》中还提出，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反人民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有组织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发动叛党叛国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的表现。

鉴于林彪叛党叛国反革命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在《报告》中建议中共中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共中央审批。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一致通过并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到此，“批林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由于毛泽东没有从“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下解放出来，在否定林彪的所作所为的同时，仍肯定了“文化大革命”，错误地否定了周恩来批判林彪极“左”言行的正确主张。因而，“批林整风”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利用这个有利契机结束“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大力整顿经济秩序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空前的灾难。由于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不懈努力，中国的经济在动乱的年代里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的对外经济工作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及相继恢复领导工作的陈云、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开拓出了一个新的局面，掀起了新中国历史上对外引进技术设备、扩大经济交流的又一次高潮。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继1954年引进苏联156项工程技术设备以后的第二次高潮。

这次高潮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发生于极“左”思潮泛滥、国民经济工作遭受严重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因而在实践上具有纠正闭关自守错误、整顿恢复国家正常经济秩序的拨乱反正作风；而且这次的对外引进技术设备、扩大经济交流是中国第一次以资本主义国家为主要对象进行的大规模经济交流活动，对中国确立的对外经济战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间所积累的经验教训和形成的思想闪光点，为中国以后在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指导思想和基本政策的系统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1971年底至1972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也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重点集中表现在贯彻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两个方面。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而批“左”又从一开始就与调整、整顿相联系。

自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就多次提出，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九·一三”事件发生之后，全国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

动观点。

1970年，国民经济建设的高潮刚刚兴起，领导班子软弱涣散。一些省、市主要领导人对生产指导不得力，无政府主义、瞎指挥作风严重。同时，不少地方纪律废弛，生产设施、设备失修甚至被毁，“空头政治”肆虐，体制混乱，几乎没有企业管理。知识和知识分子备受歧视，科学技术工作停滞、倒退，各级领导对抓生产疑虑重重等。

这些“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在此时已经尖锐、严重地暴露出来。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客观上是否定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的过程。周恩来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从1971年到1975年，是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在1970年初，第四个五年计划就已经开始编制了。1970年2月～3月，全国计划会议召开，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

1971年，是新中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国务院根据《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具体精神，于1970年底编制了1971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197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狠抓内地建设和国防工业建设；大办农业，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要狠抓原材料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要大打矿山仗；要发展科学技术，让中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然而事实证明，1971年的经济计划指标又过高了。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在1970年底就已经显露出来了。

按照常理，由于存在这么多的问题，1971年应该对计划做一些调整，把指标适当降低一些，但是国务院不仅没有及时进行调整，反而推出了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其中的基本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就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按照这个《纲要（草案)》来安排生产，指标必然过高；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时统管整个国防工业的军委办事组由林彪一伙把持，他们不顾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基建规模。民用方面也为追求翻番任务而到处上项目。

尽管如此，1971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基本上还是完成了。但由于指标过高，与中国的国情不相符，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三个突破”的问题。主要是由于盲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生产急剧膨胀所造成的。

“三个突破”也就是：到1971年底，职工总数达到5 318万人，突破了5 000万人，职工人数猛增，使工资支出和粮食销量大大超过计划；原计划1971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96亿元，实际执行结果达到302亿元，



突破了300亿元；原计划1971年粮食销量为794亿斤，实际执行结果达到855斤，突破了800亿斤。

“三个突破”是周恩来首先发现的。1972年初，周恩来就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三个突破”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首先是挤掉了农业劳动力。由于各地大搞会战，1971年常年参加会战的民工在最多时竟达到1 000万人。另外，在1970年到1971年两年新增加的职工中约有600万人是从农村招来的民工。

“三个突破”使工业劳动生产率下降，还增加了货币投放量，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和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使社会经济状况更加不稳定了。

由于党中央忙于抓“批林整风”运动以及其他方面因素的干扰，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慢。1972年，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

自1960年以后，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进程逐步加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所发展。自1971年以后，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继续迅速发展。各地农业机械修造厂不断增加，生产能力不断提高，适应各地特点的农机新产品不断涌现。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毛泽东委派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各部门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新的转机。对于企业和经济管理，周恩来花了很大功夫进行整顿。

对于企业的整顿，首先是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企业管理遭到严重破坏，在工矿企业中，用人无定员、劳动无定额、岗位无专责、效率无考核、质量无检查等现象是非常普遍的。1971年12月～1972年2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

这次会议，批判了林彪一伙阴谋炮制的反革命《“571工程”纪要》及其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讨论了1972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确定了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这一年计划确定的生产指标，基本上还是可靠的，但基本建设规模安排大了，致使在主要原材料的平衡上，留下了不小的缺口。

在会前，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乱得很，急需要整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与会者的要求，会议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这个文件，针对此时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整顿措施，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

义等，其中重点是整顿企业管理。

这个《计划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建议提请中央将该文件批转下发，但张春桥却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加以否定。张春桥还公然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对会议施加压力。

《会议计划纪要》虽因张春桥的反对未能在会上通过，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且受到各个企业的普遍欢迎。这个《计划会议纪要》实际上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此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经济工作中的许多问题是非颠倒，被搞得混乱不堪，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赢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攻击为“物质刺激”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

为了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针对普遍存在的受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的影响而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等人所搞的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

周恩来还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从而精辟地论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鼓励各级干部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非常重视工业产品质量，并把工业产品质量放在议事日程上，解决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管理混乱局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和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一些产品质量有了明显改进。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紧抓了经济管理的整顿。

1972年3月30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它在保持原税赋的前提下，主要在四个方面做了改革。

首先，它对税种进行了合并。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



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等均合并为工商税。

其次，它合并以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税目、税率进行简化。改革后的税率由过去的141个减为82个，实际上不相同的税率只有16个。对于多数企业可以简化到只用一个税率征税。

在改革中，国务院还将一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地方有权对当地的新兴工业、“五小”企业、社队企业、综合利用、协作生产等确定征税或者减免税。最后，国务院对少数税率作了调整。改革后多数地区的税收没有增加或者略有减少。

这次税制改革，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税种、税目、税率过于简化，难以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千差万别的情况，税收作为调节各方面经济利益的一个杠杆，其作用、范围有所缩小。

4月7日，国家计委又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增加职工，充分挖掘现有劳动潜力的通知》。国家计委在《通知》中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下达的劳动计划。

5月20日，国务院批准试行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上报的《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意见》针对基本建设中长期存在的战线长、浪费大、制度松弛及贪大求洋等问题，作出了规定。

6月9日，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

8月19日，国家计委将《关于当前国民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报告》认为，国民经济中存在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基建战线太长，设备、材料、投资跟不上。二、职工人数增加多了，消费品供应跟不上。

关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要从两方面人手：一方面要积极增加生产，抓好农业，抓好基础工业，特别是抓好原材料工业；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严格控制职工人数。

1972年下半年，工业方面的整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一步深入发展。同年10月，国务院有关经济管理部门在北京召开了有关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会议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谬论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加强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为企业搞好经济核算创造条件、改进国家对企业亏损的管理制度、严格财经纪律等。

1973年1月7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研究解决粮食销

量、工资总额、职工人数3项突破国家计划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要大力加强农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国防和行政方面的开支，精简职工。

1973年1月，国务院又提出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这个《计划纲要（修正草案)》把1975年钢产量指标从3 500万吨至4 000万吨下调到3 000万吨。钢的指标一降低，其他指标也就松动了。它为1973年的计划安排和调整争取了主动权。

当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周恩来明确指出，国民经济严重遭受林彪一伙极“左”思潮的破坏，1972年、1973年这两年中逐渐表现出来了，国民经济根本没有比例。在计划工作上也“没有‘王法'”了。

周恩来还历数了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再度尖锐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给国民经济带来破坏性后果的极“左”思潮。周恩来同时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写明白，要有按劳分配和必要的奖励制度。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1973年初召开的计划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了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个文件同1972年计划会议的纪要相似，其主要会议内容仍然以纠正生产管理中存在的极“左”思潮和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必须遵守的原则。同时这个《规定》重新强调了“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的观点。这对国民经济的好转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此后，国家计委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于3月6日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这一文件。

这一文件的起草和讨论表明了周恩来实事求是、坚持在经济工作中继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竭尽全力清除其破坏性后果的果敢精神。

在整个文件讨论过程中，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均对讨论内容表示赞成，认为这些规定切中时弊，经济战线很需要这样一个文件，建议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下发。

但是，唯有上海市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张春桥并强令把文件收回。张春桥的这种蛮横态度，表现出在周恩来提出批极“左”的正确意见遭否定后江青一伙得志猖狂的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



虽然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文件没有下发，但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从1972年起，特别是1973年，还是先后采取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新的调整。

国务院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的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和支农工业的投资。1972年，国务院适当调整了投资结构。

国务院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国务院下达指示，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职工计划的同时，一律要制定职工工资总额计划；各单位的工资总额计划，都必须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核定，并送当地人民银行；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以及违反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超额或计划外工资。

国务院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商业部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确定采取一定的措施。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措施。

国务院调整经济的第四项措施是，对《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进行调整。

1972年11月13日，国家计委在听取各地区、各部门关于1972年经济情况和1973年计划设想后，即多次召开会议，研究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会议在分析几年来，特别是1969年以来，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后，认为1973年要对各项比例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查，建设步子不能迈得太快，要为第四个五年计划中后两年能有较快发展创造条件。

为此，国家计委指出，要增加农业投资比例，各行各业都要真正做到支援农业；要压缩国防军工和援外开支，适当增加一线、二线的投资，军工应更多地为民用生产服务；提高用于设备维修等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投资比例；多引进一些先进技术，特别是化纤生产设备，加强计划管理，抓好企业整顿；提高教育经费中用于普及办学教育的投资；解决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问题。

197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再次讨论1973年计划会议讨论确定的今后五年计划发展设想的报告，即《关于国民经济计划问题的报告》。

6月13日，国家计委下发了经国务院同意的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指

标。这一计划指标是经过全国于 1973 年 1 月 7 日 ~3 月 30 日召开的计划会议讨论后，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修改后确定的。

尽管困难重重，全民经济计划经过 1972 年特别是 1973 年的调整，“三个突破”问题基本上还是得到了控制。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冲击。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为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国务院曾经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和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以及全国林业会议。在周恩来的多次讲话精神指导下，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经营、允许生产队因地制宜灵活安排生产。

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改善生活。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中实行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的初步纠正。

1971 年 12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人民日报》从 1972 年 1 月起，连续发表社论，宣传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指示》精神，强调要抓紧落实各项农村政策。

虽然受到“左”倾路线错误的长期影响，1972 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的推动下，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是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等的大力推动的结果，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否定极“左”路线，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直接反映。



大批老干部解放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疯狂地打击和迫害老干部，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九大前后，毛泽东多次讲到斗批改，其中就包括将斗批错了的改过来，实际上改的工作已在进行着，九大前解放了一批老干部，有的还被吸收到了新的中央委员会里。

“九·一三”事件后，开始再次启动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毛泽东在考虑了某些重大事情安排的同时，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为那些曾受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平反昭雪。

1971 年 10 月 4 日，毛泽东在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批判了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时搞的所谓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和形式主义，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自 1960 年主持军委工作以后所搞的“突出政治”的那一套做法。而林彪的这些做法，毛泽东本人在此之前也曾对此加以肯定。

在批过林彪的一套“突出政治”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又针对林彪曾鼓吹的“紧跟”的提法表示异议。毛泽东说，“紧跟”，他就不愿听，不能跟人，要跟党，跟路线。这就是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紧跟”风提出的驳斥。

1971 年 10 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明确要求他们切实改正，进而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一时不能解放仍然被监禁的许多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

11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一份公安部门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要求改善在押人员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这样，由于周恩来的亲自干预，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朱穆之以及一些爱国人士和文艺界人士，也先后得到周恩来的关照，从而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境况。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对曾经使他震怒的“二月逆流”采取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基本肯定的态度。

毛泽东指着叶剑英并且对在场的与会同志们说，大家再不要叫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的实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这实际上是毛泽东亲自为所谓“二月逆流”平了反，并且毛泽东自己也作出了某种形式的自我批评。

1972 年 1 月初，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叶剑英的谈话中进一步否定了存在所谓“二月逆流”的问题。毛泽东并请周恩来、叶剑英两人将此意见转达陈毅。

为此，叶剑英特意到医院将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的消息转告给重病中的陈毅。1 月 10 日，毛泽东亲自参加陈毅追悼会，对陈毅的一生作出高度评价，为陈毅的冤案平了反。

这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亲自参加的追悼会。毛泽东对陈毅夫人张茜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他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情况经过报刊、广播公开宣布，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这种“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这对广大老干部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一种慰藉。

半年后，周恩来对此还感慨地说，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使他们这些老干部和忠于毛泽东的人，都很感动。

毛泽东的这些转变，为周恩来解放“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一大批老干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大会，又为周恩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

周恩来抓住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的这个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1972 年 1 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

周恩来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



1972年春天，周恩来得知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因受“杨、余、傅事件”的株连而被关押在河南，在关押期间突然死亡。周恩来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林彪、江青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煽动，许多老干部在被批斗过程中身心都严重地受到摧残，健康状况甚差。1972年4月，周恩来知道了陈正人、曾山两位部长发生心脏病因无处就医和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后，当即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恢复对老干部的体检和医疗制度，并亲自对此作了布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10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作了体检。这其实也是周恩来为解放老干部创造的另一个机会。

周恩来借这个机会，将许多在外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的老同志召回了北京，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并为他们安排了工作。

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九·一三”事件后，许多老同志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信，在揭发和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也反映了各自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希望能出来工作或结束审查，改善生活，与家人团聚。毛泽东对其中许多信件作了批复，有的明确表示同意解除审查和出来工作。有的虽然未作批复，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容易被理解为同意申诉人的意见。

1972年1月，萧克从江西水修农林部“五七”干校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在信中，萧克揭发、批判林彪的罪行，同时说明自己虽已结束审查，但却迟迟未予解放和恢复组织生活。毛泽东看后，在信上批示，萧克的问题属于党内犯某些错误的性质，应当恢复党籍，并给予适当工作。

周恩来等因势利导，决心把工作进一步作到位。在很短的时间里，陈云、苏振华、杨成武、林枫、张执一等许多老同志或解除审查，分配工作，或改善了生活待遇。

陈云，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之外的领导职务。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映他在江西南昌下放的情况，请求中共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批准了陈云的这一请求。

此后不久，陈云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7 月 31 日，陈云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次日，各大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这是自 1969 年 10 月以来，陈云首次参加国务活动。至此，陈云恢复了名誉。

为了从全局上推进解放老干部工作的进行，彻底扫除极“左”思潮这一障碍。1972 年 4 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从正面阐述了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这篇社论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在这段时间，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活动的机会，通过在《人民日报》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为老干部恢复名誉，解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受难的干部。

“疾风知劲草”，毛泽东在斗争中识别了林彪，也理解了包括徐向前在内的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斗争的艰苦。毛泽东逐步起用一些老革命家，并在中南海接见了各位老帅。

周恩来带病支撑着困难的局面，为老帅们能出来工作花费了许多心思。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徐向前频繁地参加了一系列国务活动。

廖承志也是在这期间被解放的老干部之一。为了廖承志的解放，周恩来多次对军代表说：“廖承志问题作结论了没有？快点解决他的问题”，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廖承志终于获得解放。

1972 年下半年，利用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转机，周恩来把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引向深入，解放干部的工作也有了进一步发展。

8 月 5 日，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的子女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反映被关押的林枫的病情，请求尽快将林枫放出来治疗休养。

8 月 11 日，毛泽东在阅过该信之后立即批示说：“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8 月 11 日晚，周恩来即约有关人员谈专案问题。很快，林枫的问题即被解决。

在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工作落定之后，纠正“文化大革命”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授权周恩来去落实干部的政策问题。在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再



一次体现出了他们在长期革命生涯中曾经有过的密切关系。

周恩来把他审时度势的斗争艺术和细致周到的工作作风密切结合起来，从一个个关键环节入手，推动干部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周恩来在接受了毛泽东的委托后即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落实中央的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国务院的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军队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

周恩来还规定，“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中央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在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中，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毛泽东的态度更具有决定意义。

毛泽东不仅亲自抓了重大案件的平反，而且亲自对许多干部的来信作出了重要批示。这些干部经毛泽东批示，或者在政治上被解除了审查，分配了工作，或者在生活待遇上得到了改善。其中为“杨、余、傅”事件平反即是最好的例子。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的时候，明确地表示要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领导同志的冤案承担责任，并且在一定形式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要给贺龙、“杨、余、傅”和罗瑞卿平反，并且坦率地承认有几次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表示要“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说，“杨、余、傅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1974 年 7 月，毛泽东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恢复名誉。此后不久，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了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军内被打倒、被关押的干部多达数百人。其中，级别最高的是两位元帅：彭德怀和贺龙。关于贺龙，毛泽东曾拍案而起说，看来贺龙的案子“假了”。总政治部考虑到毛泽东说过的贺龙的案子“假了”，于是派保卫部部长蒋润观持介绍信前往中央专案组一办索取贺龙的材料。一办的负责人却不答应转交贺龙的材料，蒋润观乘兴而去，失望而回。正当总政治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班子不知从何入手之时，周恩来亲自为他们选定了突破口。

1972 年 12 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于 12 月 18 日致信此时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汪东兴等，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此时，谭震林被下放到广西桂林，并不幸于7月24日把右腿跌断了。

周恩来在得知此事后给谭震林的信中指出，谭震林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周恩来并讲了谭震林在桂林摔伤了骨头。

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关心，给了此时的谭震林以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谭震林特意选定1972年12月26日发信，因为这天是毛泽东的诞辰之日。

毛泽东收到了谭震林的信后，当即将信批给中央政治局，同意谭震林回京治病的请求。

1972年9月，周恩来接到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张化东的妻子曹宏恩的来信，信中要求寻找张化东的下落并了解张化东问题的性质。周恩来当即批告外贸部有关负责人，准予张化东的妻子曹宏恩探监。随后，在周恩来亲自安排下，将张化东释放就医。

同年10月，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亲自过问贺绿汀的问题，催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案。贺绿汀于1973年1月被解除监禁而获得解放。

1972年冬天，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在囚禁中的李葆华身体很不好。这封信经胡耀邦、王震辗转送至周恩来。周恩来接信后亲自给安徽省革委会负责人打电话，责令其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住院检查身体。

三天后，周恩来又再次打电话催问事情的落实情况。在周恩来的关心下，李葆华获释。不久，李葆华就调任贵州省担任第二书记。又一位老干部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走出了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阴影。

著名的进步作家沈雁冰，是原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因“反革命”嫌疑被拘捕入狱，专案组又不及时审查，不得解放。

1973年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童小鹏曾向有关负责人询问了关于沈雁冰的情况，问他究竟是什么问题，均没有确切的答案。童小鹏就当面报告周恩来，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周恩来授意童小鹏向公安部军管组负责人施义之调查，要他们迅速审查结案。

对于贺龙，周恩来曾尽了最大力量保护而没有保住，贺龙最终还是被林彪、江青等人陷害含冤而死。对林彪等人的罪恶行径，周恩来一直感到非常气愤。为了给贺龙平反和恢复名誉，周恩来在重病时亲自调出专案组的材料

审查。

在1972年前后，虽然江青、康生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干扰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但是，干部政策的落实问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干预、推动下，不断地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迫害和被打倒的老同志出现在党和国家的重大节日招待会和重要会议上，并且以这样的露面方式被宣告结束审查。

不久，毛泽东又作出新的批示，说这样一个一个地解放干部太慢了，应该一批一批地解决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一下子提出几百人的名单，再一次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这样，一大批原党政军的负责干部重新回到了领导岗位。

这些干部的复职，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和同江青一伙斗争的健康力量，削弱了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造反派势力，为中共中央以后顺利地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奠定了政治的和组织的基础。

1973年初的一天，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大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周恩来有事找他。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对田维新说明找他来的原因是跟他谈解放干部的问题。周恩来又说，只给他一个人谈也说不好，要田维新再找一个人来。于是，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时任总政治部干部部部长的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田维新和魏伯亭说，要跟他们谈陈再道和钟汉华的问题。

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治部以后，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经过认真的调查甄别，写出调查报告，送中央政治局讨论。在讨论过程中，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最后，会议还是为陈再道、钟汉华两位将军平了反。

197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国务院按照惯例，将在9月30日晚于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招待各级的行政机关干部。周恩来充分利用这次招待会的时机，安排了一批被长期关押的老干部出席这次招待会，并趁机将他们释放出来，为他们恢复名誉。在《人民日报》第二天刊出出席人员的名单时，周恩来认真细致地翻看了2 000多个见报的名单，及时地补进了肖华、刘志坚、齐燕铭、薛子正等一些享有一定声誉的老同志。

这些老同志都是遭到林彪、江青等人迫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隔离审查，至1974年国庆前夕仍未解放。还有一些久不见报的人，如张学良

的胞弟、全国政协委员、爱国人士张学铭，相声大师侯宝林等，都是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写进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名单，从此恢复了名誉。

老将军的"解放"工作，大体上都按一定的工作程序进行。第一步是由总政治部审查鉴别原来造反派在打倒老将军时所作出的结论。确认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哪些是颠倒黑白的、哪些是无限上纲的。然后，总政治部根据调查的情况作出新的审查结论。这些新的审查结论还必须与老将军打倒时所在的原单位取得大体一致的意见。

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才能真正被"解放"。而由于江青一伙的刁难，中央政治局这一关，往往又是最难过的一关。

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7时半召开，通常一次会议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材料的内容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的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特殊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

据田维新回忆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老将军"解放"的问题时，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令人非常难以忍受。后来与江青争辩得多了，也就习惯了，不怕了，无非是被江青一伙多扣几顶帽子就是了。

在田维新的记忆中，周恩来主持这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往往不多讲话，只在争论中的要害处说一两句。不过常常是周恩来的一两句话，就使江青一伙争不起来了，事情也就这样子定了。

由于江青的刁难，在中央政治局讨论175位将军的"解放"问题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不过，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全军175位被打倒的高级将领，历经一年多时间的紧张艰难的工作，终于全部获得了"解放"，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

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由于江青等人的百般阻挠，这一工作步履维艰，远未达到预期的目的。1973年春，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大量便血，需要尽快动手术。在动手术之前，他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并且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

中央组织部提出一个300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江青、张春桥等人百般阻挠，设置种种障碍，从中作梗。为此，叶剑英愤然作过一首"过桥"的诗，来表达对江青等人阻挠解放干部的愤慨，对"牵骡人"周恩来表达自己的敬佩和感谢之情。



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受到阻止

“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和党的领袖毛泽东犯了“左”的全局性错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周恩来再次处于多种矛盾和冲突的中心和焦点，处于时起时伏的政治冲击波的风口浪尖之上。他既要维护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内乱的情况下不致中断，使共和国大厦不致倾倒；又要对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推行其阴谋诡计有所抵制和斗争，保护广大干部和民主党派人士免受或少受他们的迫害和摧残。其处境之艰难，工作之繁忙，病痛之折磨，已达到心力交瘁、难以想象的地步。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毛泽东将其看做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国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对于毛泽东而言，经过“文革”，他打倒了自己选择并由党组织确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而由他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林彪却要谋害他，因此毛泽东陷于极大的痛苦之中。一方面，选择新的接班人和维护“文革”便成为他晚年思考的两个根本问题，另一方面，被迫对自己的错误政策作局部调整。林彪事件从实践上已宣告“文革”的失败和指导思想的错误。周恩来试图以此为契机结束“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却依然坚持“文革”的极左错误。与此相联系，毛泽东着眼于能否按照“文革”的路子“继续革命”来选择接班人，而周恩

来却恰恰相反。虽然反对把权力交给江青一伙是两人的共同点，但毛泽东却依然信任和支持江青集团。因此，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矛盾和分歧依然存在。第一个巨大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失，第二个巨大矛盾的对立面虽只剩下一个江青集团，但他们对周恩来的攻击、诬蔑和发难，比之林彪一伙有过之而无不及，周恩来的工作依然困难重重。

随着时局的起伏变化，周恩来时多时少地始终坚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以求稳定局势，排除阻力，借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批判极左思潮，是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一贯思想。周恩来在此期间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大体上以1971年林彪事件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个阶段，是以1967年1月开始的夺权风暴为起点的。自1967年初以来，周恩来多次对夺权狂潮中某些错误的纠正，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极左错误的抵制和批判。“七二〇”事件后，康生等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王力等唆使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大权，8月22日发生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毛泽东也对“揪军内一小撮”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提出批判极左思潮。8月底，周恩来指出，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总之，自1967年7月底以来，周恩来一再强调要反对极左倾向，警惕极左煽动，其表现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不相信领导，否定一切领导，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在不同场合，提出和坚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1968年，周恩来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到1971年3月，他针对存在的问题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中，为所欲为”的现象，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表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

林彪事件对中国政局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这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出现了转机。中央领导机构中进步力量的加强，使党内抵制“文革”的势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优势。二、这事件使毛泽东受到震撼而出现有限度的反省，他亲自抓了对一些高级干部的政策落实工作，进行政策上的某些调整，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所有这些都为批判极左思潮创造了有利条件。三、这时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始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怀疑逐渐加深并扩大到整个社会。这是当时周恩来得以开展批判极左思潮的



历史背景。

林彪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的深入，周恩来主持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逐步展开，使这个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批极左思潮充分展开的后阶段。

1971 年 8 月，周恩来向驻外使节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贯穿着“批透极左思潮”主题，揭开了全面批判极左思潮的序幕。从 1971 年底开始，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排除阻力，消除“文革”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恶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重要性，还针对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批判极左思潮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指出，忽视政治，埋头生产，空谈政治，不敢抓生产，都是不对的；把产品质量提到第一位，关键是肃清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1972 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1972 年 4 月，周恩来再次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1967 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这是批判极左思潮斗争逐渐展开的第一个时期。

1972 年 8 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他指出，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9 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

10 月 14 日，根据周恩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人民日报》

用一个整版，发表《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一组批判极左错误和无政府主义文章。对此，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极为不满，指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周恩来与江青一伙在“批林”性质问题的分歧，最后还得由毛泽东裁定。

同年 11 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11 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11 月 30 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12 月 1 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12 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 8 月 1、2 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12 月 5 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



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毛泽东支持周恩来的工作，但这种支持是有一个限度的，即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

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其实批林彪极左曾经是毛泽东的意见，但这时毛泽东却否定了周恩来的意见，支持了江青等人。实质上，毛泽东对批极左的否定，就是对周恩来纠正“文革”错误不满的一种表态。这是批判极左思潮斗争深入发展，围绕着打“左”还是批右问题，党和人民同江青集团的斗争异常激烈的第二时期。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1967年9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一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做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1972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从1972年底批林整风开始的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它是我们党内一次试图纠正“文革”错误的尝试。其实质是：“可能的条件和范围内，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阻止和减少它的破坏，逐步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使国民经济在相对稳定的局势下摆脱

困境，有所发展，安排好人民的生活。”

1973 年以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入了遭受挫折而被迫中断的时期。1972 年底，毛泽东断然否定了周恩来的批“左”主张，再次使两个巨大矛盾交织在一起，天平再次向江青集团倾斜，形成了对周恩来等党内健康力量难以承受的重大压力。虽然周恩来仍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认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已进入了批极左思潮的斗争不得不暂停的第三时期。

由于指导这次“批极左”的基本精神、主要方针和办法都是在 1972 年制定和出台的，因此也称为“周恩来 1972 年整顿”。毫无疑义，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是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面旗帜。



邓小平复出

邓小平复出的转机是透过两件事显现出来的。一、林彪事件的爆发，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新定性。

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五天后，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十天后，这个消息扩大传达到地、师一级。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10月中旬，传达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一级。10月24日，传达扩大至全国基层群众。

居住于江西步校的邓小平在还未正式听到中共中央传达的文件之前，对此已有预感。懂得无线电技术的邓朴方，从短波的一个外国电台中，邓朴方突然收听到一条消息，说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在蒙古坠毁。以后接连几天的消息都在推测，说中国内部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当邓朴方把这一消息告诉邓小平时，邓小平没有说什么。

邓小平真正接到这个消息是11月6日。当天，工厂里突然通知邓小平夫妇去工厂听传达文件。所传达的中共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所发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11月8日，也就是听过中央文件传达以后两天，邓小平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邓小平除了表达对中共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还向毛泽东汇报了他自己的具体情况。

信中他也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明确地表示，在报上每天看到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这些都使他的心情激动起来，就想为国家为人民再做点事情。他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他表示他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希望能有机会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为了保证以后和中共中央的联系，邓小平在信中提到，过去，毛泽东交代他有事情找汪东兴，年初因他大儿子的事写信给汪东兴，工作组同志却告

诉他不要再写信了，所以11个月来，他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

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邓小平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

事实证明，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这封信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邓小平并不知道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看到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为什么不让邓小平写信了。汪东兴其实并不知道不让邓小平再写信的事。汪东兴向毛泽东如实回答说，他并没有不管邓小平的事，他跟毛泽东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央办公室副主任王良恩负责邓小平的事。

毛泽东对汪东兴说，邓小平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其实十分明确，不要阻挡邓小平写信。

毛泽东还在邓小平信上批示说：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在邓小平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又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的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后，当机立断，一方面派人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厂，印了若干份，并分别送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进行讨论。另外，周恩来又采取了一个果断措施，立刻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革委会，宣布邓小平即日即可解除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可安排他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

接着，周恩来又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指示将邓小平的老秘书王瑞林等工作人员调到邓小平身边，以协助他的工作，改善他的日常生活，改善他的处境，为邓小平的重新出来工作做好准备。

林彪的自取灭亡，在历尽劫难的"文化大革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事件，对邓小平的政治命运，无疑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自此以后，邓小平的政治环境开始有了一些转机，生活待遇也较以前逐步好转。林彪在江西的爪牙程世清倒台后，新省委白栋材、黄知真探望了邓小平，撤换了态度恶劣的原监管人员。不久，中共中央根据邓小平的请求，同意邓朴方回京治病。



1972年陈毅追悼大会于1月1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毛泽东亲临追悼会。

追悼会上毛泽东在同陈毅的家属谈话时称赞了陈毅，还提到了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此时正担任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的。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显然，毛泽东是将邓小平划出了自己的“对立面”。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对于在场的周恩来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也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一个信号。周恩来深知，“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一旦被“摘帽”，乃至被“解放”，势必会推动对一大批“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为他们重新出来工作开个好头。此时的周恩来非常希望这些老同志早一些得到“解放”，为混乱的局面出一份力。

于是，周恩来便当场示意陈毅的家属，将毛泽东有关邓小平的谈话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的意思向更多的人传达。

1972年1月下旬，周恩来同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会议的代表时，明确提到邓小平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的意思的”。

这里，周恩来又进一步把邓小平纳入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这些老人”之列，直接将邓小平划到了林彪一伙的对立面，进一步澄清了所谓的“邓小平问题”。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是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审定的。其中写道，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严格区分。除了极少数的那些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于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新干部，党内的同志或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这些文字，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讲，邓小平的“解放”已指日可待。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向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风向突然又发生了

逆转。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做法遭到了江青等人的质疑，并获得了毛泽东的支持。

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起伏，在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上，便自然而然地集中了党内对于“文化大革命”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样，虽然有了毛泽东的重要批示，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却迟迟不见“下文”。似乎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就在毛泽东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被“搁置”了四个月之后，1972 年 12 月 18 日，周恩来提笔致书纪登奎、汪东兴两人说：“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在这封信中，周恩来虽然提及毛泽东于 12 月 7 日晚上谈及谭震林这位 1967 年“大闹怀仁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即回京安排工作。但是，同时，周恩来又着意提到了邓小平。

从周恩来的这封信字面上看，毛泽东在谈话中未必提及邓小平的问题；而周恩来却在信中强调毛泽东过去“曾提过几次”，其中，自然包括四个月前他对邓小平的来信作的长近 200 字的批语。周恩来之所以旧事重提，要求纪登奎、汪东兴“考虑”邓小平的问题，正表明了他对这件事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周恩来对于解放老干部，曾作过解释说，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标杆”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人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就容易了。

关于周恩来所讲的“从上到下”。最“上头”为谁呢？此时非邓小平莫属。自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来信中作出“八·一三”批示后，周恩来原本打算先“解放”邓小平以树起这一最大的“标杆”，明确政策，从而“解放”一大片其他的老干部。而当批判极“左”思潮受挫，碰上了江青一伙所设置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难点”后，周恩来不得不绕开“难度大的”，走“先易后难”之路；即选择“薄弱环节”进行突破，继而打开全局。

终于，历史叩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

1973 年 2 月，邓小平接到了要他回京的通知。在江西度过三年多的时光后，邓小平带领全家人于 2 月 20 日乘火车启程，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

1973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初，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原信的批示精神，也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起用的指示，连续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

 

讨论起用邓小平的问题。

这次讨论无疑也充满了斗争。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先念为一方，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为另一方，进行了一番较量。周恩来巧妙地运用毛泽东的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这把“尚方宝剑”，迫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范：立即起用邓小平，不能再拖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等，旗帜鲜明地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 月 9 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向他汇报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

周恩来在信中提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

周恩来并且向毛泽东报告，邓小平已回到北京。毛泽东对此批示“同意”。周恩来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邓小平本人阅读，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

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

中共中央在《决定》中说，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问题。毛泽东的批示，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毛泽东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遵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并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中共中央的《决定》还要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

从中共中央的这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文件当中可以看出，在此时“左”的思想指导之下，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地为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彻底平反。相反，《决定》还以落实对犯错误干部的政策为其出发点，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表明这时对解决邓小平的问题还存在着一种历史的局限性。

然而，根据中共中央这个《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党

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得以复出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的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论点和做法的一种否定。

邓小平的复出对于进一步推行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解放”工作，无疑是起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应该说，这才是邓小平此番复出的“实质”所在。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复职的《决定》的当天，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建议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叶剑英主持。

1973 年 3 月 28 日，周恩来身体稍有康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

3 月 29 日，邓小平同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邓小平可以“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1973 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 1973 年 4 月 12 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1972 年 5 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8 月 14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

12 月 18 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27 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



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1973年2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68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3月9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月28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29、30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29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4月1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

12 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1973 年 5 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973 年 4 月 12 日，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重要场合公开露面了。当晚 7 时 30 分，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里，周恩来举行盛大宴会，热烈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一行。宴会尚未正式开始，赴宴者还未各就其位，人们还在等待着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亲王人坐。这时，邓小平出现了。

邓小平戏剧性地突然露面，使在场的众多中外来宾都惊讶不已。一些参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会还没有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纷纷奔向近处的邮电大楼，向全世界发布“邓小平复出了”的重大消息。

第二天，港台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邓小平重返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间，邓小平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门话题。

5 月下旬，中共中央为筹备党的十大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向与会者强调，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邓小平在 1973 年 8 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此时是邓小平恢复组织生活的第五个月。从“第二号走资派”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大的转折，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对邓小平来讲，好运似乎还没有到此为止。毛泽东还要委邓小平以更重大的责任。

从 1974 年初起，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了邓小平处理。从此，邓小平进人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领域工作，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影响更大了。

南京长江大桥和宝成铁路建成通车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迅速提高列车的过江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任务。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时，中国政府在南京已增建了多艘火车轮渡，使综合通过能力提高到单向日渡车达1 240辆，年输送能力达1 400万吨。但仍远远落后于运量增长的需要。这一情况严重地影响了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其中，南京地处长江的下游，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一起，很早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南京建造一座长江大桥就被提上日程。

1958年10月，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后，中国政府便开始组织力量勘测设计南京长江大桥。在选定建桥地址后，铁道部协同中国科学院，邀请科研、设计、工程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两百多人，共同讨论研究了大桥的设计及技术问题。他们先后提出上部结构方案39个，下部结构方案10个，美术方案40幅，并经仔细分析比较后，向铁道部提出最后方案，不久即获批准。

1959年9月，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参加者有铁道部、江苏省和南京市两级地方政府。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成立之后，旋即开始了整个大桥的具体筹建工作。

1960年1月，大桥正式动工兴建，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影响了大桥的建设进度。1964年以后，大桥建设才出现高潮。

在建桥过程中，工人们发扬了苦干加巧干的精神。在架设公路引桥的预引力梁时，架梁用的大龙门吊机被横穿工地的金河挡住，工人们仅用十个半小时就让50多米高、100多吨重的龙门吊机通过金川河。再如修造难度很大的双曲拱桥时，工人们经过了六个月100多次的试验，完成了混凝土的合理配方，在正式架设中，大战69天，终于完成了双孔拱桥的架设任务。

1960年1月，大桥正式动工兴建，因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困难，影响了大桥的建设进度。1964年以后，大桥建设才出现高潮。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1968年12月29日，公路桥提前通车（原定1969年7月1日

通车），全桥胜利建成。

与此同时，由济南铁路局领导建设的津浦铁路新汴河大桥也于 1968 年 3 月 15 日正式开工。

这一工程只用了短短的 85 天时间，于 6 月 8 日建成。位于安徽淮北平原新汴河工地横跨新汴河上的津浦大桥长达 260.18 米，是一座 13 孔双轨铁路大桥。

新汴河工程是进一步根治淮北平原洪涝灾害的一项关键工程。新汴河河道，共长 130 多公里，从宿县城北截引沱河起，经灵璧、泗县人洪泽湖，中间穿过津浦铁路。横跨新汴河上的津浦铁路大桥的建成，可以保证新汴河工程在以后的汛期更好地发挥效益，并且保证津浦铁路畅通无阻。

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建桥梁中最大的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长 6 772 米，主线为双线铁路桥。铁路桥之上是公路桥，长 4 588 米，共有四条行车道，两旁另有人行道。正桥两端矗立着四座巨大的工农兵塑像。

正桥采用 10 孔铁路公路上下分层的钢桁梁，浦口岸第一孔为跨径 128 米的简支钢桁梁，其余九孔为三联跨距 160 米的连续钢桁梁，桥下通航净空宽 120 米，高 30 米，可通航 5 000 吨至一万吨级的海轮。桥的主桁及铁路横梁等主要结构，采用 16 号锰低合金钢和性能近似的桥梁钢。铁路桥面铺设焊接长钢轨；公路桥面铺用轻质材料的钢筋混凝土板。

西端的引桥长 5 200 米，为正桥的三倍多。铁路引桥南北岸共 159 孔，跨度 31.7 米，为预引力钢筋混凝土梁。公路引桥配有 18 孔的双曲拱桥和 11 孔的双曲拱落地结构。两岸的铁梁两端各建一座高 97.6 米的桥头堡。入夜，大桥上万盏灯火齐放光明，绵延十几里，有如银河落在宽阔的江面。

大桥共九个桥墩，桥墩基础深达 70 米至 80 米。根据不同地质、水文条件，分别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墩台基础。即重型混凝土沉井基础、钢沉井加管柱基础、浮式钢筋混凝土沉井基础和铁板柱围堰管柱基础。

南京长江大桥代表了当时中国桥梁建筑的最高水平，而且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也代表了国际桥梁建筑的先进水平。

其主要成就首先表现为解决了正桥深基础和深水基础的问题。大桥主流处水深达 30 米，江底覆盖层厚 40 多米，河水最大冲刷可达 23 米，流速为每秒 3.2 米。工程技术人员通过大量试验，从实际出发，采用了四种墩台基础加以解决。人土深度达 50 米至 60 米。

其次，公路铁路两用桥梁突破了160米跨度，采用了16号锰低合金钢，节约钢材15%至18%。公路桥面采用了粉煤灰陶粒钢筋混凝土，质坚而轻，比普通钢筋混凝土要减轻20%至25%。

再次，采用了多种先进技术解决难题，如研制成功了大型动打桩机、汽动式大型钻机；采用了体拼装机器样板钻孔、循环压力灌浆、氦氧深潜水作业、动能止摆船、接泥式吸泥机等技术，突破一个又一个难题，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使中国人民跨越长江下游天堑的梦想成为现实，大大提高了客货列车的过江能力。使过去用轮渡载运列车过江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大大提高了列车过江的速度（由渡船的两小时提高到十多分钟）。

南京长江大桥使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宁芜铁路贯通起来，大大改善了华东地区的交通状况。同时，它还大大减低运输费用，减少旅客旅途劳累；使华北、华东和中南的交通运输更加便利。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难以估计的。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到1968年，全国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为了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的状态，在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下，全国计划座谈会讨论了们1969年国民经济纲要（草稿）》，并把《计划纲要（草稿）》作为1969年计划的主要文件。这个《计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五项主要任务，其中一项为狠抓交通。

北京第一条地下铁道线路于1965年7月开工，由北京火车站到西郊石景山区苹果园，全长23.6公里，设17个车站。1987年建成地铁一线复兴门折返线，由复兴门运行至苹果园，全长17公里，设12个车站。

第二条地下铁道线路沿原北京内城城墙在地下修建，形成环线路，全长23公里，设18个车站，除北京火车站到复兴门原属第一条地铁线路已先期建成外，其他线路于1971年3月开工，1984年建成通车，1987年全线环行通车。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北京市开工建设第三条地下铁道线路。这条线路以复兴门为起点，往东经西单、天安门、王府井、东单、建国门到公主坟，全长12.2公里。它与地铁一线在复兴门连接，与地铁二线在复兴门和建国门交汇，是横穿东西，穿越市中心的地下交通干线。地下铁道的建设，标志着北京市公共交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69 年 1 月 31 日，柳州公路大桥建成通车。同年 5 月，安徽省芜湖铜陵线的漳河铁路大桥建成通车。同年 7 月，山东平阴黄河公路大桥破土兴建。

1970 年 7 月 1 日，成昆铁路正式通车。

成昆铁路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通车的一条重要铁路干线。它北起四川省成都市，南达云南省昆明市，全长 1 083 公里，途经彭山、夹江、眉山、峨眉、甘洛、越西、西昌、喜德、德昌、米易、攀枝花、元谋、安宁、平浪等十几个中小城市和 122 个车站。它的建成通车，对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铁路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的同时，福州闽江大桥也于 6 月 30 日建成通车。

1970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湘黔、枝柳铁路建设会议纪要》，要求首先建成湘黔铁路。为统一领导，有关方面成立了湘黔、枝柳铁路会战总指挥部。

湘黔铁路于 1972 年 10 月 13 日建成通车，全长 902 公里，总投资 16 亿元。湘黔铁路东头和湘赣铁路相连，西头和 1966 年建成的贵昆铁路相接。这样就在中国南方构成了和陇海铁路平行，横贯中国东西的第二条铁路交通干线。该铁路于 1953 年开始修建，至 1962 年修通了湘潭至金竹山段，成为穿过湘西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一条重要铁路。

1970 年，湘黔铁路续建金竹山至贵阳段，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湘黔铁路的建成通车，对促进湖南和贵州沿线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地区间物资的交流，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云、贵两省的煤炭、磷矿石外运，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减轻了对陇海铁路的运输压力。

1972 年 9 月 30 日，长沙湘江公路大桥建成通车。1973 年 2 月 23 日，横跨四川岷江的两座公路大桥建成通车。

1975 年 7 月 1 日，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电气化工程全部建成通车。承担起西南、西北两大地区间的物资交流，宝成铁路是全国铁路网的骨架，对于沿线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

早在 1913 年，中国政府曾就修建同（大同）成（成都）铁路进行过多次踏勘，但未动工兴建。在 1936 年至 1948 年，政府又经过多次勘测比较，曾选定天水至成都方案，但仍未动工兴建。直到 1950 年至 1953 年，政府对天水至略阳和宝鸡至略阳两段又进一步勘测，最终选定宝鸡至成都的方案作

为宝成铁路的修建方案。

宝成铁路于1952年7月1日从成都端开始动工。

1954年1月，宝鸡端也开始施工。

1956年7月12日两端于甘肃黄沙河接轨。

1956年7月13日上午10时在甘肃省徽县黄沙河举行了接轨仪式。

当施工进入紧张阶段的时候，曾经动用了中国新建铁路一半左右的劳动力和4/5的机械筑路力量。这条铁路的修建工程。共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接轨时间比设计文件规定的日期提前了13个月以上。

1958年1月1日正式通车，全线采用蒸汽机车牵引，正式运营。

从1958年6月起，宝成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工程。1960年6月建成宝鸡至凤州段工程，1967年开始进行剩余部分改造，1975年7月1日全线完成电气化改造，成为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宝成铁路是沟通中国西北、西南的第一条铁路干线。宝成铁路北起陕西省宝鸡，南行达四川省成都，与成渝、成昆两线衔接，全长669公里，是沟通西北与西南地区的第一条山岳铁路。

宝成铁路全线隧道304座，延长84公里，大、中、小桥1 001座，延长28公里，桥隧总延长占线路长度的17%，全线最长的是新会龙场隧道，长4 245米。

宝成铁路是新中国第一条工程艰巨的铁路。宝成铁路（宝鸡至广元段）几乎全部处于山区，由宝鸡出发后就需要先后跨越秦岭、巴山和剑门山，地势险要，因此工程相当艰巨。

宝成铁路进入秦岭山区后沿清姜河盘旋迂回，铁路通过秦岭时，从杨家湾车站到秦岭大隧道直线距离只有六千米，但升高却达680米，即每千米上升110米。为了把坡度改为每千米只升高30米，能够通行火车，只能把铁路线反复迂回盘旋，在6千米的直线距离内盘绕了27千米；在任家湾和杨家湾之间的线路以30‰的大坡度急速爬升。为了克服地势高差，过杨家湾站后就以三个马蹄形和一个螺旋形（“8”字形）的迂回展线上升，线路层叠三层，高度相差达817米，即为著名的观音山展线。所以在观音山站就可以看到三层铁路重叠的场面。再经2 364多米长的秦岭大隧道穿过秦岭垭口，即进入嘉陵江流域并到达秦岭站；越过秦岭后线路即用12‰的下坡道沿嘉陵江而下至四川省广元，秦岭至略阳间先后14次跨过嘉陵江。

著名的“观音山展线”，坡度最大达33‰，是我国正线坡度之最，上坡

时需要三辆电力机车前拉后推方可驶上秦岭站，下坡时一路刹车，火花四起，蔚为壮观。

为了克服地势高差，设计方案以三个马蹄形和一个螺旋形的迂回展线上升，线路重列 3 层，高达 817 米，随后以 2 000 多米长的隧道穿过秦岭垭口，进入嘉陵江流域。全线共完成主要工程量有：路基土石方 7 116 万立方米；隧道 304 座，总延长 84.4 公里；桥梁 1 001 座，总延长 28.1 公里；桥隧总长约占线路长度的 17%，正线铺轨 667.71 公里。从开工到交付运营间先后发生严重的滑坡 58 处，崩坍 272 处，整治工程量及难度都相当大。整个宝成铁路工程打穿上百座大山，填平数以百计的深谷，单填土石方就有 6 000 万立方米，按高宽各一米算，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半以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宝成线作为单线电气化铁路，其技术水平和运输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1994 年，国家决定投资 57 亿元，对宝成线进行复线电气化建设及既有线电气化改造。1996 年 7 月 1 日，宝成复线电气化建设及既有线电气化改造工程正式开工。这次改造工程，无论是从设计上，还是从施工方法上都较以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全线采用了大量具有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尤其是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更使工效大大提高，工程质量得到了保证。1998 年底，该线复线及电气化改造主体工程已经完成，11 月 8 日，广元至江油 162 公里复线电气化开通。建成后的宝成线的年运输能力将增加到 4 000 万吨以上，比过去提高 1.5 倍，时速由 60 提高到 80 公里。经过再一次“充电”的宝成电气化铁路，将与西部经济一起实现第二次腾飞。

宝成电气化铁路的建成，拉开了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序幕。宝成铁路全线实现电气化通车后，货物通过能力比电气化以前提高一倍以上，投资仅为修建一条新线的十分之一。由于实行电力牵引，全线机车牵引定数取得一致，沿途减少了列车的编组作业，加速了车辆周转，减少了列车检查和给水给煤人员；同时，电力机车运转效率比过去的蒸汽机车速度高，能节省几十台机车，乘务人员也可以相应减少。

从此，电气化铁路伴随着祖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了高速发展期，短短二十余年间，就成为继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国之后第九个拥有一万公里电气化铁路的国家，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宝成铁路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设骨干分不开的。宝成铁路主要承担西南、西北两大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是中国铁路网的骨架，对于沿线工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作用。以后

相继修建了广元至普济、德阳至汉旺、广汉至岳家山、青白江至都江堰等四条支线，促进了附近地区矿藏资源的开发。

这些交通运输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火车头”的作用，而且从实际上为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大型水利工程的先后建成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兴建水利工程，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宝贵资源。我国对水利工程进行了长远的规划，从“人工天河”红旗渠的竣工，到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的建成，中国水力资源之丰富与开发条件之优势，在世界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969 年 7 月 6 日，河南省林县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这一水利工程是 1960 年开始动工兴建的，从山西省平顺县的候壁断起，穿越太行山的许多悬崖绝壁，至 1966 年建成了宽 8 米，深 4.3 米，引水量为 25 秒立方米，长 140 华里的总干渠和 203 华里的干渠，把漳河水引进了林县。

至当年 7 月，林县人民又胜利地完成了以红旗渠为主的 1896 华里的支渠配套工程。支渠配套工程的竣工，使全县从山坡到梯田，从丘陵到盆地，形成一个水利灌溉网，全县水浇地面积由解放前的不到一万亩扩大到 60 万亩，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1969 年 7 月 15 日，安徽省为沟通长江和巢湖航运而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裕溪口船闸，继节制闸、拦河坝建成以后，又建成并且提前通航。新建的裕溪口节制闸和船闸，全部用的是钢筋混凝土。节制闸共 24 孔，长 200 多米。它同已经建成的巢湖闸构成了巢湖流域裕溪河的梯级水利枢纽，防洪保护面积达到 220 万亩，蓄水、引水灌溉面积达到 329 万亩。船闸闸室长 195 米，宽 15.4 米，可以同时容纳两艘千吨级轮船。

裕溪口船闸的建成，使裕溪口船闸以上 280 公里的航道畅通无阻。长江、巢湖之间的航运，再也不受裕溪河枯水季节河道水浅的影响了。

1969 年 9 月 23 日，江苏省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这是江苏里下河地区抗旱和排涝等综合利用的水利工程。工程是 1961 年开始兴建的，是由中国自行设计、自行安装的。整个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浚河道等 10 多项工程项目组成。

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把长江、淮河、大运河和里下河连接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机动引水和自流引水，进行抗旱和排涝。

在里下河地区遇旱时，三个抽水站可以抽引长江水，实行南水北调，灌溉大运河自流灌溉区的淮安、宝应、兴化、高邮、江都五个县的250多万亩稻田。在里下河地区积水受涝时，三个抽水机站又可以昼夜抽水250万立方米的速度排水入长江，受益范围包括高邮、江都、泰县、兴化和泰州五个县市，同时还便利了苏北内河运输。

1970年5月18日，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工程全部竣工。这一工程是从1966年11月开始动工兴建的。经过淮北45万民工几个冬春的奋战，把拓宽的沱河与开挖的新汴河相连接，构成了一条横贯豫、皖、苏三省，长250公里的大型河道。

这项工程的竣工，为沱河及濉河流域的洪水开辟了一条宽敞的出路，从而减轻了淮河的排洪量，解决了历史上经常遭受水灾的豫、皖、苏三省淮北14个县（市）的1 500万亩耕地的排洪排涝问题。

由于整个工程边施工边受益，1969年沱河流域虽遇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春汛，也没成灾，粮食产量一般比以往正常年景增长20%至30%，这条大河还为发展灌溉、航运等事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快了改变淮北面貌的步伐。

1970年6月16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工程完成。这一工程是根治海河的整个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清河位于河北省中部津浦铁路和京广铁路之间。过去，由于河道淤塞窄小，上游洪水不能够畅通下泄，每当汛期来临，洪水泛滥，造成沿河地区的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

自1969年冬季以来，来自石家庄、唐山等八个地区的30万治河民工，克服了种种困难，共排出积水8 000多万立方米，修建桥梁47座、枢纽工程两处，完成挖河工程土方达7 300万立方米。

后来，大清河两岸河堤得以加固，河道已经浚深拓宽，在部分地段又进行了裁弯取直，同独流减河相连接，构成了横贯河北省中部的一条长达210公里的大型河道。从此，汛期洪水能够畅通入海，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14个县不再受洪涝灾害威胁，确保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从而为促进沿河地区工农业生产和发展航运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0年7月1日，汉北运河全部竣工。这条运河是汉北水利工程的主

体工程，全长110多公里，流经湖北省粮棉集中产区天门、汉川、应城、云梦和孝感等县。并把这一地区的主要湖泊串连起来，把积水引入新河，排入长江，能使这一地区的农田免遭水涝灾害。

与此同时，新疆最大的一项防冲防渗渠道工程叶尔羌河本岸引洪大渠，也于1970年7月26日竣工。

1971年8月12日，陕西西关西部大型水利工程宝鸡峡弓门胃灌溉骨干工程竣工。10月22日，广西龙江一座中型水电站洛东水电站建成发电。

1972年8月21日，塔里木垦区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塔里木拦河闸建成。

1974年2月23日，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这项水利工程是为了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江而于1958年9月兴建的关键工程，它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

建立在湖北省境内汉江上游的这一水利工程，是解放以来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它包括一条总长五华里的大坝；一座装机总容量为90万千瓦、有12条线路送电、年平均发电量为38.3亿千瓦时的电站；一套国内第一次制造的，一次可以提升载重为150吨驳船的升船机以及引水总量为每秒600立方米的两条引水灌溉渠道。水库的最大面积为846平方公里。

1974年9月15日，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基本建成并发挥显著效益。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是黄河干流开发的第一期重点工程之一，坐落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县境内。它是一个以灌溉为主，结合发电、防洪、防凌等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在1958年开始动工兴建，1960年开始发挥灌溉效益，1967年底开始发电。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包括一座长697米、高42米的混凝土拦河大坝、六个河床闸墩电站、两个渠首电站、七孔溢流坝、三孔泄洪闸和开关站等建筑工程。灌溉面积达300多万亩。

几年来，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全灌区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出现了一批粮食亩产过“长江”的县、社、队。贺兰山下和鄂尔多斯台地的一些沙漠、荒滩，引黄河水上山，也建起了几十个农场、林场和果园。纵横7 000多平方公里的灌区，水源充足，结束了遭受黄河泛滥成灾的历史。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力网的中枢，有了这个工程，过去工业基础薄弱的宁夏，迅速发展起冶金、煤炭、机床、化肥、农机、纺织等现代工业。

1974年12月19日，黄河上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工程改造获得了初步成功。三门峡工程是黄河干流上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工程，委托外国设计。设计的基本方案是以高坝大库拦泥蓄水发电。工程于1957年动工，于1960年9月建成蓄水。

由于对泥沙淤积估计错误，水库建成后，泥沙淤积十分严重，并且淤积部位从潼关向渭河迅速发展，形成“翘尾巴”，这样，不但水库有报废的危险，而且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因此，有关部门又进行了改建，主要是加大水库泄流排沙能力，使水库能保持一定的库容，合理地发挥效益。第一步改建工程从1965年开始到1968年完成，第二步改建工程从1970年开始到1973年12月完成。

三门峡水库改建后，效益十分显著。水库泄流能力由在库水位315米（海拔高程）时泄放每秒3 080立方米增加到每秒10 000立方米。泄洪能力加大了，排沙能力也加大了，不仅可以使库容得到保持，而且潼关河床高程也有下降，为减轻渭河下游淤积创造了条件。

1975年2月4日，中国此时发电能力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成。

刘家峡水电站全面竣工于1974年底。这是中国第一座装机百万千瓦以上的大型水电站，从勘测、设计、科研、施工到全套设备的制造和安装，完全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完成的。

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成功，在当代中国的水电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此时舆论界充分报道宣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刘家峡全长12公里，位于黄河上游，在甘肃省兰州市以西100公里处的永靖县境内。这里，两岸山峰陡峭，峡谷深邃。奔腾浩荡的黄河水自南而来，经刘家峡转一个90度的弯，又纵贯永靖县城向西而去，水力资源极其丰富。

早在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在刘家峡建立水电站，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刘家峡水电站的全部勘测设计任务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完成。1958年9月，水电站开始筹备施工。但1961年停工缓建，搁置了三年。1964年9月，水电站重新动工兴建。到1968年，一座混凝土大坝在刘家峡最窄处拔地而起，将滔滔黄河之水拦腰斩断，形成一个万顷碧波的高原平湖。

1969 年 3 月底，刘家峡水电站第一台机组开始发电。1974 年底，五台机组全部投产运行，刘家峡水电站的建筑安装工程宣告全面竣工。此后，水电站的一些收尾工程也于 1978 年结束。

刘家峡水电站的主体工程是拦河大坝。这个大坝全长 840 米。其中，河床主坝段为直线型混凝土重力坝，最大坝高 147 米，长 204 米，顶宽 16 米；主坝左右两侧各有混凝土副坝与溢流堰连接，全长 636 米，高 28 米至 46 米，右岸坝肩为黄土副坝。这是中国建成的第一座拦河高坝。

这个拦河大坝的建成，使黄河干流和支流洮河、大夏河河水汇积坝内，形成黄河上游龙羊峡至青铜峡段梯级规划当中的第七个梯级水库，连接了甘肃省的永靖、临洮、东乡、临夏、积石山县和青海的民和等县，全长为 65 公里，面积为 130 多平方公里。

刘家峡总库容达 57 亿立方米，死库容 15.5 亿立方米，有效库容 41.5 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 11.2 亿立方米。共控制流域面积 18 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黄河全流域面积的 1/4。

多年来，这里平均径流量 270 多亿立方米，相当于黄河人海量的 63% 左右；平均输沙量 8 900 万吨，是黄河全河年输沙量的十八分之一；年平均含沙量为每立方米 3.12 公斤，最大含沙量为每立方米 360 公斤。每年 7 月、8 月、9 月三个月间，径流量占全年流量的 70% 以上，输沙量占全年输沙量的 90% 左右。

刘家峡水电站的设计，充分考虑到黄河水量集中、含沙量大的特点。泄水排沙建筑物有左岸泄水道、右岸溢洪道和坝底泄洪道、排沙洞；泄水建筑物标准按千年一遇洪水设计，万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在正常水位 1735 米时，总泄量为 800 多立方米每秒。

刘家峡水电站的厂房建在坝后，因河床狭窄，厂房一半枕在主河道上，称之为坝后厂房，另一半则伸进大山腹中，称之为地下厂房。主厂房长 170 米，宽 25 米左右，高 50 多米，五台立式水轮发电机组在这里一字排列。

其中，一台 26 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是中国第一台单机容量最大的双水内冷式水轮发电机组，像一座直径近 13 米、有七层楼高的大圆形宝塔，总重量达 2 000 多吨。五台发电机组总发电能力为 122.5 万千瓦，年均发电量为 57 亿千瓦小时。全站一年的发电量比 1949 年前夕中国全年的发电量还要多。

强大的电力由三个开关站经四条 220 千伏、1 条 330 千伏的超高压输电

线路送往兰州、天水、青海、西宁和陕西关中等地，把陕西、甘肃、青海三省的电网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东至关中平原，西达青海高原，南到甘南草地，北临腾格里沙漠的方圆几千公里的大电网。

廉价的电力和丰富的水库储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西北地区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如青海 1973 年工业总产值，比送电前的 1969 年增长一倍以上；甘肃在送电后几年的年工业总产值也大幅度增长。

刘家峡水电站的建成，使干旱地区的提灌工程不断扩大，改变了以往"山下黄河滚滚流，山上吃水贵如油"的历史，使 1 580 多万亩灌溉用水保证率由 65% 提高到 85%。即使是在枯水期也能得到及时灌溉；水库控制下泄流量，使下游的兰州、包头等工业基地及人民生命财产免遭特大洪水的侵袭，同时还减除了宁夏、内蒙古约 700 公里河段在解冻时期冰凌的危害；刘家峡水库面积广阔，湖水平稳澄清，水面温度提高，除终年可以通航外，还是发展养殖业的良好场所，多年来，已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

刘家峡水电站自 1955 年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建站决议，至 1978 年收尾工程结束，前后历时 23 年，无数的工程技术人员为之献出了心血。

据统计，电站的整个枢纽工程建设，共开挖土石方 1 895 万立方米，其中暗挖石方 68 万立方米；使用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 182 万立方米；安装机电设备 21 687 吨；安装金属结构 9 606 吨；总投资 6. 38 亿元，平均每千瓦投资 550 亿元，取得了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的优良成果。

刘家峡水电站的建设与投产，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征服黄河灾害，开发和利用黄河水力资源的事业中又迈出了前进的步伐，也为中国建设大型水电站积累了可贵的经验。

与刘家峡水电站一样，1990 年，葛洲坝工程的胜利竣工也是中国经济建设当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据史书记载，葛洲坝于 6000 年前就形成了。葛洲坝是一座古城旧址，地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多个世纪战火频繁。秦将白起火烧彝陵之战、三国吴蜀彝陵之战，均在此附近进行。频繁的兵事使葛洲古城化为灰烬。1971 年至 1974 年间，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上马——中国水利史上又一壮观的会战在此拉开了帷幕。

周恩来曾经提出："葛洲坝工程方案要放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提纲中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在目前条件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

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

周恩来还提出过：“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济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

1970 年 12 月 30 日，身穿军装的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匆匆赶到工地，将毛泽东的“赞成兴修此坝”的“最新”和“最高”指示对数万名军人和民工宣读了。张体学宣布：尚未作完设计的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测、边设计”的“三边”方针，即日起破土动工。

于是，中国第一大江上的第一大坝——葛洲坝工程，仅依据一个规划性的文件，就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关于葛洲坝工程的上马，毛泽东的批示共 52 个字，全文内容是：“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毛泽东的批示是有预见性的，葛洲坝工程刚一上马，就遇到了困难。

1972 年 4 月，时任指挥部党委常委、副指挥长的林一山和当时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人员断定，上马的葛洲坝工程要失败，因为整体规划中还有几个关键性的重大技术问题没有解决。

首先，长江从南津关出峡之后，以 90 度的角度陡然向南急转，河宽由原来的 300 米陡然展至 2 100 米，河床由海平面以下 40 米陡然上升为海拔 30 米，水流呈现出泡水、漩涡、剪刀水等各种极其复杂的流态。同时，长江每年要下泄五亿多吨泥沙。对于工程如何顺应河势，开出两条人工航道保证通航，而且航道又不被泥沙淤积的问题，种种模型试验都达不到要求。

其次，葛洲坝大坝基础是建在粘土岩和砂岩夹层上的，含有粘土岩软弱夹层 54 层，其中部分已经泥化。大坝建在这样的地基上，没有任何依据可以保证大坝建成后泥化夹层不会恶化，坝体不会滑移。

再次，如果先建三峡工程拦截洪水，葛洲坝只需抗一到两万立方米的水头，而先建葛洲坝，使其一下子升至要独立抗每秒 11 万立方米的水头。大坝建筑物如何合理安置，才能防止洪水冲击，在这时没有成形的设计。

葛洲坝工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了国务院，周恩来非常着急。1972 年 4 月，周恩来在机场送走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后，对钱正英说，葛洲坝是他的“一块心病”。

1972 年 10 月，长江干道又发生了碍航事件，交通部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反映情况。11 月，国务院决定紧急召开葛洲坝工程汇报会，一连开了 3 次，都由周恩来亲自主持。

至此，葛洲坝上马约有两年，已开挖土方 314 万立方米；石方 166 万立方米；浇注混凝土 10.52 万立方米，其中因质量事故及修改设计炸除 1.62 万立方米，实为 8.9 万立方米。设计还没有搞出来，费用已达 2 亿元。

1978 年，是葛洲坝工程施工的关键年。李先念和时任副总理的谷牧，以及交通部、一机部、水电部负责人，时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的陈丕显等，于 1 月 6 日至 9 日到工地视察。在视察过程中，李先念明确提出，葛洲坝工程第一要保航运，第二要保质量。

1978 年 9 月 30 日，李先念指出：葛洲坝这样大的工程，在我国水电建设史上还是第一个，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质量第一。这是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广大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党委领导下，作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实在令人高兴。工程质量，务必做到一丝不苟，持之以恒，千万不能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因为这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马虎不得，如稍有疏忽，必后患无穷。

1978 年 10 月，工程局开展了第一个“质量月”活动。由于质量问题抓得及时、抓得狠，为日后大江工程获国家优质奖提供了保障。

1989 年 7 月 21 日至 24 日，时任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湖北视察期间，看望了葛洲坝工程局、葛洲坝电厂和船闸的干部职工。江泽民说，水利工程施工相当艰苦，党和人民决不会忘记葛洲坝工程建设者们的艰苦劳动。发展经济，首先要开发能源。希望葛洲坝电厂的广大职工发扬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为国家多发电，多做贡献。

1990 年，葛洲坝工程胜利竣工。历史为葛洲坝工程留下了雄姿，这是党的正确决策和人民的聪明才智凝聚而成的丰碑，是中华民族在实现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又一丰硕成果。葛洲坝工程为人民造福，为后代铺路。

从红旗渠到葛洲坝，几十年来，这些水利工程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水利工程的创建，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及为人类服务为前提，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开创了中华水利史上的新纪元，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华水利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这些大型的水利工程的建成，不仅是中国水利工程技术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璀璨明珠。这是中华儿女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国水利史上的杰作。

科技战线所取得的辉煌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落后地位，“中国必须永远摆脱几代人以来受强国的任意宰割的命运”，这一直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一个坚定信念。中国要有自己的核武器，也要有自己的高科技成果。

早在中苏双方的核危机发生之前，两国领导人曾围绕核武器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长期争论。争论内容包括：原子弹是不是纸老虎；中国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中国是否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谈判；中国是否应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等等。但是，中苏双方并未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

1945 年，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令世界为之一震的论断。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然而，毛泽东对于核武器和美国能力的看法，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大相径庭。用苏联领导人的观点来看，美国不可能是“纸老虎”，而是“事实上非常危险的食肉动物”。

1954 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向赫鲁晓夫大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表示了他对美国核威胁的轻蔑。这使赫鲁晓夫非常吃惊。赫鲁晓夫进行的反驳是：“一两枚导弹就能使所有的中国部队化为灰土。”

在与毛泽东发生争执的几个月后，赫鲁晓夫便暗示时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说，中国也许会成为一个“令西方担忧的问题”。后来有人说，在北京的对原子弹认识的争论是中苏分裂的先声。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中苏在核武器、核战争问题上的分歧，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深刻而难以调和的。

1955 年 1 月，即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如下藐视美国的言论：“美国无法用它的一小颗原子弹消灭整个中华民族。”即使

美国的原子弹拥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当它落到中国的时候只能把地球打穿个洞、甚至把它炸烂。这对于太阳系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对于整个宇宙而言，没有任何的意义。

对于是依靠苏联的核保护伞，还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中国党和国家领导层曾有过不同意见。

在中苏关系还是“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的时候，不仅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使中国外交跟着它的指挥棒转，而且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有人曾经产生过这样一种天真的想法：将来如果爆发战争，中国应该出军队，而苏联出原子弹。

然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考虑要深远得多。毛泽东指出，苏联的核保护伞，同时又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利剑”。中国不能依靠别国的核保护伞，而必须发展自己的核武器。毛泽东对于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他不仅亲自鼓励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而且告诉外国来宾，哪怕勒紧裤腰带，中国也一定要造出原子弹来。

中国决定发展核武器，并不是取决于国家安全受到的直接威胁，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基本利益，取决于打破别国“核垄断”的理性需求。实践证明，中国发展核武器这一战略是极为成功的。

1957 年，中国首次受到战术核武器的威胁。这时，美国在台湾部署了“斗牛士”导弹，同时也向韩国派遣了装备有核武器的部队。1958 年夏末，台湾海峡爆发危机时，美国向金门提供了能发射核弹头的八英寸榴弹炮。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当中美开始改善长达 20 多年的对峙关系时，苏联又开始在蒙古部署战术核武器。

1958 年，毛泽东在谈到核武器对中国的潜在意义时，对高级干部说，没有原子弹和氢弹，其他人不会认为中国人说话有分量。中国对原子弹的迫切需要，在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经过艰难探索和试验，中国终于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下午 3 点，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又在新疆罗布泊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获得百万吨级梯恩梯当量的核聚变能量。

中国对核武器的观点和做法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和广大人民利益着眼的。首先，中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是用来称霸，而是用来反对核讹诈和核战争。同时，中国坚决反对两三个国家任意挥舞自己的核武器，以世界宪兵自居，在世界上发号施令，而绝大多数国家则被要求软弱地遵守

条约，完全成了核奴隶。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和在此指导下的中国的实际行动，正好触到了霸权主义的痛处。

1964 年 1 月，中央专委根据氢弹研制工作的进展情况，要求继原子弹炸响后，在三五计划期间争取解决氢弹的“有无”问题。

毛泽东在 1964 年 5 月和 1965 年 1 月两次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曾两次谈到核武器发展问题，明确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根据上述要求，周恩来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立即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二机部经反复研究后，于 1965 年 2 月向中央专委呈报了《关于加快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一方面要抓紧原子弹武器化工作，装备部队；另一方面要尽快突破氢弹技术，向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阶段发展。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审议并在原则上同意了二机部的规划安排。

1965 年 8 月，中央专委又批准了二机部《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决定在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研究的同时，进行若干次核试验，争取在 1966 年 6 月进行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子逐步突破氢弹技术。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做事要先抓龙头。二机部是核事业的龙头，该院又是搞核武器的龙头，而设计部又是该院的龙头。要研制氢弹，首先要突破理论设计上的难关才行。因此，科研工作者首先把重点放在该院的理论设计部，也就是邓稼先、于敏那里。他们形象地把这个想法、做法称为“龙头三次方”。

首先从哪里抓起的问题解决了，科研人员接着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考虑要研制出一个什么样的氢弹。在开始着手研究氢弹时，二机部的党组就提出了“两手准备，保证低水平，争取高水平”的方针。

这时，理论设计部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搞低水平的，再搞高水平的；另一种是，一开始就瞄准高水平。如果先搞低水平的，那是一定可以做出来的，但是不能上导弹的弹头。

经过反复的研究，科研工作者们一致认为，低的方案虽然成功率较高，但不仅不能装上导弹头，形成真正的威慑力量；而且由于高低方案之间无内在联系，实现了低的方案后，还是需要从头再去攻高的方案，这样既延误时

间，又浪费人力、物力、财力。这样低的方案实际上是无意义的。高的方案虽然需要花点时间去探索，但它是外国人已经实践成功了的东西，不存在什么还没有突破的科学技术问题，只是中国的科学家还没有掌握罢了。专家们坚信，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出来。

当时，中国有中国科学院自制的两台 10 万次的计算机，一台在北京，一台在上海。上海的那台中国科学院华东计算机研究所的 J—501 计算机运行比较稳定，用户比较少，可以提供较多的计算时间。后来，理论部的专家说，在西方搞氢弹的时候，还没有这样高水平的计算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氢弹搞得快的一个原因。

专家们兵分两路，由于敏带了部分专家到上海，其他的专家在北京。这样，北京、上海两地同时攻关，通过专用的保密电话，互相交流信息，共同探讨技术上的难题。

开始提出的两个设想，在上计算机计算之后都被否定了。随后，北京、上海两组科研人员都酝酿着新的设想。于敏等专家在上海领先了一步。他们按照新的设想提出了具体的方案。邓稼先也到了上海。他们在计算机上进行了大量的计算机数值模拟结果的理论分析，经过近三个月的持续努力，终于找到了造成自然热核反应条件的关键所在，探索到了氢弹及其爆炸的原理。

1966 年 5 月 9 日，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获得成功，给氢弹理论研究提供了实测数据。周恩来称赞这一成绩是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的三结合，是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

1967 年 5 月，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5 月 9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议，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聂荣臻也参加了这次专委会议。

周恩来在会上要求说：“对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安全，保证试验成功；要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

氢弹空爆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比预订计划提前完成。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等于 6 月 12 日在中央专委会上听取了罗舜初的关于氢弹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的汇报。

周恩来在会上说：“不要犯经验主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在十三日综合预演后对氢弹总装再一次认真地做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

经过有关专家的反复研究，中央专委确定1967年6月17日为氢弹试验的零日。周恩来指定聂荣臻亲赴现场指挥这次试验。

6月17日，天气晴朗。驾驶726号轰——6型飞机的徐克江机组，携带着中国的第一枚氢弹起飞了。

1967年6月17日8点20分，氢弹降落到了预定的高度，在空中起爆了。随着刺眼的闪光和雷霆般的轰鸣，氢弹爆炸后出现的巨大火球发出耀眼的光芒。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了。指挥部有的帐篷被吹倒了，这是氢弹光辐射和冲击波的威力。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更要壮观美丽得多的伞状烟云，慢慢上升、扩大，逐渐由红色变成白色。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就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跳到了爆炸能够装上导弹头的氢弹，不但赶在法国前面爆炸了氢弹，而且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所用时间最短、水平提高最快、试验次数最少的国家，使中国的热核爆炸试验一起步就比美国起步时高一头，再一次迈出了迎头赶上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中央以尽可能少的试验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的要求。

中国比原计划提前突破原子弹、氢弹技术的事实，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预言。

三年后，正当中国人民豪迈地跨进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正当中国人民欢庆中共九大胜利召开一周年的时候，从祖国首都北京又传出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我们也可搞人造卫星”的号召。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中国的卫星研制工作即在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张劲夫、竺可桢、裴丽生和科学家钱学森、赵九章等的组织领导下展开。科研人员在人造地球卫星的理论探索、预先研究以及探空火箭研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开展卫星工程研制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一颗卫星一开始就被提议命名为“东方红1号”。卫星的外形被定为一米直径的近球形多面体，是为了根据其轨道变化较精确地推算高层大气密度，同时便于贴布太阳能电池并使其在任何姿态下输出较为均匀。这个三图一表得到了周恩来、张劲夫、罗舜初等有关领导的一致赞同。

“东方红1号”的方案，经过近半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到1965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方案论证会。论证会对涉及到“东方红1号”大总体和卫星本体的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而广泛的探讨。论证会最后确定的目标是“东方红1号”一定要在1970年发射；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东方红1号”的命名、结构外形、主要指标等在论证会上都得到了肯定。

1969年7月，火箭试车因受派性影响，秩序混乱，难以进行。周恩来得悉后，于7月17日到8月9日间连续四次召集七机部有关人员，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尖端工作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并确定组成指挥部，加强领导，从而使这次试车得以进行，并取得成功。

1969年末进行的第三级固体火箭与卫星对接试车和1970年1月进行的一二两级火箭飞行试验，也均获得了圆满成功。

1970年3月5日到3月21日，科研人员完成了两颗发射卫星的总装和质量全面复查。4月1日，两颗“东方红1号”卫星和一枚“长征1号”运载火箭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4月8日，星、箭对接。4月10日，科研人员完成总体测试，卫星和运载火箭矗立在发射架上。离发射架约100米处的地下设有控制室。4月19日，科研人员在对卫星进行综合测试中，又及时发现和排除了卫星上超短波信标机的主载波功率下降、谐波功率增大，将影响地面站跟踪的故障。

4月20日，周恩来再次强调这次卫星发射要做到完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4月24日凌晨，毛泽东批准实施发射。

1970年4月24日，气象部门报告：晚上8点到9点是最佳的发射“窗口”。指挥部决定把发射时间定在晚上9点30分左右。

4月24日下午3点50分，周恩来打电话给罗舜初说，毛泽东已经批准了这次发射，希望大家鼓足干劲，细致地做好一切工作，要争取一次发射成功。

当晚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火箭在震耳的隆隆声中离开发射架。9点48分，地面卫星观测站报告：“星箭分离，卫星入轨”。9点50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播送《东方红》乐曲，清晰洪亮，传遍全球。

当天晚上，周恩来由北京飞往广州，参加由越南、越南南方、老挝、柬

埔寨领导人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庆祝这次会议的成功，并宣布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消息。

4月25日，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轨道，近地点439公里，远地点2 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 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东方红1号”的发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同国外初期的卫星相比，中国第一颗卫星在技术方案、技术指标方面都是先进的。在卫星的跟踪手段、信号传递形式、星体温度控制等方面都超过了其他国家第一颗卫星的水平。“东方红1号”的重量远远超过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的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上天以后，西方舆论哗然，美国报纸认为中国已拥有了原子弹和氢弹，因此，必须把中国的这次卫星的成功发射看成是宣布能把核武器发射到地球上任何地方去的公告。法国报纸认为中国卫星上天，对苏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些西方报纸还认为，尽管中国卫星上天对世界的最大影响将是心理和政治方面，但鉴于中国是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其军事意义也是明显的。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除了以上科学技术成就以外，中国在其他科技领域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

1973年8月，从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传出一个令人喜悦的消息，由这几个单位联合研制的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这是当代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成果，是中国电子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中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1958年至1959年，科技工作者相继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小型电子管计算机103机，及大型电子管计算机104机，此为第一代机。1965年，中国自行研制了运算速度为每秒五万次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此为第二代机。

20世纪70年代初，上海计算技术研究所、复旦大学及上海长宁拉手厂等单位共同协作，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每秒

钟可运算11万次。它结构简单、体积小，与同速度的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相比较，更适用于工农业、科研等部门对多类数据的运算。此为第三代机，表明中国计算机工业有了较大进步。

1973年，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这是由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设计制造成功的。至1973年8月26日，经3 000多小时的试算运转，证明其性能稳定，质量良好、主机的解题能力、外部设备和管理、语言编译及符号汇编三套程序等各主要目标，均已达到设计要求。

这台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字长48位，内部储存容量13万字，加上磁带机、磁盘机、打字机、作孔机和输出、输入机等，共有九种22台外部设备。试算运转过程中，操作人员仅用十几秒钟就可准确地运算出一个200阶的代数方程组。而这如果用人工运算，则至少需100人计算一年。操作人员还用这台计算机进行了复杂的工程设计、天气预报、处理地震资料等几十个题目的运算，均取得良好效果。其中一些题目，是中小型计算机难以完成的，而用这台大型电子计算机，则可较快地运算出来。

这台电子计算机的试制成功，标志中国的电子计算机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大肆干扰和破坏，由于坚持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了几起几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在此期间，国内在基本建设、工业交通、科学技术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就。如1972年，中国配置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比一般稻种增产20%；科学家们还成功地利用X光衍射法完成了分辨率为2.5埃的猪胰岛素晶体结构的测定工作。这是中国继首先在世界上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以后，在蛋白质研究工作当中取得的又一科研成果。

我国科技战线上取得的这一系列高科技成果，为我国的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不仅使中国更能在世界大国中站稳脚跟，也为取得更高一级的科技成果创造了好的开端。

周恩来悉心指导核工业建设

中国的核工业是在受到帝国主义的核威胁的背景下，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体现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维护世界和平。中共中央、毛泽东决策，在周恩来总的组织领导下，由贺龙、聂荣臻、张爱萍、刘西尧、刘杰等负责，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具体负责实施的。从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核工业开始，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国核工业以及核试验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1964年1月14日，我国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为原子弹的完成提供了关键条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弹爆轰试验取得圆满成功。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5月14日，我国第二次原子弹爆准确实现了空爆，达到预定目标。两次试验的成功为我国研制导弹核武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央决定，将“两弹”结合，进行一次弹道式导弹核武器全程发射试验。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各行各业的发展陷入混乱状态，绝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但是在周恩来的特殊保护下，我国的核工业成为受干扰最小的行业部门。仅从1967年3月至11月间，他和毛泽东等先后签发了22封电报，指示“不准夺权”、“不准串联”、“停止四大”、“制止武斗”、“坚持生产”等，对核科学家采取保护措施。

正是有了以上的保障措施，文革十年间，最令人瞩目的是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自1964年我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成功后，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共成功进行了16次核爆炸试验，还有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次运载火箭发射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地球卫星成功等，可以说成果一颗接一颗，捷报一个接一个，勇往直前，直上云天。十几年的时间就突破了历史上的“八个第一”，成功发射了八颗人造卫星等。使

中国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核武和航天大国。

在文革前夕，周恩来十分关心核工业和核试验，在1966年3月11日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后，周恩来又在4、5月间，连续三次主持召开专委会会议，研究进行热核试验等问题。终于抢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前，在5月9日，成功进行了一次热核试验，即通常所说的第三次核试验。

1966年5月进行的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前夕，周恩来对试验工作作了“要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指示。他不仅这样要求，而且身体力行。试验前，他总要等待现场指挥部报告了专家、操作人员和主管部门领导三结合的研究结果后，仔细询问可能影响成败的各个关键环节，认真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才决定是否试验。他还要求各主管部门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要考虑到，并要求拿出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不仅要求核试验本身万无一失，而且要求核试验的放射性烟云，不仅对我国人民不要造成损害，也不应对邻国人民造成损害。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情要精打细算，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负担。”“我们搞有限的核试验，不要像美国、苏联那样，搞一二百次试验。”试验中，要求把各种测量、效应试验都收到应有效果，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总理就紧紧抓住核工业不放。据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回忆说：“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亲自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视察工作。同年9月，当我国核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时，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实验工作的许多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弹道、爆点、安全自毁装置等，并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直到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对‘两弹’结合的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冷’试验和‘热’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进行了证实后，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5月9日，周恩来在第18次专委会上，全面审查了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决定：试验准备的期限提前到6月20日。6月12日，周恩来等再次听取关于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他反复强调试验安全问题，委派聂荣臻赴现场指挥，场外工作由他、李富春等直接领导。

文革时期周恩来既要表态支持“文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少受干扰，其把握难易程度，不言自知。9月25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宣布：“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

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还是要团结。”

10月8日，周恩来又明确提出，对核试验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并于10月8日、20日，两次主持中央专委会议，专门讨论“两弹结合”试验，并强调一定不能出乱子。”

10月24日，经毛泽东和周恩来批准实施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10月25日，聂荣臻元帅受中央委托，亲临发射场主持“两弹结合”发射试验。

10月27日，装备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准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诞生，美国用了13年，而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只用了两年。西方报刊惊呼：“中国这种闪电般的进步，是神话般地不可思议。”这时，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不给造反派留可乘之机。”

1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出了要研制人造卫星的设想。同时，为使核武器系列化，周恩来还提出，1968年要把“东风3号”搞出来，“东风4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1964年至1968年）解决。并同意在当年12月底或次年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1967年，局势更加混乱，夺权风也刮到了国防科技领域。周恩来为了保护中央专委和国防科技骨干，想方设法阻止“造反派”夺权，而“造反派”却打着“革命”旗号恣意妄为。

针对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一事，他气愤地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又说，“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周恩来还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指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

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那样的局面下，能发出批评夺权派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周恩来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央专委委员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

张爱萍曾回忆：“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救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

为防止“造反派”的夺权行为干扰尖端武器研制，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在国防工业等相关系统实行军管。

1967 年的 5 月，在周恩来的倾心维护下，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5 月 9 日，周恩来主持第十八次专委会，要求 6 月 20 日之前做好氢弹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 6 月 1 日～10 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

6 月初，正在准备氢弹试验的关键时刻，七机部一个名为“九一六”的“造反派”组织居然占据了国防部大楼。由此可见，尽管三令五申，国防工业系统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6 月 3 日，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九一六”派：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当晚 10 时至次日凌晨 4 时，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搞“万炮齐轰聂荣臻”是错误的，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可以，但不能揪斗，必须给他们足够时间去工作。现在，中央有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往后推迟。不要搞疲劳战，以免造成事故。周恩来的讲话，使“造反派”多少有些收敛。

1967 年 6 月 12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小会，研究氢弹试验的时间等问题。为加强领导且保护聂荣臻，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要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聂荣臻心领神会地回答：“义不容辞！”

1967 年 6 月 12 日，周恩来听取了关于氢弹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告诫参试人员，要切实搞好人民群众的安全转移工作，落实一旦发生意外情况下的安全措施。周恩来对此仍不放心，委托聂荣臻亲赴现场领导这次试验。6

月17日8点20分，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科技工作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抢在法国之前的誓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继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在核工业领域取得的又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

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爆炸，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则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两个发展阶段质的跨越。。正是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成功率最高，耗资也是最少的。导弹和原子弹相继诞生后，“两弹”的结合已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

导弹和原子弹相继诞生后，“两弹”的结合已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为了打破核垄断，我国在研制原子的同时，就把下一步的目标瞄准导弹核武器。1964年6月至7月，我国连续发射三枚中近程运载火箭成功。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视察。他一下飞机，就详细询问基地的情况。接着，他来到发射阵地，观看了火箭发射合练，检查了导弹核武器试验的准备情况。同年9月，当我国核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周恩来又亲自过问试验工作的许多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弹道、爆点、安全自毁装置等，并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直到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进行了“两弹”结合的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冷”试验和“热”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证实后，周恩来才放下心来。10月20日，“两弹”结合试验前，周恩来在与二机部、七机部负责人以及一部分科学家开会时，激动地说：“核爆炸成功后，有人嘲笑我们有弹无枪，无非是说我们光有原子弹，没有运载工具。我们要用导弹把原子弹打出去，用行动来回答舆论的挑战!”10月26日，“两弹”结合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完毕，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实施要求。27日上午，“两弹”结合试验成功。

1968年12月11日、1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14日，他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这才有了12月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热核试验的成功。

1967年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同样殃及航天火箭和核工业。许多工厂和科研机构也先后发生了武斗、夺权，有的工厂、院、所的安全和生产一度

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周恩来极为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只要他得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不管是白天、夜晚，不管他正在干什么，他都要亲自过问。不是直接打电话，就是约见肇事的造反派头子，当面谈话，或以他的名义发电报，制止动乱。他反复告诫他们："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并规定不准串连，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他还多次派调查组到原子能联合企业、核武器生产基地，代表他解决纠纷，制止武斗，维护生产。1967 年 5 月，中央决定对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下属的一些厂、矿、企业和科研院、所实行军管，自上而下成立军管会，负责管理，以缓冲动乱造成的破坏。

1967 年 7 月 13 日，核武器研制基地两派群众组织各集结队伍，手持棍棒长矛，对峙在办公楼前，事态一触即发。军管会报告周恩来，他立即发出五条指示，两派队伍即刻解散，防止了一次大规模的流血事件发生，维护了基地科研生产秩序。他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核武器和核燃料 4 个厂的群众组织代表，苦口婆心地作说服教育工作，要他们消除隔阂，搞好生产。

1967 年 12 月 10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针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周恩来下了命令："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在周恩来这样精心的指导和安排下，12 月 27 日，我国第七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到了 1968 年，派性斗争已是难以调和，国防工业受到的干扰越来越严重。

1968 年 4 月 20 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组成班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7月初，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诬蔑聂荣臻“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为保护聂荣臻，7月11日，周恩来在报告上策略地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1969年8月，林彪对核工业直接插手干预，借口所谓战备，要求核工业工厂向大三线搬迁搬迁就意味着中断生产，放射性物质一旦泄漏会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周恩来晓以利害，坚决顶住，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一线工厂不能搬迁，要连续生产，而且要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报经毛泽东批准，才避免了搬迁给核工业可能造成的损失。而更值得追忆的是，“文革”期间，他对奋力为发展我国尖端事业的科学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极尽其保护的责任。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严肃提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曾说过：“‘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在这段极其艰难的时间里，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了2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对我国国防尖端各个领域的发展，做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性的指示和部署。

在我国中远程火箭的技术攻关取得新进展后，1965年，钱学森等上书党中央，希望早日把人造卫星列入国家任务。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采纳了钱学森的建议，并把我国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卫星本体的研制，地面跟踪系统设备的研制，以及发射试验场地的建设等要齐头并进。为此，周恩来以中央专委的名义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上下通力合作，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人给人，全力以赴研制卫星。1970年4月24日晚9时35分，我国第一颗卫星徐徐升空入轨。周恩来听到卫星入轨的报告后，高兴地说：“准备庆贺！”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了这一喜讯。而毛泽东在书房里已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从卫星上发来的清晰洪亮的《东方红》乐曲！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后来，他又指示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就在筹建核电站的同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准备工作也进入紧张阶段。

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试验下水。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又利用有利时机，重新启用了一批干部和科学家。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文革”的干扰，尖端武器试验确实出现了一些事故。对此，周恩来并没有责怪参试人员。他一方面指示暂停试验，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再继续试验。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医生确诊患有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多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1974年4月12日，是周恩来生前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议。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批准了上海728工程（是以周恩来1970年2月8日首次提出要搞核电站的时间命名的，也就是今天已投入运转的秦山核电站）的建设方案。也许他已预感到自己参加中央专委会的机会不多了，在这次会议上，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大的病痛主持会议，并作了长篇讲话。对我国尖端事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他一再告诫：“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关心的不仅是核武器，他的目光更远大，已经考虑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用核能来解决电能不足的问题，造福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他指出：“建设核电站要绝对安全可靠。”“有关部门要选派好的设计人员支援上海，通过这个工程，锻炼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二机部、七机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要总结经验，要有专人抓这件事。”叮嘱在南方选址“要注意防潮、防腐蚀、防风化。”他十分关心对三废（指废渣、废液、废气）的处理，详细询问了各种处理方案，并一一作了指示。他还一再告诫与会同志：“要想到21、22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与会人员眼含热泪记下了他最后的嘱托。

我国的军事工业和国防尖端事业，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霸权主义卡我们的情况下，没有被窒息瘫痪，在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没有被中断，反而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并为大规模发展尖端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是和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决策以及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我国在发展国防尖端科学和改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

成就，大大增强了国防实力，从而保障了几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使我国在国际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后，周恩来被病魔摧残，住进了医院。令他欣慰的是，中国在 1975 年 11 月 26 日，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逝世，留下了他未尽的事业，以及他对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永久牵挂。

在“文革”乱局中，周恩来呕心沥血、辛勤操劳换来了核工业的累累成果。从“两弹一艇”（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到核能和平利用，中国已建成独立完整的核科技工业体系，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完整核科技工业体系的国家之一。

“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独立、自主、和平的外交方针，同愈来愈多的国家发展友好关系。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建交，预示着帝国主义阵营孤立中国的阴谋破产。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也相应调整对外关系，即联合世界上所有反霸权力量，反对美国霸权主义与苏联的扩张主义。这一时期，整个国际格局和美苏争霸的战略势态发生了激烈的变化。美国的霸权地位日益动摇，苏联的军事实力迅速增长。美国尼克松上台后，积极推行“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三原则，调整全球战略和对外关系，并着手改善中美关系。

1971 年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启了中美建交之门。

1970 年，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中国是否派队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乒乓球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很大摧残，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中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三十一届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但世界舆论认为，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够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乒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乒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中国队也应该参加。

经过研究，军管会决定，向中共中央写报告，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批准派队参加这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3 月 15 日早上，毛泽东将批示传到国家体委。毛泽东除了批示照办外，还批道：“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此，中国队确定出征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即将奔赴日本比赛的前一天，即 3 月 16 日晚 9 点 30 分，周恩来接见了全体代表团的成员。

周恩来首先强调了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重要意义，同时对中

国队在参赛中的政治、技术情况及有利条件分析得一清二楚，他又再三强调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

赵正洪说：“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周总理的指示办，组织好参赛”，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广交朋友，提高警惕，保证安全，力争政治、技术双丰收，为国争光。“请总理并转告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

3 月 17 日，代表团乘飞机到广州，再由广州乘火车抵达香港。

为了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亲自安排代表团搭乘两架联邦德国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前往日本。

3 月 21 日，飞机准时从香港起飞。两个多小时后，飞机到达日本上空。中国代表团的队员们还未下飞机，日本方面几位负责接待的人就上来接他们。日本警察也登机了，对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赵正洪表示，要尽力保护代表团的安全。

在东京短暂停留后，代表团即移师名古屋。

代表团领导人根据周恩来此前的“友谊第一”的指示，开展了体育外交活动。在东京，赵正洪先后会见了中岛健藏、后藤钾二、西原寺公一等日本友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还参观了名古屋的大学和丰田汽车厂。每到一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都会受到日本人民的友好欢迎。

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中国代表团的生活、安全都花了很多的心血。名古屋电视台还请赵正洪和庄则栋由后藤钾二陪同到电视台，向日本人民讲话。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也参加了，气氛颇为热烈。

3 月 30 日，中国代表团代乒协主席宋中去会场外大厅喝咖啡的时候，发觉美国代表团的乒协主席斯廷霍文正好坐在对面。

出于礼貌，宋中也只好礼节性地点了点头。随后，斯廷霍文便和宋中聊起了乒乓球。后来，谈话慢慢就从乒乓球转到别的事上了。斯廷霍文说，在 3 月 15 日，即美国代表队到日本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宣布取消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限制，并声明说，这样做与总统在公开场合表示的同大陆改善交往的意愿是一致的。

宋中说：“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在北京会面。”

斯廷霍文笑了笑，表示同意宋中的说法。

在宋中、斯廷霍文两个人分别离开自己的座位时，突然，斯廷霍文问宋中，中国人不是挺和气的嘛，为什么宋中刚才那么凶。

宋中哈哈大笑起来。

这是在名古屋中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当天晚上9点多钟，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即向北京汇报说，美国代表与中国代表团接触，表示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友好，并说出了美方的潜在意思，即“美国乒乓球队想来华访问”。

在北京，名古屋来的报告每天被整理成简报。其中两份，一份送周恩来，一份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报告上指示说，与名古屋每天通话三次还不够，要增加到五次。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的结论是：“现在美国访华时机还不成熟。”

4月1日，美国国务院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基辛格仔细地看了备忘录。只见备忘录里重点提到了一句，北京已派出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几年来，中国参加这类体育比赛还是第一次。

基辛格在几天后才全面了解了这句话的重大意义。

4月2日，锦标赛组委会安排各国运动员去游览三重半岛海湾。在艇上，选手在随意的交谈中，美国青年笑着问中国队员：“听说你们已经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队去你们国家访问了，什么时候轮到我们？”

于是，中国代表团的信息又一次到了北京：“美国队想访华。”

4月4日，中国运动员准备提前乘车赶往爱知体育馆，当汽车就要发动时，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也上了车。原来，科恩因为练球耽误了时间，找不到自己队的车子了。看到一辆带有乒乓标志的大轿车开来，他就跨了上去。

当年参加比赛的中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回忆说，这位美国选手很自觉地站在车门口，也不动。汽车一直向前开，路上大约走了十几分钟，科恩就站了十几分钟，也不跟中国人说话。中国运动员也没有一个主动同他说话。

此时，坐在车的最后一排的庄则栋看到车子快到站了，而科恩很窘迫。庄则栋就站起来从挎包里拿出一块折叠好的东西递给科恩，并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这辆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

科恩打开一看，是一幅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是黄山风景图。

庄则栋曾经连续三届获得世界男子单打冠军。能够得到他的礼品，科恩

十分高兴。大轿车到达目的地，他们相拥着走下车。记者们拍下了这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

4月5日，日本新闻媒介争先恐后地报道了这条令世界瞩目的新闻。新华社编辑的《参考消息》也很快地转载了这条消息。当天，科恩在地铁站买了一件运动衣回赠给庄则栋，又拉着他一起拍照。中美关系的新动向，引起了各国更大的关注。

名古屋传到中国国内的消息，也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注意。虽然对于国家体委和外交部报送的那份认为美国运动员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的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批示同意。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对形势的新判断。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新的决定。

后来，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的情景，新闻工作者钱江回忆说，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已经放了几天。

对于这份报告，周恩来持非常慎重的态度。他在报告中加进了这样一段话：即可留下他们的通讯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

周恩来在文件末端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周恩来本人不作最后决定，没有把报告批下去，而是于4月4日将它呈送毛泽东。

这份报告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毛泽东看了报告后没有当即批示，但也没有让秘书把它拿走。

在此届乒乓球锦标赛中，中国队夺得了女子单打、双打、男女混合双打、男子团体比赛的冠军，而在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输给了日本队。

4月8日，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结束，各国代表团将纷纷离开名古屋回国。而毛泽东还在思考之中，周恩来不得不提醒毛泽东必须做出抉择。

关于毛泽东下决心时的情景，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清楚记得。吴旭君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在4月6日那天给我看了份文件，这是什么文件呢？这是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一份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阅了。我当时想，这么看来，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大局已定，因为大家的意见都一致。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因为我跟他相处久了，看得出来。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

就在4月6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药，他要提前睡觉。晚上11点多

了，他坐在这儿，当时那儿是床。他就坐在床边。我坐在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饭，就坐在他对面。他因为吃了大量的安眠药，困极了，他就脑袋这么低着，就在那儿这么低着睡，就是不肯躺。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哪，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他跟我交代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如果照他现在说的去办，那不就是错上加错了吗？我在提醒自己，这么大的事可不能轻举妄动。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再主动地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地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看着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吃呀？我叫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

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净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代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都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毛主席做了最新的决定。

4 月 7 日清晨，毛泽东电话通知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周恩来立即把黄华和章文晋找来，要他们安排有关人员研究接待方案，并且与名古屋取得联系。周恩来对黄华和章文晋说，毛泽东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最后，周恩来要黄华和章文晋放下手头的工作，全面负起责来，接待好这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4 月 7 日上午，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腾久观光旅馆的花园里举行游园会。此时的赵正洪接到了北京的电话记录，上面写着：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一事，考虑到该队已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在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到中国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等情况及时报回。

看完电话记录后，赵正洪马上派人把宋中叫回，让他马上去找美国乒乓

球队，向他们发出邀请。与此同时，赵正洪又派人去请日本文化交流协会的村岗久平，把邀请美国队访华一事迅速转告后藤钾二。由于事情突然，来不及事先和后藤钾二打招呼，赵正洪请村岗久平向后藤钾二转达歉意。

安排完毕，赵正洪即向外界宣布，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邀请美国队访华。

宋中看了电话记录后，马上就去找美国队的住处。10 时 30 分，美国乒协国际部主任哈里森走出饭店大门，遇见了中国代表团的宋中。

宋中对哈里森说："有事要对你和斯廷霍文谈。"

宋中与哈里森一同回到休息厅里。一坐下，宋中就直截了当地说，他代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发出邀请，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

哈里森平静下来后说，真没想到，但这是件好事。

哈里森表示非常感谢中国队的邀请。

当天晚上，美国队向国内请示。当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尼克松在深夜得知了中国方面对美国乒乓球队的邀请时，他立即发出指示，以加急电报通知美国驻日本大使迈耶，白宫的意见是，运动员务必去北京。对此，尼克松事后曾说，他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队访问北京的形式求得实现。

美国队就这样接受了邀请。

下午 3 时，哈里森把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人员聚到一起，问大家去不去中国。队员们激动地一直表示同意。但是他们将此行也看得很悲观，其中以年及 40 的博根的电话最为"悲壮"。他在电话中对他妻子说，万一他去中国发生了什么事，请他的夫人把他写下的未来得及发表的文稿收藏好，日后传给他的两个孩子。

在这期间，日本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报道了"乒乓外交"这一戏剧性的事件，并且都登在头版头条，叫做"小球推动了地球"。

美国队在忙乱之时，中国国内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接待工作的部署。

对于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具体安排，毛泽东、周恩来都了如指掌。

4 月 8 日，周恩来找到了《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明确告诉他们，美国乒乓球队就要来北京了，"这是毛主席亲自作出的决定"。周恩来还说，决定作出之后，"主席还催了我两次。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4 月 10 日，周恩来的秘书又给对外友协打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说美国乒乓球代表队到达中国之后，晚上要安排陪餐。

4 月 11 日，对于外国乒乓球代表队访华时的具体比赛安排，周恩来亲

自确定，乔冠华主持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吴德主持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郭沫若先后主持和加拿大队、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主持和美国队的比赛。

4月12日，周恩来又批阅了国家体委关于接待外国乒乓球队的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上批道："特急，送曹诚、吴晓达同志阅办，并送黄华、章文晋同志阅。"周恩来还批了一句："故宫可在12日开放参观。"

美国乒乓球队于4月10日经香港飞抵北京。

4月14日下午两点半，周恩来在亲自设计的具有椭圆形会场的人民大会堂接待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的乒乓球代表团。

周恩来对美国运动员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自此，中美关系开始得以改善。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中美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中、美两国的第一次正式交往。这场被毛泽东誉为"小球推动大球（指地球）"的乒乓外交，标志着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运动和夺权斗争，一度使中国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陷入停顿。直至“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动乱局势才相对地趋于缓和。这一时期，党和政府不仅逐步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外交纠纷，还缓和与修复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同非洲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关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陷入了对越作战的泥潭，实力大损，在与苏联争霸中失去其咄咄逼人的霸势；而“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又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而瓦解；另一方面，苏联又在全世界加紧了扩张不步伐，大有席卷亚、非、欧和囊括全球之势。

由于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派军舰侵入台湾海峡、带头侵略朝鲜和越南、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封锁等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在中国的街头随处可见。敌对和最低限度的接触成了新中国成立后20余年间中美关系的写照。

1969年1月20日，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宣誓正式就任美国第三十任总统。虽然他在竞选中曾说“一旦就任一定会在外交上搞大动作”但是，他的上台并没有使中美关系的紧张局面有丝毫松动。

2月19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就美国中央情报局将叛逃外交官廖和叔送往美国这一事件，对美国发表了强烈抗议声明，并决定取消原定在2月20日举行的第一百三十五次中美大使级会谈。

此时，美国侵越战争的规模不但没有因为美国新政府上台而缩小，反而呈现继续扩大的态势。美机、美舰仍不时侵人中国领空、领海。中国外交部照例对此提出严重警告。

中苏关系在这时也更加恶化。1969年3月2日晨，苏联国防军侵人中国领土珍宝岛，中苏边防人员发生激烈交火。同时，苏联国内的反华气氛甚

嚣尘上。10 万人冲砸了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馆。苏联还集结大量兵力于中苏边境。此时，中国国内的反苏备战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到处是一派“大备战”的火热气氛，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越南战火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形势中下，在国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新的对外战略，摒弃原来奉行的“反帝”又“反修”、两面开弓的外交路线，决定改善中美关系。

1969 年 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对国际形势做出了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估计。会后，毛泽东却重新启用了“二月逆流”以后一直靠边站的四位老帅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并交给他们两项特殊的任务，即在北京的四家工厂蹲点和共同研究国际形势。面对四位老帅的疑问，周恩来转了达毛泽东的意思，告诉叶剑英等四人不要被中共九大上的政治报告给框住。面对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但国际问题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而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都被打倒了。这次重新启用他们，并且没让他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就是为了他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专门考虑国际形势。最终，经商讨决定由陈毅归纳四人的讨论结果，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

为了能够利于研究工作，周恩派遣了擅长英文的熊向晖和了解外交内情的外交部现职工作人员，欧美司司长的姚广参加会议。

在这时，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办事组”对中国外交也起着作用。1969 年 6 月，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主持召开“军委办事组”座谈会，宣布了林彪“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判断和命令，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很显然，“军委办事组”认定，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

6 月 7 日下午，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熊向晖和姚广列席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苏修、美帝谁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战争是否真的就要到来了?”

至 7 月 10 日，老帅们经过 6 次共 19 小时的讨论，写出了第一份书面报告。7 月 17 日，由陈毅定稿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交给了周恩来。这份报告却提出了与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完全不同的判断。

四位老帅作出“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

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断。

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部分还说，中国早已森严壁垒，随时可以战胜任何来犯之敌，但推迟战争，对中国更有利。中国需要抓紧时间，加强各方面的准备。政治上主动进攻，军事上积极防御；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壮大陆海空军；同时，在国际上，扩大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

随后，四位老帅于7月29日~9月16日又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尼克松新政府对华战略的新动向和重新评估中苏战争的可能性。

9月17日，最终由陈毅定稿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交给了周恩来。

四位老帅在这次报告中再次做出了“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的判断。

鉴于苏联担心中美两国可能联合、而美国新政府又多次表示战略收缩和松动中美关系的意向，中国可以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矛盾“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用和苏联举行边境会谈、和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的战术行动，以获取在战略上的主动效果。

陈毅还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

至此，四位老帅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给予他们的历史使命。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建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深刻的思考。这无疑是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前奏曲。

而此时，尼克松出于对付苏联的战略考虑，急于拉拢中国。

在196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尼克松开始间接地透露新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政策意向。尼克松说，他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尼克松在“中国外交季刊”的文章中还意味深长地说，在经历了一个对抗的时期之后，人们正在进入一个谈判的时代。

尼克松首先启用了他的反对派人物主张缓和对华关系的基辛格。并在上任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交给基辛格一项任务：“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同年3月，尼克松访问法国，与时任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就中国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受了戴高乐对他缓和中美关系设想的鼓励。

4月22日，法国的艾蒂安·马纳克动身前往中国北京就任驻华大使。

艾蒂安·马纳克认为，华盛顿正在力求同北京开始真正的对话，美国准备承认中国并且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

半年之后，尼克松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时，在和时任罗马尼亚总统的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时候，很是直率地对齐奥塞斯库说，他想在他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请齐奥塞斯库从中斡旋，把他的信息传递给中国。尼克松还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把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国和苏联两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尼克松在拉合尔和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的叶海亚·汗会谈的时候又说，尽管有不少人反对他的观点，他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他还表示，美国和中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他想结束这种状况。当然，尼克松的这些话是绝密的。

在尼克松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在注视着这位新总统的举动。早在尼克松参加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周恩来就指示有关部门加强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尼克松上台后，中国的官方报纸在毛泽东的直接指示下转载了美国新总统的就职演说。

周恩来借毛泽东要求整顿外事队伍之机，又迅速指示外交部重组对美政策研究机构，指示外交部要认真研究尼克松7月25日在关岛发表的“新亚洲政策”的讲话，吃透尼克松所说的从亚洲进行“战略收缩”的真正含义，要尽快摸清美国的战略意图，做好可能与美国新政府打交道的准备。

尼克松在访问完菲律宾、印尼、南越、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回国后表示，1970年春天以前不再出国。这一宣称意味着尼克松不愿匆忙与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

1969年8月8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了演说。罗杰斯声称，中国终有一天会在亚洲和太平洋事务中起重要作用，这就是他们在一直寻求打开来往渠道的一个原因。

9月5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理查森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说，同中国共产党关系最终改善是符合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的。他们不想利用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敌对，收渔翁之利。但是，如果这一争吵升级到严重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程度，他们不能不感到深为关切。

就在美国发出的这些想与中国缓和关系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被送到中国的

时候。1969 年 9 月 3 日，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的胡志明逝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吊唁仪式上通过越南方面向中国总理周恩来传话，表达了他希望路过北京时在机场会晤周恩来的意向。

于是，9 月 11 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历时三个半小时的会晤。这是 1965 年 2 月至 1989 年中苏关系正常化之前 20 余年间两国政府首脑所进行的仅有的一次会晤，这次会晤使中苏之间的紧张气氛暂时有所缓解。

此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意识到应当加快同中国和解的步伐，以争得战略上的主动。但是，中美接触只有通过大使级会谈这个唯一的直接渠道，但此时会谈已中断两年之久。于是，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催促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设法秘密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官员，以便建立联系，尽快恢复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立即将此情况报告国内，此时，中国领导人又先后收到美国方面委托法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传递的信息。

1969 年 12 月 1 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被邀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做客。几天以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也应邀去了美国大使馆。

在这两次互访促成了 1970 年 1 月 20 日中美华沙谈判第 135 次会谈，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一步。西方的传播媒介马上予了以报道。

12 月 6 日，中国政府宣布释放两名因游艇误入中国海面已被拘捕数月的美国游客。还指示雷阳积极与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发生接触。

1970 年 1 月 20 日，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在波兰首都华沙重新开始。美方代表提出，美国政府准备派出代表去北京或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进行直接商谈。中方代表表示，中国方面愿意考虑和讨论美国政府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从而切实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两国的关系。两国间的会谈可以在大使级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2 月 18 日，尼克松在向全国提交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中国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要建立稳定的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在中美大使级第 136 次会谈中，中方代表也明确表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问题，

中国愿予以接待。

3月和4月间，美国对华的贸易限制进一步放宽。

但是，正当中美和解前途“柳暗花明”的时候，中国南部邻国柬埔寨在美国的直接插手下，发生了右派政变。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商定的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搁浅。毛泽东就此事发表了“5.20”声明。

声明中说，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在世界上非常孤立。中国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示威运动震动了全球。这个声明中还着重说：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泽东还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这则声明令尼克松十分震怒，然而基辛格解释说：“这篇文章既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又没有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表态。毛泽东这么做，是利用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来‘大肆宣扬’从而表示支持西哈努克。”这一场风波才算就过去了。

1970年6月，美军撤出柬埔寨，要求恢复中美之间的联系。这是美国再次向中国发出愿意打破僵局的一个信号。

7月10日，中国政府公安机关提前释放了于1968年10月被捕的美国间谍、天主教主教詹姆士·华理柱以作为回应。中美之间的秘密联络和试探又重新活跃起来。

9月，尼克松接见《时代》周刊记者时明确表示，如果他有生之年有什么事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他不能去，他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去。尼克松的这段话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注意。

在美国为中美关系做出积极努力的同时，中国也以另一种方式向美国做出了暗示。

毛泽东于10月1日请美国记者斯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拉着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

第二天，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

典礼上的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照片，无疑是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义的信息。但可惜的是，它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为此，基辛格在其回忆录里深表懊悔。

12 月 18 日，毛泽东又约斯诺与他单独会谈。在谈话中，毛泽东似乎是很随意地说他是不喜欢民主党的，他比较喜欢共和党。他欢迎尼克松上台。

看着斯诺费解的样子，毛泽东又说，中美会谈，15 年谈了 136 次。他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

毛泽东表示，他愿跟尼克松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接着，毛泽东在谈到尼克松时爽快地说：

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1971 年 4 月 30 日斯诺和毛泽东的谈话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发表在《生活》周刊上。文中引用了毛泽东的大部分原话。这在世界上引起了不小反响。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大国的报刊都用显著的位置和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或报道了与其相关的论述。

在中美关系的进展中，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70 年 10 月下旬，在联合国成立 25 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尼克松特意接见了叶海亚·汗和齐奥塞斯库两个人。在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尼克松十分明确地告诉他，美国希望对华关系实现正常化，希望叶海亚·汗作为中间人为中美关系的“解冻”做出一些努力。叶海亚·汗则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会把尼克松的愿望带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国宴的祝酒词中，第一次以一个美国政府要员的身份说出一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同年 11 月，叶海亚·汗到北京访问，将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并专门安排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具体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

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深入的

交谈。

12月30日，基辛格收到了一封由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传递的来自中方的信，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他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尼克松在复信中说，美国准备和中国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正当中美之间通过“罗马尼亚渠道”和“巴基斯坦渠道”频繁地传递口信，毛泽东明确表态愿意在北京接待尼克松之际，美国加强了在越南战场上的攻势。对此，中国方面严厉谴责了美国侵略印度支那三国的新罪行，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3月5日至8日访问越南。高度赞扬了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

1971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时却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个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去中国大陆旅行的一切限制都取消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球队应邀参加，再一次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创造了机会。

1971年7月9至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讨论了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问题，并就尼克松访华一事达成协议。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就《联合公报》与中方进行谈判。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历史性访问。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双方就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交换了意见，着重讨论了印支问题和台湾问题。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

1978年中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发表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大门就此打开。

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不仅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促进了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并带来了中国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

“波罗行动”

“波罗行动”是1971年7月基辛格美国秘密访华的行动代号。

1971年4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对美国报界发表改善中美关系的谈话一个星期后，尼克松收到了来自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口头带来的北京消息。

希拉里说，他的总统（叶海亚·汗）转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话，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通过两国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方能找到方法。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会晤。

对于中国的这一消息，尼克松和基辛格进行了“紧密策划”。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后来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到底派谁去北京？经过商量，尼克松决定让基辛格去中国。

在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希拉里进行了秘密的商谈过后，基辛格选择了通过巴基斯坦的通道进入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建议，这样的会议，最好在中国的国土上举行，地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但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

中国的消息照例是由希拉里送来的。一样的信笺，一样的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则消息是以周恩来的名义发来的。

5月2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分析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预拟了各种相应的对策。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给尼克松一个口信，表示欢迎基辛格来华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这个口信经毛泽东批准后，于5月29日通过巴基斯坦信使发往白宫。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关于中美会谈的五点方针，主要内容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6月2日，基辛格首先看到信的内容。其中提到，最好由基辛格在6月15日至20日之间选定一个到达中国的日期，他可以从伊斯兰堡直接飞往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至于飞行方面，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去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热烈地期待着最近的将来在中国会晤基辛格。

基辛格后来回忆，看到这个信息，他此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周恩来已经接受了建议，即每一方都可以提出它所最关心的问题，这就保证可以讨论最感兴趣的全球性的问题。

基辛格接到这封信后，急忙赶去通知尼克松。

待尼克松把中国的来信读完，基辛格说了一句话：“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为了初步的成功，尼克松总统与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把这次中国之行取代号叫“波罗行动”。

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白宫新闻秘书在例会上宣布，尼克松总统即将派基辛格博士于7月2日~5日到越南南方去执行调查事实的任务，随即到巴黎同戴维·布罗斯进行磋商。在基辛格赴巴黎途中，他将同泰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们举行会谈。

基辛格按照他的““波罗行动””开始了这次真真假假的旅行。他于7月1日离开华盛顿，在西贡活动了三天，在曼谷停留了一天，7月6日到达新德里，7月8日到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

一切都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基辛格这次试探性的访问，要绕道巴基斯坦，乘坐巴基斯坦航道的飞机悄悄进入北京。为了保证基辛格能在秘密条件下安全抵达中国，巴基斯坦和中国方面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巴航的波音707飞机于北京时间7月9日（星期五）中午12点15分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5号楼。

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中方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基辛格说，如果有适当

的机会，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恩来。

周恩来大方地说，他没有去过美国，他没有到过西半球，但他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基辛格在白天，他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

第一次见面，基辛格就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倾服了。基辛格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见时，记下了自己的感受。基辛格说："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服装，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

中美双方开始了会谈。在周恩来两旁坐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坐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基辛格说，尼克松给了他两个任务：一、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基辛格提到了五点看法：

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在台湾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而逐步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

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

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

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

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的时候，基辛格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度支那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基辛格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和基辛格主要是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内容，使会谈像两位教授之间进行的一场政治哲学对话一样。虽然两个人在思

想意识上是“敌人”，但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这很使基辛格吃惊；而谈话内容之深刻，更使基辛格觉得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伟人。

第一天的会谈在晚上 11 时 20 分结束，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甚至对于尼克松什么时间访华这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都没有讨论。双方在这天的会谈中都表现得好像若无其事，似乎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附带问题。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

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一些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有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在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呢？基辛格英文比中国人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中国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有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了自己。”

当周恩来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们来的。”

7 月 10 日会谈的气氛，与 9 日的第一轮很不相同。

在会谈时，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说，美国提出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远的且不说，现在东方的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中国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这样的历史就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中国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联手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是求同存异的大师。谈不来的地方先不谈。双方还交谈了其他的问题。最后，就安排尼克松访华的问题，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 1972 年夏天来华访问，并且表示尼克松访华之前先同苏联领导

人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尼克松夏天到北京，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取选票之嫌。

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却又提出很多条件，即美国总统出行，特别是到中国来，要有保安人员，要有各种新闻媒体记者，要有全球转播的电视技术人员等。

周恩来说，这些事情都好商谈。最主要的事情是研究联合公告的具体内容。然后，他们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的公告。

当晚，周恩来因要宴请金钟麟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让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去给毛泽东汇报。

当叶剑英等人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当叶剑英等人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但华沙是官僚机构，中国驻巴黎使馆也是官僚机构。美国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不能强迫人家，那就通过巴黎吧。

叶剑英最后汇报说双方正在谈到公报问题的时候，周恩来赶到了。

基辛格在来北京的途中就提出，他此次的中国之行很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在以后的会谈当中，基辛格又重提了几次。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并且商定同时发表尼克松访华之事。

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且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双方都比较主动。公告中也不写中国要见尼克松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汇报完后，周恩来还想留一会儿。毛泽东要他快去会见基辛格，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

晚上10点15分左右，周恩来见到基辛格的时候说：因为时间太晚，本来想不来了。后来听说你们还在等我，所以还是来了。这次我们只谈三件事：一、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确定第二天走的时间；

三、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谁主动提出来的；二、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尼克松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对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访华，中国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觉得尼克松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美国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尼克松要访华，中国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双方讨论后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访华时间，双方讨论后改为 5 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7 月 11 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修改后的公告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

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 5 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公告稿经过毛泽东同意之后，周恩来于 9 时 40 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进行商谈。

基辛格看过公告稿之后认为，公告稿内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基辛格并且在接受邀请前面加上“愉快地”一词。关于发表公告的时间问题，双方讨论以后确定采纳美国提出的 7 月 15 日。公告的原文是：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 7 月 9 日～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在起草公告工作完成以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以后联系的地方。双方赞同定在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国武官沃尔特斯与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

接着，周恩来又提议，有时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

老话，不能过河拆桥。

7月11日，刚吃完午饭，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在北京只呆了48小时，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虽然只停留了48小时，但却直接和清楚的表达了美国在越南问题，台湾问题，与中国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并且了解了中国最高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的态度，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好了准备。

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

1971 年 7 月 15 日晚 7 点半钟，在洛杉矶伯班克的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中，尼克松发表了一篇七分钟的简短演说。尼克松在读完访华公告后接着说：

预料公告发表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推测，我想尽可能讲明我们的政策背景。我们谋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关系的这一行动，决不会损害我们的老朋友的利益。这一行动不是针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我们谋求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任何国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而不同时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敌人。

我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我深信，缓和紧张局势以及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较好的关系，将对所有的国家有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将去中国一行——我深切希望这将成为争取和平的一次旅行，不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和平，而且也是为了我们共有的这个地球上的子孙后代的和平。谢谢大家，祝你们晚安。

7 月 16 日，中国方面也向全国播发了这个公告。

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基辛格于 1971 年 10 月 16 日，开始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基辛格此次来北京，一是为了妥善安排好尼克松访华时的一切准备工作，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事项，就是和中国方面讨论预先拟定在尼克松访华结束之后要发表的一个联合公报。

基辛格在 10 月 22 日的会谈中拿出了已拟成的草案让中方过目，提出修改意见。他强调，此公报草案尼克松已经批准了。

10 月 26 日早晨，中美双方把一些基本的原则问题谈清楚了。

为了给尼克松到中国出访做出细致的安排，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为首的先遣队于 1972 年 1 月 3 日抵达北京，为尼克松的安全问题、接待问题、记者采访问题同中国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同时，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对卫星电视转播方面提出了要求。周恩来拒绝了对方提出修建地方卫星站的建议，而是表明：齐格勒负责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为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至2月28日24时；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此项建议维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齐格勒向国内有关部门请示后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1972年2月21日11点27分，尼克松乘坐的“七六年精神号”专机抵达北京。

尼克松与周恩来紧紧地握着手。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尼克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多年后，当尼克松回忆这段往事时在自己所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说：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通过天安门广场来到尼克松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与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一一打过招呼。

尼克松后来在回忆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时这样写道：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七十三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

下午，毛泽东接见尼克松，尼克松对毛泽东说：“我知道多少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尼克松接着想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苏联等问题，毛泽东插话：“这些问题我不感兴趣，那是周恩来跟你谈的事。”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可是我们两家也怪得很，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拢，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有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

在结束会谈时，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他绝不说他做不到的事。他做的总要比他说的多。他要在这个基础上同毛泽东，同周恩来进行坦率的会谈。

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1972 年 2 月 21 日的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上，电视摄影机拍下了周恩来与尼克松满脸喜悦地用茅台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两国领导人发表情祝词。周恩来在祝酒中说道："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也在祝酒中说道："就在这个时刻，通过电讯的奇迹，看到和听到我们讲话的人民比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看到任何其他如此的场合的人民都要多。如果我们两个民族是敌人的话，那么我们共同居住的这个世界的前途确实是黑暗了。但我们能够找到进行合作的共同点，那么争取世界和平的机会就会无限地增加"。

1972 年 2 月 21 日晚 6 时～7 时，中美双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商讨会议办法和公报的形式和内容。

2 月 27 日，在由杭州至上海的飞机上，中美双方就公报的定稿问题终于最后敲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双方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这样说：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 1972 年 2 月 21 日～2 月 28 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 2 月 21 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

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2月27日下午5时，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讲话。

对于《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分歧，周恩来后来说：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月28日早晨，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尼克松返回美国。

当天，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对尼克松访华进行了报道。中美关系解冻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际社会把尼克松的北京之行称之为“尼克松冲击”。

在回忆录中，尼克松写道：

回顾在中国度过的那一个星期，我感到最鲜明的印象有两个。其一是在北京观看体育表演时，观众既守纪律而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它证实了我的这一信念，即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周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我和毛泽东会晤的时间很短，又过于正式，使我对他只能有一个肤浅的印象。可是我和周举行过许多小时的正式会谈和社交场合的交谈，所以我能看到他的才华和朝气。

世界上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往往全神贯注于某一事业或问题，周恩来却不然，他能广泛地谈论人物和历史。他的观点为他那种刻板的意识形态的框框所歪曲，然而他的知识渊博是惊人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中美关系解冻不仅是中国和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影响了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其他一系列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

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预示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两极结构正在由中美苏政治“大三角”所替代；同时也证明中国倡导和力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日益深入人心和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中美关系的巨大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崭新的外交局面。

1972 年3 月 12 日和5 月 18 日，英国和荷兰同中国先后签署了关于两国外交关系升格的联合公报。1972 年 10 月 10 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签署了中国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1972 年，欧洲国家还有希腊（6 月 5 日）、卢森堡（11 月 16 日）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3 年 3 月 9 日，西班牙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 1972 年内，中国同世界上 18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中日邦交正常化

美国总统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新闻消息如同一股冲击波，使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的日本佐藤政府带来极大震动。

1972 年 5 月，佐藤荣作倒台，随之崛起的是“庶民宰相”田中角荣。

1972 年 7 月 7 日，田中角荣当选为首相，马上宣布，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田中角荣上台发表就职演说两天之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致词时，谈到田中组阁问题时说：“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7 月 12 日，周恩来授权姬鹏飞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田中角荣访华的决心。

早在 1971 年 9 月，藤山爱一朗率领日本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访华团访华。同年 11 月，在中国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以飞鸟田一雄为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再次访华。11 月 10 日，周恩来会见了这个访华团，并且会见了时任日本东京都知事的美浓部亮吉。

在会见过程中，当谈到中日关系时，周恩来说：“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自古就属于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只是因为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才被日本割去。就像库页岛南部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割去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都说日本要放弃过去占领的地方。南库页岛放弃了，过去把中国的东北说成是‘满洲国’，也放弃了，朝鲜也放弃了，台湾也放弃了，在日本方面来说是放弃了。这些地方都已归还它们的祖国。”“没有哪个说南库页岛地位未定嘛！朝鲜现在还是一分为二，但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属于日本，分

裂了还是一个国家，是独立的。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已经归还中国了。当时中国派行政长官陈仪、参谋长葛敬恩到台湾受降，日本当时驻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在受降文件上签了字。受降以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要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和台湾海峡，台湾早被中国人民解放了。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初，也承认台湾是属于中国的，宣布美国对台湾没有野心。”“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现在联合国就有人说，蒋介石用中国的名义不能进联合国，如果用台湾的名义可以到联合国去。这个谬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在世界各地都还有市场。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台湾问题，台湾究竟归还没归还祖国，地位定没定。比如说，有人要搞琉球独立，我们就不支持，你们当然也不会赞成，一定坚决反对。”

1972年7月25日，竹入义胜访华，带着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以及与中国交涉的方案，分别受到廖承志、周恩来的多次接见。最后一次会见时，周恩来交给竹入义胜一份关于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

8月3日，竹入义胜回国后，把这份原始方案连同会谈纪要一同交给田中角荣。田中角荣欣喜若狂，这对急切想要了解中国意向的日本新上台的政府如同雪中送炭，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材料后来被叫做《竹入笔记》。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与相继访华的日本社会党佐佐木美三、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自民党小坂善太郎等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和田中角荣访华等问题进行了多次友好会晤。

8月，大平正芳在接见时任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的孙平化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时，向孙平化转达了田中角荣将访华的决定。

为了使全国人民理解毛泽东打开中日关系大门的意义，周恩来从9月1日起修改《外交部关于接待田中访华宣传提纲》，并于9月4日亲自批发这个文件，要求各大城市“在9月20日做到家喻户晓”。

9月21日上午10时，北京、东京同时向全世界发出公告：“日本国总理田中角荣愉快接受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将于9月25日至30日访问中国。”

9月2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50多人来到北京机场。上午11时30分，田中角荣乘坐的道格拉斯DC—8型日航专机越过浩瀚的东海，平稳地降落在北京机场停机坪上。

田中角荣访华期间，中日首脑级会谈共举行了四次。

9月25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首次会谈。在会谈前，双方代表在休息厅里会见。代表团成员以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为中心。

关于台湾问题，周总理表示：日中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他指出：我们希望从政治上来解决一些历史问题，不要拘泥于法律条文。日蒋的外交关系不能保存，但日本在台湾的侨民可以找到一个办法。关于宣告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我们不同意日方的说法“确认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周总理说这样写，会变成从缔结旧金山和约到现在这段时期，中日战争状态已经结束，而我们又不是当事者，不包括在内。总理提议由两国的外长找出一个办法，即双方都同意的一句话。

总理坚持恢复中日邦交三原则，要我和大平考虑每一项原则如何在联合声明中表达出来的问题。最后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结束了，但中日邦交还没有正常化，中日还没有建交，这在中国人民的感情上是不顺畅的，我们这一次要使他们在感情上顺畅起来，推动中日友好。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谈。中日双方为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各自阐述了基本思想和立场，诚恳、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要通过谈判求大同存小异，一举恢复两国邦交。

9月26日下午两点，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进行第二次会谈。寒暄之后，周恩来以严厉的口吻谴责日本的做法。

周恩来说：“高岛条约局长是来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吧。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这便是恢复邦交谈判时出现的“高岛讼棍”事件。

事实上，日台关系问题一直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田中角荣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华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

9月27日下午4时许，中日双方继续举行首脑会谈。

会谈在和睦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就整个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中日双方的意见接近一致。在这次会谈当中，对联合声明，周恩来只字未提。日本人又开始有些迷惑不解，稍过了一会儿，他们就明白了，毛泽东将在晚上8时接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最终决策性的意见将由毛泽东来说。

9月28日，首脑会谈进行到最后一轮。这次会谈，双方就联合声明的内容达成最后协议，并于9月29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为了表示中国方面的诚意和决心，周恩来书写“言必信，行必果”六个大字赠给田中角荣。

周恩来说，中日两国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中国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田中角荣也书写日本一句古训“信为万事之本”回赠给周恩来。

9月29日上午10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中日联合声明》中说：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1972年9月25日至9月30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毛泽东主席于9月27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

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 1972 年 9 月 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签字仪式后，大平正芳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大平正芳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并将予以关闭。

1972 年 9 月 29 日这一天，是中日两国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折的里程碑。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后，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中日

友好关系不论是官方的关系还是民间的往来，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973 年 4 月 16 日 ~5 月 18 日，由廖承志率领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在民间和政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后，中日两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继续得到发展。

1974 年 1 月 4 日 ~5 日，日本外相大平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同中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包括缔结航空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月间，中日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但是航空协定尚在继续谈判交涉之中。航空协定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如何处理日台航线问题。

4 月 20 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同一天，日本政府外相大平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航空运输协定是国家间的协定，日台之间是地区性的民间航空往来”。这是符合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的。

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的签订（1974 年 9 月 29 日正式通航），和紧接着 1974 年 11 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赴日本签订的海运协定，有力地推动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两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1977 年 4 月，以土光敏夫为首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就签订长期贸易协议进行商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1978 年 2 月 14 日，由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稻山嘉宽和最高顾问土光敏夫率领的日本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访华代表团来京商谈中日长期贸易协议问题。经过友好协商，双方全部达成协议，并于 1978 年 2 月 16 日在北京举行了签字仪式。

这是中日民间第一个长期贸易协议。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这个协议是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口平衡的基础上，为发展两国长期稳定的经济贸易关系，经过友好协商，在各自取得本国政府的支持下而签订的。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中规定，中国出口原油、煤炭等给日本，而日本出口技术成套设备、建设器材等给中国。

作为民间长期贸易协议，这个贸易协议是整个中日两国贸易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日长期贸易协议为期 8 年，自 1978 年至 1985 年止。在有效期内，双方各自出口的总金额为 100 亿美元左右。在签订协议的一年后，1979 年 3 月，两国决定把 1978 年 2 月签订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的有效期延长到 1990

年，贸易额扩大两倍到三倍，即第一方的出口累计总额从100亿美元扩大到200亿美元。

协议签订以来，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执行情况良好。1978年中日贸易总额为48.2亿多美元，比1977年增加了39.2%；1979年中日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近23%，在所有同中国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中占首位。

在中日建交后的几年里，中日之间陆续签订了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协定。而其中长期贸易协议的签订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这个协议涉及的时间长、面广、金额大。它是根据两国的具体情况和独特条件，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互相补充、取长补短的基础上签订的。它的签订和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完善执行，对于发展中日两国间长期稳定的经济关系，扩大两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使两国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中日经济合作和往来带来了新气象。从长远的战略眼光出发，这是以两国的经济合作来加强中日友好的坚实基础。

中国恢复与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联合国是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纽约根据同年6月41个国家在美国旧金山签字的《联合国宪章》成立的一个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制止侵略行为”、“促成国际合作”等。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和安全理事会举行理事团。1945年6月，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理所当然地就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在美国等国家的无端阻挠下，中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长达26年之久。

50年代美国主张死期审议恢复中国联合国席位提案，60年代美国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提案。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否决了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提案。1971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的社论。称赞这次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及各国的支持。

社论写道：今年，美国又伙同日本抛出两项荒谬提案，妄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为了实现这一阴谋，它采取了种种手段，要把蒋介石集团保留在联合国内。但是，美国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跟着它走的寥寥无几。它的一个提案被否决，另一个提案由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获得通过而成为废案，落得个一败涂地。连美国通讯社也说，“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第二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与社论内容相一致的声明。声明还

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压迫的苦痛，中国永远不做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联合国从成立到1971年，已经走过了26个春秋。成员国也由成立时的近50个成员国发展到131个。

在联合国新增加的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深知联合起来的强大作用。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这些国家不断发出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呼声。多年以来，这些国家的政府坚持谴责和反对美日等少数国家政府对享有威望的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推行的敌对和歧视的政策。

这种出于纯粹的政治考虑而排斥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做法，不仅极为严重地否定了正义，而且特别违反了联合国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精神。阿尔巴尼亚等国就此问题于1961年向联合国大会提案。这些国家认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合法权利问题，特别是对联合国组织的前途，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提出以后，许多友好国家支持和赞同这一提案。由于这些国家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经过多年不懈和顽强的努力，使这一努力卓有成效，终于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1971年，中美关系不断地发出解决的信号。世界舆论密切注视着中美关系的发展进程。而且，美国政府对于台湾问题在对策上也表现出某种松动。这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斗争中的力量对比，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之后，美国设想了一个“双重代表权”的方案，即同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又要求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席位。

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荒谬说法，中国政府很快就给予了反击。1971年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谴责美国“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

1971 年 6 月 1 日，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联合国会员国在接纳中国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对美国在本年度联大所持态度，尼克松有意含糊其辞地说，美国的分析大概要花六个星期的时间。在美国完成了他们的分析之后，美国政府将决定他们在当年秋天举行下届联合国会议将采取什么立场。那时美国政府将就这个具体问题发表一项声明。美国政府有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

就在中美同时发表有关尼克松访华的公告之日，即 1971 年 7 月 15 日，一贯支持中国立场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18 个国家又向联合国提出决议草案，以后又增至 23 国。草案中提出：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组织根据宪章所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然而，美国在努力打通与中国往来的渠道时，仍然不肯放弃台湾当局，声称不能抛弃它的“老朋友”台湾当局。就在 1971 年 8 月 2 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声明》，详尽地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

这份《声明》中称，在一个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权不需要损害两个政府中任何一个政府的主权要求或看法。两者都参加联合国的局面不需要要求这种结果。

罗杰斯在《声明》中还称，美国将支持当年秋天联合国大会上要求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行动。同时，美国也将反对任何驱逐“中华民国”的行动或者以其他方式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

罗杰斯还坚持说，美国所作出的这项决定是完全符合尼克松希望使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以利于世界和平的愿望的，并且也完全符合美国人的一种信念的，那就是相信“中华民国”继续在联合国中拥有代表权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

根据美国政府的这些立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乔治·布什于 8 月 17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递交了一封信和一份解释性备忘录，正式

要求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议程。乔治·布什并在解释性备忘录中无理地要求：

在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联合国应当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即蒋帮）都是存在的，并且应当在规定中国代表权的方式中反映出这一不容争议的现实。在这样做时，联合国不应被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各自提出的、彼此冲突的主张表明立场，以待按照宪章的要求和平解决此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如果联合国要成功地履行它维持和平的职责并促进人类的福利，它就应当以公正和现实的方式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

乔治·布什还在备忘录中提到“重要问题”提案的 19 个（后增为 22 个）共同发起国。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斐济、冈比亚、海地、洪都拉斯、日本、莱索托、利比里亚、新西兰、尼加拉瓜、菲律宾、斯威士兰、泰国、美国、乌拉圭。

同时，乔治·布什还提到“代表权问题”提案的 17 个（后增为 19 个）共同发起国是：澳大利亚、乍得、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冈比亚、海地、洪都拉斯、日本、莱索托、利比里亚、新西兰、菲律宾、斯威士兰、泰国、美国、乌拉圭。

美国等国关于“重要问题”的提案中认为，决定在大会提出的结果将导致剥夺“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任何建议都是宪章第十八条所规定的重要问题。

关于“双重代表权问题”，内容：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并且建议让它得到安全理事会 5 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席位；确认“中华民国”继续拥有代表权；建议联合国一切组织专门机构在决定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考虑到本决议的条款。

1971 年 10 月 18 日，阿尔巴尼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席位的提案提交联大后，联合国大会开始了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专题辩论。经过一周的激烈辩论，约 80 个会员国的代表在会上发了言。

在此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给许多国家的首脑写信，国务卿罗杰斯和乔治·布什在联合国内外和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 200 多次话，活跃于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

美国有些议员还扬言，如果联合国通过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美国将削减给联合国的经费。一直到正式表决前几分钟，美国还指使某些国家出面

要求推迟表决，以便说服一些仍然动摇的国家支持美国提案。

此时，台湾的台独分子也四处游说，在东京、纽约、旧金山等许多地方大肆活动，要求如果蒋介石集团以中国的名义不能呆在联合国内，可以用台湾的名义，在世界许多地方宣扬“一中一台”的论调。

10 月 25 日，这一天成了联合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个日子。联合国的全体成员国将在这一天就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一系列表决。以阿尔巴尼亚等 23 个提案国为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唯一代表的为一方；附和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提案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空前的“投票角逐战”。

第一轮投票是对美国提出的要推迟表决时间这一提议进行表决，但这一推迟表决的决议，以 53 票赞成、56 票反对、19 票弃权而被大会拒绝了。第一回合，以美国为首的一方即告失败。

接着，美日等国仍然指望取胜的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也以 55 票赞成、59 票反对和 15 票弃权而惨遭败北。

至此，美国为保留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而设置的最后一道防线也终于被摧垮了。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发觉它自以为坚强盟友的北约成员国中除了卢森堡、葡萄牙和希腊之外，其余国家竟都投了反对票或弃权票。

当这一表决结果在大会的电子计票牌上亮出时，整个大厅都沸腾起来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兴奋得高声欢呼，热烈拥护。极度高兴的坦桑尼亚代表甚至从座位上跳起来，跑到前排跳起了非洲舞。

这种情形表明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大势所趋，大快人心之事。只要接下来再表决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的提案，这场激烈而又紧张的争辩战就结束了。

可是，美国代表团到此时还想作最后的一次努力。美国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乔治·布什面色阴沉地走上大会的讲坛，发言要求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时删去其中立即驱逐台湾代表出联合国的一节。

但这一显然是毫无理由的提议当即遭到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反对。经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人马利克的裁决，乔治·布什的提议无效，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仍按原样付诸表决。

在这一大势已去的情况之下，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周书楷为了避免处于被驱逐的尴尬境地，被迫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组织，并带

领他的“代表团”灰溜溜地离开了会场。

接着，提付表决的两阿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此时，在整个挤满了人的大厅里响起了异常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提案已获通过，美国等费尽心思制定和提倡的那个“双重代表权”案已失去再进行表决的意义，成了一个胎死娘腹的产物。

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台湾蒋介石集团悲哀地退出他们在美、日政府庇护下非法占据的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这一斗争的最后胜利。

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问题表决后的第二天，即1971年10月26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姬鹏飞收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通知了联大会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正如外交官们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没有中国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世界上出现的诸如裁军、国际安全、和平、特别是东南亚的和平等紧迫的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不论是谋求实现宪章中所规定的目标和宗旨的联合国也好，或者是有着不同制度和政策的世界各国也好，都少不了中国。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在联合国支持正义的友好国家的不懈努力下，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 年 10 月 26 日，当联大表决结果传到中国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感意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结果，可以说是给中国政府一个惊喜。其实，在此之前的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中国领导人表现了极大的耐心。就在 10 月 24 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当天下午，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讨论去不去纽约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时候，毛泽东打电话向周恩来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以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中国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周恩来汇报说，大会讨论准备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这里的“乔老爷”，指的就是乔冠华。

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地进行着。这是新中国成立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亲自审定。

很快，一个阵容强大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就组成了，团长是乔冠华，副团长是黄华，代表有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表是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等。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还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五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了舆论的轰动与各国的关注，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接到任务后，乔冠华一连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

在1951年，乔冠华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中国“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提出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但不同的是，这次他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去对全世界发言的。

11月9日下午，在北京机场，4 000多群众挥舞起花束和彩带，热烈欢送第一次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

周恩来、叶剑英等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机场送行，党、政、军各界负责人和各国使节也到机场送行。

11月11日，纽约时间中午时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乘坐的波音飞机在纽约国际机场降落。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上发表了简单而热烈的讲话。

乔冠华说：同其他国家建立和发展正常的关系；一贯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反对外来干涉、掌握自己命运的正义斗争。我们代表团将遵循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在联合国里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

当天上午，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联合国秘书处的代表和友好国家的代表，很早就来到机场等候出席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的到来。数百名美国友好人士也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来自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亚特兰大等地。好几百名爱国华侨很早就来到机场，他们打起红旗横幅，上边写着：“热烈欢迎祖国驻联大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们还举起毛泽东的画像。

中国代表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到纽约后即开展了外交活动。第二天，即11月12日，乔冠华即拜会了第二十六届联大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向他表示感谢联合国组织对中国代表的欢迎。随后几天，乔冠华又到纽约鲁瓦医院探望正在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中国代表团又连续拜会了23个提案国的代表。

中国代表团的这种灵活、坦诚和充满协调精神的外交姿态，使刚刚到联

大的中国代表团博得了舆论界的好评。国民党集团撤离联大时曾经有过“预言”，诋毁中国代表团“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的讨论”。中国代表团的行为使国民党的诽谤之辞不攻自破，没有了市场。

11 月 15 日，纽约时间上午 10 时 30 分，乔冠华、黄华、符浩、熊向晖等精神抖擞地走进联合国大会会议厅就座，立即吸引了一大批蜂拥而至的各国记者。记者们为中国代表团迅速地拍下历史性的画面。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中国代表表示祝贺和欢迎。这一时刻，被联大主席马利克称为“历史性的时刻”。

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出现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本来，11 月 15 日的全体会议是以“世界裁军会议”为议程而召开的。但是，许多会员国都把时间用在发表欢迎中国代表团的演说上了。最后共有 57 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越来越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当天时间下午 6 时 40 分。欢迎仪式整整进行了一天。

在各国代表致词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大的讲坛。这是新中国的代表第一次正式站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坛上，向全世界显示正义事业的胜利。

乔冠华在发言中首先对联合国主席和许多国家代表所表示的对中国的欢迎表示了。对于坚持原则，主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阿尔巴尼亚等 23 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对以不同方式对中国表示了同情的其他一些国家，表示衷心的了感谢。同时批评了美国的排挤政策。

在大会发言中，乔冠华阐述了世界形势以及中国政府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乔冠华指出：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 26 年了。世界局势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联合国成立之初，成员国只有 51 个，现在已经增加到 131 个。在新增加的 80 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二次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20 多年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欧洲、北美、大洋洲也兴起了要求改变现状的群众运动和社会潮流。

乔冠华在发言中阐述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步的。这种进步总是要通过无数的革命和变革才能取得的观点。还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发展的艰难历

程，并提出了严正的申明。

关于台湾问题，乔冠华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居住在台湾的1 400万人民是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归还祖国，台湾同胞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美国政府在1949年和1950年一再正式确认了这一事实，并且公开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无意干涉。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派遣武装力量侵占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

对于有些人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乔冠华指出，这是在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继续制造“一中一台”，实际上也就是“两个中国”。

乔冠华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用武力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一定要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任何企图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的阴谋，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接着，乔冠华重申了中国的一贯立场，即支持和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和利益，坚决反对大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

乔冠华在发言中说：

国家不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准则。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国家都无权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中国反对大国优越于小国，小国依附于大国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理论。中国反对大国欺侮小国、强国欺侮弱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乔冠华说，中国的主张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所谓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作、将来也永远不作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

乔冠华在发言当中还提到了裁军的问题，他强调说：

一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扩军备战，大力发展核武器，严重地威胁国际和平。世界人民渴望裁军，尤其是核裁军，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求解散军事

集团、撤走外国军队、取消外国军事基地，是正当的。

中国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垄断，最终消灭核武器和核战争。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并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作为第一步，首先就不使用核武器达成协议。中国政府曾多次声明，现在我代表中国政府再一次郑重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美国和苏联如果真想裁军，就应该承担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这并不是一件难于做到的事。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是对他们是否真正具有裁军愿望的严峻考验。

乔冠华认为，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是互相支持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贯得到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是中国应尽的义务。为了支持各国人民的斗争，帮助这些国家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中国向一些友好国家提供了援助。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从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的筹备的召开

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的国内形势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后，党的思想组织建设遗留的问题亟待解决，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逐步回升，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但不断受到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毛泽东又支持了江青等人的观点，使正确的措施无法顺利实施。实际上，中共十大召开以前，中国国内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

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 1974 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叛国叛党的计划破产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以及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或死或被囚。特别是党章中已写入林彪的名字作为党的“接班人”，而此时林彪都成了“死有余辜的反革命集团的首领”，成了谋杀伟大领袖的元凶。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所选的 21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已有七名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首脑和骨干成员。中央政治局存 14 个人，缺额达 1/3，难以正常工作。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开展了六年，矛盾突出，前后掣肘，难以为继。“九・一三”事件爆发，造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之一“接班人”的反叛，位置空缺，以上种种，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这些在全国上下造成了一场严重的思想混乱组织混乱。全党面临着统一思想认识、确定行动路线的急迫任务。“九一三”事件后，全党普遍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召开一次新的党代会，已刻不容缓。

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在“九一三”事件后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分别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工作，但这些临时措施急需得到合法程序的认可。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急需补充新人。解决这些思想路线和组织调整的问题，只有通过提前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才能完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多次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正确意见。以非凡的坚强毅力和高超的领导才干，以及忘我的牺牲精神，极力排除江青等人的干扰破坏，克服“左”倾错误在经济、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林彪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

1971 年底到 1972 年初，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公安工作会议、科学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一再强调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努力纠正因极“左”造成的危害。

周恩来在上述会议上明确指出，“左”的批不透，右的还会来；极“左”思潮不批透，就没有勇气贯彻毛泽东的革命路线。

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①]

对此，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9 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与此同时，周恩来花了很大气力，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方面，纠正了许多冤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让他们重新出来工作。这期间，党的干部政策有所落实。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纠正极“左”错误。

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②]

对此，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这时的经济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在工农业生产内部，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严重失调，从而造成工业生产都远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合理，工农业结构性失调进一步加剧。经济管理混乱，导致投资效益下降。

1971 年，国营企业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利比 1970 年减少 0.96 元；全国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全国有 5 000 多家企业亏损，占企业总数的 1/4。产品质量下滑，生产事故不断增多。据 1971 年底的调查，所调查的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 8 737 项产品中，合格率仅为 45%，而因事故伤亡的人数却超过 10 万人。

对此，1971 年底至 1972 年初，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抓产品质量的问题。1971 年 12 月 5 日，周恩来听取了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随后，根据周恩来对企业管理进行整顿的指示，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提出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和企业要抓产量、质量、利润等七项指标。

1973 年 1 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 1973 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这个文件对纠正生产建设上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作了十条纪律规定。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未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的精神通过与会代表的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此外，中共中央严格控制基建规模，并且决定把当年的大中型项目从 1 500 多个减少到 1 200 个左右，以后的投资要更多地用到技术改造上来。

在整顿企业、缩减基建规模的同时，周恩来着力整顿农村“左”的政策。

1971 年 12 月 26 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

这时，在农村中存在着分光吃净，集体增产个人不增收，超支户多，分配不兑现，以及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现象。中共中央为此提出，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要生搬硬套大寨的方式，不要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

营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中央为此还在1972年多次指示，要加强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具体规定了对发展农村经济十分有利的政策，体现集体增产、个人增收的特色。

经过中央努力在工业、农业、基建、外贸各个领域的纠"左"，国民经济的发展在1973年出现了较好的势头。

1973年，"三个突破"基本上得到了控制，粮食、棉花的库存量及其他农作物产量有较大增加，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劳动生产率、产品合格率都有一定提高，社会商品零售额超过计划的4.9%，人民消费水平提高了5.2%。

在科学教育工作方面，周恩来提出要加强和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

针对中国这时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现状，周恩来于1972年7月11日给几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周恩来让张文裕和朱光亚作好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

针对此时教育现状，周恩来还表示赞成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些学科的大学生。

在外交工作方面，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际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发展对外贸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73年，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中国从日本、美国、西德等国家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中国的现代化生产技术水平。

总之，自"九·一三"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对各个领域里"左"的错误有了某些纠正。使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周恩来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所作的这些努力，触到了顽固坚持极"左"思想的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痛处。

1972年初，当国家计委在周恩来指示下提出加强管理的7项措施时，张春桥等人就顽固反对，大放厥词"没有那么些规章制度，企业照样进行生产"。"文化大革命"破了那么多规章制度"还是照样发展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靠思想政治工作"。

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王洪文也口出狂言，前时期提出要建立规章制度，不是中共中央的。这实际上是搞"管卡压"。对于按劳分配制度，王洪文甚至攻击说，加强管理的7项措施"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

阶级莫大的侮辱"。王洪文还挑拨说，他要是工人，他也不上班，因为强调发展生产，加强劳动纪律，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姚文元在攻击农村落实政策时说，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

周恩来的反左正确主张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坚持要批"极右"，把《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极"左"的文章说成是"大毒草"，指责周恩来主张批极"左"不全面。江青借此向《人民日报》发难，在报社内大搞"反右倾回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支持了江青等人的意见，认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主要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

随后，在江青的蛊惑下，全国发动了反对"右倾回潮"的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从而给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如此结果，不但使刚刚有了好转的形势又恶化起来，而且还使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大不可能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结束这场灾难，使党的领导转上正确的轨道。在这种特殊形势下，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仍在全局上得以继续。

这就是中共十大召开前的复杂的历史背景情况。

为了开好大会，王洪文被调到中共中央，1973 年 5 月 20 日 ~31 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为大会作准备。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并同华国锋、吴德一起列席政治局会议。

此后，又在十大前任命王洪文为中共十大党章修改小组负责人和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决定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主持起草大会政治报告。这样的组织安排，就决定了中共十大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中共九大的"左"倾错误。虽然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解放了谭震林、李井泉等13 名老干部。

为准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三份重要文件需要在会前拟定。第一份文件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政治局确定的报告起草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叶剑英、李先念六人，由张春桥执笔。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对报告的起草工作给予指导，以体现他的意图。这年六月中旬，在听汇报后，他基本认可了报告稿的要点，并提出具体补充意见。③

这份报告，首先肯定党的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肯定九大以来党中央领导的各项工作。关于粉碎林彪反党事件，报告认为这是“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报告对林彪等的阴谋活动和两面派手法进行批判，又反复论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据以提出：作为反映国内外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报告要求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注意“抓大事”，以主要精力开展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批判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报告强调：当前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鉴于中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报告号召各级党组织应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努力完成国家计划。

第二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修改小组成员有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修改稿于七月初基本完成，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修改稿中除删去总纲里关于林彪的一段话外，仍保留九大党章的主要内容，同时更突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多处强调要“批判修正主义”。根据毛泽东在揭批林彪集团斗争中提出的“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观点，修改草案将“反潮流”作为一种需要坚持和发扬的“革命精神”写入总纲。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是批判林彪，确立新的“接班人”的地位。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要年轻，二、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④]1972 年 7 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⑤]

第三份文件是《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中央

专案组”起草的这个报告，毛泽东事前就表示：不应再搞那些繁琐内容，改为直截了当地列举众所周知的林彪一伙的罪恶阴谋和叛党叛国的事实。[6]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审查报告》简略记述了九大以来林彪集团进行抢班夺权、策动武装政变的经过，最后建议中央永远开除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些职务。在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1973 年 8 月 20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提出处理的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当中，对李雪峰的认定和处理与事实不符，属于错案。1982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李雪峰党籍。7 月 10 日，《审查报告》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8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

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至此，大会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十大召开前按原计划还需要召开九届三中全会，以便确定有关十大的会期安排和工作程序等。[7]八月上中旬，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七月底对十大准备工作的指示，商议成立以王洪文为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为副主任的中央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并拟出十大主席团成员、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常委的预选名单。[8]九届三中全会被取消。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表示：“希望这次会议开成真正是团结的、胜利的大会。”[9]

十大开会的方法和以前有些不同：先在各地区、各单位分别开预备会议，讨论为大会准备的三个文件，提出意见。这样做，为的是缩短大会的时间。

1973 年 8 月 24～28 日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代表 1 249 人，代表全国 2 800 万名党员。毛泽东主持大会。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大会选举了由 148 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秘书长：张春桥。

主席团主要成员有：刘伯承、江青（女）、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

毛泽东同志主持了大会。周恩来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是由张春桥、姚

文元等主持起草的。该报告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等，这就全面肯定和继承了“九大”的错误，使“左”倾思潮延续下去。

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十大党章保留了九大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内容，在结构上作了些调整，条文部分改得不多。总纲中只取消了有关林彪的论述和林彪的论点。值得指出的是，十大党章在“左”倾错误方面的新发展，主要是充实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把“批判修正主义列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长期任务”；片面提出“反潮流”原则，要求党员要具有反潮流的精神等。

大会最后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但一批众望所归的老同志入选，毕竟反映了党内健康力量的增强。

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1973年8月3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点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九人，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委员21人，候补委员四人。实际上王洪文一跃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十大期间，毛泽东还曾考虑成立一个以老干部为主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但未能实现。事后，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作了说明，他说：这件事过去，在我们党内没有这个制度。主席说他要作“顾问委员会”主席，我们听了都不同意。主席当时不是开玩笑，是真的要这样做。主席说，即使是当了顾问，但我还是要管的，不仅“顾”，而且“问”。因大家反对，后来主

席又说：你们大家都不赞成，我只好还作（中央委员会）主席，鞠躬尽瘁。[10]

毛泽东关于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一方面表明他试图改变党内的现行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已感觉到自己的病情而对“后事”的某种担忧。这种担忧，随着他本人身体状况的明显下降，以及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复杂局面，变得日益加深，甚至焦虑不安，直接影响到他此后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的决策。

8 月 29 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公报详细报道了当时大会的基本情况和大会坚持的方针路线。

注释：

①②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 年 8 月 1 日、2 日。

③周恩来就起草十大政治报告问题给张春桥的信，手稿，1973 年 6 月 17 日。

④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 年 8 月 24 日。

⑤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 年 7 月 24 日。

⑥周恩来就中共十大准备工作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 年 7 月 4 日。

⑦周恩来就十大准备工作等问题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 年 7 月 10 日。

⑧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 年 8 月 4 日。

⑨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 年 8 月 20 日。

⑩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 年 8 月 23 日。

“四人帮”的形成

“四人帮”的概念是在毛泽东批评四人小宗派的基础上提出的，“四人帮”的形成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极左思潮泛滥，所谓左派成长的背景下形成的。它经过了萌芽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

“四人帮”是指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央政治局中所结成的四人小宗派组织。“四人帮”这一称谓最先由毛泽东于1974年1月初在对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评中提出。

“四人帮”成员早期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后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极其重要的职位。在其政治活动期间，极端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名义上执行“左”的革命路线，对大批老革命同志，国家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试图夺取国家政权。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四人帮”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开始气味相投走到一起的。早在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所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江青抛出的部队文艺工作会谈纪要时，这些人开始形成了统一战线。

到了文革正式开始以后，由于有最高领袖的赏识“四人帮”中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在这个前提下，张春桥、姚文元逐步成为了政治舞台的新星。

张春桥早在50年代，就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1958年，张春桥第一次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这年5月25日，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因毛泽东的赏识，一跃而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在这一年，张春桥也跃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这是因为柯庆施的荣升有张春桥的功劳。此前，在中

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柯庆施的报告受到了毛泽东的表彰，此后，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按照柯庆施的指点，张春桥写出了标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这个报告正符合毛泽东要大跃进，反反冒进的思路，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在1958年1月16日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又当众问周恩来："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从此张春桥成为了柯庆施的红人。

柯庆施进入中央政治局后，与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给身为中共上海市委政策调查研究室主任职务的张春桥带来"最新最高指示"。

那时的张春桥，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子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

从反反复复的揣摩之中，张春桥获得不小的发现：毛泽东对于红军时期的供给制颇为欣赏和怀念，在多次讲话中提到了当年的供给制，而对于八级工资制造成的等级差别，常有非议。

张春桥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发表在第6期的《解放》上。张春桥的文章很快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毛泽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一口气读完，觉得此文甚合自己的心意，但有些提法又过于偏颇。他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还亲自写下一段《编者按》。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毛泽东和全中国的注意。

不过，就在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不久，毛泽东觉察到全国范围内"左"的严重后果，来了个紧急刹车。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批评了"三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

也就在此时，河南竟送来某县"两年进入共产主义"的报告。毛泽东看罢，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批示："美妙如一首诗！我们的秀才伯达、春桥，可否去看一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

姚文元的出名则是伴随着文艺领域的大批判而来的。1954 年下半年，中国文坛就掀起了批判胡风的浪潮。姚文元在北京《文艺报》1955 年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分清是非，划清界限》一文，又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三套手段》一文，崭露头角。攻击胡风理论“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胡风先生已经站到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已经站到污蔑党的立场上去了……”姚文元的“左派”言论，引起了当时身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春桥的注意。张春桥指导姚文元在《解放日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胡风的文章。一时间，姚文元名声大振，成了反胡风的“英雄”。由此，姚文元、张春桥他们成了莫逆之交。

1957 年 2 月 6 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攻击姚雪垠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在文中，姚文元用词激烈，极尽攻击之能事。这篇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谈及文艺界的问题时，提到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最近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一下成为了毛泽东关注的“新星”。

1957 年 5 月 15 日，毛泽东经过对形势的分析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毛泽东这篇文章向全党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形势变了，资产阶级右派已经在向全党进攻了，我们要等待时机，反击右派。

5 月 25 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并讲了话，新华社为此发了一条很短的电讯。电讯稿中引用了毛泽东说的两句话：“同志，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对此，《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和《文汇报》在发稿中，从编排的技巧上，使用的铅字和标题的大小上不尽相同。姚文元对照这三张报纸，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巧的是，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颇为赞赏，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如此一来，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

毛泽东决定，就从姚文元的这篇文章说起，提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问题，公开批评《文汇报》，于是，毛泽东当天提笔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1957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在

第一版发表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同前几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共同发出了反击右派斗争的号角。一下子，姚文元成了“反右英雄”。

姚文元趁此机会，在半年时间发表了50多篇反右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奠定了姚文元“反右英雄”的地位。“姚棍子”的名声也就此远播四方。姚文元作为一颗文坛“新星”，在全国名噪一时。1958年7月，上海市委决定创办理论刊物《解放》柯庆施决定调姚文元进入上海市委，在《解放》杂志任文教组长。

靠批《海瑞罢官》步入政界。《海瑞罢官》发表和演出后，受到广泛好评，毛泽东当时亦称赞过。但江青等人出于其政治目的，硬说《海瑞罢官》是一台“骂皇帝”、借古讽今、为彭德怀翻案、攻击人民公社的戏，是大毒草。

获知内情的姚文元决心攀附江青这棵大树，他闭门8月，绞尽脑汁，无限上纲，牵强附会，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此文一出，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姚文元因此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而后由江青提名，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接二连三地发表长文，写了《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批判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写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批判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写了《评陶铸的两本书》，批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连同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四评”是姚文元进入高层的“奠基”之作。姚文元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张春桥）。姚文元的文坛霸主地位越来越稳固。1969年更被毛泽东钦点为九大报告工作组成员，与张春桥共同执笔政治报告。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姚文元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70年8月以后，又取代陈伯达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王洪文的发迹，始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全国的动乱以后。由于他成为了受江青、张春桥等人赏识的上海造反领袖，开始了飞黄腾达的道路。王洪文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干事。接触到不少厂里领导干部的档案材料。“文革”风暴一起，他摇身一变为“造反派”，抛出了厂领导的材料，当了工厂造反派的头头。

1966年11月6日下午，他带领他所领导的造反队伍，加入了上海17个单位的造反派联合组成的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王洪文因为是当时参加代表会的仅两名党员，被推选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

当时，上海工人另一派造反派“工人赤卫军”势力很大，不同意他们动辄打砸抢和迫害老干部的行动。他们的组织也不为上海市委认可。

作为“工总司”的核心成员，王洪文对于上海市委不承认他们感到恼火。他们组织赴京告状团，去北京告状。11月10日凌晨，王洪文带领2 000余人冲进上海北站，强行登车，火车离开上海不远，即奉命停留在上海附近的小站安亭，火车开不了，他们便挡住所有经过安亭的火车，造成火车停运，同时炮打上海市委，制造了“安亭事件”。

上海市委向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安亭处理。

在王洪文与上海市委对峙的过程中，11月11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钦差大臣”张春桥，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赶往安亭，12日与王洪文等几个头头开了一次碰头会，当众答应第二天回上海解决问题。13日，张春桥签字同意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1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意见，并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政策。

上海市委只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工总司”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张春桥则通过这件事，为自己在上海培植了一支夺权势力，成为“工总司”实际领导人的王洪文也由此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接着，由于有张春桥的支持，王洪文带领工总司制造了“血洗上柴”的“英勇战绩”，成为上海造反大军的领袖。

此后，在张春桥、姚文元的谋划下，王洪文带领打手制造了“《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等一系列搞垮上海市委的事件，为以后的“一月夺权”作好了铺垫。

1967年元旦社论向全国吹响了攻击“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角。“军师”张春桥等人旋即赴沪，策动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掀起“一月夺权”的风暴，夺取上海市委大权。

1月6日，王洪文、徐景贤联合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全市32个造反派组织，10万多人，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这次大会的导演

就是张春桥、姚文元，连大会的发言稿和口号都是经过他俩仔细审批。大会宣读了三个由张春桥、王洪文一伙炮制的“通令”，宣布“夺权”成功。

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经毛泽东审定，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通过一系列的造反行动，王洪文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造反英雄，由此在新的上海领导机构里成为了主要代表。2月24日，按照当时“老中青三结合”的说法，组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而王洪文位列副主任。

此后，由上海“一月风暴”刮起的“夺权风”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一时间，“夺权”风潮达到了如火如荼、如疯似癫的境地。而首开夺权之风“功臣”之一的王洪文，也名声大振，逐渐走进了毛泽东的视野。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人物，造反夺权的功臣，在党的九大上，王洪文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成为了中央委员。此后，为了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在康生的推荐下，1972年9月，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王洪文奉调进京。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他考虑新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要年轻，二、要从工人、农民中直接选拔一批人。他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事件”后，“多次说要提工农出身的同志为党的副主席、常委。”[①]1972年7月，他又说：“外国人说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说是我们死了就会变修。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要搞一点年轻人来当共产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所谓年轻人，就是年龄在三十至四十之间，要工人和农民。老年、中年还要。你们多找找，南方北方都找。文化水平低一点，用一批知识分子扶助。”[②]

正是从这种设想出发，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被考虑进入新的中央领导班子。

在1973年5月为筹备十大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中央工作。

在党的十大前，毛泽东提议，政治局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党章修改小组，张春桥和姚文元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8月20日，中共“十大”的选举准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王洪文显赫地出任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这为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做了铺垫。这样，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

王洪文的发迹，得益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栽培，这使王洪文自然要追随其后。而在王洪文到来之前，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并肩战斗”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就已经结成了三人小团体，尾随在张、姚之后的王洪文自然成为这个小团体的第四个成员。

文革开始以后，江青为了获得政治资本，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为自己树碑立传。成功地策划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取代了中央通过的《二月提纲》。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利用30年代发表的《我的一封公开信》捞取政治资本，把自己打扮成为上海文艺界的革命老战士。当时，在她的活动下，以中央文革的名义给毛泽东和林彪写了一封信，信是陈伯达代笔写的。信的第二页的落款处，“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成员都签了字（江青除外）。

这封“中央文革”碰头会给毛泽东、林彪的信，将江青封为“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据江青的秘书杨银禄回忆，九大”前的一天晚上，江青拿来《公开信》对他吹嘘说：“我那个时候才20岁出头，就顶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领导上海的文艺革命，不容易呀！我和鲁迅一起受围攻啊！虽然说我和鲁迅受围攻的形式不尽相同，但受围攻的程度是一样的。鲁迅的骨头很硬，顶得住压力，我的骨头也是很硬的，我们都顶住了。”

当然，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是业绩辉煌，成为无人替代的革命旗手。

“九大”成为江青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能否进入政治局，似乎决定着她的政治生命前途。最初，她进政治局的要求被毛泽东否定了。几天以后，毛泽东决定成立酝酿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员名单工作的领导班子，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三人组成，这给江青能够进入政治局带来了机会和希望。江青多次主动往8号楼（康生的住地）跑，康生也多次到10号楼找江青密谈，并通过叶群活动林彪。这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

员的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召开工作班子的最后会议上，商定中央领导班子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江青名列其中，最终成为了政治局委员，步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至此，在党内组成小宗派的条件已经成熟。

1973 年 8 月 30 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成为四人帮结伙标志。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

此后，面对周恩来发展经济，批判极左思潮，整顿秩序的种种努力，江青一伙采取了阻挠、攻击、批判的各种伎俩。对此，1973 年底以来，毛泽东多次批评江青，对江青的不满日甚。1974 年，有一次，江青要见毛泽东。通报以后，工作人员给她送来一封信。内容是：

“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七四．三．二〇”

1974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针对江青等人借所谓的“批林批孔”给周恩来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行为，毛泽东再次批评江青等人，并提出了宗派问题。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毛泽东又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江青说。

“当众说的！”毛泽东紧跟一句道。

“说了算！”江青也紧跟着回答。

“孔老二讲，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说到这里，对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说：“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

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

“不大好的就改。”

“你也是难改呢。”

“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江青又接着说了句。

最后，毛泽东对大家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毛泽东说的“上海帮”即由此而来。后来人们称“上海帮”为“四人帮”。

注释：

①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 年 8 月 24 日。

②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的谈话记录，1972 年 7 月 24 日。

江青等人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8月党的十大召开后，“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毛泽东在强调安定团结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种种措施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凭借他们在党的十大上所窃取到的权力，加紧了篡夺最高领导权的步伐。在这一阶段里，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篡权与反对篡权的斗争非常激烈。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采取了一系列恶劣的手段和一系列卑鄙的行动，他们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一个严重的步骤。

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搞反革命两面派，披着极“左”的外衣，在非常“革命”的口号下，制造分裂，颠倒敌我，否定一切。他们高喊“革命”口号而猖狂反党反人民，妄图打倒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因此，批林整风开始后展开的批极“左”，批假“左”真右，就等于撕开了“四人帮”的“左派”画皮，捅到了他们的心窝子上。“四人帮”十分恐慌，江青叫嚷“批林整风都整到我们头上来了！”“四人帮”的一些死党也嚎叫：“陈伯达倒了，必然要炮打张春桥、江青同志。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林彪坠机后，江青一伙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急于寻找机会打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篡夺党政大权。

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揭批林彪反党集团的批林整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周恩来将批林整风的重点放在了林彪鼓吹的极左路线上，同时结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了各条战线的整顿工作。但到了1973年，江青一伙却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对准了周恩来等。

其实，批林批孔运动起源于是彻底批判林彪的极左还是主要批判他的极右的分歧，批判极左就会涉及江青等人的极左。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方

向问题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这从本质上说，是1967年2月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1972年的8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

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10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对批林性质的认识分歧很大，最后由毛泽东裁决。毛泽东从他晚年的“左”倾错误理论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在12月的一次谈话中，肯定林彪反革命集团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否定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给江青一伙壮了胆。

但这些分歧对立还不能使江青等掀起更大地风浪。时机的到来是江青等人利用清查林彪的机会，在林彪家中找到了一些摘录的孔子和儒家著述的语录条幅和卡片，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等等。于是，便认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信徒，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江青一伙指使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整理了一份资料，取名叫《林彪与孔孟之道》，送给毛泽东。

1973年，春天，毛泽东在一首诗中批评郭沫若尊孔：“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接着毛泽东又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7月4日，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谈话，他讲到“批孔”问题，说：“郭老在《十批判》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同时，毛泽东又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工作。

表示不赞成否定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②

7月17日，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时又谈到儒法斗争的问题，说：“我们郭老（指郭沫若），在历史分期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

判书》里边，立场观点是尊儒反法的。”“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③

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他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并当场念了他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言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着眼点是针对现实生活中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怀恋文革前状态的人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

9月23日，毛泽东会见了埃及副总统沙菲，又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毛泽东关于儒家和法家的评论，很快为江青一伙所利用。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虽然多次提到批孔，但他并没有将其突出到中央的全盘工作中，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然而。毛泽东的这些话，却为江青等利用，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

在十大前夕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曾借毛泽东关于“批孔”的诗和有关言论，主张将“儒法斗争”的内容写进十大的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以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为理由没有采纳。毛泽东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④

当时担任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飚不久后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⑤

据此，1974年的1月上旬，在周恩来主持召开过的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中，以及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

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1973 年 7 月间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以为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1974 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⑥]

12 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⑦]

1974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批林批孔”是借题发挥，实质要解决现实问题。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防止“右倾翻案”，肯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而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看到在这之前，即 1973 年 7 月毛泽东批评过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工作，12 月批评过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以为有机可乘，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篡夺最高权力扫清障碍。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机关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还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1 月 23 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

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8]

24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从此，批林整风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

江青于1974年1月两次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会上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

1月25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1974年第1号文件为“王牌”，临时通知周恩来主持“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不知道今天大会的内容，是临时接到“江办”的电话通知，匆匆赶来的。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9]

“一·二五”大会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便吩咐参加大会的秘书把大会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秘书们连夜突击，到1月26日上午，就把记录整理好了。周恩来把记录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划了横杠，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都装在了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了毛泽东。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

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⑩]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他越看越生气，说："在她眼里还有谁，谁也不在话下了，竟背着政治局，背着我，连个招呼也不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⑪]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1月30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⑫]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⑬]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⑭]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⑮]

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16]

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是1974年3月20日。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1972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17]

此后，批林批孔已经演变为评法批儒。1974年3月18日。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18]

6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19]

6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20]

由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江青等人还歪曲

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他们煽动指挥下，到处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把政治空气又弄得很紧张。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拉山头，打派仗。一些人甚至散布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痪。

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21]

对国内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很少发表具体意见。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毕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经他批准下发的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文件，主要是强调要注意掌握政策，防止和纠正运动中的偏差，以及“抓革命、促生产”。[22]

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4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7月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这些规定，对已经发展起来的“批林批孔”运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和损失起了抑制的作用。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稍有收敛。

8月，他对李先念说：“现在是要团结、稳定。批林批孔联在一块，我看许多人对孔夫子不大懂呢。”[23]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974年底，四届人大召开在即。鉴于“四人帮”在民兵领导体制上另搞一套、扩建江青所说的“第二武装”、煽动派性斗争，毛泽东向周恩来、

王洪文提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这时，湖南的造反派也在组织“民兵指挥部”，准备冲击省委机关。毛泽东责令在全国解散这类组织，以稳定大局。经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发出《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出现的动乱因素。此后运动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

“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1974年1月~5月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3.7%。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五亿元，支出增加25亿元。

注释：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②毛泽东同张春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4日。

③毛泽东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1973年7月17日。

④据周恩来在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73年8月20日。

⑤耿飚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⑦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

⑧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⑨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⑩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⑪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⑫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⑬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⑭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⑯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⑰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

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⑲⑳“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1977年12月14日。

㉑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㉒中共中央在此期间下发的有关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1974年7月1日）等。

㉓毛泽东同李先念谈话记录，1974年8月20日。表露了毛泽东准备停止批林批孔的心态。

假借“批林批孔”掀起教育界动乱

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在教育领域，江青等人大搞反“复辟回潮”，反师道尊严树立“反潮流”典型，吹捧白卷大学生，鼓吹“朝农经验”。使教育战线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人打着“反击修正主义”的旗号，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反右倾回潮”运动又称为“三个月运动”。

10月11日~23日。国务院科教组在北京召开理工科院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143人。会议总结交流了搞好学校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的经验，研究了按照“五·七”指标和“七·二一”指示组织教学工作，进一步搞好开门办学，使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使学校同社会建立广泛和密切的联系等问题。迟群在会上讲话，说教育战线出现了种种“复辟”、“回潮”现象，“要警惕老的在新形势下复辟，”要警惕修正主义，要防止复辟。他提出，要抓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革成果，在教育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他并为科教组在9月召开的批孔座谈会辩解：“科教组开的那个批孔会是正确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科教组没有降调，谁降调谁负责。”并说：“反对批孔，就是复辟。”

随后，他们在领导阶层大揪“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在人民群众中大扫“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到处乱扣“裴多菲俱乐部”、“自由论坛”、“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反对七·二一指示”等大帽子。

此外，江青等人还派人进驻到清华大学的教研组和一些系，大搞“揭盖子”、“夺权”、“占领阵地”，搜查打击他们怀疑的对象。

在这次“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清华大学被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的教职工有64人，被点名批判的有403人。迟群还以“秦怀文”的笔名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的成果》和《再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文章把学校师生员工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对“教育革命”和“两个估计”的抵制说成是在教育界“出现了一股翻案风”，企图进行“反攻倒算”。文章还说，知识分子队伍中“暴露了一小撮右派”，要毫不留情地对他们进行“揭露批判”，进行“反击”。

迟群在清华大学发动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不仅对清华大学，而且对于北京及其他地区的高校都起了恶劣的影响。

为了达到“反右倾回潮运动”的目的，江青一伙大力推行所谓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力支持培植有“造反”精神的冒尖人物，树立了一些“反潮流”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

在这次“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江青等人制造了“小学生日记”事件。1973 年 12 月 12 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长篇的编者按语。

这个小学生是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黄帅和其班主任老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黄帅的家长就要黄帅写这封信。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断章取义摘编的。

这个材料先是刊登在《北京日报》的一个内部刊物上。迟群、谢静宜见到这一材料后，立即接见了黄帅，并由谢静宜指令《北京日报》加编者按语发表。

这个编者按语说，这个 12 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说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编者按并说，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的流毒远不止于此”。

编者按还说，全党全军及全国人民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希望人们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些“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到运动的对立面。

根据姚文元的“指示”，《人民日报》于 12 月 28 日全文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并再加编者按语，对黄帅的事大肆报道。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赞扬了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并提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

12月28日，《人民日报》又刊登所谓“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的报道。

在《人民日报》的宣传及江青等人的鼓动下，各地报刊、电台、电视台广为传播《人民日报》编者按等材料。国务院科教组还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以便更好地学习“黄帅的做法”。

于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有些地方还树立了本地的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

在这股浪潮中，学校为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所采取的种种管理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并受到江青等人及其爪牙的批评。一些学校又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还有一些学校的桌椅被拆毁、门窗被砸坏、玻璃被打碎。据统计，北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学校的玻璃被砸碎20多万平方米。学校财产又遭严重破坏。

《人民日报》转载《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赞扬黄帅“反潮流”精神以后，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反响。对黄帅的这种做法，许多群众不同意，不赞成，并提出了看法。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宣传干事王文尧、放映员恩亚立、新闻报道员邢卓三人，以“王亚卓”为笔名，给小学生黄帅写信。他们在信中对黄帅的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为此，1974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在“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黄帅复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的一封公开信，并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

革命小将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报纸上发表后，广大师生和群众都积极支持黄帅的反潮流革命精神，热烈赞扬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代新人茁壮成长。但是，也有人很看不惯，出来指责。王亚卓同志就是一个。黄帅同学写了信，对他的错误思想一一加以批驳，说得有理，驳得有力，值得一读。

这件事情反映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坚持革命，还是折中调和？是扶植和发展革命的新生事物，还是对它横加指责？这是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大好形势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教育战线广大师生要在当前的批林批孔斗争中，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肃清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黄帅复"王亚卓"的这封公开信在发表前曾经过迟群、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看过。迟群还在"王亚卓"的信上批上"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要革命就有反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等语。

江青对标题作了修改，并对发表这封信提出具体要求，认为版面要排突出些，内容要生动活泼些。

黄帅的公开信发表后，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人就被诬陷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代表"，遭到批斗和隔离审查，并被下放连队劳动。其家属也受到牵连。

一个12岁的小学生被江青等人树立为"反潮流英雄"，虽然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小学生黄帅的责任。

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后，北京内燃机厂的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黄帅写信。这位老工人在信中教育黄帅说："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意？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作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随着历史的演变，你肯定会明白这其中的原因。"这封信严肃地指出这一事件是有人在背后导演的。

与此同时，江青一伙抓住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借以在全国领域掀起"反复辟"浪潮。"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经过是，1973年7月10日下午，马振扶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

因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杨天成还要她作检查。之后，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7月12日初中班学生大会上要求各班对此事进行讨论批判。

张玉勤当日离校后未回家，而且其父母一直得不到她的消息。直到7月

14 日，她的尸体才在水库中被找到。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已作了妥善处理。:

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立即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河南重新进行所谓“调查”，并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蔑为“复辟回潮”的典型，还说张玉勤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是“凶手”。

后来，江青还借题发挥，在 1974 年 2 月的一次会议上又哭又闹，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女学生”，并且叫嚷着要向全国控诉。王洪文也帮腔说，要给学校的老师判以重刑。

1974 年 1 月 26 日，迟群、谢静宜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简报》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造成的。

1 月 31 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中共中央并要求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中共中央；同时提出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河南省委在接到文件之后，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被夺权，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并且被判刑两年。

中共中央转发《简报》后，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天奇、杨天成式人物”，共批斗了 280 多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这个文件的精神，组织学校师生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复辟”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中小学教师因此被打成“复辟”典型，有的被下放，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开除公职，有的甚至被判处徒刑。一时间，各校出现了学校领导怕负责任、教师不敢管学生的现象。因此，学生组织纪律松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的事情经常发生。学校秩序混乱。不少学校、班级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除此之外，江青等人还充分利用张铁生的“典型”作用，猛烈发动“反复辟回潮”运动，进而攻击周恩来。

李庆霖原是福建省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降职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任教，爱人是炊事员，家庭经济比较拮据。在“文化大革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李庆霖的子女到了福建最贫

穷的山区插队，生活也很困难。

李庆霖于1972年底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自己的处境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工、招生、招干工作中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等情况。毛泽东于1973年4月15日复信，并馈赠人民币300元。

毛泽东的复信于6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李庆霖一下子成了反映民意的英雄。

江青一伙便利用这件事，对李庆霖进行不切实际的宣传。李庆霖在宣传面前飘飘然，在1973年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亡发表《谈反潮流》的文章。

张铁生是196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担任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一心想上大学。1973年4月3日，国务院转批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选拔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

出于对周恩来的仇恨，江青等人看到《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大为不满。与江青等人勾结在一起的毛远新从辽宁专程前往北京，与江青等人密谋。他们诬蔑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的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

于是，江青等人要求毛远新拿出一些反对国务院这一决定的材料，决定首先从辽宁开刀。就在江青等人准备对学校招生工作提反对意见时，张铁生“白卷事件”发生了。

张铁生参加了1973年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在理化考试时，张铁生只答了化学部分第一题中的六道小题，只得六分。面对理化考卷，张铁生干瞪眼，却毫无办法。于是，张铁生就在试卷背后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白他的身份及对上大学的渴望。

张铁生在信中说，他自1968年下乡以后，始终热衷于劳动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但他对于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张铁生还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人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1973 年 7 月 10 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在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时，谈到生产队长张铁生答不上卷子给领导写信的事。毛远新得到消息后，如获至宝，当晚令人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速送来。

毛远新得到试卷和信后，立即决定在《辽宁日报》上加编者按语发表，同时派人对张铁生调查，得出“张铁生一贯表现很好，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发表了经过毛远新删改的张铁生的信，并附加了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但他在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编者按语中还说：“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二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对《辽宁日报》上张铁生的信进行转载，同时也转载了《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语，发表了评论。评论把张铁生吹捧为“路线觉悟高的答卷”、“反潮流英雄”。

张春桥大加喝彩，说文化考查这样搞法，把无产阶级寄予希望的青年卡在门外，使“修正主义有希望，无产阶级没有希望”。毛远新也跟着狂叫，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的时候，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随后，各地报刊又对《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加以转载。《文汇报》在转载的同时，还发起了“选什么样的人上大学”的讨论。《红旗》杂志、《教育革命通讯》也都以张铁生的信为引子，围绕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文化考查”这一问题发表文章、评论乙这些文章和评论都说，搞文化考查是对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

张春桥、迟群也乘机说，文化考查是“复辟”，“反攻倒算”。江青说，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一时间，《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成了“反潮流”的“代表作”。张铁

生则被封为“反潮流英雄”。这个被老师评为基础知识太差和没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张铁生，竟被破格录取到铁岭农学院，还担任了农学院的领导职务，之后又混入中国共产党，并当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张铁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江青等人利用，成了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但可以平步青云的恶劣典型。此后，全国刮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

周恩来为了稳定全国局势，忍辱负重，带病日理万机。然而，江青等人却向周恩来射出一支支暗箭。江青等人利用黄帅、张铁生等“典型”，在教育战线上大作文章，不停地向周恩来发难。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发表后不久，江青等人在上海的亲信搞到一份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个毕业学员的《谈话记录》。《谈话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毕业鉴定后的一些想法和面对分配的思想斗争。他们删改了《谈话记录》，把它弄成一篇反对“智育第一”的材料，并让这位参加工作的学员签名同意。

于是，江青等人以此展开讨论，说《谈话记录》提出来的问题，不仅对师大适用，对上海其他大学也适用；不仅对大学适用，对中小学也适用；不仅教育战线适用，对其他如文艺、出版、新闻、体育、卫生等上层建设、思想文化领域都有普遍意义。

经张春桥审定批准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为《谈话记录》所写的编者按语，于11月21日发表。随后，江青等人在上海的亲信对《谈话记录》提出的问题讨论了3个多月。

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与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及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的谈话中，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

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有许多人看不起儿童团，但是大家都是从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毛泽东还提议，在北京要把8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来考他们。

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的这次谈话，演出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

12月30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根据毛泽东关于要出题目“考教授”的谈话，对北京地区17所高等院校的631名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性的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方式进行抵制。

事后，科教组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发简报的方式，在《教育革命通讯》上发表题为《考教授有感》的署名文章等办法，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在此之前，辽宁对大学教授进行过一次考试。在北京“考教授”之后，上海、天津等地也先后仿效。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考教授”的事情，进行大肆渲染，对教授们大加贬损。把不同学科、不同专长的教授拉到一起考同样的试题，本来就是无稽之谈。而江青等人却在分数上大作文章，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以此来否定大学入学考试和其他考试的必要性。

“考教授”在各城市展开以后，“考试”被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冠以“右倾回潮”的“罪名”在教育系统大加批判。

江青等人在以这几件“典型”的事件大肆批判了反“复辟”以后，又在教育战线上发起更深层次的“评法批儒”和“儒法斗争史”运动。

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对“师道尊严”、反对“右倾回潮”这些口号的鼓动下，1974年初，中学生几乎像“文革”初期时的学生一样，重新造起反来。北京市中小学校玻璃窗上的玻璃几乎被砸得精光，教室里的桌椅板凳被砸坏的很多，学校无法安宁，教师无法上课。而江青一伙却赞赏说这是“和十八世纪工人破坏机器一样的革命行动。”在江青一伙看来，这是对周恩来整顿教育的最好回击，因而他们极力鼓动学生“反潮流”。

江青假借“批林批孔”发起在军队的放火烧荒

林彪事件以后的10月3日，军委办事组进行了改组，“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①]四人帮的军师张春桥由此进入了军界，成为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领导者，这为四人帮在军队中推行极左路线创造了条件。同时江青、姚文元也成为了国务院文化组的领导者，为他们制造舆论，乱党乱国提供了组织保障。

1973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给江青一伙提供了乱军夺权的机会，以此为契机，江青一伙假借批孔将目标对准了军委的领导人。

姚文元在1973年12月3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讲到秦始皇，都把打仗归功于手下大将，要批驳一下。这个观点同说“打仗是林彪的功劳、彭德怀也‘吹’是他的功劳”是一样的。秦统一六国的文章，可以写，要找人写出来。

《红旗》编辑组中江青等人的追随者马上把这个题目列为“重点”，决定找个“比较得力的省”的作者来写，并选中了辽宁。在交代任务时，这些追随者强调说，这篇文章要“有很大的现实意义”。2月16日，姚文元在稿子被写出来后，又要《红旗》编辑组的人“研究一下”，文章“开始如何和批林挂上”。

3月3日，由姚文元亲自布置，由辽宁大学“李时”写的题为《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74年第三期发表。这是一篇以批秦大将王翦为名，实在猖狂反军的“黑文”。文章写出初稿后，“罗思鼎”还对这篇文章提了意见，并进行了修改。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文完全是按姚文元的要求写成的。

在历史上，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六国，是有他的历史功绩的。但秦始皇手下的大将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也起了不小作用。这篇文章为了满足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荒谬地把肯定秦始皇同肯定他手下的大将对立起来。

这篇文章一方面伪造历史，神化秦始皇，表面上是用这个封建帝王来影射、比附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是在给毛泽东的光辉形象抹黑，手段极为卑鄙；另一方面，在“肯定秦始皇”这个盾牌下，借“批判”大将王翦，放肆地对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干部进行影射攻击。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开头就别有用心地把某些同志肯定王翦的作用，与“地主资产阶级中的尊孔派竭力抹煞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和林彪借咒骂秦始皇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

文章着意渲染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

江青等人甚至指使其控制的文人公然篡改历史。

《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一文说，公元前224年，秦始皇为了灭掉实力比较强大的楚国，再次召回王翦，要他带60万大军击楚。王翦开始推辞不干，勉强答应后，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后来，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此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

这段历史，《史记·王翦列传》里有明确记载，秦始皇起先低估了楚军的实力，不听王翦要派60万大军的建议，结果打了败仗。这才“复召王翦”，并同意由他带60万大军攻楚。而王翦所以一再请求赏赐田宅园池，他自己解释得很清楚而且合理，是因为秦始皇比较多疑，王翦向秦王多要些田宅是为了解除秦始皇对他的怀疑。

李时捏造这段历史，完全是为了影射攻击紧跟毛泽东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

文章恶狠狠地说，政治路线对了，将领的作用可能得到发挥；政治路线错了，将领就不能发挥什么作用了。不仅英雄无用武之地，甚至还会垮台。

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读者的批评。广大读者指出，这篇文章牵强附

会，观点错误。有的读者痛斥这篇文章是以借古讽今的手法影射现实，极其反动。

但是，姚文元后来在6月5日对《红旗》编辑组召集人说，有人提出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整个观点是可以的。

同时，"康立"的《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一文，也发表在《红旗》杂志1974年第三期上。这篇借批"宰相"，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是1974年初姚文元在上海亲自授意"罗思鼎"干的。文章的不少段落是姚文元亲口讲的。这篇文章先以《孔子和儒家之徒是一小撮政治骗子》为题，在《学习与批判》1974年第二期上发表过。

《孔子和林彪都是政治骗子》一文歪曲《汉书》作者班固对汉元帝的评论，说汉元帝用的宰相都是"儒家"，结果汉朝的政治越搞越糟，元、成、哀、平4朝，一代不如一代。"尊儒的结果，是西汉的灭亡"。

这篇文章还说，"儒家之徒"都是"政治骗子"，并且别有用心地在"信"字上大作文章。

早在1972年9月，周恩来在中日建交时曾题词，"言必信，行必果"。"康立"却在这篇文章中大书"大凡政治骗子，在骗人时都道貌岸然，信誓旦旦，装得一本正经"。孔子和儒家之徒，明明是一批"说假话的专家"，但是在嘴上挂着的，或者在公开文书中写着的，总是一个"信"字。

江青等人就是用这种卑劣的手法，抓住和控制了宣传舆论阵地和工具，恶毒影射攻击周恩来。但是，江青等人也深知，仅此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夺取专政工具，特别是夺取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权。

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打着毛泽东的旗号，一方面积极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维护"文化大革命"；另一方面大搞阴谋诡计，进行反对周恩来的活动。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活动的主要意图就是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在1974年一二月间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写信、送材料，还向迟群等人散布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并说迟群等人是她的"炮队"。

1974年1月13日，江青以个人名义把迟群、谢静宜等人找去谈话，派他们分别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

23日，江青致信吴德："我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代表我祝同志们春节

好！此外，送你们文化组《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辞简释》各200份，并请她（他）们宣读。另外，附《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批孔文章汇编》各20份，供同志们参阅。材料不够，但是你们可以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1月24日，江青还背着毛泽东和党中央，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等写信说：

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简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会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简释》各200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

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常恨隋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同一天，张春桥也批示“建议军委商议一下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24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组织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在上述会议上，江青等人俨然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会上，迟群、谢

静宜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他们介绍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产生的过程和“反复辟”的主题，强调“批林批孔”要联系现实。迟群说：“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河南唐河县马振扶中学“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

提出“走后门”问题，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要利用人们对“走后门”等不正之风的不满，整倒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领导干部。江青一伙是以“批林批孔”为名，把矛头对着周恩来和党政军领导人。

会后，江青等人就到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庆功宴”。他们还通宵达旦地整理讲稿，审查大会录音带，准备下发。

秘书们连夜突击，到1月26日上午就把记录整理好了。周恩来把秘书整理出来的大会记录仔细地看了一遍，重要的地方还用红笔画了横杠，然后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周恩来把这封信连同大会记录都装在一个大信封里，立刻派机要通信员送给毛泽东。

当天下午，毛泽东认真地看了“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感到非常气愤，他认为这完全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1月30日，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也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了自己对“批林批孔”运动动员会的看法。

2月15日，毛泽东对叶剑英的来信作了批语，并且复了信。毛泽东在复信中说：“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 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毛泽东并扣留了江青等人精心炮制的准备散发到全国的“一·二五”大会录音带。后来，毛泽东把“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叫作“三箭齐发”。

毛泽东虽然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但是并没有取消“批林批孔”运动。而这时，“批林批孔”运动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已在全国蓬勃发展起来了。

江青虽然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但并不甘心失败。江青到处“放火烧荒”，用个人的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鼓动“批林批孔”，想方设法插手军

队事务。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说：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的信上，针对江青等人的言论写了批语：“现在，形而上学猖獗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召集于会泳、陈亚丁等人开会，以听取汇报为名，把矛头对着人民解放军。江青说：“今天我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陈亚丁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看来要夺权，陈亚丁你去把权夺过来嘛！我看军队的文化工作还是让陈亚丁管起来。”“放火烧荒，你们去3个人，去放火嘛。”

会上，江青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例如，“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不许普及样板戏”、“有错误批评不得”、“我们的话根本不听”等等。为了整军队，江青还诬蔑攻击各级领导干部，骂这个是“军阀”，骂那个是“坏人”。

在江青发出“放火烧荒”的号令后，江青及其跟随者们便一齐上阵，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3月13日，张春桥在听取解放军总后勤部汇报时说，对有些问题，不能怕“派性”，甚至只有靠内战才能解决。

3月15日，王洪文攻击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维持会”。王洪文还说，如果真的打起仗来，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

3月17日，陈亚丁擅自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单位的负责人开会，传达江青3月5日的讲话，布置在军队“放火”、“夺权”。

与此同时，3月6日，王洪文在总参谋部讲话，要求揭开总参的“盖子”。他说：“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3月下旬，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几个总部多次运动盖子没有揭，人换了路线没有换，修正主义路线没变。”“四人帮”把矛头直接指向军队。

为了夺权，为了控制武装，江青一伙在军队碰壁后，开始大搞第二武装，妄图通过组织由造反力量控制的民兵武装来实现其夺权的目的。

江青对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早就感到十分气愤，但没有办法，因此一直对军队问题感到忧虑。

虽然张春桥为总政治部主任，但江青认为，从表面上看，军队是她们和周恩来平分天下，但一召开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占着绝对优势。周恩来的势力要比她强大得多，张春桥在中央军委里面是孤掌难鸣。

江青对与周恩来的决战，充满了恐惧，担心军队不站在自己这边。因此，她要千方百计抓军权。

为此，江青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找来讨论下一步的打算。

张春桥说："我虽然名义上是政治部主任，执掌着全军的人事大权。但在任命重要领导干部方面，我一点权也没有。军委常委一开会，他们是多数，人又熟悉。背后又有周恩来的控制。我是一个光杆司令，抗衡不了他们。军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致命的弱点。"

江青说："我们搞第二武装吧，造反派还是听我们的话的。"

王洪文立即表示同意江青的意见。王洪文说："把民兵组织起来，发枪支弹药，要现代化的，机枪、大炮，甚至火箭，都要齐备；要进行军事训练。到关键时刻，一声号令，这些民兵就能拉出去与叶剑英的正规军决一死战。"

江青接过王洪文的话，说："我们要两路进攻，不能让叶剑英安静了，要让火烧荒，鼓动军队的造反派闹腾一下。"

江青等人的这次秘密会议，决定了他们要进行"放火烧荒"，表面上鼓吹"批林批孔"，实际上却是为了夺取军队的领导权。

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江青等人要篡党夺权，自然要极力从中央军委手中夺取军权。可是，军队不听江青的。对江青来说，军队是一块"荒地"。于是，江青企图利用"批林批孔"这把火，来一个"放火烧荒"，从而把这块地盘夺下来。

在"放火烧荒"这个指导策略的指引下，江青等人到处写信，送材料，煽风点火。江青先后给空军、海军、军委、国务院文化组、二十军防化连、南京军区、广州军区等单位写信，鼓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13，江青以个人名义给空军司令员写信，要求"批林批孔"。江青在写给空军司令员马宁的信中说，听说"空军批林批孔有些困难"，请苏元勋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

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各100本，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江青在信中说，苏元勋一向受林彪死党吴法宪的压制，“九·一三”事件以后才引起大家重视。托他去传达，请指定一个连队，请苏元勋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告苏元勋同志转告我”。

为了切实抓住军权，江青等人除了四处乱发信件外，还到处召开会议，污蔑中央军委领导人。

江青等人进行“放火烧荒”的一个突破口是破坏《解放军报》。《解放军报》于1974年1月17日，在第三版《党的生活》专版中，刊登了一篇不足1 500字的短文，题目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短文主要介绍了在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教导下，空军某厂党委搞好党委团结的经验。

江青等人看到这篇短文后，非常不满。江青首先表示要派几个人到解放军报社去。张春桥说，《解放军报》1月17日有篇文章，“怪得很”，要写文章批评。王洪文也附和说，这篇文章“很坏”。

江青等人通过其爪牙，派人到一个连队捉刀代笔，盗用连队战士的名义，给《解放军报》写了一封所谓“揭发信”。江青和姚文元都批示这一“揭发信”要发表。

“揭发信”发表后，王洪文下令解放军报社要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解放军报社阶级斗争的“盖子”。

此后，江青等人就接二连三地找军队的岔子，今天指责宣传某个连队的报道是“和中央唱反调”，明天批评把两条批孔新闻摆在一个版上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连队，要他们“眼睛盯着《解放军报》，挑他们的毛病”。

江青等人还公然破坏中央军委关于稳定部队、部队基层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唆使一些人以连队名义轮番到解放军报社贴大字报。他们对解放军报社上下夹攻，内外夹攻，百般刁难。

到3月中旬，江青等人见时机成熟，就由张春桥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下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稿件。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被迫变相停刊五个多月。

江青等人之所以抓住军队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短文大作文章，其用心就是借此来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

早在1973年5月，空军在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后，对党委领导班子进

行了整顿。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党委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解放军报》在 1974 年 1 月 17 日发表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短文体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空军讲话时，江青等人也在场。因此，张春桥在炮制“批评意见”时，曾说到，最近“又有什么人讲了话”，以此含沙射影地向有关人员暗示，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周恩来。

江青等人在军队中的猖狂活动，很快被中共中央觉察了。3 月 20 日，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对江青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在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 月 21 日，王洪文、张春桥带着陈亚丁，当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演出了一幕掩盖抵赖、丢卒保帅的丑剧。陈亚丁承认是自己乱说乱传，把江青到军队“放火烧荒”的罪行全都承担了下来。

至此，在毛泽东批评下，由江青等人为夺取军权而发起的“放火烧荒”就这样结束了。

注释：

①《中共中央通知》，1971 年 10 月 3 日。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1974年2月，这一理论以我国政府的名义向全世界宣布，则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之所以此时提出这一理论，是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希望改变我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处理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更大地所发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与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团结起来。

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开始调整外交策略方针，先后同美国、日本开展了友好合作，毛泽东十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对亚非拉各国间的国际关系问题十分关注。在中国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前的1974年前后，这成为这一时期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1974年2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谈话。

他对卡翁达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他对布迈丁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①

其实，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思考得出的。探究这一理论的由来，它是随着毛泽东对世界大势不断深入研究，历经“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总结而得出的。

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里，毛泽东不同意世界战略格局中“二分世界”的方法，提出

了“三分世界”的观点。

在毛泽东看来，二战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充满着民主势力与反民主势力，美国是反动势力的堡垒，积极推行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扩张政策，叫嚣美苏战争，而苏联是世界民主力量的主要柱石。在这两大战略力量之间，存在着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进一步谈到，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所以，“中间地带”国家与美国的控制和反控制是世界矛盾斗争的焦点。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上，是美国企图控制的主要亚洲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将打破美国全球战略的布局，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深刻揭示了当时世界政治斗争的本质，指出了虽然战后美苏对立的局面正在形成，但世界主要矛盾还不是美苏矛盾，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因此，“中间地带”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毛泽东实际上希望，以各国的独立自主和民族解放运动来牵制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为此他说：“只有这个斗争胜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才可以避免，否则是不能避免的。”这一理论从根本上明确了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指明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确立“反美倒蒋”战略的理论基础。同时，这一理论突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反映了中国革命与战后美苏对峙格局和它们两国的关系，包含着不赞成苏共限制中共发展的政策。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从“中间地带”理论的逻辑出发，选择了站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的“一边倒”战略。但是，当时相当多的民族主义国家，在挣脱殖民统治之后，仍维持了它们对两大阵营的中立立场，形成了一股中间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如何争取这股中间力量的问题便凸显出来。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发生了两件大事对世界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表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在崛起；二、1956 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西方阵营内部英法和美国的矛盾。正是这些事件，引起了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的重新思考，并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

1957 年 1 月 27 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就苏伊士运河事件指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



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

1958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中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么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么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耳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1963 年 9 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②]

“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在这里，毛泽东从世界战略关系的视角指出，在美苏之外的国家都是中间地带，中间地带按照经济发达与不发达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国家，一部分是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国家都与美苏有矛盾，随着它们自身力量的发展，日益成为一支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力量。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和“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奠定了基础。1963 年 10 月毛泽东对巴卢库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不久，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国家，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1964 年 1 月，毛泽东在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

同时也反映了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结束了长达20多年的敌对状态，两国寻求建立对抗苏联的战略关系。1973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第四次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提出了关于“一条线”的战略设想。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所谓“一条线”，就是依纬度划一条横线，建立连结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这种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表明了毛泽东对国际战略问题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即放弃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的思维方式，突出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重要地位，表现出毛泽东处理重大国际问题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为此后的“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提供了必要的认识前提。

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不仅改变了战后两极体系的观念，突破了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同时战略地指明了中国外交将以反霸权为主

线，团结第二世界，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也为中美关系的恢复、中国外交空间的拓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理论向世界宣告是在一个多月以后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阐述了这个理论的中心思想，表明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遵循的立场。

1974 年 3 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选定邓小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3 月 31 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4 月 2 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这些文件。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 4 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③

4 日，毛泽东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6 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

4 月 10 号下午，邓小平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大会场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这篇精心准备的演说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

面对 100 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在报告中分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现实状况。他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

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像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在发言中，运用“三个世界”的理论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出了中国政府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个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等等。

邓小平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

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邓小平，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当时舆论评论说，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1974 年 9、10 月间在武汉的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④]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酝酿成熟的发展轨迹，“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注释：

①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②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③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

④《毛主席指示要点》，《中央讨论文件》（1974）3号，中共中央办公厅1975年1月3日印发。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阐述中国的政治主张

1974 年 4 月 9 日，联合国总部将要召开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次会议是由阿尔及利亚以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执行主席身份倡议召开的，也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大会，因此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百多个国家的赞同和支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

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 2 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1974 年初，周恩来总理身患重病，不宜远行。3 月中旬，外交部领导开始酝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当时，中央政治局在讨论代表团团长人选上还进行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初设想是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三个人中选出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方便的时候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3 月 19 日，王海容向毛泽东汇报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时，毛泽东稍作深思后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

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就将毛泽东的意见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 月 22 日，外交部向周恩来报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乔冠华、黄华同志为副团长出席大会。随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人选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提出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并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在会上，江青公开表示反对，她认为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虽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因为江青的阻挠，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人选的会议没有形成结果。第二天，周恩来总理不顾江青的反对，提笔在外交部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并将批示文件各政治局成员传阅。

24 日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3 月 24 日，毛泽东圈阅同意外交部所提方案后，外交部又将此报告送其他中央领导审阅。就在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当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两人叫到她住的钓鱼台十号楼，对外交部的请示报告进行了无理指责，并强令外交部收回请示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王海容对江青说，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联大特别会议，已经有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亲自出席大会，何况外交部的请示报告已经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和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外交部无权收回此报告。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

害怕邓小平在国内外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扩大后，打乱自己篡党夺权阴谋的江青并不死心，3 月 25 日夜，她又连续四次给王海容打电话，继续威逼要外交部马上撤回请示报告。王海容在阐述不能撤回的理由后又补充说：“我只是主管礼宾的，凡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的报告，都不能撤回。”江青听后，恼羞成怒，大骂王海容说：“你昏了头，脑子僵化。”

王海容意识到江青可能还要继续纠缠，于是在 3 月 26 日上午即向毛泽东报告了江青四次电话威逼，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果政治局的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

王海容随即将毛泽东的话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迅速将毛泽东的这个意思转告给了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同时，周恩来决定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人选。

3月26日晚，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阐述了由邓小平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理由：第一，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正义事业；第二，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第三、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还说："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泽东的意见。同时，还说会议要开三周，小平同志可只出席头一周，除讲话外，与各方重要人物进行接触，创造局面后便回。

政治局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周恩来又叫王海容、唐闻生前来列席。她们刚刚进入东大厅，江青就质问王海容：邓小平去联大参会，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外交部的意见？王海容回答：请示报告是外交部写的，已经周总理批呈毛主席圈阅同意。主席今天上午还说小平同志出是他的意见。

休息时，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叫到东大厅的小房间，再次施加压力，要外交部撤回请示报告。她还说，国外的事情相对次要，邓小平要留在国内等等。王海容、唐闻生对江青的纠缠和压力开始保持沉默，但江青从小房间回到会议室后，大吵大闹，蛮横无理地训斥王海容、唐闻生。于是王海容就在会议上同江青争执起来。

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中除江青外均一致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即便这样，江青仍不罢休，叫嚷着"要重新考虑，我要保留意见，主席是允许保留意见的"。她还企图要周恩来在报告上写上她的保留意见。王海容、唐闻生看到这种情况，连夜将政治局会议及自己当场顶撞江青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①江青收到此信后，目瞪口呆，不敢再纠缠此事。同时毛泽东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转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联合国开会还是小平去，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不同意就拉倒！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毛泽东的决策，打破了江青企图阻挠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图谋，迫使她收敛了在政治局嚣张跋扈的气焰。当天晚上，王海容、唐闻生陪周总理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外宾时，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写信批评江青的事。周恩来说："怪不得，江青打电话对我说，她已改变了态度，支持小平同志出国。原来是你们向主席反映了情况的结果。"

人选一事敲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 27 日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由于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高层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如何漂亮地亮相关系到新中国的外交形象。因此邓小平在接到中央的任命后，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准备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工作之中。

3 月 31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修订了"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和对外政策的请示"及讲话。

60 年代，邓小平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同苏共进行过谈判，有着丰富的国际斗争经验。他对参加准备工作的同志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亲自指导代表团成员准备发言稿。代表团在讨论发言稿时，觉得除了明确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代表团把这个想法向邓小平汇报后，邓小平和代表团成员一起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并认真听取每个同志的发言。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邓小平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时，参加起草工作的凌青记下这几句话后，邓小平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句话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这也充分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4 月 2 日，周恩来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预定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当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没有出席，王洪文虽出席但显得无可奈何，也没有提出异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附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毛泽东阅后批示："好，赞同。"

4 月 6 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离京赴纽约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

别会议。周恩来总理破例亲自率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四千多人到机场送行。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4月10日下午，在一片关注的气氛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面对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和众多记者，邓小平从容不迫地开始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提出的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并论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代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是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而且永远不称霸。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邓小平还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指出，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

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绝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郑重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邓小平的讲话，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和世界舆论的赞扬与好评。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与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也纷纷报道邓小平的发言。一些媒体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代理人”。

随邓小平同志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的解廷勇回忆说，当晚，阿尔及利亚民主共和国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举行招待会。小平同志和布迈丁主席握手之后，布迈丁主席问小平同志：“我的老朋友周恩来身体好吗?”小平同志回答：“很好！我从北京启程，他还到机场送我。”接着布迈丁问：“你发言了没有？讲了什么问题?”小平同志说：“讲了三个世界的划分。”布说：“有没有第四世界、第五世界?”小平同志诚挚而坚定地说：“归纳三个世界好。”当时，尽管有一些国家不太理解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历史的检验，三个世界划分，如今早已被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就连美国和苏联也接受了。

会议期间，邓小平还会见了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阐明我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这次大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取得了成功。

4 月 19 日，邓小平率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代表团回国。邓小平这次率团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不仅增进了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且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也奠定了邓小平作为一名国际政治活动家的重要地位。“邓小平”这个名字从此被国际社会广为关注。

1974 年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进一步向全世界阐明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中国外交史上闪光的一页。

注释：

①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 年 3 月 27 日。

严厉批评四人帮阻止江青的组阁企图

1973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一落下帷幕，四届人大再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的代表大会完成了党的中央机构和组织的人事安排，人民代表大会要完成国家组织机构的人事安排。

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召开四届人大。然而由于江青等人的野心膨胀，意欲组阁，使这次的筹备工作变得十分艰难，由此，围绕四届人大的筹备展开了复杂的斗争。

江青的组阁企图包括了打击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老干部，具体包括了掀起批林批孔、阻止邓小平参加联合国大会、批判所谓的走后门、制造风庆轮事件等。江青的组阁企图还包括了安插亲信，提出组阁要求等。这一系列的动作，由于有了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有了周恩来的抵制，最终未能得逞。

批评四人帮。1974年7月17，身患多种疾病的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开会。包括才做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

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用严肃的口吻批评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又说："你也是难改呢。"他还指着江青向在场的政治局成员表示："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四人）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泽东在会上两次郑重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点名批评江青，并且话说得那样重，点出了"四人小宗派"的问题。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但他还留有余地。在主要是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在会上也说了"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政治局会议结束的当晚，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北京。

九大以后，特别是1972年以后，为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毛泽东开始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在周恩来的协助下，通过打招呼，下指示，安排出席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确定出席国庆招待会人士的名单等各种形式，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获得了解放，开始走上工作岗位。

1974年国庆节刚过，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毛泽东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②毛泽东圈阅了这个报告。他本来早就在催问四届人大能不能在本年内召开，并且得知主要是人事问题。当天下午，他就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一项重要决定。

由于毛泽东年迈多病，周恩来病势日重，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对今后全国大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一直谋求在四届人大“组阁”的江青等人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事情很清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是对江青一伙“组阁”计划的致命打击，是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却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进行了通报。③

江青等还力图插手军队的人事安排。10月6日晚，江青赶到周恩来住的医院，向周提出她对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谈军队总参谋长的人选。周恩来对江青所提“方案”始终不作任何表态。在纠缠了整整两小时后，江青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回。一到住地，她就向王洪文“声明”要“保留提名观点”。她还称：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④

在离开武汉南下长沙前夕，毛泽东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在这个文件里，传达了他在武汉期间所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后来，他又谈到：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⑤

毛泽东这些言论，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他希望全

国上下不再发生大的变故，特别是中央内部应该团结一致，以便在近期顺利地召开拖延已久的四届人大。

毛泽东刚到长沙不久，就发生江青等策划的“长沙告状”事件。

10 月 14 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国产“风庆”轮的报道（即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这是 10 月 12 日由姚文元批交新华社刊登的），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江青立刻写下大段批语，向国务院及其所属交通部门提出质问，称：“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要求抓住“风庆轮事件”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⑥]

很明显，不过是借题发挥，想通过“风庆轮事件”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它的背景，仍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

对江青的蓄意挑衅，周恩来、邓小平不予理睬。在江青要求政治局成员传阅的批件上，周、邓没有作一个字的表态。这使得江青等十分难堪。

10 月 17 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当会议快要结束时，江青突然又提出“风庆”轮问题，强迫在场的邓小平表态。邓小平驳斥了江的指责，表示：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能搞强加于人的做法。他原来坐着，后来站起来说。理屈词穷的江青竟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这件事就发生在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后十多天，格外引人注目。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密谋。江青提出要王洪文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力图阻挠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⑦]

18 日清晨，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的指示。因为书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信的最后又说：“附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⑧]

当天上午，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擅自飞赴长沙。他一见到毛泽东，便称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按照同江青等商量好的口径，诬告北京现在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还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9]

王洪文在信中说的“我们几个同志商量”，并附江青的三个材料，又说“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毛泽东一看，早已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十分不满。听王洪文讲完后，他立刻严厉地批评道：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0]

10月20日，毛泽东通过陪同外宾前来长沙的王海容、唐闻生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指周恩来）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他特别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这样，邓小平除担任第一副总理外，还要兼任总参谋长。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11]

江青等的“组阁”图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毛泽东更明确地表明将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以及总参谋长的职务，分别交给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郑重说明：这些问题，几天前王洪文来长沙时还没有这样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纪登奎回忆道：“毛主席的批评，王洪文始终没有向政治局传达。”“总理对我说：告状没告下来，给了三个职务。”[12]这样，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大局已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受到毛泽东批评的王洪文，这时已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

11月6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执行毛泽东10月20日的指示，“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我的身体情况比7月17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13]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已阅。同

意”。[14]

同一天，陪同外宾去长沙的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这些意见。他讲到“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时，毛泽东说：“我拥护叶剑英同志的意见。”李先念说：“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开一个会，问题就完全解决，不可能。”毛泽东说：“王母娘娘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请她吃了一顿饭，现在又是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请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15]

几天后，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见毛泽东。毛泽东问起10月17日邓小平愤然退场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毛：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

毛：我赞成你！

邓：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毛：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16]

同一天（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写给他的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17]”毛泽东这些批语，由于眼睛看不太清，写得歪歪斜斜，有些字还重叠在一起，难以辨认，但他是十分郑重地对待的。

11月19日，江青又给毛泽东写信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今后当小心谨慎，不能为党为主席闯祸。当然，需要斗争需要牺牲时，我要有精神准备。"[18]

第二天，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道："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至嘱。"[19]

由于毛泽东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二把手还在"再考虑"中，江青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提名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20]。毛泽东还托人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江青等人不但不能"组阁"，也不能担任党中央和全国人大的主要领导人。

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邓小平说："四届人大正在搞名单，20日可以完成，准备先送给主席看了以后，总理和洪文来一下。"毛泽东说："可以。"[21]

12月下旬，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下，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和《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都已完成。

最后提出一个准备在四届人大上产生的委员长、副委员长和总理、副总理、部长的名单，是总理亲笔写的。12月20日凌晨，他叫国务院值班室主任吴庆彤去，把他写的名单送到国务院印刷厂印成清样，然后将原稿交回烧掉。他还交代把印出的清样交给他，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一人一份。"[22]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带着名单飞往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准备情况。

12月23日下午坐飞机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24日，在毛泽东的住地，周恩来、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多住几天。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作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又提出：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他问周恩来："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又告诉周恩来："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当周恩来讲到他设想的总政

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笑着说："罗荣桓。"[23]从这天起到27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进行了三次谈话，又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鉴于江青等变本加厉地大搞帮派活动，毛泽东再次警告王洪文："'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并且是向政治局正式提出来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他说："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政府（组阁）。"毛泽东还对江青等以"第十一次路线错误"攻击周恩来，以及借"批林批孔"大批"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要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在批评"四人帮"的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邓小平，称赞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嘱咐周：你身体不好，人大开过后，你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邓小平去顶。他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当谈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毛泽东问到邓颖超，周恩来解释后，毛泽东没有再提意见。他还嘱咐"问候郭老"（指郭沫若）。[24]

临别时，王洪文又对毛泽东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登奎有国务院，还管组织部、中联部。文元管出版、宣传。春桥管党务、五卷。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回答："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读《参考》（指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两本。我也是啊。"[25]谈话到此结束。

周恩来回到北京，亲自整理出毛泽东的谈话要点，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关于毛泽东对江青和"四人帮"的批评，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讲，还在会前先对江青本人谈了。

江青在第二天写信给毛泽东说："昨天晚上政治局开了会。会上由总理、洪文同志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和对我的批评。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我希望人大之后离开北京，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我低温很久了，脑力有突变的危险——一切都遗忘。"[26]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江青：不要来看我。有病文件可以少看。我已印两部文学史（指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两册），暇时可以一阅。"[27]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下旬，江青不顾毛泽东月初“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飞往长沙。毛泽东见到江青时表示：“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接着，他重复了过去批评她的话：“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㉘江青一无所获而归。

毛泽东的谈话，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75年1月13日～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重新展示了1964年12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这都给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新的希望。

注释：

①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谈话记录，1974年7月17日。

②王洪文给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圈阅的原件，1974年10月4日。

③④⑦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王洪文、姚文元时王洪文的供词，1980年11月2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93页，第120页，第93页、第94页。

⑤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谈话要点，手稿，1974年末至1975年初。

⑥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在《国内动态清样》（1974年10月13日）上的批语，1974年10月14日、26日。

⑧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原件，1974年10月18日。

⑨据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青时王洪文出庭作的证词，1980年11月26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年4月版，第119页、第

120 页。

⑩据张玉凤 1980 年 7 月 18 日提供的证言（节录）。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纪实》，群众出版社，1982 年 4 月版，第 94 页、第 95 页。碰了壁的王洪文当晚便返回北京。

⑪毛泽东口述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传达记录，1974 年 10 月 20 日。

⑫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 年 10 月。

⑬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4 年 11 月 6 日。

⑭毛泽东对周恩来汇报信的批示，手稿，1974 年 11 月 6 日。

⑮毛泽东同李先念的谈话记录，1974 年 11 月 6 日。

⑯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 年 11 月 12 日。

⑰㉗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 年 11 月 12 日，1975 年 1 月 4 日。

⑱㉖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 年 11 月 19 日，1974 年 12 月 30 日。

⑲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语，手稿，1974 年 11 月 20 日。

⑳毛泽东同王海容、唐闻生的谈话，1974 年 11 月。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976 年 10 月 18 日）

㉑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4 年 12 月 17 日。

㉒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 年 10 月。

㉓㉕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记录，1974 年 12 月 24 日，1974 年 12 月 27 日。

㉔周恩来起草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手稿，1974 年末至 1975 年初。

㉘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年 9 月版，第 152 页。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曲折筹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1970年3月筹备工作开始，到1975年1月大会正式召开，筹备工作历时近五年时间。其间，在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政变阴谋，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艰巨的斗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期的规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于1968年至1969年内召开。然而，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问题一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四届人大会议多次提出多次推迟，筹备工作也时断时续。

中人九大以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从1970年3月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当时，国内局势趋于平缓。毛泽东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还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毛泽东的意见，表明他力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尽快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愿望。按照中央工作的预定日程：1970年3月17日~2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当时曾预计于1970年9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即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举行。

然而，宪法修改草案讨论过程中关于“国家主席”以及所谓“天才问题”的争论，酿成了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上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厮杀”。会后发表的公报仍引人注目地公布了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信息”。只是由于庐山会议暴露出来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实际上已暂时搁置。

从庐山会议林彪集团暴露到“九一三”事件林彪一伙自取灭亡，全国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四届人大具体的准备工作被迫中断。这期间，周恩来全力辅助毛泽东，开展了整顿工作，从思想上、组织上清理文革中的错误，大力整顿社会和经济秩序。周恩来亲自谋划，让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恢复工作。包括邓小平的复职及工作安排。

首先，注意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在舆论宣传方面的“左”的倾向。1971 年 1 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陶铸签发的一份党中央文件（内容是关于毛泽东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一些指示）上批道：“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同年 5 月底，周恩来在一次全国性会议上作长篇报告，批评对外宣传特别是对党的历史和领袖宣传中存在的大量虚假夸张、强加于人的现象，强调对这些不正视历史、不实事求是的宣传要当场给予纠正，并承认错误。周恩来的这些认识，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极左言行包括对个人崇拜问题的一种反思。

其次，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分裂。庐山会议期间，在陈伯达等人事发后，周恩来对陈伯达及有关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后，他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试图教育挽救黄永胜等人。当林彪一伙终于走上与党和人民为敌的道路时，周恩来义无反顾，当机立断，直接领导指挥了同这伙反革命集团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全力维护了党、国家和军队的统一，避免了一场大分裂、大内战。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这里讲的“真正的内战”，就是“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大打”，就是分裂。[①]

第三，采取措施，稳定政局。林彪事件后，党中央下达一系列文件，在全党全国开展“批林整风”，旨在统一人们的认识，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进而稳定全国政局。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直接领导清查与林彪一伙有关的人和事，使之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稳妥解决。1972 年 5、6 月间，党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周恩来向与会党政军高级干部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长篇报告，站在高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以现身说法阐明确立毛泽东作为

全党领袖、毛泽东的路线作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对历史上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严厉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剖析。周恩来在这个时候作这样的报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有利于增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团结、稳定的大局。

第四，积极“解放”干部。在初步稳定政局的基础上，周恩来抓住历史契机，提出进一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尤其注重党的干部政策的落实。1970 年在进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已开始做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他曾向毛泽东建议安排张闻天、王稼祥等当人大代表。同年 7 月，他亲自起草国务院《关于张霖之同志死亡处理意见》，在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为这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冤逝的国务院部长平反。规格空前的陈毅追悼会，在党内外产生巨大影响，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广大老干部的深深的慰藉。经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②]同年下半年，毛泽东作出关于邓小平问题的批示，周恩来迅即传达贯彻。

总之，尽管林彪事件干扰和推迟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正常进行，但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努力，则为这次会议的最终召开扫除了一大障碍，同时又不失时机地为会议的关键问题——人事安排做了必要的准备。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 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一个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③]

第二次提出和受到极大的干扰。随着林彪集团的垮台和批林整风的开

展，四届人大的工作又重新排上了日程。1973 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 8 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了出来。[④]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闭幕不久，周总理和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9 月 12 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在近期内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开始进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时，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总理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张春桥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纪登奎担任组织工作小组组长。

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受到严重干扰。

面对干扰破话，周恩来考虑更多的，是极力保证四届人大的组织路线的正确，尽量解决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问题。

首先，抵制“四人帮”的组阁企图。从这一年 3 月到 12 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1973 年春，在周恩来直接安排下，邓小平回京复职，由此带动、加快了一大批老干部“解放”的进程，形成一种由老一辈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重新进入领导岗位、继续掌握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舆论氛围。周恩来这一时期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努力，实际上也是在具体批判和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的极端做法，为最终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和运作机制创造必要的前提。

周恩来高度重视邓小平复职以后的工作安排问题，亲自宣讲、落实。使邓小平顺利接替自己主持工作。并鼓励老干部坚持斗争。

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

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10 月初，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确定了接替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表明四届人大已经进入“组阁”的关键时刻。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10 月 14 日，江青看到有关风庆轮的内部报道，其中有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便要求政治局对此“表态”。但周恩来、邓小平都未予理睬。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一伙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强迫邓就“风庆轮”一事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据理驳斥。会后，“四人帮”暗中策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但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当场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⑤]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一再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11 月 12 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 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 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的稳定与成功。事后，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 29 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 日，根

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⑦

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周恩来起草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1974 年末至 1975 年初）。26 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

其次，反击"四人帮"批林批孔运动。1974 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 月 25 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表明他已准备斗争到底的决心。

1975 年 1 月 13 日，历经磨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

1974 年冬，鉴于周恩来的身体情况，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在邓小平领导下，起草小组克服阻力，最终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稿中。同年 12 月 20 日，周恩来审阅同意这一《报告》稿。这是老一

辈革命家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胜利。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361页。

②《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③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会议记录（引文为王洪文插话），1974年3月18日。

④自197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之后，国内报刊很长一段时间未再提及四届人大问题。直至1973年10月1日，“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继续前进》中才再次提出“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⑤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1974年11月6日。

⑥“特写”：《胜利属于周恩来》（［美］《时代》周刊，1975年2月3日）

⑦吴阶平：《终生难忘的教诲》以不尽的思念，第584页。

“风庆轮”事件

1974年6月1日，自1972年春发现膀胱癌以来一直抱病超负荷工作的周恩来终因病势沉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风庆轮事件”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造船能力严重不足，我国自己所造的船，大约只能满足我国需要的1/10。周恩来针对当时的情况积极主张从国外买一批船只。周恩来曾说过：我国是一个海岸线很长的国家，应有一支与之相适应的远洋船队。为了发展我国的远洋航运事业，就必须向国外购买船只，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为尽快发展中国的远洋运输业，早在1963年，周恩来就根据当时有利条件，提出在积极发展国内造船工业的同时，也可利用香港中国银行可提供的外汇贷款从国外购买船只，以加快我国远洋运输船队建设。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但在绝对主张自力更生的背景下，一些人对买船租船持有异议，这也属于正常的意见分歧。但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的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争论变得不正常起来。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又明确指出：在远洋运输方面，要力争在1975年基本改变租用外轮的局面。之后，国家计委便制定了一个计划，即在1972年至1974年三年内利用外汇贷款买船，以加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船队。周恩来批准了个计划。担任周恩来经济秘书的顾明回忆：“‘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恩来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

当然，在购买外国船只的同时，我国也大力发展自己的造船业，风庆轮

便是上海江南造船厂1973年建造成的一艘万吨巨轮。

交通部所属的中国远洋运输公司上海分公司买下风庆轮后认为：该轮的主机性能不适于远洋航行。规定其只能在近海航行。但在“批林批孔”中，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船厂工人和该轮海员贴出大字报，要求风庆轮远航。交通部分析了风庆轮的建造以及轻载、重载两次试航的情况，批准了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要求风庆轮远航的报告，决定在近期让风庆轮远航罗马尼亚。为不让风庆轮带着故障去远航，周恩来明确指示要在它出航之前好好检查。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派工作人员验收并接船的时候，也提出过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正确和必要的，在实际中也被造船方所采纳。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意见竟全被歪曲。接船的同志发现，主机的一个汽缸套磨损较大，于是提出船厂应将这个汽缸套换下来修理。这条意见当时被江南造船厂接纳。但是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革委会公交组却无中生有地诬陷说，交通部的人百般挑剔刁难，“有人提出风庆轮要远航，就要换下国产主机，装上进口机”。此外，“四人帮”的党羽还认为它属于“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在试航中，风庆轮的雷达发生了一点问题，接船方提出意见后，造船方进行了修理，接船方复查后认可。这样一件已经解决了的事情，以后竟被“四人帮”的党羽歪曲成“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5大件进口货（雷达、电罗经、起货机等）才能远航”。姚文元认为，这是“崇洋卡国产的典型例子”，“相当尖锐地揭露出经济工作中的路线斗争”。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下，上海全市展开了借所谓的“风庆轮问题”批判“崇洋媚外”的运动，多次召开批判会。先对正确的意见加以歪曲，使之变成错误的，然后猛加批判，扣上“卖国”、“洋奴”帽子。

“崇洋媚外”是江青等人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的借口。1974年1月，姚文元到上海收集材料，为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做准备。1月17日，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委会上，上海市革委会常委金祖敏说，闵行地区的几家工厂生产任务吃不饱，而北京部里的人却从苏联进口发电设备，“最近崇洋媚外思想有所抬头”。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说：“有一股进口风。”姚文元听后立即表态说：“在生产问题上，经济领域的斗争是不断的。”并要求给他搞几个材料。

在姚文元的支持下，“四人帮”的党羽陈阿大跑到江南造船厂进行煽风点火。他说，你们这个厂是王洪文做过工宣团长的，现在你们求稳怕乱，是倒退。对有些人要敢批敢斗，你不向他进攻，他要向你进攻。受陈阿大的煽

动，江南造船厂的一些人贴出了《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马天水立即批示要求中远上海分公司革委会将全文照抄成大字报，在公司的重要地方张贴出来。同时，还令上海市工交组发上海各船厂职工“一起议论”。之后，工交组又指责公司领导对大字报不表态，指责交通部和远洋公司“拜倒在洋人脚下”，“靠买船过日子”。在马天水批示后，上海各船厂也纷纷前往中远上海分公司张贴大字报。一时间，公司院内四处贴满了批判“崇洋公司”的大字报。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风庆轮开始了远航。交通部派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的两名干部——组织处副处长李国堂和宣传干事顾文广随船工作，加强远航领导，并且任命李国堂担任风庆轮副政委，顾文广担任实习三副。“四人帮”的党羽认为，交通部来者不善，不怀好意，他们也在船上安插了他们的人，其中包括上海远洋分公司党委委员、风庆轮政委朱栋。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黄涛要求朱栋等人在航行中密切注意李国堂、顾文广的动态和表现。斗争就这样在船上展开了。

“四人帮”围绕“风庆轮事件”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以达到排挤他人夺取更高权力的目的。

1974 年 5 月 9 日，风庆轮从上海启航。远航途中，朱栋组织船员批所谓的“买船问题”，说买船就是“崇洋媚外”。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这是把矛头指向国务院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坚决反对。他们据理反驳说：国务院和交通部一向支持国内造船工业，在目前国内造船还远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买一些外国船建立自己的远洋船队，用以摆脱长期租用外轮受制于人，使大量外汇流失的局面，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周总理决定并得到毛主席同意的，怎么能说成是崇洋媚外？

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大家对出国以来的航程工作进行了总结。李国堂、顾文广认为，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和不足，为胜利返航做准备。朱栋认为，风庆轮之所以能够远航，是批判“崇洋媚外”的结果，而李国堂、顾文广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要进行“政治总结”。

远航途中，风庆轮的主机不断发生故障。在毛里求斯海港停泊时，我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将样板戏《杜鹃山》影片送到船上。上映时，船员对电影和轮船的质量都有一些议论，被“四人帮”的耳目记录了下来，成为江青等人手中的“牌”。

1974 年 8 月，在风庆轮航行到罗马尼亚后，《人民日报》发了消息。张

春桥准备发难，他严厉责问《人民日报》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刊登在报缝里，并下令在风庆轮回来后要刊登头版头条，要搞连续报道，要进行大宣传，因为这是“路线问题”。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要求上海宣传部门要大批“洋奴哲学”。《解放日报》请风庆轮组织几篇文章批判“洋奴哲学”。在“四人帮”的指示传到风庆轮上后，朱栋的气焰更加嚣张，肆无忌惮地对李国堂、顾文广进行迫害。

9月9日，返航途中，风庆轮在印度洋出现主机故障，不得不停船修理，长达47个小时。美军飞机三次在风庆轮上空盘旋，情况十分严峻。李国堂建议向国内发电报报告，船长也起草了电文。但朱栋不惜违反航行规定，将电报压下，污蔑李国堂“胆小怕死”，是“假洋鬼子”。

由于风庆轮在远航途中故障频频，直到1974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风庆轮才回到上海。回到上海后，“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亲信炮制了一份包括“八大问题”题为《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的万言材料，诬告李国堂是“假洋鬼子”，“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并把这份材料送到北京。以此作为批判李国堂、顾文广乃至交通部的工具，实际上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

风庆轮结束远航回到上海港的时候，正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筹备工作正进入最后确定国务院领导人选的阶段。当邓小平被毛泽东提议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进入实质操作期后，“风庆轮”事件就被江青等人作为射向周恩来及其为首的国务院、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重磅炮弹。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让秘书张玉凤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要王洪文告诉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就国务院组成人选第一次表态，在周恩来因病住院已经四个多月的情况下，毛泽东的这项提议意味深长。当晚8时，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传达了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意见。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安定团结，并为此酝酿新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不甘心。他们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反对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所谓的“风庆轮事件”，便成为他们认为已经导演成熟的一出好戏。“四人帮”抡起“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

的大棍子，叫嚷要揪“风庆轮事件”的“大后台”。

在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江青作出批示，并致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让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同日，王洪文紧随江青之后，也批了一段话：“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10月12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10月14日，张春桥跟着批示道：“同意江青、洪文同志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同日，姚文元也写了一大段批语：“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江青一伙此举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挥舞“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棒，其目的是打向周恩来，更是打向周恩来住院后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的信传来

后，邓小平做了圈阅，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没有就江青等人的提议表态，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为配合“四人帮”的抢班夺权活动，“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在文艺宣传领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造势运动。“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朱永嘉说得很清楚：“风庆轮不是一条船的问题。风庆轮的远航是整个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造船的斗争和整个路线斗争是紧密联系的。”因此，“风庆轮的问题要把文章做足”，“要一直宣传到四届人大的召开”。

在风庆轮返回上海港后，江青等人利用此事指责国务院，说国产万吨巨轮早就该远航，就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致使万吨级巨轮没有及早远航。由于“四人帮”掌握了舆论大权，自此以后，京沪报刊上有关“风庆轮事件”大批“卖国主义”的通讯、评论、诗歌、小说、故事、说唱，连篇累牍，连绵数月。张春桥在《红旗》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中，更是把所谓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上升到原则分歧的高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1974 年 10 月 12 日，《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文章污蔑“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是“洋奴哲学”，“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影射攻击周恩来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

在报纸宣传方面，由“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市委书记徐景贤，市革委会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直接指挥。在 1974 年 10 月至 11 月两个月内，《文汇报》共发 44 篇文章，《解放日报》发表各类文章 66 篇。“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两报使尽浑身解数，既有通讯报道，也有评论、访问记、座谈会纪要，还有照片、图片、杂文、小说，他们称之为“全套宣传”，“连锁宣传”，在全国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文化部还下令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年内拍一部关于“风庆轮问题”的电影，并作为文化部直接抓的“重点影片”。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派秘书赶到上影厂，要他们重点搞“风庆轮”，“要敢于触及中央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要写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走资派”，“剧本的主题是回答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1974 年 10 月到 11 月间，在上海，围绕“风庆轮事件”，各种参观会、

报告会绵延不绝。"四人帮"在上海的干将组织风庆轮政委朱栋等人四处作报告达上百个场次，组织20多万人上风庆轮参观，借机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卖国主义"，他们还组织《歌唱风庆轮》的专场歌咏大会，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随着"四人帮"在政治领域掀起狂风浊浪，李国堂、顾文广受到了批斗。王洪文下令李国堂、顾文广扣留在上海，从10月15日起接受批斗。在此后一个月内，他们接受了大小批斗25次，被戴上了"假洋鬼子"、"洋奴"、"汉奸"、"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交通部派来的特务"、"风庆轮上的错误路线代表"、"攻击中央首长"等"帽子"和"罪行"。11月14日，李国堂、顾文广被押解回到北京。

翌日，迫于压力，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宣布：李国堂停职审查、交代问题、接受批判；顾文广回宣传处交代问题、暂不工作、接受批判。回京后，他们接受大小批判5次。

公道自在人心。在李国堂、顾文广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日子里，风庆轮的船员给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安慰。面对"四人帮"党羽要求揭发李、顾两位同志的威逼，风庆轮副水手长邬中由断然回答："对总公司派来的两位同志没有意见，他们在船上和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工作，这样的干部我们是欢迎的。"在批斗会上，邬中由以缄默表示抗议。有的船员鼓励李国堂、顾文广说："不要怕，要顶住。"这都给李国堂、顾文广以极大的支持。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7日，在交通部党组的过问下，他们才得以恢复名誉。

由于在揭批"风庆轮事件"中表现"突出"，"四人帮"在上海的几员大将在讨论组阁名单时，准备将风庆轮政委朱栋列入其中，安排他当交通部部长。马天水提出："要派人到交通部去。"王秀珍提名朱栋："朱栋在'风庆轮'与李国堂斗争表现很好，让朱栋去。"马天水等人表示赞同："他和交通部斗争有经验了"，"他到交通部能起作用"。而随着江青组阁阴谋的破产，朱栋的"部长"梦破灭了。

江青政治阴谋的破产。在1974年10月17日晚上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等发难，逼迫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表态。江青煞有介事地提出风庆轮和交通部"崇洋媚外"的问题，逼着邓小平表态。邓小平绵里藏针地说："我已圈阅了。

10月17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有预谋地借所谓"风庆轮"事

件，对邓小平进行突然袭击和围攻，逼邓小平表态。江青恶狠狠地说：“李国堂是国务院交通部的一个副处长，你们别看他官不大，来头可大呀。他有后台，我有证据，李国堂的后台就在国务院。”一旁的邓小平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江青又挑衅性地问邓小平：“小平同志，总理住院后，国务院由你主持工作，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你不讲话不行，你要向政治局讲清楚，国务院为什么要派李国堂到风庆轮上当政委？”

邓小平说：“我已经圈阅了。”江青以命令的口吻说：“圈阅了算什么态度？你要表态。”“对这个材料我看还是要调查一下哩！”邓小平平静地说。但江青又大声地质问道：“你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邓小平正色予以反驳：：“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不能强加于人嘛！这样政治局怎么合作？”真是“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邓小平顶撞道。江青先是禁不住怔了一下。邓小平当着政治局委员的面这样顶撞江青，是江青没有料到的。接着，江青暴跳如雷，跳着脚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和谩骂。张春桥、姚文元也一起加入对邓小平进行围攻。

邓小平忍无可忍，连说“我要调查”后，愤然离开会场。江青说，她发火是因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对文化大革命从来不表态。风庆轮虽不大，毕竟是中国造的，邓小平为什么不表态？……”张春桥说：“我早就知道邓小平要跳出来，果然跳出来了。”江青提出要王洪文抢在邓小平陪外宾到长沙去见毛泽东之前，先到长沙去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10月18日上午9时，王洪文背着周恩来等在京的主要领导人乘专机飞往长沙。下午2时左右，毛泽东接见了他。王洪文一开头就把形势说得十分严重，说他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他把周恩来、邓小平同1970年庐山会议上的林彪、陈伯达类比，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即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的味道。王洪文讲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争吵的经过后说，邓小平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有关。王洪文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进行篡权活动。他说：总理现在虽然有重病，住在医院，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人。他们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对江、张、姚分别吹捧一番，最后说：请毛主席指示，我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哩。

毛泽东虽然不在北京，但是他识破了江青等人的动机。他没有听信王洪文的谗言，当即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性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叮嘱王洪文说："你回去后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

在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同时，10 月 18 日，江青两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到钓鱼台她的住处谈"风庆轮事件"。江青要她们向毛泽东反映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攻击 17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又一次"二月逆流"。江青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让王海容和唐闻生代她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

但王海容和唐闻生并未听江青的话和受江青的操纵。10 月 19 日，她们赶到医院，将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他已经知道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经过他的了解，事情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周恩来同时表示：还要继续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

毛泽东对江青一伙借机进行篡权的阴谋活动是有所察觉的。10 月 20 日，邓小平赶赴长沙，陪同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邓小平离开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经在解决，但是江青还这么闹。"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将他的意见带回北京："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的身体还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齐给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做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杨成武可以做副总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人再考虑。""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样一来，毛泽东明确地把国务院总理、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而且，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具体人事安排主要由周恩来负责。这无疑给江青一伙的"组阁"梦以毁灭性的打击。

毛泽东指示王、唐二人回北京后，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他抓紧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0 月 25 日，周恩

来与叶剑英进行了长谈。27 日，与李先念谈话。28 日，与王洪文谈话。11 月 1 日 ~3 日，在医院分三批约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

1974 年 12 月 23 日，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和王洪文飞抵长沙，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多次谈话。毛泽东明确地对王洪文说要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要求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比你强。”这让王洪文尴尬不已。

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提议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共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定，完全打乱了江青等人的政治阴谋。这次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 1 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 月 8 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 年 1 月 13 日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产生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彻底粉碎了“四人帮”围绕“风庆轮事件”所进行的篡权阴谋。

四届人大和政府的人事酝酿选举

从10月下旬开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了十多次会议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时没有多少争议，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周总理、纪登奎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有吕正操、梁必业、傅秋涛、武新宇，以及王淦昌、白寿彝、陈望道等人。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关于“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的指示，从1974年11月中下旬开始，周总理在动了大手术之后，不顾自己极其衰弱的身体状况，在305医院的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到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12月18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总理又审阅修订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2月20日晚，纪登奎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检查四

届人大各项组织工作的最后落实情况，会议开到21日凌晨。他回忆到：散会后我留在紫光阁整理会议讨论的有关文件。21日凌晨2时，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同志拿着一个文件袋来到紫光阁，问吴庆彤在吗？我告诉他，庆彤同志刚散会回家休息了。这时他把周总理亲笔写给吴庆彤亲启的“特急绝密”文件袋交给我，并说你同他联系，总理交代让速办，中午起床后总理要看。这时我虽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但已感觉得到是一份非常重要又非常急的文件。因为从值班室成立以来就规定，有关四届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由中办秘书局机要交通处传递，总理办公室直接送交文件这还是第一次。

文件是一封周总理给吴庆彤的亲笔信，总理写道：庆彤同志：请派专人速将此件送印厂特密件印两份清样，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样印好后，请将我写的原稿烧掉。信后是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方案》是在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21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当天晚上，纪东又来到紫光阁，送来了周总理对名单方案清样的修改稿，（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二人）让立即印好两份清样，说总理等着要看；并嘱：修改稿原件也一并销毁。吴庆彤立即让我带上铅版和修改稿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改版后又重新印好两份清样带回。这时吴庆彤等在值班室，他把清样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后密封，让我立即将重新印好的两份清样再送总

理办公室纪东。周总理就是带着这份印好的清样，于 12 月 23 日飞往长沙，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据吴德（当时吴德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回忆，在周总理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让吴德任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他向周总理提出不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想离开国务院文化组。周总理考虑总得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经再三衡量还是吴德比较合适。周总理找吴德谈话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你去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合适。周总理这个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酝酿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四人帮”提出让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吴德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他们坚决反对，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在听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时，曾有人提议让陈望道作教育部部长，最后周总理反复考虑还是坚持让周荣鑫作教育部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最后他们议定：对教育部和铁道部的人选一定要坚持，对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李先念曾同纪登奎开玩笑说：“文化部也不让他们干，他们就失业了。”

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议，“四人帮”只争得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席位。在周总理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名单中，主要是考虑了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了一批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

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代表作部长，如农林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关于提名李素文和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问题，与中央筹备工、青、妇三个组织的人选有关。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在1974年他就伸手抓工、青、妇三个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东三省市各推荐一名负责人。上海推荐金祖敏担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北京推荐谢静宜担任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山东推荐杨坡兰担任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在审定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周总理提出，为了便于人大常委会议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数。为此要调一批工农中委到工、青、妇工作，并兼人大常委，这批人大部分担任了工、青、妇筹备组副组长。后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了对工、青、妇领导班子的调整意见，他要求增加一些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派性严重的人不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组部对工、青、妇领导班子名单作了调整，拿下了唐岐山、梁锦棠、鹿田计、董明会、张洪池等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韩荣华、马恒昌等一些劳动模范和老干部代表人物。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来京后同王洪文联系频繁。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央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后来全国妇代会因故未开成，此议没有成文。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主席批准。

“长沙决策”，四届人大顺利召开。1974 年 12 月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进入了最高决策的关键阶段。12 月 23 日，周总理强撑着重病之身，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从 12 月 23 日 ~ 27 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毛主席赞成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做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冼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最后做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这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长沙决策”返回北京，亲自整理出毛主席长沙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总理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方、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南方推荐了董加耕，西北推荐了姚连蔚，天津推荐了孙健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副总理的人选。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10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四个名单，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建议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全会还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0年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1月13日至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时间持续5年之久，中间几经波折，实在来之不易。

四届人大确定的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是党内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反复较量后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它对于当时以及后来党和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斗志，成为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的政治遗嘱。

为了给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做准备，1975年1月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9日，周恩来打电话到长沙，请示毛泽东还有什么话要向二中全会讲没有，并表示“自己打算在二中全会结束时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嘱咐身边工作人员，“劝总理不要讲，并指示二中全会闭会时由总理传达主席的指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①]全会闭幕时，周恩来在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意见。[②]

在此前后，从1月5日到11日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代表2 885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2 864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72%。妇女占22%以上。54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12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

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大会选举了由218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康



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吴德为秘书长。

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选举和任命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会上，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从 1 月 14 日起，全体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1 月 17 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张春桥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重申了 1964 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③]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报告》的精髓所在。这个基本思想内容，周恩来早在 1954 年的一届人大的报告中就已明确提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意见。1959 年二届人大之后，他又号召加快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直到 1964 年三届人大上，周恩来完整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1966 年 4 月，国内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时周恩来对实现"四个现代化"仍充满希望，他说："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④]面对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周恩来不得不花费巨大精力来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心系国家和人民的周恩来所思所虑依然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报告还在以下方面作了阐述：

农业方面。周恩来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还

差；我们还没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忽视向“送上门来的老师”（即来自发达国家的农业团体）学习的机会。周恩来的目的很明确：借鉴、吸收国外的经验，尽快改变国内农村落后面貌，逐步接近和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工业方面。针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的情况，他指出：我们经济上仍很落后，底子就是“一穷二白”，所以，不好、不行的地方要敢于承认，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正是从这时起，周恩来把目标对准西方发达国家，批准引进了大批成套新型生产设备，并确定了“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

国防方面。他指出，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针对美国总统尼克松关于中国是“世界五大力量”之一的说法，周恩来多次表示，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还要奋斗好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之明。1971年8月，主持《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周恩来列出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写有“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的内容。同时，提纲还就“四五”计划的设想提出近期发展目标：“一个稳固的农业基础”，“一个比较强大的工业”，“一个比较发达的交通网”，“一个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商业网”和“一个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⑤

以上内容体现了这次会议取得两方面的重要成果。

大会选举产生了以朱德为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为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一大批富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认真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选举朱德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女）、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壮族）、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女）、乌兰夫（蒙古族）、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周建人、许德

珩、胡厥文、李素文（女）、姚连蔚为副委员长，常委会委员 143 人。

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四届人大闭幕以后，周恩来在他先后召集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明确宣布："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向与会人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的评价。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5 年 2 月 1 日。

二月初，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有关国务院副总理分工的报告。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对这个结果，"四人帮"感到格外沮丧。四届人大开过不久，江青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对几乎所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都骂了一遍。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产生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邓小平在四届人大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些有影响力的科学家和文艺名人被列入四届人大代表的名单上，最瞩目的是科学家钱学森和相声大师侯宝林，这两位是当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努力下列入名单的。四届人大象征着国家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已有意把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四届人大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它以事实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军队并没有被摧毁，还能够保持统一和开展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这是当时以及后来党和人民克服困难、战胜内外敌人的基本条件。

其次，周恩来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强调和指明了一个时期工作的方向，它给予全党全国人民以极大信心和希望。从广义上说，它也是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跨世纪"三步走"宏伟蓝图的最初构想。

第三，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集中了相当一批革命家和老干部，他们多数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们恢复工作，掌握实

权，不仅有利于当时的国家经济建设，也为后来党和人民继续斗争并最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领导和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证。

注释：

①唐闻生、王海容所写的书面材料，1974年3月14日。

②周恩来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1月10日。

③《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79页。

④周恩来答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问，1966年4月10日

⑤见周恩来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提纲）》稿，1971年8月31日。

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开展整顿工作

党的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厌倦、怀疑和责难的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是干部和群众仍然对这种努力表示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这时一方面希望结束长期的不正常局面，也对已经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复辟倒退”，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他在思想上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

1974 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度的责任感，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高超的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局势。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 5 月 29 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①

7 月 4 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②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

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3 700多人。在9月15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1974年11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听取李先念关于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李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这个指示，为四届人大重提“四个现代化”目标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邓小平的整顿和三项指示提法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4年12月17日，陪同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到长沙的邓小平，在会见外宾结束后，又向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谈到《政府工作报告》时，邓小平说：“工业十年来增加了一点九倍，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一点几，这个数目还可以。”谈到对外合作和贸易时，邓小平说：“当然，我们什么也不搞，也可以发展，但是速度慢些。现在国际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国际范围，都是取长补短，包括美国。”“以后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我们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

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大家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并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毛泽东说：“要先念、余秋里、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我看。主席讲，八年了。这里面包括怎样帮助省委树立威信。”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

这是一次重要的谈话。邓小平所说“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说出了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表明他认可这个看法。以后大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也一直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

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那些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要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果。

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这是阻碍局势好转的一个关键。党中央于2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4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20个铁路局中的19个超额完成计

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53 700多车，比2月份平均日装车多一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7 800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1975年前四个月，全国欠产钢195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中央于5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立刻显著回升。6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72 400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国务院关于当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197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增长15.1%，农业增长4.6%。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期间，对于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大力进行整顿，分别取得明显的成绩。军队的整顿在调整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国防科委解决了七机部两派闹派性达九年之久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文艺工作重新强调党的百花齐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开始改变近十年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的局面。特别是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他们不断寻找机会，伺机提出反对。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

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掀起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才出现了新的高潮。

1975年是一个风云变化的一年，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全面整顿工作取得了可惜的成就，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当他感觉到邓小平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这仍然反映出他内心的剧烈矛盾。

注释：

①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5月29日。

②邓小平：《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1975年7月4日。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

1975 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的“四人帮”企图插手军队，夺取军权。在毛泽东支持下，党中央坚定地阻止了江青一伙“组阁”的阴谋，确定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975 年 1 月，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 月 17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会议上仍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会议以后，由毛泽东、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代理病重的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全面负责起中央党、政、军的领导重任。这时，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任务是：第一，苏联仍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全国备战仍然是军队的首要任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严重的困难和非常严峻的形势，他以卓越的洞察力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大无畏的气魄与非凡的胆略，力挽狂澜，决心消除“左”的思想的影响，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他提出整顿工业、农业、军队、文艺等方面的方针、政策。提出，现在问题相当多，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生产的形势不好，铁路运输上不去，规章制度被破坏，事故多得惊人，派性严重，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领导班子涣散，党风受到严重损坏，党的文艺、教育思想被割裂，毛泽东思想被割裂。因此，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党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文艺要整顿，教育要整顿。他深知整顿全国各条战线中，军队的整顿尤为重要。他坚定地提出，1975 年军委的工作“第一件事，军队要整顿。”

1975 年 1 月 25 日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题为《军事要整顿》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整顿军队的方向。邓小平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

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人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而“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的战斗力也会消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针对军队的纪律很差等问题，他说，“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加强纪律性。”“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他肯定地告诉大家，“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他“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把工作做好。”“各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他提出，要首先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邓小平的讲话，观点鲜明，态度坚决，重新提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全面任务，提出了军队建设所要解决的一系列主要问题，指明了军队整顿和建设的方向，是中国全面整顿的惊蛰之雷。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3号文件，通知：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于1971年），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由叶剑英主持。

2月9日，军委常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即讨论研究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和会议的主要内容问题。军队全面整顿触动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争夺的重要阵地，王洪文、张春桥利用其能够出席军委常委会议，握有军队事务指导大权，极力干扰破坏军委扩大会议。在讨论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议题时，叶剑英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王洪文即提出，军委扩大会议第一项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张春桥在发言中大谈理论问题，大谈商品、货币的关系问题。邓小平强调，军委扩大大会议应集中解决军队的编制问题，以此达到整顿军队、加强战备、实现安定团结的目的。在讨论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问题上，王洪文和张春桥的意见，被否定了。

王洪文和张春桥在2月军委常委会上提出的军委扩大会议主题的意见，遭到邓小平和叶剑英等人的否定之后，他们还不甘心。3月1日，张春桥和姚文无在《红旗》杂志发表他们主持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即“二十三条”），在全国制造舆论。同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大讲“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的论调，谎称：“主席要我们注意反对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会上，有的军区提出，总政治部应搞一个统一的学习计划，张春桥却说：“总政不宜单独搞一个计划或安排”，“一是搞不出来，二是搞出来也靠不住”。企图只能按着他所提出的所谓“反经验主义”的调子进行。

为了准备好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和为全国整顿做好准备，中央军委确定在总参谋部专门成立一个军队整顿编制体制小组，由副总参谋张才千任组长，负责就军队编制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军委提出整顿编制体制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为军委决策提供基础。不久，中央军委又责成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分别成立了国际形势研究小组和军队工资制度调研小组，主要负责对国际形势和军队工资制度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军委提出相应报告，以供参考。与此同时，军委和总部还陆续派出工作组，深入全军各部队进行调查研究，进一步摸清主要问题，为中央军委指导全军的整顿工作，获取第一手材料。军委常委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先后召开了十余次会议，听取军委、总部各调研小组的汇报，研究讨论和决定有关军队整顿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时，还几次召集全军各大单位负责人进行座谈，征求他们对整编及其相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军委整顿编制小组，经过紧张地工作，在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军委常委会写了《关于压缩军队员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5月下旬，军委常委同意把军委整编小组的这个报告作为军委扩大会议的主要文件。

军委扩大会议经过4个月的紧锣密鼓筹备工作，到6月中旬，会议的各项文件及其他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军委遂于6月14日将拟制的军委扩大会议议题和文件，以及开会的时间等事项，上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报告立即获得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同意。于是，中央军委正式发出通知，定于6月下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于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

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军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问题，集中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

邓小平、叶剑英分别就军队的整顿作了重要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军队整顿的必要性、目标、任务及其伟大意义，并就整顿的具体工作作统一部署。徐向前、聂荣臻作了重要发言。会议遵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精神，深刻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军队存在的问题，并确定了解决军队问题的办法和措施。

关于战争形势。会议认为，世界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一方面是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战争可能推迟。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争取更多一些时间，做好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等项工作，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相应发展国防力量，准备应付霸权主义可能强加给我们的战争。关于军队的状况。会议认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经得起考验。但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存在的问题很多。会议研究确定，军队进行整顿，主要从3个方面展开：一是“消肿”。调整编制体制，坚决把军队员额压减下来；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安排超编干部；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一些部队平时实行精简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在3年内将军队总员额减少60万人。二是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纯洁组织，增强活力。三是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抓战备，搞好预设战场建设、作战训练和改善武器装备。这几项工作的侧重点是提高部队各级干部的组织指挥和管理能力，加强国防科研工作，发展军工生产。会议特别提出，要把军事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

7月14日，邓小平在报告中主要讲了6个问题：指出：军队总的来说是好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军队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虽然仗不大，但不管派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一个团了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的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

一、关于局势。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向来就说，要准备打仗，战争推迟三年、五年有好处。过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争取了十年时间，还可

能再争取五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总之，时间重要。能争取两个五年就很好。”“要在争取到的时间内，好好把我们的工作搞好。”

二、邓小平集中讲了军队的状况，他指出：“军队总的是好的。”“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邓小平指出：“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使有限的军费不能更多地投入武器装备的改善，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提高。所谓“散”，就是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军队支左，卷入派性，又把派性带回部队。至今许多人没有摆脱派性。少数人喜欢垒山头，搞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听自己的人。一些个人单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不服从上级，对抗命令，不考虑整体利益，只考虑一派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务调动，喜欢大城市。有的还拒不落实政策，不遵守政治纪律。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所谓“骄”，就是投入“支左”后，大权在握，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是骄横。不讲团结，不守纪律。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军人乘车也不给老弱妇幼让座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奢”，则是指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委的。有的随便从地方拿东西。生产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权。这样搞，就是地培养特权阶层。还有，占地方房屋，有的是霸占。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软”、“懒”、“散”班子部队有的是。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忠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坚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也有组绢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

三、军队要整顿。邓小平指出："整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这个，同时还要注意解决'散'、'骄'、'奢'、'惰'的问题。要联系起来，解决这些问题。"

四、军委的工作。邓小平指出："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都是毛主席的话。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

五、整编中的干部问题。邓小平指出："在编制内配备的干部容易安置一些。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安置的问题。有几十万干部到地方，地方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在军队内部，马上来的大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当正式职务，谁当顾问"。"顾问的问题，这是一件新事物，以后有些什么问题还要再看一看。总之，设顾问问题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的一个好办法。不然的话，一级机关里面，司令、副司令，政委、副政委，参谋长、副参谋长，主任、副主任，打麻将可以开七八桌，这不行嘛，耽误工作。"

六、高级干部的责任。邓小平说："我们都担忧啊！尽管是一部分现象，担忧是有理由的。所谓传、帮、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过去几十年，军队总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现在部队这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真正把几十年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靠我们。"最后，邓小平说："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会议认为，中国兵源雄厚，平时少养兵，战地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压缩定额，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平时把民兵建设搞好，储备好干部，储备好兵员，储备好装备，作好战时动员扩编计划，一旦战争打起来，就可以就地出干部，就地出兵员，就地出装备，迅速把部队扩编起来。会议再次申明，"编制就是法律"、"兵贵精不贵多"仍是今后的建军原则。

7 月 15 日，叶剑英作会议总结。关于国际形势问题。叶剑英指出："毛

主席高瞻远瞩，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两个新的论断。一个是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战略地规定了三个世界的划分……一个是指出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强调了战争的危险。”“毛主席说，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我们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就要吃亏。毛主席的这些指示，非常重要。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时间问题的紧迫性。”“我们要充分利用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赢得的时间，把军队整顿好、建设好，抢在战争爆发之前，做好一切战争准备。”

. 关于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指出：“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破坏，把军队编组搞得很乱，很不适应打仗的要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党中央确定军队进行精简整编，这是加强我军建设，准备打仗的一项重大措施。”精简整编“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可以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精简整编的重点是机关。”“编制确定以后，要严格执行。编制表就是法规，不能自行修改。以后，增加单位、增加人员要经军委批准，要保持编制的严肃性。他指出：小打，现有部队就可以；中打，稍加充实也能对付；大打，能保证部队迅速护编。他针对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和利用派性反党乱军的严重情况，严肃地指出：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他针对军队一大批高级干部被打倒或审查，“四人帮”极力阻挠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明确提出：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他强调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叶剑英还告诫全军高级将领，要保持警惕，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精简整编，相应的有一个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总的精神是，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干部的成长。”

“设置顾问，是为了精干领导班子，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这是加强我军建设，加强战备的一项重要措施。”

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以及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讲话。2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这对当时全国各条战线正在进行的整编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建设发展史上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会上提出的集中精力考虑军队长远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展国防力量，把军事训练放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坚决克服“肿、散、骄、奢、惰”等一些加强军队建设的思想、方针、原则，为军队的长远建设提供了有力指导。这次会议，连同会后进行的军队整顿，对后来中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以其所具有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而载入史册。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经中共中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等组成的领导小组，从8月到年底，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国防科委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同时，对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部署，也进行了调整。会议受到全军上下的热烈拥护。

评《水浒》反投降派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正在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继续进行全面整顿之时，一件看起来与整顿并不相干的评《水浒》运动的发生，打断了邓小平的整顿步伐。而随后对于三项指示为纲等的批评、批判，彻底否定了1975年开始以来的整顿工作。

1975年7月下旬毛泽东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其中有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找个教师来念，并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①]

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②]

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③]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④]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⑤]

1973年12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⑥]

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⑦]

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9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8]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9月20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9]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10]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8.7%，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5.5%，农业总产值增长3.1%。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11]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毛泽东自1971年冬身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1975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处于这种状况，使他更加不能了解全面

情况。“四人帮”在其间所作的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年9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36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1943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1975年9月28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10月10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9月27日和11月2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12]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

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8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当时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10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

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13]

这是1973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10月19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14]”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27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15]11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

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11月2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16]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3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17]

4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邓小平）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18]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19]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遂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

‘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20]由此毛泽东更认为有必要在全党高级干部中统一认识，反击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

注释：

①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 年 12 月 12 日。

②④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③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泽东审定稿），1975 年 8 月 14 日。

⑤毛泽东给林克的信，手稿。见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版，第 10 页。

⑥毛泽东接见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成员的讲话记录，1973 年 12 月 21 日。

⑦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 年 8 月。据刘庆棠 1977 年 3 月 5 日揭发材料。

⑧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和江青在大寨同文艺界、新闻界部分人员的谈话记录，1975 年 9 月。

⑨毛泽东同邓小平的谈话记录，1975 年 9 月 24 日。

⑩毛泽东在听取华国锋汇报时的指示，1975 年 9 月。

⑪《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版，第 255 页、第 369 页。

⑫⑯毛远新笔记，1975 年 9 月至 11 月，1975 年 11 月 2 日。

⑬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 年 11 月初。

⑭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记录，1975 年 10 月 19 日。

⑮毛泽东在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来信上的批示，手稿，1975 年 10 月 28 日。

⑰⑱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插话（毛远新笔记），1975 年 11 月 3 日，1975 年 11 月 4 日。

⑲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1987 年 10 月。

⑳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年 6 月版，第 426 页、第 427 页。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源于邓小平的整顿，由于整顿工作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受到文化大革命的追随者“四人帮”及发动者毛泽东的反对。当然毛泽东对自己身体状况的认识，使他有种迫切的感觉。伴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的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特别是主要领导者，接班人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他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支持的，但是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制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同时迫切地想扭转“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社会上出现的混乱现象，希望实现社会安定，加快经济发展。

毛泽东没有真正认识到两个方面的深刻矛盾。他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与安定团结、经济发展存在根本对立的矛盾。

面对邓小平的整顿，江青等人更是极力反对。他们是在鼓吹推行极左路线中获得政治资本的，江青等人为了坚持自己极左路线，达到自己夺取更高权利的险恶目的，疯狂反对邓小平等人纠正“左”倾错误。他们利用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路线方针的立场，鼓噪反邓。毛泽东在江青等人的挑唆下，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转向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



案风”运动。由此，全面整顿的形势发生了逆转。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发动反邓打头阵的是张春桥。1975年春，张春桥利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开始发动进攻，用毛泽东反对社会主义时期实行八级工资制的思想，批判邓小平主张的根据劳动成果按劳分配来体现差别的做法。

2月6日，江青等人对邓小平的人身攻击几乎公开化。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公开号召人们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过批判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斗争。这个时期，“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管白猫黑猫的走资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走资派”、“还在走的走资派”等千奇百怪的“罪名”，全部指向邓小平。

3月初，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3月2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些指控的实质，是说邓小平歪曲了毛泽东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实现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因为邓小平认为这三项任务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领导制定了恢复工业、铁路、钢铁冶金、军队和教育工作的方案，以及反对诸如江青排演的“革命样板戏”之类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邓小平所做的这些工作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表现。

最初，面对张春桥等人的无端指责，毛泽东提倡要安定团结。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

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5 月 3 日，毛泽东亲自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提出了上述观点，“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见面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27 日和 6 月 3 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①]

张春桥等人的反攻因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奏效受阻数月后，他们又利用评《水浒》和刘冰的信组织起了新的进攻。而此时毛泽东的侄子、江青等人的亲信毛远新来到了毛泽东的身边，由于毛远新的倾向，使毛泽东对邓小平整顿的判断性质起了反作用。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 1975 年 5 月 29 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



忘记。”7月4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正是由于这三项指示的说法和大抓整顿的做法，为后来的批邓留下了后遗症。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随着整顿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与江青等人的斗争趋向白热化。双方都在争取毛泽东的支持。邓小平等人是力图用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来纠正他的错误方面，而江青等人则是要把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把中国引向混乱，以便获得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权。

问题的爆发始于评《水浒》和刘冰的信。邓小平向毛泽东转送了清华大学刘冰等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大学教师芦荻的谈话中讲到：“《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②]“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并且对张玉凤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③]据刘庆棠1977年3月5日揭发材料。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9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9月间，邓小平在国务院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说，“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

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④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对此，邓小平9月24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两件事是问题的起源，一、刘冰的信，二、毛远新的汇报。

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信中揭发的问题有：迟群自党的十大、四届人大以来，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个人的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便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违反党的政策。信中还揭发了迟群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等。

10月13日，刘冰等人再次给毛泽东写信，继续揭发迟群对毛泽东、周恩来的不满，公开攻击中央领导人。刘冰还揭发迟群假“左”真右以及与谢静宜大搞阴谋活动等问题。

刘冰等人写的这两封信均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在看了后一封信之后，作出指示，“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邓小平）提高。”⑤

此前，10月19日，对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



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1975年8月和10月的两次来信）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毛泽东认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0月25日，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指使和参与下，该校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诬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这位负责人还吹捧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等等。对于清华大学人事处的来信，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1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江青等人见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如获至宝，欣喜若狂，抓住战机，向邓小平发起进攻。

1975年，毛泽东已经是82岁高龄了，病情日益加重，说话走路都很困难。毛泽东出席会议、接见外宾的次数日益减少，与外界联系也很少，急需一个联络员。江青于1975年9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的病榻前，充当了一名特殊的联络员。

毛远新当了毛泽东的联络员后，住进中南海，凡事都由他来上下传达。中央政治局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这期间，从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否定邓小平等人在工农业、教育、文艺等方面的整顿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汇报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确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毛泽东的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面对毛泽东的指示，1975年10月31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我有事需要向主席当面谈谈并取得主席的指示和教诲。明日下午或晚上都可以。如蒙许可，请随时通知。”

11月1日晚上，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

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之事。在邓小平向毛泽东询问近期中央工作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时，毛泽东作了肯定的回答。

然而，11 月 2 日，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

毛远新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就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不是有人要翻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案。毛泽东是不容许任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虽然觉察到这场运动的一些缺点，但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主要的，必须"三七开"。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评价，毛泽东到去世时也没有动摇和改变。

而邓小平在 1975 年的全面整顿，虽然都是在"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下进行的。但从本质上说，确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而邓小平强调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被认为是"脱离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对邓小平强调要克服派性、批判派性，对捣乱的造反派头头要批评，不听的要调动工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也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提出，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最初，毛泽东仍希望统一认识，要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决议。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部讲

出来。

邓小平对毛远新关于“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说法和否定中央九号文件以后全国形势的意见，明确表示异议。

邓小平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不认错。邓小平针对毛远新的话说：“你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价，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

11 月 4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 11 月 2 日晚与邓小平等人开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示毛远新，继续开会，范围扩大一点，让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也参加，8 个人先讨论。会议要抓住“两条路线斗争”，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指示要以他的“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这个结论为基础，对“文化大革命”作个决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和毛远新八人召开会议。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八人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听完后说：“对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看法不见得一致。”毛泽东怕江青从中生事，特别叮嘱毛远新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江青。

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便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小平提出来。毛远新奉命与邓小平谈了一次话，但两人的谈话并不愉快。

11 月 10 日，邓小平在找胡乔木谈工作时，谈到他因转刘冰等人的信受到批评。胡乔木说，不仅是转刘冰等人信的问题，可能对全面整顿的问题，毛泽东早就有意见。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整顿工作的倾向及刘冰来信的批评后，希望邓小平按照他的意愿对文革有一个认识，由于邓小平不愿意按照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三七开做结论，毛泽东下决心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按照毛泽东的部署，首先是在党内进行打招呼，范围逐步扩大。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11 月 13 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

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⑦]

这时，康生又带病受江青之托到毛泽东处“告状”，说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右倾翻案”。以后，康生又接二连三地给毛泽东吹风。

11 月 20 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召开 17 人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

会前，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个建议婉言拒绝。邓小平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合”。

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两次。因邓小平有自己的想法，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毛泽东对毛远新的“汇报”相信了。

由于邓小平始终坚持自己不赞成这样一个决议的态度，导致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

毛泽东明确表了态，同意毛远新的看法。毛泽东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进而指出，邓小平有两种态度：一、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要召开一个“打招呼”会议，向党政军高级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的有关指示。

11 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正式向全国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打招呼”会前，仍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于 11 月 21 日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报告报送毛泽东审定。报告中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 136 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

邓小平在报告中就打招呼的办法作了说明，并提请毛泽东批准将打招呼的范围扩大。邓小平在报告中说，打招呼的办法是，召集全体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块谈。中央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

11 月 22 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报告上批道：“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



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

11月23日，毛泽东又给邓小平写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在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信件的批语。《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说“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强调“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还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的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并将讨论情况上报中央。

不久，《人民日报》把打招呼会议的精神捅到社会上，对邓小平进行不点名批判。至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持续9个月的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此后不久，邓小平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公开批判，就这样在江青等人的炮声中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1月15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

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⑧

1975 年 12 月 27 日。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阵再说。"⑨

"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也说明毛泽东对江青等人执掌中央权力的不放心不信任。12 月 10 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⑩12 月 27 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⑪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⑫

自 1975 年 11 月 24 日开始的打招呼会议以后，反击右倾翻案风便逐步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必要以及它所将导致的动荡局面，是毛泽东预料到的，他不希望出现更大的动荡局面。他开始再次认真思考着未来的接班人的具体人选问题。这样，经过认真的考虑，毛泽东选定了华国锋，他希望由华国锋完成这一任务。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大规模的展开了。

注释：

①王海容、唐闻生记录的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要点，1975 年 6 月 7 日。

②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③江青同于会泳、刘庆棠等人的谈话，1975 年 8 月。

④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 年 9 月 15 日。

⑤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毛远新笔记），1975 年 11 月初。

⑥毛远新笔记，1975 年 9 月至 11 月。

⑦毛泽东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手稿，1975 年 11 月 13 日。

⑧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5 年 11 月 15 日。

⑨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手稿，1975 年 11 月 15 日。

⑩毛泽东同毛远新的文稿谈话（毛远新笔记）。1975 年 12 月 10 日。

⑪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5 年 12 月 27 日。

⑫毛泽东对江青来信的批示，手稿。

教育整顿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领域为“重灾区”，是一个斗争相当激烈的重要领域。四人帮对于教育部的领导权也十分重视，多次要求安排他们认为可靠的人，但遭到反对。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抵制了四人帮推荐的人选，推荐周荣鑫担任了教育部长，这使四人帮十分不满。

1975 年在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下，周荣鑫进行教育整顿，做出了巨大努力。

教育整顿分为前后两个段落。9 月前：整顿教育思想，分清是非，划清界限。9 月后：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到 1975 年 11 月“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前后大约八九个月。

在第一阶段，周荣鑫主要抓了学习、座谈、发表文章三件事，借此回答解决“两个估计”，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的估计和态度问题；以学为主和如何看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问题；“社来社去”与大学的培养目标等最为迫切的问题。

第一件事，组织教育部内各司局单位，结合总结工作，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指示。传达了毛泽东当时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关于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个方面的批示，对电影《创业》的批示，对湘剧《园丁之歌》的赞扬，对知识分子问题所作“老九不能走”的指示，对“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的斥责，等等；组织大家学习领会，认清当前的形势，明确政治方向和主要任务。周荣鑫还先后组织编辑了《周总理有关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和《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供内部学习，明确教育整顿的指导思想。

5 月 7 日上午，周荣鑫同教育部理论研究组同志谈话，指出“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弄清楚，政策才能掌握好”，提出作为上层建筑的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对知识分子队伍到底怎么看？学

校中的问题，关键在知识分子还是在领导？是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还是克服“读书做官”的观念？大学的任务是什么？能不能说只能从城市到农村，不能从农村来城市？等问题，要求讨论清楚。

六七月间，周荣鑫组织司局级干部学习班，学习中共中央5号、9号、12号、13号文件，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教育的论述和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结合学习，总结上半年的工作。他连续出席各司局的讨论会、汇报会，发表许多重要意见。7月3日，周荣鑫参加普通教育司小组讨论会，主要就中小学教育问题发表意见。

7月24日，周荣鑫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谈国内国际的教育情况和如何做好对外宣传的问题。周荣鑫就知识分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科与理科、理科与工科的区别，“社来社去”，考试等理论与实际问题，比较系统地发表了意见，指出要分清界限，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这次谈话的内容，可以说是这一段时间内发表的意见的综合。

周荣鑫参加了6月16日国务院召开的、讨论经济各部门的十年长远规划和五五计划工作务虚会。从7月17日起，增加文教科学规划小组，随后又分成文教和科学技术两个小组，周荣鑫为文教组召集人。参加文教组讨论的为六个部门：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体委、广播局、计划生育办公室。讨论以下共同性的问题：一、知识分子问题，二、方针政策界线，至、体制，四、上层建筑怎样适应经济基础，促使生产力发展。文教规划小组从7月19日~8月8日开会9次，出简报5期。会议指出，“要从指导思想等方面，解决不少单位不敢提智育、文化，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忽视基础科学，以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等倾向。”

第二件事，有计划地在教育界组织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力求划清界限。8月23到30日，教育部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在23日座谈会开始时，周荣鑫着重讲了争夺青少年的斗争问题、文化教育问题、教师问题。27日下午，周荣鑫在小组讨论会上插话，分析应该怎样全面地完整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对“与十七年对着干”、“社来社去，厂来厂去”、“越办越往下”等当时流行的口号表示不能同意。30日上午，周荣鑫又在座谈会结束会上讲话。讲话中表明：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打倒，我也不怕。要做小平同志讲的那样不怕被打倒的人。

10月4日，周荣鑫出席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在会上指出，要研究这



几年问题是什么，历史和现状是什么，要追根穷源，把产生问题的根子找到。10月20日，周荣鑫听取铁道部人事局同志汇报七所铁路高等学校接交及教育革命情况，发表长篇讲话。针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反对整顿的舆论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10月24日，周荣鑫出席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在会上作了许多插话。强调小平同志的讲话要好好学，指出不能只讲形势大好，不讲形势逼人；不但要讲路线，还要讲方针、政策和方法；领导班子是关键，好多问题不出在教师身上，不要一批就批教师。

第三件事，周荣鑫非常重视舆论阵地。努力办好《教育革命通讯》，用以统一认识，引导教育整顿的进行。《教育革命通讯》每一期的清样都送周荣鑫和李琦副部长审阅。为了在舆论上给教育整顿开路，《教育革命通讯》按周荣鑫的意图精心组织了两篇重要评论：《全面关怀青少年的成长》（第8期）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正确道路》（第10期）。强调要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上好政治课和社会主义文化课，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课。反对单纯学理论和轻视理论学习的两种偏向。周荣鑫还亲自出题目，要求发几篇重视基础理论的文章，这就有了后来的《研究基础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搞好基础理论研究》等。这些文章和评论批评了认为坚持以学为主的原则，努力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科学知识，重视基础理论课教学，保证教学时间和质量，便是搞智育第一，便是走回头路的错误认识；批判了“以干代学”的实用主义货色。并指出，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通过抓三件事，理清思想，在四个主要问题上分清是非，划清界限。

关于“两个估计”。究竟怎样认识和估计“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教育工作，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认定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有教师队伍和建国后培养出来的高等学校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曾断言：“两个估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以从文教阵地开刀，工人阶级所以开进学校的重要依据；是制定教育革命一系列方针、措施的重要前提。否认这‘两个估计’，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就会从根本上取消教育革命。”而包含“两个估计”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又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这就增加了否定它的难度。周荣鑫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对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并不表示否定的态度，但对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搞出来的“两个估计”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否定和批判“两个估计”，成为周荣鑫这一时期谈话的共同主题。

周荣鑫明确指出：简单地把知识分子看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有人说17年培养的学生，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那就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厉害。10月4日和24日，他在关于理科教育革命汇报会上又一次说：有人讲17年培养的人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这不全面吧！打击面太大了。有人讲学校里40岁左右的教师有权有势，这个打击面更大了。我们就是依靠他们。这是最不讲政策。“两个估计”要继续研究。“两个估计”讲清楚了没有？11月8日，他更概括说，“两个估计”实际上是一个估计，对知识分子的估计。主要是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认为17年都是知识分子搞坏的。

周荣鑫还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问题。他说：教育与经济基础，哪些相适应，哪些不相适应？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一讲就讲两个，一个是17年，一个是1972年回潮，就是不讲林彪路线的干扰；不能一提知识分子就骂一通，这样符不符合主席的方针？毛主席当时讲的500万，是指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现在我国有2 500万知识分子…是否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不留情面地批评迟群，说迟群在朝阳居然说17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经济是个破坏；在清华大学还提出：知识分子是知识私有化、经营个体化、成果商品化。周荣鑫反问道：现在到底是“知识私有”还是“不学知识”？恩格斯曾经称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时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是对立的，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差别，并且还不能消灭这个差别，这个差别要在共产主义时期才能消灭。关于教师问题，周荣鑫说：一进教育的门槛就不行了，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要挂上“资产阶级”，不挂也要挂。几百万教师在培养学生，还天天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关于以学为主和如何看待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问题。10月20日，周荣鑫在听取铁道部人事局同志汇报七所铁路高等学校情况时指出：当前形势，就是要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任务和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统一起来，不能割裂开。我们现在有人把政治和经济、业务、技术总是割裂开。毛泽东一再教育，要讲对立统一，割裂开的思想不对，而现在有人就是搞形而上学。四个现代化需要培养有较高政治觉悟和较高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

人，不注意这一点将来要拖后腿的啊！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不能前进还不是“复旧”？科研不抓，理论不提，这样下去怎么行？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现在对以学为主都发生了怀疑，学校不以学为主，以什么为主？说无产阶级不要高度的文化水平，这也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政协第一届会议上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四个现代化也是体现高度的文化。他还批评说，甚至（有人）荒唐到说不要文化也一样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学文化。

8 月 23 ~ 30 日，周荣鑫在城市中小学教育座谈会上讲了关于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文化教育、教师三个问题后指出，这三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如何看待文化知识。对青少年是争，不是整。首先要解决理想教育问题。学不学都上学，这不行。学生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认为“读书无用”，不想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学生中流传着“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都插队，行不行都回城，干不干都吃饭”的顺口溜。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讲过不要文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一谈起文化，就谈虎色变，怕得要死，赶忙出来说话，什么“回潮”啊，“又是 1972 年的风”啊！毛主席指示过的，也可以不管，这样不成！周荣鑫进而分析说：1964 年以后，毛主席对学校批评得很多，主要是批评学校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究竟要害是学文化还是理论脱离实际？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中贯穿了一个重点，就是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反对脱离工农，反对的是“死读书”。现在批“智育第一”很起劲。毛主席（1971 年）讲，七八岁起学外语，而且要有七个语种。到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周荣鑫还说：“贫下中农为革命种田，工人为革命做工，学校为什么就不能提为革命读书呢?”

说到考试问题，他认为：也要一分为二，以学生为敌人是不对的，为什么不能文化考查？主席并没有否定考试，主席讲要考试，不要出偏题、怪题等。现在一批判，就摇摇摆摆，要花点功夫，把理论搞清楚。

关于基础理论和理科教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了反复的斗争。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进行整顿的时候，就提出要改变教育界的许多极“左”观点和做法，做出一系列重视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的指示。但在当时，特别是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把这些正确的主张诬蔑为“右倾回潮”而受到批判。

周荣鑫领导教育整顿时，同“四人帮”针锋相对，编印了《周总理有关基础科学研究和理科教育革命的部分指示》。主要内容是1972年整顿期间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理科教育的谈话和批示（共14次）。以后又编印了《毛主席关于自然科学的部分论述》，供内部学习。周荣鑫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做根据，说明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主席对李政道说，基础科学来自应用科学，又指导应用科学。总理也讲，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要在广大实验基础上，把科学理论向上提。总理特别抓了高能加速研究试验。又说：主席历来重视科学实验。现在看来不搞基础科学问题不大，十年八年就看出问题来了，国防、国民经济都要出问题。学文科，先到社会上接触两年再上大学，可以。理科、外语，年纪大了可不成啊！主席对文科、理工科的指示，是区别对待的。而我们执行时一刀切。

在一次讲话中，周荣鑫指出：“过去搞理论——实践——理论是违反《实践论》的，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实践——实践——实践也不行，也不符合《实践论》。学校要重视基础理论课的教学……单纯学理论不对，但轻视学理论也不对，现在单纯学理论的不多，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这两种倾向都要克服。”十分明确地点出了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

关于“社来社去”与大学的培养目标问题。“四人帮”及其亲信曲解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毛远新“推出”的朝阳农学院经验更把“社来社去”绝对化。周荣鑫无所畏惧地提出问题：“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这样成不成？”“我们现在学校有没有培养干部的任务？不培养干部办大学干什么？”“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他对毛远新所在的辽宁省的做法很不满。他说，辽宁来电话，要求学生全部“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全部分配在省里，我答复不了。另一方面，他们又打电报，向计委要150名俄文翻译。我告诉计委，没有，都“社来社去”了。培养出来都“社来社去”，不给国家办事，行吗？都“社来社去”，教育部门也不好办，教师队伍的来源就成问题。

与“社来社去”相联系的是批“读书做官”，主张所谓“拆梯子”。周荣鑫说：“不能把工农与干部、工程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对立起来，这样批不是制造混乱吗？”对所谓“拆梯子”，周荣鑫指出，“现在有个提法，要拆掉‘读书做官’的梯子。这里有个界限问题。是不是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就不能当技术员，不能当干部，只能回去当工人农民。只能从城市到农村，



不能从农村到城市。这样成不成？在二十世纪内，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产量提高，农业人口相对减少。县社也要办工业。一再强调社来社去，其他部门需要怎么办?"把当国家干部说成做官是错误的。脱离了现阶段的需要和可能来谈教育，很危险。在10月20日谈话中，他对"拆梯子"的说法又作了进一步分析：有人认为学校是读书做官的梯子，说要"拆梯子"，大学生毕业后先下去劳动两年，然后提拔。他把当干部、当技术员都看成是"官"。这哪里是"拆梯子"，而是"搬梯子"，把"梯子"从学校搬到工厂、农村去了。他指出，好多问题带有方向性。不能什么口号都接受。

在第二阶段，周荣鑫主要抓了《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教育也要整顿"。整顿的核心是重新确立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科学院工作。周荣鑫出席了这次会议。当场听取邓小平关于科学和教育的指示，研读了胡耀邦、胡乔木等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为完成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整顿的任务，周荣鑫决定学习科学院的办法，起草一个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央批准后，以此来统一思想，指导教育整顿。他说："教育战线问题成堆，不向中央领导汇报，这样下去很危险。""这个提纲汇报后，送到主席那里，如能经中央批发下去，一系列工作也就可以跟上去了。"

周荣鑫亲自领导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明确由野时负责《教育革命通讯》编辑工作的方玄初执笔。

起草小组处于半秘密状态。经过几次讨论，确定要把毛泽东1957年关于"十年树人"的一段指示作为立论的基点。毛泽东在1957年曾经提出："我们要在十年内培养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庞大的技术队伍，百年树人，应该改为十年树人。没有这一条，社会主义建设不成。无产阶级没有庞大的技术队伍、理论队伍、专家队伍（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不行。"《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要把毛主席的论述作为旗帜，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是教育上不去，就会拖后腿，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四个现代化的全部进程。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在周荣鑫直接指导下前后写了三稿。

10月8日，在讨论第一稿时，周荣鑫说；"小平同志讲了两句话，形势大好，形势逼人。要看到逼人的一面，要头脑清醒；要端正路线，要有干劲

搞四个现代化。”25 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对如何写好《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周荣鑫讲了意见。他说：汇报提纲的精神，“要用小平同志的讲话来武装。”还说，“汇报提纲要写存在问题，把对立面的典型言论拿出来……把尖端拿出来，不能掩盖”，让人家一看就懂。他还说，“要扣住 197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写，这样可以省好多文章。把《纪要》重新改动一下，改掉林彪的东西。‘代中央拟个通知发下去，这就是教育上的宪法’。通知要写明‘不许整老师’、‘不能矛头向下’。”周荣鑫看过第一稿后，“要求在修改时针对偏差，正面讲清涉及面大、有普遍性的几个关系。并对起草者说：《纪要》里有对整顿教育有用的东西，还是讲了一些，文化学习’，”我们可以强调这些部分，打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旗号，在教育整顿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10 月 23 日，在讨论第二稿时，周荣鑫要求，主要从正面阐述几个关系问题：政治和业务、理论和实际、以学为主和兼学别样、分数挂帅和必要的考试、智育第一和智育、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普及和提高、师道尊严和必要的组织纪律的关系等。一万面既全面讲清楚这几个关系，另一方面又联系实际明确提出要纠正排斥业务和不搞业务的倾向。《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要专门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和整顿领导班子。此外，还汇报了高等院校下放后产生的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

第二稿写好后，因为形势有了变化，没有立即送上去，周荣鑫交代起草人：修改《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时，要加强有关阶级斗争的内容。因此，第三稿便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但主要的思想内容没有变。11 月 12 日，《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执笔人方玄初把稿子送给周荣鑫。

《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分六个部分：一、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二、新的形势重新把“十年树人”的历史任务提到我们的面前。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五、坚持两条腿走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六、整顿领导班子。

可惜的是，《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十一月十日稿）》印出铅字稿的时候，清华大学已经在一个星期以前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送刘冰的信的严厉批评，一场以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特征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已经在那里掀起。11 月 8 日，张春桥已经找周荣鑫谈话，责令其检查。紧接着，



周荣鑫得到通知，要他于11月14日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评。11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相继贴出大字报，周荣鑫被公开点名批判。这个概括了教育整顿内容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还没有来得及上送，就被扼杀了。唯其如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也没有很快被发现。张春桥等后来得知，看到这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恨恨地说：发现迟了，要不然，这就是第四株大毒草。此话说明，在张春桥的目中，《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同《论总纲》、《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一样，都是击中“四人帮”要害的文件。

1975 年掀起的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文革时期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源于对 1975 年教育整顿的不同看法，这次教育整顿工作实际是周恩来 1972 年教育整顿的继续，是周恩来、邓小平与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斗争的再次较量。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成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导火线。

直接原因是由于刘冰等人写信反映了迟群等人在清华大学的行为。1975 年 8 月 13 日和 10 月 13 日刘冰等人两次写了反映迟群的信，通过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这两封信引起了毛泽东对否定教育革命的忧虑和不满，由此引爆了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革命路线是否正确的争论。

毛泽东对这两封信的批示是：“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在性质上已经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江青等人见到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开始向邓小平发起猛烈进攻。10 月 25 日，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指使和参与下，该校人事处负责人写信给毛泽东，诬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这位负责人还吹捧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等等。

对于清华大学人事处的来信，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进行讨论。”教育战线的新的大辩论由此爆发。

11 月 1 日晚上，毛泽东找邓小平谈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批评了邓小平为刘冰等人转信之事。

11 月 3 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到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件



的批示。分管教育工作的张春桥还责令教育部部长周荣鑫作检查。11 月 8 日，张春桥找周荣鑫面谈教育形势，责令周荣鑫作检查。

周荣鑫提出："学生不读书等问题亟待解决。"实际这是教育整顿要打倒的目的之一。对此，张春桥说："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张春桥还说："迟群 1968 年带领军工宣传队到清华、北大，路线是正确的。"

11 月 12 日，清华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清华大学 1 700 多人参加党委扩大会议，学习和讨论毛泽东的指示。11 月 18 日，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揭发和批判刘冰等人"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周荣鑫在会上受到批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了邓小平，并公开了"邓小平是刘冰的总后台，刘冰是邓小平在清华的代理人"的说法。

这次会议后，清华大学贴出大批大字报，北京大学也贴出大字报，公开点名批判刘冰和周荣鑫等。

然而，江青等人不会满足于在清华和北京一地刮"黑风"，而是想方设法把"黑风"刮到全国。于是，他们组织外地一些省市的干部、群众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还指使各地党羽大量翻印清华、北大的大字报，四处散发。

两校的大字报迅速在各地学校传抄。一些学校相继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

12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二十期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 月 4 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是第一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文章中说：

"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介绍了清华大学开展教育大辩论的情况。

《报告》叙述了清华大学抓住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展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把刘冰等人向毛泽东反映意见的信说成是“诬告”迟群和谢静宜，“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刘冰等人是“有深刻政治背景的”。

《报告》说，1975年7月~9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报告》还提出，教育部周荣鑫到处讲话，制造和散布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反对毛泽东的教育路线，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并且直接插手刘冰等人的“诬告”信。这场斗争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报告》下发后，“教育革命大辩论”便推向全国。周荣鑫、李琦等教育部负责人受到追查和批判。

12月20日，中央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即张春桥于11月30日向阿尔巴尼亚人士介绍中国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所作的估计。张春桥认为，这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17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我们的教育部长也有问题”。

同时，在迟群一伙的策划下，教育部向国务院写报告，诬称周荣鑫利用《教育革命通讯》，“制造否定教育革命的舆论，在部内外造成思想混乱”，要求从当月起暂停出刊，这份报告经张春桥同意批准。

1976年1月5日，为了推广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经验，江青等人控制的《人民日报》在《加强党的领导，开展教育战线的大辩论》的标题下，发表朝阳农学院党委的文章《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文章把对“朝阳农学院经验”持有异议的观点，说成是“翻案”、“复辟”的奇谈怪论。



1月14日，江青等人的党羽“方海”写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文，在《学习与批判》第一期发表。“方海”的这篇文章和“梁效”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紧密配合，伪造苏联教育史，为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造舆论。

“方海”在文章说，20世纪30年代，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们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这时，“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便窃取苏联教育界领导权”，接过实现国民经济技术现代化和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革命口号，对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革命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攻击造成学校‘混乱’、学生‘知识水平低下’的教育革命”，进而“复辟”了旧的教育制度、招生考试制度。

“方海”在文章中还说，正是由于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苏联学校里才培养出来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样的这个“家”、那个“家”一类的“精神贵族”。也正是由于这些人“窃取”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才使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沦落成为“法西斯的社会中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这个历史的教训对中国人民来说太“深刻”了。

“方海”在这篇文章中把苏联20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鼓吹“学校消亡论”的“左”倾思潮吹捧为“教育革命的方向”，把20世纪30年代初期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教育路线、整顿学校诬蔑为“复辟”旧教育制度，并且把它归结为苏联变修的原因。

“方海”如此颠倒苏联教育史和苏联历史，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影射攻击中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影射攻击“教育革命”路线，从而进一步影射攻击邓小平及教育战线上执行正确方针的广大干部群众。

1976年1月16日，新华社在北京大学师生员工开展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深入发展的一则电讯中，概括了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场斗争是在校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去年七、八、九月份，教育界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否定教育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北大党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看出了这是一股修正主义的“西风”，决心和它对着干。校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几年来教育革命的经验，保卫教育革命的成果，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1976年2月1日，《红旗》杂志第二期就发表了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署名辽宁大学“大

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影射攻击邓小平，江青等人授意其御用写作班子在报刊上抛出一篇又一篇文章。

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文章中说：“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没认过输。”文章还把邓小平称做是“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称做是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文章还宣称“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

2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半是谤文半是挽歌——痛斥苏修对我国教育战线大辩论的诬蔑》的文章，文中对教育大辩论的目的、意义、内容做了叙述。

文中说，我国教育战线上正在广泛深入地开展一场革命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深刻揭露了在教育界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对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文中说，对建国以后17年的教育体系应当怎样估价？我们的教育要不要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这正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场大辩论首先面对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清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先是实行“基本照旧”，把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制度保护下来，不准改革；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那一套，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封、资、修教育的大杂烩。那时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重地统治着学校，用“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等剥削阶级思想腐蚀毒害我们的青年一代，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教育阵地却仍然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多么怵目惊心的事实！“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充分表达了亿万劳动人民的心愿，也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所作的历史的宣判。这样的教育制度，无产阶级当然要彻底摧毁它，岂止将它“一笔勾销”，而且要口诛笔伐，深入批判，不断地肃清它的流毒，决不允许它在中国复辟。这是我们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文章极端地宣称，“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

文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教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措施。千百万革命接班人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茁壮成长，必将使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朝阳农学院党委的文章《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我们在哪些重大问题上坚决同 17 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文章把解放后“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称为“旧学校”，并总结了他们与之“对着干”的 10 个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一、旧农大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新农大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二、旧农大集中办在城市里，新农大分散办在农村。三、旧农大大搞“学而优则仕”，培养精神贵族，新农大实行“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新农民。四、旧农大大搞“智育第一”，新农大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五、旧农大极力标榜“正规化”，新农大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六、旧农大搞“三中心”、“老三段”，新农大建立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新体制。七、旧农大高楼深院，与世隔绝，新农大坚持“几上几下”，同三大革命运动息息相通。八、旧农大是少数人享受教育特权的“小宝塔”，新农大越办越大，越办越向下，使广大群众都有机会受教育。九、旧农大只让学生受奴化教育，新农大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十、旧农大教师脱离工农，新农大坚持教师同工农相结合。努力建立一支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

2 月 24 日，迟群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江青等人安插在教育部的党羽，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由周宏宝任组长（周宏宝原为上海第一钢铁厂三级车工，后任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中共十届中央委员），由薛玉珊任副组长（薛玉珊原为沈阳军区炮兵七十五师副政委，1971 年借调到国务院科教组任大学组负责人）。

新成立的“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完全剥夺了教育部部长周荣鑫的职权。随后，病情严重的周荣鑫被逼作检查并且每日都遭到残酷批斗。4 月 12 日，周荣鑫在批斗会上昏倒之后，却被无理拖延，没有被及时送往医院。周荣鑫被送到医院后，又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正确的治疗，以致当夜含恨

去世。

1975年12月18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时是毛泽东的联络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此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主要三个方面：1. 阶级斗争为纲；2. 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3. 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正。"毛泽东阅后批示："可以。"12月21日，毛远新将他整理的毛泽东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

1976年2月2日，毛远新再次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当日，毛泽东又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以"。

1976年在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3月3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中央通知稿时曾批示"同意"。

其中关于文化教育问题，指示中说，就有些人反对"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毛泽东认为，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毛泽东指出，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



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毛泽东指出，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成立后，为了突出与"旧学校""对着干"，从5月6日~6月23日，分3批召开29个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推广辽宁省1975年高等学校试行的"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的"三来三去"经验。

7月25日，教育部转发《辽宁省教育局1975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总结》，并在通知中说，辽宁省1975年各类高等学校试行"三来三去"原则的经验"很好"，是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分配制度、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深入教育革命、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和工农划等号的普通劳动者的"重要措施之一"，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学习、推广。

这一年，全国高等学校共招收工农兵学员21.7万人。

经过全面整顿后教育战线刚刚出现的一线曙光，瞬间为大辩论的狂潮淹没掉了。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走向全国

1975年在教育战线掀起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引燃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火。1975年冬，江青等人以教育战线的大辩论为“突破口”，污蔑刘冰、周荣鑫“否定教育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是后台，制造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氛围。“梁效”所写的题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文章发表，成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标志。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批邓运动全面展开。1975年12月，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判邓小平。江青等人在会上大肆批判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

12月2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口头检讨。邓小平在这次“检讨”中，表示，对于对他的批评感到“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并坦率地承认他“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这次会议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随信附上他“检讨”的记录，表示想面见毛泽东。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检讨”和信没作任何批示。于是，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对邓小平进行批判和“帮助”。

1976年1月3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第二次“检讨”。这次是书面“检讨”。加了一条，检讨“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请示主席，没有提到政治局讨论”。随后，邓小平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这份书面“检讨”，并在信中再一次提出“面陈”的要求。

就在这种政治气氛中，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这是他被再次打倒前在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周恩来的逝世和进行丧事活动，推迟了中央政治局“讨论”会的召开。周恩来丧事活动刚刚完毕，“批邓”战火立即重燃。

毛泽东没有见邓小平，1月14日他在邓小平1975年12月20日和1976年1月3日的“检讨”上批示：“印政治局讨论”。

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邓小平再次作“检讨发言”，并在



会上进行“讨论”。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一次给江青等人提供了翻云覆雨的机会。由于毛泽东发出对邓小平的批判，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猛烈攻击。

会上，江青等人甚至追问邓小平，为什么提出要见毛泽东。面对江青等人的刁难和责问，邓小平讲，他要向毛泽东当面陈述自己对于错误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工作问题。邓小平还心怀坦荡地说，不讲阶级斗争是他的“旧毛病”（换句话说，就是他的一贯思想）。邓小平甚至更直率地说，要说他“犯错误”，他是因为根本立场错了，具体工作就会错。

随即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表示，他是一个不适应于担任主要负责工作的人。这实际上是邓小平正式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请求解除职务的要求。

这次会议结束后，邓小平不顾夜已深沉，于当天晚上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并随信附上他在1月20日会上的发言记录。

邓小平在信中说，他两次要求面见毛泽东，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听取毛泽东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他的工作问题。邓小平并且表示，在批判时提他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他自己十分犹豫。提，怕觉得他受不得批评。不提，又有恋权之嫌。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还是当面谈这个问题好些，再不提出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过失。因此，他向毛泽东提出解除其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并请毛泽东予以批准。

信中写道，他“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再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他自己，“一切听从主席和中央的决定”。信的结尾，邓小平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日期是“1月20日夜”。

1月21日，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向他汇报1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邓小平愿意作自我批评。

当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还想谈他自己的工作问题时，毛泽东说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以后再议，可以减少邓小平的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毛新远问毛泽东对邓小平是不是还采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毛泽东肯定地回答说“对”。

选择接班人，继续开展批邓运动。

为了实现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目的，1月2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揭发邓小平。王洪文将其上海走卒马天水的所谓揭发材料呈送给毛泽东。

揭发材料说，邓小平于1975年6月12日与马天水谈话，告诫马天水不要与江青等人为伍，还点了张春桥的名字。王洪文写道，他觉得邓小平的这

次谈话，从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的，是一次“挑拨策反”。

1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王洪文还私自起草了一个以中央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长篇讲话。

2月1日，江青、张春桥亲自布置其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要理解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其目的是要借文艺作品攻击和诬陷邓小平以及全国各地各部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力求更快地将邓小平“打倒”。

由于周恩来去世，国务院总理职位出现空缺，没有一个主要负责人主持国务院工作。而此时，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状态，已无法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必须有个人带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为此，毛远新曾请示毛泽东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

毛泽东指示，就请华国锋带个头，让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华国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邓小平专管外事。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也就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通知说，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十分不满。“一号文件”让张春桥失望至极。张春桥忍耐不住心头的气恼，写下了一篇日记：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一号文件”下达后，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专管外事”，但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文件。紧接着，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打招呼会议。

2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的小礼堂里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在与上海代表谈话时攻击邓小平说：“他是

一言堂，独立王国，法西斯。”

江青并要求上海代表“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江青说，“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张春桥对上海代表谈话时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国务院决定进口外国成套设备是“买办资产阶级”，是“垄断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张春桥并说大批老干部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是“敌人”。

王洪文于2月份起草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的讲话时，攻击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反对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2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在打招呼会上讲话，要求大家回去以后把学习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文件放在首位，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

华国锋并在讲话中提出了政策界限。他传达毛泽东的话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负责”。

华国锋还在讲话中要求：“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

至此，“批邓”问题正式在党内公开。邓小平由不点名批评到被点名批判。

为了大批“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江青等人密集布置了大量文章。2月1日，江青就布置赶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文艺作品。江青让于会泳等人赶快布置，将与“走资派”斗争的电影改编为京剧，紧密配合“斗争”。

2月6日，张春桥向于会泳下达“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的任务。张春桥说，可以定一个地区，一个市甚至一个省、一个部；要有思想深度，要写出“走资派”的特征。

2月16日，江青对《人民日报》上吹捧《朝霞》丛刊《序曲》的文章作“批示”，要求把该书中一些写“走资派”的作品改编为电影、戏剧。于会泳等人立即召集各种会议加以落实。3月2日，影片《反击》由迟群筹建的班子开始炮制。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批判旧世界中建设新世界》，批判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同一天，上海的《学习与批判》杂志

刊登文章批判邓小平整顿派性、起用老干部。2月16日，江青、张春桥指示《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化大革命铸造的一代新人》的批判文章。紧接着，新闻纪录片《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投入摄制。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阶级斗争，促春耕生产》，公布了毛泽东批评"三项指示为纲"的讲话。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再论孔丘其人》，影射攻击邓小平。

文章说，孔丘是"一个十足的翻案复辟狂"，"虽然掌权时间不长，却疯狂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同日，《学习与批判》第二期发表"梁凌益"的《从（宣和遗事）看"元祐更化"》、"宫欣"的《回顾20年代苏联党内的一场大辩论》，影射攻击邓小平同托洛茨基一样是"搞的完全是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黑货"。

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题为《评"三项指示为纲"》的文章。这篇文章歪曲事实，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并诬称以"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文章并把"三项指示为纲"说成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把实现四个现代化污蔑为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文章中说：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3 月 1 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又紧随《评“三项指示为纲”》后发表“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红旗》杂志第三期并发表题为《反修必须批孔》的文章，将周恩来 1972 年致力于纠“左”的思想和行动诬蔑为“复辟资本主义”。

江青等人的御用写作班所写的这些文章，把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诬蔑为“右倾翻案风”，鼓动各条战线开展“反击”；把邓小平关于提拔专业人才到领导岗位的正确意见批判为“专家治所”，“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提出要在科技界“实行专政”等等。

3 月 1 日，《红旗》杂志发表“翟青”的《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影射邓小平和司马光一样，“一上台，就借‘整顿’为名，放手干他的复辟倒退勾当”。

至此，江青等人对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批判和攻击渐渐进入高潮。

1976 年 3 月发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其中一条是“翻案不得人心”，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他们现在还在走。”第三条是“邓小平这个人不抓阶级斗争。他从来不以此为纲，总是白猫黑猫，不区别帝国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3 月 3 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重要指示》，作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文件。

《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毛主席重要指示》中说：1949 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 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

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毛泽东认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不满意，二、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明确地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在《毛主席重要指示》中，毛泽东强调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他的原则。毛泽东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泽东说：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运动的政策问题，毛泽东建议，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80%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年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毛泽东并建议党内同志读哲学，读鲁迅的作品。毛泽东说：

“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论孔丘》，冯天瑜（时任武汉师范学院教师）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还可以看郭老（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讲话，要求组织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学习贯彻。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华国锋2月25日的讲话。

至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正式在全国大规模开展起来。

3月7日，姚文元诬蔑邓小平制造毛泽东讲过"老九不能走"的"谣言"，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翻案"。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改的题为《翻案不得人心》的社论。社论说：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监（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社论说，"走资派"是反对毛泽东的，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因此，毛泽东提议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

社论还说，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社论在把邓小平作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同时，有针对性地说：

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

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论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因此，这样的斗争以后还会继续下去。

3 月 14 日，《学习与批判》第三期发表《梯也尔小传》，大骂梯也尔“整顿和改编”军队，“反攻倒算”，“镇压革命、投降卖国”。文章甚至对邓小平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

在《学习与批判》上，这类文章比比皆是，如《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 Q 小 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司马光登台一年》等等。

3 月 16 日 ~23 日，文化部召开“制作座谈会”。于会泳在会上传达张春桥、江青关于写与“走资派”作斗争文艺作品的“指令”，并布置了 20 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影片创作规划。其中，写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 8 部，写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 12 部。

在江青等人炮制的文艺作品中，《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是代表作。6 月，影片《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开始拍摄。7 月 1 日，《欢腾的小凉河》上映。

到此，江青等人完成了预定的目标。即利用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掀起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进而公开打出“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旗号，把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推向全国。

江青等人借“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夺权声势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全面开展是伴随着中央领导人的调整进行的，1976年2月的中央“一号文件”，调整了邓小平的职务，“四人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同时确定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对“四人帮”又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为了获得最高权力，“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造舆论。从批邓到影射华国锋，从批邓到意欲打倒所有老干部。

1976年3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6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梁效”的长篇文章《“克己复礼”再批判》，影射攻击邓小平“攻击革命的大好形势”，“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扼杀”新生事物，“恢复”旧的制度。这篇文章在“批邓”的同时，也影射攻击了华国锋。

为了树立自己在全国的影响，江青等人借反击“右倾翻案风”，私自召集12个省、区座谈会，大肆宣传自己的一贯正确，并在会上对印发的关于“风庆”轮问题的材料发表长篇讲话，攻击邓小平。

在讲话中，江青诬蔑中国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售原油、煤炭、棉布，是“汉奸行为”；攻击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攻击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修正主义王法”，是搞“管、卡、压”，主张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煽动无政府主义；攻击要求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是“利润挂帅”，鼓吹“利润越低越好”；攻击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和措施是“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攻击国家大力提倡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是“走专家路线”，叫嚷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等等。

在讲话中，江青污蔑攻击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大汉奸”、

“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等。

江青还借批邓无耻吹捧自己为武则天式的英雄。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江青露骨地表露出当“女皇”的野心。她借武则天吹捧自己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会后，江青还要求将她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印报毛泽东、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等。

华国锋认为此事重大，专门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于3月10日批示说：“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

为了给篡党夺权扫清障碍、打倒老干部，江青等人抛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妄图重新“打倒”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老干部。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早在中央2月会议期间，张春桥召见在上海的亲信时就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研究阶级关系；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

2月底3月初，在王洪文、张春桥的亲信徐景贤等人的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了大型的“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所谓“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

3月1日，经姚文元审定的署名“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人民日报》于3月2日转载。3月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两篇文章污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论证“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文章认为：“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4月初，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在会上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大谈“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

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在大搞舆论攻击诬蔑的同时，江青等人也对许多老同志进行批斗围攻。他们把恢复工作的老干部诬蔑为“还乡团”，煽动层层揪“代理人”、“复辟派”。

一些坚决执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进行的全面整顿的部门领导人被撤职，重新受到批判。万里、胡耀邦、胡乔木等被罢官和批判。

江青等人在这一运动中，迫害了大批老干部。其中，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江青等人乘机篡夺了教育部的领导权。

借“天安门事件”彻底打倒邓小平。“天安门事件”平息以后，江青等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规模更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江青等人在周恩来病重和逝世之后，他们一直把邓小平、叶剑英看做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这两个“障碍”虽然遭到打击，但是“尚未彻底搬除和摧毁”。

这时，江青等人利用“天安门事件”这场政治风暴，大肆制造“口实”，要揪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已达到彻底打倒邓小平的目的。

4 月 6 日晚上，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

张春桥在会上说：“天安门事件实际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在这次会议上，江青等人就如何深入“批邓”，搞臭中国的“纳吉”，如何审讯被捕的“反革命分子”，如何利用录音、拍照等现代化的手段继续追查“反革命”线索等等，一一进行讨论。

毛远新赶忙给东北传话说：“邓纳吉在党内是有市场的，在高级干部中有相当的市场”，“现在出来闹的都是小喽啰，大人物不好轻易说话，不说话不等于没说话”等等。于是，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一时间掀起了“批邓”、揪“中国纳吉”的恶浪。

4 月 7 日早晨，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 4 月 6 日平息“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几件事。

毛远新汇报说，华国锋建议将北京发生的事通报全国，并起草了北京市委的报告，中央要发个文件。对此，毛泽东表示“公开发表”，并表示不发表北京市委的报告，而是直接发表《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现场报道”。

毛泽东又作出“新的指示”，即据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

籍，以观后效"，并且交代"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

毛远新问："是否由中央作个决议，也公开发表呢?"毛泽东给予肯定的回答："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

在这次与毛远新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让华国锋任总理，并同中央的决议一起登报。

4月7日下午，毛泽东又作了补充指示，华国锋还要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第一副主席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破例，从未有过。毛泽东指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是针对江青等人的。因为这时，华国锋任代总理，王洪文和张春桥，一个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常委，名次不好排。有的省给中央写报告也写王洪文"副主席"，不写"华代总理"。而且，王洪文、张春桥曾一再给毛泽东出过难题，以"不好见报"为理由，不愿意参加接待外宾。

毛泽东认为，王洪文和张春桥之外，还加个江青，都看不起华国锋，而大权又不能交给"上海帮"。于是，毛泽东决定在"副主席"前面加个"第一"，就成了"第一副主席"。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随后，毛泽东对这两个决议都批示"照发"。

第一个决议是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决议》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第二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十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文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的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这篇报道竭尽颠倒黑白、造谣诬蔑之能事，说"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

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

报道把人民群众对江青等人的声讨和对“左”倾错误批判的抗议说成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把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邓小平说成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把人民群众拥护邓小平的领导说成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抬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从4月8日～10日，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中共中央之命，集合游行，表态拥护中共中央下达的两个《决议》，谴责邓小平，向中央发电报表示支持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人民日报》对此发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造成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拥护”两个《决议》的假象。

4月9日，《人民日报》用《首都一百多万军民上街游行热烈欢呼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决策》的大标题和《北京市一万多名青年代表举行大会，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两个决策，愤怒声讨邓小平的罪行，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誓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副题及其内容占据第一版面。

“天安门事件”后，中国出现了一个江青等人操纵的短暂的“恐怖时期”。公安部门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大肆搜捕参与“天安门事件”的“罪犯”。

北京及其他各地也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追查和搜捕“天安门事件”和其他类似事件的积极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叶剑英也成了怀疑对象，在被查之列。一大批人被拘捕或被判刑。

江青等人在对革命群众进行大搜捕的同时，掀起了更大的“批邓”运动高潮。他们调动御用写作班子“池恒”、“梁效”、“程越”、“方刚”等就“天安门事件”大写“大批判”文章，每天在《人民日报》、《红旗》等各种报刊杂志上像连珠炮似的打了出来。其攻击矛头集中在邓小平身上，诸如“万箭齐发，对准邓小平”、“愤怒声讨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罪魁祸首邓小平”等等，充斥在舆论宣传阵地。

4月13日，姚文元在凌晨和深夜两次同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通电话，诬陷邓小平是“匈牙利的纳吉”，诬蔑清明节前后悼念周恩来的广大干部群众是“搞匈牙利事件”，授意心腹按照这个调子编资料、写文章。

姚文元在凌晨的电话中说，“邓小平是纳吉没有什么问题”；姚文元在

深夜的电话中又进一步布置任务说，“匈牙利事件，你们可以搞个小资料——纳吉是什么人？搞好后送我看看”。

当这个心腹把整好的纳吉资料上报后，姚文元又在 4 月 17 日打电话告诉其心腹说，张春桥、江青对这个资料“提了些意见”，要他修改后再送；并且又追加任务，对于“匈牙利事件”，可以编个内部资料。

江青等人混淆是非，抹杀事实，大搞所谓“追谣”，把罪恶的矛头指向邓小平，对与他们作斗争的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政治迫害。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也利用历史，紧密配合。4 月 14 日，靳戈的《谣言考》在《学习与批判》第四期上发表。文章《谣言考》说：

“儒家，造谣就是他们的一大特长。孔老二给法家先驱少正卯扣上五条罪状，不靠谣言是办不成的。”“儒家儒家，其实是谣言世家”。“戈培尔鼓吹的造谣一千次就可以变成真理这一类骗子哲学，发明权应当是属于他们的。”“政治谣言，更是直接为反动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可以从中察觉这个阶级的进攻目标和走向。举其大者，有如下数端”：“其一，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其二，为野心家篡夺政权呼风唤雨”；“其三，借谣言打击进步力量”；“其四，颠倒历史，实行翻案”。

《谣言考》在每一段落都引用了一些历史故事作为注脚。文章说：“总而言之，反动派在想什么，他们反对谁，拥护谁，往往会通过谣言表达出来。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造谣决不会有好下场”，“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反革命谣言制造者，同样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江青等人纯粹是贼喊捉贼。其实，“谣言世家”倒是他们自己的写照。

4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把为伸张正义投身于“四・五”运动中的广大人民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诬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

社论说：“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社论认为，“天安门事件”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紧相连。社论说：

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都作了充分表演。在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散布政治谣言，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清明前后，又跳出来进行种种破坏活动。有的四处串连。秘密上书



中央，要邓小平“当总理”；有的吹捧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他张目；有的暗中策划，为闹事的人撑腰打气；有的公开活动，张贴反动标语、诗词，发表反动讲演，狂喷反革命的毒汁。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同邓小平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只要党内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进攻，帝、修、反就会同它们呼应。这一次，苏修叛徒集团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它所谓的“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来了，没料到邓小平失败得这么快，还没有来得及鼓掌，就垂头丧气了。一切善良的人民，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提高认识，擦亮自己的眼睛。

社论说，对“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对“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镇压”。这些就成为江青等人明目张胆的行动准则。

社论最后说，“一切革命同志”，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4 月 20 日，署名“高路”的文章《“整顿”与“正名”》在《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抛出。文章首先对邓小平进行公开的猖狂进攻，妄图以此作为突破口，达到他们“揪一层人”的罪恶目的。

5 月 9 日，“高路”的文章《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违背毛泽东的指示，另搞一套，打击和诬陷邓小平。

文章还说，邓小平要“网罗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包庇、重用一小撮坏人”，组织“还乡团”。文章把邓小平贯彻整顿方针诬蔑为孔丘的“正名”，把邓小平落实干部政策诬蔑为孔丘“举逸民”。

5 月 16 日，在《五・一六通知》发表 10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题为《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10 周年》的社论，社论诬称邓小平等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5 月 1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题为《党内确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的文章。文章写道，“到天安门广场

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天安门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

6月18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1964年12月12日的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一个批示印发全党。明确提出“批邓”是要再次揪出并打倒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7月1日，《红旗》杂志第七期发表“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特别强调，邓小平被打倒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走资派还在走”，“还会有新的政治代表和头面人物”。可见，江青等人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还要整倒“一层人”，即正在台上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中央、国务院一些领导同志。

迟群在几次讲话中说，“有一层人势力很顽固”，要特别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一级盯一级”，“一级一级往上盯”，“一直盯到中央政治局”；“仍然会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

姚文元于7月1日审改的《清华大学党委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强调，要警惕“走资派”“篡夺”各级领导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

在此期间，毛泽东由于“天安门事件”的“意外打击”，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决定不安排毛泽东会见外国贵宾。

从毛泽东的实际健康状况来看，他确实已经没有精力和脑力来领导整个国家的“批邓”运动。这样，“批邓”运动就在江青等人的操纵下，发展成为再次揪出并打倒一个“官僚主义阶级”的运动了。

江青等人利用各种渠道，搜集和整理诬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大量材料，以攻击这些领导同志。

王洪文私自调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国防工办等单位从1975年6月～1976年1月的部分文件、会议简报，大肆拼凑黑材料。

江青等人的亲信把持的上海市总工会，断章取义地整理印发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材料43种，25万多份，被点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副委员长15人，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20多人，省委书记13人。

7月，姚文元又布置中国科学院调查“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同自然科学工作有何关系”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与历史”。他们把党的核心小组70%的成员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把一大批干部打

成“还乡团”、“复辟势力”，是“修正主义社会基础”。

在中央计划工作座谈会召开前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密谋策划，以王洪文的名义拟出全面夺取党、政、军权力的计划。他们认为时机未到，没敢将这个计划公布于世。但是，他们仍然以计划为蓝本，指挥和遥控全国各省市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而把揪出并打倒党内“官僚主义者阶级”的理论付诸行动。

在北京的谢静宜更是有恃无恐地肆意散布江青等人的种种谬论，说“人大常委会开会时，你看那个样子，叫人哭笑不得。那些老头，有的是瞎子，有的是聋子，有的是小车推来的，有的是别人扶来的，有的是拄拐棍来的，有的抱着枕头（指氧气袋）。开一次会，有的上厕所三四次。委员长讲话，得秘书在旁提词，讲两个问题忘一个问题。”打倒老干部的野心昭然若揭。

总的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冲击下，经过1975年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

在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一些铁路枢纽重新瘫痪，交通堵塞，货物积压，列车晚点。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大批判的局面。

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指出：“毛泽东同志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因而再度陷入混乱。”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贡献

1976 年 1 月 8 日，在四人帮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越烧越旺的动荡时刻，周恩来告别了他为之终生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告别了把毕生心血投入其中的工作岗位，带着不舍与遗憾，留下了他未尽的事业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贡献，总体来说，抵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如包括宋庆龄、郭沫若、李宗仁等著名人物。维护国家和国民经济的运转，使其没有遭到完全破坏，使国家工作能够在动乱中延续下去。

自 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周恩来就处在风口浪尖之上。十年中，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下，周恩来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尽一切可能减少损失。十年中，他充当了治安队长的角色，哪里有动乱，哪里有窟窿，哪里需要扑灭过了头的“革命之火”，就总能看到他的身影。文革之初，他努力维持国家的正常秩序，在打倒一切的革命声浪中，他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面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他协助毛泽东夺取了胜利，扶正危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和纠正极左思潮的错误，使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他根据毛泽东的决策，积极促成和落实邓小平同志复出并主持中央工作，全力支持邓小平领导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极大鼓舞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评价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

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

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由党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运动，身处其中的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无法完全脱离其中。对此，1980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问时做了评论，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存了他。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在1979年1月4日的讲话中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彭真说，有些事他不那样做，“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他是委曲求全，处境困难。”

伍修权在回忆中深情地说：“十年动乱中，我们党和国家遭受了空前大劫，周恩来同志也被推到了一个相当为难的境地。

“他同党内绝大多数同志一样，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反动行为和罪恶勾当是深恶痛绝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这场运动是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作为中央领导人和毛主席的主要助手之一，不得不在组织上表示服从。特别是林彪、江青之流抓住他在遵义会议以前一度执行过的‘左倾’错误路线，要挟他不能再‘反对毛主席’。他只得尽量克制自己，认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拥护他作出的决定，为顾全大局而暂时委曲求全，力求缓和可能引起的党内冲突，他的心情和处境是可以体会和理解的。他一贯的善良厚德也曾经被别有用心之徒所利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既拥护、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又不理解、跟不上，而当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非作歹，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时，周恩来又义无反顾地同他们的倒行逆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在中国的这个特殊历史阶段，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崇高敬意。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特别是林彪、江青

两个集团的破坏，“在荆棘中潜行，在泥泞中苦斗”，顶天立地，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其超人的精力、胆识和才华，做出了令世人钦佩的贡献。

周恩来面对动乱，尽力维持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希望将损失降到最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担当的是“救火队长”的角色，哪里出了乱批乱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在工作组问题上，7 月 18 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召开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在听取了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汇报讨论后，批评刘少奇、邓小平等派工作组是压制“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周恩来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是“我们没有很好地交代，也没有召集他们开会”。这里他一方面主动承担了责任，一方面也为工作组的同志讲了话，事实上是在保护这些干部。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讨论“十六条”时，他与“中央文革”顾问陶铸商量并向毛泽东建议，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进一些限制性的政策规定：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区分和对待干部，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保护做出过贡献的科技人员，搞运动不要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等。

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搞多长时间，要达到什么目标，此时周恩来并不清楚。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他主张时间不要持续太长，免得影响生产。为此，他曾于 1966 年 8 月请示毛泽东，提出中央和国务院机关的运动到 10 月中旬告一段落的设想。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毛泽东一开口，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多达 1 100 多万人次。加上以后的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以及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像的。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组织各机关、学校妥善接待，并不失时机地、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走上正轨。由于周恩来等人不断努力，在 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后，红卫兵串联才停止下来。

动乱中，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政机关和军队。1966 年 11 月，造反派以查“黑材料”为名要冲入中央档案室，周恩来得知后，立即



派李质忠前去制止。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以“破四旧”为名，要搜查档案，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接着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1967 年 2 月 17 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操纵造反派叫党组“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并宣布“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1967 年 8 月底，周恩来把王力 8 月 7 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文革小组的另一成员戚本禹于 1968 年 1 月也被批捕，打击了极左势力。

“文化大革命”初，周恩来支持军队叶剑英等领导人“长城不能毁”的观点，制定稳定军队的措施。1967 年 1 月 14 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以后还颁发了“军委八条”和《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稳定军队的重要，并批评冲击军队的行为。

1967 年后，经过周恩来的大量工作，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中央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领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并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切无不倾注了周恩来的心血，终使严重混乱状态在 1968 年初得到遏制。但由于毛泽东坚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运动根本不可能像毛泽东所设想的那样二、三年内结束，而是拖了 10 年。正因为周恩来的存在和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这场历史性灾难的打击，并维持了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周恩来努力维护国家和国民经济的运转，极力降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根据“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设法把“革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全力保护生产少受干扰和损失，使人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得以保障，并使生产稍有发展。他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

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闹什么革命?”可是愈演愈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因此，周恩来、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鼓吹“革命”的文革小组，1966 年底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认为是以生产压革命，并请出了林彪，他们把“革命”看成至高无上，其他损失都是最小的。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大革命”的兴起，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并不退缩回避，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减少经济损失。在工业、交通和农业等经济部门，实施了各种措施，保持稳定。对于混乱的铁路、交通部门和工矿企业则实行军管。国内形势稍趋稳定时，周恩来便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制定了 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

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还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保护老干部，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战胜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造反派”：“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因此，这一斗争也是极为尖锐复杂的。运动之初，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免受伤害，如彭真、邓小平、杨尚昆、薄一波等，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使许多人渡过难关。1967 年“二月抗争”后，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冲击，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亮相”，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周恩来保护一大批老干部，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老干部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有利时机，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问题，即 1971 年全国职工人数突破 5 000 万人，工资总额突破 3 000 亿元，粮食销售突破 800 亿斤。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抓经济整顿工作，调整比例关系，严格控制基建规模，紧缩通货，控制货币投放等工作都取得明显成效。1973 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



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财政收支平衡。这一年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也为以后的治理整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周恩来在经济调整中，还以战略家的眼光，打开对外合作的大门。1972年根据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拟定的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先进的化肥、化纤技术设备的方案，在排除了“四人帮”的干扰，经毛泽东、周恩来审批后于1973年初执行。这是新中国的第二批大规模的引进，提高了我国工业的技术含量，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推进了工业的现代化。

周恩来努力清除“左”的影响，筹划光明的未来。1967年周恩来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1971年上半年更是反复强调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又一次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代表党内健康力量，高举批判极左的大旗，与“四人帮”进行不懈的斗争，并使其“文化大革命”以来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在实际工作中生效。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花大力气平反部分冤假错案，解放一批领导干部；二、整顿企业，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局面；三、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四、迅速打开对外工作局面，改善对外关系。

周恩来纠“左”努力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是通过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设法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批老干部重新出来为党和国家工作。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有力否定。周恩来妥善处理“九·一三”事件后，即向毛泽东力荐叶剑英负责军委日常工作。这就为军队掌握在党内健康力量手中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避免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祸害。对于解放老干部，周恩来曾作过这样的解释：“落实干部政策，上头的‘解放’了，政策就明确了；‘榜样’有了，下边就会跟着落实。难度大的，先从容易的入手；容易的解决了，难的也容易了。”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文化大革命”中屡遭批判的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王稼祥、廖承志等一批老同志，或在一些公开场合频频露面，或被解除长年的监护，得以住院治疗，由此带动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的一大批高中级干部先后复出、复职。特别是促成邓小平的复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党内存在一个“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说法，事实上否定了由此制定的有关决议及其“左”

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它促使更多的老同志获得解放，恢复工作，并削弱帮派势力，使党内健康力量不断发展，为以后粉碎“四人帮”积蓄了中坚力量。

周恩来在其纠“左”努力受挫，并一度受到批判、攻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因为时日不多而退缩。他带着病弱之躯，在医院里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筹划着党和国家的未来。最主要的有两点：一、重申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计划，筹备并主持四届人大。在取得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了以他和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班子。这也为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支持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贯彻四届人大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他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邓小平。

周恩来努力维护保证国家经济建设，不使国民经济崩溃。到1966年底，全国除解放军野战部队外，各级党政军机关基本上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全国出现“打倒一切”的大动乱。对此，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恢复生产。

这时，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领导一些尚能工作的党政部门，尽力维持社会安定、正常生产和国家政权职能的运转。面对无法阻挡的“文化大革命”他对副总理、部长们说：“这场革命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要因势利导。”副总理、部长们正在挨斗，他们十分气愤，认为自己不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也不应该像对待地主一样挨斗。周恩来劝他们主动做检查，因为在当时只有做了检查才有可能得到群众的谅解，才有可能出来工作。他希望他们尽快出来工作，因为经济生产一天也不能停。

他还对派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的负责干部余秋里、谷牧不无担忧地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同时，他还曾对副总理李富春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表明了他要扭转混乱局面的坚定决心。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措施，全力以赴保护生产少受损失，尽力保证人民生活的基本要求。

早在1966年7月14日，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李富春主持召开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强调各部门不要放松当年生产计划任务的落实和完成，要



注意督促检查。

9月初，周恩来又亲自主持起草了《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提出红卫兵的行动要有组织纪律性，要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要保证党和国家职能部门对内对外工作及国民经济动脉的铁路运输等“不受影响”、“正常行使”。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等人否定了。

9月5日，周恩来在北京市中等学校红卫兵座谈会上讲话，明确提出革命的目的还是为了促进生产。工厂和学校不同，不能把生产停下来，放假闹革命。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他不厌其烦地把这些道理讲给狂热的红卫兵听，力图使他们的行动纳入有领导、有秩序的轨道。

8、9、10月，是学生进京“大串连”的高潮阶段，给铁路运输造成极大的压力。周恩来亲自过问，要求业务部门妥善处理好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周恩来对他说，已经见了好几百万了，火车、吃饭、住宿一切都免费，再来就困难了。毛泽东说，现在才开始，要接见成千上万。于是，周恩来又毫不推辞地承担起一切组织接待、生活安排、宣传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他每天还要亲自过问和审看工交部门的生产报表、铁路货运的计划、煤矿产量、原料供应等。他特别要求铁道部要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多次指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影响！”他对协助抓铁路工作的谷牧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他让谷牧在9月底突击起草了一份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稿。

9月14日，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两个文件。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等等。

这两个文件传达后，有利地支持了各地党委的工作，受到基层生产第一线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维持了社会生产和县乡厂矿等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

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依然抽空听取有关经济建设的情况汇报。11月9日，他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9月7日，该报曾发表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这篇社论严肃批驳了只强调“革命”，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观点，突出强调“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适用于一切单位和部门，是“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而“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

对此，林彪、江青等人十分恼火，公开污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是“救火队员”。“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在一次会上说：工人闹革命的两次高潮，被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压下去了。

11月13日，陈伯达将“中央文革”起草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运动的12条规定交国务院，要求尽快答复。这个规定提出了“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旨在突破“文革”发动范围的条款，与周恩来的意见大相径庭。当拿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时，遭到各地与会者的一致反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听取李富春、余秋里、谷牧汇报座谈情况后，明确指出：工交战线搞“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分期分批地搞，坚持八小时工作制，不得擅离工作岗位，不得内外串连。他还根据座谈会提出的问题，决定成立国务院业务组，负责管理经济工作及工交企业的生产，并要他们立即起草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有15条内容的修改稿，对陈伯达的12条规定作了几处实质性的修改。

然而，周恩来的努力却遭到林彪和“中央文革”的反对。12月4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的汇报。会上，林彪及“中央文革”严厉批判这个汇报是“以生产压革命”。一连三个半天，谷牧遭到围攻。周恩来承担责任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

12月6日，林彪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否定了汇报提纲，并荒谬地说：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时期也可能降低生产，如果用生产成绩大小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是大错特错的。生产受一点损失，其他方

面得一点收获，在政治上得到收获也是重大收获。他还说，“这次运动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这就将运动的重点从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扩大为所有的干部，大大增加了打击面。

最后，会议通过了陈伯达修改而成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文件否定了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允许学生到厂矿串连和厂际间串连，允许工厂企业成立群众组织。工交被突破了，农村、财贸也随之突破。

1967年的上海等地的夺权引发武斗迭起、派性纷争、经济受损、每况愈下的混乱局势，致使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未能完成，1967年的计划不能如期制定。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矢志不移，在更艰难的环境中抓生产、抓业务。

首先，他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同志，尽力使国务院健全的领导系统不被打乱。1967年1月4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说：“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轻易罢官”，即使某些领导人有错误，也“应当让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同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走资派”、“犯严重错误的”是极少数，“犯个别的一般性错误的是极大多数”，因此，“撤职查办要少，撤职查办的，也要叫他们工作，不要扫大街去”。

其次，采取紧急措施保护重要部门和单位的工作秩序，继续限制动乱波及的范围。大夺权开始后，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仅靠原有的领导抓生产还不行，非常时刻要有非常措施。

为此，他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在中央军委副主席、秘书长叶剑英等的配合下，采取军管的办法维护党和国家职能部门的工作。

周恩来在“文革”中领导国防建设

文革时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国的核工业一枝独秀，成为受干扰最小的行业部门。从文革一开始，周恩来总理就紧紧抓住核工业不放。

“1966 年 6 月 30 日，周恩来亲自到火箭发射试验基地视察工作。同年 9 月，当我国核弹、导弹结合试验的工作准备就绪时，周恩来又亲自过问实验工作的许多细节，包括导弹飞行弹道、爆点、安全自毁装置等，并一再指示，要绝对保证安全。直到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对‘两弹’结合的保险措施和安全自毁装置‘冷’试验和‘热’试验的安全可靠性进行了证实后，周恩来才放下心来。”

“文革”狂飙中的 9 月 25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他既要表态支持“文革”，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防科技事业少受干扰，其把握难易程度，不言自知。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是在思想上有毛病，在工作上还是要团结。”10 月 8 日，周恩来明确提出，对核试验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10 月 27 日，装备核弹头的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准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飞行试验获得成功。周恩来又不失时机地指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在此期间，专门委员会还原则批准研制攻击型潜艇。

12 月 11 日，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提出了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为使核武器系列化，周恩来提出，1968 年要把“东风 3 号”搞出来，“东风 4 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1964～1968）解决。并同意在当年 12 月底或次年 1 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1967 年，局势更加混乱，夺权风也刮到了国防科技领域。周恩来为了保护中央专委和国防科技骨干，想方设法阻止“造反派”夺权，而“造反派”



却打着“革命”旗号恣意妄为。这个度如何把握，实际上要比走钢丝还难。针对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一事，他气愤地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又说，“与国防工业相关的各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他反复告诫有关人员：“这些单位是国家的绝密工厂、院、所，对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极其重要，一定要保障其绝对安全，保证其连续生产。”“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不准串联，不准停产，不准武斗，不准夺权。”周总理竭尽全力地保护了参与我国尖端科技的技术专家和行政领导干部。他命令第二、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科研院、所的军管会负责人，采取切实措施，保护列入名单的科学家和干部的人身安全，并严肃指出：“如果这些人发生意外，我要找你们。”钱学森曾回忆说，“‘文革’中，我们都是受保护的；如果没有周总理的保护，恐怕我这个人早就不在人世了。”

在那样的局面下，能发出批评夺权派的声音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一些处境困难的中央专委委员接到中南海保护起来。这期间，周恩来还嘱咐秘书转告受到冲击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坚持住，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张爱萍曾回忆：“恩来同志如同保护许多同志一样竭尽全力救我于水火。在罗瑞卿同志突遭厄运时，恩来同志派我去大西北基地指挥第三次原子弹试验，这当然是工作的需要，但也有很浓的保护色彩。在揪斗成风时，他又任命我为总理联络员，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处理部院合并的事宜，这虽然也是势在必行，但也有让我避开风口浪尖的意图。可是，我终于在他力不能及的情况下，被投入了一个秘密监禁人的地方，被扣上了一长串置人于死地的大帽子。”

为防止“造反派”的夺权行为干扰尖端武器研制，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首先在国防工业等相关系统实行军管。

正是由于周恩来的倾心维护，1967 年的 5 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的加工装配以及试验准备工作才全部完成。5 月 9 日，周恩来主持第十八次专委

会，要求6月20日之前做好氢弹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于6月1日～10日，陆续提出六七月份试验场和烟云经过地区的详细的气象资料，再决定试验日期。

6月初，正在准备氢弹试验的关键时刻，七机部一个名为“九一六”的“造反派”组织居然占据了国防部大楼。由此可见，尽管三令五申，国防工业系统也不可能成为世外桃源。6月3日，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九一六”派：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当晚10时至次日凌晨4时，周恩来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搞“万炮齐轰聂荣臻”是错误的，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可以，但不能揪斗，必须给他们足够时间去工作。现在，中央有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往后推迟。不要搞疲劳战，以免造成事故。

周恩来的讲话，使“造反派”多少有些收敛。

1967年6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委小会，研究氢弹试验的时间等问题。为加强领导且保护聂荣臻，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要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聂荣臻心领神会地回答：“义不容辞!”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六次核试验。

12月10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第七次核试验问题。针对“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周恩来下了命令：“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基地有人说，现在为试验，试验后再算账，再造反，这是错误的。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安排下，12月27日，我国第七次核试验取得成功。

时间进入到1968年，派性斗争已是难以调和，国防工业受到的干扰越来越严重。

4月20日，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



组成班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7月初，国防科委机关“造反派”诬蔑聂荣臻“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黄永胜、吴法宪据此写报告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为保护聂荣臻，7月11日，周恩来在报告上策略地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1968年12月11日、13日，周恩来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3号”中程地对地导弹的试验报告。14日，他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

12月27日，我国用自行研制的“东风3号”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热核试验。

在“文革”乱局中，周恩来始终坚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以保证尖端武器试验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

1970年2月8日，周恩来提出，要在国内搞核电站，要靠发展核电解决上海用电问题。后来，他又指示说，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

在筹建核电站的同时，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准备工作也进入紧张阶段。1970年4月24日晚，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当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试验下水。毋庸讳言，由于“文革”的干扰，尖端武器试验确实出现了一些事故。对此，周恩来并没有责怪参试人员。他一方面指示暂停试验，另一方面要求大家坐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找出失败的原因，再继续试验。

“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利用有利时机，重新启用了一批干部和科学家。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医生确诊患有膀胱癌。但他依然抱病多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1974年4月1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中央专委会会议，审查二机部一座核材料生产工厂的建设调整方案，并讨论清华大学的试验性核

电站工程急需解决的一些问题。这也是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专委会议。这次会议审查批准了上海“728 工程”（即后来的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他一再告诫：“要想到21、22 世纪，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他关心的不仅是核武器，他的目光更远大，已经考虑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用核能来解决电能不足的问题，造福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此后，周恩来被病魔摧残的身体，已支撑不起中央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令他欣慰的是，中国在 1975 年 11 月 26 日，成功地发射了一颗返回式卫星。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这一系列成功，都离不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

华国锋走上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岗位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中央领导曾的人事变动作出安排。通知说，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邓小平专管外事。此后，又于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确了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

对照毛泽东1963年5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提出的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一人事调整，似乎体现了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当时，毛泽东说：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懂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不是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第四条：要讲民主，不搞“一言堂”，不搞家长作风。第五条：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对五条标准还做了解释。1964年7月初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7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家中同毛远新谈话。他说“这五条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是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条件下，这两次人事变动，是毛泽东保卫“文化大革命”这一方向性问题的一个重大举动。不过，在这个非常时刻，毛泽东保留了极为重要的清醒。他没有把党、政府和军队的大权交给江青等人。

这样，华国锋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也标志着毛泽东接班人的尘埃落定。

华国锋完成这样的过程，经过了很长时间，从这个过程看，能够最终选择华国锋，主要有以下几件事十分关键。

1955 年夏，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了华国锋的名字。1955 年 7 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华国锋在学习了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后，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等三篇文章，这些带有浓郁湘潭乡土气息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并记下了华国锋这个名字。1955 年秋，毛泽东回到湖南视察，在长沙第一次接见了担任湘潭地委书记的华国锋。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老实厚道、忠诚可信的印象。1955 年 10 月，毛泽东破例邀请华国锋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华国锋在全会上介绍了湘潭地区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经验。

1959 年 6 月下旬，毛泽东回到湖南，在长沙约见了已经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兼省委文教办主任的华国锋，并提出要回韶山家乡看看。华国锋立即作出安排并陪同毛泽东到韶山。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形势时，没有唱高调，而是实事求是地说："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产量不可能那么高了。"那时，华国锋主管的工作已经和农业问题没有关系了，但他还是讲了自己的观点。

同年 7 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问题牵连到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中央迅速调湖北省委书记张平化接任周小舟，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这时，中共湖南省委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揭批周小舟的反党和军事俱乐部问题。但是，周小舟在湖南的用人、行政是深得民心的，特别是在湖北等邻省大刮"共产风"之时，小舟冷静处事，避免了湖南的重蹈覆辙，连陶铸都不能不承认周小舟的所作所为是客观实际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湖南省委在批判二周（周小舟、周惠）的时候，很有些阻力，新任书记张平化在情急之中看到了华国锋的一篇文章《论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的政治基础》，此文虽然有些粗糙，但是，在那样的现实下也是难得的。湖南省委因此布置下去，就华国锋同志的文章展开深入揭批周小舟问题的巨大声势。张平化进京之后把华国锋的文章也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赞赏："我们的干部中要是多几个华国锋这样务实肯干的老黄牛式的同志，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就可能少走一些弯路。注意培养中层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现在看还是非

常重要的。”有了这两次的深刻印象，再加上华国锋在湖南获得的一些政绩，在毛泽东眼里，华国锋的理论水平，实干态度都得到了认可。

华国锋出任湘潭地委书记之后，由于对毛泽东故居的完善和作过保护，并有一个指示，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青睐。他指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成功，湘潭的一草一木都是革命的见证，都是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文献。我们今天保护好毛主席的故居就是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高度负责。以后，这里不仅要成为毛主席生活、战斗过的地方的纪念馆，也要成为中国革命的纪念馆。”①

当这段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的时候，毛泽东对左右说：“此人（指的是华国锋）很有些理论水平，不简单。”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居然能给一个普通的地委书记这样一个评价，可见，华国锋的工作还是比较到位的。

1964 年 7 月 1 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也破土动工。华国锋主持奠基，尔后，他调动全省一切力量支援这项工程建设。10 月 1 日，韶山毛泽东陈列馆落成开馆，从动工到落成，仅用一百天。

同时期，华国锋十分重视支持袁隆平发展杂水稻。

“文化大革命”初期，华国锋也曾受到冲击并被批斗。1967 年 7 月以后，当 47 军主要负责人黎原和省军区负责人龙书金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革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听罢，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要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就这样，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副组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很快就升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0 年 8 月 23 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同时继续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2 月 18 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斯诺，讲话中谈到了华国锋。毛泽东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班子里人。斯诺回去以后，写了一篇记述在北京与毛泽东谈话情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其中也提到了华国锋的名字。华国锋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国际上。

1971 年 1 月，庐山会议后，经毛泽东提议，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

下，他参与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华国锋晋升到中央工作伊始，还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接班人，因为那时候王洪文正在当红。然而，华国锋没有自己的任何班底，没有和京中任何的大老有任何超越工作关系之外的特殊联络。这被毛泽东视作可靠、单纯。毛泽东不止一次的提及华国锋："国锋同志的优点是厚重、朴实，对党忠诚，组织观念、纪律性很强。不像有的同志以为进京了，尾巴翘到了天上去。老子天下第一。"

1973 年 7 月，任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同年 8 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周恩来同志主抓农业工作，取得了成绩，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1975 年 1 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 2 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学等方面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重科学技术工作的发展和高科技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开始的前夕，在中央召开的农业学大寨的会议上，华国锋的发言再次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表扬华国锋高屋建瓴的看问题，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国锋同志的讲话表明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的广大干部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一举一动都是洞若观火的。国锋同志的敏锐的政治观察力是值得你们这些同志学习的，我看这篇讲话要印发政治局，印发到县团一级，国锋的水平我看不在春桥之下嘛。[2]

1976 年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 1 月 8 日在北京病逝。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在此前后，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1975 年 12 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



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1976年1月12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3]

15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1月20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4]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5]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在此期间，毛远新请示毛泽东说，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主要负责人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个人做具体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6]

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7]

华国锋这时55岁，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1971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

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毛泽东在28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1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2月初，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8]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1月28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2月3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9]

2月7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10]

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和地位，不使中国出现苏联马林科夫的悲剧，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办法。一、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把华国锋提拔到接班人的位置上来。华国锋的地位就此奠定，一跃而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



这是鉴于中央当时的人事状况作出的选择。在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还有王洪文和叶剑英。王洪文早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资历之深非华国锋所能相比。所以毛泽东必须给华国锋加上“第一”，才使华国锋的接班人身份变得十分明确。

这样，毛泽东于1976年4月7日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以明确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

在确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之后，国务院总理，毛泽东特别在1976年4月对张、姚作过这样的“最高指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

不过充满忧虑的毛泽东，特别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嘱咐”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最后几句话说得那么悲凉，说到了“动荡”，说到了“血雨腥风”，说到了“天知道”，就因为毛泽东知道在他死后，华国锋未必压得住阵脚。毛泽东早就说过，他死后，江青会闹事。他担心，华国锋未必斗得过江青。所以，他把华国锋和被他称之为“四人帮”的四个人一起召来，说了那番意味深长的话。[11]

1967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华国锋同志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赞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实行隔离审查，一举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他先后主持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在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入经济建设等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他主持下，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为1976年广大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一批重大错案平反。

在稳定全国局势的同时，华国锋同志重视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重新发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号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搞上去，多次强调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注释：

①见《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第11页

②《我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汪东兴著，1995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第102页。

③毛泽东对七机部舒龙山来信的批语，手稿，1976年1月12日。

④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76年1月20日。

⑤毛泽东同毛远新谈话记录，1976年1月21日。

⑥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⑦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1月21日。

⑧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陈锡联任职的通知，1976年2月2日。

⑨张春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手迹。

⑩姚文元日记，1976年2月16日。

⑪叶永烈：《邓小平改变中国》，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版。



“四五运动”的酝酿

1976 年，周恩来的逝世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又处在了危难的关头。面对大好形势的逆转，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孕育了强大的反抗力量。

4 月 5 日，中国人民为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的复出，声讨江青等人，再次爆发了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被后人称为“四·五”运动，它的发生同五四运动一样，不是历史的偶然，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经历了全国的大动乱，眼见一批批的老革命家被打倒迫害，特别是经历了林彪的折戟沉沙，许多有识之士开始猛醒；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全面整顿中开始复苏，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发生了强烈的逆转。周总理的逝世，“四人帮”的疯狂，这一切，令人们发出了“中华何处去”的问号。

全国人民从希望到失望乃至最后的绝望，“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沉默，终于在清明节前后不可阻遏地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等人的强大的抗议浪潮。

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已达 10 年之久。林彪反革命集团及江青等人在这期间肆意横行，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于 1975 年主持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上任后，进行了各方面的整顿，深得人心，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

江青等人则抓住这一时机，继续推行极“左”路线，妄图重新打倒许多老干部，并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江青等人的这些举动，更是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强烈愤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深担忧。

正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展之际，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

周恩来不在了。人们把重大希望和热情支持给了邓小平。可是，邓小平也被江青等人毫无道理地打下去了。

在中国大地上，江青等人借“批邓”之名肆意横行，为非作歹。面对这样的严峻局势，广大人民群众都在认真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1976年1月12日~14日，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深厚的感情，为离去的周恩来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首都百万人民群众自动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两侧，等待灵车通过，形成了古今中外从未见过的送灵场景。

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以各种形式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而江青等人为了限制周恩来的政治影响，对群众的悼念活动极力加以限制和破坏，对悼念的群众进行威胁和迫害，并利用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大肆攻击周恩来等人。

2月6日，江青等人有意在新华社发行的《参考资料》上编发了蒋介石一手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材料，诬陷周恩来。

接着，《学习与批判》杂志以介绍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为由，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顿时，上海街头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漫画。

2月9日，《文汇报》发表《“甘罗十二为上卿”的启示》的文章。文章就甘罗在12岁时被任用的事情，捏造了一篇在秦始皇和吕不韦之间的“儒法斗争史”，并借题发挥，把甘罗这个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吹嘘成“一批执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年轻人”的“代表”，说“他们年轻，朝气蓬勃，斗志旺盛，对新事物敏感，革命热情高，没有什么包袱”，还夸耀他们对秦王朝的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文章借吹历史亡灵，来吹嘘自称中央“最年轻”的王洪文以及江青等人培植的翁森鹤、张铁生一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为他们在篡党夺权中“大显身手”而作舆论宣传。

文章还借甘罗“比身为相国、人称老臣的吕不韦高明”，影射攻击已经逝世的周恩来。

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张铁生在大寨进行破坏活动以后，又在太原发表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张铁生得意忘形，彻底地暴露了江青等人“研究儒法斗争史”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密切联系。

张铁生说，通过对儒法斗争史的“研究”，懂得了“前进与倒退的辩证



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由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派掌权，历史必得倒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掌权，革命就将发展”。

在讲话中，张铁生还说，“民主革命派”的思想体系都是“儒家”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搞经验主义”。

由此不难看出，张铁生讲这些话的目的就是恶毒攻击革命老干部。

2 月 13 日，署名“高路”的小评论《孔丘之忧》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高路在这篇小评论中，对孔丘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悟忧也”大肆发挥，指桑骂槐，对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以及沉痛悼念周恩来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恶毒攻击。

文章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广大干部群众污蔑为“哭丧妇”，并说“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高路”在这篇文章中充分发泄了江青等人对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和沉痛悼念周恩来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刻骨仇恨。

2 月 14 日，“贾漱章”的《台阶小论》一文在《学习与批判》第二期发表。《文汇报》提前一天转载了这篇小论文。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张春桥精心炮制出笼的。

1976 年初，马天水便派人注释清代龚自珍写的《明良论》，并印送上海市委常委阅读。江青曾经多次布置其写作班子借龚自珍的《明良论》写批“台阶论”的文章。

江青等人批判“台阶论”的实质就是攻击邓小平所坚持的组织路线，攻击在实际斗争中培养、考验、提拔干部的方法，并将其污蔑为“论资排辈的封建恶习”。

“贾漱章”在文章中说，“台阶如同官阶。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了爬到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爬起台阶来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尽管这些人爬得头昏眼花，筋疲力尽，半死不活，甚至还有人从台阶上跌下来摔死，可他们自己还是乐此不疲，觉得爬得很有滋味的。”“在那个时代，资格第一，阅历至上”。

贾漱章在文章《台阶小论》中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地主阶级刚刚兴起的那段时间，用人还不是那么讲资格”。著名的法家人物商鞅在秦国雷厉风行地实行变法时，还不到三十岁。在那些“头脑昏庸的秦国守旧官僚”的眼中，商鞅就属于所谓“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的年龄。这类人更够不上“开始爬台阶的资格”；而那位支持商鞅变法的秦孝公，只有 20 刚出头，

比商鞅还要年轻。“然而，就是这两个没有什么资格的青年人，在秦国地主阶级推动下，使秦国从奴隶制开始向封建制过渡，从而干出了一番划时代的改革事业”等等。

在文章最后，“贾漱章”还叫嚷“台阶之风不破，培养千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期望岂不是完全落了空?”

这篇文章借批所谓“台阶论”，为打倒老干部，为“新生力量”上台，大造舆论。

许多读者在读完这篇文章后非常气愤，纷纷写信、写稿提出对“贾漱章”的尖锐批评。

一位解放军战士写了一篇题为《从托派骂“老近卫军”想到的——斥〈台阶小论〉》的文章。这位解放军战士在文章中这样说，《台阶小论》中“大谈‘官阶’的一段言语，跟当年‘托洛茨基的信’中那些关于‘官僚’的议论”，实质上是非常相似的。

2月15日，“高路”又写了一篇小评论《“仁”的妙用》，并继续在《光明日报》发表。“高路”写这篇小评论同样是为了影射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

文章《“仁”的妙用》说，孔丘“仁”的妙用，就是用“爱”这件外衣来掩盖阶级斗争，只允许自己复礼，而不让别人革命。文章还说，孔子的弟子孟轲是在借“安定”、“统一”，让新兴地主阶级放弃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和专政，从而实现复辟奴隶制的一统天下的梦想。

文章在结尾写道，“在刘少奇、林彪相继垮台以后”，“关心”、“爱护”、不要“伤害”人的“仁爱”经又开始大念起来。这只能让人们再一次认识到，“孔丘的幽灵还在继续游荡”，从而“使批孔的战鼓敲得更响”。

在江青等人的授意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炮制的《再论孔丘其人》，于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第一期同时发表。这是一篇影射攻击华国锋和邓小平的文章，也是江青等人批判“代理宰相”的代表作。

在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后，“梁效”根据江青等人的旨意，在3天以后炮制了《再论孔丘其人》。当有人提出在文章中写上“代任总理华国锋是否合适”时，迟群狂妄地回答说“可以写”。

原稿还有一些十分露骨地影射华国锋的话，如“孔丘是利用阴谋手段，混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中都的行政长官），不久又升为司空（负责建设、规



划等事务），接着调任司寇（管理司法、治安工作），最后竟得到了代理宰相的职位”；“在他 56 岁时，由司寇代理宰相”，而且“兼管农业”等等。

后来，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也感到太露骨了，于是悄悄改为“他在鲁定公十二年，由司寇代理宰相”。

3 月 1 日，“高路”写了《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并刊载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其实这篇文章是“梁效”所写，只不过姚文元自己做贼心虚，怕“梁效”写得太多出差错，才把署名改为“高路”。

与此同时，“池恒”写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一文，也在这期《红旗》杂志上发表。“高路”与“池恒”的文章前后呼应，密切配合，极力鼓吹江青等人所提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

“高路”还把鲁迅的话加以歪曲，说，诬蔑老干部是“正在阔气”的“走资派”、“复辟派”，是“同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反动路线一脉相承的”。

因为江青等人的祸国殃民，因为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因为建国以后较长时期的“左”倾思潮，因为毛泽东晚年的一次又一次严重错误得不到全面纠正，所以全国人民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痛苦。

但这一切，终因周恩来的逝世，因为江青等人不准悼念周恩来的行为，因为周恩来逝世后的最佳总理人选邓小平的“再度落马”，而引发出广大人民群众撼天动地的吼声。

面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人民群众的反击活动从总理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就开始了。

习惯以忍辱负重的方式来承担民族厄运的中国人民，以沉默来表达愤懑心情的中华民族，终于在这个时候发出了一次怒吼。所以这种怒吼将不可置疑地决定中国历史的命运。悲壮的抗争之光终于撕破积聚已久的乌云。

1976 年 2 月初，山城重庆冶金建设公司第一子弟中学教师谢幼田在解放碑交电公司大楼东侧的墙上贴了一张署名“一工人”的大字报《提请注意》。谢幼田在大字报上写道，“请广大人民注意斗争的新动向”；“批‘右倾翻案风’的矛头到底对着谁?”；“对一伙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的阴谋，全国人民一定要警惕”。

2 月 13 日，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黑龙江分公司中山路仓库汽车司机何庆华从哈尔滨发出一封《致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一封公开信》。

何庆华在信中写道，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分子，利用窃取的重要岗位，把自己伪装成“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着红旗反红旗”，名义上搞大辩论，实质上是大镇压，谁要有半点不同意见就打成反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将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2月1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干部、共产党员窦守芳在北京天安门前、王府井、西单、西四等地，张贴揭露江青等人阴谋的小字报。窦守芳还针对清华大学组织张贴大量“批邓”的大字报，在清华园内贴了许多张小字报。

小字报说，那些大字报是江青等人压出来的。他们有的是舆论，缺的是人心。他们凭借的是白色恐怖，用的是煽风点火、运动群众的手法，目的是篡党夺权。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被他们的谣言所蒙蔽。

2月23日，福建省机械局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吃了豹子胆”的大字报，题为《“阿斗”的呼声》。文中历数了“四人帮”的六大罪状，震惊福建，波及全国。随后，福州市的许多市民纷纷在大字报上留言，表示支持刘宗利，从而影响波及了全国。后来，王洪文于3月8日亲自下令追查。

2月26日，2月26日，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青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在词中，厉海青锋芒直指林彪、江青等人的逆行。锋芒直指林彪、“四人帮”的逆行。

2月28日，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清在解放碑交电公司大楼墙壁上贴出了署名大字报《我爱我的祖国》。白智清在大字报中把江青等人比作“丧尽天良的牲畜们”，指责江青等人让多少个烟囱停止了冒烟，多少部机器停止了运转，多少辆火车停止了运行，钢铁产量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赤字上升。

在大字报中，白智清还赞颂邓小平主持整顿工作后，1975年的钢产量是在近10年净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也是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全面恢复的一年。为此，白智清责问到底是谁葬送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甚至不放过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条件。

3月2日，武汉市贴出了“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现代化”等许多大标语。随后，武汉市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署名为“塞成中”。

同时，武汉锅炉厂召开有200百多人参加的集会。人们在集会上公开点名批评江青、张春桥。

重庆钢铁公司技术员白智清继2月28日之后又于3月4日把他写的题



为《试问，到底是哪家主义？——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6 000多字的大字报抄成几张，贴在成都间市区盐市口。

白智清在大字报上义正辞严地说，近段时间内，上海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在各大街头公开刷出了"要马列主义的理论家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的反革命行动，人民群众绝对不能再沉默了，一定要起来反抗。

大字报说，张春桥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打着马列主义旗号，贩卖杜林修正主义黑货，给国家、给革命、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分子。大字报说，"我深信，在天安门广场上千千万万给总理守灵的人们，千千万万自动给总理戴黑纱的朋友，都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人民幸福"。

白智清在大字报中这样说，他深深知道，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大花园中，没有足够的鲜血是浇不开映山红的。最后，他在大字报中提出"要祖国富强不要生命！要马列主义不要脑袋！"的口号。

3月7日，山西太原江阳化工厂青年工人杨国珍，冒着被江青等人的爪牙"打倒"的危险，在太原市贴出"纪念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两周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这样的标语。同一天，太原市的钟楼街、五一广场等地出现许多类似的标语。随后，山西省人民文化宫的墙上出现了"反对江青"、"反对张春桥"、"反对姚文元"等标语口号。

3月9日，贵阳制药厂李洪钢、郭成望、王大卫、陈明云及贵州无线电厂的叶忠源、贵阳永恒精密电表厂的黄维鸣、贵阳黔灵印刷厂的卢炎等七名工人，在贵阳市中心的紫林庵街道上贴出长达3万字的《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大字报。文中对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致力于发展生产力的功绩与努力表示赞赏。极有见地地提出"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乃是我国在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此篇大字报反映强烈，很多群众认为大字报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并一致表示"支持这张革命大字报。"

这7名工人还将大字报的内容油印了300多份，在郑州、武汉、长沙等地张贴、散发。

3月11日，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了《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

赵大中在大字报中写道，他把张春桥的罪行公布于众，可以唤起人们的注意，“张春桥是个坏人！万一他的阴谋得逞，也要叫他的日子不好过。”这样，就是杀头也甘愿。“拳拳赤心，溢于言表。几天后，赵大中再次不顾个人安危，写出了更为激烈的续篇。

三明市郊陈大公社农机站的会计、赵大中的妻子，在赵大中的大字报受到署名“洪风”的大字报的攻击时，坚决地对赵大中的观点和行动表示支持。同时，她在《来而不往非礼也——评洪风》的大字报中指出，张春桥的命运跟林彪一样，决然逃脱不了垮台的下场。

3 月 13 日，陕西省西安市一名青年工人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这位青年工人揭露江青等人的罪行，同时附诗两首。诗中写道：“望巨星，殒于天，泪洒江边。看今朝，男盗女娼，怨恨满人间。”

3 月 20 日，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泽东。杨振汉在信中批判了张春桥的谬论。接着，杨振汉又于 3 月 26 日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信。

这期间，在郑州、杭州、长沙、厦门、齐齐哈尔、呼和浩特、徐州、顺德、吴桥、伊通等市、县，也有许多人通过贴大字报、大标语，发送传单，进行演讲等形式，公开向江青等人宣战、挑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杭州气轮机厂一位 23 岁的青年工人李旭君编写出一份在全国乃至世界影响极大假的《周总理遗言》。

这份假遗言真实强烈地表达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符合人民群众和党政军干部的愿望，也合乎周恩来的思想实际，击中了江青等人的要害。

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怀念和热爱，对江青等人的愤慨和憎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激起了人民群众一股爱与恨撞击的强烈怒火，如同天空中的陨石一样，随时可能燃烧爆炸。引起这种爆炸的导火线，就是江青等人的党羽在上海《文汇报》制造的反周恩来事件。

周恩来逝世后，江青等人给《文汇报》的亲信下达命令，让他们宣传周恩来时不能低不能高，其用心路人皆知。

在这道手令下，《文汇报》的“低调处理”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凡是描述或客观记录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悲痛怀念的词句一律删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散发近 500 多万份材料，公开点名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而上海的街道上更是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和漫画！

3 月 5 日，新华社在播发沈阳部队指战员学习雷锋的报道时，全文引用



了周恩来生前为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随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转载。但是，《文汇报》在转载时，把这一消息放到第四版，并且把周恩来的题词全部删掉。人民群众对《文汇报》的这一做法极为不满。

时隔20天，也就是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又火上浇油，《文汇报》的表演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篇通讯比3月10日《人民日报》的社论《翻案不得人心》和3月5日《文汇报》删改周恩来的题词更加露骨了。在第一版刊登了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通讯。文中竟然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锋芒直指周总理和邓小平！人民群众一看便知道，"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含沙射影地污蔑周恩来；"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影射邓小平的。

《文汇报》的这两支毒箭，射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心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热爱周恩来的神圣感情受到了严重的挑衅。一石激起千重浪。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明白，《文汇报》的后台是张春桥。《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见报后，全国各地的抗议电话、抗议电报和抗议信件，接连飞向《文汇报》。抗议声声翻作浪，《文汇报》收到的抗议信件、电报达420多件，抗议电话1 000多次。人民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文汇报》胆敢炮打周总理，我们决不答应！""反周总理的人不得人心！反周总理的人是孤立的！反周总理的人，在政治上必然是短命的！""《文汇报》是谁家的报纸？""你们的后台是谁？请站出来！人民是不会宽容的！！""你们到底是在受谁的指挥?！奉劝你们不要跟着张××的指挥棒瞎跑！""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

面对质疑和抗议，四人帮一面给文汇报打气，给予其"高度评价"，称其"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勉其再接再厉。一面辩护，姚文元云："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王洪文狂？删掉总理题词（指总理给雷锋的题词）算个屁事！"张春桥则颇为霸道地说："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

很快，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斗争，率先在南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红色冲击波，随后传导到了北京以至全国，终于形成能量巨大发的四五运动。

“南京事件”拉开了“四五运动”的序幕

在悼念周恩来活动中及其后因四人帮操纵出现的反周活动引起了各地人民的愤慨，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等人的强大的抗议浪潮最先在江苏省南京市轰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3月21日，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员，联名写信给《文汇报》编辑部，责问他们在3月5日出版的报刊中公然删去周恩来对学习雷锋的题词居心何在。

3月24日下午，南京新医学院约400名教职员工，踏着沉重的步伐，向雨花台烈士陵园敬献了第一个周恩来的花圈，挽联上用镀金字写上“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先烈永垂不朽”。一位摄影记者取下了这一挽联。

这个缺少了挽联的花圈，一下子便成为南京市民议论的中心话题。人们出于对“上海帮”的反感，在议论中很自然地将取走挽联的人说成是“上海帮”的人。于是，南京新医学院的数名教职工在新街口银行前贴出了“誓死捍卫敬爱的周总理”的大幅标语，以表示对“上海帮”的抗议。3月25日下午3时，各个游行队伍汇集到雨花台。人数多达十几万。他们继续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发表演讲，焚烧花圈和报纸。

3月25日，在《文汇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后，南京人民正在酝酿中的反对江青等人的情绪和行动变得更加不可遏制。

许多市民和学生举行了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等人的游行集会，并贴出许多大标语和大字报，其中有“揪出中央的赫鲁晓夫式野心家”、“谁反对周总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敬爱的杨开慧同志，我们永远怀念您”、“文汇报必须向全国人民公开认罪”、“打倒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新牌修正主义者”、“把文汇报的黑后台挖出来”、“不揪出《文汇报》的黑



后台誓不罢休”、“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批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等。

广大南京市民抬着花圈、横幅和周恩来的遗像上街游行。参加的人有学生、工人、知识分子，也有公安干警和机关干部。他们边走边高呼口号：“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不要封建法西斯专政！”、“人民是主人不是奴隶！”、“梁效梁效，专会造谣！人民日报，黑白颠倒！”

江青等人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让姚文元代替中共中央写了一份电报稿，并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名义发往各地。污蔑南京出现出现的悼念声讨活动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全部覆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南京和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怒火，并没有被中共中央的“通知”浇灭。他们反对江青等人的正义行为越演越烈。几乎每个人都准备在清明节前后把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再推进一步。

江青等人在江苏的代理人按照江青的意思，炮制了以后不准去梅园、雨花台等地举行悼念活动的禁令。这一禁令被泄露后，人民群众更加激愤了。

南京大学数学系26岁的青年教师、团总支书记李西宁在听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和不准去梅园、雨花台举行悼念活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抢在省委的禁令传达之前去梅园，并决定连夜贴出通知，号召全校师生参加这一活动。

3月28日上午8点，南京大学数学系的400多名师生，不顾种种禁令，毅然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队伍前头，高举周恩来的巨幅遗像，遗像后面是由玉兰花组成的花圈，“光辉永照后来人”的横幅悬挂其间。队伍在李西宁和计算机专业一年级党支部书记秦峰及其他几位学生干部的带领下，特意绕道最繁华的新街口闹市区和大行宫，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出发前，游行组织者——李西宁神色严肃而又刚毅地说：“我们今天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去悼念周总理，我们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让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群众是不好惹的！”队伍抵达梅园后，李西宁又率全体师生面对总理遗像起誓：“向周总理学习！一定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一路上，交通警察为这支队伍开绿灯；车辆为他们让行；无数人民群众

肃立道旁向他们致敬。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这支队伍，从而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江青等人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洪流。

这支队伍大大地激励了人民群众反对邪恶的正义情绪和行为。街头巷尾声讨江青等人、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骤然剧增。这支队伍出发之前，李西宁这位游行组织者神情严肃而又刚毅地说："我们是怀着庄严肃穆的心情，前往悼念周总理的。我们这次就是要造成强大的声势，要那些反对周总理的人看看，人民是不好惹的！"

游行队伍到达梅园后，李西宁又率领全体师生面对周恩来的遗像宣誓："向周总理学习！一定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我们的革命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3月29日上午，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把3月25日的《文汇报》贴在校园里，用墨笔把"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句话勾勒出来，在旁边加上"看一看，想一想"六个大字。接着，他们又在南京大学南园宣传栏下面和对面，贴出"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这两条大标语。

3月29日，南大师生再擂战鼓，决意以血醒民。上午，他们贴出"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保卫！"下午，南大师生组成20多个小分队，将大标语贴遍了南京城的主要干道。晚上，他们又奔赴南京火车站，将一张张战斗檄文贴在一辆辆即将开出的列车上！

与此同时，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抄贴出1957年毛泽东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在《是粗枝大叶，还是别有用心》的标题下公布了《文汇报》就3月5日删去周恩来题词事件搪塞他们的复信。

3月29日中午，南京大学11个系的400多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奔向南京市街头。他们在各个主要街道，在开往各地的长途汽车上张贴了"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文汇报》'3·25'文章胆敢反周总理，罪该万死"、"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

南京大学的这一壮举，迅速得到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美术学院、南京汽轮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高校和许多工厂、厂矿企业工人的支持和响应。他们组成近百个小分队，纷纷上街刷写大小标语和张

贴大小字报。

一时间，抗议江青等人倒行逆施的大小标语遍布整个南京城。

3 月 29 日中午，在南京工学院 2 000 多名师生的率领下，全市约 14 万人抬着花圈，高呼口号，沿着鼓楼大街、中山东路前往梅园，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广播车不时播放着邓小平在周恩来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实况录音。许多手持半导体扩音器的青年站在高处发表激昂的演讲。愤怒的人群不时发出惊涛般的吼声。

3 月 29 日晚 6 时许，秦峰带领南京大学一队学生，手拿排笔、墨汁，腋下夹着纸卷，迅速前往南京火车站。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他们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刷上大标语。

秦峰等人将第一条标语刷在由上海开往成都的 82 次列车车厢两侧。在列车上的旅客们的护卫下，这些“《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向何处去”、“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等大标语由 82 次列车带到途经的各个地方，带到了成都市，起到了巨大的鼓动作用。

3 月 29 日晚 11 时许，南京大学的学生们又在车站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在开往上海的 405 次列车上刷上同样的大标语。但是，一个多小时后，这些学生打电话向镇江询问情况，才知道 405 次列车在镇江被扣住，标语也被冲洗掉了。

这时，学生和广大市民们更为激愤，决定在第二天用油漆刷写。3 月 30 日上午，南京大学、南京邮电学院、南京化工学院、南京汽轮机厂“七·二一”工人大学等 16 个单位，派人到火车站同车站工人一起，用水氯松、油漆、沥青等，在开往上海的 13 次特快列车上刷上大标语。这些标语是不容易冲洗掉的。随后，他们用这种方法在所有途经南京的南来北往的各列列车上都刷上了大标语。

南京邮电学院广播电视专业三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张夏阳还带头在旅客候车室和列车上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驴头”等口号，向旅客宣讲、揭露《文汇报》反对周恩来的罪状，断言这些家伙的阴谋决不会得逞，预言再过两三天，全国人民一定会行动起来。

在张夏阳的带动下，车站月台上、广场上、饭馆前，到处都有人演讲。与此同时，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在南京城里络绎不绝地出现。

南京建筑三分公司人事科科长龙连山，带头喊出“打倒江青”等口号，更是鼓舞人心。

南京的信息，在一夜之间，通过南来北往的列车、公共汽车传到江苏全省和全国各地。于是，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坚决支持南京人民的革命行动”等新标语。

对于南京人民群众反对江青等人的行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都是支持和赞同的。

3 月 30 日下午 5 时半，南京市最热闹的新街口、山西路西口等处，出现了南京警备区战士徐同新写的传单。徐同新来自江苏泰兴农村。徐同新高中文化程度，曾当过通讯员、炊事员、文书，也曾去浙江接过新兵，并且在那儿见过打砸抢和王洪文、翁森鹤的“第二武装”残害干部、群众的情景。

徐同新通过各种调查，了解到江青等人的许多反动行动后，开始起草一份传单。徐同新在人们下班时，将传单贴到南京最热闹的新街口、鼓楼、山西路口等地。

徐同新在传单上写道，“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几十年如一日，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历尽艰难险阻，踏遍万水千山”。“他机智勇敢，对敌坚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无私忘我，为党、为人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谋害周总理，反对毛主席，妄图搞垮军队。他们正在干着林彪没有干完的罪恶勾当”。“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

人们一边看传单，一边高呼“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当有人问“张春桥要不要打倒”时，群众异口同声地回答道：“要！一定要打倒！”还有一些人干脆在传单上签名，表示坚决支持。

徐同新的传单在南京城里大量地传抄着，并且被复制成大字报到处张贴。

与此同时，南京大学地质系教师康育义，在与两个陌生人交谈有关南京城的大标语与小字报时，越来越多的人被他鲜明的观点所吸引。在广大听众的再三要求下，康育义说出了闷在心里很久的话。康育义说：“周总理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为什么有人要反对他？为什么逝世三天就广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在讲演时，康育义旁征博引，论述人们所关心的生产问题、工资问题。



康育义向人们讲述了一个月前去贵州参加地下水考察时，看到沿途的荒凉和人民生活贫困的情景，斥责那些手握“反对唯生产力论”大棒的家伙，说他们“理论上反动，实践上荒谬，中国这样下去要垮台!”康育义在谈到对“批邓”的看法时，表示不同意给邓小平扣各种帽子。

康育义的鲜明观点和立场，吸引了更多的听众，也使人们受到影响。

继南京大学师生之后，南京的工人也正式走上街头，张贴标语。

3 月 30 日，一首题为《满江红——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词作令许多人交口诵吟。

3 月 31 日下午，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女医生王运德和丈夫张精英及这个厂的一名电工殷辉起草、书写了“深切怀念杨开慧烈士”、“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党和国家的报纸、电台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周必乱、反周亡国”、“党内这个走资派在上海大搞独立王国不得人心”、“舍得一身剐，敢把党内这个走资派拉下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打倒《文汇报》黑后台张春桥”等标语。

一个直径多达 2 米的大型花圈，陡然呈现在鼓楼食品商店大楼的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句挽联夺人心魄。只见两幅黑绸，上面特书 32 个大字：“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3 月 31 号下午 2 点 30 分，南京最繁华地段之一的中山东路，一幅巨型标语在一幢六层楼的顶端直泻下来，只见上书 15 个大字：“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接着，王运德等人把这些标语张贴在厂大门、中山门、七一四厂、新街口、大庆路总厂、新火车站沿线上。

同一天，南京市电信局三分局工会主席、测量班长秦世祚和他的同事，将一个直径达两米的大花圈安放在鼓楼食品商店二楼阳台上。阳光照射下，两句挽联夺人心魄。用两幅黑绸制作的挽联上写着 32 个大字：“心血操尽革命伟业如巍巍泰山立寰宇，骨灰撒遍祖国山河似点点春雨润人间。”

4 月 1 日，在南京铁路中学校园里和食堂门口，铁路中学教师厉传彬、学生王一民刷出每个字一米见方的悼念周恩来的标语。他们并在水泥地上写出了“打倒张春桥，清除隐患，挖出定时炸弹”等标语。这一天，南京城里到处都是数不清的悼念周恩来以及声讨江青等人的宣讲台、演讲台。从此，南京城沸腾了。

悼念周恩来、反击江青等人的活动在南京越演越烈的消息迅速传至江青等人耳中。

3月30日，王洪文再也沉不住气了。他亲自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要他们在南京的记者注意反映情况。王洪文说："南京事件的发生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

王洪文为了给"南京事件"定性，向北京报界他的心腹打招呼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目的就是想转移"批邓"大方向，借着《文汇报》删节"大作文章"。"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3月31日，南京一个记者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鲁瑛反映了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等人的情况。鲁瑛接到情况后，马上送给王洪文。王洪文阅后又立即送给江青。

3月31日晚上7点，王洪文打电话到人民日报社询问南京的情况。晚上9点，姚文元也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并要求一得到情况就马上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更是如坐针毡，惶恐、焦躁、恼恨不已。当晚10时，张春桥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询问南京的活动情况。

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关会议，在王洪文等人的操纵下，错误地认为："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指出"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要求对已出现的大标语"全部复盖"，声称要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错误的指令是难以收服人心的。

4月1日凌晨两点多钟，姚文元给新华社一位负责人打电话，对南京分社把"南京事件"的原因说成与"南京人民对总理有深厚的感情"、"长期以来江苏对上海的做法有意见"等说法发出责难。

姚文元训斥说："你们记者要有鲜明的立场。这明明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乱破坏，煽动群众，反对中央，怎么能说成是'江苏对上海有意见'呢？你们要对事物进行阶级分析，告诉你们记者，要提高警惕。"随后，姚文元又补充说，"要注意反映省委对电话指示的执行情况。"姚文元下达的这些指令，分明是在要求记者监视江苏省委。

4月1日晚11时45分，江青等人继前几天印发材料通知后，又对江苏省委发出"电话通知"。"电话通知"把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说成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并要求彻底追查"谣言"。

4月2日下午3时，江苏省委接到"电话通知"后，将"电话通知"传



达到全省。江青等人在江苏省委的走卒，立即组织大批人马到各个街道冲刷冲洗大字报、大小标语口号。同时，他们组织人贴出大字报，污蔑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是“为反革命复辟、政变制造舆论”，并要求支持广大人民群众正义行动的省市委的领导“承担政治后果”。

与上一次的“通知”一样，江青等人的“电话通知”无法动摇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反击江青等人的决心，反而更加激起了人民心中的怒火，增强了人民的斗争意志。抗议的波浪依然汹涌澎湃，“捣毁《文汇报》的土围子”的标语依然还在。

就在“电话通知”传达的当天，南京大学一间教室的课桌上出现了一首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捉妖战歌》一下子轰动了南京城。歌词寓意辛辣，文风苍劲，一语道破了江青等人的滔天罪行。同时，南京部队宣传站、虹桥、兰桥等地，陆续出现了“野心家张春桥翻案不得人心”、“向张春桥的修正主义文化部、宣传部开炮”等类似的标语传单。

4 月 3 日，南京邮电学院学生在南京市的大路边、电车上刷出了“保周总理无罪，批《文汇报》有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誓与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切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发挥‘五不怕’精神，坚持斗争到底”等 20 多条大标语。

4 月 3 日，南京邮电学院师生置安危于度外，毅然贴出一幅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同打着白旗反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反周总理的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要彻底追查！”“要发扬‘五不怕’的精神，坚持斗到底！”“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

与此同时，南京工学院 2 000 多名师生沿着鼓楼、新街口、中山东路到梅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南京市里更多的单位、群众，则用送花圈的形式代替游行、演讲、大字报、大标语等，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

4 月 3 日，去雨花台送花圈的人达 14 万人次以上。

4 月 4 日这天，虽然是星期天，但南京市各单位都不休息，照常上班。他们要以实际行动来怀念周恩来。但是，仍然有 8 万多人到雨花台悼念周恩来。

从 3 月底到 4 月初，南京市共有 1 600 多个单位，66.7 万多人到过雨花

台悼念周恩来，敬献了6 000多个花圈。这无疑对江青等人是个沉重的打击和严正的警告。南京市人民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让江青等人知道，人心不可侮，伟大的人民已经或正在觉醒。

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反抗江青等人的行动影响巨大，它使全国人民受到巨大鼓舞。当载有反对江青等人倒行逆施大标语的长途汽车、火车从南京奔向各地时，反对江青等人的火种也随之撒向了神州大地。

对江青等人祸国殃民的罪行早已忍无可忍的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南京人民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入声讨江青等人的斗争中去。

全国各大中城市上海、武汉、常州、无锡、杭州、郑州、太原、西安、淮阳，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各种形式的悼念周恩来、声讨江青等人的群众性活动。

此时，全国人民都发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好坏群众分得清，爱憎哪能靠命令”等呼声。

虽然江青等人对全国下达了所谓“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并提出了南京和其他各地的标语口号不准进入北京的要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是永远掩盖不了的。无数标语、口号仍然以各种形式被带进北京城。这一消息的到来不仅使首都市民对全国人民的战斗状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而且大大鼓舞了北京市民的士气。

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声讨江青等人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声讨极“左”路线给中华民族造成灾难性大劫难，坚决支持“代表党的正确领导”的邓小平的亿万人民投入的“人民战争”，以悼念周恩来为契机，在“南京事件”的引导下，揭开了序幕。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1月人民悲痛，2月人民睁开了哭肿的双眼，3月人民在怒吼，而4月人民便投入到决死的战斗。这场“决死的战斗”的高潮，就是从首都的天安门广场展开的。



北京“天安门事件”

随着“文化大革命”破坏性后来的暴露，党内外抵制“左”倾错误、反对江青集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3月底到4月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事件，被称为“天安门事件”。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随着周恩来逝世，邓小平的被批，叶剑英的被解除军队领导权靠边站，以及其他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受到打击迫害，使人们对自己的希望产生了担忧和不满，从而愈加怀念周恩来了。他们要求为被污蔑陷害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群众平反昭雪；要求恢复各级党的领导，有个安定团结的局面；要求集中力量把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求对祸国殃民、制造十年动乱的“四人帮”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搞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然而就在这个政治关节点上，江青等人却疯狂地压制和破坏人们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贬低周恩来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引发了人民长期积压在心中的强烈怒火。于是，一场强大的群众抗议运动爆发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各地的悼念和抗议活动，激起了北京广大群众的对周恩来的怀念之情。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从3月开始。3月19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红小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献上花圈。3月23日，安徽省濉溪县的一名普通干部张学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周恩来敬献了花圈。随后，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花圈就多起来了。

走进这肃穆的海洋，随时都可以读到感人至深的诗（词）句。

3月30日，一幅悼词张贴在五四运动浮雕下面。悼词中写道：“敬爱的周总理，您那和蔼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辉高大的身影，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是无法磨灭的。”“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您的革命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我们决心学习您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

性，”“誓与党内外的资产阶级血战到底！”“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您安息吧，全国人民永远怀念您。您的遗志自有后人继承！”

各地人民群众的悼念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

为防止事态在北京近一步扩大，3 月 24 日，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送花圈的单位、人数、送了多少花圈等汇总上报”。3 月 27 日，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人到天安门广场巡视，并根据情况，在夜间把白天人民群众送的花圈统统收走。北京市民兵指挥部奉命派员赶赴天安门广场“观察动向”。3 月 30 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①]

3 月 31 日，北京市公安局遣派便衣工作人员“以群众面目出现，把小字报、诗词记录下来，全部报告”。

4 月 1 日，北京市公安局负责人在公安会议上错误认为：“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

对于江青等人和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广大的人民群众非但没有被吓退，反而激起了他们的斗志。3 月 31 日，又有百余个花圈被送到天安门广场，哀悼周恩来的悼文，痛骂反革命分子的诗词也开始急剧增多。

4 月 1 日，叶剑英派秘书给邓小平送了一份《情况汇编》。这份《情况汇编》写了上海、杭州、武汉、南京四地悼念周恩来、反对江青等人的活动情况。

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反江青等人的斗争越来越处于明朗化和尖锐化的局面，江青等人恼羞成怒。于 4 月 1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局势。邓小平和叶剑英没有出席。紧急会议认为天安门广场等地张贴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央可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

姚文元在当天的日记写道：中央政治局召开六人“紧急会议”，他坚持要发出一个“严肃的通知”。毛泽东即批准了这个通知，发往江苏和全国。

毛远新于 4 月 2 日凌晨在信中向毛泽东汇报了 4 月 1 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的几件事。他在报告中写道：南京已有人“借‘总理遗嘱’闹事”。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

毛远新还建议毛泽东说，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共中央可以正式发一个文件，说明所谓“遗嘱”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



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

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于4月3日批示“同意”。

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连续召开3次紧急会议。会议传达了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灰楼里，成立了“联合指挥部”，抽调公安干警、民兵各3 000人与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以便随时出动。同时，把天安门广场按地段划分，派便衣“记者”混入人民群众之中，分片包干，严密控制，暗中监视、跟踪。

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的常委会议，又拟定出《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群众的措施。

北京市各团体、机关、街道、旅店等从4月2日上午开始，先后传达了政治局关于“南京事件”的“通知”以及北京市委的“电话通知”。中共中央的电话通知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②]

“通知”说，“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门前有“反革命捣乱”，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并警告广大人民群众不要去天安门广场，更不要送花圈。

面对“通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抗议江青等人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越来越多，人也是越来越多，北京重型电机工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抵天安门广场。中科院109名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上书：“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4月2日，在纪念碑北侧的旗杆上，一幅几十米长的黑地白字的条幅赫然入目，上书：“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更有诗寓意直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素纸黑纱含恸剪，苍松翠柏和泪扎。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定无花。”“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姚），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同日，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文中直指王张江姚。文中写道：“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韩志雄的举措当然引起了“便衣”的注意。晚10点多钟，韩志雄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

4月3日凌晨4点40分，王洪文亲自“驾临”天安门广场。同日，姚文元把革命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是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联合指挥部的人开始了秘密的逮捕行动。到4月4日凌晨，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的群众已达26人。

4月4日清明节，又逢星期天。首都人民悼念周恩来、抗议江青等人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一天，陆陆续续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人数高达200万人次。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科技战线“铁人”陈篪和著名作家、诗人魏巍为代表的科技文化界人士也纷纷到天安门广场。此外，有许多少先队员到天安门广场过队日活动，有许多共青团员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誓仪式。

“童怀周”——这个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主任汪文风为首的16位成员的光荣集体，先后编辑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天安门诗文选》等书收录了几乎所有诗文，为历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天，叶剑英和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彭绍辉也来到天安门广场。悲壮场面和庄严气氛深深地感染了这些老革命家。他们坚信党心、军心、民心不可欺，历史潮流永远不可逆转。

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披展血书，上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 ——中国无产阶级的红后代。”场面感人，壮怀激烈！

上午7时，青云仪器厂职工，排成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同时，曙光电机厂3 000多名职工从东单出发，走进广场。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也把他们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抬进了广场……

上午11时，首都钢铁公司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讲演，声泪俱下，感人至深：“阳春3月的连绵雨水，那是我们8亿人民流不干的眼泪。”“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慈祥的父亲！”“您忠诚的儿女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同志们，我们发现有那么一小撮人，把矛头对总准周理，这是我们绝不允许的！”“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总理得人心，人民热爱总理。这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同志们，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但是，我们要坚定信心，把那些野心家、阴谋家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垮！”



同日，纪念碑东侧贴出《叫人怎么办?》的诗词，为邓小平的不平遭遇公开辩护。词中写道："8 点钟上班，点上一支烟，倒上一杯水，翻开一本大参考，一看就一天。生产上不去，这是自然自然。自从去年'七一'后，面貌大改变，领导下基层，抓纲又抓线。任务明确方向对，群众心里好喜欢。加班又加点，卫星上了天。结果好话没听见，坏话一大篇。什么'人头要落地'，却成了大灾难。这叫人怎么干?！是不是不干才喜欢？不，他们想一手来遮天。3 人 10 只眼，阴谋篡大权，唯恐天下还不乱。同志们，怎么办？我们就要和他们顶着干，把他们的阴谋来揭穿！"

同日晚 9 时，纪念碑东南角出现了《第 11 次路线斗争大事记》，引来众人的围观。文中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引起了强烈反响！

广场上佳作迭出，欢声如雷。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写下了《扬眉剑出鞘》的名作。诗中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北京电子管厂供应科干部丁长江写下的《清平乐·敬悼周总理》的名词："海倒山排，天下啼恩来。花甲益民劳功迈，一唱旗赤寰白。信步龙潭虎穴，识斩妖魔狼豺。今会马列同戈，后人万世常怀。"《颂杨开慧》则是一首锋芒直逼江青的名篇："升月忠魂若有归，不着奇装身心美。文攻直刺投降派，俯首人民不武卫。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送开慧。"《清明悼总理》义正辞严，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同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暴风骤雨就要来临了！4 月 4 日晚上，在江青等人的威逼下，国务院和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研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情况。会议的最后给悼念活动定了反革命活动的性，随后毛远新给毛泽东带有倾向性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

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③]

4月5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④]

由此一场抗争与反抗正，正义与非正义的斗争激烈地在4月5日上演了。

凌晨1~2时，广场上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此间，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200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4月5日零点刚过，王洪文就开始亲自督促“清理”天安门广场。其中，有57名在场群众遭到审查，有七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抓捕。通往天安门广场的各处路口都设立了所谓“劝阻站”，不准送花圈的人们进入。人民英雄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层层封锁线围住。

4月5日清晨6点左右，北京172中学30多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把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7点半，一个身着军装的人发表反对人民群众送花圈悼念周恩来的讲话，遭到人民群众的斥责。随后，一个身着蓝制服的人说：“中央都快点最大走资派的名了，你们还送什么花圈。

这一下使群情更加激愤。人们不仅严词申斥他，还要用拳头惩戒他。此人见势不妙，夺路向人民大会堂跑去。追赶的人群跟着向人民大会堂涌去。一时间，人民大会堂门前集聚了10万之众。“联合指挥部”立刻往人民大会堂东门增调民兵、警察和部队。

早上8点多钟，两辆广播车在天安门广场向群众作宣传说，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赶快离开天安门广场”，不要在广场上停留，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受到威胁的人们更加愤怒了。群众们打破了车门的玻璃，走进汽车把广播员揪了出来，并推翻了车。

临近中午时分，上万名群众手挽着手，高唱着《国际歌》，包围“联合指挥部”，派出四名代表进行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群众有悼念周恩来的权利等要求。

可是，“联合指挥部”毫无诚意。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就这样被粗暴地断然拒绝了。此时的天安门广场四周出现了更多的民兵和警察，广场渐渐



形成了被包围的态势。

中午 12 点多钟，愤怒的群众把一辆民兵指挥部头头坐的小轿车推出了 50 米远，随即车子被掀翻，油箱起了火。

下午 2 点左右，一辆面包车在给被群众包围在指挥部里的头头们送食物时，被愤怒的群众当即掀翻并点着了火。

"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 1 个营，警察 30 人，民兵 200 人，加强小灰楼的警戒。

下午 5 点左右，群众们被"联合指挥部"的冷漠无理激怒了，呼喊着向楼内冲去，点燃了楼里的稻草，躲在三楼的指挥部头头终于藏匿不住，只好撤离。

当"联合指挥部"浓烟滚滚时，江青等人命令卫戍区作出镇压人民群众的具体部署：在中山公园成立新的民兵指挥点；在 28 中学设立公安局西路指挥部；出动民兵五万人，警察 3 000 人，卫戍部队 5 个营，带上木棒、手铐等工具，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 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地待命。

在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毛远新先后见了毛泽东。江青阐述了当天发生的烧房子，烧汽车等现象，并强烈要求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情况，并向毛泽东念了几份人民日报社记者赶写的《情况汇编》。

毛泽东对毛远新指示说，就按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办。对邓小平还要做思想工作，他要认错，"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打击，不要怕人家说我们镇压民主。阶级斗争，从来没有什么民主可言。"

对于毛泽东这次失误的判断，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在 1980 年 10 月向中共中央呈报的一份材料中，曾冷静而坦率地谈到过。

张玉凤说："天安门事件"前后，毛泽东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江青、毛远新为了控制真实情况，曾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下了一条规定：没事不要到外边去。

接着，毛远新在人民大会堂传达了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暴乱"；"政治局要采取果断措施，平息暴乱，必要时可使用武力手段。但不要调野战军，不要开枪"；"鉴于邓小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将他隔离审查，交代问题"。

4 月 5 日晚上 6 时 30 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了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上的全部播音器同时开放，重复地播放着吴德的讲话：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从 4 月 5 日深夜至 4 月 6 日凌晨，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他们连续开会会议讨论了由人民时报提供的报告，这个报告以掐头去尾，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法，把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4 月 6 日凌晨 3 点，毛远新将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天安门事件”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4 月 6 日的天安门广场上，人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全国保卫周恩来总理委员会”，向全国人民说明这次事件的真相，对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抗议。

天安门广场上的戒严仍未解除。北京市公安局还通知各区分局、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有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立即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及工作单位。

除了武力镇压外，江青等人更是通过舆论宣传，大造声势，欺骗世人。

姚文元在修改人民日报社记者们写的《情况汇编清样》时，扣发或删去了有关群众悼念周恩来的内容，对声讨江青等人的内容大砍大删，还蓄意收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有“联系”的材料。

4 月 7 日上午，重病中的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时报》记者关于天安门事伯的所谓“现场报道”说报道将天安门事件说成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据此，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

1976 年 4 月 7 日，中共中央作出两个决议。第一，中共中央关于华国



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第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同日，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同日，"四人帮"在公安局的亲信在市公安局会议上扬言："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更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与此同时。北京和全国各地，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开始全面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的"幕后策划者"。至6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等人以各种手段搜去5 830件悼文、诗词、祭文原件，强令群众交出悼文、诗词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并从中选出了较为重要和较有针对性的600多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 984件。北京市共有388名群众被拘捕；如果加上以隔离审查、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追查的北京市群众，全北京被触及的群众高达数万名。

全国许多省市也进行着大规模搜捕镇压活动。以辽宁省为例，由毛远新部署的，就审查处理了685人，其中拘留213人，逮捕49人，判刑11人。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继续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歪曲的谬论。江青等人利用打手和舆论工具，瞒上欺下，做尽了坏事，是镇压"天安门事件"的真正凶手。

1976年4月，这场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的运动意在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天安门事件"的错误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受江青等人假汇报的欺骗，作出错误判断。这对"天安门事件"最后定性起了关键的作用。但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坚持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是毛泽东作

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观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6]

《决议》指出：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抗议运动，可以说是建国以来一次最大的民主政治运动。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抗议运动的意义，除了对周恩来的悼念外，还有更重大更深层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渴望制止江青等人在继林彪反革命集团之后搞乱全国、实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渴望社会主义祖国日益强大、繁荣昌盛的强烈要求，在这场抗议运动中充分体地现出来了。

这个运动的爆发，为粉碎江青等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为粉碎江青等人作了一次总动员，更可以说是人民群众的一次成功预演。江青等人即将遭到覆灭的命运。这是江青等人违背人民的意愿、逆历史发展潮流而动的必然结局，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所要求的。

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群众运动，随后被人们习惯地称呼为“四·五”运动，它与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震动和转折，驱走了黑暗，迎来了光明.

这场运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和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了历史前提。

注释：

①王洪文对《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76年3月30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76年4月4日。

④毛远新给毛泽东的报告，原件，1976年4月5日。

⑤毛泽东听取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情况汇报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⑥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77页。

唐山大地震发生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中国唐山市丰南一带位于东经118.1度、北纬39.6度，在距地面16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突然发生里氏8.2级（国内测量为7.8级）强烈地震，比日本广岛原子弹强烈约400倍的猛烈爆炸发生了。23秒钟后，唐山被夷成废墟，682 267间民用建筑中有656 136间倒塌和受到严重破坏，242 769人死亡，（包括天津等受灾区）、164 851多人受重伤、70万多人受轻伤、15 886户家庭解体、7 821个妻子失去丈夫、8 047个丈夫失去了妻子、3 817人成为截瘫患者、25 061人肢体残废，遗留下孤寡老人3 675位、孤儿4 20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0亿元人民币以上。地震罹难场面惨烈到极点，为世界罕见。大地震震撼了整个世界。

20世纪世界最惨痛的地震灾难发生了。唐山，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在一场没有预报的特大地震中夷成废墟。这样大的地震为什么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点预报都没有呢，难道是没有先兆，还是没有预测出来呢？都不是，而是预报决策出了问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的漏报。

大地震在震前曾被准确地预测出来了，地震预测遭到的漠视，使唐山人付出了血的代价。“地震前，地震监测网覆盖了整个唐山地区。”1986年《地震报》统计数据说，1976年上半年，唐山地区群测点中的骨干点就达85个。绝大多数监测点都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临震异常，至少十几个点向上级单位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的马希融。这位担任过河北省第六、七、八届人大常委的七旬老者，曾两次发出了临震预报。

从1976年5月28日开始，马希融发现，一直平稳的地电阻率值出现了急速下降的现象。他一边加紧观测计算，一边注意观察地下水和动物变化。为慎重起见，马希融还与其他地震台站进行沟通，最后确认监测结果无误。7月6日，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7月14日，国家地震局派来两位分析预报室负责地电的专家。他们检

查了设备、线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之后指出，地电阻率值下降是干扰引起的。

7月26日、27日，地电阻率再次急剧下降。思虑再三，27日18时，马希融拿起电话，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公室发出强震临震预报："地电阻率的急剧变化，反映了地壳介质变异，由微破裂急转大破裂，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此时距唐山大地震发生仅剩9个小时。

地震前的北京地震队的耿庆国正在三里屯的岳母家。家里人说屋外晾的衣服爬满了蚂蚁。耿庆国低头一看，地上一层潮。为预报此次地震已奔走多日的耿庆国立刻做出判断，这是地下水往上涨，要地震！他马上跑到三里屯派出所，借用那里的电话跟地震队进行了最后的沟通。

7月以来，北京市地震队监测的各种异常已经非常明显了。7月14日，北京市地震队紧急给国家地震局打电话，提出震情紧急，请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立即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国家地震局说，先到天津、唐山等地了解情况，21日再听汇报。

21日，国家局没来人。北京队业务组副组长张国民直接给主管华北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梅世蓉打了电话，请求立即听取汇报，梅世蓉把汇报时间推迟到了26日。

26日那天，国家局来了15个人，梅世蓉没到。国家局的同志听取了整整一天的汇报后，传达了梅世蓉的意见。耿庆国回忆说，当时梅世蓉的意见是"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

"国家地震分析预报室是一个决策部门，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耿庆国说，"按照当时的地震水平，虽然报不准7月28日，但7月底8月初的时间段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7.8级，但5级以上是可以报出的；虽然报不准唐山这个确切位置，但是京津唐一带是可以报出的。事实上唐山地震前6个小时就出现了地声、地光，如果给老百姓打个招呼，减轻人员伤亡是可能的。"

其实，国家地震局的一批年轻同志坚持认为唐山、滦县一带会有大震，但他们的意见始终得不到重视。听取北京市地震队汇报的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汪成民，就是一位。

7月14日，全国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唐山召开。汪成民利用17日、18日晚间座谈时间，在领导反对在大会上做震情发言的情况下，



以个人名义通报了“7 月 22 日到 8 月 5 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 5 级以上地震”的震情。这次“越轨”行为使距唐山市仅 115 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躲过了这场塌天大祸。

为什么面对种种迹象，最高专业管理部门会漠视呢？原来，在河北邯郸大地震以后，地震局出现了地震方位的‘东西之争，这成为唐山地震漏报的重要因素。1975 年 1 月，在国家地震局召开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专家对我国东部 1975 年、1976 年地震形势分析出现了严重分歧。分析预报室的权威们认为，中国东部自 1969 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问题不大了。今后一两年，主要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 8 级大震。以汪成民为代表的一些青年专家则反对忽视东部的看法。1976 年 5 月，云南发生了 7.4 级地震，结果使权威们更加坚定地认为原先估计的“主要危险区在西部”是正确的。从此，工作重心转向了西部。

对此，新华社的消息文稿中公布了这一重大失误。“唐山地震的震级为 7.8 级，震中烈度为 11 度。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人口密集的工业区，发生的时间是 3 点 42 分 56 秒（北京时间），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地震部门事先未能发出预报。由于这些原因，它所造成的损失是很严重的。”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以最快的速度采取了一些救护措施。

《唐山大地震》记录了大地震的发生和救援过程。危难关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唐空军的飞机向北京紧急起飞；开滦矿山救护车也向北京方向急速驶去。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时 42 分，唐山。地光闪过，大地颤动，发出了排山倒海般的声音。

当天早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政治局为发生强烈地震而召开了紧急会议，震中虽已初步确定，但具体灾情不详。为此，中央特派煤炭部部长肖寒、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等乘专机赴唐山考察灾情。为使工作有的放矢，中央政治局原计划等考察组返京，全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后，再作抗震救灾的全面部署。正在这时，有人报告道：唐山来人了。“开滦矿驾驶矿山救护车进京的李玉林一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唐某飞行团副政委刘忽然和师机关参谋张先仁等一同走进了会议室。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纪登奎听后，马上对办公厅工作

人员说："告诉刘子厚同志、肖寒同志，唐山来人了，让他们去唐山后，就地指挥抗震救灾。"

唐山地震报信者李玉林回忆他赴京报信的过程，震动把他从地上颠起，又落下，整个房子瞬间被解体。而救下李玉林夫妻及其中一个儿子性命的是两个粗大的衣橱：它们抵挡了坍塌的墙体。李玉林说，这过程大约持续了10秒，这10秒，就把整个城市从人间送进了地狱，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抹去了。

地震以后，李玉林从废墟中爬出来，他第一个念头是往矿区跑。

"当时我是开滦煤矿唐山矿的工会副主席，知道当晚井下有1万多名工人，这么多工人我必须要去看！"李玉林跑到矿里一看，却傻眼了：基本上所有的建筑都塌了，水电也全停了，甚至连救命的声音都没有。

当过兵的李玉林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发生这样的灾难必须让党中央知道，只有党中央和毛主席才能调动军队进行大规模救灾。

李玉林发疯一样地在街上跑，想要找到一部电话。但整个城市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房屋，没有声音，更找不到电话。

李玉林跑到煤矿西门口，碰到崔志亮开着一辆红色的救护车从风井赶来。李玉林异常清醒地对崔志亮说："这辆车谁也不能动，你得听我的！"他要开车去找电话。从矿里出来，武装部干事曹国成也赶上来，另一矿友袁庆武也上车参与行动。

报告党中央。因为找不到电话，李玉林意识到应该一直朝北京的方向行车，这样才有机会最快把消息传到北京。

当时去北京有三条路可选，南线走芦台、天津到北京，要经过几条大河；北线有两条路，一条是唐山经丰润、玉田；另一条是唐山经韩城到玉田。前这两条线都要通过还乡河水泥大桥，如果桥坏了就无法前进。

李玉林分析到了很关键的一点：唐山经韩城到玉田的路可以不经过还乡河水泥大桥，而可以绕行经过一个木桥。水泥桥和铁桥容易在地震中受损，而木桥韧性好，不容易被损坏。事实证明他的分析非常正确，还乡河水泥大桥果然过不去，但那座木桥主体完好，车辆顺利通过了。

当李玉林高兴地看到路边有一部电话时，他们才知道，救护车已经到了北京的通县（今通州区）。但此时都没人上班，电话无人接听。正当他们想给中央打电话时，一个厂里看门的老人说："有等电话的功夫车就开到了！"李玉林他们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开到北京去！亲自向党中央汇报！"

8时零6分，李玉林到了国务院接待站，快去中南海，李玉林他们的车一直开进了中南海北门，到了中南海紫光阁，向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

当天10点左右，中央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举国上下针对唐山的抗震救灾行动立刻开始了。李玉林的举动为中央救灾决策“抢下了一个大白天”。

28日上午10时，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李民率领指挥机关先头人员，乘飞机在唐山机场紧急着陆。不久，空军机关人员到达。11时，河北省委、省军区先头人员到达。12时许，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副政委万海峰、政治部副主任郑希文和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书记马力、省军区司令马辉、煤炭部部长肖寒乘坐的飞机降落。下午2时，3架飞机载来了沈阳军区指挥机关人员和辽宁省医疗队。下午4时起，5架飞机分别运载大同、阳泉、峰峰、抚顺、淄博、淮南矿山救护队赶到唐山。此时，救灾部队正由西南和东北两路向唐山开进。当天，全国各地的医疗队正迅速组成……

中央政治局在听取了李玉林等人的汇报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后，及时研究唐山抗震救灾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同时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的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主席：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地区发生七点五级（后改定为7.8级）强烈地震，波及天津市和北京市。据初步了解，唐山市区遭受毁灭性破坏，百分之八九十的房屋倒塌，四十余万居民大部分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下。天津市亡一万二千余人，其中宁河县亡一万余人，伤几万人，市区倒塌房屋一万余间。北京市亡一百余人，伤四千余人，全市倒塌房屋三万多间。

为了迅速组织力量，进行抗震救灾，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陈锡联、纪登奎、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五同志组成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并在唐山设立前线指挥部，由刘子厚等同志负责。

指挥部成立后，已采取了下列措施：一、立即调动约17个师的部队，前往参加抗震救灾。目前已有5个师的兵力进入唐山地区，4个师的兵力进入天津市。二、立即从附近几个省的煤矿抽调井下救护队，共约七百余人，赶赴开滦煤矿抢救困在井下的工人。三、由北京、辽宁、山东等地和人民解放军组成五千人的医疗队赶灾区抢救伤病人员。目前已进入灾区的医疗力量有近千人。四、组织力量抢修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道路桥梁，维护危险水库。五、抢运物资，支援灾区人民，解决生活急需。

中央拟给灾区各族人民和解放军指战员发一慰问电，并由华国锋、陈永贵等同志组成慰问团，立即赴灾区进行慰问。

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文件。据《毛泽东传》记载，他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作了这样的介绍："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在看到唐山地震3天之后的报告后，他再次示意，一定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当日，通往唐山的一条条公路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10万救灾部队从四面八方赶赴唐山。摇晃着鞭状天线的电台车，不时向部队发出联络信号；飘扬着红十字旗的卫生车上，各医疗队正紧急部署抢救工作；无数辆满载士兵的解放牌卡车，此起彼伏地鸣响急促的车笛，在泥泞不平的公路上连成了一条条长龙。

唐山地震发生后，所有的"生命线"工程几乎毁于一旦。公路被毁；桥梁拦腰截断，铁路路基变形、列车脱轨，停运；机场所有的航空导航系统全线停滞，只能靠人工手势指引飞机起飞着陆；通讯、电路、水路全面卡断。正是这个时候，数以万计的伤员急需外送救治，数以几十万计、又渴又饿的灾民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而各地的亲友也等着报平安的电话打来……这一切都给救援工作制造了难题。

《唐山大地震》一书记载了上述情况。因地震后24小时是抢救的"黄金时段"，此时救出来的伤员存活、救治的可能性最大。所以，唐山地震后，如何保证"生命线"畅通成为唐山救援中首先考虑的问题。

自7月28日~8月12日的半个月里，中国空军的英雄们硬是用最原始的方法，创造了近代飞行史上的奇迹。雷达靠不住了，机场跑道边的指挥塔台上，地面指挥员就靠目测、口报来引导飞机起落。他们2人一班，手拿无线电送话器，一人盯住跑道东边，负责飞机起飞；一人盯住跑道西头，安排飞机降落。往往是天空中盘旋着好几架大型运输机，急等着降落的指令，跑道边上，又同样停着几架匆匆卸完货的飞机等待指令飞走。起落间隔最短时，仅仅十几秒钟。十几秒啊，简直就是眨眨眼的工夫。在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用最先进的设备，还一个空难接着一个空难，而在这小小的唐山机场，在大地震后裂出道道深缝的跑道上，竟没有出一点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差错。正是他们，在危急时刻铺平了一条救死扶伤的道路，铺平了一条向唐山源源不断地输送救灾物资的道路。几天后，空军司令部又调来几个雷达连在这里组织起严密的空中巨网，唐山机场才算结束了它成立以来最繁忙的指



挥任务。据统计，共有 2 885 架次飞机在唐山机场起飞降落。

地震当日，救援人员火速赶往唐山，慰问电、慰问信、汇款、粮票、大批救灾物资，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飞向唐山。

29 日深夜，辽宁邮电系统维修队修复了关外三省经唐山通往天津、北京的电话线；

30 日，一辆由油罐车改装过来的水车第一次把清水送进了干渴的唐山；

8 月 7 日，在铁道兵部队的抢修下，京山铁路恢复通车……

大地震后，唐山的广场上，学校的操场上，马路两侧的人行便道上，到处堆满震亡的尸体，躺满受伤的难民，地震灾区到处可见抬着伤员寻医找药物的人流。全国各地赶赴唐山的医疗队，以惊人的毅力全力抢救伤者，但仍有十余万重伤者生命处于垂危之中。在这危难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当即决定，立即将他们转移到外省市治疗。他们被抬上汽车和飞机，运到了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北京、天津等省市各大医院，进行抢救。

为了及时救济灾民，飞机还进行了空投。那一个个闪着生命之光的食品箱在洁白的降落伞下，飘向无数双潮湿的眼睛……空投，使那坍塌的一个个废墟中支起了一顶顶草绿色的帐篷，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空投，使人们陆续穿上了崭新的军衣，除了死人，再也见不到赤身裸体者了。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药物。基建工程兵的大型机械车开来了，那些挣扎在乱石中 3 天、5 天、8 天的人们获得了新生。最后，连埋在井下 15 天的矿工也神话般地被救了出来。整个扒救活人的工作结束了，几十万生命得救了！

唐山大地震的伤亡数字，当时各大报纸媒体无人提及。3 年后，1979 年，新华社发了一份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新华社大连 11 月 22 日电在 1976 年 7 月 28 日发生的唐山大地震中，总共死亡 24 万 2 000 多人，重伤 16 万 4 000 多人。这两个数字是唐山、天津、北京地区在那次地震中死伤人数的累计。这是 11 月 17 日 ~22 日举行的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的。当时新华社记者，撰稿人徐学江说，"当时，唐山大地震已过去 3 年多，由于一直没有公布官方的伤亡人数，国内外有很多猜测和谣言，如香港报纸就曾报过唐山地震死亡人数超过 70 万等，与其让猜测和谣言满天飞，不如正式公布真实情况。"在他的沟通下，当时的国家地震局科研处处长最终没有向上级请示，签字同意新华社发稿。

地震后经过 2 个月的施救，恢复了水、电、通讯和交通，安置了伤员，

控制了传染病的发生，开始了重建家园的工作。

为了尽快让受灾的灾民有一个新家园，1979 年 9 月，10 万大军进入施工现场，20 多位规划专家齐聚唐山，开始了唐山的重建工作。

当时在重建的选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一种观点是异地建设，放弃原来的城市，放弃唐山。理由是市区地下的断裂带随时可能引发大震，此外，原地重建、清废墟、搬迁，费时费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原地建设有利于保持其历史特色；此外，原地重建还能减少征地、迁移的巨额投资，节约土地。新唐山最终还是选择在原址上修建，但整个城市往北进行了推进。在通过对工程地质、地震地质、水文地质等方面的考察后，把新城区确定在北部。而一些处于活动断裂带附近的大型工厂也随之迁移。

当时，重建工作由国家建委负责，谷牧副总理负总责，具体由国家建委下的城市建设局负责规划设计。当时，结合各个专家意见，确定了新唐山分点重建的规划指导思想，实行规划、设计、投资、施工、分配、管理“六统一”，按“先外围、后中心，先地下、后地上，先住宅、后其他”的顺序组织施工。

唐山重建历经 10 年，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978 年初至 1979 年 7 月，搞试点趟路子；1979 年下半年至 1984 年底，大规模建设；1985 年之后，完成扫尾工程。1986 年 7 月 28 日，一万多名唐山各界人士聚集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唐山抗震 10 周年纪念大会，“正式宣告唐山重建基本结束”。1990 年 11 月，唐山市政府因为震后重建工作而获得了联合国人居奖。

“四人帮”阴谋夺取最高权力

邓小平被再次打倒以及叶剑英靠边站后，在“四人帮”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上，华国锋就成为了主要目标。为了达到打击华国锋的目的，早在批邓之时，就在报纸中含沙射影地进行攻击诋毁。毛泽东逝世以后，江青的野心更加膨胀，他有恃无恐地多次向华国锋提出无理要求，企图夺取更大的权力。由此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斗争逐渐明朗以致白热化。主要表现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相关后事及重大原则问题上，四人帮在包括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以后由谁保管、追悼会由谁致悼词、主席的遗体保护责任等问题上百般刁难，制造混乱。

不仅如此，王洪文还在中南海私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以及要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写进悼词中进行大肆宣传等等。

毛泽东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全国人民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于是开始了疯狂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中央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日益趋于白热化。

在“四人帮”看来，毛泽东逝世后，形势确是“一片大好”，邓小平被打倒了，叶剑英靠边站了，李先念休息了，华国锋又刚刚上台，掌权不稳。这真是天赐良机，大权唾手可得。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搞乱全国，乘机夺权，以偿周恩来病重、邓小平打倒而未能夺取领导权的遗恨。

就在中央政治局紧张处理毛泽东逝世后的相关事宜之际，四人帮阴谋开始了夺权行动。

9月12日凌晨3点，华国锋接到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电话。张平化反映王洪文的秘书米士奇，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设立对王洪文负责的值班室，另立中央。

闻听此事，华国锋先后拨打叶剑英、汪东兴的电话。

汪东兴报诉华国锋，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王洪文就盗用中共

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向他请示汇报，妄图切断党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联系，由他们来发号施令。

这是一次十分严重的信号，华国锋立即指示取消这个值班室，通知全国各地。

同时，姚文元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四人帮”在北大、清华的爪牙，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张春桥还写了篡党夺权的提纲，精心准备。

为了控制局面，江青等人把北大、清华和上海的华东师大、复旦等大专院校当做自己消息来源的“窗口”，大搞阴谋活动，搜集情报。江青还布置清华、北大、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直接给她送材料；江青俨然以“党中央主席”自居，凡是给中央的信件都要送她过目，再做处理。

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他们大造舆论，甚至篡改历史、私自编造党的历史，吹捧江青，为江青夺取最高权力作准备。由“四人帮”的爪牙编的所谓“党史”中，写到江青有 18 处之多，并将这个伪造的“党史”编成教材，在大中学校的学生中进行灌输，流毒甚广。

“四人帮”在下边煽动群众反对华国锋，在上边则处处给华国锋施加压力，威逼要挟华国锋就范，充当他们的“御用工具”。华国锋主张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四人帮”偏偏对着干，竭力破坏。张春桥的意见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只会对右派有利，不如出单篇。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则说华国锋“捞到了稻草”。很明显，“四人帮”以反对出版为由，反对华国锋。在党中央处理保定闹事问题上，“四人帮”也大唱对台戏。只是后来因为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支持，才下决心派部队去缴了枪，处理了闹事之徒，稳定了保定的局势，从而也保证了首都的安全。

正如汪东兴后来所说的那样，当时有三个中央办公厅：一个是名正言顺的，由汪东兴主持的中央办公厅，另一个是米士奇（王洪文秘书）负责的假中央办公厅，再一个是清华大学（江青控制的）伪中央办公厅。

“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准备，自然忘不了抓武装力量，这是夺权的关键一步。早就奉命窜到上海的王洪文，以“城市民兵创始人”的姿态，亲自检查落实民兵工作。王洪文返回北京后，对上海民兵抓紧遥控指挥。

8 月 31 日，上海民兵指挥部向上海市委、市革委会报告说，根据市委领导指示的精神，8 月 11 日和 13 日，他们分别召开了武器发放工作会议，进行讨论、安排，重点是加强边防和反空降地区的武器配置。



这个报告中还说，他们共计下发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3万支、六三式全自动步枪2.2642万支、五六式轻机枪200挺、六三式六〇炮300门。

在上海，除了宝山、崇明因防震未领回武器之外，其余的武器均已下发完毕。"四人帮"在上海的各单位对此工作都比较重视，成立了"七五年武器分发领导班子"，对如何加强武器弹药管理制订了措施。

所以，"四人帮"在上海的这次武器下发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和迅速。就这样，七万多件武器突击发放到了上海民兵的手里。

关于"四人帮"在上海将武器急于发放的原因，马天水在1976年12月15日交代的材料中说，立即发放武器，主要是因为1976年以来，特别是毛泽东病重后，他们受"四人帮"的毒很深，他和徐景贤、王秀珍也曾议论过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形势，担心万一发生内战和闹乱子，所以想手里有点力量。

除了上海之外，"四人帮"在北京也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月9日，就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迟群就奉"帮主"之命，在清华大学发出信号，警惕"还在走的走资派的破坏和捣乱"。迟群要求民兵树立高度的战备观念，一旦有了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这并不是虚张声势。在清华和其他地方，"四人帮"在能控制的"民兵"中开始了动员和戒备。

与此同时，四人帮加紧控制舆论工具为篡党夺权大造声势，抛出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遗嘱，为抢班夺权制造舆论。

这件事最早发生在1976年7月~8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据曾在计委办公厅工作的陈斐章讲，"按既定方针办"一语的造成和出现，同他做记录时的失误有关，并讲了细节。当时，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捣乱，会上斗争很激烈，加之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会场乱哄哄的。一天，华国锋拿着陈斐章等人起草的稿子宣读，中间离开稿子讲了几句话，其内容即是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华说，毛主席讲："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在华国锋停顿的时候，王洪文突然插话：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接着华国锋又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由于人多听不清，担任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不要着急"，至于什么"方针办"，没听清。情急中陈斐章便顺连其意，写成"按既定方针办"。会后，陈整理华国锋讲话稿，发现记录与原话不一致，即请当时的领导，也是组织和服务这次座谈会的计

委一位副主任核实，而他未核实就发文了。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为了把自己打扮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和继承毛泽东遗志的“正统”，居心叵测地把因记录有误而造成的“按既定方针办”抓来，确定为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并作为当时的宣传主题和中心，连篇累牍，大做文章，从而使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像一张“天网”一样笼罩了中国大地。

“按既定方针办”在1976年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的《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社论中公开宣传。这篇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并进一步解释“按既定方针办”，说：“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大声疾呼“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

同日深夜，张春桥向华国锋提出，将毛泽东“按既定方针办”的临终“嘱咐”写进悼词，被华国锋委婉拒绝。

1976年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永世长存》的报道中写道：“首都的隆重吊唁活动在全市各界人民心中激起巨大的力量。坚强的首都人民忍住心头的悲痛，坚决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1976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9月18日毛主席追悼大会的通讯，其中说：“人们决心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向前。”

197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在报道各地追悼大会的情况中说：“在各地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当地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致了悼词，沉痛悼



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照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据从9月17日～30日的不完全统计，《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北京、上海的七种报刊，刊登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计有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九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四人帮"如此这般地大肆宣传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究竟是什么用心呢？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泄露了天机。这篇文章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华国锋看到这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和在报刊上的大肆宣传，曾问过许多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听到了。若情况是这样的话，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江青既然听到了这个遗嘱，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会上的《悼词》稿时，她不提出来，要求写在这两份最具权威的文献上，而仅在"两报一刊"的社论中公布和大肆宣传呢？很显然，这是利用他们即"四人帮"利用掌控的舆论阵地搞阴谋诡计，公然以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挑战党中央通过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悼词》，也就是对抗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

实际的情况是，1976年4月30日晚，毛泽东主席接见新西兰总理马尔

登后，陪见的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留下来汇报近期工作。在华说到总的形势大好，但有几个省不太好的时候，毛泽东当即给华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三句话后来成为华国锋做接班人的重要依据。

这个遗嘱的主要动机，根据姚文元在审查时期的交代，主要是打击老干部。

"四人帮"认为，要把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只要按"毛主席路线"办，他们就可以"无往而不胜"。

张春桥曾向王洪文和姚文元解释，"按既定方针办"也只不过是一句虚词，关键是那几句说明语。毛泽东的"既定方针"就是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就是要防止一伙新老"走资派篡党夺权，搞资本主义复辟"。

他还说，在追悼大会之前发出去，越快越好，要把毛泽东的这条"临终嘱托"尽快告诉全国人民。这样，那些"阴谋家、野心家"才不敢轻举妄动。

姚文元将他们的对话内容记了下来，并表示，当天就把社论稿送交中央政治局讨论。但是，张春桥要求，不让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签发。

这就是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内幕。

在"四人帮"炮制的这篇社论中，首次用粗体字公布了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不过，在社论的最后审定稿中，姚文元还是抹掉了"临终"两个字。

中共中央发布的1976年二十四号文件，指出了这个"按既定方针办"是伪造的。

中共中央在文件中说，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伪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其目的就是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大造舆论。姚文元将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塞进了9月16日两报一刊的社论。

中共中央的这个文件还回顾了毛泽东提出的"三条指示"的由来。1976年4月30日，病重的毛泽东给华国锋亲笔写了"三条指示"。事后，华国锋向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而且华国锋还曾



经将毛泽东的这个亲笔指示给姚文元看过。由此可见，“四人帮”是蓄意篡改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文件还说，在中央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华国锋致悼词的时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参加了讨论。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中写上“按既定方针办”。但是，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把伪造出来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塞进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且在宣传上排斥上述的中央两个正式文件，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当时的宣传中心。

“按既定方针办”和“照过去方针办”除个别文字不同外，在内容和本质上却有很大差异。

其实，“四人帮”要弄的是一个极端阴险毒辣的计谋。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说白了，就是按“四人帮”的方针办，由他们任意解释，任意摆布，一切都要听他们的。“四人帮”认为，只要他们手里有了“临终嘱咐”这个“尚方宝剑”，就可以乱砍一气，主宰一切了。

与此同时，“四人帮”用更大的努力巩固上海的“根据地”。

9月21日，身兼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对王洪文的上海之行并不放心，决定亲自出马，加强“领导”和“指挥”。

同时，也就在中央“封存文件”、王洪文飞往上海的同一天，9月21日下午3点30分，张春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单独接见了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听取了他与马天水同南京军区司令部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

张春桥对马天水已经给上海民兵增发了原定入库的枪支表示了完全默许和暗地支持，并且指示徐景贤“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动向”。

9月22日夜，张春桥又找到王洪文办公室工作人员，要他们去上海把一封亲笔信交给马天水。张春桥在信中写道，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是大有人在的。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在张春桥的旨意下，紧急行动起来，加紧进行武装暴乱的准备。

9月23日，王洪文匆匆从上海返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王洪文还是放心不下，又给王秀珍挂电话，叮嘱她，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的”。

9月27日，张春桥在钓鱼台国宾馆十七号楼召集王洪文、姚文元碰头。王洪文谈了在西山、玉泉山的所见所闻。张春桥一听就发现王洪文受骗了，

大为恼火。三人经过一番研究后，密报江青。

"四人帮"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加强"文战武备"，发起新的攻势。他们又玩弄"文化大革命"初期制造贺龙"二月政变"流言的手法，造谣说叶剑英在西山也有个"军人俱乐部"，"图谋不轨"。

此外，"四人帮"还亲自出马抓"枪杆子"。江青到昌平某师，王洪文到保定某军，张春桥到通县某部队，分头去"串联"，拉拢、煽动部队跟他们走。

在拉部队不见奏效的情况下，9月27日，张春桥亲自出马，给上海的同党发出了"三点指示"：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以后中央搞集体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不出版了，可以出单行本，先出接班人"五项条件"。

实际上，张春桥所说的"集体领导"，就是"四人帮"领导，"接班人"条件就是"四人帮"上台的条件。

9月28日，张春桥还是不放心，于是又派人送口信给上海市委领导人说，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上海的徐景贤忠实地传达贯彻，并且下了两个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手令。徐景贤还曾经亲笔记录了捎信人向上海市委常委传达的张春桥的"指示"。

"指示"中充满了张春桥的"黑"理论。张春桥自认为，阶级斗争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还没有人知道；后来有了列宁，中国懂得马列的也很少。

张春桥在"指示"中还说，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在世界传播了，比起那时候来懂得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要建立信心。"指示"还分析形势说，当然要看到曲折，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

"指示"对上海的死党吩咐说，上海不要急，不要多出头，许多事让外地去搞。

张春桥还说，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扎实一些"。上海不搞，别人还会拿出几条来讲你。老实说，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林彪、邓小平要搞上海，都没有搞成"。林彪搞成的话，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

由于"四人帮"日益嚣张，形势越来越紧。

到了9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经到了最后该摊牌的阶段。

9月28日，张春桥同江青在中南海共同密谋发动一个新的"夺权战

役”。

次日，这个“战役”在大闹中央政治局的喧嚣中打响。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在京的和外地的一些委员。

“四人帮”经过充分准备，决心大闹一场，企图把党的最高领导权夺到手。

会议在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之后，江青向华国锋发难说：“毛主席逝世了，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不仅如此，江青还攻击华国锋处理所谓“保定问题”优柔寡断，没有能力。一旁的王洪文、张春桥乘机一唱一和，要求加强集体领导，安排江青的工作。

实际上，“四人帮”所谓的“安排工作”，就是让江青当中央主席。

这是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等人酝酿良久，迫不及待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问题。“四人帮”心里明白，只有打出江青这面旗帜，才能压倒华国锋。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对江青问题不好表态，但他心里很明白，江青的意思就是要夺权。“四人帮”打出江青旗号，无理取闹，也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剑英、李先念等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和否决。

“四人帮”一看第一炮没有打响，又要横生枝节。但是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立即表示这次会议不再讨论“加强集体领导”这个问题。

稍后，会议接着讨论了毛远新是否回到辽宁省工作的问题和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以后由谁保管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四人帮”也是完全有预谋的。江青等人事先策划毛远新为自己去向一事给华国锋写一封信。毛远新在信中说，他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已经没事可做了，是留在北京，还是返回辽宁，可以视情况而定。毛远新表示，如果有事，他可以留下。

很显然，这封信是个“问路石”，想试探华国锋，让他表态。其真实意图是要继续留在北京。

但是，出乎“四人帮”意料的是，华国锋在会上念了毛远新的信，并明确表示同意毛远新回辽宁。这一下，“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打乱了。

江青一伙一听，非常生气，连声叫嚷：“毛远新应该留下。”

江青提出：“毛远新留下，还要他处理毛泽东的后事。”

在这个紧要关头，华国锋也毫不示弱。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不久前就说过，毛泽东的后事她不参加，毛远新也不参加。

江青一听，立刻大哭大闹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又摆出调解的姿态说，毛远新对毛泽东的情况比较熟悉，还是暂时留在北京为好。

看见张春桥出面“解围”，江青接着说，还是把毛泽东的文件、材料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则提议，文件材料暂由汪东兴负责保管。

江青马上强烈反对说，汪东兴既要管办公厅的日常事务，又要参加治丧，事情够多了，不要再给他增加负担。她建议毛泽东的文件可以交给毛远新保管。毛远新是毛泽东的联络员，毛泽东的好多文件都是他帮助整理的，由他保管最合适。

华国锋坚持由汪东兴保管，因为汪东兴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便于展开各方面工作。即使他忙不过来，也可以让张玉凤协助办理。

江青一听提到张玉凤，便气急败坏地说，张玉凤坏透了，经常“偷”毛泽东的文件，很可能是个“潜伏的特务”。中央应该采取紧急措施，对她“进行隔离审查”。

对此，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并没人附和。叶剑英表示支持华国锋的意见，把文件交给中办负责，由汪东兴管起来。汪东兴、李先念等人说，毛远新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早点回辽宁去，他是省委书记，出来太久，办完毛泽东的丧事，还是让他回省为好。张春桥、王洪文也表示同意。

1984 年 8 月 16 日，汪东兴讲起毛泽东文件保管的事时说，毛泽东逝世后，江青悄悄从钓鱼台搬到中南海，就是想要毛泽东的文件。她要把文件交给毛远新。当时他在人民大会堂守护毛泽东的遗体，保管文件的是张玉凤。江青趁机借了两份去，没有归还，还把文件篡改得一塌糊涂。为此事，汪东兴找华国锋商量开一个会议讨论。因为叶剑英生病不能出席，就改为谈话。可是江青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和毛远新都带来了，叶剑英得到消息也赶来了。于是，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毛泽东的文件由中办负责，并由汪东兴负责封存。

关于此事，张玉凤在 1976 年 10 月 20 日的揭发材料中也证实说：

主席逝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



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儿。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的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文件的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两同志的两次谈话记录稿。

坐在一旁很少发言的叶剑英这时斩钉截铁地说：“我同意华国锋的意见，毛远新还是回辽宁，文件仍由办公厅负责保管。”有几位委员也都附议，支持华国锋的决定。

但是，“四人帮”继续纠缠，摆出种种“理由”，坚持要毛远新留下。会议僵持不下，从头一天的午夜已经跨入第二天凌晨了，会议还没有一个结果。激烈的争吵，无理的纠缠，使与会人员疲惫不堪。

最后，华国锋以中央第一副主席、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宣布：“会议开到这里，不要再争吵了。我认为，毛远新应该回辽宁去，这是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决定。”同时，华国锋强调指出；由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在场，关于中央全会问题根本不能讨论。最后，华国锋说，即使中央全会要作政治报告，也应该由他来作，应该由他来准备，至于党中央的人事安排，应该由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至此，“四人帮”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9 月 29 日的这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是“四人帮”最后一次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由江青发难，唇枪舌剑，短兵相接，通宵达旦，纠缠不休，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和“四人帮”围绕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问题，展开的又一次公开较量，“四人帮”的阴谋又一次大暴露，并且遭到了挫败。

9 月 29 日的会议表明，和“四人帮”的斗争已经进入了关键性的短兵相接阶段。此时，即使是华国锋和“四人帮”，双方也都已经没有任何缓和的余地了。

反对“四人帮”正义力量的聚集

9月中旬以后，华国锋反复思考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非常复杂，毛泽东在世时，说要解决都未能解决。现在能否解决得了？特别是江青，是否会俯首听命？解决江青的问题，在国内外舆论界会有什么样的反响？华国锋一时很难下定决心。

由于“四人帮”日益器张，形势越来越紧。到了9月下旬，“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经到了最后该摊牌的阶段。

一场围绕着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战无声地向纵深展开了。与四人帮相对立的是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云、汪东兴、王震老一辈革命家支持的华国锋。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意愿，为了党的安定，国家的利益，全力支持华国锋。

一天，汪东兴告诉华国锋，据朱穆之讲，姚文元还亲自给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组织人给江青写信。对此，汪东兴不无担忧地说，这样恐怕会把人心搞乱。

为了事后有备无患，汪东兴向华国锋提出要由中办保存毛泽东书写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字条的要求。

汪东兴对华国锋说，那批反潮流的一伙人不容轻视，他们可能会兴风作浪，搅得昏天黑地。这两天，江青已经收到一万多封“慰问信”，仅清华、北大就写来几百封这样的信件，有的写信人还是一些省级、军级干部。俗话说，“无风不起浪，浪大能翻船”，这是有人故意在兴风作浪。

1975年，为了阻止四人帮篡权，让华国锋顺利“接班”，毛泽东不仅选了华国锋，还交代身边的人要宣传华国锋，让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

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和嘱托扶助华国锋，支持华国锋，打垮“四人帮”。这是叶剑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正确选择。

对于毛泽东选择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华国锋的



评价，叶剑英是十分清楚的，也是鼎力支持和拥护的。

叶剑英在许多场合公开表示，要支持和拥护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

叶剑英曾经向有些同志说，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第一；第二，华国锋年轻，人还老实，有工作经验，还讲民主；第三，还有许多老同志，可以帮助他。当然，要像“周公辅成王”，可不能像“诸葛亮扶阿斗”那样，中国共产党里有许多周公。

叶剑英还多次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要三个桩”，这等于是号召他人去帮助华国锋巩固领袖的地位。

根据当时的形势，解决四人帮主要有三个方案。

这三个方案包括按照正常的组织秩序，立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扩大会议，做出决定，正式罢免“四人帮”；“先斩后奏”，先由少数中央领导人商量决定，对“四人帮”采取果断处置，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采取突然手段，执行军委领导职权，下令逮捕，再依法处理。

9 月 21 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的几位重要决策人之间进行了秘密“通气”。

这一天，杨成武来探望聂荣臻，谈起了对“四人帮”的看法及其倒行逆施。

当杨成武说到军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时，聂荣臻让杨成武立即到叶剑英那里，转告他的意见：“‘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李先念也曾对杨成武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所以要注意争取得到华国锋的支持。”

杨成武很快就来到了叶剑英这里，及时地转达了聂荣臻的意见。叶剑英在听了聂荣臻的意见之后，要杨成武转告聂荣臻，他也有同感，聂荣臻想的和他想的是一样的。叶剑英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各位领导人互相取得联系，商量认为，毛泽东逝世后，党和国家的领导责任就必然落在华国锋肩上无疑。老一辈革命家一致要求，华国锋应当顺从民意，当机立断。

面对险恶的形势，9 月 12 日晚上，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来到西山，拜访叶剑英，并对形势作了分析。

当傅崇碧把几位老同志对形势的议论向叶剑英报告之后，叶剑英说，许世友、粟裕、韩先楚、宋时轮都来找他反映过类似的情况。叶剑英还专门让几个秘书收集国内发生的各种动态，特别是注意上海、辽宁的动态，每天都要听取两次情况汇报。

最后，叶剑英对傅崇碧讲了四条原则，要傅崇碧回去告诉大家，沉住气，不要慌，也不要着急。

叶剑英讲的四条原则是：一、"四人帮"没有抓到他们什么东西，一时还不敢下手；二、江青一伙积怨很多，非常孤立，死心塌地跟着跑的没几个人；三、同"四人帮"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要讲究方法，掌握好时机；四、要做好应急准备，要多和老同志，特别是军队的老同志保持联系。10 点左右，傅崇碧一回到 301 高干楼，就立即向王震、罗瑞卿等人汇报了他同叶剑英谈话的详细内容。傅崇碧对王震说，临告别时，叶剑英把他送出门，还一再叮嘱他转告王震，要多找李先念、陈云联系。

面对"四人帮"抢班夺权、咄咄逼人的形势，叶剑英对华国锋的意向作过这样的估计，在华国锋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慑于"四人帮"的压力，委曲求全，维护下去；二、与"四人帮"又斗争、又联合，最终和江青等人来个"权力再分配"，让出一部分权力；三、坚决同"四人帮"展开斗争，彻底打垮他们，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态度。

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最紧迫的是时间。"四人帮"在行动，上海和北京的"第二武装"在集结，时不我待，铲除"四人帮"不能再拖延了。

就在叶剑英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动向，苦苦思索着在什么时机、采取什么办法收拾这伙败类的时候，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铲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9 月 15 日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到邓小平家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一一向邓小平作了详细汇报。他告诉邓小平，毛泽东逝世前后这一段，叶剑英从西山下来，经常住在小翔凤胡同。

邓小平听完王震的汇报后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据王震后来回忆，9 月 16 日，邓小平连电话也没有打，单独去看望了叶剑英。

此后，王震受叶剑英委托来到了陈云家里，征询解决问题的办法。陈云



主张尽量合法，不要打草惊蛇。

过了几天，叶剑英又派王震去看望陈云。陈云说，斗争很复杂，毛泽东刚刚去世，要保持中国稳定的政治局势，尽量用和平方法解决，震动小一些。

王震听完了陈云的话，觉得很有道理。

邓颖超来了。叶剑英知道邓颖超的来意，没等她开口，就把自己最近一个时期的想法作了交底。

邓颖超也谈了自己所担忧的事情。邓颖超认为，比较难办的是江青。这个人最会演戏，她会利用与毛泽东的关系扮演新角色，利用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倒打一耙，嫁祸于人。

叶剑英胸有成竹地说："对付这个'三点水'也不难。解铃还须系铃人。毛主席生前不是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吗？只要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她的戏就演不下去了。"

接着，邓颖超又提出，诡计多端、狡诈成性的张春桥也是一个十分难对付的人。

叶剑英回答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个话要重新解释。他担心的则是上海的"第二武装"，还有北京的民兵指挥部。"天安门事件"，他们已经表演一次了。不过，他深信，只要三军巍然不动，他们那一点点"御林军"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

在此前后谭震林、乌兰夫、李德生等老同志也都表示支持对四人帮的斗争。

汪东兴后来回忆说，他和叶剑英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这时，叶剑英亲自到中南海汪东兴家去过两次，当汪东兴和叶剑英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他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剑英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他们都认为，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

据叶剑英分析，"四人帮"的武装力量主要在上海。"四人帮"因此认为很有必要在北京发展武装力量。

为了实现罪恶的目的，江青一伙又把手伸向了中央警卫团。

他们选中了与张春桥关系密切的副团长李鑫。江青还特地找来李鑫进行谈话，故意拉拢。李鑫在同江青的谈话中没露声色。谈话中，江青认为，李

鑫是个“老实、可靠”的人，于是就得意忘形了。

李鑫在谈话之后，不到半小时，便乘夜色只身来到中南海，悄悄走进汪东兴的书房，把张春桥和江青找他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全部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深感事态严重，当即带着李鑫赶到华国锋的住处，把这一紧急情况向华国锋作了详细汇报。

华国锋听完李鑫汇报后也深感震惊。他没想到“四人帮”竟会准备动武。

汪东兴说，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很可能要搞武装政变，篡党夺权。这一点确实不可不防。

汪东兴提醒道，千万不要小看这几个人的能量，“四人帮”不仅掌握着全部舆论工具，而且还掌握着相当大的武装力量。

据汪东兴所知，仅上海、北京的民兵就有200多万，在野战军、空军、卫戍区、公安部，也都有“四人帮”的人。江青还请吴忠和卫戍区的两个师长在北海的仿膳楼吃过饭，情况已经很危急。

李鑫说，他听毛远新讲，徐景贤也于9月21日到北京来了。

汪东兴说，事不宜迟，应当赶快下决心，不然等他们动了手，一切全完了。

华国锋在“四人帮”的逼迫下，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华国锋说，他们这是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修正主义，搞反党小集团。华国锋终于下定了解决“四人帮”的决心。

看见华国锋已经决断，汪东兴说，正是这样，“四人帮”的这个性质毛泽东生前早就给定了。

最初，华国锋想通过中央全会解决问题。汪东兴说：“召开中央全会只怕解决不了问题。‘四人帮’可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化大革命一旗手’，如果指责他们分裂党、搞修正主义，他们肯定会反咬你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资本主义。这些事，扯不清。到时候弄不好就会打蛇不成反被蛇咬。”

但是，华国锋说：“我就不相信全体中央委员和全国的党员会跟着‘四人帮’跑，会支持‘四人帮’这样做。”

李鑫说，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因此必须采取特殊的手段，既不能召开中央全会，也不能进行公开辩论。因为“四人帮”在政治上、理论上、组织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特别是“四人帮”还把持着电台、报纸等宣传武



器。如果进行论战，很难控制眉势，还可能受他们的打击报复。

李鑫建议学苏共中央抓贝利亚的办法，把他们几个秘密逮捕。

华国锋听完了李鑫的话后，不由得一愣。过了一会儿，华国锋问汪东兴，能否这样干。

汪东兴说："唯有如此，方能取胜。"

得到十分肯定的答复后，华国锋问："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怎么抓？谁去抓？抓起来如何处置？"

汪东兴说："你下令，我负责执行任务。"

此刻的华国锋思想上仍然有些顾虑，说："我是副主席，不能下命令抓另一个副主席。"

汪东兴即刻明白了华国锋讲此话的用意。于是，汪东兴说："主席不在了。你就代表中央。"

华国锋接着问，叶剑英是否会同意所有的行动。汪东兴点点头，再次给了华国锋肯定的回答。汪东兴说，据他所知，叶剑英早有此意，而且叶剑英近来正抓紧在军队中"秘密串联"，寻找时机。听了"军队"二字，华国锋若有所思地说，这件事没有军队的支持不行，要得到军队的支持没有叶剑英的配合不行。要干，必须有军队和一大批老干部的拥护和支持。

对于华国锋的这个提议，汪东兴立即表示赞同，并建议尽快找叶剑英商定。

叶剑英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答，而是问华国锋是如何打算的。

李先念回答说："华国锋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方案，只说想尽快和你见面。"

听了李先念的话后，叶剑英表示立即去看华国锋。

9 月 24 日晚上，华国锋刚刚吃过晚饭，便接到了江青打来的电话。江青的电话是邀请华国锋到怀仁堂小放映室观看国产故事片《芒果之歌》。江青几乎用命令的口气向华国锋一再强调，这是一部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好影片，现在放映，有着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中央领导要带头看、带头学、带头接受教育。

华国锋虽然十分不满，但又怕江青纠缠起来没完没了，便一口应承下来，并假装表现出很高的热忱，还郑重提议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晚上都去看、都去学、都去受教育。

江青听华国锋这么一说，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华国锋的意见想得周全，

想得深远，抓到了根本，并自告奋勇要亲自通知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乘机顺水推舟，索性让江青全权处理。华国锋说："这部优秀影片是你亲手扶植起来的，你又是这次观摩会的召集人，一切由你决定最好。"

同一天晚上9点30分，由于受江青的所谓"邀请"，华国锋准时地走进了怀仁堂小放映室。其间，华国锋与李先念谈到了叶剑英决定在9月25日准备去见华国锋。

9月25日上午，叶剑英果然只身进城，来到史家胡同华国锋的住处。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叶剑英和华国锋彼此都有一定的了解和信任。所以，他们都省去了许多暗示和遮掩，开门见山，直言不讳，就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进行商谈。

叶剑英首先向华国锋通报了上海民兵突击发放枪支弹药的情况。

华国锋听完后点头道："我也听到一些这方面的反映。据说北京的民兵也发了不少武器，马小六还从郊县调来三千多民兵聚集在中山公园。"

为了进一步提醒华国锋，叶剑英又补充了一个消息。叶剑英说："近几天，张春桥和王洪文几乎天天都要往上海打电话，人员来往也非常频繁。前天，徐景贤还亲自跑到北京来了。"

华国锋听后，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都向叶剑英说了出来。华国锋说："张春桥还连续到中南海201找过江青几次，每次都密谈一两个小时。9月21日，江青和张春桥还把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找去，了解中央警卫团的情况。"

接着，华国锋又把张春桥和江青找李鑫谈话的经过简要地讲了一遍。

叶剑英听完此话之后说："种种迹象表明，他们是要动手夺权。"

华国锋连忙低声道："正因为如此才请你来，赶快想个办法。"

听到这里，叶剑英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法子。你是第一副主席，毛主席不在了，也应该站出来，把中国共产党的大舵掌起来，制止'四人帮'的阴谋。"

早有此意的华国锋对叶剑英说："经验少，资历浅，只怕讲话没人听。"

叶剑英鼓励说："我支持你，军队会支持你，老同志也会支持你，要大胆地干。"

华国锋听到这句自己期盼已久的话，不由得情绪为之一振，说道："有叶帅这番话，我就放心了。"

叶剑英催促道："争取时间不容易，谈谈具体想法。"

华国锋说："我想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向全党公布毛主席关于要解决



‘四人帮’问题的讲话，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党罪行。”

叶剑英听完华国锋的方案后说：“只怕到时候没有几个中央委员听你的。”

听到叶剑英否定了第一个方案，华国锋又搬出了第二套方案，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中央政治局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叶剑英听完华国锋的两个方案后，已经明白华国锋在故意投石探路，又摇摇头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一个人也能搅散。”

华国锋说：“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四人帮’问题好?”

叶剑英知道不能再拖延时间，看着华国锋一字一句地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不是你吃掉他，就是他吃掉你。靠会议，靠批判，靠思想斗争，都解决不了问题，只有采取特殊手段，出其不意，狠狠一击。”

华国锋领会错了叶剑英的意思，说：“动用军队，把他们全抓起来?”

叶剑英说：“抓‘四人帮’这几个人不用兴师动众调部队。”

华国锋听到这里，大概已明白了叶剑英的意思，他想尽快明白叶剑英的意思。

叶剑英接着说：“‘上兵伐谋’，对付这几个人只能智取，不能硬拼。处理林彪的‘四大金刚’就是个例子。”

叶剑英解释说，“四大金刚”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九·一三”事件后，林彪摔死了，可他的这“四大金刚”还活着，而且还都在中央政治局，又都在军队控制着要害部门，十分不好处置。还是最后，周恩来想了一个办法，即把“四大金刚”调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议上突然宣布他们的罪行，当场逮捕“四大金刚”，关押起来，然后再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定。这就叫先动手，后开口。

叶剑英的办法和汪东兴的办法不谋而合，华国锋脱口称赞道：“这个办法好。李鑫说，当年赫鲁晓夫抓贝利亚就是采用这个办法。”

叶剑英赞叹道：“看来你早已胸有成竹了。”

华国锋说：“就按叶帅说的办，出其不意，打他个措手不及!”

叶剑英看华国锋已下定决心，对华国锋说：“还需找一个可靠的帮手。”

当华国锋问帮手姓名时，叶剑英告诉他是汪东兴。华国锋说：“汪东兴和你意见一样。”

9 月 25 日这一天，叶剑英和华国锋在一起，一直商谈了两个多小时，对策划的这次“重大行动”的每个方案和具体细节都进行了反复的分析、

权衡。叶剑英、华国锋一致认为，在这种形势下，唯有采取这种特殊的手段方能一举粉碎“四人帮”，达到安治天下的目的。

叶剑英和华国锋共同认为，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和军队虽有些人同“四人帮”关系不错，但多半是趋炎附势，投机取巧，真正死心塌地为江青一伙效忠的只是极少数，只要计划周密，先发制人，肯定能一举全歼，稳住大局。

听了叶剑英的妥善安排，华国锋连声称好，随即又列举了一些人的名字。

同华国锋商谈之后，叶剑英进一步增强了粉碎“四人帮”的信心。为了不致引起江青一伙的过度怀疑，叶剑英又在玉泉山“休息”了两天。

9 月 27 日，这位久已“生病”挂职的国防部长突然出面接待外宾。

事实上，叶剑英仍全权领导着陆海空三军，这对“四人帮”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其间，叶剑英会见了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一行。

9 月 27 日下午 4 时 30 分，中美双方举行的会谈结束。叶剑英送走美国客人之后，立即赶到不远处汪东兴的住处“南船坞”。

在汪东兴的陪引下，叶剑英只身穿过两道内门，来到了后厅，见华国锋站在客厅前面迎候。寒暄了几句之后，他们相随走进客厅。

叶剑英问汪东兴的意见，汪东兴回答说：“毛主席不在了，我一切行动听从两位副主席的。”

叶剑英对华国锋和汪东兴说：“毛主席刚逝世，大家心里都很难过，我们本不想这样做，可是不行。‘四人帮’已经动手了，上海的民兵把大炮都拉出来了，江青一伙是要篡党夺权，把我们置于死地。”

听完叶剑英的这番话之后，华国锋也说，“四人帮”的野心很大，他们在上海把大标语都贴到街上了，要王洪文当国家主席，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江青当中央军委主席。一旁的汪东兴乘机点明“四人帮”活动的实质，他们这是公开抢班夺权，武装叛乱。叶剑英对汪东兴说：“这可是一步险棋，搞不好要掉脑袋。”

汪东兴说：“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值得。”

叶剑英看汪东兴如此坚决，又追问汪东兴，如果采取具体行动是否有把握。

汪东兴肯定地回答说：“有把握。”

于是，汪东兴便把中央警卫团的兵力、装备、警戒范围等情况详细地向

叶剑英说了一遍。

随后，汪东兴说：“解决‘四人帮’这几个人并不难，问题是把‘四人帮’搞起来后，能不能稳住局势，会不会出现动乱?”

华国锋听完汪东兴的分析之后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一定能够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商定了大事后，叶剑英又对汪东兴吩咐说，先考虑怎么解决“四人帮”，用什么方法解决。并再三叫汪东兴切记，人员要少而精，行动要稳。

华国锋也嘱咐汪东兴，谋事在于密。对所有参加行动的人都要严格挑选，严格控制，绝不能走漏一丝风声。

汪东兴对叶剑英、华国锋两人保证，他会谨慎行事的。万一失败了，杀头坐牢，他一个人顶着。

逮捕审查“四人帮”

9月30日，在毛泽东逝世的第21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27个生日。

由于毛泽东的逝世，使得这个隆重的国庆日也失去了以往热烈欢庆的色彩。天安门广场再也没有红旗如潮、鲜花似锦的景象，人民大会堂也没有贵宾满座、张灯结彩的盛大宴会的场面。人们看不见过去那种各式各样的集会和游行，也听不到往年那种兴高采烈的笑声和歌声。

中央政治局为了度过这个特殊的国庆节，专门召开了会议，商讨决策。在此之前，江青曾提议为纪念毛泽东逝世的第一个国庆节，中央领导应全部深入到工厂与工人们一同学习劳动，一同召开“批邓”的座谈会。

此时，江青的这项提议得到了华国锋和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赞同。汪东兴为此还责成中央办公厅拟定了一份名单，把副总理、副委员长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全分到北京的各大厂矿企业。具体的方案是，华国锋和王洪文去首都钢铁厂；张春桥和姚文元去北京重型机械厂；叶剑英去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江青去电车公司。

但是，当汪东兴把这个安排打电话通知住在玉泉山别墅的叶剑英时，却遭到叶剑英的坚决反对。叶剑英说，他身体不好，哪里也不去。没等汪东兴把话讲完，叶剑英便挂断了电话。

但是，刚挂断电话不久，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又亲自来电话邀请叶剑英到长辛店出席工人们举行的国庆节联欢。这更加引起了叶剑英的猜疑。叶剑英不动声色地询问这样的安排是否是北京市委的意见，以证明自己的猜测。吴德笑着回答说，这是张春桥安排的。

叶剑英接着问吴德：“张春桥为什么单单让我去长辛店呢?”吴德向叶剑英解释说：“张春桥说，长辛店是毛泽东几十年前亲自点燃革命火种的地方，你是老一辈革命家，去和工人们见见面，会更有意义。”叶剑英听完吴德的话，已经觉得其中可能有问题。叶剑英说：“是很有意义，可惜我的身体不好，去不了。”然而，吴德仍再三相邀。这更加引起叶剑英的怀疑和愤怒。同时，叶剑英也担心华国锋等人会身陷阴谋。他立即打电话给华国锋，

提醒他不要大意。最终，叶剑英以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去会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为由，建议取消这次活动。华国锋欣然同意了叶剑英的建议。

中央领导深入基层参加国庆节活动的计划被取消后，在9月29日夜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又提议改为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泽东著作座谈会，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9月30日晚上7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宣布开会。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群众代表们按照“四人帮”定调准备的稿子，一个一个“批判”发言。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闻名全国的中学生代表发言，年纪不大的中学生竟然以稚气的尖锐声音，猛烈地批判“师道尊严”。

叶剑英不屑于“四人帮”安排好的表演。他微闭双目，神态庄严，根本没有听到这些同一个调子的“传声筒”在讲些什么。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晚上，天安门城楼上下四周的岗哨全是汪兴东亲自布置的，对每一处哨位他都经过反复勘察，做到了如指掌。因为时间仓促，华国锋当晚的发言没按常规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也未经中央政治局常委传阅。所以，当晚，华国锋要讲什么，坐在主席台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谁也不清楚。因而，每个人都听得十分认真，他们也都希望华国锋能讲出自己的意愿。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极为简短。

华国锋这个只历时一分钟的国庆讲话，出乎“四人帮”的意料。华国锋此时竟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不讲“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而江青等人越听越气。

相反的是，叶剑英等一些老同志越听越满意，觉得这个讲话，一反“四人帮”规定的“革命高调”，实在难得。

散会后，张春桥连夜将姚文元喊到钓鱼台国宾馆十号楼，问姚文元，对华国锋当晚讲话的看法。

姚文元没有听出讲话的“奥妙”所在，就盲目地认为，华国锋的讲话太过于简短了。姚文元还说在这么重要的会议上，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也不认真准备一下。

但张春桥说，华国锋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一番精心准备的。他觉得失望，叶剑英等人听了却很高兴。

姚文元似乎受了启发，说华国锋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这种时刻在讲话中怎么能只字不提“党的基本路线”，不提“文化大革命”，不提“无产阶

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也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至连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也闭口不讲，这在全国会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听完这番话，张春桥说，这正是华国锋的高明之处，不讲就是不同意，就是另有打算。华国锋可以不讲，“四人帮”认为不能不讲。因此，张春桥和姚文元共同商量要与华国锋唱对台戏，在下次座谈会上要宣传革命。果然，10月1日国庆节这一天，在姚文元把持下，新华社却发表了与华国锋讲话完全唱反调的消息报道。这篇报道的通栏标题是：“首都工农兵学商群众代表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举行国庆座谈会，决心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这篇报道足足占了半个多版的篇幅，比华国锋的讲话长了许多倍，说出了“四人帮”想要说的话，其目的就是与华国锋大唱对台戏。“四人帮”的野心，路人皆知。老革命家、老同志和一切正直善良的人们目睹“四人帮”在国庆前后的表演，更加激愤，更加期盼叶剑英能够扶助华国锋举起利剑，一举铲除“四人帮”。老同志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自己的热切希望带进山，还有一些人悄悄地上山面见叶剑英，商谈对付“四人帮”的策略。

此间，陈云上了西山。当叶剑英向陈云介绍谈话背景以及“四人帮”阳奉阴违，制造各种事端时，陈云十分愤怒。陈云告诉叶剑英，国民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要尽快采取措施粉碎“四人帮”。叶剑英与陈云这次紧急会晤和交谈，对最后实施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有着重要作用。

王洪文这一天则窜到北京郊区的平谷县，制造谣言。王洪文煽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同日，“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催促“梁效”写作班子，加快整理一批党、政、军领导人的黑材料，送“四人帮”急用。迟群的秘书说：“主席、委员长、总理就要定下来了，要提升一批，罢免一批。”

10月4日，“四人帮”以“梁效”的名义，在《光明日报》上抛出了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动文章。文章中声称：

在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庄严时刻，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梁效"抛出的这篇文章在知情人们看来，其矛头直指华国锋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即使在不知情，但已熟悉"文化大革命"历程，掌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规律"的广大干部群众来看，从这篇署名"梁效"、实则是"四人帮"代言人的文章中，也能明确地感到一场极为重要的'斗争"已经展开。叶剑英读到《光明日报》上"梁效"的文章，仿佛嗅到一股战场上的硝烟。叶剑英一眼就看出了这篇"社论"的"背后动机"，如此露骨，如此恶毒。

这不是一般性质的"社论"，不是一般性质的"黑文"，而是"四人帮"给大小罗罗们，给上海"第二武装"的士卒们，给效忠"女皇"的臣民们，发出的一篇战斗"檄文"，一个紧急行动的号令。

这篇反动文章同样使华国锋震惊了。看完"四人帮"精心炮制的文章，华国锋知道低估了"四人帮"的能量和气焰，江青等人并未退缩，也没有善罢甘休，而是聚积力量，大张旗鼓地反扑过来，抢先打出了"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大旗，公开发出了"谁反对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谁就是修正主义头子"的严厉声讨。

李鑫将报纸上的消息同江青和毛远新在席间的谈话结合起来，一五一十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听完李鑫的汇报，华国锋深感事态的严重。"四人帮"这样做就是要坚决同华国锋作斗争，将他置于死地。

据李鑫报告说，江青正在积极组织武装力量，看样子，一旦时机成熟，"四人帮"就会立即动手。这样的话，结果将不堪设想。

"梁效"的反动文章发表以后，叶剑英驻地的几部电话机响个不停，秘书、参谋和随员们应接不暇。

叶剑英此时实在顾不得亲自接电话、听电话了。但秘书们接完电话必向他报告，而且有回复。

办公室的同志根据叶剑英的布置，一个环节、一个环节，一件事、一件事向叶剑英汇报。当叶剑英听到空军司令员张廷发正在生病住院时，非常焦急，立即派人去空军医院探望，并告达他的指示："病要治，部队也要管。"

张廷发领会了叶剑英的意图，立即出院，亲自坐镇作战值班室。当张廷

发向叶剑英办公室拨通电话，报告自己的指挥位置时，叶剑英听到后，满意地点点头，笑了。

在数个电话当中，有一个电话来自海军司令部。这个电话数次打来，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速见叶剑英。警卫参谋再一次把情况报告给叶剑英。叶剑英最后说道："肖劲光这个司令真是急先锋！好！答复他，请他在小翔凤胡同等候！"

肖劲光和叶剑英见面后，来不及更多的问候，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提出建议说："事不宜迟，再不动手，他们就要动手了！"

叶剑英说："我们正在商量采取措施。"并一再叮嘱肖要加强战备，听候命令。

肖劲光此刻虽然还不知道对付"四人帮"的全部战略部署，但心里总算有了底。肖劲光对叶剑英说了声"保重身体"就要告辞，叶剑英不让他走。叶剑英有意留肖劲光吃午饭，又关切地问了问苏振华的情况，请肖劲光代向苏振华"吹吹风"，让苏振华提高警惕。

吃过午饭之后，肖劲光带着叶剑英的嘱托，迎着满天风云离去了。

叶剑英送走肖劲光后，又驱车前往华国锋新居。到达目的地附近，叶剑英故意让司机转了几圈子，进到东郊民巷十五号院。

叶剑英驱车到来时，华国锋连忙把叶剑英迎进客厅。叶剑英入座后，华国锋便开门见山把办公厅副主任李鑫报告的情况又向叶剑英细说了一遍。

叶剑英早就识破了"四人帮"的险恶用心，他用手指着《光明日报》说，这张报纸他已看到了，"四人帮"故伎重演，这一手很恶毒。

叶剑英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又在玩弄搞垮刘少奇的老把戏，先是写文章，造舆论，在全国搞起一场大批判，大揭发，等把你批倒批臭了，再撤职罢官，开除党籍。

华国锋听了叶剑英一番分析后，更加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他说："没想到'梁效'的文章这样快就出笼了，'四人帮'早就有准备。"

叶剑英加重语气提醒华国锋注意《光明日报》文章的分量，不要小瞧这群舞文弄墨的秀才，他们能量大得很，他们这是向华国锋公开挑战。华国锋说，他听李鑫讲，江青亲自许诺要让毛远新当国防部长。

华国锋以为叶剑英还不知道毛远新调动军队的事情，就说，真若搞政变，何用几百万人，有几千人就足够了。据李鑫报告，毛远新偷偷从沈阳军区调来了两个师，已经开到山海关一线。

早已知晓此事的叶剑英说："我已命令李德生将这两个师火速调回。"



华国锋一怔，仍有些不放心地问叶剑英：“他们要是不听李德生的指挥怎么办?”

向来谨慎的叶剑英说：“我已让杨成武把驻守在天津附近的28军调至塘沽一带，封锁了入京的水陆通道。”

知道叶剑英已经做出了如此周详的安排，华国锋不禁暗自惊叹，因而心中的惶恐之感也霎时间减轻了许多。到了这个时候，华国锋不由得由衷地赞叹说：“有叶帅坐镇，我就踏实多了。”

叶剑英说，他只能帮华国锋敲敲边鼓，战略决策还得由华国锋来定。

叶剑英还忠告华国锋：“军事家最忌讳的是贻误战机。现在要根据情况改变原来的部署，要提前采取行动，我们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否则会坐失良机，陷于被动。”

听完叶剑英的忠告，早已有意提前行动的华国锋说，“他们这样猖狂，又把持着报纸、电台，再拖下去就无法控制局面了，必须赶紧采取措施。”

叶剑英立刻表示赞同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要出其不意，以快取胜。”

华国锋还有些不放心，直言问叶剑英，如果行动起来，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叶剑英似乎早已经深思熟虑，听到华国锋相问，就说，军队他已经安顿好了，各军区、各兵种他都打过了招呼。华国锋心急口快，打断叶剑英的话说，上海的几百万民兵不好办。早已作过周密安排的叶剑英说，他已经命令60军和东海舰队进入一级战备，迫不得已，就武力解决。

华国锋终于消除了最后一丝疑惑。叶剑英说，关键是要把报社、电台首先夺过来，牢牢地控制住舆论。华国锋此时已经不敢再小瞧宣传部门，这些宣传部门被“四人帮”把持多年，要想夺过来并非易事，对于派谁去接管这个问题，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

叶剑英想到了9月27日提到的三个人，于是，握笔在面前的报纸上写下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三个人的名字，推到华国锋面前，并让他找这几个人。

华国锋将这几个名字从报纸上撕下来，放进衣兜。华国锋看到计划大体上落实，又问：“叶帅，你看哪一天动手好？请您决定!”

叶剑英说：“根据我们准备的情况，我提议6日或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你看怎么样?”

叶剑英说着，从黑皮包里拿出写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开且请

华国锋签字。华国锋在《决定》上签了字。签完字之后，华国锋又想起了汪东兴，不知道汪东兴那里准备得怎么样了。在这种情况下，华国锋不好多露面，所以想请叶剑英去探一下汪东兴的情况。

叶剑英非常明白华国锋的意思，于是就主动提出，由他去找汪东兴了解情况。

之后，华国锋就立即按照叶剑英留下的名单，分别打电话召来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原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原中联部部长耿飚，一一作了具体交代。

为了取得决战全胜，叶剑英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家里，倾听汪东兴汇报最后一切准备工作落实的情况，对遇到的难题摆开来并寻求一一解决，使行动计划更臻于完善，更为可行。

汪东兴又将进一步落实的情况，及时报告华国锋、叶剑英。最后经过紧急磋商，确定提前到10月6日晚8时采取行动。

行动方案是："会议"事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主要有两个议题：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按照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不是常委怎么办？为了让他参加，以改动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姚文元不在钓鱼台国宾馆，他在城里的住处属北京卫戍区管辖范围。为防万一，作两手准备，先通知他来怀仁堂开会，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万一来不成，再临时通知卫戍区领导负责就地解决，特意通知吴忠做好准备。对于江青这个特殊人物以及另外几个死党分子，则个别处置。

实际上，叶剑英、华国锋一点儿也没有低估此时的形势。"四人帮"也预感到末日将至，在10月初，更加疯狂地进行武装夺权的准备活动。

10月4日深夜，华国锋被江青的电话缠了两个小时之后，确信无人跟踪，才驶进中南海，正式批准了汪东兴的行动方案。

事后，汪东兴回忆说，本来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后来考虑拖得越久，越危险，更改为6天，定在6号。10月5日下午决定按事先设想行动方案办。

这次特殊行动的第一步就是布置好参加人选的名单，并决定以北京市委的名义逮捕迟群、谢静宜等死党。同时，为了保持稳定，华国锋要求不能用军队去对付学生。

1976年10月6日，是粉碎"四人帮"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日子，所



以，这一天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占据了显著的一席之地。

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天刚蒙蒙亮，北京城大街小巷便响起嘈杂的自行车铃声和激昂的革命歌声。默默无闻的群众又开始了默默无闻的操劳。

10 月 6 日凌晨，汪东兴一反常规，不到 7 点便起了床——准确地说，他一夜都未曾入睡，只在凌晨打了个盹。为保险起见，汪东兴从枕下取出苏制 71 型无声手枪，从枪膛中退出子弹，插进腰间的皮套。看看时间尚早，汪东兴又回到书房，拧开收音机。

正在这时，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鑫走进来，向汪东兴汇报情况。

李鑫向汪东兴汇报说，一切安排均按照汪东兴的布置进行着。会议通知，已经派机要秘书送出去了，“四人帮”都没有外事活动，估计不会有人请假。

汪东兴又再三询问李鑫是否摸清江青的住处。李鑫点头说，江青不会离开中南海。毛远新曾说她老住在中南海不合适，想搬回钓鱼台国宾馆或到别的地方。江青此时立刻反对说，不能走，这房子是毛泽东留给她的，别人谁也无权过问。江青还说，以后她就住在中南海。江青还让他把她留在钓鱼台国宾馆的东西搬过来。秘密逮捕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张春桥。据李鑫汇报说，张春桥的贴身警卫从汉口回来了。汪东兴听到此话之后猛然一怔。

1976 年国庆节前夕，汪东兴与华国锋、叶剑英多次商谈，决定采用武力除掉“四人帮”。为保证秘密行动计划的顺利实施，汪东兴主动批准张春桥的贴身警卫回老家探亲。汪东兴没有预料到的是他又被张春桥秘密调回。显然，张春桥已经预感到某种危险，因此暗中加强了戒备。

为了解决这个意外的情况，汪东兴让李鑫多安排几个人，趁张春桥及其警卫不注意的时候，抢先下手。汪东兴还说，如果他要反抗，就坚决消灭。

李鑫立刻领会了汪东兴的意思。10 月 6 日早晨，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汪东兴集合了负责秘密行动的人员，共有 18 名军官，个个腰佩短枪、匕首。随即，汪东兴向各位发出号令，并宣布了秘密逮捕人员的名单，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毛远新。顿时，大厅一片沉静。

上午，王洪文、张春桥同时接到通知，晚上 8 时，在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望准时出席；下午，姚文元接到电话通知，晚上 8 时到怀仁堂研究宣传问题。

10 月 6 日这一天的整个下午，叶剑英就守候在九号楼，心情极不平静，但又显得平静异常。这是“决战”前的那种平静。此前，叶剑英早已得到

汪东兴的报告，一切都按照部署正常进行。

晚6时40分，汪东兴带领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已经来到怀仁堂，迅速各就各位。

晚7时，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红旗轿车几乎同时到达怀仁堂院门前。

华国锋和叶剑英一道来到怀仁堂的正厅。正厅的摆设变了样：一扇屏风，将整个大厅隔成了前后两个厅。前厅仅留下两张罩着白色的套衣的高背沙发，斜对着门，其余什么也没有。

叶剑英和华国锋分别坐在沙发上，汪东兴带着几个警卫退在屏风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7时55分，院内传来了脚步声。第一个走进怀仁堂大门的是张春桥。在张春桥身后紧跟着他的贴身警卫。当张春桥走进怀仁堂大门时，第一个行动小组的负责人纪和春迎上去，不动声色地恭迎着张春桥。张春桥上下打量了一番就问，叶剑英和华国锋是否到了。此时此刻，汪东兴、叶剑英和华国锋早已在大厅等候了。

正当张春桥的警卫想跟着张春桥一起进正厅时，被两位卫兵拦住了。张春桥为之一震，觉察到不对劲。纪和春忙解释说，这是汪东兴的指示，所有的警卫都在大厅中休息。张春桥无可奈何，只好让警卫在大厅等他。

张春桥随着纪和春朝里走去，刚刚进小门，拐了两个弯之后，张春桥便被紧紧扭住。没等张春桥完全明白过来，纪和春等人已经将他带到正厅里。

早已做好准备的华国锋起身宣布了逮捕张春桥的“决定”。“决定”揭发了自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趁此机会，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进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念完“决定”后，纪和春就给张春桥戴上手铐，把他从怀仁堂的后门押走了。

张春桥的警卫似乎听见外面的动静了，他站起来就要往外走。这时，在座的一位警卫团副团长见时机已到，随即将张春桥的警卫摁倒在地，立刻缴了他的枪。

不一会儿，王洪文来了。王洪文刚进院子时，随身警卫即被留在院外。王洪文感到事情不大对头。当王洪文快走近正厅大门时，专门对付他的行动小组立即走了过来。

王洪文有一点挣扎，当行动组的几个卫士在走廊里把他扭住的时候，王洪文一边大声说“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一边拳打脚踢，拼命进

行反抗。但是王洪文很快就被行动小组制服了，被扭着双臂押到大厅里。华国锋把“决定”又念了一遍。

还没等华国锋念完，王洪文突然大吼一声，挣脱警卫人员的扭缚，由五六米远的地方向叶剑英猛扑过去。

在这个紧要时刻，一旁的警卫猛冲上去把他扑倒，死死地摁住，给他戴上手铐。

秘密逮捕的第三对象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家里，他那地方是由卫戍区管的。此时，汪东兴也事先安排好了，如果姚文元不来怀仁堂，就让吴忠带人去他家里解决。

结果，姚文元也来了。汪东兴怕再发生意外，经请示华国锋和叶剑英同意，没有让姚文元进正厅，只让人把他领到走廊的大休息室，由警卫团一位副团长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姚文元听完后，没有争辩，也没有反抗，只说了声“走吧”，就随行动小组的几名卫士出了门。

就在怀仁堂主战场打响的时刻，李鑫、张耀祠、武建华几位负责在江青、毛远新的住处采取行动，把这两个人也抓起来了。

在秘密逮捕江青的过程当中，张耀祠于10月6日8时30分奉命带领行动小组到万字廊201号，江青此时就住在这里。

张耀祠作为汪东兴的助手，多年来一直掌管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工作。张耀祠对这里的每一处环境，每一个哨位，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当张耀祠带人走来时，守卫在门口的两名警卫竟然没有阻拦他们。

张耀祠连忙提着手枪，带领两男两女四名行动小组队员疾步冲进客厅，没有发现江青。张耀祠连忙又沿长廊奔进书房，也没有发现江青。正搜寻中，一名队员押来江青的秘书刘真，张耀祠从刘真口中得知了江青的藏身之处。

张耀祠急忙把枪一挥，几个箭步蹿到江青的卧室门前。张耀祠镇定了一下，推门进入室内。

江青见张耀祠猛然闯人，不由一怔，知道情况不妙，忙怒声质问道：“谁让你进来的?”

张耀祠并不回答江青的话，只是目光警觉地将卧室扫视了一遍，见无他人，这才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对着江青念道：“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趁毛泽东逝世之机，相互勾结，秘密串联，阴谋篡党夺权，犯下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中央决定对以上4人进行隔离审查。”

还未等张耀祠读完，江青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顿时慌了神。蓦地站起来连问："为什么？为什么？"

此时，张耀祠并没有正面回答江青的问话，只是用命令的口气让江青马上跟他走，江青并没有服从。

此刻，江青更主要的是借此拖延时间，冷静一下头脑，想想对策。这时，她要求进一趟厕所。

大约过了一刻钟，江青从厕所里走出来，神情沮丧，但仍故作镇静。

张耀祠向江青提出最后要求，请她立即交出保险柜的钥匙。

江青不答话，拒绝交出那把象征权力和地位的保险柜钥匙。双方进入高度紧张的对峙状态。

行动组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不断催促江青交出钥匙。江青说："要交，也不能交给你们。"

随后，江青要了一个大信封，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装进去，在信封上写上"华总理亲启"几个字，交给了行动组人员。

在解决江青之前，李连庆就已经奉命带着四名行动小组的队员，于10月6日晚赶到中南海毛远新的住处，对毛远新采取"保护审查"的措施。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北京卫戍区派出力量负责具体解决。

在"文化大革命"中，新闻机构的特殊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在重大行动面前，对新闻机构的掌握决不可掉以轻心。

10月6日晚9时许，汪东兴指挥各行动小组将"四人帮"全部关押之后，按照事先制订的计划，华国锋立即命令耿飚、迟浩田等人火速赶到怀仁堂，并且亲自下达了接管中央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机构的命令。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叶剑英、华国锋等人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